



南斯拉夫  
資料匯編

00026

# 南斯拉夫資料匯編

內部讀物

— 003734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年·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印  
新华書店北京分店內部發行組代售

1957年5月出版

印數1—15,000 統一書號3003·291

每冊(7)2.90元

封面設計者：孫正 校對者：姜獻生等

## 出版者說明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和研究南斯拉夫的問題，特將1948年以來南斯拉夫方面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文件、党政領導人言論以及有關資料選編出版。

本書大体上按党、政治、經濟以及国际关系四类內容分別編排。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年3月1日



## 目 录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章程 .....	1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二中全会于1953年6月在布 里俄尼島通过的決議 .....	13
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非常)中央 全会的开幕詞 .....	21
卡德尔：关于思想斗争的一次挑战的实质(摘要) .....	34
托多罗維奇：两条战綫的斗争 .....	55
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六中全会的开幕詞 .....	81
卡德尔：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社会主义建設 中的领导作用 .....	89
貝吉奇：談談改善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成分的几个問 題 .....	103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組織書記处1956年12月 8日扩大会議決議(摘要) .....	114
* * *	
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組織和政治組織的 基础与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根本法 .....	121
卡德尔：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新的社会和政治制 度 .....	152
关于工人集团管理国家經濟企業和高級經濟組織的基 本法令 .....	172

铁托：在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工厂 .....	179
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新章程 .....	207
烏亞諾維奇：工会和政党 .....	215
铁托：工会应当照顾个人的利益，也要关心集体的利益 .....	219
卡德尔：四年經驗 .....	222
卡德尔：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實踐 .....	230
卡德尔：对有关南斯拉夫国内政治發展问题的回答 ...	274
关于公社和区的新机构的一般法 .....	285
卡德尔：关于区和公社的新机构 .....	303
卡德尔：在新条件下的我国国家管理 .....	334
卡德尔：现代南斯拉夫的基本问题和南美关系（第一、二部分）.....	353
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議会的演說（第二部分摘要）.....	368
* * *	
关于經濟情况和今后經濟政策基础的會議 .....	382
伏克曼諾維奇：經濟發展的协调和提高生活水平 .....	385
铁托：南斯拉夫的經濟問題 .....	395
卡德尔：关于我国合作社政策的任务 .....	421
关于南斯拉夫經濟問題的一些材料	
南斯拉夫的經濟情况 .....	448
关于南斯拉夫的一些統計数字 .....	479
南斯拉夫經濟發展的十年.....	482
南斯拉夫生活水平 .....	489
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經濟关系 .....	494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 声明 .....	497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 情况的决议的声明 .....	600
铁托：对于苏联和对于社会党的态度的言论(摘要) ...	508
铁托：在印度国会的讲话(摘要) .....	512
铁托：在南斯拉夫国民议会关于外交政策的报告 (摘要) .....	519
卡德尔：答丹麦一杂志编辑问(摘要) .....	53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 共和国两国政府宣言 .....	536
弗拉赫维奇：论社会主义各种力量合作的形式 .....	541
卡德尔：南斯拉夫对于联合国的展望 .....	553
铁托致函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	57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 .....	574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 系的宣言 .....	581
铁托：对美国“埃迪·薛伍德”研究班人员的谈话 .....	585
卡德尔：现代南斯拉夫的基本问题和南美关系(第三 部分).....	597
托多罗维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 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宣言 .....	605
铁托：在普拉南斯拉夫人民军俱乐部向伊斯特里亚的 共产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发表的演说 .....	619
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的演说(第一部分)...	643
卡德尔：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机构发展的必然规律就是	

不断地扩大民主管理形式 .....	668
“战斗报”评论：几点意见 .....	679
佩罗维奇：在纪念列宁逝世的时候 .....	685
维尔范：新道路(摘要) .....	693
“战斗报”评论：是真誠的社会主义的討論，还是無原則的爭論? .....	698
波波维奇：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議会的外交政策报告 .....	708

#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章程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

(原载 1952 年 11 月 12 日“党的泉源报”)

## 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自觉地为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而奋斗，并把这种意识灌输于工人阶级和一般劳动者的广大群众。它是根据盟员自觉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自己的活动中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南。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工人阶级的自觉的和最先进的有组织的部分，它同城乡极广大的劳动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它给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了一条道路，并引导它们起来为摆脱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枷锁、为摆脱外国侵略者的奴役、为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的政权、为建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兄弟友谊、团结和平等、为巩固它们共同的联邦共和国、为保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独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条件而奋斗。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为建设社会主义、为保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独立、兄弟友谊、团结和平等而奋斗，竭力用自己的政治和组织的手段发动和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为实现这些目的而奋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所进行的这一斗争及其结果，使它成为全体劳动人民——工人阶级、劳动农民以及绝大多数联合在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而奋斗的统



一战线中的其他劳动者的知识分子的领袖。

因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经常不断地为提高他们的政治和文化而奋斗。同时它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便使他们能够尽量广泛地参加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参加监督社会团体和机关以及经济和社会机关的工作。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活动是公开的。联盟及其各级组织所遵循的原则是：联盟为了顺利进行活动，必须同劳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是依靠劳动群众参加各级组织的工作和参加通过联盟的决议而建立的。因此，全体劳动者参加联盟各级组织的工作和监督它们的工作是联盟的每个组织的主要的工作方法。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中，锻炼成为牢固的、由全体盟员一律必须遵守的自觉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组织。联盟的力量在于它坚持不渝地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正确地表达它们的愿望和利益，在于联盟的牢固团结，全体盟员和联盟各级组织的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在联盟内部，不容许有思想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以及破坏纪律、破坏联盟的纲领、决议和章程的人。同样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员资格同信奉宗教和履行宗教仪式是不相容的。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每个盟员必须为实现联盟的纲领和实现联盟的章程而积极地忘我地工作，积极参加通过和执行联盟及其机关的一切决议，在人民中间以及在群众性的社会组织 and 团体内进行政治工作，为加强联盟队伍的团结、保护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团结、加强它们的联邦的防卫力量而斗争。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进行基于平等原则的工作，以發展和加强同全世界的無产階級和劳动者的兄弟般的国际关系。

## 二、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他們的义务和权利

(一)凡承認联盟的綱領，为实现联盟的綱領、章程和一切決議而誠实地奋不顧身地積極地工作，并在一个組織內进行工作和繳納盟費者，均可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

凡剝削他人劳动者均不得为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

(二)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必須：

1. 經常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覺悟和領会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基础；

2. 为建立人們之間的社会主义关系、树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道德而斗争，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来作为其余劳动者的表率、并在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方面起带头作用；

3. 經常在人民中間積極进行政治工作，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覺悟和政治文化水平，說明和解釋联盟的路綫，發揮群众在通过決議、監督联盟各級組織、社会团体和人民政权机关的工作方面的積極性和主动性；

4. 積極参加通过联盟的決議并切实地守紀律地予以实现。

(三)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有权：

1. 参加在各級組織的會議上和联盟的报刊上討論联盟的一切政策問題和参加通过联盟的決議；

2. 在联盟各級組織的會議上批評任何盟員；

3. 选举和被选举到联盟机关工作；

4. 要求在討論其本人的工作和品行并通过決議时亲自参加；

5. 向联盟的任何領導上或联盟的机关包括中央委員會和代

表大会在內，提出問題和建議。

(四)接收覺悟的積極的和忠實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勞動者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盟員。

加入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盟員不得有任何社會特權。

接收盟員時只個別接收，且須年滿 18 歲。

接收盟員問題由基礎組織全體大會根據聯盟盟員和其他勞動者的提議以及根據申請入盟者本人志願決定。

基礎組織通過決議接收為盟員後發給新盟員以盟証。

加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盟齡從基礎組織通過決議接收為盟員時算起。

接收盟員的書面決定送交區委員會或市委員會或相當於區委和市委一級的委員會。

(五)每個盟員由一個固定的或長期的居住地點遷到另一個地方時必須前往其所移居的當地組織報到，而該組織須將其編入某一組織內。

### 三、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結構和內部民主

(六)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系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這種民主集中制原則為：

1. 一切領導機關均由自下而上選舉；
2. 聯盟各級機關必須向選舉它們的各級組織和機關作關於自己活動的總結報告；
3. 少數服從多數的決定；
4. 下級機關必須執行上級機關的決定；上級機關可以撤銷聯盟的下級機關的決定，如果這些決定和聯盟的綱領、章程和路線相抵觸。

(七)聯盟系按生產單位和地區組織的。



(八)上級机关必須帮助下級机关和基础組織發揮它們工作中的独立性；联盟的一切組織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是独立的。

(九)联盟的組織結構如下：

1. 企業、村鎮、农村以及南斯拉夫人民軍部队中等等为基础組織全体大会；

2. 公社为公社代表會議和公社委員會；

3. 市、区(乡区和市区)为市代表會議，区(乡和市区)代表會議和市委員会，区(乡和市区)委員會；

4. 边区、省为边区代表會議和省代表會議，边区委員会和省委員会；

5. 人民共和国境內为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和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員會；

6.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境內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員會。

(十)基础組織全体大会选举書記或書記处，代表會議和代表大会选举委員會，委員會为代表會議和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十一)除中央委員會外，联盟各級組織的一切領導崗位缺額必須补充，由非常代表會議产生。如果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員會委員人数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員會委員人数减少三分之一，則召开非常代表大会。

(十二)在选举联盟各級机关时，盟員有权提出候选人和發表自己对被提出的任何候选人的意見。选举由無記名投票，对每个候选人分別表决的方法进行。

(十三)联盟各級組織的内部生活系根据联盟內民主、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同意見的爭論發展的。每个盟員有权参加和必須参加其所在組織討論和决定联盟的政策問題。

#### 四、基础組織

(十四)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基础为其基础組織。

工厂、矿山、企业、农村、村鎮、南斯拉夫人民軍部队、居民点等等設基础組織。凡有三个盟員的地方即可成立基础組織。

在社会組織和团体等等內部进行工作的盟員，必要时可由联盟各級組織的領導加以組織成为他們工作所在的組織範圍內的联盟的積極分子，不論他們屬於联盟的哪个基础組織。

(十五)基础組織选举書記和副書記各一人进行日常工作。大的基础組織可設立支部并选举三人組成的書記处。基础組織的支部选举支部書記一人。設有几个基础組織的企业和工厂，选举企业和工厂委员会，任期一年。这种委员会的委員人数由相当的代表會議确定，但不得超过十五人。

(十六)基础組織全体大会照例一月召开一次。

(十七)基础組織直接和劳动人民群众發生联系。其主要任务如下：

1. 經常增强自己的力量，吸收工人階級和劳动农民以及先进知識分子的队伍中优秀的劳动者加入联盟；

2. 經常不断地对自己的盟員进行思想和政治教育；

3. 培养盟員具有共产主义者革命家所独有的一切品質：忠誠、自我牺牲精神、謙遜、可为表率的生活、共产主义的同志般的关系以及一切可为其余劳动者的榜样的品質；

4. 提高盟員同敌对的和异己的观念作斗争的政治警惕性，肃清和巩固并清除自己队伍中的各种野心家和市儈等分子，他們的立場和行为給联盟带来損失；

5. 作为一个政治組織必須經常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繼續發展和巩固，保証同劳动群众保持各种各样的最广泛的联

系,保證每个盟員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最充分地發揮積極性;

6. 經常地坚持不懈地在人民中間进行政治工作以解釋联盟的路綫,把劳动者的政治思想意識提高到联盟的意識水平,用自己的工作來保證劳动者尽量广泛地参加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

7. 整个組織和它的每个成員一样始終必須站在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进步、反对階級敌人的一切殘余和官僚主义表現的斗争中,因为这些东西力圖妨碍和延緩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發展。

(十八)基础組織的活动是公开的,決議由有非盟員的劳动者出席的會議通过;基础組織应在群众的监督和参加下更多地發揮積極性。

## 五、市代表會議、区(乡区、市区) 代表會議、公社代表會議

(十九)市、区(乡区、市区)、公社的組織的最高机关为市代表會議、区(乡区、市区)代表會議、公社代表會議。

市代表會議、区(乡区、市区)代表會議、公社代表會議由相应的委員會召开,至少两年召开一次,而非非常代表會議則根据委員會决定或根据組織的三分之一的成員的要求召开。代表會議听取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的工作總結报告,并就它們的报告通过決議,审查在执行联盟的政策时所获得的成績并給予評价,通过有关今后工作的决定,选举委員會作为自己的执行机关,选举監察委員會。

(二十)市委員會、区(乡区、市区)委員會、公社委員會集体进行工作,在至少有三分之二委員参加的會議上通过決議。委員會从自己的委員中間选举以書記为首的由五人組成的書記处,以进行日常工作。

市、区(乡区、市区)和公社的委员会的委员人数由相应的代表会议确定,但不得超过 25 人。

市、区(乡区、市区)和公社的委员会也可以召开有联盟的个别盟员和联盟的积极分子(他们不是市委、区(乡区、市区)委会和公社委员会的委员)参加的扩大会议。

## 六、边区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

(二一)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边区组织或省组织的最高机关为边区代表会议或省代表会议,这种代表会议由边区委员会或省委委员会召开,至少两年召开一次,而非常代表会议则根据边区委员会或省委委员会、或者根据隶属边区组织或省组织的各级组织成员总数三分之一的要求召开。

代表会议听取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并就它们的报告通过决议,选举边区或省委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二二)边区或省委委员会为边区或省的境内的最高领导机关,并领导自己境内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两届代表会议之间期间的全部工作。边区或省委委员会选举边区或省委委员会的书记处,以进行历次会议之间时期的日常工作;边区或省委委员会书记处的委员人数由边区或省代表会议确定。

(二三)边区或省委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召开,但至少四个月召开一次。

根据边区或省委委员会的决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个别盟员和积极分子(非委员会委员)均可出席边区或省委委员会扩大会议,并有发言权。

## 七、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组织

(二四)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体

盟員組成人民共和國共產主義者聯盟。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為人民共和國共產主義者聯盟所必須執行。聯盟在人民共和國的盟員須執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最高機關的決議和各共和國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

(二五)代表大會的決議是全權的，只要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至少代表盟員總數的三分之二。

出席代表大會代表的比例和選舉方法由中央委員會根據本章程確定。

(二六)代表大會：

1. 聽取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的工作總結報告，並就它們的報告通過決議；

2. 根據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政治路線規定人民共和國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政治路線；

3. 選舉聯盟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

(二七)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委員人數由代表大會確定。

(二八)人民共和國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為人民共和國共產主義者聯盟在兩次代表大會之間時期的最高領導機關。

(二九)中央委員會選舉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作為自己的執行機關。執行委員會從自己的委員中選舉書記處，書記處在執行委員會歷次會議之間時期保證貫徹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和指導日常工作。執行委員會委員的人數和書記處人數由中央委員會確定。中央委員會選舉檢查委員會，檢查委員會審查破壞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綱領和章程以及申訴等事件。

人民共和國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得到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的同意，設立必要的輔助機關以實現聯



**盟的当前任务。**

(三〇)中央委员会根据需要召开会议，但至少一年召开两次。

中央委员会可召开有联盟的个别盟员和工作人员（非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但他们只有发言权。

(三一)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者联盟监察委员会监督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的物质财政活动。

## **八、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最高机关**

(三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最高机关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至少四年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发起，或者根据全体盟员半数以上的要求，或者根据至少三个人民共和国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要求召开。

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的日程须在两个月前公布。

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全权的，只要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至少代表盟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代表的比例和选举方法由中央委员会根据本章程确定。

(三三)如中央委员会没有按本章程第三二条所规定的期限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要求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组织有权成立组织委员会准备和召开非常代表大会。

(三四)代表大会：

1. 听取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并就它们的报告通过决议；

2. 通过联盟的纲领和章程，修改纲领和章程；

3. 规定联盟的政治路线；

4. 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三五)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人数由代表大会确定。

(三六)中央委员会为联盟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时期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国内以及同外国的党和组织的关系上代表联盟。

(三七)中央委员会根据需要召开会议,但至少每年召开一次。

中央委员会还可召开扩大会议,并有个别盟员和工作人员(非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他们有发言权。

(三八)中央委员会选举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为首的执行委员会作为自己的执行机关。执行委员会从自己的委员中选举书记处,书记处在执行委员会历次会议之间时期保证贯彻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和指导日常工作。

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人数和书记处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监察委员会,检查委员会审查破坏联盟的纲领和章程以及申诉等事件。

在联盟的领导方面,设立必要的辅助机关以实现联盟的当前任务。设立何种机关以及隶属领导,最后由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决定。

(三九)中央监察委员会监督中央委员会的物质财政活动。

## 九、联盟在南斯拉夫人民军中的组织

(四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南斯拉夫人民军中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工作形式由中央委员会根据本章程决定。

## 十、对盟员的处分

(四一)基本组织或最高机关对不实现联盟的纲领和章程、破坏纪律、对联盟采取不诚实和两面派手段、违反共产主义道德

行为、不繳納盟費或用其他任何方法給聯盟的利益带来損失的每个盟員，必須予以紀律处分。

加入聯盟的盟員如三个月不繳納盟費，或两个月內沒有任何正当原因不参加聯盟各級組織的會議，或同聯盟的組織失掉了联系，即停止其盟籍。

如基础組織或聯盟的領導上的工作給聯盟带来了重大的損失，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者聯盟中央委員會即可将这些基础組織或領導解散，并規定基础組織每个成員的个人的責任或領導上的責任。基础組織解散后須个别地重新登記盟員。解散領導时，同时須召开非常代表會議以选举新的領導。

对盟員的一切过错須極細心極仔細地加以考察。对盟員的处分带有教育的性質。

受到处分的一切盟員有权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任何領導提出申訴，領導上須在收到申訴書后三个月內作出决定。申訴書可在受处分者得到关于处分的通知后三个月內遞呈。申訴書可在收到关于受处分的通知后任何时候向代表大会遞呈。

(四二) 根据受处分者本人的請求、根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組織或給予处分的領導或受处分者所在組織的提議，可将处分撤銷。

## 十一、聯盟的經費

(四三)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經費为盟員繳納的盟費和其他收入。

盟員繳納盟費，數額占其工資或收入的一定比例，比例由中央委員會規定。

聯盟各級組織和領導根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中央委員會的計劃預算处理聯盟的經費。



#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二中全会于 1953年6月在布里俄尼島通过的決議

——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各級組織

(原載“共产主义者”杂志 1953 年第 7 期)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討論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工作缺点的問題，并認定在对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教育以及他們对人民的政治工作中的缺点，目前是我們最大的弱點。

## (一)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工作形式和方法發生重大的变化。在实现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決議时，在为进一步發展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而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暴露出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些领导机关和組織的工作中严重的缺点，許多共产主义者，也和許多在人民中間进行政治工作的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机关与組織一样，在新的条件下惊慌失措，而这就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方向遭受严重的威胁。無論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決議本身，或是我国社会主义發展上当前任务的實質，都往往不是了解得很正确。

在实现第六次代表大会決議时显露了两个基本的不良傾向。第一个傾向表现为这样一种观点：現在共产主义者要摆脱对进一步發展社会主义所負的責任；目前共产主义者的作用归结起来只不过是做講演；民主制的發展使得反对反社会主义傾

向和現象的斗争成为不必要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各級組織和領導机关对政治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設問題所作的指示，对共产主义者來說不再是必須执行的；取消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指揮方法就是意味着共产主义者要放弃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目的的斗争；他們不應該有自己的立場，等等。第二个不良的傾向表現于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認為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作方法和方式絲毫沒有改变，工作仍繼續按老方式进行，民主只是我們宣傳鼓动的策略，等等。

在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斗争和思想統一方面也有严重的缺点。各种不同假冒科学的和反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流行起来了，而担任領導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水平提高得很慢；思想工作和教育工作千篇一律，而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統一，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面貌所作的斗争进行得特別軟弱。

但是，目前最大的缺点在于政治工作和發揮广大人民階層的積極性的政治斗争軟弱無力。个别共产主义者不再在政治上考虑和在政治上对待問題，丧失了战斗的政治敏感性，变成了官僚，而且有时甚至不再是革命者了，因为革命者在政治上向前看，并且用自我批評态度来回顧已經實現的东西。在我們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甚至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队伍中出現了有时具有重大規模的各种不同傾向。流傳着許多不相干的、异己的影响，庸俗的自發势力的影响，共产主义者队伍中呈現紀律松弛現象，对許多問題發生相当的政治思想混乱現象也是屢見不鮮，而許多共产主义者，包括領導工作者在內，由于担負各种实际專門技術問題和实际經濟工作过重，所以这些現象也就没有什么反应，他們忘記了自己首先是政治工作者，是爭取建設社会主义关系的战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大部分盟員，甚至一大部分領導干部都沒有參加政治斗争。他們的領導部門的“專業化”以

及他們脫離政治生活，給他們自己帶來危害，並且削弱了社會主義力量的政治威力。擔任領導工作的共產主義者往往大多是經濟專家，他們卻從狹隘本位的立場來解決經濟任務，做出各種反社會主義的打算，不從社會主義的立場來對待鼓勵和贏利的問題，而陷入各種純粹專門的論據中，忘記了這個問題的政治方面，忘記了建設社會主義關係的利益，而為的僅僅是實現企業的某種狹隘本位的“利益”，僅僅是獲得尽可能更多的物質資料，但沒有考慮到社會主義關係和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利益。正是因為他們不是從共同的社會主義立場，而是從狹隘的地方立場，從本位的立場，從一個企業、地區等立場出發來對待各個措施，所以就發生有歪曲路綫現象，出現落后的不自覺分子的傾向，在許多地方鑽進敵人，產生對我國建設問題採取不健康的、不問政治和片面態度的一些現象。正是因為共產主義者往往是破壞和削弱我們措施的各种傾向的體現者，所以這就既鼓勵了敵對分子，也鼓勵了各種機會主義分子、保守分子、沙文主義分子和其他反社會主義分子，這些人用民族主義形式作掩蓋來破壞社會主義建設。

我們可以用就落后區和先進區的發展速度問題所展開的爭論來作為例子。有些人認為工業中的積累僅僅是他們的功勞，而不考慮到積累是全體勞動人民社會勞動的結果，某一工業部門的積累是一系列因素的結果，而不僅僅是某一勞動者集體工作的結果。還有另一種意見，認為發達的區應該停止發展，一直到不發達的區趕上它們為止。在各企業、各個區和共和國中都發生了這一切現象。共產主義者聯盟各級組織，甚至領導機關在某些場合下不僅不反對這些現象，反而和這些現象打成一片，只要它們似乎能符合某種地方的利益，甚至還支持它們。他們不了解全體共產主義者和各級領導機關的責任僅僅是要為共產

主义者联盟和劳动者社会主义联盟的政策而斗争，捍衛这个政策，并向劳动者解释这个政策，他們却常常在不良倾向面前实行机会主义退却，对它們毫無反应，也不指出它們的后果以及其可能使社会主义建設所遭受的損害，甚至支持这些倾向。

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工作中的严重缺点之一，就是他們很少关心从社会主义的立場来开展真正建設性的批評以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关系进一步發展的不良現象。甚至出現这种情况：这样的批評被压制，而展开了从反社会主义的立場（資本主义、民族主义、本位主义等的立場）出發的政治上不良的批評。这一切都阻碍了我国的發展，并严重地妨碍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各級組織在人民中的政治積極性。

## （二）

共产主义者联盟工作中的这一切缺点在發生变化的社会关系中有其深刻的根源，可是，这种社会关系是和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政治工作的变化不相适应的。政治工作中的缺点远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已存在。代表大会的決議的目的就是要明确地規定共产主义者在为进一步發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中的任务，拟定新的工作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长时期来就已感觉到的政治工作中的缺点。

以前，共产主义者用行政的政治方法来实行领导。这并不是說，用不着进行政治解释工作，但事实終究是很多共产主义者逐漸更加依靠自己在国家机关中的职位，开始丧失工人阶级最先进部分的战斗政治組織的成員所具备的特征。他們学会了使用行政手段，主宰一切，并且开始放弃从政治上来考虑問題，不去考虑吸引广大人民阶层来参加社会主义事業这一斗争的政治利益。这就使得某些共产主义者的战斗的政治敏感有些变得



鈍化。

社会民主形式的建設和社会职能分散的过程保证了社会主义力量具有强大有力的规模，并且在实践中已得到证实，但这同时也暴露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中的许多不良现象。

此外，我們經濟制度的不完善也产生了新的不良现象。我們在制定新的經濟制度时就指出了它的基础，規定了方針，但在这个制度中还有許多缺陷。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許多組織以及个别共产主义者不去为消除这些缺陷而斗争，相反地，却竭力利用它們来满足自己狭隘的、地方的、本位主义的自私自利利益，或者用来逃避各种決議。这些缺陷便于于各种各样沙文主义倾向、民族主义和小資产階級自發势力的敌对影响流傳起来。

这就是共产主义者联盟工作中不良现象的基本原因，而这些不良现象还由于沒有正确地理解第六次代表大会決議的結果而更加表現出来了。

### (三)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發展的基本前提是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識，这也就是目前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主要任务。而为使共产主义者能够实现这个作用，就必須在共产主义联盟内部加强对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教育工作，巩固他們思想上和政治上統一的工作，根除共产主义者意識中旧的資产階級理論殘余的工作。对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教育也就是在日常的政治斗争和工作中把他們教育成为自覺的政治战士，但这不单是用获得一般的馬克思主义知識的方法来进行的，当然，这种一般的馬克思主义知識也是必須的。

加强共产主义者联盟各級組織和共产主义者对各种損害我

們制度的現象的戰鬥的政治敏感，教會他們不是從本位立場和實際主義立場來解決各種不同的社會政治問題，尤其是經濟問題，從而得出反社會主義的結論，而要教會他們從政治上來解決問題，發揮他們的政治積極性，使他們能夠不是用行政的方法和一般政治口號，而是用進行具體的政治鬥爭來迅速而正確地對待問題，增強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力量在反對不良的現象和反社會主義現象的政治鬥爭中的團結，為我國貫徹到底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而進行鬥爭，對領導機關和共產主義者聯盟各級組織的工作進行更多政治分析，反對主觀主義的和任意的解決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這就是目前共產主義者的思想教育工作中的首要任務。

建成民主社會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是和社會主義力量更加有力的發展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但是，各種敵對傾向以及其他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傾向也同時開始進行活動。因此，覺悟的社會主義力量首先應該把自己的積極性用來提高人民的社會主義意識，以反對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而來的一切不良現象。

反對領導幹部陷於經濟的和行政的實踐主義，要求我們的幹部首先注意經濟實踐所引起的政治問題，向勞動人民解釋我們國家措施和經濟措施，在通過各種決議以前進行政治準備工作，使我國勞動人民認識我國經濟關係中的變化，——這就是共產主義者的首要任務。

目前的形勢以及各種現象和傾向，如果及時發現它們用自己努力來消滅它們，那是不可怕的，但是，假如我們看不到它們並且不是堅決而巧妙地反對它們，那末它們就可能成為很嚴重的。此外，外國的宣傳機關正在利用、鼓勵和發展我國的這些不良現象，企圖使這些不良現象更加深化。

因此，反應迅速，直接到人民中去，提出政治論據，從政治上

揭露敌对的不良现象，进行政治解释，——这也就是有效的反应。共产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联盟各级组织的高贵品质决定于他们怎样和用什么方法从政治上来进行反应，在人民中做了多少工作，他们进行工作的群众组织怎样，他们如何坚决地反对危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盟的一切现象。而这并不是用一般指令，而是通过在人民中直接的政治活动以及对当地这一切不良现象的直接反应来达到的。

对我国的国际形势、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国际事件解释不够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严重缺点。对外政策问题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机关中很少讨论，它们对对外政策问题注意和研究得不够，因此出现各种错误的不承担责任的解释，我国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走进另一极端。对我们对外政策的敌对解释没有顺利进行斗争，对我们对外政策上的各种倾向以及对我们外交政策上各种步骤的错误说明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反击。今天，当国际发展上略有转变的时候，各种错误的解释可能会在这方面造成很不良的后果，也就是说这些错误解释或者能够引起各种幻想，或者能够对群众发生这样影响，以致他们不了解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即我们对外政策独立自主的原则。

必须不是用命令方法来把刊物变成我们政策的工具，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利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政治思想工作，公开的讨论，揭露不正确的立场以及提高我国新闻记者的水平。

必须把积极活动集中在政治问题上，集中在发挥人民觉悟的斗争问题上，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者不问政治的、官僚主义的、本位主义的观点，增强共产主义者联盟各级组织中的思想统一，迅速而顺利地反应一些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巩固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各级组织来反对共产主义者队伍中一切不良的和异己的现

象，經常把一切妨碍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团结的分子清洗出来，关心人民的真正的政治积极性并为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路线而斗争，而不是关心死板教条的和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发挥共产主义者在群众性社会组织中，首先是在劳动者社会主义联盟中的政治积极性，这样就使得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贵品质决定于他在反对敌对倾向以及其他各种有害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斗争中的随机应变，反对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反对轻率的恶意宣传、本位主义、狭隘性，沙文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民族主义的和庸俗的倾向，而首先要反对队伍本身内部的这种现象。

这就是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而斗争中摆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面前的主要任务。

###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



##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第三次(非常)中央全会的开幕詞

(原載 1954 年 1 月 18 日“战斗报”)

鉄 托

同志們！我想來談一談為什麼我們要召集這次全會，談一談我們召集這次非常全會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當然，首先要指出的是：如果一切都處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談的只是那些大家都知道的並不涉及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的小事情，那末，我們就會採取別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了。但是，由於德熱拉斯同志的文章具有妨礙正確地實現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的性質，由於這些文章具有這樣的性質，於是，使得本來只能由新的代表大會解決的、關於共产主义者聯盟和社会主义繼續發展的重大的內部問題，卻被提交社會討論，就是說，被提交給非黨群眾討論了。顯然，所有這一切引起的後果，就使我們不得不召集這次全體大會。

德熱拉斯同志的文章是他個人的作品，是他個人的意見。在這裡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既然他也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中央委員，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早些採取措施呢？這樣不是可以不動聲色、少受損失地使問題得到一定的解決嗎？

如果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那我就得承認：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有一定程度的過錯的。因為德熱拉斯同志早就寫了這些文章，並且在今年秋天他也有一次問过我：“老朋友，你對我寫的文章有什麼意見，你在這方面有什麼想法？”我回答說：“有一些事情我是不同意的，但是基本上還是好的，所以我想這些還不足以成

为你不写的原因，繼續写吧。”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文章中也涉及了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谈过或写过的事情。

只是在不久以后，在12月，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我才发现德热拉斯同志太异想天开了。当时我发现，在这些文章中他实际上是在抨击共产主义者联盟（我不想涉及到几个理论上错误的原理，这将由卡德尔同志来谈），我发现问题是要取消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破坏纪律，是要使我们党的统一和我国的统一遭受巨大的损失。在这点上我是没有看错的。如果我看错了，那倒是我们的运气，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错。所有这些结果是很坏的，这不仅对我们的联盟，而且对我国都起了不良的后果。

不能说，德热拉斯同志的这些文章没有遭受过个别同志的严厉批评，不能说个别同志没有和他谈过根本不同意这些文章的意见。关于这一点他们自己会来谈。但是我发现，德热拉斯同志在这次批评之后，在个别谈话中仍然是沿着老方向前进，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文章中更力图加剧这种情况，我还想告诉你们，当时我不在贝尔格莱德，而在斯洛文尼亚疗养，当时我曾坚决和严厉地对待了这件事情，并且要求立刻停止刊登他的文章，一直到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中枢解决这个问题时为止。

德热拉斯同志当他在“新思想”杂志上还未发表最后一篇文章以前，就知道了我的否定意见，但他极快地把它发表了。他想用这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呢？我能猜想到，事实上他是想利用这篇文章使我们，使他在“新思想”杂志上所攻击的这个“集团”不可能在精神上根据平等的原则来争论他的一些思想原理以及其他原理，在这些原理中，他抨击了官僚派，或者说得好听些，他在消除我国官僚派的问题上闯进了洞开的大门。

我不打算在这里争论或谈论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是专事攻击他人的小册子。这对我来说不是重要的。对我来说重要的

是他以前所写的东西。这一切会引起什么结果呢，他想把事情弄成什么样子呢？我应该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我說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有意识地做的，而且事先就知道这样行为能给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我国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就太激烈和太沉重了。我认为正是因为对我国发展的实际的（和对由此而能发生的事情不了解），就是促使他继续写我们不同意他写的文章的因素之一。

他很倉卒地（一星期內三篇文章）在“战斗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不是某种新的独创的理论呢？这些思想是不是关于我国发展、关于我国实际情况的发展的新思想呢？同志们，不是的。今天我们有些同志还问：“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攻击他呢？为什么召开非常全会来讨论那些你们也說过的东西呢？”我回答说：是的，这里是有我和卡德尔的想法和說法，也有其他一些同志的想法，这些想法我们都在会议上公开地談过。我是第一个談到了党的消亡，联盟的消亡，但是我并没有說这只要經過六个月，一年或是两年就可以办到，而是說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要最后的阶级敌人还能有害，只要广大群众还没有掌握社会主义意識，那末就談不到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消亡或消灭，因为共产主义者联盟要和它在革命时期对革命的胜利負責一样对实现革命的成果負有責任。联盟应当存在，还不仅要存在，而且要成为思想上更强有力的，以便認識到它本身应起的巨大作用。这絲毫都不奇怪。但是現在談的是关于德热拉斯同志在他的思想方面，或者像他自己所說的，在他的“哲学”观念方面所闡述的問題。当他提到了那些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并用来在消灭官僚主义方面和日益完善形成我国社会生活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符合现实的事物时候，他在自己的“哲学”議論中得出了什么样的結論呢？他想以此来掩飾他所宣傳和所写的主張，即消灭共产主

义者联盟，使资本主义复辟，而这已不是以前那样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形式，因为在西方的民主形式中必然有一般的社会形式。

他向我们宣传的不是新型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抽象的民主，这种民主似乎是充分的民主，而实际上是無政府状态。

对我们来说，民主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民主就是达到主要目标——社会主义的手段，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最民主的管理形式，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真正的民主，而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宣传和描述为民主而民主，而且是西方的形式民主，这就是倒退到旧的社会制度形式去，而不是像德热拉斯同志所说的那样向前进。为什么呢？他在这里所写的东西，我们已在很多修正主义者和最著名的改良主义者那里读到过。因此，他不能在他的“哲学”思考中作这样的妄想，即：他在继续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民主，而我们这些落后的老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却在阻碍这种迅速的发展，所以必须用什么方法把我们推开。照他的意见，我们是机会主义者，而实际上，我们在革命的社会发展观上，却同他所写的东西离得那样远，就如天离地一样。既然他如此远远地向后倒退，所以我不愿在此深究，这里是不是有难为情，因为实际上存在有两种极端。但是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的那种极端在他的文章里表现得最明显。

同志们！我现在为另一件事而感到不安，我为许多盟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低得难以想像而感到不安，他们还以为这是我国进一步向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我国现实生活的一种什么新理论。使我惊奇万分，而且这是主要的，什么东西引起每一个觉悟的共产主义者深虑不安，什么东西使我们负有责任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联盟中共产主义者的内部生活。由此而出现了涣散状态，这是毫不奇怪的。我可以公开对你们说，如果我看不到简



直像南方大雪塊開始從山頂上倒下來那樣極有害的後果，那我無論如何不會這樣鄭重地向同志們建議召開全會。說老實話，我認為只要讀一讀12月間外國通訊社在塔紐克(ТАНЮГА)的報導上所寫東西，就足以看到我國社會主義現實的所有一切反對者是怎樣迅速地抓住了德熱拉斯的這種理論，又怎樣為這種理論而興高采烈。他們說，很明显，民主已遠遠超過了他們所想像的，因為今天已有一位理論家能採取這樣一種立場，他能說絕對必須消滅這一或那一現象，因此，正如他們在那里所寫的，南斯拉夫已接近於西方的民主。確實，南斯拉夫是接近於西方的民主，但不是在內部制度的問題上，而是在國際合作的問題上接近於西方的民主。

德熱拉斯同志為什麼同他已共同工作17年的老同志們發生分歧呢？德熱拉斯同志始終有可能在我們集團內發表他所想的東西，甚至比他所寫的還要更多的東西。我們全都了解他，我們彼此間也都爭論過，開過玩笑，而一個人在開玩笑時是什麼話都會談的。但是，這些問題在我們集團從來也未用公開發展的那種形式來討論過。他在此以後仍認為沒有必要在執行委員會或在書記處的會議上說明自己這樣寫作的意圖。當然，我們是沒有允許他這樣寫的，因為正如我在上面已對你們說過，這只有代表大會才能討論和解決，而不是通過輿論界或報紙來討論和解決。讓那些從某些腐朽的自由主義動機出發來捍衛自由發表思想傾向的人原諒我吧。我們一向來，特別是在我們和蘇聯斷絕關係以後的最近幾年來，都沒有阻礙過自由表達思想，但這些思想應當有自己的地位，應當是共同爭論的結果，應當是進步的、先進的、推動我國現實向前進的思想。

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誰要是妄想他能像鳳凰那樣從自己腦子裡產生最成熟的思想，那他就會犯錯誤。這樣的事是不會

有的。我們到現在為止都是集体地工作的，除了集体工作，互相交換意見、彼此激烈討論以外，就不可能有其他方法，只要大多數認為是最正確的，就应当採納。這個原則以後在我們共產主義者聯盟中也應當保存下來。聯盟同其他一切聯盟和政黨所不同的地方，正是因為聯盟有這樣的紀律，它是成熟的，而且大多數同志也都認為紀律是必需的，這是很好的。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諳通一切事理的人，而我們中間誰也沒有權利妄想這一點。誰也不可能超出并駕凌在眾人之上，我想，德熱拉斯也很少有权妄想這一點。因為他脫離了我國現實生活，他不知道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質何在，他也不知道我們的決議，不了解制定我國法律的所有一切痛苦和苦難，我國法律是根據什么样的因素制定的，我們是和什么东西進行鬥爭，我們是如何困難地獲得目前所有的東西，對這一切困難和痛苦歷史，他是不了解的。

德熱拉斯同志在工作中從來沒有像我們已故的基得里奇同志以及那些他宣布為官僚主義分子的人在日常工作中表現出來的那樣極大熱情，因為他認為這是實踐主義和平凡的瑣碎工作。然而這正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這是社會主義的勞動，這是真正的工作。社會主義正是由這些工作才構成的，而不是由我們中間的某一個人，具體地說來就是德熱拉斯同志臆造出來的某些抽象思想構成的。這裡沒有社會主義。誰不了解我國發展的實質，誰就不能期望從哲學的立場正確的描述和解釋我國現實情況。但德熱拉斯同志却是離開了我國現實的。我希望他自己會說明這一點。

同志們！此外，從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來看，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堅決反對布里俄尼島上召開的第二次全會的決議，當時我們談到了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異己的、歪曲的、落后的、過时的形式和概念發生有害的影響。他也違背了這一點。

同志們！這就是促使我們必須而且只能在全會上解決的因素。當然，我不想說明德熱拉斯同志的議論中存在有怎樣的矛盾；這讓卡德爾同志來談，他將對這一問題作一個報告。我在繼續講話前還想着重說明一件事。我不久前就和大家談過，我們是不夠警惕的，但並不是完全沒有警惕，而僅僅是在一定程度上警惕不夠。我認為難以過早地決定這個問題，難以在德熱拉斯顛倒黑白任意向輿論界說明自己議論以前來解決德熱拉斯同志及其觀點的問題，因為人們還不了解，以至認為，這是集團內部爭奪權力的鬥爭，同時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當時在他的第一批文章發表以後就已提出了德熱拉斯及其在聯盟領導中的地位的問題。

照我的意見，這在現在暴露出來倒是好的。讓大家從中看到我國民主實踐，我國民主的寬容態度，如果有必要，讓大家看到，我們已等待到了極端可能的界限，但是，事情一弄到頂點時就要說：停止吧，讓整個中央來談一談，應該怎麼辦，對此有何想法。我認為，這終究不會引起這樣重大的惡果，而一切已經發生的惡果，是由於德熱拉斯的過錯而產生，但無論如何不是由於我們的罪過而產生的。

同志們！有一個情況是很有意思的。從德熱拉斯同志的文章中以及他的所有一切觀點中尤其可以一望而知：他一句話也沒有提到工人階級，好像工人階級並不存在。可見，我國整個革命前的準備鬥爭、革命鬥爭以及革命後的我國建設事業的主要代表工人階級，他都沒有想到，而在其“哲學”議論中卻把過去的資產者剝削者、過去的部長、過去的資產階級先兵同覺悟的工人彼此看成一樣——這一切現在對他來說都是一樣。

這樣結果怎麼樣呢？結果就會導致無政府狀態，導致無法知道的可怕境地。因為如果我們允許這樣做，那末在一年內就

不会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我所說的就是如果没有流血的斗争，也就没有我国社会主义现实。这就是这种观念的后果以及这些思想在我国流行的后果，因为我国还存在有意想不到的残余和各种各样观念。这一点现在最明显看出来：在过短时期内，在这几天内就已产生了不满情绪，国内反动势力和一切摇摆不定的不健全分子已开始抬头，更不用说西方的反动势力了，它们认为，德热拉斯将在我国举起民主的旗帜。

当然，我不怀疑绝大多数共产主义者的觉悟程度，但是也有成千万这样一些人，他们增加了动摇分子和各种冒险分子的数目，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不仅使我国的成长受到损害，而且也使我国应该重新去争取早已取得的东西。

德热拉斯同志就是没有看到这些后果。我以为，他作为我们党内长期的领导者，有充分时间来考虑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就像他有时间考虑其他事情一样。现在有人问道：他确实是如此无知呢抑或这是另外什么的后果，因此，我提请全会来决定：这是不是消灭最革命的因素（它们正是我们队伍中传播社会主义意识的体现者）的有意识的、有系统的准备工作。

同志们！由此可见，正如我以前所說的，他恰恰忘记了体现这一切事物的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想到工人阶级。这是不是一种使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造成分裂的企图呢？这是不是下意识的或有意意识的破坏我们社会主义联盟队伍的统一呢？在我脑子里出现了这些想法，而这是应该加以说明的，因为现在已有了这样一种趋向，即很多人說，工人能做什么，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们不是什么理论家，他们只有自己的工厂，就让他们和以前那样在工厂里做工，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现在管理着工厂。现在一些酒吧间的争吵者、政客、接近编辑部的公众、某些文学家等等都来了，他们来自小资产阶级队伍，来自那些由于某种



原因早已不在我們队伍內并已滾蛋的人的队伍。这样，这就應該是优秀人物組織成的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識和發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体现者。

为什么我从德热拉斯的文章中見到了修正主义，同志們，这是不难猜中的。我想你們大家也都看到了这种修正主义，我簡直难以相信德热拉斯沒有看到这一点。这里就提出了关于不惜用任何代价換得民主的問題，关于和伯恩施坦对目的的說法完全一致的說法（这最好由卡德尔同志来談），以及其他許多說法的問題，这些說法在西方得到某些修正主义集团异常的贊同。而德热拉斯同志沒有見到这一点，沒有看到这就是修正主义，而且是最坏的一种修正主义，即改良的机会主义，而不是他想在自己的文章中所提出那样的革命激进主义。这里絲毫也沒有什么革命激进主义。这只是把历史的車輪拉向后轉，而不是推向前进。請原諒我，我應該極其尖銳地表示，德热拉斯同志脱离我們并不是为要更迅速地向前进，而是拚命向后退到旧社会去。

現在問題仅仅在于：他是不是意識到这一点，是不是看到这一点。如果他是意識到的，那就是說他早就已考慮到这件事了；如果他沒有意識到，那我們希望他会有一天确信这一点。

从德热拉斯的文章中可以察覺到的影响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質。其中有一种影响我已經提到过了，即他脱离了目前的现实，脱离了自己的同志，找到了另一种社会，而且也有这样社会；其次是西方的影响，出国旅行，——其他各种各样的影响，只不过不是我国现实、我国革命的往事和历史上一般革命經驗的影响。

有人說，革命有自己的邏輯，有很多事物是要重复的。一个人从这种情况就可看到事实确是如此。在革命初期，在武装冲突时期，当广大群众發动起来的时候，革命就容易向前推进；当群众起而破坏过时的东西，陈旧的东西，为他們造成难以容忍生

存条件的东西时候，这种震荡就少得多或者很少，而人们脱离革命车轮的这种情况简直例外。但是，在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即在武装冲突和革命胜利以后，成为这次革命代表者的人们碰到斯齐拉和哈里白德<sup>①</sup>的各种各样暗礁，并和它相撞，那时情况就很艰难，尤其是当事情不是像某些人所期望和想像的那样轻易而迅速地进行的时候，一些软弱者便逐渐垂下双手，他们抛掉武器或是要求事情进行得更迅速些，而不顾这一般说来是否可能，并且寻找各种借口、理论和哲学来斥责社会改造的这种缓慢发展。

这里具体说来就是德热拉斯同志。他是那些在痛苦而困难的现实中、在我们沉重的工作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中感到无法忍受的人们中的一个。他在这里坐不住，他在这里自相矛盾，和本性发生矛盾，现在他寻找另外的借口，毫无任何根据责备我们，说我们是继续迅速发展的障碍。在什么地方是否有过这样的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大胆地消灭了他们昨天所做的但已认为不合适的东西，以便创造某种新的、更好的东西呢？是不是有过这种革命，革命的领导者这样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以便像在我国这样使一切事物向前发展呢？没有。

当时他为什么有权利如他所说的那样认为这是一个长满苔草的池沼，他投入了一块石头，以便掀起波浪，而使事业更迅速向前推进。同志们！我不知道给我们这担任重要职位的人加上什么保守主义和机会主义罪名的这样思想从何而来。显然，这是不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不了解我们工作的条件的结果，不了解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国家中的发展，即在具有各种各样使我国大多数居民意识感到累赘的观念的落后国家内最先进社会制度的发展受到历史制约性的结果。这就是说轻视地对待这

---

<sup>①</sup> 昵称名。——译者

一切。

当然，当时他所写的一切东西归根到底都是要打开大門的一种平常意图，虽然关于这一点其他同志已談过。我同意我們也談过这一点，但是当我們談到要联盟的消亡或相适应的党和国家的消亡时，我們从来也沒有說这将是明天，后天或是过一两年的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是艰难而痛苦地發展起来。

在任何情况下都和德热拉斯的文章一起显露出来的唯一优点就在于，这一切使我們和我們很多人头脑清醒过来，使我們大开眼界，看到我們从来沒有怀疑过的东西，但同时我們也不相信有这么一大批人，他們（特别是德热拉斯同志）認為我国已消灭了阶级敌人。德热拉斯認為沒有阶级也沒有阶级敌人，全都一样。但是正是德热拉斯事件却表明了，阶级敌人对我們有怎么样的危險。阶级敌人存在着，这在德热拉斯文章發表后就明显看出，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也有阶级敌人，他以各种形式来表露自己。有一点該是肯定的，即我們將要更多地注意到，使任何一个人都不要以为阶级敌人及其消灭的問題只是武装斗争和結束这一斗争的事情，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設完成，我們进入最高的阶段即共产主义为止。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种各样敌对力量将以各种形式反对我們，妨碍我們，如果注意到西方的影响，就尤其如此。

誠然，德热拉斯同志曾对青年寄以特別重大的希望，而他在这里却力圖取消青年呢！不需要青年！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如果誰要取消共产主义者联盟，只留下一些共产主义者，他們可以成群地在酒吧間、啤酒店里，在各个角落和办公室里彼此爭吵、頂嘴，那末就很明白看出，他也贊成取消青年联盟。

他甚至也不給工会留有余地。我想听一听他怎样來說明这

是正确的，我們都知道，我国工会还有重大的任务，在很长时期内，它們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在生产者中間扩大社会主义意識。

同志們！我想在这里說几句來說明我对德热拉斯同志所犯錯誤的看法。这是有关我国的統一的重大錯誤，而离开这种統一就会使我們遭受損失。在結束时必须強調这一点，但現在我也可以說：我認为如果我們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我們这些我党黨員現在走到了另一極端，并且在尖銳革命斗争时期那样办事，那是絕對錯誤的，不仅是無益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在目前，我們已經如此强大，以致可以完全用另外的方式，用新的方式，用我們所固有的方法来进行反对这种企圖的斗争，并尽力不把那些犯錯誤的人，甚至犯很大錯誤的人消灭掉，而使他能看到自己錯誤，并且今后尽力工作，以便在某种程度上糾正他們所做的事情。

我知道德热拉斯同志就是这样的人。我認为他是一个必須并且應該看到他所做的事情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應該接受任何批評和党的任何处分，然后繼續工作，不致离开建設社会主义的人們的队伍，而且繼續工作，今后帮助糾正他給国家和共产主义者联盟所带来的損失。

我談到这里为止了，我認为爭論應該向这个方向进行，即德热拉斯不是批評所唯一針對的目标，批評应当針對我們目前联盟內外的情况。我应当說明，在德热拉斯事件之前就有很多材料和証据，它們說明應該更坚决反对那些想利用民主的外衣而危害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們，目前这些人由于德热拉斯的文章便以为中央已發生了分裂，他們就可以做到他們所想的事情。这次爭論应当有这样方向，就是要使这些人不能說什么話。我們必須証明，虽然發生了給我們带来巨大損失这种悲惨事件，但我們終究不應該犯新的錯誤，陷入另一个極端，而是应当通过一



些決議來使我們能夠頑強地向我國制度進一步民主化的方面前進，並且決不改變我們進一步正常的向社會主義、向社會主義民主制邁進的方針。情況就是如此。希望不要有什麼憂慮，以為現在需要改變我們的方針，因為我們根據這一方針前進時犯了錯誤；我們應當沿着民主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這條道路前進，但要更加警惕和謹慎，使得我們以後不會說，我們又一次瞎了眼。這就是我所要談的。



## 关于思想斗争的一次挑战的实质(摘要)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  
(非常)中央全会的报告

卡 德 尔

为了说明执行委员会对德热拉斯同志的文章的态度，也就是说关于这些文章的思想性和政治性，铁托同志已对全部主要内容作了说明。德热拉斯文章中表面上的理论论证，实际上是次要的东西。首先，它所以是次要的，是因为德热拉斯先是提出政治提纲，然后急忙地对这个提纲作公式般的理论说明；这种说明，实质上既不深入，也不科学，形式上相当纷乱；作这种说明为的是使这个理论看起来是重要的，虽然它并不是这样。其次，它所以是次要的，是因为假如他的文章没有政治意义，中央委员会就不会来干预德热拉斯同志的理论思考。

同时，由于存在着某种意见，认为德热拉斯同志的观点对我国具体的政治实际状况，在政治上当然是有害的，因为根据这种意见，它“表现得过早”，可是，它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它毕竟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某种“新”贡献，是某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某种向前看的观点，所以，考察这些文章的理论方面，将是有益的。关于这一点是可以这样说的。当然，这次全会没有很多时间来更详细地研究这些文章。因此，我极力根据对德热拉斯的文章的分析，依照这些文章的写作次序，仅对下面三个问题加以解答：

(一) 反映在德热拉斯同志的文章里的观点是否是真正的“新”观点；

(二) 这种观点是否对社会主义的理論思想的真正的貢獻，它是进步的，还是在向后退；

(三) 这种观点对我国的现实生活有什么意义，它对于我国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的發展有什么結果。

同时，我想着重指出一点，就是对德热拉斯同志文章的理論部分的批判，不应从这种意見出發，說他要想成为“新”人物。我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是在前进着，無論在理論上或实践上，我們从来也沒有采取过这种态度，認為社会主义的理論思想的全部發展，即社会科学的全部的繼續發展，是随着馬克思的去世而終結的。同样地，我們在任何时候从来也沒有贊同过这种观点，說共产主义者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斗争中必須遵循馬克思或恩格斯的每一句話。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全部方針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方針，虽然我国还有个別共产主义者是教条主义者。我們的这种方針，特別明显地表现在1948年我国同苏联政府的冲突上。如果我国共产党的方針是教条主义的話，那么我們当时就会經受不住我們業已經受住的压力。此外，在我国具体地建成社会主义方面，富有許多新的形式和新的理論結論，以致我們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我們真正对現代社会科学(其基础是馬克思奠定的)作出重大的貢獻。

反对教条主义，死搬公式，官僚主义和反民主主义傾向的战斗，在已經改变了的經濟关系的基础上争取新的社会生活的形式的战斗，为了建成社会自治的民主机构的斗争等等，几年来，在我国順利地繼續进行着。整个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一个組織站在这种立場上。这种方針同样是作为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基础，也是党章法則及在工業、国家建設，換句話說，社会建設方面反官僚主义的一切措施的基础。

因此，如果問題涉及所有這一切方面，那末德熱拉斯同志是耀武于無人之野，作不必要的賣弄，他發表了動人的宣告：“清剿戰場，可是，却是為了戰鬥”。我們不明白，在這裡，如果德熱拉斯同志不是為了繼續我們的中央委員會不僅在1948年，而且在1948年以前，就已宣布過的那個鬥爭而振奮，又是什麼新的戰鬥使他振奮。在我所談過的鬥爭的任何場合，德熱拉斯同志只能進行破壞，當我們注意到他是怎樣無組織地拿着舊式武器跑到戰場來。

### （一）德熱拉斯同志的出發點

既然德熱拉斯同志所宣稱的鬥爭的性質是有問題的，所以這個“戰場”上力量的配置也就有問題了。在德熱拉斯看來，我國有以下的幾種力量在交戰着：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二、官僚主義和官僚；三、社會主義和民主。每個人都期待他寫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而不是寫社會主義和民主。我認為，他的這種戰略就好像是一個將軍在戰場上作了如下的計劃：敵人有30個師，而我們有戰旗和戰壕。可是我們的師團在那兒呢？誰將在這些戰壕里作戰呢？這並不使戰略家德熱拉斯感到興趣，儘管就是任何戰略原則所在。同時，德熱拉斯同志總是喜歡抽象公式主義，喜歡機械地搬運別人的公式和依據比擬來作結論，他從來也不切實地對他所說的現實作認真的科學分析，並且在這種情況下，他是研究概念，而不是研究實際力量。這就是他的文章中幾乎全部公式在理論上毫無根據的基礎。

因此，在按照德熱拉斯的意見來配備社會力量時，發生了兩個問題，即在某種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我重復一遍——僅僅在某種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和官僚，是一定的階級趨向的代表，這是很清楚的。可是，民主怎樣才能夠成為社會主義的動力，這一

点是完全不清楚的。

直到現在，誰也不會懷疑民主仅仅是一种政治形式，民主本身并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德热拉斯同志本人在其文章中最后就是这样来研究民主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配置階級力量时把民主放在社会主义的实际的階級力量所应有的地方。但是，假如德热拉斯同志做到这一点，那他将会获得与他头脑中的現成公式相反的结果。如果他是从分析开始，分析一下給南斯拉夫带来社会主义的那些階級力量，即物質的社会力量是怎样的，發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階級的物質的可能性是什么的話，那末，他将得到同他头脑中的現成公式相反的结果。但是，由于他的出發点是他的提綱，而不是我国的现实，因此，他就不会更改自己的提綱，而極甘願把我們的活生生的现实装在自己的公式框子里。

……这里产生了一个問題：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和階級力量才能使社会主义發展呢？我們認為，从馬克思到今天，也就是說，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存在的那一天起，社会主义的动力是工人階級，是同其他的一切劳动群众結成特种联系的工人运动。难道德热拉斯拒絕这样的理解嗎？肯定地說，关于这方面，他在文章中任何地方都沒有談及，而且，例如，他从第一篇文章到最后一篇文章，一点也沒有提到工人階級的社会作用，甚至几乎就沒有提到工人階級这几个字。他使我們不了解究竟怎样的新的社会力量才能使社会主义和民主得到發展。这一点所以較为显著，是因为他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公共的和私人的”，1958年12月20日“斗争报”）說过：

“当前，任何政党或任何集团，甚至于階級本身（卡德尔着重指出）都不可能独特地表达整个社会的客观需要，都不可能把支配生产力發展的专权擢为己有，以免生产力遭受阻碍，以免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变成奴隶”。



假使說，德热拉斯的这个提綱是正确的，那它就意味着工人階級和工人运动在我国已經起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也就是說，它們不仅是已不再需要，而且也根本沒有了。大家知道，以現代工人运动为基础的科学的馬克思提綱是：为本階級利益，为摆脱資本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階級，不可能不同时为整个社会的利益和进步而斗争，因为它的客观社会地位就是这样。由此可見，工人階級和工人运动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起着主导的历史作用。这个作用，正在随着国内社会的对抗性在从生产資料公有化而开始的过程中的消失而相应地“穷竭”。

我們是否已是处在这样一个發展的阶段，即处于这种情况，这时階級对抗性已沒有了，因此，整个社会的利益再也决不同那和一切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工人階級的作用，以及工人运动的作用相联系。每个人都知道，我們还不是处于这种情况，而且，这将不是很快就这样。你們大家都知道，我們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發展中仅仅走了第一步，因此，我們不得不甚至在經濟方面，尤其在政治生活中阻止某些强制的因素，以便工人尽可能迅速地、以最小的牺牲摆脱旧的、落后的状态。因此，工人的国家也就存在。最后，人們并没有放弃棍子，因为他们有时也可以用这个棍子来打無辜的人。所以結論只有一个，或者是德热拉斯同志錯誤地估計了我国社会的真正結構及其内部关系，或者是他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而迷途于唯心主义体系之中，因此又得出錯誤的結果。假如既非这样又非那样，那么他只是說了一番空話。

与这点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問題，就是德热拉斯同志怎样研究官僚主义和官僚的問題。

德热拉斯同志把这一切指为，似乎我国关于官僚主义的問題，是一个“閉塞集团”的問題，或者說，好像是一个关于保护業已形成的制度，即官僚主义的帮派的形成的問題。这里，产生了



一个問題，德热拉斯同志根据什么分析和何种社会关系而作出这种結論呢？同时，更坏的是，德热拉斯同志不关心这种分析。他最喜欢利用类推的方法，把斯大林国家的極简单的公式轉套在我們的制度上。为了做到所有这一切，他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解釋：（一）当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时，官僚主义“紧靠着”革命，这就是說，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前，它作为一个帮派，即作为一个“閉塞集团”，跟在我們后面。（二）目前共产主义者正在变成官僚主义者，因为他們自命是唯一的、自觉的社会主义的建設者。这种官僚主义的理論深奥嗎？似乎在历史上任何时候，無論什么階級，無論什么运动，当它們保护了曾經保护过的东西，或者它們不是它們所自認爲的东西的时候，就認为自己是不对的。而实質上它們是它們本来的真相。

德热拉斯同志正是从这个基地上逃走的。对他說来，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东西又有又沒有，而爭論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形式。这不仅是極端的唯心主义，完全脱离唯物主义的立場，这是荒謬的。爭論只是能表现社会矛盾的形式之一，但是客观真理的存在并不以这种爭論的結果为轉移。而且，决不能迴避这个客观真理。無論是官僚主义，或是社会主义都不是抽象的概念。例如，在它們背后都可以偷运任何种的願望。官僚主义是一种制度，它是国家資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一定形式，官僚是一个帮派，这是历史上衰亡着的剝削制度的最后的形式或是最后的捍衛者。我国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国家資本主义关系的制度呢？德热拉斯同志本人說，这种关系是沒有的，他承認这种关系已被徹底粉碎。那么他从何看到官僚主义的形成，这个领导了反人民的階級斗争的帮派的形成呢？德热拉斯同志实际上是同少数的官僚作斗争，而不是同官僚派武士作斗争。

因此我不想說我国沒有官僚主义。在其余方面，假使我也

談这个，你們大家一定会笑我，因为我自己同你們大家一道，是講过和写过許多关于官僚主义傾向的危險性和必須同这种傾向作斗争的人当中的一个。

……我們必須用發展社会自治的民主机构和發展社会主义的經濟关系的办法同官僚主义傾向作斗争，因为其他一切是以它們为轉移的。但同时不应把小孩連水一起从盆中倒掉，即不应把革命同官僚主义一起抛掉。由此可見，德热拉斯的提綱是沒有根据的，問題是关于官僚派（即帮派）和非官僚派（即人民）之間的斗争。

照我看来，德热拉斯的文章中的观点的錯誤根源也在于此。他不是从现实出發。因此，目前在这条道路上，他把某种非现实的投影看作是自己周圍的一切。

## （二）关于民主

德热拉斯同志在写了头几篇文章后，看来似乎他本人也覺察到，奉行这种理論前提和政治前提，就要陷入絕境，因而迫使他抛弃这种前提，还是繼續盲目追随这种前提的邏輯上相因而生的路綫。他决定了后者。这里我不想牵涉到促使他走这条道路的原因，也不預备判断德热拉斯同志是否意識到如果从自己的出發点出發他就会遇到的后果。他把一切社会傾向、过程、現象变成簡單化的術語和一般公式，例如客觀和主觀、形式和內容、具体和一般等等，因而离开了空間和時間，开始从表面上来玩弄这些概念和術語，似乎在它們背后沒有活生生的物質力量和跟一定的物質条件相联系的活生生的关系。換句話說，他离开了唯物辯証法而陷入不可知論和怀疑論。

……在这种情况下，德热拉斯同志，作为一个教条主义和最終公式的批評家，竟达到了極为令人遺憾的、簡單化的公式和最

終公式的境地，达到了絕對靜止的教条的境地。如果他是这样公式化地編写資產階級，編写强有力的官僚派和一定的抽象的理想的民主，这种可怜虫的民主只应保衛社会主义，而且他怀疑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奋斗的能力，那么，不仅德热拉斯同志的讀者，而且連他本人都應該發問，究竟在这个德热拉斯式的戰場上真的需要做些什么。

从这个不合实际的公式中产生了另一个同样毫無生气的公式：成为主要的是形式，而不是內容。目前，正如德热拉斯同志所說的，主要的是民主。而民主，照德热拉斯的看法，这就是为發表新的思想制造气氛，是“思想斗争”的开端，是批評自由，是爭論。

这就是說，一切階級、階級之間的一切物質关系和整个现实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普遍爭論中的“自由的精神”，至于这种爭論的結果怎样，那就不去管它了。

……我曾以友好的同志般的方式，向他提出自己的批評的意見。

德热拉斯同志对我的这些意見的反应非常神經質，带着受侮辱的神态，并且在談話中，提出了以下的論点：

一、鉄托同志是官僚主义的庇护人，但他迟早会和官僚主义冲突起来。

二、兰科維奇同志和我，实际上已贊同他——德热拉斯的意見，可是，我們是机会主义者，所以不願意和鉄托同志爭吵。

三、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这里已产生了某种社会主义的——左的派別。

四、不可以排斥我国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發展的可能性。

不言而喻，德热拉斯的这些論点使我异常惊奇，我不同意他这四个論断。在繼續交談中，我的印象是这样，德热拉斯同志大

体上至少是同意我的意見，并收回他的全部四个論点，說明所有这些仅仅是他一时膚淺思考的結果，說他自己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些蠢話；至于他發表在“战斗报”上的观点，我没有明确的感想，談話到此为止。关于上述德热拉斯同志的論断，我和铁托同志只字未談。我認为，德热拉斯大概也發現了他的輕率的、不严肃的、我們一般都已見慣的过火行为之一，而且我期待他在以后的文章里会多多考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自己的同志的意見。但是，不久我就抛弃了一切希望，特别是在讀了他的“回答”之后，这篇文章是在我和他談話之后隔了几天發表的（在这篇文章里，他对我和批評过他的同志作了答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他的上述論断我还是一字未提，为的是不致妨碍有可能消除分歧。不过是两三天前，德热拉斯同志本人把这次談話的内容通知了铁托同志。

我談这些，是有如下的理由的：

一、为要指出德热拉斯沒有任何口实来抱怨任何，即使是最微小的个人对他的不忠诚态度。

二、为要指出，除了他的文章，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影响执行委员会發表关于不同意德热拉斯同志的文章的通报的決議。

同时，目前因为德热拉斯的观点已通过他的文章徹底反映出来了，所以我們終究可以这样說，德热拉斯在和我談話中所提出的論点，同他文章中的論点是有本質上的联系的。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去表述它們，相反地，他在談話中对我說过的論点，証实了我剛才所說过的，德热拉斯的民主的观点不是我們的观点，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是無政府主义和資產階級自由主义形式的混合物。

我們并不抛弃資產階級民主的积极的成果。其中有許多已在我国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地位。但是，在为社会主义奋斗作为



理想的战士面前提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多党制,在我看来,这是开倒车,归根到底也就是放弃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者联盟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社会主义民主的口号。我们始终认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但同样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科学的政治上唯一正确的立场,肯定说,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必须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中有机地成长起来。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就是表示一般阶级社会的衰亡,就是表示阶级对抗的废除,归根到底也就是表示任何政权的消灭。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方向,无可争辩地,只能是一个,即它可使每个公民都能直接参加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因而谁也不需要同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作战,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为了政权而争吵的必要。

我不断言,我们是非常接近于实现这样类型的民主,即无党派的民主,但是,我们已经在社会自治的机构中为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个机构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站在全体劳动群众的前列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影响的加强,而这也就是反对我们的制度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和不良现象的主要武器。其他办法是没有的。这个制度建设得愈好愈快,官僚主义和不良现象也就会愈快地消失。

同时,反对这个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的另一个过程也正在发展起来。庸俗无政府主义倾向,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愿望以及来自国外的各种不良影响,它们同样也是以民主这个字眼来掩饰自己。但它们的目的是,无疑地,决不是民主,虽然它们是躲在民主的名义后面。这种强烈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至少是比官僚主义倾向更大的危险。德热拉斯同志不是拿自己来和它们对抗,而是在这种压力下屈服了。据我看来,这里有着德热拉斯同志的政治观点的发源地。



也許我們这里有人感覺到自从对斯大林式的教条失去了信心以后，自己有某种空虚，他們现在就拿出一些新的庸俗無政府主义的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公式，作为新的教条来代替斯大林式的教条。但是，我們在 1948 年所以获得胜利，正是因为共产党过去不是教条主义的，現在也不应该用新的教条主义的死板公式来妨碍共产党员以及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一切战士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根据具体条件表現机智。而德热拉斯同志恰恰給带来了这种新的教条。我想，这自然是有害的。

但是，比这更重要的問題就是，什么新的思想使得德热拉斯同志这样奋激，并想到必須保証給它們發表的自由呢？一切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都是自由出現的，并且經过了自由爭論。但是，如果有人把發表新思想的民主程序的問題提到第一位，像德热拉斯同志的作为那样，那么很明显地，这种思想的出發点就是这样的，即它就会和我国的制度的政治基础發生冲突。这里并非事关爭論自由的問題，而是关于德热拉斯同志的观点的本身。关于自由，我們必須在这里談一談，但不是談我国有沒有“足够的”民主。何况德热拉斯同志已有足够的自由。在三个月期間內当众解釋。我們在这里，作为共产主义者，应当确定我們对这种理論的态度，而不是談关于表达新思想的自由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們这里早已解决了。

### **(三)关于长远目标的非现实性的理論的意义**

德热拉斯同志的抽象分析。当然会使共产主义者和他的文章的讀者失掉任何远景。这甚至关系到民主的本身，因为一定的社会力量也必定具有民主。由此可見，既然德热拉斯同志把掌握政权的共产主义者說成是官僚主义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期待从他們那里得到民主，就自相矛盾了。

……我順便談談，德热拉斯同志的這些論點，不外就是紊亂複雜的矛盾的癥結，德热拉斯同志以他自己的這些論點在我國重新復活那 50 年前伯恩施坦所倡始的隨後又為許多其他作家，以及右翼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左翼的政治活動家重複過的過程。大家知道，伯恩施坦用下列詞句來表述自己的論點：“通常稱為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的，並沒有給我提供什麼，運動——這就是一切。”

……我不準備作某種機械的歷史的比擬，同樣也不準備斷言說，同一個現象在不同條件下具有同樣的結果或同樣的原因。但只要把上面我所引証過的伯恩施坦的話和德热拉斯的話比較一下，就足以使我們看出，在他們之間存在着令人吃驚的相同的地方，德热拉斯的理論是種非常陳腐的理論，它在 50 多年以前就有人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反復咀嚼過，今天對我們說來，難道它會成為繼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會成為能爭取社會主義的武器？它在實際上恰恰是為相反的目的，即為削弱我國的工人運動，為剝奪工人運動的任何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武器服務的。我不敢斷言，德热拉斯同志向伯恩施坦學習，但他採用了同樣的措詞，這是很明顯的。但是也許有人會問，這種陳舊的觀點現在在新的情況下，即當工人運動取得了政權的時候，是否能變成為比它當初遭到大家——從韓德曼到列寧——的攻擊的時候更好和更可行的。

……德热拉斯同志在發揮自己的理論時，就直接援引馬克思的話。當他這樣做的时候，顯然，他所指望的只是那些沒有充分讀過馬克思的著作的人。事實上，德热拉斯的觀點不但同馬克思的作品的精神沒有任何聯繫，而且同它的字句也沒有任何的聯繫。德热拉斯同志完全逞性地把馬克思從“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不錯，就社會發展的某種成就來說，馬克思是不承

認最終目的，但正是馬克思根據自己所作的科學分析，而把共產主義當作一種遙遠的最終目的，這個目的，今天人類可以利用科學的方法看到，人類可以把自己自覺的積極性集中在這個目的上。僅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主義才成為工人運動的“最終目的”。不言而喻，馬克思沒有描繪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情形，因為這是無謂想像的兒戲，而不是科學的工作。然而，他原則上用一個科學的公式表述了共產主義，把它當作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人人都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此外，正是馬克思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以便把自發的職工運動轉移到科學社會主義的陣地上，向它們提出具體的目標：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給它們指出為達到這個目標而奮鬥的道路。最後，也正是馬克思利用了這樣一個原理作為論據來反對不自覺的自發的工人運動的擁護者，這個原理就是，認為沒有工人階級的自覺鬥爭以及沒有工人階級的勝利，資本主義就會把人類引向野蠻境地。不用說，這個原理是荒謬的，因為決不可以設想會沒有工人階級的自覺鬥爭。但是，以為凡是不可避免的東西同時也必定是為美好的將來而鬥爭的人們的自覺的目的，這種論斷也同樣是荒謬的。馬克思說共產主義是不可避免的時候，他這樣說，是根據他對社會發展的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作了科學的分析。馬克思知道，工人階級不能不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鬥爭，不能不為社會主義而自覺地進行鬥爭。根據這一點，德熱拉斯同志在這裡不僅不正確地引証馬克思的話，而且十分明顯地和公開地離開了馬克思。

在較後的一篇文章（“理想”）里，固然，德熱拉斯同志畢竟承認某些遙遠的目標，——這在他看來是些理想——，而且他實質上是把宗教的理想，例如，同共產主義的目標混為一談。在德熱拉斯同志看來，理想在這篇文章里僅僅變成了海市蜃樓，它煽動

商队去和沙漠作斗争。这篇文章所描述的真正的目的，这就是斗争的本身，就是一种主观力量反对另一种主观力量的斗争。人们为斗争而斗争，而不是为一定的社会目的（这种目的同时也是物质的必然性）而斗争。这种怀疑论的理论，特别使我回想起各种“生存主义”派别，根据这些派别看来，一切社会倾向以及社会力量的一切意向都是一样坏和一样好，而这个斗争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发展。我不坚持，这正是德热拉斯所武断的，但我不能说他和这没有任何联系。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说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在政治方面，它是有害的。

……德热拉斯同志说，直到现在，人们没有实现过任何一个遥远的目标，根据这一点，我们的遥远的目标是成问题的。以为我们的目的是不能实现的，这首先就是不正确。既然它们是现实的，就是说它们是从社会运动的方向本身当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基本上就能实现。不言而喻，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的目的和志向没有得到实现，这是因为迄今以前，一切历史的和社会的变革都是一个阶级社会经由实现那些在历史上具有进步的带领导性的社会作用的阶级的目的而改变为另一个阶级社会。在这方面，马克思所说的和德热拉斯所说的绝对相反，马克思认为，人们所抱的目的是可以实现的。第一，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从阶级体系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时代。在这种过程的期间，社会意识的表现不同于以前时期。尤其重要的是：工人运动的解放目标，同时又是实际的目标，它反映了全体工人群众的利益。我们的信念也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们的这个信念就是：我们的社会将朝着内部日益统一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为德热拉斯同志所预见的那样朝着社会的思想分化的方向发展。

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德热拉斯同志这些理论的和政治的见解在共产主义者的队伍里建立怀疑论的哲学，使我们争取社会



主义的正当的斗争迷失方向、沒有原則性和缺乏信心。我們不能对此漠不关心，况且德热拉斯同志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領導成員。德热拉斯的理論即使是对那些不甚熟識理論問題的人說来，它越是装作不足道的，是由各种反馬克思主义的怪風吹来的，如果考虑到德热拉斯同志是一个領導成員的身分其后果就越大，假使不及时地指出这个理論的非馬克思主义的、違反工人运动的腐朽的性質，其后果就会愈加严重。

#### (四)关于“新的力量”和关于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性質

不言而喻，所謂最終目的的这一全部理論，一般說来，其所具有的理論上的意义，不如实际政治意义。仅仅由于这个緣故，才显出了其严重性。伯恩斯坦从这个理論作出結論說，工人階級必須放弃自己的階級政党。德热拉斯同志由此得出結論說，共产主义者联盟，照現在这个样子，乃是發展民主的主要障礙。因此，他得出一个結論，說如果我們不把联盟解散，那么就必須把它变成为沒有任何內部紀律和放弃思想統一的某种辯論俱乐部。因为不是这样，又該怎么理解他下面的一段話：

“誰也不会去‘監督’他們（当然是指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卡德尔注）的工作，他們不会‘得到路綫’，而是靠爭論的提綱和講稿，自己可以根据地点或社会組織的各种条件，根据工作生活的所在来决定自己的立場”（見“联盟或党”，載 1954 年 1 月 4 日“战斗报”）。

不这样理解，我們又怎么来理解他号召無須共产主义者对运动的統一負任何責任的普遍的思想斗争呢？

最后，我們又怎么能理解他号召用“較多民主的”力量来代替“較少民主的”力量的号召不过就是号召有权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內部組織派別和集团的權利呢？



德热拉斯同志固然說过，共产主义者联盟应该为对共产主义者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而斗争，可是，我不明白，这件事情该怎样进行，既然联盟本身在思想上是不统一的。我不敢断言，一切共产主义者对任何问题都应该一摸一样地思考。但是很明显地，例如，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共产主义者对于像德热拉斯同志在自己的文章里所坚持的那些原理可以采取绝对相反的立场，共产主义者联盟就不可能像一个统一的组织来进行工作。因为这就引起形成派别和使共产主义者联盟本身分裂。而且还不如此，它会引起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切有组织的和自觉的行动的分裂，而这些行动，我们今天绝对是必需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力量还相当薄弱，我们的新的民主的组织形式取决于共产主义者在社会自治机关里思想立场的统一。自然，共产主义者对于自治的社会机关的日常实践的问题，不必要有统一的想法，但是决不能放弃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思想统一以及以这种统一为基础的纪律的原则，这个原则保证自由争论达到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只有这样组织，共产主义者才能真正成为各族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联盟的核心。

上面我所引用的德热拉斯的话，是摘自“联盟或政党”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德热拉斯同志对那些对他的批评意见毕竟作了某些让步。其实，他的全部观点，不以“联盟或党”一文中某些矛盾的结论为转移，结果必然要消灭共产主义者联盟（这里，顺便指出，他说虽然从前写过关于“官僚统治”的文章，而斯大林公式的一切残余今天在我国的确正处于破产的境地）。

……难道共产主义者有人经过这样批评后，还能捍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存在吗？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德热拉斯同志在那篇文章里这样明显地、公开地“确定了”这些东西后，他正是在第 56 行中，怀疑共产主义者联盟、各族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

义联盟、南斯拉夫人民青年和职工会，簡言之，他怀疑作为目前进行自觉的、有組織的社会主义行动的工具的一切。对于这种創举，除了說它是十分輕率的，荒謬絕倫的無政府主义自發勢力的观点外，还有什么别的可說呢。这种理論本身，自然是什么也沒有說明。它是有破坏性的。可是，問題还是一个悬案，誰能利用这种理論来为自己謀利。在我国，这种“思想”还不是唯一的。于是就从無政府主义的和资产階級自由主义的立場上来有系統地暗中破坏我們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此外，类似的观点正直接从我們的某些人的官僚主义、自以为是的态度的表現中日益發展起来。他們以为，正是我国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們現在变为天不怕地不怕的偉大人物。最后，这种傾向反映我国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情緒。他們同斯大林一道失去一个上帝，而現在正在寻找另一个上帝，因为他們不相信我們自己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我想，德热拉斯同志的文章也正反映着这种气氛。因此，他們远远地离开了为促进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而且，至少是离开了为促进爭取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

……为什么德热拉斯同志作出这样的提綱呢？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不是根据馬克思主义的方法科学地分析我国实际情况而做出結論，因为他从来不願意做这种切切实实的工作，而却浮跨于历史的比拟和他人之模样，然后在自己的幻想中加以加工制作，并将其勉强安在我們的实际中。自然，我不来談那些鼓励他这样提出問題的政治因素。虽然，关于这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可是，結果是什么呢？他硬說，我們走得太慢，而同时他需要资产階級的民主形式！要是这样，我們是否就能走得快一点？是的，是快一点了，但这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

## 結 論

如果我們要在結束時從我的全部敘述中做個結論，那么就應該斷定：

一、德熱拉斯的觀點主張不僅不能促進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而且使它向後退。

二、按其政治本質來說，這些觀點對共產主義者聯盟在為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的鬥爭中的思想統一，只會起有害的作用。

由此可見，德熱拉斯同志的觀點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戰士的武器。它所唯一能協助的是假民主的無政府主義，以及作為結束反對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的街壘的其他各種各樣的共產主義情報傾向。

那麼，德熱拉斯的文章是用什麼東西來影響我國的某些人呢？不是用文章的理論內容，而首先是用它的無政府主義自發勢力的一般傾向，這種傾向現在和將來都使那些想立刻跳越目前這個致力於為迅速發展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而創造物質條件的階段，以及想一剎那間就出現“天國”的一定階層的人們喜歡。

而這種傾向，在我國確實有過，並且，將來一定還會有。應該指出，到現在為止，我們對這種傾向估計得十分不足，因此，問題就發生了。我們必須以進一步建設社會自治的民主機關和其他的民主形式以及改進共產主義者聯盟和各族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聯盟的工作來同這種傾向作鬥爭。我們應該同時意識到，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既要反對官僚主義傾向，又要反對無政府主義自發勢力的傾向。這兩者對於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都是危險的。

德热拉斯同志写文章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引起爭論。可是，德热拉斯本人以他对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見的人所采取的那种目空一切的傲慢口吻給我們一种最好的观念，似乎这次爭論进行得多么像样。德热拉斯在1953年12月24日的“斗争报”上的“答复”証明了这一点。德热拉斯同志这篇“答复”是在和許多向他宣称不同意他的文章或者不同意文章中的某些原理的同志交換意見后写成的。他以下面的口吻公开地回答这些私人的和友誼的关怀：

“而那些肯定說这是为外国而写的人，恰恰証明他們在自己的人民面前的心境齷齪和他們的言行已开始不一致，这过去是現在也是頹廢現象和社会落后的象征。实际上是不存在两种道德和两个真理。但两面性是存在的，这就是以真理掩盖謊話，以道德掩盖伪善行为，以社会主义掩盖官僚主义”。

这难道不是迫使不同意他的立場的人緘默的一定的形式嗎？他的这个答复最多不过如此而已。德热拉斯同志在答复中开始公开地駁斥馬克思主义辯証法。他說道：

“有人說我已成为辯証法的异教徒，我不想做辯护，因为至今辯証法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最大的异教，而每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如果能成为它的武器，那他就会幸福。而列宁主义、馬克思主义、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大題目，我現在沒有鑽研它。我想，对这些理論和对我們大多数人來說，最重要的还是真正推动社会前进”。

我不認為，每个南斯拉夫公民都必須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和必須站在馬克思辯証法的立場上，可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及其中央，在任何場合都是站在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不仅站在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而且把馬克思主义当作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科学武器。德热拉斯同志可以摒弃辯証法，



但他沒有權利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在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下，強迫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委員們接受他的這些看法。

在那篇“答復”中，他這樣寫道：

“而我們的官僚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不可能不多少是斯大林式的，帶點南斯拉夫的斯大林主義。因此，他發出了類似的思想臭氣，而他在某種程度上是採取那種“文明”和“愛真理”的方法，當然，“在上面”還不是直接地公開地對待我們，可是，在其他地方，即“在下面”，這種情況是非常多的。

以這種口吻來回答自己的同志，無疑地是德熱拉斯的民主主義的特點。凡是希望為人們之間的民主關係而鬥爭的人們，首先自己應該學會用民主方式交談。而這種談話語調，是反對所有不同意敘述這種意見的人的意見的典型的逞凶語言。

即使是德熱拉斯這個“答復”的結束部分也暴露出對任何其他意見的極端不耐煩和表現得很不謙虛，這種不謙虛失掉了尺度的感覺和空間與時間的概念。我們在那里看到：

“我不寫這個問題，是為了保證保住這個可靠的小地位，或者是由於兒童或孩子般的放肆，至少是為了民主的光榮，僅僅是因為應該做這個，因為像其他人一樣，我是一個社會的客觀過程的‘犧牲品’，這個過程迫使我去做這個。這就是我的熱情和信心的泉源。因此，仿佛我不尊敬和不願意傾聽原則性的、公開的、同志般的社會主義的批評，我不能不高傲地對待這種對立特性的批評”。

對這個語調不需要加以評述。德熱拉斯同志習慣不受任何人的批評。他現在是第一次遭受從下面來的批評。正是這個，他不能忍受。他想用這個答復來壓制以後的一切批評。最後，他的這種反應不就很清楚地說明，德熱拉斯的觀點不僅沒有對我們為社會主義民主的鬥爭作出貢獻，而且還給它以打擊。我想，



这些事实既使德热拉斯关于爭論自由的慣用詞句适得其所，也使他的所謂从“官僚主义的楼梯”下降到人民中这种說法适得其所。这些事实同样表明，某些人当中的某种不安情緒是無的放矢和無根据的，这些人現在問道，这次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民主能否在我国得到無阻碍的發展。相反地，正是这次全会有助于使那些与这个目的对立的傾向适得其所，因此，它对我们进一步爭取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斗爭将作出决定性的貢獻。

## 两条战綫的斗争

(原載“我們的新聞”杂志 1954年3月号)

米·托多罗維奇

我国的新經濟制度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制度本身一样,从它刚一萌芽的时候起,就为許許多多千差万別的不良現象所冲淡,这些不良現象或者是发生于这个制度内部,或者只是較为鮮明地表现在这个制度内部。因此,到处都可以听到对制度本身的批評,这种批評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方式,抱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它总是用盜窃、投机、資本主义因素的复活等等許多事例,以及其他形式的經濟犯罪行为的許多事例,来加以“証实”。

这种事例过去和現在,特别是在实行新制度的初期,都存在着。

有些人說:赢利,赢利,結果怎样!大家都听了你們的話,現在你們埋怨不了誰,都只怪你們自己,坦白地說吧!說这种話的往往是一些不熟悉情况的人,往往是些近年来埋头在靜悄悄的工厂里而沒有受到我国革命的風浪触动的人。所以,他們不贊同地和不安地注視着“經濟叛乱”和我国革命的經濟和社会發展的汹涌浪潮。

另外一些人,如果不說是胆怯,便是害羞地利用一切机会指出:从前当存在着固定的国家計劃的时候,我国經濟企業方面并沒有“这种蛮干的行为”,而这种蛮干行为使私人資本主义因素能得以“抬头”。的确,目前当新制度稳定以后,这种批評家就十分少了。

第三种人,指出西方“进步的”、“民主的”国家資本主义为

例，以寻找摆脱这种现状的出路”。

第四种人，例如德热拉斯，对于任何国家干预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制“缓慢地”和困难地产生以及“一点一滴地”“赋予”自由，感到非常恼火。

諸如此类。

实际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问题的实质何在呢？

### (一)

着手坚决消灭行政经济制度和大胆施行新经济制度，使我国多年来受束缚的经济力量获得了解放；开始普遍利用潜在着的许多后备力量。开辟了所谓自由市场，即商品货币经济的黄金来源。黄金的狂热席卷了一切个人、集体、企业、预算机关、城乡小私有生产者以及暗藏的投机分子等等。

早在施行新制度的初期，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企业）可以说就获得了扩展以及保证它们能够确定积累的百分比和基金的自由。出现了生气勃勃的、独立自主的和有首创精神的经济组织，代替了那些资金不流动，常常不能赢利的预算的半机关半企业。

小商品生产者、手工业者，尤其是农民的主动性得到了发挥。小手工业者和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者活跃起来了，这在现今条件下是很必要的，并能很好地补充工业生产和其他大生产对人们需要的满足。商业组织和社会供应组织通过这种结合变得更有效，更完备和更有条理等等。

因此，我国的整个经济不顾这个尚不发达的、受以前的制度的许多残余限制和牵累的新制度借以发生作用的极其困难的客观条件，开始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不打算同时也没有必要叙述新制度所获得的良好结果，虽然这些结果是最重要的。

現在已經很清楚，在我國生活和我國關係的任何一個領域內，新制度都給予新的沖動力並促進社會主義因素和關係更迅速、更穩定和更充分地發展起來。

但是，這種商品貨幣經濟同時還暴露出，而且也必然要暴露出其另一方面，特別是在一種制度過渡到另一種制度的時候。因為不良現象及其原因和後果是本文的主要對象，所以關於這方面我準備多談些<sup>①</sup>。

當行政經濟的狹窄範圍被消除了的時候，小生產的一切形式和一切小經濟企業都活躍起來，浮現出來。其所以會這樣，還有一個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的情況：大生產雖然已獲得了解放，但實際上還受行政羈絆的殘余和重大的義務所束縛，以致使大生產不能像小生產那樣自由地發展。

為了說明這一點，不妨舉些例子。據新薩特工會委員會通報，1952年，伏依伏丁那省已註冊的私營工廠的數目增加到2,144個，而未註冊的工廠數目增加了一倍，即為同一年的4,063個。

但是手工業的增長，其特點不僅是手工業工廠的數字有所增長。同時每個手工業工廠每年平均周轉額也有所增加。我舉下列材料來說明：僅僅由國家機關和企業經過人民銀行發放給私人經營者的就有以下款額：

	1952年	1953年
	(以百萬狄那爾為單位)	
私營建築業機構	3,873	8,887
其他私營機構	6,121	8,272
私人從事運輸服務事業者	8,856	11,245

但是，隨同着這種增長，同時還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不良現象，以及各色各樣的投機活動和黑市。“國家消亡”被投機分子

理解为号召他們千方百計逃避法律，逃避納稅和其他義務等等。所有這一切以及諸如此類的現象都不僅是手工業所特有的。

在商業方面，在包買主、中間人、“職員”等等，實際上即在私商的各种隱蔽的活動方面，這種不合法的形式靠犧牲相應的企業及其資本而在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上得到發展。例如，有一個時期某些代售商店實質上操在一些販賣外國貨的投機商人手裡。為了在新經濟條件和新制度下尋找出路，為了尋求冲破我國經濟生活的道路和方法，早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就已獲得的往來的資本主義經驗，資本主義的貪婪和狡詐，獲得了新的形式。

但是，這一過程的特征不僅僅是私人商品生產者的增加。同時，真正資本主義類型的大企業主也開始出現。特別是建築業和類似的工作方面更是如此。我舉幾個這類的例子：

薩拉也沃一個建築企業主，1953年有 500 至 600 個工人，這些工人在波斯尼亞、赫爾查哥文，特別是在澤尼查等地建築工廠煙囪及其他建築工程作工。根據合同所得到的款項超過 3,000 萬狄那爾。國家檢查機關的通報中說道：“建築企業的經理簡直是在競賽，看誰能更快地和他訂更多的合同”。

貝爾格萊德的一個油漆匠在布戈伊諾註冊了自己的商號，他有一所不大的作坊和一個上年紀的工人，對於這所作坊，他所繳納的稅款達 40 萬狄那爾。他作為企業主在特拉夫尼克、尼克希捷、鐵托格勒和薩拉也沃等地的大規模建築工地工作。他從

① 原注：因為批評這個制度的人利用這些不良現象作為主要證據。我特地舉些最困難的情況，雖然這些情況是極少有的，並且大多數已被消除了的。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有点夸大和帶諷刺地例舉這些不良現象，而絲毫也不害怕這些東西會有助於批評這種制度的人，因為在經濟和社會的關係上，新制度已在實踐中充分地表現出自己的長處。



1月至6月这期間，仅从3个企業方面就得到950万狄那尔。（可見：貝尔格萊德的这位油漆匠，他的“作坊”在布戈伊諾，进行工作又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維那，而自己却住在薩拉也沃……。）

有一个鉄匠在大工業企業里工作，1952年賺了几百万狄那尔。他用这些資本来做大生意，經售各种建筑材料和其他的材料<sup>①</sup>。

到去年上半年为止，这种有技能的、显然已不是很小的資本家是相当多，他們开始出現在各个方面（德热拉斯說：众人皆自由，資产階級亦自由！），但他們大多数被消灭的要比出現的来得快。

同样的过程，在农村里也發生过。消灭分区貿易和义务供应，廢除合作制和农業中的行政措施，这些也刺激了农民緊張劳动和农产品增加。这里附帶說明一下，在1952年，虽然有严重的旱灾，但畜牧業还是有增长，而在1953年，由于丰收和气候条件良好，全体农業生产者所耕种的土地比往年好得多。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条件，即市場漸漸开始控制农民生产，农民竭力想从土地上取得更多的产品，同时农民历来对土地的渴望、想当土地的主人的旧幻想、旧日的貪婪心理和打算进行欺騙和各种投机活动等等重又出現。曾發生过这样的事情，在退出劳动合作社的农民的土地周圍，又开始挖了很深的沟，并种上了天然籬笆。在战后保留有土地的人，都要求把土地归还給他們。一些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向往潘捷瓦茨基——里特的移民們又

<sup>①</sup> 原注：这里談談这几个典型人物的行为。第一个人是在薩拉也沃有三幢住宅。第二个人，有人从貝尔格萊德用飞机給他送酥皮包子。第三个人花了60万狄那尔給他兒子举行婚礼，同时給在軍隊里的小兒子寄了8万狄那尔，“讓他庆祝哥哥的喜事”。多少有些美好前途的“真正的”資产階級，絕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这些人确实十分清楚，这种利潤是暂时性的，因此他們也就大加浪費。

提出了他們的旧要求。买卖土地（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增多起来。关于繼承的訴訟和田界的爭吵等等开始發生。例如在塞爾維亞的一些地区，姑娘的嫁妝增加了，并改变了物質表現。战后农村青年要求嫁妝須有自行車、收音机和其他現代物品。現在除了金錢之外，土地也开始当作嫁妝。

但是問題照例不仅限于農業生产。又出現了农民兼商人；或者是包买主，或者是与其类似的“社会主义”分子，或者是，比方說，商人，他們在果园地区收購“拉吉亞”，并运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大城市去卖（例如貝爾格萊得有一个合法的市場，在那里，这些农民在“茨維德柯夫·梅汗”附近出卖“拉吉亞”）或者在伏依伏丁那和斯罗文尼亞等谷物地区收購玉米，然后运到山区去出卖。富农的石場也得到發展；有些农民成了这种或諸如此类的供修筑道路、修筑城市街道和工業建設之需的材料的供应者。

这就引起高利貸者的出現，当然不是經常如此。

最后，真正的現代採購資本家企圖根据訂貨使自己能够抬起头来。檢查机关已經查明，每天报刊也經常指出，个別的企业主租了几百公頃土地，同时社会主义企业还撥款給他們，不課任何稅款，無須任何抵押。

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我們的社会主义企业在思想上也是不純淨的。新經濟制度中的这种私人資本主义傾向，在其他商品生产者身上或在社会主义經濟組織（企业和合作社等等）本身当中，都显露出来了。首先是个別企业或个別的企业集团公然想要利用市場上的壟断地位，以抬高物价和取得尽可能多的利潤当然这只是極偶然的現象。这里有客觀上存在着的壟断地位被利用，同时还出現了人为地制造壟断的企圖，如各企业間的秘密协定，以及企圖建立和資本主义卡特尔毫無区別的联合組織。

不用說，市場規律首先推動生產者去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商人降低商業費用，推動一切生產者去改進產品的質量。這是基本的趨勢，是這一過程的主要表現。可是，要是可以的話，為什麼不用其他方式謀利呢！他們感到不好意思，因為“我們終究是社會主義的企業”；可是競爭和在戰前時期就熟悉業務的“能手”漸漸地操縱了一切，逐漸開始逃避和破壞法令，破壞規範，無視對社會所承擔的義務（如納稅等等，故意拖延付款期限，虛報收入或其他捏造）。

企業中的某些人在尋找決議的空子和迴避決議的方法上表現出十足的技巧權術。同時伴隨著對社會的犯罪行為，必然還會發生在企業內部的犯罪行為。在這些企業內部常常發現個別人員的舞弊行為。例如在某些企業里，尤其在農業合作社里，個別人員變成了投機分子，他們利用企業的資本以謀自己的目的，有時候這些人員竟成了企業的商品的供應者，或者同時成為在出賣“自己”企業的商品時的私人中間人（高利提成）。

最後，所有這種和諸如此類的投機活動都是和職工間高工資的分配有聯系的。大家知道，有上進心的官僚主義分子不是任何時候都只為了自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集體，他想維持自己的特權，就收買整個勞動的集體。“他確確是個投機分子，但他是為我們大家工作！”但是，這裡不是任何時候都只簡單地瓜分大量金額。在某些地方，他們把自己的產品按優惠的價格賣給工人；在另一地區，工廠親自收購、轉運並出賣供工人和職員的各種個人消費品。我知道有些工廠按半價進行產品交換，以供應自己團體的成員。在實現這種粗魯的“階級團結”中，這些企業的基層工會組織起了帶頭作用。這些私人資本主義傾向在為輸出而生產的企業中最为明顯地表現出來。由於和真正資本主義市場的接觸，由於這些企業擁有外匯，這裡，在我

們感到亏空的地方，最容易造成壟斷。在这里，互相进行欺詐，和外国企業簽訂協定，損害本国竞争者的利益，进行各种非法勾当打埋伏，或虛报国外收入的实数。甚至有这样的情形，某些企業不把自己的一部分資金向人民銀行或其他机关上繳，而把它作为外匯，非法地攔在国外；这种做法實質上就是建立私人資本，并把它从国民經济中勾銷，就是說，它們做出了即使从任何健全的資本主义經济的观点看来都是不許可的行为。某些为輸出而生产的企業的这种活动，必然使旧的，早已丧失了政权的資產階級残余在这些企業内部找到安身之所，資產階級在这里已为自己找到了方便的避難所。

在現时的条件下，由于企業的狹隘利益往往是和市、区等委员会的狹隘地方利益相一致，所以某些企業就得到这些机关的有力支持。为了能够滿足“城市”和“我国边疆”的需要以获百万之利，这些委员会装着看不見企業的各种陰謀鬼計。

不但如此，在某些場合，它們还进行了“郑重其事的”准备和各种談判等等。为了滿足狹隘地方利益而損害公共事業，他們有时竟不惜做出犯罪行为。如上所述，由于企業和委员会同私人企業主等訂立契約，想借此免除积累和基金的高額的百分比以及其他形式的作为企業基金的付款，所以，私人企業主照例賺得大笔錢。这种为了本单位目的而直接攫取社会資金，即屬於整个社会的資金，也是公开发生的。有一个市委委员会和某个企業簽訂了合同，規定在企業应当交出作为联邦基金的7,200万狄那尔当中，50%被企業留为已有，而另外50%則讓給市委委员会。

总之，随着商品貨幣經济的出現，也出現了把一切东西都拿来买卖的企圖。买卖各种物品，不只是生产企業的發明和壟斷。买卖正教的神像和我国領導同志肖像的流浪商人也出現了。“根据新經济制度”，体育組織找到了給体育用品企業籌撥体育运动



經費的有效方法。“旅行家”在山德查克奉信伊斯兰教的居民中招募到土耳其去游历的旅行者，他提倡这种“旅行”游历，不仅利用伊斯兰教的信仰，而且利用“質地優良和極其廉价的土耳其紡織品”来进行投机活动。

## (二)

基础所特有的这种現象必定在上層建筑中得到反映。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上升，是小商品生产和私人資本主义傾向上升的必然的伴侶。因此，几乎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領域內，除了社会主义民主外，这些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現象还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来，即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思想体系、科学、艺术和哲学中表現出来。

在小私有生产的增长和私人資本的萌芽忽此忽彼地出現的这种可能和結果的基础上，从活生生的永不熄灭的复古渴望中，在一些人中間，产生并散播了一种說法，認為新經濟制度实际上就是倒退到資本主义。

他們把新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發展了解为向資產階級民主“前进一步”。

向西方投降吧！目前愈益被击破的資產者比过去更有信心地抱着这个已經破灭的希望。

在廢除了經濟中的行政措施后，富农高喊：“我們的时代到来了！”并威胁貧农說，他們不会要党员干活。

被不間断的汹涌澎湃和轟轟烈烈的革命变革和变化所吓倒和弄得精疲力尽疲憊不堪的小商人，輕松地断言：我們醒悟过来了，現在一切都恢复正常状态了！

一个紡織企業的官僚分子，用工人集体的名义写信給共和国执行委员会說：“請你們归还給我們在伏尔涅捷卡亞一万那的



別墅吧！因為它是我們工廠的舊主人的財產。”

有一個外國人坦率地提出問題，他說：“既然你們作了聰明的第一步，並給企業以首創的自由，為什麼你們不立刻作出第二步，不把工廠歸還其所有者！他們是能最好地利用這種自由。”

德熱拉斯的“人人皆自由！”的近代的“新思想”，是作為對這個現實作“科學的”和“哲學的”概括以及作為行動的號召而被提出。

南斯拉夫的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滿懷信心地和百折不撓地向前邁進；這些現象不能夠挫折它們的銳氣，因為黨能夠預先看到這些現象，因為黨早在向新制度過渡的初期，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二次中央全會上就已預見到了這些現象。

總之“……儘管狗在狂吠，商隊還是走自己的路”。

靜寂是表面的和暫時的，它使德熱拉斯得出結論說，南斯拉夫再也不會有階級存在，再也不會有階級鬥爭；其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對於消滅舊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和出現新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民主，在最初的時候，一切社會階層、一切階級和階級的殘余都表示歡迎。但是，它們都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都是以自己的階級意向和利益為依據。

農村中行政措施的廢除，社會主義民主在各方面的發展，鞏固了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聯盟，特別是在中農中間。但是在農村中的新的條件下，同時出現了舊時代的一切保守勢力和一切黑暗勢力；游說者和司書隨同包買主和高利貸者一起出現，牧師的活動又重新活躍起來，教堂婚禮日漸增多，大批大批地把孩子送到教堂洗禮，教會開始到處活躍。

農村中被解放的市場，即私有生產者的自由活動，開始和將要發生的更公開的農村分化，以及社會主義民主的新形式的出

現，所有这些都必然要引起新的政治变迁。公开发財致富的现实的情景迫使有产的农民必須投入政治斗争和引起他們投入政治斗争的企望，甚至使他們能够相当快地夺取政治陣地。（这主要是在通过土地基金法令之前發生的，因为这个法令差不多完全打消了富裕农民的这些幻想）当取消农村中旧的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形式的时候，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政治上最积极的和最先进的农民曾一时不知所措和茫無前途，因为他們不能到处和立刻找到新的斗争形式。此外，有一部分貧农感觉到他們失去劳动合作社的經濟依靠，他們在从前的剝削者面前变得無依無靠。反动分子和非社会主义的，即反社会主义的力量的全部盲目的自發势力变成更加坚决和更加富有侵略性的了。

在农村經濟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矛盾和对立，必然在社会主义联盟的組織中得到反映，正如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組織中得到反映一样。由此，在这些組織中便产生了不滿情緒，特别是在去年1953年更为突出，新的条件能够客觀地影响这些組織的許多成員，因为他們已更确定和更完全地形成了一种意識，認為农民是私人經營者。长期来許多农民都以自己的家产定居下来，現在他們所想的和私人商品生产者一样。他們的私有經濟所取得的成績，致富或貧困的可能性，目前都直接决定着农民的政治立場和行动。这一时期在农村發生的不滿情緒，並沒有削弱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农村中的陣地，虽然这种不滿情緒在許多場合确实暫時削弱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組織。由于这些不滿情緒，使得农村中的社会政治关系更加团結無間，使社会主义力量結合起来，只有現在才开始了（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不是那种吵吵鬧鬧的，而是更細致、广泛、系統和全面的政治斗争，加入这一斗争的广大农民群众，比过去要多得多，因此，这一斗争贏得了具有很大意义的政治胜利。

新的經濟条件、新的自由市場、份地的限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实际上(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立刻更广泛地在政治上吸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泛的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终于找到了这样一种关系(虽然是一般的),它使农民在經濟和社会关系中能够更加独立,从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發展,逐漸加入社会主义發展,并把这种發展看成是自己的發展,而不是什么异己的,农民一定要去适应它和强迫农民接受的东西。不管这个汪洋的农民大海有时看来是多么汹涌澎湃,毫無疑义,当談到农村的状况时,我們所指的只是地方的和暂时的現象。因此,尽管在选举运动时有过高声震耳的極反动的口号,秋季的选举表明,农村中的政治稳定性比以前更加强了。在农業合作化逐漸活躍的过程中,这一点已經逐漸开始表現出来。

至于談到城市,那末,在城市里,以所謂典型的敌人的形式出現的旧階級的殘余及其經濟地盘,比起农村来要薄弱得多。我所談到的一切,牵涉到私人小商品生产的加强和在过去年代里某些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現,这些都是極其微不足道的,以致不能把它和城市社会主义經濟的巨大力量相比較。真正的資產階級,即拥有資本的大資本家,在国有化以后,实际上几乎已不存在了。有时在某些地方出現个别的小資本家,关于这些資本家,我在上面已經說过。但是,这个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社会的代表,首先是被剝夺政权的资产者,受过严格訓練的資產階級保护者,一些过去的律师和法官,从前的政客、反动的艺术家和其他的矇昧主义的宣傳者。他們的唯一的前途和唯一的希望,就是外来干涉,即所謂西方的援助。我已經說过,他們把社会主义民主和新的社会及經濟制度,看作是由西方的压力所造成的退却。旧南斯拉夫知識界的代表、采取中間立場的政治活动家以及諸如此类的人物,在进行秋季选举的时候,策划了一个利用选举运动

的計劃，恬不知耻地商議怎样瓜分职位等等。如果当私人資本刚开始發展的时候，特别是在1953年上半年容許了私人資本自由發展，那末“新資產者”即建筑企業主等等确实能够使这个实际上僵死的、被消灭了的資產階級复活起来。同时，根据通过的法令，私人資本極大部分已被消灭了，这些法令使得新“資本家”分担自己旧的階級兄弟的命运。現在，各种頹廢派和敗坏德性的各界知識分子繼承被剝夺了政权的資產階級的保护人并使其“年青化”。需要有其他的手段和他們作斗争，而不是需要国家檢查机关和法令。

但是，在我国的条件，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的更严重的表現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和庸俗習气。这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基础就在于我国普遍的相对落后性，尚不十分發达的物質生产力，大量的农民以及城市小商品生产者的存在等等。庸俗習气多少影响到我們社会主义国家多数公民的意識。随着自由市場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出現而活躍起来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更加鑽入我国生活的一切孔隙，而且差不多在各个方面都表現出来。

这里不必詳細地談这一点，然而这有必要尽量多談和写。在布里俄尼島举行的全會就已指出这一斗争的必要性。我想只談一件事情。

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影响下，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各級組織中出現了各种异己的、但却享有某种影响的分子，他們不喜欢現时的坚强的革命紀律和經常的警惕性。实际上，德热拉斯就是这种分子和这种現象的代表。他同时又是小資產階級对我国工人运动和一般社会主义运动施加压力的最大的政治胜利者，虽然他向这种压力投降了，但同时他又是代表着資產階級思想及其以“新的”現代的“社会主义”形式表現出来的理論和哲学



的最大的“胜利”。资产阶级思想是与社会主义相违背和相敌对的观点的表现；最近几年来，这些观点是作为与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力量相对抗而在我国出现，并且在德热拉斯的著名的文章中得到高度的综合性的，可以说是至善至美的理论表现。同时，这是一些反革命势力的坚决的政治举动。德热拉斯事件对我们来说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小商品生产和经济中私人资本主义因素，以及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政治、艺术、文化等方面的各种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复活的反映和结果。在上述现象中客观上有其根源的这个结果，恰恰影响到米罗万·德热拉斯，其原因必须到他个人的观点和地位等等当中去寻找。

总之，在德热拉斯事件中空前尖锐地表现出近年来至少我们是对其估计不足而且往往被人忘记的敌人。许多人只在这时才明白：现时我们除了反官僚主义战线外，还有一条战线，在这条战线上，共产党人和我国整个社会都必须时刻顽强地进行斗争。在经济上，一方面必须经常同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现象作斗争，另一方面必须同私人资本主义的倾向和现象作斗争；在政治上，必须经常同官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倾向因而也就是同典型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其实，早在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第二次布里俄尼全体会议上就已经预见到了同这些资产阶级倾向和现象的表现作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在当时条件下也许还不可能发现它们的种种表现形式和尖锐程度。

但是，既然不发达的生产力是我国私人资本主义倾向的基础，那末，官僚主义在客观上是植根生产力之不发达，但官僚主义常常是轻易地利用必须和私人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的事实来替自己辩护。整个社会的组织，特别是社会的经济生活，在工人集体和公社等自治的基础上，把国家政治的官僚主义制度的基



基礎連根拔掉和徹底加以消滅。但由於上述的落後狀態，我國的經濟制度和社会制度今後也還會產生官僚主義傾向，不過其範圍是日益縮小。但是，群眾的覺悟越低，官僚主義的危險性就越大。因此，無論在經濟方面或在政治思想和其他方面，這條鬥爭戰綫是經常公開和經常起作用的。所以，在我國共產主義者面前擺着一個在兩個方向同時活動的複雜的問題，即經常觀察和考慮各種反社會主義現象的過程，這些現象意味着舊勢力以各種形式復活起來。

上面我談到了兩條戰綫，但是由於這兩種傾向是作為獨立的、互不依賴的、乃至相對立的勢力的作用而表現出來，所以，這裡所談的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社會和剝削階級的殘余進行反抗的各種形式。同時這兩種現象，不但其根源是相同的（兩者皆為舊時代的殘余！）而且它們現在也是相互交錯，相互彌補，此一現象生於另一現象，而且往往是二者缺一，便不能存在。所以，今天我們再不能像兩年前那樣說：官僚主義是主要的危險，即使不是唯一的危險，例如德熱拉斯及其他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分子所經常企圖設想的那樣。我們也不能作相反的斷言，說其他的即私人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危險是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恰恰相反，正如我所說的，必須把這兩種傾向看作是反社會主義的舊勢力的一種表現，看作是舊的剝削階級殘余力圖賴以保存的形式。

有些人以為，新的社會經濟制度削弱了（雖然只是暫時的），我國力量的對比而不利于社會主義，因為據說階級敵人的力量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增長起來了。其實這種說法是不確實的。實行新的經濟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社會主義民主的初期的歷史，不過是舊勢力突出復活和加強的歷史。新制度和社会主義民主只作為從前徹底戰勝資產階級和一般私人資本主義的結果才

能出現，而且只有實行新制度和社會主義民主，並在實踐中確立新制度和社會主義民主，才能說是徹底戰勝了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由於基本的和主要的反社會主義勢力遭到了失敗，所以目前這些反社會主義勢力的變種在政治及其他活動場所表現得更加鮮明，更加顯露。因此，大體說來，我們這裡所有的一切反社會主義勢力都表現為兩種形式：或官僚主義，或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它們已大大地削弱並繼續在削弱，而社會主義力量目前卻處於高漲之中。目前同反社會主義勢力的鬥爭當然是更為複雜、細致和尖銳，它要求大力進行思想和政治準備，但是這個鬥爭可以不慌不忙地、公開地、通過對敵對勢力經常不斷排擠和消滅來進行的。所以，在這一鬥爭中所掌握的陣地，是更加牢固和堅實的。

實際上，我國社會只是由於實施了新制度，才開辟了自己的起點。它利用國家，以便在國家幫助下在過渡時期中尋找和建立這個起點。只是現在我國的社會才沿着自己的道路前進。在這條道路上前進的時候，它會引起那些原形畢露的一切敵對勢力的反抗，但同時社會將會把這些敵對勢力消滅，並朝着自己的目标前進。

### （三）

上述私人資本主義因素和傾向以及經濟犯罪的其他形式<sup>①</sup>怎麼能夠這樣大規模地和這樣迅速地表現出來呢？其原因是什

<sup>①</sup> 原注：有些人把經濟中的這些犯罪現象的出現看作這個制度是比行政制度更加沉重的負擔，我要用恩格斯的語來回答他們，“必須是先存在有私有財產的制度，然後掠奪者才有可能占有他人之勞動”。可見，在舊制度下面，經濟遭到了更大的損害。（這只是從法律上而言）這種制度的成就在於，它把這一點當作犯罪的現象加以追查。

么？

原先我曾強調指出，近年来我国小商品生产的增长，如果从整个看来，其所以是好现象，这是因为现在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生产力的加强，这是生产力增长的形式之一，这种形式在目前情况下是可能的。在战后不仅用剥夺的办法，而且利用行政的经营方法来同私人资本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作斗争的初期，小商品生产迫不得已而受到损害，而且其受损害的程度，甚于我们所需要的和对我们有益的。更自由的制度自然使得被超经济的手段消灭的东西得到补偿。这时，各种不良现象当然就会出现而且已经出现了。例如，尽管手工业有相当大的增长（在行政措施时期），可是它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同时，如果考虑到我国工业发展的情况，那末，大概它永远也达不到战前水平。

不良形式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必须到我国经济制度不发达的状况中去寻找，更确切地说，必须到我国的经济立法中去寻找，这种立法制定得还不充分，并且有许多缺点。显然，我国经济制度的最初的一些形式和我国经济制度付诸实现的第一批法令，不能预见到以后发生的一切现象和在实际生活中所碰到的一切困难，因此，当自由市场刚一形成，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自发势力便不可克服地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而发生作用，它寻找我国法律和我国制度中可能突破的一切缺口。这既表现在私人商品生产方面，也表现在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中的私人资本主义倾向上面。

收支差额的赤字和经济上的其他亏空，如同缺乏必要的经济后备一样，造成许多种商品缺乏，以致在我国的自由市场上不可避免要产生垄断，并使各种各样的投机活动成为可能，特别是在商品交换方面和在贸易方面。

我国经济尚未解决个体生产的问题。在最近的一些新法令

頒布之前，个体生产者还不可能是加入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总过程的生产者。个体生产者之能够生存，或者作为私有生产者，或者如果他愿意加入社会主义成分，就得终止其为个体生产者。由于这个缘故，一切利用个体劳动或不大的雇用一两个或几个工人的作坊的小企业，应当仍然是私有的，而且必然要按照私有商品生产的规律发展。

关于公社在我国经济制度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怎样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然而，没有公社就不能建立社会分工制度，以及建立广义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社会的职能的区分，它使得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个人、劳动个体和工人的简单的总和，不是企业、劳动集体的简单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结合是复合的社会机构。在这种复合的社会机构中，公社是一个主要环节；在目前的条件下，它恰恰是这样一个环节，没有这个环节，便不能设想同私人资本主义倾向以及同国家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早先颁布的法令使企业基本上获得解放，成为经济法律的个体和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它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社会职能决定于在社会基金由表现为积累和基金的百分比的一定金额来补充的条件下，它能够自由地生产和在市场上交换自己的产品；粗浅些说，整个社会是由各个独立的企业总和以及拟订计划和征税的一个中心构成的。在这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倾向在企业本身内部自然就能够得到发展，而且已经得到发展了。和私人资本主义倾向相对立的，是集中的倾向，即和企业有很大距离的倾向，因此，归根到底，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公社没有加入这一过程的缘故。公社和企业相当接近，和劳动集体相当接近，所以它同企业的联系，它对企业活动的监督，以及它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职能，不带有集中的官僚主义的倾向，因为公社是工人自治的直接



的和最高的表現。但同时公社和企業距离也相当远，因为不能把它和企業相比較，因为它是比劳动集体更广泛和更完整的社会組織；同时它是“社会”的代表，它能够和企業中的私人資本主义傾向相对抗。由于頒布了新法令，这个問題也获得了解决，或者至少已經打下解决这个問題的基础，它使我們能頗为有效地同社会主义企業中的私人資本主义傾向以及同小商品生产中的私人資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同时个体生产将适应着社会主义經濟制度而發展。这也保証我們同国家資本主义(官僚主义)傾向作有效的斗争。

目前，我国經濟制度自行提出一系列要求：(一)制定法令的体系，它精确地規定各部門在生产中的权利和义务、交換和分配的規則以及对違法的处分办法；(二)建立一种能够保証实现这些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統一的有效的机关。当我們还没有碰到实际需要的时候，無論那一个要求我們都是沒有的。例如，我們缺少許多法令以及我們沒有組織国家檢查和其他机关这一事实，在許多方面使个别危害行动成为可能，甚至推动了这些危害行动。在經濟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消灭国家資本主义的經營方法，就是取消国家分配社会产品的权利，因而也就是取消原本屬於社会本身的职能的过程。同时，在我国条件下，国家作为社会的工具，用处处以及在生产和分配方面执行法令来保証这一职能，就是說国家是社会用来保护社会主义經濟發展的工具。

最后，今年年初頒布的新經濟法令在很大程度內应当补充自己的这个体系，以便使我国經濟中私人資本主义因素發展的問題，能在許多方面求得解决。但是这决不是說，在我国，在小商品生产方面以及在社会主义經濟組織中的私人資本主义因素和傾向的根源便会这样完全被消灭。恰恰相反，这些因素的复活是和我們的制度本身有联系的；这种制度本身目前也还会长



期繼續產生私人資本主義傾向和現象，其範圍當然在日益縮小。所以，我國社會必須經常和有意識地和它們進行鬥爭。因此，為了更突出地強調在我們國家里的自覺因素的作用，我想指出以下的情形。

在反對官僚主義的這個鬥爭中，以及由於在我們國家里實行了新經濟制度，有些人在紛紛談論價值規律，談論大家都公認價值規律在我國的存在，以至開始散播一種看法，認為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天然屬性。但是必須立刻提醒一句：價值規律不是我們的什麼發明，不是什麼新的，僅僅在我國的條件下才是重要的東西，而是過去的顯著的殘余，是確實不可避免的、不能很快就得到克服的殘余。價值規律的作用仍然是肯定的，甚至是進步的，但這只是在一定限度和一定界限內。同時，由於我國貨幣商品生產使經濟方面（不僅僅在經濟方面）能夠得到進展，所以我國社會生產中的商品性質的因素畢竟是不固定的、分化社會團結和社會的因素。想借規定“真正的價值”來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就等於想用選舉“真正”教皇的方法來消滅天主教，或是等於把那種最充分地表現生產者為自己生產品所奴役的經濟范疇徹底實現，而企圖以此來建立生產者最後支配自己生產品的那種社會。——當初恩格斯就是這樣嘲笑杜林，因為杜林宣稱價值規律是自己未來的公社的普遍規律。問題在於要了解，價值規律並沒有消滅，而且不是任何人的法令所能消滅的，因為它和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相符合。因此我們仍然要弄清楚，在生產力發展上，從而也就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上，這個規律所起的進步作用的範圍和程度如何。把這點確定之後，我們就從肯定的方面去利用這個規律的作用，而在這個規律對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皆成為多餘的和有害的地方和時候，我們就應該把它拋棄。

价值規律發生作用的範圍，除了小商品生产和农村等等以外，已大为縮小和受到限制，因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基本上已被克服。

社会生产中的無政府状态已根本消灭，因为生产力的本質已被認識，生产力的社会性質已被公認，而生产归根到底是根据整个社会及其成員的需要，用社会經濟計劃（联邦的、共和国的、公社的和工厂的計劃）来調节的。对社会产品的資本主义占有也根本被消灭了，因为社会通过企業、公社、共和国和联邦来实现对这部分产品是为維護社会本身及其發展所必須的（在經濟方面这点归根到底就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那一部分产品的社会占有；供个人消費的那一部分产品由工人自己領得，作为个人占有。

这是大体上和从原則上来說。但是，在这些計劃範圍內和个别行动上表現出自發势力，即价值規律。生产者交換自己的产品；生产者之間直接的社会联系是通过計劃来实现的，此外，还有一种經過市場的直接的联系。一般的和大致上的都由計劃按排，而最后的和細节上的則由市場来安排。因此，我国社会也遵循着这些範圍，对产品实行控制。我国社会目前不能也沒有权利更进一步，因为这样它就会走向官僚主义，对事物的支配就会变成对人的支配，即就会变質。

由此可見，問題的实質在于，每个单位（各个社会成員、企業以及公社）在社会生产中的份額必須进行計算，以便加以分配，同时这个計算是經過市場上的交換来进行的；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需要交換的产品的商品性質。这是企業內部私人資本主义傾向和公社中本位主义傾向所产生的客观基础，这个基础也造成了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現象等等。

因此，随着新法令的施行，經濟制度已發展到这样的程度，

以致于由目前从这个制度中已自动地产生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社会主义。但这个制度仍旧是不发达的,因为旧的关系、旧的形式和旧的经济范畴使它感到极度困难,以致于使得它本身又产生了旧时前资本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或这方面的倾向(的确,这种关系和倾向是微不足道,而社会主义关系则是很广泛的)。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关系和倾向,出现了各种矛盾首先是某种阶级矛盾所由产生的种种对立面。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如同不断完善制度本身以及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一样,是根本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由于我国已为继续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私人资本主义倾向和官僚主义倾向的基础均已被消灭(私人资本已被消灭,经济中的行政官僚主义制度已被消灭,找到了——虽然是基本上找到——在实践中获得良好结果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形式),我们往往低估和忘记了这些倾向出现的危险,忘记了旧社会阶级制度复活的危险。这在我国的确是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一切发展都如此迅速向前推进,以致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想到历史还会这样倒转过来。但是,包括在使复活思想本身成为不可能的客观力量和物质力量内部的(除其他一切之外)还有自觉的因素,即同旧势力反抗的自觉的斗争以及为发展和改进新的社会主义事物的自觉的斗争。如果不估计到这个因素,那末,其余一切客观因素都是不足以维护目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在我们国家里,仍然还存在着出现个别人,尤其个别集团、集体和公社等等在某些方面实行垄断的可能。我们已经看到各个集体想获得这种垄断的企图总是和这些组织内部的官僚主义相联系的。这样,由于历史的必然性,结果就造成由支配事物转为支配人;在经济统治的基础上,政治地盘和政治影响渐渐发展和巩固起来,认为这是正确发展的思想开始逐渐加强。

于是社会就退化了。我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不能容許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壟断出現的發展水平。商品、貨幣、市場等等，在我国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具有的那种概念。但是如果我們沒有为社会主义發展，为消除这些旧質，为縮小市場規律和商品貨幣經濟等的作用而进行自覺的有組織的斗争，如同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一样，那末这些范畴每一个別的和所有的范畴都包含有旧質的殘余，而且恰恰是在这样的程度上，以致足以使我国社会走壟断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官僚专制的道路。

造成对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一工人階級的最有覺悟的革命組織估計不足和削弱的一切傾向（更不用說要把它消灭），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傾向。

#### （四）

最后，我想談談下面的問題。我想証明：第一、上述一切否定的因素并不是什么历史的必然性或“錯誤”，而是我国經濟發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第二、这些不良現象，其中大多数帶有暫時性，因为这种現象的出現是在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的时候，即当时在制度或組織內部都还存在着許多“漏洞”，因此沒有任何理由攻击制度或攻击我国經濟制度的基础；第三、我們要向所謂無意識运动的信徒和某些新制度的热心的保护者指出，正是这个制度产生了必須以自覺的斗争来加以反对的某种現象（这并不是这个制度的罪过）。

同时，我想指出經濟变更和政治及其他現象之間的緊密的相互联系，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到：目前如果不懂得和不考慮到經濟政策，政治斗争便無法进行，今天，經濟問題在任何地方——“上上下下”，都是政治的本質的，基本的和主要的部分，經濟政策再



不是而且永远也不会是某地区或共和国内部个别“经济学家”的事情了。

早在1816年，聖西門就把政治确定为研究生产的科学，并預言道，它将完全专心致力于經濟。恩格斯說道，这里“十分清楚地表现出这样一种思想，即支配人們的政权应当变成对事物的管理，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即达到国家的廢除……。”而在这历史預定偉大理想家的天才預言一定要實現的我国，恰恰在这一預言正在日益實現的今天，却确立了完全相反的見解。这里我所指的不仅仅是像德热拉斯所采取的这种立場，他把政治、民主等等的一切理論和現存的社会物質生活基础割离开来。他把哲学的、政治思想的和帶綱領性的对我国現代生活（絲毫沒有分析我国社会的經濟生活）的觀點体系加以發揮，并提到社会上來公議。这里我所指的是某些代表同志以及其他政治战士，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等等中心的負責人的錯誤概念，他們除了研究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問題之外，还喜欢研究“同人民有关的”任何其他問題。

在我們国内，有些人往往錯誤地理解在布里俄尼島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全会的決議。这次全会給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一政治組織及其領導人，即革命战士的政治活动，政治斗争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并且指出，他們干預具体問題，干預一定的專門技術問題，實質上就是官僚主义。專門的經濟問題，具体的專門的問題，这是企業和經濟专家的事情，而政治領導者則应当解决和經濟政策、經濟制度等有关的問題。

作为政治战士的共产主义者，他們的作用就是教育和推动人們和群众前进，要亲自解决一切極关緊要的問題，解决与社会本身的存在和發展有关的一切問題，并作出决定，而这首先就需要共产主义者亲自積極参加討論和解决這些問題，而且还要积

極參加討論和解決在各自工作崗位上，即在工廠、委員會、國民議會等等所發生的每一個問題。因此，一切政治活動家不但要鼓動和宣傳，不但要教導“下級”，指出他們必須參加解決某個問題（這是重要和必須的），而且還要直接參加制訂和貫徹經濟政策。例如，過去只有極少數的代表和其他政治上的負責人參加有關經濟制度的討論。然而，這些法令不帶有專門技術的性質，因為它們是解決整個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基本問題，解決人們之間關係的基礎，解決集體及其各個成員在其經濟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我國社會自覺管理自己的運動如果不表現在這一點，那末還能表現在什麼地方。

以前談過關於制度（照馬克思看來是過渡時期）的某種有機的“缺點”和談到必須使這個制度不斷完善。正是這種完善過程應當成為我國最廣泛最有覺悟的各界人士自覺努力和不斷研究我國經濟的結果；這種完善過程應當成為他們實際革命意向和不間斷的、直接的鬥爭的事業。這也是屬於當前的經濟政策，屬於經濟計劃等等的範圍的。當然，也還有許多作為政治的組成部分的其他問題，即共產黨員參加解決並推動群眾投入自覺鬥爭的問題。但是，所有這些問題多少是直接或間接地同上面的問題有聯繫，以及同基本的問題有聯繫的。

談到各種反社會主義的現象和傾向時，我曾經強調指出，有許多反社會主義的現象和傾向是不能“自動地”克服的，而需要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進行自覺的鬥爭。不過，解決經濟制度 and 社會制度的基本問題，在許多方面都有助於這一政治的和思想的鬥爭。南斯拉夫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制訂了我國進一步發展的總路線，規定了抵抗反社會主義勢力的基本形式，並適應當前的條件和需要，即根據既定的發展我國社會的方針，改組了共產黨和人民戰綫。如果這些組織不能夠在某一時

期內找到实际的斗争形式和所謂活动内容，那末其原因就不能仅仅和首先到这一事实中去寻找，即它們不能立刻使基層組織和其他各級組織的成員和領導明确方向，而要到另一个事实中去寻找，即社会制度，首先是經濟制度的一些基本問題沒有得到解决。因此，随着新經濟立法的施行，大部分过去的問題就会实际地得到解决，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联盟的各級組織的全部活动中就能决定工作内容和找到政治斗争形式。

#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六中全会的开幕詞

(原載 1956 年 3 月 14 日“战斗报”)

铁 托

我們召开这次全会是由于在共产主义者联盟总的工作中，特别是在青年工作中存在一些重大問題。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們已召开过几次中央全会，現在要討論的問題。在以前的中央全会上也討論过。今天我們把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工作专门地作为一项議程提出来。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对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工作方針，做了重大的改变，通过了符合于南斯拉夫社会情况的決議，指出了共产主义者在今后社会主义的發展中所应起的作用；但六大以后产生了某些停顿現象。人們有些辨不清方向，在工作中經常走錯了路。

在我国工業化的蓬勃發展中，在整个社会生活里，曾經存在，而且現在仍然存在一些困难，这些困难不仅是客觀的，而且大部分是屬於主观性的，这些主观性的困难是与共产主义者本身的工作相联系的。

在这次全会上應該对这些問題进行討論（报告人将在这里談到这些問題），因为現在已經到了應該真正坚决地采取一切措施，消除这些缺点的时候了；因为如果这些缺点繼續下去，将产生極坏的后果并阻碍我們今后的發展。

我不想談报告里包括的那些問題（这一切兰科維奇同志都要談到），我只想开幕詞里強調指出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为了



使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工作进行得更順利，我認为必須严肃地注意这些問題。

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当前工作中的基本缺点是什么呢？就拿这样的問題來說吧，我們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談到社会主义的繼續發展和今后的远景問題，談到共产主义者在这一發展中的作用問題，并制定了一个原則，这一原則可能引起了某些人头脑的混乱，这些人認为随着国家的中央經濟和行政职权的逐漸削弱，在我們社会制度中也就不再需要像我們过去的共产党一样有組織的政党了。

这是發生了誤解。因为这些人認为由于国家某些职权的削弱，即由于經濟和行政管理的分散，共产主义者不再負有以前所承担的那些困难任务了。共产主义者沒有以必要的認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問題。認为仅通过把很多职权分配給各方面的人士、交給群众，社会主义的意識也就会到人們头脑里，就会自动普遍起来。

我們很多同志不了解，正是在經濟、行政管理分散的条件下，要求共产主义者更多地貢獻力量，以使我們所制定的这一新制度得以正确地發展。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們完成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某些組織上的改变，即，把各机关中联盟組織改組为区域組織<sup>①</sup>。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我們的街道組織在改組前非常薄弱，思想上也不够發展。但是，我深信，我們公式化地对待这一問題，一下子把一切組織都轉到街道中去是不正确的。我不想今天在这里要求或者鼓动使这些組織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因为那些区域組織的情况很好，在这些組織里，最

---

<sup>①</sup> 即街道組織。——譯者

有才能的共产主义者对我们联盟中那些经常受到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和其他分子的影响及其思想侵袭的同志们还是有作用的。但是，对某些机关我们需要做些改变（兰科维奇同志将谈到这点），因为，从六大到现在看来，由于在这些机关里没有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有很多害处，并因而产生了各种不良的现象。

同志们，在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着思想上的弱点。这种弱点在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没有具备必要的理论水平（虽然不是60多万盟员都如此，而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且，太不注意根据实际情况来继续提高思想意识了。这就造成了过去和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弱点。

我们取消了中央党校，但有些地方也在当时取消了共和国党校，虽然后来事实纠正了它，又重新组织了党校和训练班。但是，共和国党校的取消就是错误观点的反映，这种观点认为在分散管理以后，一切都将自流地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也会自然地发展起来。很多共产主义者忘记了自己的革命者的作用和对我国公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作用。他们很快地走入另一极端，学会了只是发号施令。他们认为，就因为他们是各种环境中各个组织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就能随意驱使人民，就能要求别人把自己的话当作最权威的话接受下来。从这样的立场、观点出发，他们很难担当教育者的新作用。

我想，不仅我们的，而且在世界各处的共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都是要成为群众的教育者。但是，如果共产主义者自己不是经过培养的，缺乏足够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他们就不能成为群众的教育者；如果他们不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来行动、不作为一个具有革命组织的一切特点的統一组织来行动（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应该是这样的革命组织）、不作为一个具有自己队伍坚强的纪律性和团结一致性的統一组织来行动，他们

就不能成为群众的教育者。正由于我們把共产党改称为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后，共产主义者联盟团结一致的組織性减少和削弱了，因而产生了如下的情况：許多共产主义者，甚至高級领导机关中的某些人，認為再沒有必要接受其他高級机关的決議，接受他們自認為不符合于本地和本組織情况的決議和某些工作了。因此，产生了一系列不好的現象，这些現象过去和現在都是我們的阻碍，我們必須消除它。我們必須有一个思想上、組織上团结一致的联盟。我們所实行的分散管理表明我們在这方面做的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就使各方面的人士，广大群众能够参加政权和管理。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需要一个思想組織来领导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和改造人們的工作，因此，这一組織必須是团结一致的。

我們过去認為在我們社会内部生活中有可能过渡到民主化，不仅由于我們 1948 年与苏联發生的冲突，也由于我們討厭斯大林式的管理形式，相信我国存在民主化所必需的条件。当然，我們經常強調，我們的民主不是某种口头上的东西，它在我們的經濟、物質和整个社会發展中必須有自己的基础，即在我們的社會管理中必須有其經濟基础，它必須区别于西方的民主而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質。虽然，我們有了民主化的正确方針，但是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在我国各种异己思想开始發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現在更加强了。当然，这还不像能威胁我們革命果实因素那样危險，但是，这是危險的，因为它妨碍着社会主义的發展和对我国公民进行正确的教育，并使这些工作变得很困难。当然，我們的工厂是社会主义發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在不發达的国家里，沒有工厂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工厂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造就社会主义的人，最重要的在人們头脑中形成社会主义思想，正是那些社会主义的异己思想日

益阻碍着我们。我们现在不能走入这一极端。我们应该为造就我们的人而斗争，应针对这些社会主义的异己思想及其影响来加强我们的影响。但是，如何加强这一影响呢？仅通过报刊是不够的，每一个共产主义者，无论他在哪里，都必须不懈地、顽强地进行这一工作。

我们，特别是在六大以后，担负了我们建设中的各种职能和职务，因此，我们很多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普通的事务主义者，他们忘掉了其它的一切，只想到自己那一狭窄的小圈子，也看不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因此，我们要更加顽强地与这些带有地方主义色彩的不良现象进行斗争。我认为，共产主义者无论担任什么职责，绝不能忽略自己的这一基本任务：要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作为对一切事件有国际主义观念的国际主义者来工作。他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这方面；如果能够正确地了解自己的基本任务，他就能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正确地进行工作。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应该非常严肃地讨论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经常干扰我们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在现阶段，在我们的当前的工作中还有很多物质上的困难的时候。还可以再补充两句：通过这种工作，一切共产主义者统一思想 and 统一行动的必要性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现在，我想谈谈我们工作中一些好的方面。我谈到不良现象是希望在今后工作中能研究并考虑这些现象，消除这些现象，使我们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其实，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如果没有各种缺点，我们取得现在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要顺利得多、快得多。难道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没有取得巨大成就吗？取得了，我们取得这些成就就是因为我国全国人民，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支持这一外交政策。难道我们在建设方面没有取得巨大成就吗？我们在工业



化方面，在我国整个建設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面貌已大大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及时地克服这里将要談到的各种主观上的缺点，我国的面貌会改变得更大，缺点会更少。

当談到为人民而斗争、談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时，我想在这里再提一个问题。我想談談我們的青年同志們，我們青年的情况很不好。在战争期間我們的青年赢得了極高的荣誉，而这是由于我們共产党領導了他們，給他們指出了道路，毫不間断地把他們掌握在自己手里，培养他們，使他們發展。这样，青年們随时都准备做出偉大的、英雄的事業。战后的最初年代我国青年做出了偉大的、英雄的劳动事業。为什么？因为共产党掌握着他們并对他們进行工作，因为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正确的方針。虽然有些地方也有缺点，但能够很順利地克服，所以他們在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后来，特別是在我們終止了义务劳动的时候，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忙于經濟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迫切問題的时候，我們有些放弃了对青年团的領導。我們使它任意發展，給它規定了不正确的任务，人民青年团也就不再是一个政治組織，不再是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因素了。当然，这就产生了不良后果，今天也存在这样的現象：在义务劳动中值得驕傲的那些青年和曾是农村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人物的青年中的一部分避开了我們，虽然，我們在这一时期的青年团工作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績。这些青年躲开我們不是由于我們对农村的各种措施，如稅收等。很清楚，他們所处的环境對他們有影响，因为他們的父母、亲友把自己对各种問題的不滿傳給了他們。但是，他們躲开是由于我們沒有及时地对他們充分地解釋在我們这兒發生的情况和應該做的事。我們正應該最經常地向这些青年解釋这一切，但我們很少和他們談我們的日常困难、我們的成就和我們要达到的目的。對他們講的很少，他們就远远地离

开了。

有人認為我們的各種協會、“游擊隊”、足球協會、射擊協會和其他協會能影響我們青年，只以它們是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的協會這一事實就能使青年變為有覺悟的社會主義公民。我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在資本主義國家里也有這樣的協會。難道那里是發展着社會主義覺悟嗎？……首先，要通過我們的工作使我們的協會成為社會主義的組織。不應使青年處於沒人管的狀況，而應該給他們指出方向，如果我們自己不在这方面努力指導、教育他們，他們就不能給予我們所要求於他們的东西。

有人說，我們所獲得的成就和我們日常的社会事件是能使我們青年逐漸成為有才干的公民，成為我國今后發展中的建設者和我們的換班人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認為這也是錯誤的。我們整個聯盟和每個共產主義者最困難而又最崇高的任務就是更好地把青年組織起來，給予他們正確的社會主義教育，為他們而鬥爭，使他們擺脫各種社會主義的異己思想的影響，從各種反動殘余的影響中掙脫出來，使他們抵抗住已經滲入我國社會生活的西方各種腐朽思想和影響的侵襲。一句話，我們應該注意關心我們的青年。因此，不僅是青年團的領導，而且共產主義者聯盟也必須有一定水平，才能使這一工作正確地發展。

最近幾年，我自己也曾向青年團和某些共產主義者指出與反動的和各種異己思想的鬥爭還很軟弱。有这样的情况：共產主義者經常一句話也不能講，我們在自己的發展中所走的這一如此廣闊的民主道路使他們簡直有些迷惑；他們害怕反對那些經常不正確地，不公正地批評或誹謗我們的措施和制度的卑鄙的人、反動分子和小市民們會導至某種宗派主義的傾向，很多共產主義者還不能非常堅強地反對當前經常發生的各種攻擊。我認為，共產主義者在保衛我們的革命果實和我們今后發展中的

作用問題在当前像6年前和10年前一样是一个迫切的問題。他們应具有一定水平，不应害怕由于干涉某些內部事务太多而伤害某些人。因为，不干涉那些內部事务并不比以前过份干涉的危險少。問題是在于干涉哪些事情。应该知道干涉什么。如果干涉各种不好的事物，各种違法行为，工厂的某些领导干部的不正常和不正确的行为，那他干涉的是正确的，共产主义者有权干涉。但是，如果共产主义者干涉计划和各种技术操作过程……就是不正确的了。共产主义者在工厂和机关里应该是领导工作的人，应该是指出基本方針，指出企業或机关工作發展的基本特点的人。

同志們，这就是我想在这个全会上提出的一些問題，希望在这里能很好地思考這些問題，进行討論并做出最后的决定。

## 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 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領導作用

(原載苏联“真理报”1956年6月2、3日)

卡 德 尔

南斯拉夫战后的發展在組織方式和工作方法上，在体现共产党的領導作用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是首先由社会主义的物質和政治力量的發展和广大劳动群众覺悟性的提高来决定的。

第一个阶段包括战后的最初几年。革命胜利后共产党領導的工人階級首先必須在旧的国家机器的廢墟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构和奠定进一步發展社会主义关系所必須的物質基础。在这种条件下集中的国家执行机构起了决定性的革命工具的作用，新的階級利用这机构保衛了革命的政治胜利，实现了主要生产資料的公有化和为社会主义的物質和主观因素的繼續發展打开了道路。在这阶段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这方面。

在这阶段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有三个。首先必須把新的国家机关建立起来，联系起来并把它变成統一的机构，共产党領導的革命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領導机关可通过它迅速地、直接地实现那些迫切的革命任务。因此必須給这統一的集中的机构以相应的政治作用和力量。然后，正由于它有这种作用，这个革命政府机关和共产党必須有密切的联系。不仅



在重要的职位上要有共产党员，并且要使这机关直接完成共产党或其领导机关的决议。在革命刚刚胜利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是沒有别的形式来实现的。最后，由于注意到广大工人群众缺乏民主管理生产资料的經驗，和必須而且有可能用革命的方法更快地实行计划经济的制度和最快地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把整个管理经济的任务委托給有組織的执行机关。

工作方法和实现共产党领导作用的組織形式，都是适应于这种制度和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党的领导机关在完成任务时，依靠国家机关，对它的工作予以监督和指导，向它說明它执行国家政策的基本决定。此外，党經常在群众中展开極其普遍的活动来解釋各項决议，以求这些决议得到工人阶级和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不仅是指一般政治性的支持，而且还要發揚下層的主动精神。在这項工作中，党一方面依靠国民議会和人民委员会全体會議，另一方面依靠人民陣綫各机构的支持，通过人民陣綫，党才可能在进行解釋和执行任务时同最广大的群众保持最直接的接触。

同时，党的基層組織設在企業里、国家机关里和各种不同的团体里，也就是說，設在他們的领导机构里，这一点也符合于上述的工作方法。党通过这些途徑使国家行政机关和国民經济管理部門在执行任务时受到党的直接影响。

在南斯拉夫战后第一个發展阶段上，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主要特点就是这样的。显然，在这些条件下無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形式曾經必須受到限制。这种政治制度是直接 from 革命中生长出来的，它执行了最主要的革命改造任务。就其趋向看来，这样的政治制度曾經完全符合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群众的願望，它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工具。正是这种情况曾經使得它在我国条件下具有历史必要性。

用这样的工作方法在这时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巩固了工人阶级革命政权的政治团结；实现了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实行了计划经济的制度；制定并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改造劳动人民的社会意识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绩；过去的统治阶级的残余政治力量已被缩减到最低限度。这些都是很短期间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这种政治制度逐渐地开始表现出若干不良的倾向。因为完成任务的重心是国家机关和党的、国家的监督机关，所以广大的劳动群众对国家机关工作的影响、他们对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工作的参与、他们主动精神的表现，当然都受到了限制。而由于常常“忘记了”在群众中做必要的解释工作，就出现了政权的群众基础缩小的危险。在各种负责岗位上的个别共产主义者开始失去注意群众情绪的能力，在行动上显出他只是个国家官吏，而忘却了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政治责任和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国家执行机关和党的执行机器混合在一起的倾向的发展成了明显的危险，这无疑就会削弱党和群众的直接联系，因此也就会削弱它正确反映和体现社会中进步倾向的能力，而这个社会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

换句话说，官僚主义的危险已经变成直接的、现实的巨大危险，这里所说的官僚主义不是指一种特殊的方法，而是指一种使人很容易安于现状和老规矩、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权统一的原则很容易遭到危险的破坏的政治和社会因素。

## 二

虽然这些倾向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并没有占统治地位，但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来说这些倾向的表现已经是一个足够严重

的信号，以至須要改变我們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形式和关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章、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也应当适应这一改变了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党向自己和整个社会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也就是在国家系統中和社会关系中消除官僚主义的客观泉源和根源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主要的武器和政治工具是：我們采取了扩大整个政权机构，特别是經济管理方面的执行职能的群众基础这一方針。換句話說，采取了整个政权、特别是国民經济管理方面执行职权的地方分权和民主化的方針。根据这个方針，在这个时期中，我們的工人委员会、地方自治机关和教育、衛生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各种自治机关都有了發展；取消了各行政区政府的体系，大大縮减了国家机构；扩大了国民議會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等等。对整个这个体系的更仔細的分析和描述当然不是本文的主题，因为这要占很大篇幅。但是应当指出，这些改变的政治、經济和社会后果是非常大的，是非常深远的。

首先是，在国家职能方面，即在国防和保衛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質方面还保留了統一的集权的国家机构；除了这方面之外，国家机构或是实行地方分权，或是将它的职权移交給社会自治的各种机关和机构，这些机关和机构对一定的自治机关或劳动人民代表的集体机构直接負責。換句話說，在社会主义关系和社会主义發展的范疇內，有意識地采取了使个别国家职能通过它們的“社会化”而消亡的方針，也就是通过把它們移交給各种社会机构和自治組織。其次，在这种情况下，由党领导机关通过決議和交由国家执行机关直接执行的方法，或者是我們称为行政领导的方法，不仅在政治上不能为群众接受，而且实际上是完全無效的。行政机关在原則上已經变成有关的社会自治

机构执行它們決議的一种直接的有資格的执行工具，而垂直的管理系統只归納成法律上的監督。

当然，这不等于說，我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主張把社会分裂成某种孤立的、地方分权的地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統一的，它把社会生活各个部門，特别是国民經济部門中所必需集中的社会职能都联系在一起。同时，在建立这些集中的职能方面，我們依靠主要的社会自治机构。它們在各种組織形式中根据自己工作的需求和直接利益集体地保証具有共同利益的一定职能的必要的集中，同时也对执行这些职能产生直接影响。

为了更明确起見，我只举出我們社会委员会的組織情况作为例子。社会委员会是各个經济部門企業的共同組織，各企業的工人委员会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社会委员会的領導工作。当然，在社会委员会有关整个社会的某些决定方面，政府有权直接干涉。这样的社会委员会是全国某些計劃执行职权和經济协作职权的承担者，而工人委员会的代表本着法律和經济計劃做出关于这方面的决定。由此可見，在我們这里名为地方分权而实际上不符合它的真正实質的这种过程并不意味着在現代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必要的集中职权的取消，然而無論如何使这些职能民主化了。

可見，整个改組的目的是：把一系列的执行职能从一个統一的国家执行机关移交給許多劳动人民的自治机构和使执行机关从屬于自治机构(而不是从屬于中央行政机关)，从而保証劳动人民对制定和执行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首先是在国民經济方面的各个決議和任务的直接控制和直接影响。

由此可見，我們努力防止把国家机构变为单独的政治和經济力量的任何傾向，同时还关心，使社会主义發展的重心轉移到劳动人民的創造性的、可能更加自由的主动性上，劳动人民在自



己的日常工作和願望中追求着自己的物質和精神利益。只要这种利益具有以生产資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鮮明形式,它在實質上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物質自發力量的主要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的。

不錯,像个人主义、地方主义这样的那些的后退在这里总还有自己的客觀和主觀的基础,而且它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延緩社会主义的發展,或者給它带来一定的害处。但是它終究已經不能促使运动后退或停止了。正相反,我們的經驗表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在改組后,才在政治上成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通过地方分权和民主化,新的社会关系已經在变成可以进行自由的日常創作和發揮受物質和精神的社会主义刺激因素支配的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的自然空間了。这給了社会主义关系以內在的力量,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傾向要反对这內在力量都显得無能为力了。

但是,归根到底,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显然是在我国的环境下社会主义的有觉悟的力量的領導積極性,首先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領導積極性。这种積極性無論在社会主义觉悟的形成方面,在爭取經常的社会主义进步的斗争中,或在克服受旧習慣、陈腐观点,过去的意識上的殘余,因循習气等的影响而产生的停滯和歪曲現象的斗争中都是必要的,至于在反对反社会主义因素的斗争中它是不可缺少的,这点更不必說了。这种反社会主义因素在我們国家里还是不能估計不足的。應該注意到,它們还依靠着农村的社会經濟結構这个基础。

### 三

当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不

是自封自得的，而是取决于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組織，也就是說，看它在社会主义进展道路上的客观作用如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要在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發展中起真正的領導作用，它就必須在工人階級中和各社会机构中取得能够反映最进步的傾向的地位。所以它同劳动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它对他們所承担的直接的、民主的責任是它發揮領導作用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因为这样，在新的情况下，就必須切实改变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的組織形式。

我已經說过，用行政手段解決問題和通过国家机构来执行的方式，在我們这里不仅在政治上会受到指責，而且是不可容忍的。

除了联邦和共和国的政权領導机关以外，也就是說，除了国民議会和执行委员会这些通过法律、原則性的決議和远景經濟計劃和关心維護法制的机关以外，实际的政权是放在为数众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管理机关內，如：工人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里的委员会，領導学校、教育、衛生和社会保險各方面的机构和一些社会工作的广泛的各种自治委员会。所有这些自治机关都有自己的效率高的組織結構，这种結構在原則上只对本机关和法律負責，而不对上級行政机关負責，除了監督法制执行情况以外。

所以，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新情况下改称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这正是为了強調社会主义关系發展和共产党人的社会作用的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人首先是通过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和为数众多的自治机关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进行說服教育的情况下，才能保証一定的政治方針的执行。只有这些机关的决定，只有这些决定，随后才会成为对行政机构和专家的指示。这种关系急速制止住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內的官僚主义傾

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又面向群众了，并且尽力首先是通过在群众中和群众的組織中的政治工作来保証使他們在社会自治机关里的代表采取社会主义的決定。

当然，也必須在一定意义上改变党組織及其領導机关的工作內容。必須不仅使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各个組織，而且每个共产党人在其活动和工作中有更大的独立性。

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各級党的領導机关，甚至是基層小組，解决社会机构日常活动中細小具体的問題，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所謂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战斗性的指导作用，意思是：它維護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为社会主义的發展打开更寬广的前景，动员和組織劳动人民群众实现这种前景。

因此，共产主义者联盟要求盟員必須在思想上一致，在社会主义發展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路綫問題上一致，而在日常活动和选择形式的問題上各个共产主义者可以在各个社会自治机关內、在共产主义者联盟总的思想政治路綫的範圍內独立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同意見的爭論的重心也就正是在这里。因此，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各級組織和領導机构的會議上，不預先对这个或那个国家机关或者社会組織的決議提出具体的建議。这些机关可以独立作出決議，对于共产主义者來說，原則上不強求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持同一观点。但是共产主义者联盟各組織和領導机关，監督共产主义者的工作的思想內容，过問他們的工作，或者喚起共产党人的責任感，如果他們离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努力实现的社会主义發展的基本路綫的話。

当然，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各組織和領導机关的日常工作中，要給予共产主义者以直接的、实际的帮助，首先是經常分析各种

現象的發展，討論成功和失敗，指出錯誤、經驗和教訓、反社会主义勢力和傾向的表現以及同它們作斗争的方法。換句話說，共产主义者联盟尽力培养自己的盟員，使他們每一个人在争取社会主义进步的日常具体工作和斗争中都能独立地拿定主意，使他發揮生气蓬勃的、战斗性的社会主义的敏銳精神，从而帮助他迅速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不負責任的、落后的、不适宜的和有害的現象。只有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才能对自己的决定或者社会民主机构的决定完全負責，他就会支持或者譴責这些决定。

这种工作方法在短期內就取得了很大效果。干部开始更迅速、更大量地成长起来了，更加能够独立工作了，从而也就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对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事物的責任。而最主要的是，責任心提高了，这不只是指对“上級”的責任心而言，而且首先是指对“下級”、对劳动人民和他們在相应的社会机关的代表的責任心而言。因此，共产主义者联盟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的領導作用是直接的、客觀的和民主的，也就是說，这种作用产生于工人階級和工人群众，并且首先又通过他們自己的積極性、他們自己的决定而实现。当然，这个过程还不完善。我們在这里还有弱点，有未經考驗或者过时的形式等等。但是實踐証明基本方針是正确的，这个方針是成功的。

#### 四

在这种情形下，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組織就有特別重要的作用。这是劳动人民和他們的社会团体的人数众多的組織，是从原来的人民陣綫产生的。它的成員，既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也有工会和青年、妇女团体等，人民陣綫以前是一个广泛群众性的組織，受到人民从政治上的積極拥护，經歷过解放战争，战后又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物質基础。由于地



方分权和一些执行职权移交給社会自治机构，这个組織所起的作用就广泛得多了。人民陣綫不再只是从党到群众的一根牽引帶了。它的各个組織同公社、人民委员会、这些組織的理事会、工人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組織發生了直接的联系。它們开始討論了許多政治問題和各方面日常实践的問題。可以說，它們形成了自己的全民社会主义議會，在这个議會中，每天都广泛地討論摆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政治和經濟机关面前的具体問題；虽然社会机关不必須同意这些組織的意見和決議，但是畢竟很明显，社会机关是处在这些組織的直接影响之下。因而，共产主义者联盟应当特別重視自己在这些組織中的工作，保證这些組織一貫奉行社会主义方針。由于政治制度中这种改变了的情况，前人民陣綫把自己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

因为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組織成員在思想方面并不是一致的（使他們团結一起的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共同信仰），显然，在他們当中也能發生各种各样的非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意見。共产主义者在这方面的任务就是向群众指明这类非社会主义观点的真正性質，并为消除这种观点而斗争。很少遇到共产主义者在这方面的活动沒有获得成功。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些組織中經常的和生动的政治討論以及就各种迫切問題交換意見中，共产主义者在群众中起了、而且起着巨大的教育作用。除了上面我所談过的那些任务以外，这就是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主要任务。

但是在这条道路上，在我們面前發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特殊問題。在政权的地方分权和民主制度中出現了一种危險：在工人階級数量很少、也就是說在經濟和政治方面影响薄弱的个别地区，共产主义者联盟沒有足够的力量，使能通过相应的民主

社会自治机构来保证一贯奉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方针，因为它不能够依靠相应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南斯拉夫就有着工业不够发达的和小的私有农业占优势的许多地区。在这些地区中，如果让社会自流地发展，那么，或者会使资本主义的成分加强，或者会迫使社会主义力量放弃地方分权和民主化的方针，或者会停留在集中的行政领导方法之下。当然，这一切就会大大拖延和延缓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发展。换句话说，落后的农村在这一种或是另一种情况下都将会强使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接受它自己的政治面貌。

为了避免这两种的情况，我们采取了人民委员会和国民议会的两院制，就是说，除联邦院以外，全国各地还选出生产者院，生产者院同联邦院有相等权能来解决一切经济、社会或是宪法性质的问题。生产者院由企业和农村中的直接生产者——工人、技术知识分子和农民等按照各经济部门对全国总收入所作贡献的大小按比例选出。因为工业、运输和贸易工人等在国民收入中的贡献要比农业的大得多，因而，他们要比个体农民在生产者院中有更多的代表。

这样就使得即便在不很发达的地区，工人阶级也能保证自己的领导的作用。正是这个组织能够使得这些地区的地方分权和民主化不致削弱社会力量。因而，生产者院在我们的制度当中是实现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没有生产者院，工人阶级的力量就不能在政府的地方分权制度中取得真正的反映，从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作用也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反映。

在现有的社会主义经验中，这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的；但其实，列宁在第一部苏维埃宪法里就已经采用过（虽然用法不同），那部宪法中也规定工人代表比农民代表要多。

## 五

由于这一切，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組織系統中也發生了若干变化。誠然，生产的原則依旧是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导的組織原則。但是这个原則通常只在生产和經濟部門中采用，此外，只有在一些国家机关中还采用，如果这些机关和作为政权工具而同国家的职能有密切关系、它們需要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負起特別的责任、并且为了預先防止可能發生的偏差而需要最直接的政治監督。在其他机构和国家机关里取消了以前所有的党組織，把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分派到按地区原則建立起来的基層組織中去工作。

这个措施的目的旨在把国家机构从联盟机构中“解脫”出来，使它注意社会領導机关的工作，它根据法律和宪法对这些机关負責；另一方面，联盟机构的任务是在群众及其代表机关和組織中进行工作。这有两方面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官僚主义病根的斬除和共产主义者联盟在群众中的政治地位的巩固，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人民代表机关的作用，保證这些机关对国家执行机构的工作有充分的監督。

这当然不是說，共产主义者联盟放弃了在沒有基層联盟組織的机构、社会管理机关或社会服务机关里的工作。在这些地方，在分析經驗之后証明共产主义者联盟必須加以直接的思想干涉的时候，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活动就更加發展起来。其方式多半是建立常設或临时的联盟盟員積極分子小組。共产主义者联盟領導机关的各种联盟的會議和全体會議也具有这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指导和糾正的作用。这些會議通常不拟定詳細的決議，而是討論社会發展的主要趋势和問題，对成就、經驗和失敗作出估价，指出不良的現象和危險的偏向，从而帮助共产主义者在

社会机构和組織中进行独立的实际工作时找到正确的方向。

共产主义者联盟这样的工作方法，影响了它的組織机构。旧的由职业指导员組成的机构在新的条件下已經不适合于活躍的实际生活。于是对它作了大大的縮減。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政治上的考虑，进行政治監督和执行联盟机关的某些具体決議；而比以前有了更大作用的是每个工作部門的各种各样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直接在相应的社会組織和机关里工作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以及和委员会联系的各种积极分子小组。

但是这里必須指出一点：大多数在群众中做实际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委员会列入“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領導系統中，而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范圍內——和做組織政治工作的書記处并排，書記处主要是解决具体的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和进行共产主义者联盟組織的日常工作——只有一些研究具有原則性政治意义的問題的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保証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在日常工作中的政治思想統一。此外，还設立干部委员会来研究社会生活各部門干部的培养政策問題。

当然，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机构之間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合作，更精确地說就是：在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統一的政治机构里分配工作，这样我們就能完成形式上極其复杂的各項工作。

\* \* \*

当然，不应当特別強調說：我們在工作中碰到許多困难，我們犯了錯誤，遭受挫折，在發現个别形式表示軟弱或为时过早的时候不得不經常予以修正。在这里只有实践才能予以最后的断定和校正。但是，如果就整个來說，机构的改組使我們無論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巩固方面，或者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發揮劳动人民物質的和經濟的主动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



成果。

我所談到的各种形式当然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發展的特殊条件的产物。因此我們决不是說这些形式对一切国家都适合。虽然社会主义在其社会內容上是統一的，但它的發展道路和形式是極其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在由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里。在这一意义上，每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从自己的具体条件出發的国家，正如列宁所說，应当在社会主义經驗的总宝庫中放入某些新的、特有的东西。我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認為，如果我們不是在我国条件下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說，如果不是力求用自己的实践和理論来帮助社会主义思想普遍的推进和社会主义發展形式的丰富，那么我們就不配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偉大思想的体现者。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們認為也必須研究和运用其他国家的，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經驗。

于貝尔格萊德

## 談談改善共產主義者聯盟 盟員成分的幾個問題

(原載“共產主義者”雜誌 1956 年第 7、8 期)

穆希丁·貝吉奇

依照章程調整盟員的數量，接受新盟員以及開除不能留在聯盟中的盟員，這種做法具有巨大的意義和深刻的政治思想性。這些原則的實際運用包括採取一切措施來促進聯盟組織一貫的革命進展，促進它內部思想上的團結一致，加強戰鬥準備並且提高共產主義者在日常工作上的政治影響。組織的成員以及他們對社會上最進步力量團結的程度對組織的發展以及對聯盟在思想和業務上的統一都具有巨大的意義。

這些問題都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大會以及各共和國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不久前舉行的全體大會上又談到了。由這可以看出聯盟組織在積極努力本著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的精神鞏固和加強自己的隊伍，清洗組織中的一些破壞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基本章程的不良的成員，採取了擴大聯盟隊伍更正確的方針，把最覺悟、政治上最積極的工人接受入盟，加強共產主義者的思想工作等等，所有這些措施加強了聯盟的許多基層組織，並且大大提高了共產主義者在社會生活中的政治作用。

例如，1956 年這一年，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在接納新盟員方面基本上是以青年為對象的。這不用說，是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在六中全會以後加強工作和對於在青年當中進行工作的問題表現極大注意的結果。例如，在波斯尼亞—黑塞

哥維納，1956年被接受到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總人數當中，年齡在25歲以下的青年占73%，在塞爾維亞占65%。其他共和國的許多地區的情況也大致相同。這件事實使得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領導機構有必要更好地研究和組織對年輕的共產主義者的系統的思想工作。

大部分組織都很重視接收婦女加入共產主義者聯盟的問題。在某些地區，在1956年上半年被接受入盟的婦女比1955年全年接受入盟的人數還要多。比如，1956年，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被接受入盟的婦女有443名，即占11%。而在1955年全年被接受入盟的總人數中，只有232名婦女，即占8.6%。馬其頓的情況也是這樣。

但是，六中全會也指出了各級組織在共產主義者聯盟盟員數額變動方面所長期所存在的某些消極趨向。儘管由於我國在民主陣營和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在國內方面——由於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穩定和進一步加強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的光輝前景而形成的政治條件，儘管這些條件近幾年來已經好得多了，然而在1956年年初以前，聯盟盟員人數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同時，由於國家經濟的發展，工人階級人數大大增加，它的社會政治作用也大大加強。遺憾的是，這種巨大的變化，並沒有迅速和充分地改善聯盟盟員社會成份方面得到反映。

到目前為止，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對隨着社會主義新社會生長的年輕一代的依靠是不夠的，雖然它是新幹部的無窮盡泉源。除農村外，還有一定數目的工業企業中，婦女勞動力是占大多數的。遺憾的是，在這些企業中同在農村里一樣，到目前為止，在談到接收婦女加入共產主義者聯盟的問題的時候，還用落后的歧視對待婦女。

关于联盟的成份和人数变动的材料说明，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之前，盟员人数增加了，1952年7月，盟员人数达到最高的数额，而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主义者的数目减少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数额只有在这一年才增加。各共和国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情况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是这样的。

下面两个表说明联盟盟员数额的变化。

表一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员人数

1948年7月1日	1952年7月1日	1955年12月31日	1956年7月1日
468,175	779,382	624,806	635,984

表二

从1949年到1952年		从1953年到1955年		从1956年1月到7月	
接收	开除	接收	开除	接收	开除
416,031	107,028	70,648	162,827	25,689	13,414

1952年以后盟员人数的减少是用行政方式管理时期里发展联盟的特点的后果，是一些组织为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加强而本着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各次全会的决议的精神所采取的那些措施的后果。1952年以前组织的扩大，以及后来到1956年初为止盟员人数的减少也是没有步骤地经常是成批吸收新盟员和大批开除不配处身于共产主义者联盟队伍里的分子的结果。例如，1949年到1952年这段期间吸收了416,031名盟员，那么从1953年起到1955年这一期间只吸收了70,648名盟员。同时在1949年到1952年为止有107,028人被开除出联盟，而在1952年以后就有162,827人被开除出去。从1953年到1955年受各种处分的共有49,147人。因此，如果拿平均数来说，每一



个基層組織在 1951 年平均吸收盟員总数的 3.5 %，开除 0.9 %，然而在 1953 年吸收进的盟員占 0.9 %，开除出联盟的占 2.5 %。

在今年，被吸收进来的盟員人数逐漸增加了，吸收进的和开除出去的人数之間的对比是比較均等的（在今年头六個月內吸收进的盟員有 25,689 人，而开除出联盟的有 13,414 人）。当分析有关 1956 年內吸收的材料的时候，可以下結論的是，个别組織依然沒有摆脱成批吸收新盟員的做法。

在很多組織中都感到，不能要思想上与联盟沒有联系的盟員。城市和农村的組織已經开除了一些异己分子，这样做是对的；在将来也还必需坚决清除他們。但是也很难認為許多組織的这种做法是恰当的；它們在最近一段時間內只管“清洗”，以致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連一个新盟員也沒接收。在斯洛文尼亚 88 个各拥有 500 名以上工人和職員的企業中，在两年（1954 年和 1955 年）中接受了 263 个工人和职工加入共产主义者联盟，但被开除的却有 960 名。在 29 个企業（其中有的有工人 1,000 名以上的企業）中，在两年中一个新盟員也沒有接收。

不用說，曹歇氮气工厂的联盟基層組織是一個人也沒有接受入盟的，因为，在 13 个月中，那里沒有举行过一次集会。“科托尔公社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个别組織 5 年来沒有接收一个新盟員，鉄托格勒的“馬尔科·拉多維奇”工厂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組織也是在两年內沒有接收一个新盟員，虽然这个工厂的員工都是青年工人，他們的不均年齡是 22 岁，这种情况除了关门主义和政治幼稚外，是不能用其他东西来解釋的。在 1955 年沒有接受一个盟員的基層組織有 485 个，即等于共和国基層組織总数的 48 %。（根据門的内哥罗共产主义者联盟三中全会的报告）。

只有这一点才能說明为什么年齡在 25 岁以下的盟員在联盟中是比較少的。在拥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經驗，千百万劳动人

民的積極性普遍高漲的年代中，接受入盟的人數很少，开除的人數很多，這是決不符合社會發展、社會主義意識提高和共產主義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不斷增長的情況的。

我們聯盟的革命鬥爭經驗証實，聯盟的隊伍在思想和組織上的團結也同政治上的戰鬥力一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成員，特別是聯盟內的工人。然而，這種方針，在許多組織的實際活動中沒有得到明顯的表現。可以說，儘管近幾年來取得了進步，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樹立正確的看法，聯盟組織對於首先吸收工人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勞動努力和在社會主義信仰上立場堅定，並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那些勞動人民加入自己的隊伍這件事是表現得不够關心，也不够努力的。

這些材料說明了最近幾年以來聯盟社會成分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整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工人的百分比增加了，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以及克羅地亞，共產主義者聯盟組織里的工人人數的增長是比較大的，然而在斯羅文尼亞，工人人數却顯著地下降（從 58.09% 降到 40.48%）。職員人數不斷的增加也值得注意。同時也可以看出聯盟中農民人數的下降。

從南斯拉夫全國範圍來看，這種社會成分的比例沒有真實地反映出全國所發生的社會變化，也沒有反映出各部分居民在我們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按照各共和國社會成分結構中顯著的差異是由客觀的歷史條件和各共和國生產力發展的程度決定的。但是上面所指出的材料說明，這些在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組織建設中的原則性問題一直是在自發地解決的。

對各區和各別組織的聯盟社會成分作更加詳細的分析就可以更加明顯地証實這一點。例如，有 39 個區，工人占聯盟成員中最大的比例，有 12 個區的聯盟成員中農民人數最多，而其餘 51

表三 1948—1956年联盟盟員社会成份材料比較表

	社 会 成 份 (按百分比計算)				
	工 人	职 員	农 民	其 他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1948.6	29.53	14.38	49.41	6.68
	1956.6	31.36	32.06	17.67	9.96
塞尔維亚共产主义者联盟	1948.6	25.45	14.43	51.69	8.42
	1956.6	31.00	33.90	23.90	11.20
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	1948.6	31.02	12.42	46.01	10.52
	1956.6	39.10	33.88	15.41	11.61
波斯尼亚—黑塞哥維納共产主义者联盟	1948.6	27.40	15.80	51.30	5.40
	1956.6	35.71	39.25	15.06	9.97
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	1948.6	58.09	22.90	9.80	9.28
	1956.6	40.48	39.42	4.82	15.27
馬其頓共产主义者联盟	1948.6	32.08	6.63	53.76	3.52
	1956.6	28.58	38.15	24.16	8.79
門的内哥罗共产主义者联盟	1948.6	12.63	9.72	71.02	6.63
	1956.6	24.91	31.87	32.19	11.03

个区职员人数最多。例如，在台头夫烟草站，职员在联盟中占二分之一，工人占八分之一，然而在“澤尼查”冶金联合厂里，职员占五分之一，工人占十四分之一（根据1955年年底的情况）。

下面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从1952年，即开始發生巨

大变化的时期以来吸收和开除的盟员的成分统计表，这个统计表更清楚地给我们解释和阐明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社会成分。

表四

年月	吸收入盟 的人数	社 会 成 分			开除的盟 员数目	社 会 成 分		
		工人 百分比	职员 百分比	农民 百分比		工人 百分比	职员 百分比	农民 百分比
1953	25,096	36.11	18.05	32.54	72,467	24.82	10.95	54.49
1954	20,666	35.03	20.12	28.05	56,179	26.85	12.67	50.44
1955 至6月	24,886	36.39	21.62	24.16	34,181	32.50	17.14	39.53
1956	25,689	32.73	20.21	23.20	13,414	32.49	19.72	36.86
总计	96,337	35.05	20.65	27.60	176,241	27.54	13.37	48.95

这里有一点是好的，那就是最近三年半，在加入联盟的人当中，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但是，这对改善总的社会成分并不能起重要的影响，因为许多工人和农民被开除出盟了。在被开除的人中，农民所占的百分比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农村地区联盟组织中的人数急剧地减少了。在许多农村组织中农民生产者迄今为数不多，而在一部分农村组织中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除了有相当一部分盟员积极分子流入了城市，转入了工业企业以外，在某些农村组织中，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盟员人数很少，这一点是许多思想上的缺点、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社会上的消极情绪和其他有害的现象产生的根源。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盟员成分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妇女盟员非常少。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强调指出，“盟内的女盟员人数仍旧不多——如工人妇女和农民妇女”，然而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一次指出了“联盟中的妇女人数仍旧很少，因此各级联



盟組織必須在明年消除对妇女的这种关门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不民主的态度。”

現在可以断定，在大部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組織里，妇女人数同过去一样仍旧沒有增加，而在許多組織里还大大减少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妇女盟員人数从 1948 年占总数的 19.99% 减少到 1956 年 6 月的 16.88%。

表五 各个共和国的情况(百分比)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妇女所占的百分比	塞爾維亞	克羅地亞	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	斯洛文尼亞	馬其頓	門的內哥羅
1948年12月31日	20.14	23.90	17.90	31.53	14.03	20.27
1956年6月30日	17.51	21.96	14.70	28.72	11.33	17.11

自然可以意料得到的，就是在今后几年中，联盟中的妇女人数应当增加。大家都知道，随着許多大企业(这里大多数是女工的)投入生产，从事国家經濟工作的妇女人数也增加了。同时还可以看出社会积极性不断的高漲，而在这种积极性方面，妇女占有越来越显著的地位。这一切对于吸收最积极的、最有觉悟的女工和其他部門的劳动妇女来扩充联盟的队伍，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可能。

非常遺憾，但事实終归是事实，直到今天我們还不能輕易地摆脫掉在我們之間札了根的对妇女的关门主义态度。在农村里，对妇女的关门主义态度更为厉害，更为典型。指出一点就够了，在許多农業社里根本沒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女盟員。即便是有，也不过一、二名而已。这个事实表明，这种过去遗留下来的陈腐的概念在我們之間是多么根深蒂固，需要做多

少努力才能擺脫掉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在發展組織中的這種舊時代的殘余。

蘭科維奇同志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六中全會的報告中講道：“我們經常重犯某些錯誤。毫無疑問，這種情況是由十分有害的實踐造成的。但是，在對工作、對人和對解決人所感興趣的問題的那種輕率態度沒消滅之前，這種實踐是不會消除的。”大家知道，最近幾年，我們在接收新盟員、鑒定工作和通過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盟員的處分決定方面出現了相當輕率的和不負責的態度。

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反對官僚主義蛻化和官僚主義工作方法的鬥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三中全會徹底地揭露了取消派的企圖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路綫上的機會主義傾向，这样就根本地粉碎了那種想破壞作為共產主義者聯盟基礎的組織原則的企圖。但是，不能忽視，這樣的或其他性質的現象在個別組織的生活和工作中仍然出現。今後仍然應當以最堅決的形式反對這些現象。

在對不守紀律和紀律性差的盟員採取措施的問題上，許多組織注意不夠，堅持性也是不夠。近幾年來開除出盟的人數比受其他處分的盟員人數還要多得多。而且被開除出盟的大多數盟員是因為“不守紀律”和“消極”(1955年約占68.08%)。這說明了所採取的感化措施具有片面性，實質上意味着，在克服盟內缺點方面，我們所走的是阻力最小的路綫。許多組織把聯盟盟員的紀律性和積極性僅僅理解成為按時到會、交納盟費以及在會上發言等。自然，這些因素是必須考慮的；但是在聯盟的政治和組織工作中，這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特別是在現在，當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利益把共產主義者爭取一往直前的社會主義發展的奮鬥擺到第一位的時候。紀律性和積極性首先應當是為

了解决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总路綫的基本任务，在衡量共产主义者的积极性的时候，应当看他们为实现这些任务而作的努力的程度，看他们在集体中的政治影响等。

目前感到十分必要的是：在盟組織會議上討論的現象和問題应当根据原則性的观点，从比較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討論，以便使共产主义者能完全清楚这些問題的原因和性質。

对于加强組織具有重大意义的問題之一是：拟定对于联盟盟員的客观的要求。兰科維奇同志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着重指出，“許多組織衡量联盟盟員积极性的标准不是观点、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和对社会主义事業的热爱程度，而是看同志对工作的紀律性和个人的誠实。毫無疑問，这些因素是重要的，但是，这些并不能包括在联盟接受新盟員的时候所应当注意的一切特点。”

对于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的基本要求已在联盟的章程中明确規定。这些要求是根据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革命力量的性質和作用提出的。它們对于形成和發展作为徹底的革命者和無私的社会活动家的共产主义者的个性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目前大多数組織的情况表明了在接受新盟員或鑒定联盟中老盟員的工作的时候，規定和运用統一的标准和統一的客观的要求是極其必要的。要达到这点，必須更加正确地确定各生产部門中的組織和各地区（城市和乡村）的組織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在接受新盟員的时候和对老盟員采取教育措施的时候，必須估計到每一个人对实现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政策方面的观点、态度和真实的积极性。毫無疑問，这点需要做很大的努力，需要有很大的耐性，需要書記和各个書記处以及各組織的全体盟員

有經過周密考慮過的工作。

這点对乡村地区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組織來說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如果这一次又重复各种失敗——即在接受新盟員的時候犯突击毛病、缺乏警惕性和缺乏觀察，那么害处很大。組織的扩大和巩固应当成为对人民进行有系統和堅持不懈的政治教育工作的果实，成为提高社会主义覺悟和鼓勵他們在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关系方面的積極性的成果。現在在农業和合作化方面的政策正为社会主义农業生产發展以及为加强农村里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組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各公社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应当在規定接受新盟員入盟的統一标准方面，在貫徹改善联盟中的社会成分和扩大組織队伍的更徹底的方針方面起重大作用。尤其是在盟員人数不多的农村公社里，公社委员会应当注意到从政治上巩固农村組織的任务，并且給那些目前还没有成立組織的地方建立新組織創造条件。区委会的組織秘書处應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自己是委员会的机关，这个机关首要的义务是要經常注意联盟組織的生活，及时發現它們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好的經驗，深入研究各种現象的原因和實質，同时向委员会提出改进工作所必須的各种办法。

統計报表、报告、分析情况都應該有政治上的估价和結論，應該尽可能地对各組織的情况划出比較現實的圖景。

总而言之，区的或是公社的委员会必須更有系統地分析研究上述組織問題。他們應該使这些問題在組織政治工作系統中占有恰如其分的地位，使这些問題成为各組織和共产主义者經常关心的对象。



#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組 織書記处1956年12月8日扩大 會議決議(摘要)

(原載“共产主义者”杂志1956年11、12期)

1956年12月8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組織書記处扩大會議，会上就国际局势、經濟情况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的数量和成份問題討論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任务。

## 一

(一)匈牙利事件和埃及事件引起城乡劳动人民广大階層的極大注意，也引起了生动的政治活动。

在侵埃問題上表现出对侵略者的一致譴責，对埃及的支持和对于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信任。

关于匈牙利事件，最初存在过各种各样的看法和理解，存在过認識模糊和誤解。

在县委会書記會議(卡德尔同志在会上講了話)之后，特别是铁托同志在普拉的講話和其后所开展的生动的政治活动之后，对匈牙利事件清楚了，理解了該事件的原因，因此，一致拥护我們的立場。

特別應該指出，在这种局势下，青年表现了極大的兴趣，政治成熟性和战斗性；特别是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他們在这次又強調出自己屬於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驕傲。

各企業和工人集体的工人們一致支持并接受內外政策，同时也对生活水平方面的缺点和困难提出了建設性的批評。工人

們同时也对某些地方出現的敌对活动和顛复活动表现出其極大憤怒。

这些事件伴随着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組織的巨大政治活动。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联盟大多数县委会和許多政治工作者直接参加对局势进行解釋，直至基層組織和群众會議。在那些只由基層組織进行講解的地方就产生了缺点。但是，不能說，一切組織都同样地开展了生动的政治活动。落后农業地区的某些水平較低的組織对待这些事件的态度是迟緩而消極的。有一部份共产主义者对講解我們的立場采取了机会主义态度，消極态度，某些地方对敌对活动也持消極态度。

在譴責侵埃的問題上領導机构和基層組織立即毫不动摇地进行了政治活动，而在匈牙利事件上就沒有如此迅速的反应，这有些是因为事件本身的混乱，有些也因为沒有及时指出方向，对这种情况報紙上模糊不清的，非原則的言論也起了作用。

与国际問題方面的政治工作相联系地，必須指出：

(1) 中央應該通过更經常更充分地供給資料(書面的，經常的會議，研究会等)对县区委員会和基層組織給予更有組織更系統的帮助。特別是，報紙和杂志應該更多地討論迫切問題。

(2) 考虑到国际运动中發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对社会主义进一步發展的若干理論問題的广泛的公开討論，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內部必須开展更生动更有組織的思想教育工作以使盟員了解現代国际事件。

与这一工作相联系地，應該系統地出版适于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成員和社会主义联盟積極分子的材料。特別要注意进一步研究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問題。

(8) 在地方上开展系統的政治工作，特别是通过社会主义

聯盟，講解我們的外交政策，國際問題特別是社會主義發展問題。

(4) 在國際工人運動的迫切問題和我國國內經濟問題和其他問題方面，應首先注意知識分子，在共和國中心和其他大城市應經常舉行會議以通報和討論這些問題。中央委員會的思想委員會和社會主義聯盟的政治文教工作委員會在这一切問題上能給予極大的幫助。

(二) 鑒於最近兩三年國際局勢的緩和及我國國內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特別是職工生活水平的問題日益迫切。這在政治領導機構的決議中已反映出來。但是，最近兩三年以來，職工生活水平有某些下降，這必然引起對我國在這些問題上的經濟政策不了解並引起對這些問題的各种批評。在這些問題上，政治工作削弱了。有些時候，積極分子逃避在公開的會議上討論生活水平問題，特別是在工會，選民會議，共產主義者聯盟和社會主義聯盟等的會議上。

1956年11月6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擴大會議的決議指出，明年和今後數年內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是改善生活水平，首先是職工生活水平。同時也決定，通過國民議會的廣泛討論提出1957年和今後數年內社會計劃的基礎並通過這種討論澄清經濟政策方面的某些政治問題，以明確遠景並對這方面的任務採取明確態度。

在伏克曼諾維奇同志的報告中，聯邦國民議會的討論中，特別是卡德爾同志的發言中，解釋了這方面的許多政治問題，而且不久聯邦國民議會即將根據這一基礎通過1957年度的社會計劃，故此決定：

(1) 在11月6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的決議公布前，把該決議發給各縣委會。

(2) 出版一部小冊子，包括聯邦國民議會中所有發言人的

發言，关于 1957 年經濟政策的报告和議会決議。

(3) 通过一切政治社会团体，利用一切有关材料，就 1957 年和今后若干年的經濟政策問題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

(4) 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机构和各級組織要極其严肃地貫徹上述任务。为了能于負担这一工作，需要在领导机构的帮助下召开各級組織的单独會議討論这些問題并提出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的任务。

(5) 仅仅議会中的这种討論还不足以澄清政治問題并在經濟政策方面取得一致的观点，必須系統地解釋和討論这方面的各种問題。在这一基础上开展系統的政治工作以使我們在內部問題上也进一步加强团結。

(6) 除了将进行的經濟政策的改变之外，还必须通过政治工作动员一切因素来貫徹統一的經濟政策，特别是来解决生活水平問題，因为，在我国地方分权和民主制度中，許多問題也都有賴于自治机构和社会机构的活动和政策。

## 二

(一) 六中全会后，县区委员会对共产主义者联盟組織的發展給予了更大的注意。吸收了較多的新盟員，特别是工人、青年和妇女。农村組織的發展方面也获得了較好的成果。

但是，考虑到可能性——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影响，劳动群众的情緒和我国社会制度所提供的条件，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的数量仍嫌少。虽然取得了积极的結果，特别是在 1956 年，仍不能說在吸收那些應該吸收的人入盟方面获得了很重大的成就。

在七大的准备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关心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員的繼續增加，这一任务与不断地消除六中全会所指出的缺点是相联系的，而这些缺点在組織工作中还存在。



除少数例外，一切材料都說明吸收和开除一直还是不利于工人，因为，吸收工人的标准特別严格。甚至在某些較大的工業中心，情况也如此。对青年工人表现了極明显的宗派主义。

因此，县区委员会必須更严肃地帮助基層組織来克服对工人和青年的宗派主义。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領導机构和各級組織必須了解，青年組織和工会組織是共产主义者联盟新盟員的源泉。社会管理机构 and 为数众多的社会团体也是共产主义者联盟新盟員的源泉。

为更有效地解决扩大共产主义者联盟队伍的問題，更严肃地討論青年組織和工会組織对吸收新盟員的建議应作为县区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各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的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小組也应对吸收新盟員問題提出建議，以使社会生活中很多表現积极的人都被吸收到共产主义者联盟組織中来。为吸收新盟員，必須改善工作方法。因为，企業組織和区域組織不能研究和全面观察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积极活动的人們。

經常在公开會議上解决吸收新盟員問題也是重要的，因为，有別人出席有助于更好、更广泛地选择。

(二)在盟紀处分方面，情况也有所改善。但是仍一直存在着不正确的态度。仍有成批地、輕率地采取开除处分的情况。虽然，农民被开除的数量减少了，但是，他們在被开除者中仍然数量最多。企業組織比区域組織里开除的多。工人比其他許多人較容易被开除，因为对工人的标准几乎总是較严格的。

对开除原因的分析表明，70%被开除的原因是不出席會議和行动消極。但是，个别盟員的消極常常是組織情况的反映，是組織消極的反映。而且，对个人消極的看法也是形式的和片面的，常常只从會議上的一次表現来看。常常忘掉盟員的态度、行为和举止对周圍的極其强烈和积极的影响。

特別是农村，很多人被开除都是由于宗教信仰。但是，應該更多地考虑，是否都是真正的信仰，还是常常把次要的民間風俗当作不吸收入盟或随便开除的理由。

在通过处分決議时也有很多錯誤，不正确和表面性。在評價某些錯誤时，常常寻找多年前犯的錯誤，瑣碎地分析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圍繞着处分常常形成特殊气氛，这种气氛使受处分的人被孤立并使别人和他疏远，而使他情緒低落。某些例子指出，不关心并且随便地开除有十年以上党齡的盟員。

县委会表面地分析被开除的盟員的申訴。县委会，特别是区委会常常不查明事实就同意基層組織的意見。还不是各处都有完善的，十分正規的处分登記。因此，常常應該取消的处分延續了很長時間。所以，必須保證对被开除者和受处分的申訴进行更深刻更全面的研究，要較过去更深入了解个别情况，更关心人。区委会的組織書記处必須研究中訴書并提出建議，由县委会做出決定。共和国中央委員會的監察委員會也應該更多地关心这一問題，帮助并影响县区委員會和各級組織。

考虑到随便开除和最近几年来小題大作的現象，肯定地有很多人开除的不够合理。因此要提供一种可能性来糾正对不正确地被开除者的錯誤；在这一基础上一定会有一些被开除的人可以重新被吸收入盟，一部份人取消处分。應該重新审查县区委員會已有的申訴書，并根据它們做出決定，同时要考虑到过去随便开除的現象。特別是要重新研究过去被开除的盟員的当前活动和工作，決定誰能被重新吸收入盟，同时注意，大多数盟員被开除并不仅是由于本身的缺点和錯誤，而且也由于过于严格的标准由于其所屬的基層組織的弱点。

(三)就农村組織的情况，指出几个問題：相当多的农村沒有共产主义者聯盟的基層組織，很多組織只有很少的成員(2—3

人)；在吸收青年入盟的問題上，有抵触；这些組織中在开除盟員的問題上尤其存在有成批开除和極不正确的情況，以至使某些組織大大地被削弱了；某些农村被开除的盟員的数量有盟員总数的两倍。

因此，重新提出加强和扩大农村組織的必要。与农村的政治社会活动，特别是巩固合作社的活动的發展同时，必須注意扩大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問題，培养新盟員，特别是在發展农村和發展合作社工作中表現积极的青年中培养新盟員的問題。特別應該注意过去被开除出盟而今天在农村的社会政治活动中表現积极并可以被重新吸收入盟的人。

(四)考虑到系統地和經常地研究盟員数量和成份之必要，决定，共和国中央委员会除年度的統計資料和分析外，还要提供半年的統計資料和分析。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組織書記处要把它們通过的分析交中央委员会，县委会也应该把分析交給共和国中央委员会。

关于盟員数量的变化和成份的統計和登記制度应进一步發展并与需要相适应。已經有必要对知識分子中的盟員变化情况进行更詳細的觀察。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占比例最大的職員的数字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因为，常常把工人也算入職員里了。

决定将中央委员会和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統計和登記工作与組織書記处联系起来比之过去与干部委员会联系起来有好处。

(五)由于在服兵役期間很难吸收入盟，必須保証在征收入伍的人中間，凡够条件的，皆在入伍前吸收。

(六)鑒于过去决定中学八年級的学生可以被吸收入盟，决定，他們仍被吸收入区域組織，但是，学校里应建立基層組織以使他们繼續在青年組織中进行工作。

# 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社会組織和政治組織的基础与联邦 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根本法

(1953年1月13日)

为了使宪法制度适应在国内社会組織和政治組織的基础上所發生的变化，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議会茲制定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組織和政治組織的基础与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根本法

## 第一章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第一条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各主权民族的社会主义民主联邦国家。

第二条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劳动人民。劳动人民通过其所选的各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議会的代表、各工人委员会和其他自治团体的代表并直接通过选举、罢免、复决、选民會議、公民委员会、公民参加行政管理和审判以及通过其他自治方式行使权力，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条 人民委员会是劳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層机关，是市、县和区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只有联邦宪法所规定的那些职权属于联邦政府，只有各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那些职权属于各人民共和国政府。

第四条 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部門生产者的自治与市、县和区劳动人民的自治，构成全国社会組織和政治組織的基础。



保証劳动人民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各方面的自治。

生产者和劳动人民依照法律和劳动人民代表机关——各人民議會和各人民委员会的其他决定所载明的一般社会权益而行使自治权。

第五条 保証下列各項权利：

劳动人民为实际获得民主政治的、經濟的、社会的、科学的、文化的、艺术的、職業的、体育的及其他共同的权益而自由集会結社；

人身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与基本公民权；

劳动权。

第六条 經濟部門的生产者特別享有下列自治权：

劳动集体有直接和通过其所选出的和有权罢免的工人委员会、农業合作社会議及其他代表团体管理其經濟单位的权利；

生产者有被选为该經濟单位代表团体的代表的权利；經濟单位有独立确定其經濟計劃的权利；經濟单位在其完成对于社会公众集体的任务后有独立支配該单位的收入的权利，并且在这方面保証該經濟单位获得法律所規定的最低收益；經濟单位在其收入限度內有确定其工人工資的权利，并且在这方面根据法律以社会公众集体的基金保証經濟企業工人的最低工資；

生产者通过其在生产者院的代表有决定儲备以应社会需要的物質基金的数目和决定使用这项基金的权利。

生产者根据宪法和法律在經濟計劃的体制內行使自治权。

劳动集体根据建立經濟单位的法令获得自治权。

第七条 劳动人民在市、县和区特別享有下列自治权：

公民有选举和罢免其在区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市或县人民委员会的市參議會或县參議会的代表的权利，生产者有选举和罢免其在市或县人民委员会的生产者參議会的代表的权利；

公民和生产者有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代表的权利；

公民以复决权、选民会议、公民委员会、公民参加行政管理和审判的方式及其他自治方式有直接参加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利；

人民委员会依靠各经济单位、各协会和联合会以及公民的积极性在经济的、自治团体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生活方面与市、县和区的发展方面有独立管理有关公众集体一般权益事宜的权利。

人民委员会依照联邦和共和国的经济计划有自由处理经济单位所划归市、县和区的该经济单位收入部分的权利；人民委员会有支配法律所规定的一部分捐税的权利，并有制定各种地方附加税的权利；人民委员会有独立草拟和批准其经济计划和预算的权利；

人民委员会有法律所规定的关于其境内的经济单位的权利；人民委员会有监督社会财产的管理的权利；市、县和区人民委员会有管理一切不属于其他政府机关、经济单位、各协会和公众团体的土地和建筑物等社会财产的权利；

人民委员会有选举和罢免县法院和巡回法庭的法官的权利；

人民委员会有设立与选举其机关和任命本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权利；

人民委员会有以法令规定其内部组织和工作方针的权利；

人民委员会有维持市、县和区境内治安和秩序的权利。

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体制内行使国家权力。

第八条 各共和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有法律所规定的有关人民委员会方面的权利。

共和国的国家机关有监督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是否合法的

权利。

在各共和国的經濟計劃中只有法律所規定的那些財政經費划归各該人民共和国用以执行該人民共和国权限之內的职权，補助各市、县，以及補助对于全共和国具有一般利益的各协会和經濟单位。

只有根据法律規定才能在市、县和区内設立联邦或共和国的行政机关以执行联邦或共和国权限以內的职权。

第九条 联邦政府有下列职权和責任：

保护联邦国家的独立和領土完整；組織武装部队捍衛国家；維持社会和政治秩序；

保障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团結和权利的平等；

保持和調整国际关系；

保證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和法律制度在本質上的一致；

保證經濟制度和国民經濟有計劃的全面發展在本質上的一致；

保證經濟部門中生产者的自治权和市、县、区及各社会团体中劳动人民的自治权；

保證公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保證公民不分国籍、种族和宗教信仰享有平等权利；

保證联邦法律的合法性和統一的施行以及司法制度在本質上的一致。

联邦的各国家权力机关依宪法对其所規定的权限各自行使联邦政府的职权。

联邦法律由各人民委员会或各共和国的国家权力机关直接执行。

只有在宪法所規定的专属于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內以及在与联邦制度所規定的职权相符合下依法将行政职权划归联邦政

府时，联邦机关才直接执行联邦法律和其他行政职权。

**第十条**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由各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组成，并构成一个在国家、经济 and 关税上统一的领土。

商品在全国各地一律自由售卖，各共和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或各人民委员会都不得以任何法令予以限制。

某一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关在行政和司法方面所制定的法令和文件在其他共和国具有同等的效力。

**第十一条** 联邦法律和联邦国家机关的其他法令适用于联邦的全部领土内。

联邦法律和某一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相抵触时直接适用联邦法律。但该人民共和国可以提出确认联邦法律和有关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何者符合联邦宪法的诉讼。

**第十二条**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具有统一的联邦公民资格。

各人民共和国的每个公民同时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某一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其他人民共和国享有该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同样权利。

## 第二章 联邦国家权力机关

### 第一节 联邦国民议会

#### 第一项 联邦国民议会的职权

**第十三条** 联邦国民议会是人民主权的代表，是联邦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

联邦国民议会根据宪法并在宪法的体制内行使其职权。



第十四条 联邦国民議會直接并通过共和国总统和作为其执行机关的联邦执行委员会行使联邦的职权。联邦行政机关按照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指令并在它的监督下处理指定的执行事宜。

联邦最高法院及其他联邦法院根据联邦法律行使联邦政府在司法方面的职权。

第十五条 联邦国民議會行使下列专屬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选举和罢免共和国总统；

三、选举和罢免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

四、选举和罢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五、制定联邦法律：

1. 制定行政法：关于人身自由及其他基本人权与基本公民权，关于联邦公民资格，关于公民身份，关于社会安全，关于民事，关于版权，关于专利、商标、样品和模型，关于规定各种社会捐献和捐税，关于关税，关于货币、信贷制度、银行和财政制度，关于外汇，关于公债，关于匯票、支票和其他支付憑証，关于海事，关于保险，关于度量衡，关于规格，关于刑事，关于司法程序和一般行政手續，关于行政上的爭議，关于刑罰和保安措施的执行，关于仲裁法庭組織，关于公訴，关于律师，关于殘廢軍人，关于国防、对外关系及其他屬於联邦政府专責範圍內的問題，关于联邦人民議會人民代表的选举和罢免等法律；

2. 制定基本法：关于国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关于經濟单位，关于交通、公路和公用财产，关于預算、社会捐献和各种捐税，关于天然资源的使用，关于劳动，关于結社、集会和契約，关于家庭、婚姻和监护权，关于消灭傳染病、維護公共衛生、保护公民生命等对全国具有一般利益的措施，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員，

关于公設辯护人职责,关于违法行为等法律;

3. 制定一般法:关于国家权力、教育、文化、公共衛生等机构和社会政策及其他有关各人民共和国一般利益的法律;

六、批准联邦經濟計劃和联邦預算;批准联邦經濟計劃的執行報告和批准联邦財政決算書;

七、決定外交政策方針和經濟政策方針,決定其他屬於联邦政府职权範圍內有关內政政策的基本問題和措施;

八、宣布战争状态和決定和平問題;批准国际間政治或軍事合作協定,批准需要制定新法律或修改現行法律的国际協定;

九、批准人民共和国間互相同意而提出的边界綫的變更,決定有关領土變更的爭執;

十、审查共和国宪法、共和国法律、联邦法律是否合于联邦宪法;

十一、赦免联邦法律所列举的罪行。

联邦人民議會發表关于联邦政府权限範圍內的問題和其他涉及联邦国家一般权益的問題的声明和決議。

联邦人民議會对于国家机关、自治机构和經濟单位的工作提出建議。

第十六条 在專屬联邦的法律方面,各人民共和国仅在联邦法律特別授权的限度內,可以制定法律。

一項联邦基本法制定后,人民共和国在該方面可以制定其补充法律。

規定与人民共和国立法原則有关的一般法,只在該人民共和国在这方面并無法律存在时才可以直接适用。該人民共和国可依照該項一般法的原则制定法律。

在其他方面,人民共和国可以独立制定其法律。

在相应的联邦法方面的联邦基本法和一般法尙未制定以

前，各人民共和国可以独立制定其法律。相应的联邦基本法制定后，該人民共和国有关該基本法所已經規定的各項問題的法律条文即失去效力。

联邦执行委员会、联邦最高法院、人民共和国国民議会和执行委员会、自治省和自治区的代表机关、县或市的人民委员会以及有权益关系的經濟单位和自治机关均可向联邦人民議会提出审查共和国和联邦法律是否合于联邦宪法的提案。

**第十七条** 联邦社会计划保証国民經濟的全面發展，并規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收入的基本分配。

联邦經濟计划仅把依法所列举的和在联邦政府职权內用以管理事务的那些財政經費划归联邦政府，借以保証經濟的正常發展和補助国内發展較差的地区。

联邦預算对于联邦政府在其职权范圍內的事务管理費用及其各种机关工作所需的財政經費予以确定并分配。

**第十八条** 联邦国民議会可以决定将法律草案——不論在通过以前或通过以后——或任何其他屬于联邦政府权限以內的問題提交选民會議予以表决(复决)。

复决可以由議会的某一議院五分之一代表或由民族院、联邦执行委员会提出。

选民會議的决定即为有效。在复决完成后两年期間，不得通过任何与选民會議的决定相抵触的法律或其他法令。

有关复决的法律将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联邦法律以各人民共和国所用的文字制定和公布。

联邦法律在“官方公报”上公布，如此項法律本身無其他規定时，公布后八天即行生效。

**第二十条** 一切法律，除經明文規定外，不得追溯既往。

关于处刑的法律，只有规定对于犯法者所处罚应比按其他情况处理从轻时，才能追溯既往。

第二十一条 联邦国民议会每四年选举一次。

议会在战争或其他紧急情况下可以延长其任期至该情况不存在为止。

议会在其任期未滿以前可以自行决定解散。

第二十二条 下届联邦人民议会的选举必須在本届议会任期的最后一天以前宣布举行。如果本届议会的任期已經延长，則必須在引起任期延长的情况停止發展时立即宣布进行选举。

从联邦国民议会解散至举行选举的期間不得少于两个月。但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二十三条 修改宪法的議案由不少于 20 名的議院代表提出，或由民族院、联邦执行委员会提出。

议会先在各議院中采用多数票表决应否审議修改宪法的議案。

修改宪法的議案若在各議院中获得五分之三的代表投票贊成即告成立。

## 第二項 联邦国民议会的組織

### 第一目 議院

第二十四条 联邦国民议会由联邦院和生产者院两院組成。

第二十五条 联邦院由县和市的公民以普遍、平等、直接选举方式选出的人民代表与各共和国议会的各共和国院、自治省议会的省参议会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区参议会从其成員中选出的人民代表組成。

生产者院由从事生产、运输和商业的生产者按各經濟部門



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而选出的人民代表組成。

第二十六条 县和市的公民按每六万人选举一人的比例选举联邦院的代表。

第二十七条 各人民共和国的共和国院各选十名代表，自治省的省参議會选举六名代表，自治区的区参議會选举四名代表。

在联邦国民議會任期内，如果某一人民共和国、自治省或自治区的代表机关进行改选，则新选出的代表机关将举行新的选举改选出席联邦院的代表。

第二十八条 代表各经济单位的生产者院的人民代表由经济企业的职工、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以及手工业工人行会的手工业工人选出。

生产者按每七万人选举一人的比例选举生产者院的代表。

第二十九条 生产者院的代表由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生产者，在各类生产单位中以选举代表的方式选出。

工业类中包括从事工业、采矿业、林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旅店饭馆业和从事公众事业活动的工人和职员。

农业类中包括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和农业企业的工人和职员。

手工业类中包括各行业雇佣的男女工人。

享有一般选举权的生产者有权选举出席生产者院的代表。

各类生产者所选出席生产者院的代表名额按执行中的联邦经济计划所规定该单位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分配。

在各类生产人口的范围内，按照一定数目的生产人口选举一人的标准选出代表。

**第三十条** 凡享有一般选举权的市和县的公民都可以被选为联邦院的代表。

凡享有一般选举权并且属于产生代表的各类生产单位的生产者都可以被选为生产者院的代表。生产者被选为工会组织的工作人员时，仍享有被选为生产者院代表的权利。

生产者院代表脱离生产工作或脱离其所代表的生产单位时即失去其代表资格。

**第三十一条** 对于县或市所选出的人民代表授与其所当选的县或市人民委员会所属县或市参议会的委员的权利。

对于当选为生产者院的人民代表授与其所当选的县或市人民委员会所属的生产者参议会委员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 选民有权罢免其所选的人民代表。

**第三十三条** 人民代表的选举和罢免以秘密投票方式举行。

**第三十四条** 联邦院和生产者院行使下列同等的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批准联邦经济计划和联邦预算；批准联邦经济计划的执行报告，批准联邦预算的执行决算书；

三、制定联邦法律：关于货币、信贷制度、银行和财政制度，关于社会安全，关于民事，关于专利、商标、样品和模型，关于各种社会捐献和捐税，关于关税，关于外汇，关于汇票、支票及其他支付凭证，关于保险，关于规格，关于选举和罢免人民代表等法律；

四、制定基本法：关于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关于经济单位，关于交通，关于预算，关于社会捐献和各种捐税，关于开发天然资源，关于劳动等法律；

五、批准关于经济、劳动和社会安全的国际条约；

六、决定各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否符合联邦宪法，并决定共和国的法律和两院已经通过的联邦法律是否符合联邦宪法；

七、对于经济部门和社会保安部门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复决；

八、决定本届议会任期的延长，确定引起议会任期延长的情况是否已经不存在，并决定议会的解散；

九、确定人民代表、联邦人民议会主席、副主席和秘书及共和国总统、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待遇；

十、发表有关经济、劳动和社会治安方面问题的声明和决议。

第三十五条 联邦院和生产者院各自分别举行会议。

两院同样具有通过某一类法律的职权时，议案向任何一院提出均可。

两院可以决定召开联席会议对特殊的议案或其他需要两院参加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但议案的表决仍需在两院各自举行的会议上进行。

第三十六条 联邦人民议会在两院联席会议上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和罢免共和国总统；

二、选举和罢免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

三、选举和罢免联邦国民议会议长、副议长和秘书；

四、选举和罢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五、选举和罢免议会所属各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的委员；

六、宣布修改宪法。

第三十七条 属于联邦人民议会而两院并没有同等权利作出决定或联合作出决定又或生产者院不能单独作出决定的一切事项统由联邦院单独处理。

生产者院的人民代表对于联邦院单独批准的法律有提出修

改的权利，对于联邦院已經单独制定的現行法律亦有提出修改意見的权利。

第三十八条 两院具有同等权利而参加制定的法案或法令，其文件一經两院通过，即告成立。

任何一院对其他一院所已經通过的法案或法令有权提出修改。該草案經此修正后，發回原通过該法案或法令的一院重行审議。

两院对于法案內容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时，两院应任命人数相同的代表組成联合专门委员会以取得一致意見。

該联合专门委员会如果不能以各院代表多数同意达成協議，或两院不同意該专门委员会所提出的法案內容时，則爭辯中的問題可以推延七天討論。

七天期滿后，所不能达成協議的問題应在两院的會議上重行討論，如果在連續两次辯論后仍不能达成協議时，联邦人民議會即行解散并进行选举新的議會。

第三十九条 两院有关职权范围的糾紛应由联邦人民議會的两院联席會議解决。

第四十条 生产者院可以向經濟单位就其工作提出建議，并对政府机关和自治机关就有关經濟、劳动和社会治安方面問題提出建議。

生产者院在法律規定的职权范围内得就經濟单位、政府机关和自治机关的工作方面作出決定。

第四十一条 两院各自決定其代表資格的审查。

第四十二条 两院中任何一院可以在本屆會議任期未滿之前決定解散。但作出这样決定的一院必須在新的議院选出之前繼續执行任务。新选出的議院仍随本屆會議任期屆滿而解散。

第四十三条 两院各自決定其會議程序，两院共同決定代



表联席會議的程序。

第二目 各人民共和國、自治省、自治區的代表  
機關所選人民代表的特別權利

第四十四條 聯邦院在進行工作上作為一個整體，但各人民共和國、自治省、自治區的代表機關所選人民代表享有本法所規定的特別權利。

第四十五條 聯邦院的議程包括有關修改憲法或聯邦經濟計劃的提案時，各人民共和國、自治省和自治區的代表機關所選的聯邦院代表組成民族院，另外作出決定。

第四十六條 聯邦院的議程包括有關憲法所規定的某些人民共和國和聯邦政府之間關係的議案或其他提案而某一人民共和國代表機關所選出的代表多數提議單獨考慮此問題時，民族院亦另外作出決定。

民族院預先討論並決定是否另外作出決定。

第四十七條 聯邦院所通過的法案或其他法令的內容如果與民族院所通過的內容不一致時，組成民族院的代表即另外舉行會議重新討論意見分歧的問題，然後再將該問題提交聯邦院會議討論。倘就該內容再不能達成協議時，則從民族院的人民代表以外的聯邦院人民代表中和屬於民族院的人民代表中各自分別選出數目相同的代表組成專門委員會進行討論。

民族院如果堅持與聯邦院所通過的不同的意見時，對於該項法案或其他有關提案即暫時停止繼續討論，所爭論的問題從停止討論時起為期一年以內不得列於議會的議程中。

民族院在聯邦經濟計劃的條款方面與聯邦院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時，該計劃的討論可以推延兩月。在此時期仍不能達成協議時，聯邦院即行解散。

新的联邦院未选出以前，生产者院所通过的經濟计划应予执行。

第四十八条 关于联邦法律的議案列入联邦国民議会議程以前，民族院单独举行會議提出对于有否必要通过該項联邦一般法的意見。

民族院不同意有必要制定某項联邦一般法时，該項議案即不能列入議会的議程。

第四十九条 联邦院的程序規章內也包括关于民族院工作的条款。此項条款經民族院在单独會議上通过即为有效。

### 第三目 联邦国民議会議長、各議院主席

第五十条 联邦国民議会就其人民代表中选举議会議長、两名或两名以上副議長和一名秘書。

議長、副議長和秘書的任期与該届議会的任期相同，但在議會解散后議長、副議長和秘書仍繼續执行任务至新的議長、副議長和秘書选出时止。

議會議长代表議會，与共和国总统共同签署关于公布法律的法令，主持两院联席會議，監督議會程序規章的执行和議會及所屬各院決議的实行。

議會副議長在議長不能执行其議長任务时代理議長的工作。

議會議长或副議長主持會議时可以不参加討論或表决。

議會秘書負責議会的行政工作。

联邦院和生产者院各就其人民代表中分別选举主席、副主席各一名和記錄秘書三名；任期一年。

民族院就其人民代表中选举每届會議的主席、主席助理和記錄秘書各一名。

議院主席主持議院會議，監督議會程序規章的執行。

議院主席或副主席主持會議時可以不參加討論或表決。

### 第三項 人民代表的權利、義務

第五十二條 人民代表有權向其所屬的議院提出作為決定、建議、聲明和決議的法案和建議。人民代表有權在聯邦國民議會有權通過的範圍內向兩院聯席會議提出作為決定、建議、聲明和決議的建議。

不兼任各委員會委員的人民代表有權參加其所屬議院各委員會的工作，但無表決權。

第五十三條 人民代表有權向聯邦執行委員會提出質詢，聯邦執行委員會在議院會議上或兩院聯席會議上或以書面向質詢者答复所提的問題。

提出質詢的人民代表有權建議議院或議會對其所提問題展開討論。

人民代表有權通過其所屬議院請求任一國務秘書長供給情報。除非議院或議會決定該國務秘書長應親自在議院會議上或議會會議上答复外，該國務秘書長有責以書面供給所需的情報。

第五十四條 縣或市所選的聯邦院人民代表有責直接或通過該人民代表有權充任委員的縣或市人民委員會的縣或市參議會向選民報告其工作和聯邦院與議會的工作。

各人民共和國、自治省和自治區的代表機關所選的聯邦院人民代表有責向選舉該代表的代表機關報告其工作和聯邦院與議會的工作。

人民代表有權充任委員的縣或市人民委員會的縣或市參議會的建議或意見引起是否屬於聯邦院或議會的職權範圍的問題時，該參議會有權要求該人民代表提請聯邦院或議會考慮其建

議或意見。該人民代表有責提出該項建議或意見。

第五十五條 聯邦生產者院的人民代表有責直接或通過該代表有權充任委員的地方生產者參議會向其選舉者報告其工作和生產者院與聯邦議會的工作。

聯邦生產者院的人民代表有權充任委員的生產者參議會的建議或意見引起是否屬於聯邦生產者院或聯邦議會的權限問題時，該參議會可以要求其人民代表提請聯邦生產者院或聯邦議會考慮其建議或意見。

第五十六條 聯邦院的人民代表按月享有固定薪金。

生產者院的人民代表無報酬地執行任務，對於其執行代表任務所需的費用有權報銷，對於其執行代表任務時在收入方面所受的損失得予補償。

第五十七條 對於人民代表，不得因其其在議會發表意見或投票而予以指責、逮捕或處刑。人民代表除所犯罪行應處以五年以上或更重的徒刑外，未得人民代表所屬議院的批准，不受逮捕和審判。在人民代表所犯罪行應處以五年以上或更重的徒刑時，逮捕或審判該人民代表的國家機關必須立即通知聯邦人民議會議長，聯邦人民議會議長將該項通知提交有關議院以決定該審判應否繼續進行或該逮捕應否繼續執行。

議院休會期間，對於人民代表的逮捕、傳訊、或繼續審判的批准由有關議院的任免權委員會核辦並須經該議院事後追認。

第五十八條 人民代表不得兼任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或法官。

#### 第四項 代表會議

第五十九條 聯邦國民議會在當選的任期中舉行常會，



通过各議院单独举行的會議、两院代表联席會議、各常設委员会和其他专门委员会进行工作。

新选出的議會最迟在选举后的第三十天举行會議。

第六十条 各議院的會議由联邦国民議會議长根据該議院的決定或根据該議院主席、某一委员会、該議院五分之一人民代表、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建議或由議長个人动議又或根据本法的規定召集。

两院联席會議由联邦国民議會議长根据議會的決定或根据某一議院、某一委员会、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建議又或由議長个人动議又或根据本法的規定召集。

議會議长如果按規定或建議应予召集而不召集會議时，議會或其議院在二十名人民代表的要求或联邦执行委员会的要求下即可举行會議。

第六十一条 議會各議院在其有大多数人民代表出席的會議上，經出席的代表多数投票贊成即可作出有效的決議。

联邦国民議會在两院联席會議上，經多数票贊成作出有效的決議。決議的作成，必須两院各有多数代表出席。

联邦院全体人民代表的多数投票贊成或在适当情况下两院全体人民代表的多数投票贊成，才能通过关于某一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或联邦法律是否与联邦宪法相符合的決議。

#### 第五項 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

第六十二条 联邦院和生产者院各設一立法委员会与任免权委员会作为其常設委员会。

各議院也可以就其权限以內的問題設立常設委员会和調查委员会以及其他为执行特殊任务而設的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

联邦国民議會設立解釋法律的常設专门委员会。

联邦国民議會可以根据需要設立各种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

民族院为其所討論的問題可以設立各种委员会。

第六十三条 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委員不得兼任其他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的委員，亦不得被选担任議會或議院的常任职务。

議會議长不得兼任任何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的委員。

第六十四条 各委员会研究議案，討論委员会委員所提的問題和議院职权以内的一切其他問題，并向議院提出其报告和建議。

除議院決定議案应根据紧急程序所討論外，每項議案在提交議院討論之前必須先經該議院有关委员会討論。

委员会的任何委員对于各該委员会权限以内的一切与适用法律有關的問題及一切与国家机关、自治机关和經濟单位的工作有關的問題有权建議列入各該委员会議程或在該委员会討論时提出，对于其他有关一般利益的問題或有关該委員原选举单位的利益的問題有权建議并提出討論。

不兼任委员会委員的代表有权向其所屬議院的委员会提出該委员会权限以内的問題；由該委员会決定所提問題应否列入其議程。

第六十五条 各委员会可以作出決議并在其各自权限内对于国家机关、自治机关和經濟单位的工作提出建議。

第六十六条 各委员会可以要求联邦执行委员会答复有关其工作的問題并供給有关其工作的情报。

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委員可以出席委员会的會議并参加討論，但沒有表決权。

联邦执行委员会可以提議将个别問題列入委员会會議的議程并可以提議召开委员会會議以表明联邦执行委员会对于有关

問題所採取的立場。該委員會可以就所提的問題進行討論、通過決議、並提出建議。

各委員會可以邀請國務秘書長、副秘書長，其他首長和專家以口頭或書面解答問題，提供情報和說明。

各委員會可以邀請人民代表向各該委員會反映其所在的選舉單位或經濟單位的情況。

第六十七條 各委員會可以進行調查和質詢並為此目的可以向一切國家機關、自治機關和經濟單位要求提供所需材料和文件。

第六十八條 各委員會按照其所通過並由議院或在適當情況下由聯邦人民議會所批准的程序規章進行工作。

委員會選舉主席、秘書各一名。

某一議院的委員會或兩院的委員會根據需要可以召開聯席會議。

第六十九條 法律解釋委員會有權發表對於聯邦法律的有效解釋。

人民代表、議院各委員會、聯邦執行委員會、聯邦最高法院和各人民共和國執行委員會都可以提出解釋法律的要求。

法律解釋委員會向有關議院提出有效的解釋，由有關議院作最後的確認。

法律解釋委員會研究向議會提出的關於確定聯邦和共和國法律是否符合聯邦憲法的建議並在提交兩院的報告中提出意見。

法律解釋委員會由議院在兩院聯席會議上從人民代表中選舉九名委員組成。

法律解釋委員會在議會解散後仍繼續工作直到新委員會選出時為止。

## 第二节 联邦国民議会的执行机关

第七十条 联邦国民議会授权共和国总统和联邦执行委员会代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监督法律的实施，监督联邦行政工作和联邦政府权限以内的其他执行工作。

### 第一項 共和国总统

第七十一条 共和国总统：

- 一、对内对外代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 二、以命令公布法律；
- 三、發布关于批准国际条约和其他协定的文件；
- 四、以命令任免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全权大使和全权公使；
- 五、接受外国外交使节向其所呈遞的国書和卸任状；
- 六、以命令授与功勋和荣誉称号。

第七十二条 共和国总统担任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

共和国总统有权制止其所不同意的联邦执行委员会法令的执行并有責将意見分歧的問題立即提交联邦国民議会決定。在这种情况下，議會議长有責立即召开議会會議。

第七十三条 共和国总统担任武装部队的最高統帥。

共和国总统任免和提升三軍將領和法律所規定的其他軍事长官。

共和国总统主持国防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負責組織和动员全国資源和力量以应国防需要。

国防委员会由联邦执行委员会依照共和国总统的推荐任命。



联邦执行委员会以規程規定国防委员会的組織和职权。

第七十四条 共和国总统从联邦国民議会的人民代表中选出。

新选出的議会在其两院第一次联席會議上选举总统。

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得由二十名人民代表提名。

共和国总统以秘密投票选举。

获得占全体人民代表多数票的候选人即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共和国总统在当选后立即在联邦国民議会两院联席會議宣誓就职。

第七十五条 共和国总统在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和範圍內行使职权。

第七十六条 共和国总统在工作上对联邦国民議会負責。

共和国总统向联邦人民議会报告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并与联邦执行委员会其他委員在該委员会的工作上对联邦国民議会負責。

第七十七条 共和国总统的任期和联邦国民議会的任期相同，但議会可以在共和国总统任期中罢免共和国总统。

共和国总统在联邦国民議会解散后繼續行使职权直到下一任共和国总统选出为止。

第七十八条 共和国总统在联邦国民議会會議上不参加投票表决。

共和国总统缺位或因健康情形长期不能工作时，由联邦执行委员会指定該委员会副主席之一代行总统职权。

## 第二項 联邦执行委员会

第七十九条 联邦执行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負責執行聯邦法律、聯邦經濟計劃、聯邦預算和聯邦人民議會的其他法令，並為其執行發布法令和採取措施；為執行聯邦政府專屬職權以內的職務採取措施；對於聯邦法律的實施進行總的監督；

二、通過聯邦經濟計劃草案和聯邦預算草案並將其提交議會；草擬和提出議案；

三、發布聯邦行政機關工作的指令；

四、在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遭受武裝侵襲或需要立即履行國際義務時，宣布總動員和戰爭狀態；遇有發生戰爭危機時，宣布全國入於緊急狀態；發布關於緊急狀態、動員或戰爭時期必要措施的規定，此項規定具有法律的作用；

五、批准不由議會批准的國際條約和其他國際協定；

六、規定聯邦行政機關的組織並採取改進其行政工作的措施；撤銷和廢除與聯邦執行委員會的法律和規定相抵觸的聯邦行政機關的法令；

七、設立有關全國利益的企業和自治機關，規定其所設立的自治機關的活動範圍和基本組織機構；在聯邦政府的權限內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和自治機構的組織和執行職務的一般原則；

八、支配資源基金；

九、任免國務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國家銀行的總裁、聯邦檢查長、聯邦辯護人和其他法律所規定的高級官員；

十、在各議院間不能達成協議時，宣布解散議會和聯邦院；宣布聯邦國民議會的選舉；負責頒布聯邦法律和其他條例；

十一、根據特定法律發布特赦令；

十二、負責司法行政在本質上的一致，負責完成有關國際司法援助的任務；

十三、完成联邦法律所规定的其他任务。

联邦执行委员会可以向联邦国民议会提出其权限以内的任何问题，并建议议会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

第八十条 联邦执行委员会在联邦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行使其职权。

第八十一条 联邦执行委员会为执行法律可以颁布条例，并为行使其权限以内的其他职权可以发布决定和指示。

联邦执行委员会为执行某项一般法，仅在该项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可以颁布条例。

联邦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其组织机构和执行职务的条例，此项条例需提交议会批准。

各种条例由共和国总统签署。

第八十二条 联邦执行委员会由联邦院的人民代表选出三十名至四十五名委员组成。

新选出的联邦国民议会在其第一次两院联席会议上选举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

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得由二十名人民代表提名。

每一人民共和国必须有代表参加联邦执行委员会。

各人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当然委员。

第八十三条 联邦执行委员会设两名或两名以上副主席。

联邦执行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举并有权罢免其副主席。

第八十四条 联邦执行委员会在工作上对联邦国民议会负责。

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每届任期和联邦国民议会的每届任期相同，但议会在任期内可以罢免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全部委员或个别委员。

联邦执行委员会在联邦国民议会解散后繼續行使职权直到下届联邦执行委员会选出为止。

第八十五条 联邦执行委员会有向联邦国民议会报告其工作的責任。

議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联邦执行委员会提出其工作报告或提出其权限以內的个别問題的報告。

議會討論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報告，并可以根据討論通过決議和提出建議。

如果議会在討論会上認定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某些法令与法律不符，議會可以撤銷該項法令。

議會可以在两院联席會議上行使上述职权，如果所提問題专屬於某一議院的职权範圍，議會也可以只在該議院會議上行使上述职权。

第八十六条 联邦执行委员会在其會議上決定一切屬於其职权範圍以內的事項。

联邦执行委员会以多数票作出決議。

第八十七条 联邦执行委员会可以从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委員中選任委員組織旨在研究联邦执行委员会个别問題、草拟議案、条例和其他法令以及旨在作出在其权限以內的特別事項的決定的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

第八十八条 联邦执行委员会从其委員中選出秘書一名。

秘書負責联邦执行委员会行政工作并执行該委员会授与的其他职务。

第八十九条 各人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的条例及其他法令如与联邦法律条例相抵触时，联邦执行委员会可以制止其执行。

該人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不同意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決定时，可以将所爭執的問題向联邦国民议会提出。



人民共和国国家行政机关的法令与联邦的条例抵触时，联邦执行委员会可以要求该人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将该法令宣布无效或废除。

### 第三节 联邦行政机关

第九十条 国务秘书处、各级行政机关和各级独立行政机关负责直接完成联邦政府权限以内所规定的执行任务。

联邦国民议会的法律和其他法令与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条例及其他法令被列入联邦政府的权限以内执行时，统由联邦行政机关直接执行。

只有对各人民共有共同利益的事项才根据联邦一般法列入联邦行政机关的权限内直接执行。

联邦行政机关直接执行法律时可以发布行政法令，采取行政措施并发布其授权制定的法令。

第九十一条 联邦各行政机关在其各自的权限内，根据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法律和条例并在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法律和条例的范围内，依照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行使职权。

联邦行政机关在其授予的权限内独立管理这些事宜。

第九十二条 国务秘书处负责管理联邦政府权限内一个或几个部门的事宜。

联邦国务秘书处分为外交秘书处、国防秘书处、内务秘书处、国民经济秘书处和预算与国家行政秘书处。

联邦国务秘书处可以根据法律设立、合并和撤销。

第九十三条 各级独立行政机关和各级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联邦政府权限内所规定的行政职务。

各级独立行政机关和各级行政机关按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条例设立。

第九十四条 国务秘书处在国务秘书长领导下，各国务秘书长独立行使根据法律和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法令授予各国务秘书处的职权。

外交秘书长和国防秘书长由联邦执行委员会就其委员中任命。

各国务秘书长在工作上对联邦执行委员会负责。

各国务秘书长向共和国总统宣誓就职。誓词由联邦执行委员会规定。

第九十五条 国务秘书长有权发布规章、命令和指示以执行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条例和其他法令。国务秘书长仅在赋予特权时才可以发布关于执行法律的规章、命令和指示。

国务秘书长在法律或条例的规定下有责任将决定的规章和命令提交联邦执行委员会预先通过。

国务秘书长有权利和责任就国务秘书处权限范围内提请联邦执行委员会注意与联邦法律和其他命令相抵触的共和国行政机构的法令，并建议联邦执行委员会在其权限范围内采取措施。

国务秘书长在其权限范围内有权撤销有关共和国行政机关的与法律不符的法令或宣布其无效，此项法令是在行使联邦政府权限内的职权时发布的，而其执行权已根据联邦法律和条例移交共和国机关。

第九十六条 各级行政机关和各级独立行政机关由任命的首长和其他任命的官员领导。上述官员独立行使赋予各行政机关的职权。

联邦执行委员会只有在法律规定时才可以将赋予国务秘书长的特定职权移交上述高级官员。

国务秘书处可以设副秘书长一名或数名。国务秘书长在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同意下可以将其一部分职权委托副秘书长。

国务秘書处和其他国家机关的高級官員可以根据法律和联邦执行委員會的法令就指定的事宜作出決定。

第九十七条 联邦执行委員會在国家行政机关增設組織机构而其經費不在联邦預算規定之內或必須动用預算准备金时，其增設机构法令的草案必須提交两院有关委員會批准。

第九十八条 根据特別法律的規定，对于国务秘書处和其他国家独立行政机关的法令可以提起訴訟。

国务秘書处和其他联邦独立行政机关的法令如果是在較低行政水平上制定的而又不能解决某項行政糾紛时，除法律或条例規定应向某些其他政府机关提出控訴外，对于該項法令可以向联邦执行委員會提出控告。

第九十九条 联邦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中違犯法令致使国家遭受任何損害时，应負其責任。

政府工作人員在工作中違犯法令致使公民或法人遭受任何損失时，国家应負責任。国家有权使政府工作人員对其在工作中違犯法令而招致的損失負賠償責任。

上述条文对于共和国总统和联邦执行委員會的責任事故具有同等效力。

### 第三章 关于各共和国国家权力机关的原則

第一百条 各人民共和国国民議會是各人民共和国人民主权的代表，是各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一百零一条 共和国国民議會直接和通过作为其执行机关的执行委員會行使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共和国行政机关根据执行委員會的指令并在执行委員會的監督下負責处理所規定的执行事宜。

第一百零二条 共和国国民議会在联邦宪法、共和国宪法和联邦法律的基础上和範圍內行使其职权。

第一百零三条 共和国国民議会每四年选举一次。

第一百零四条 共和国国民議会由共和国院和生产者院两議院組成。

共和国院由县和市的公民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以秘密投票选出的代表組成。

生产者院由从事生产、运输和商業的生产者，按照各經濟部門在該人民共和国总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而选出的代表組成。

第一百零五条 共和国院和生产者院以平等权力参加修改共和国宪法，批准共和国經濟计划和預算，并通过有关經濟、劳动和社会治安的法律和其他法令。

执行委员会和其他国家机构的选举在两院联席會議上举行。

第一百零六条 国民議会授权执行委员会代表人民共和国、监督法律的实施、监督共和国行政工作、监督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是否合法以及負責处理人民共和国权限內的其他执行事宜。

第一百零七条 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在联邦与共和国宪法、联邦与共和国法律和联邦条例的基础上和範圍內执行其职务。

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由国民議会就共和国院的人民代表中选举十五名至三十名人民代表組成。

第一百零八条 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由主席領導。

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代表該委员会，主持該委员会的會議，簽署該委员会的条例。

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有权制止其所不同意的該执行委員



会法令的执行，但有責任立即將意見分歧的問題提交人民共和國議會決定。

第一百零九条 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在工作上对該共和国国民議會負責。

共和国执行委员会有权就共和国法律的执行頒布条例，并就执行共和国宪法、联邦和共和国法律所規定的职务發布決定和指示。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只有在联邦法律和条例授权时才可以就联邦法律和条例的执行發布法令。

第一百一十条 为了直接处理人民共和国权限內所規定的执行事宜，設立共和国国务秘書处和其他共和国行政机关，并成立由自治机关、社会組織和公民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

共和国行政机关在工作上对共和国执行委员会負責。

第一百一十一条 共和国各行政机关在联邦与共和国法律、联邦执行委员会与該人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的法令以及联邦行政机关在联邦政府权限內發布的法令的基础上和其範圍內負責处理其經營事宜。

共和国法律和人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的法令的执行权根据共和国宪法列入共和国行政机关的权限內时，此項法律和法令由共和国行政机关直接执行。联邦法律和联邦执行委员会与联邦行政机关的法令的执行权根据联邦法律或条例列入共和国行政机关的权限內时，此項法律和法令由共和国行政机关直接执行。

除执行权列入联邦和共和国行政机关权限內的法令外，人民委员会直接执行联邦与共和国法律和其他法令。

第一百十二条 人民共和国依照本法的原则独立制定其根本法。

## 第四章 关于自治省和自治区国家 权力机关的原则

第一百十一条 保证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戈索伏—密托希亚自治区的自治权。

自治省和自治区的自治权在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

自治省人民委员会是自治省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是自治区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省人民委员会由省参议会和生产者参议会组成，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由区参议会和生产者参议会组成。

第一百十二条 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戈索伏—密托希亚自治区国家权力机关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职权范围在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根本法中依照本法的原则明文规定。

自治省和自治区独立制定其法令，并遵照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根据其制定的法令规定其国家各权力机关的组织 and 职权范围。

### 附 则

第一百十五条 自本法发生效力之日起，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制定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五章以及与本法条文相抵触的宪法条文、法律和其他法令即行作废。

本法从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两院联席会议宣布之日起生效。本法将依照另一法律条文公布执行。

1953年1月13日贝尔格莱德

#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 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1953年1月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的报告

卡 德 尔

### 一、改革宪法制度的原因

自从1946年1月31日国民议会通过新南斯拉夫宪法至今差不多有7年的光景。这个宪法使南斯拉夫劳动人民能够给予其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以合法地位，巩固其革命政权，保证为打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而努力的政治条件。因此，这个宪法在我国革命发展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已经占有并将继续占有光荣的地位。

今天我们考虑这个宪法中作废的那些条文，研究这些条文的内容，我们绝不会低估我们第一个社会主义宪法的作用和其历史重要性。但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宪法通过时，无论从物质力量方面来说或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方面来说，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都只是才开始向前迈进。我们的宪法突出地反映了这样几个缺点：社会主义形式发展的不充分；相对地过度肯定国家机构的作用随之而形成官僚主义倾向的来源；存在许多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主义的残余而没有真正的民主内容；在基层的生产机构中对于发挥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给予充分的政治和物质的保护；机械地搬用苏联制度的形式，此外还有其他缺点。这些不充分的发展一部分是由于客观条件和需要的影响，一部分是由于主观缺陷的结果，即我们自己缺乏建

設社会主义的經驗。

在这个宪法頒布 7 年后的今天,南斯拉夫的情况,在全国物質力量方面和社会主义意識的發展方面,已經發生了基本变化。

首先我們在發展生产方方面已經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們原来沒有估計到我們現在会有这样的經濟力量,即:社会主义成分的社会作用已經相当强大,不但能够独立存在而且整个地說来能够战胜反社会主义的傾向。社会主义力量既然已經相当强大,就不再需要以革命政权的力量来保証社会主义的自由發展。尽管我国經濟發展不充分的情况还没有完全克服,但是毫無疑問社会主义成分已經成为主导的經濟力量;并且在自然發展規律下可以任其自己向前發展甚至改造經濟和社会發展的落后成分。这些事实还向我們說明了社会主义公众集体的一般利益已經与每个工作者的个人利益相結合,其程度已經达到这样地步,即:越来越少地需要国家的干与和以政治行政原则来保証社会主义公众集体的前进,同时各种不同形式社会自治的需要也越来越明显。換句話說,我們获得的成就不仅可能而且显著地要求我們前进。

旧宪法制度或多或少地是建筑在行政机构集权制度上。当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宪法这样規定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中物質資源来完成旨在为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和进一步发展而創造条件的最基本任务。自然,整个說来,这个制度已經产生积极的效果,今天我們修改这个宪法,并不意味着我們这样作是因为我們認為当时我們犯了錯誤,而是因为我們相信我們已經达到我們所期待的目的,我們可以从而繼續前进。

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关系并不是单纯从我們的經濟發展和我們工人的經濟利益的需要出發,同时也有其充分的政治理由。如果过多地利用旧制度,就会永远有官僚主义化的危險,



有压迫和限制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危险，有产生官僚集权主义和官僚本位主义的危险——这两点只是一件事物的两种现象而已；总之，它包蕴着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保持和扩大国家资本主义因素的危险。

这种倾向在我国既没有予以克服，也没有严重地威胁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是能以产生这种倾向的制度无疑地已经成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的越来越大的障碍。目前不仅在政治方面需要，而且在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也直接需要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可以更自由发挥的制度，也就是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以民主方式团结起来的生产者的自治制度。

自从1946年的宪法颁布以后，我国工人的社会主义觉悟在继续不断地提高。劳动人民从他们的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获得许多经验，并逐渐开始摆脱许多旧有的方式。而且不仅如此，在我们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当作为行政机构的国家行政机关甚至管理经济部门的具有一般利益的事务的时候，“一般利益”这个概念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方面的概念，并不是一个经济方面的概念。每个工人参加工厂和其他经济机构的管理开始使我们的劳动者懂得他个人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成就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在我们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者觉悟的提高不仅有力地发挥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并且唤起他们反对进一步的官僚主义的干涉。

最后这些说明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所谓对于社会主义成分的行政管理制度不仅越来越不需要，而且越来越成为有害的障碍。我们的社会主义公众集体，在铁托元帅的领导下，有意识地记下一切发展过程的结果，并且在发展社会的自治方面同时在

限制国家行政机构的活动和作用方面采取了發展的重要步驟。

这里無需詳細地來解說这个过程。大家知道重要的社会和經濟变化是随着經濟制度和社会生产管理以及其他社会自治成分的新形式和新关系而来的。我們可以毫不夸大地來說这些变化在我們社会主义革命的發展中是具有这样新阶段的性質。旧宪法的基础是：对国家权力的代表机关負責而又具有很大权限和相当独立性質的国家行政机构管理社会主义化的經濟部門。另一方面，一切后来的社会变化都是順着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我們应使国家行政机构逐漸負起这样一項任务，它只能够是，也應該是过渡期間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即保护社会主义制度，規定与社会主义發展一致的法律制度。同时，在社会主义化的經濟成分中生产資料的管理已經并且繼續越来越多地轉入全社会的手中，即轉入生产者的民主自治机关的手中。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适用于其他社会生活方面。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在現存的宪法制度和社会主义大力發展的傾向間势必發生矛盾。新的社会关系要求对基層社会生产单位中的劳动者給予發揮其社会主义積極性的自由，然而旧宪法制度是基于某种程度的集权管理原則的。新的社会关系在以生产資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經濟發展关系中要求予以社会管理的自动力，然而我們的旧宪法却过多地基于以行政机构來管理行政事务的制度上。很明显，在这些矛盾中存在着發生冲突的根源，这些冲突必須設法解决，必須避免其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

起初我們根据需要大部分以条文規定来解决这些冲突，而这些条文規定虽然变换了內容但是仍保持原来的形式。这样过了一个时期很快就显出这条道路走下去一定会有損我們社会秩序的協調和政治力量。結果修改宪法的需要越来越迫切。

这方面存在这样的問題：我們應該制定新的宪法还是仅修改补充現有的宪法。我們有特別充分的理由来反对制定一部全新的宪法。

我們还發現我們是处于社会现实的革命变化的过程中。近来我們建立了反对官僚主义复辟与恢复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坚定的防备措施，从而确实有了重大的轉折。但是这个重大的变化只是最近才發生的，我們現在必須在新的基础上处理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事务。这不是一个可以一夜完成的过程。此外，經驗本身告訴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哪种新的方式更为适合，哪种将被揚弃。只有根据这些經驗我們才能够逐渐使我們的宪法制度成为一个有机的，可以在較长时期作为我們社会生活基础的宪法制度，在这方面我們現在正在制定一項新的根本法。

这里再提一句，不能設想我們非以一部宪法作为一件完整地合法的文件来总结这个过程，来包括我們社会建設的全部問題不可。以一系列的根本法逐渐改变我們的宪法制度，这些根本法一面解决国家机构方面的問題，一面解决社会自治方面，即經濟关系、教育文化、社会保安和公共衛生等方面的問題，这样或許更为妥当些。整个說来，制定可以适合各方面的新宪法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相反地，如果我們走这条路，我們可能很快就会遇到新的困难，就会面临社会现实和政治、法律形式互相矛盾的新冲突。

結果日常經驗所显示的必然需要迫使我們寻求最迅速而可能的解决方法。我們必須顧及在我們社会生活的新基础上正規發展的利益，尽可能快地避免我所談过的那些冲突，最低限度应避免这些冲突最明显和对于我們制度的一致最有害的方面。这一点我們已經發現我們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特别是在經濟管理方面。

根据这些理由我們贊成通过一項新的根本法，也就是現在向国民議会所提出的这种形式的法律，来改变宪法制度。

有人提出：国民議会制定一項包括修改和补充旧宪法的法律是否比制定新根本法好些。联邦政府根据我上面所举的理由認為这样也不妥善。我們的宪法制度的变化并不是很小的，并不仅包括制度的外形，而是基本的变化——社会的深刻的变化。如果我們希望在宪法中以修改和补充宪法条文的方式来适应这些变化，我們实际上就不得不改变宪法的全部条文，或是制定新的宪法。由于我上面所提的理由，这正是联邦政府所希望避免的。

因此根据以上那些理由，联邦政府相信在目前条件下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制定新根本法，在这个新根本法中基本上修訂、补充和廢除現有宪法的若干条文或整个条款，但是并不将宪法的条文全部廢除，允許根据現在所制定的原則进一步逐漸改善全部宪法制度。

因此，联邦政府現在向人民議会建議制定新根本法。

## 二、社会經濟和政治原則

新根本法主要是根据下面的原則制定的。

### (一)社会主义

首先新根本法草案規定保护以工人階級为首的劳动人民的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保护劳动人民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而努力，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社会主义特点在新根本法中比在旧宪法中規定得更为清楚和充分，这一事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目前社会主义成分在生产中無疑地是占优势的成分，而在



通过 1946 年宪法时社会主义成分只不过才开始發展。

关于这一点新根本法草案首先保护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是在原則上除在农業和手工業中作为个体生产基础的生产资料——一般作为生产者自己的私有财产的那些生产资料——以外的一切生产资料。

关于这一点，新根本法还采取了一些新的内容。可以看得出：每个企业一經成立，而且不管是什么人成立的，这个企业中的工人集体就自然而然地获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正是根本法对一切企业所规定的社会特点。在这方面，一切工人在生产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不論国家或社会机关，尽管是这个企业的成立者，都不能自己承担或加之于工人集体以宪法和有关一切社会企业的法律所规定以外的更多的或不同的义务。这项规定是重要的，首先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国家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仍然認為这个或那个企业是他們“自己的”，并且可以对他們“自己的”企业任意规定在物質上应履行的义务；在这项规定在通过上述机关的事务管理，反对發生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傾向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壁垒。同时这项规定也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防止企业建立者，甚至社会主义企业的建立者，損害其他工人集体的权利来攫取各种形式的特权。

因此在原理上，新的根本法首先承認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社会生产成分，即社会主义成分，其次承認建立在生产工具私人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个体手工業和个体农業的生产成分，即生产资料个体生产者所有制的成分。而这种成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相反地不以行政措施，不經国有化，而在社会主义成分在經濟上的帮助下完全可以逐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两种成分之間自然存在一些过渡的形式，其地位必須在新根本法条文的基础上制定特別法律予

以確定。

## (二)在建設社会主义中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

新根本法還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即工人階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原動力，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負擔者。但是新根本法不再主要地通過工人階級在行政機構中政治先鋒的地位來保證這種領導作用——這種保證最終只是引導這個最前進的先鋒走向官僚主義化，引導它沉溺於國家行政機構中，結果使國家行政和工人階級相脫離——而是通過工人在企業中或其他經濟單位中的自治，通過勞動群眾以他們在經濟機關自治的方式使工人階級直接控制國民收入的使用和支配。

與此有關的是：在聯邦人民議會的體制內和各人民共和國的議會中新的生產者院這一憲政機構是特別重要的，不僅因為這些新的代表機關將代表經濟單位和他們的工人集體最直接的經濟利益，而且因為工人階級的代表不是根據人數比例產生的，而是根據工人階級的实际社會作用產生的。

生產者院的作用在進一步發展社会主义民主中也是特別重要的。首先通過生產者院工人階級獲得與社會作用相一致的和具有充分民主形式的政治力量。在這方面，需要國家政治機關在一般經濟和社會生活方面的干預已經大大地減少了，這樣，官僚主義傾向的來源已基本上杜絕。其次，通過生產者院，我們可以在國家權力的各代表機關中得到直接和強有力的勞動農民階級的代表團體，同時在加強工農聯盟的道路上將使社会主义工業更容易對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予以援助和清除在個別小生產中仍不斷發生的反動傾向。生產者院並將能夠以生產者公眾集體的名義對每個工人集體的事務和工作、對他們向整個公眾集體完成其義務進行有效的政治和經濟的控制。在這方面生產者

院將成為在經濟中特別重要的調節工具，其重要性達到這樣的程度，即這種調節自然為一般社會利益所特別需要。因此在這些性質方面，各生產者院可以特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加速其繼續向前發展，這是很明顯的。

### (三) 社會自治

自然，對於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發展，生產工具掌握在國家行政機構的手中或是由社會管理團體，像勞動人民的集體的民主的代表和生產者自己來管理並不是沒有關係的。在我們革命的第一個階段，當國家把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收歸國有的時候，社會財產不可避免地首先要以國家機構直接管理國家財產的形式出現。這一點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由於工人的社會主義覺悟還沒有提高，一方面由於整個國有化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須相當緩慢地來進行的。

但是，工人階級的革命先鋒和一般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社會主義力量的歷史任務，並不只包括領導生產工具國有化的鬥爭，而且還保證從生產資料國家管理的方式過渡到生產資料社會管理的方式——也就是過渡到生產者在社會公眾集體對他們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的範圍內的民主自治的形式。社會主義的社會力量，即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必須能夠承擔起來推動向社會主義前進的任務，否則他們將成為以他們的合法代表而出現的官僚主義的國家機構的奴隸。他們的代表在管理生產資料方面一經獨立，就不再是勞動群眾的真正的代表，而成為他們的主人。如果我們承認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發展的負擔者這一事實，那麼我們就必須毫不猶豫地判斷在屬於社會財產的工廠中的勞動集體通過他們自治的民主機構，在社會主義公眾集體所肯定的制度內，隨着一切其自覺的和自然發展的傾向，必然會

建設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资本主义者必然要建設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确切。

为了适应这一点，新根本法把社会自治原則放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这个原則就是我国劳动者通过他們的自治团体管理企业、机关和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具有一般利益的机构。另一方面，新根本法給国家机构限定出其特殊任务，即首先維持社会主义秩序、保衛人民的独立、保証法律和命令的执行、保証社会和經济制度在本质上的—致等等。自然，新根本法还規定国家在社会各方面，在保护社会制度、鎮压社会主义敌人的活动、或对于阻碍社会發展的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發生問題时有权进行干与。

#### (四)人权平等

为了使社会自治机构能真实地成为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推动力量，新根本法保障一切公民享有平等的人权。这些权利不但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物質上的。这些权利不仅保护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且还保障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物質水平。每个公民在一般政治权利外，享有工作权和由社会保障最低物質要求的权利。目前所保障的最低額还相对地比較低，但是将随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發展中的每項成就而提高。我国劳动者有权参加管理其所工作的企业或以公民資格因感觉兴趣而参加管理教育、衛生、社会治安和其他的社会机构，从而劳动者的地位将进一步地巩固。而最后，甚至如果一个工人并未当选为人民政府权力机关的代表，他仍有权参加这些机关的工作，或通过选民会议、公民参议会、各种委员会等来了解这方面的工作，更不用說在民族战綫中劳动者可以討論各种具有一般利益的問題了。我国民主的組織基础和物質基础的广泛程度比起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是



不可同日而語的。

为了使政治权利不能够用于实现推翻我們民主宪政制度的目的，新根本法还规定对于政治权利的限制，这一事实和我国的发展水平是相符合的。这些限制在于对我们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成就予以必要的保护。只要反社会主义分子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一天威胁着我国革命在民主和社会方面的成就，即社会主义的成就，这些限制就有必要存在一天。

### (五) 执行权的地方分权制

新根本法还反映出执行权最大限度的地方分权制的倾向，在过去几年間地方分权制在我们全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需要实行这样的分权制主要是在于：

一、使执行权的施行在实际上尽可能的适应现在仍不一致的具体情况；

二、使群众能以直接控制执行机关的工作，使劳动人民在实际上能以自由而充分地發揮其社会主义积极性；

三、防止国家行政机关变为某些种对于社会的永久性的集权統治力量。

根据上述理由，新根本法制定了这样的原则，即执行权的实施主要交付各级人民委员会和各种社会自治团体，同时共和国和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只保留在性质上属于联邦或共和国的职权以及由宪法或基于宪法而制定的其他法律所规定的职权。

与此有关的是：新根本法同时结束了所谓“双重负责制”，这种“双重负责制”在我们旧宪法中主要是承襲苏联的制度。根据“双重负责制”每个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不仅对其相应的代表团体负责，同时对其系统以内的高级行政机关负责。

但是，人民的每个国家权力机关或任何自治的社会单位对

于社会公众集体所負的責任仍充分保留在新制度內这是用不着說的。实际上,这种責任并不能通过集权的行政机构来完成,反而可以通过法律、規程、經濟計劃、和共和国与联邦代表机关所公布的其他各种法律条文和法令所規定的义务方面来完成,而对于上述各方面的执行可以直接或通过其行政机构来控制。

在对社会公众集体負責这一問題有关方面,新根本法也有新的創造,在法律和其他具有約束性的决定外,新根本法規定了“建議权”作为联邦和共和国人民議会的工具。人民議會或其委员会的建議不是必行的法令,然而無疑地将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具有很強的力量。如果某些社会或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一些具体行为与群众意見相抵触而涉及一般利益的問題时,这些建議将是在这些方面,即在形式上特殊属于这些机关的职权方面,具有特別效力的工具。但是拿这些情况独立来看时,我們社会将必然地要求不仅由法律条文,而且由某种形式上的非义务的标准——这个标准無疑地将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具有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义务——来規定个别內部的关系。这些社会标准将逐漸能以代替許多法律規定和行政措施,甚至在今天这些規定条文显得不可以代替的那些方面。

無疑地,这种执行权地方分权制最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力量自由互相作用的需要。

### (六)統一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同时,必須着重指出的是:新根本法絕不允許削弱劳动人民政权的統一或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一致。相反地,在逐漸大胆地实行执行权地方分权制中,在保障各社会机关和一切公民在同等的条件下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对于公众集体負有同等的义务方面,新根本法同时規定联邦和各共和国保留保証制度一致所必

要的职权和机构。这方面充分保障一定程度的社会集权，沒有这样一定的社会集权，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对最迅速而可能地發展生产力保证有利的条件。此外，不應該忘記的是：执行权的地方分权制只有在同时保证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一致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才能發揮积极的作用，才能是进步的。

但是，新根本法并不以某些集权的行政制度的独立职权来保证制度的一致，而是通过以下两点来保证的：

一、通过劳动人民权力的統一，也就是通过人民議會、通过各执行委员会、通过各人民委员会以及通过这些机关的互相关系来保证；

二、通过各国家和社会机关根据宪法、法律和其他联邦人民議會和各人民共和国議会的法令确实独立而专責地工作的原則来保证。这样，保证我們制度一致的基本工具就不再是一个統一的国家行政机器，而是人民議會的法律和其他决定，同时执行这些决定的一般政治指导和监督的作用属于人民議会的直屬机关，即各执行委员会。由于这个改变，各人民議會将在新宪法制度下，在日常实践方面較之以前具有無法相比的重大作用。在这个制度范围内国家行政机关还独立工作，用不着像以前那样由高級行政机关来监督。

### **(七)各民族的权利一律平等**

自然，新根本法保障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权利完全平等。各民族权利的平等不只在形式上是民主的，即不仅表示在各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上和各民族的与文化的独立發展上，而且深入到我們社会和經濟结构中，得到我們社会和經濟结构的保证。根据社会主义制度，不平等待遇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落后的共和

国的經濟援助和幫助他們加速發展表現了我們一切勞動者的直接經濟利益，代表了全國每個工人的經濟利益。

此外，一個各共和國權力不等的聯邦在我國是必要的，這不僅是從我國的民族組成出發，而且是从我們的社會制度，從人民主權與社會自治的觀點出發。我們國家將是具有新的意義的“聯邦”，這種“聯邦”是建立在社會自治的基礎上的一種制度——甚至不管是不是一個多民族的国家。

新根本法包括合法地保障這種平等權利的條文。在憲法的許多條款中清楚地規定了聯邦對於各共和國的權力，此外，在聯邦議會的體制內，還設有民族院，各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在民族院中，在修改憲法、改變聯邦與共和國之間關係、通過聯邦經濟計劃支配國家收入等方面，享有特殊權利。

#### (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众集体的团结

在承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權利一律平等方面，新根本法同時保障各民族的團結，在這一點上，我再一次提出不是通過行政機構或公布的法律條文來保障，而是由社會制度本身來保障。今天我國各民族的團結不再是每個民族單獨的利益問題，即它不僅是互助的利益和聯合起來保護各民族獨立的問題，而且成為每個勞動者的利益的問題。實際上，這種團結同時是在人類社會內部團結的歷史過程中向前發展的一個新步驟。

在人類文明開始時，個體生產和以貨易貨的交易促使原始部落的消滅和地方社會公社與地方封建種族集團的成立，即各民族的形成。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和廣泛地商品交易與貨幣流通的出現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形成的要素。而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全世界交換物資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提供了形成更廣泛的國際公眾集體的條件。在形成這樣公眾集體的過程中並沒



有否認民族語言或民族文化的因素，这个过程在原則上屬於新的社会團結范疇。此外，民族平等是正常进行这个过程的重要条件之一。

因此，如果我們談到統一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公众集体，我們并不是遵循关于使南斯拉夫各民族同化为“一个南斯拉夫民族”（用旧話來說）的那樣足以引起混乱的原則。如果我們一味地执行那种計劃，我們就会显得对于历史事实和客观社会法則的認識太粗淺了。旧有的臭名昭彰的所謂“大南斯拉夫主义”过去曾是，将来也还会是反动的与不能实现的。我們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众集体，無論从哪方面來說都不是建立在某种民族主义的基础上的，也沒有某种以同化各民族語言或文化为原則的榜样作为基础。它是建立在不分民族种別、一切劳动者的共同社会利益上。因此它比任何其他可能組成的公众集体更为强大。一切社会生产資料都是社会的财产——实际說来，都是我国一切劳动者的财产。生产工具最大限度的使用和改进代表每一个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对于劳动者來說，在某种意义上，生产資料是集体的财产，也是他个人的财产。这是一个創造新型的社会主义公众集体的新的因素，在这个公众集体中語言和民族文化只是次要的因素，这个公众集体不会阻碍任何人与其他不論講何種語言的劳动者以平等的身份互相接触。因此，这个因素使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公众集体成为一个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的公众集体，使我国每个劳动者都可以驕傲地称他自己是一个南斯拉夫人，不提他的民族出身、不反对他对民族語言和文化的爱护而称他自己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众集体的一分子。

从这个角度看来，我們联邦不再是一个旧形式的联邦，不再是一个各民族和他們的国家的联盟，而已經成为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的統一的社会主义公众集体的社会职能的承担者。

## (九) 民主主义

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后保障来说，劳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形式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曾经看到在一个时期内劳动人民的政权的许多职权可以由革命的国家制度通过其以社会主义思想精神进行工作的行政机构胜利地来执行。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制度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也就是在革命才成功后的时期，可以有效地起它的作用，而到一定时间就会成为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源泉。发展劳动人民自治制度是压制这种倾向的唯一有效的方法。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作为工作方式和原则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必要的。在这种意义上，在新根本法中，民主主义，即民主地作出决定的原则，已经基本上作为主导原则应用在我们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一切公民有权选举和当选为国家权力机关和社会自治团体的代表。一切决定由多数票通过，并且在各机关所具有的职权范围内没有以前那种官僚主义的监督。这个原则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但是这里有一些形式值得我们在世界上和历史面前骄傲的，在这种形式中我们今天正进行着先驱者的工作：

一、全体劳动人民的自治，特别是民主的形式和原则并不只限于这个术语的狭义的政治方面，即只是在国家制度的领域内，像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情形那样，而且还运用在生产与支配方面，运用在经济管理方面以及其他社会管理方面；

二、从选民会议、人民委员会及其所属参议会，以至一切企业的工人委员会或地方社会治安机构等基层自治团体网都规定每个公民可以随时发表意见来讨论，并且对于舆论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三、公民直接选举高级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代表，这并不

是由于他們屬於这个或那个政党，而是由于他們知道这些代表的主張和意見，这些代表值得什么样的信任。

所有这一切都的确是从政党民主走向个人自由民主的一条道路。个人自由民主比任何形式的政党民主都更能够表示劳动人民的願望，而政党民主往往是少数最高領導者，不論是两个、十个或只有一个这样的最高領導者掌握国家政权，对于社会生活进行独裁。

我并不完全对于我們目前的政治制度的形式和原則加以贊揚或称之为理想的。在国内和国外現在仍存在許多狡猾的与我們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为敌的人，我們对于他們必須加以警惕。因此，在政治上和行政上保护宪法制度的措施也是必要的，显然这种措施对于某种形式的民主权利就要加以限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們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民主形式仍然是落后的而且發展得很慢。可能有些地方，我們低估了某种民主形式的意义，而这一点也迟緩了这些形式的發展。但是这一切，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民主自治的形式开始在新的地方發展，在剝削者、壟断者或国家資本主义的官僚主义階層直到現在仍有势力的地方發展。因此，我們可以正确地說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中，正在产生新的民主关系的因素。屬於未来的民主关系的因素。

### (十)革命的誠摯和警惕

最后我还願意着重指出我們新根本法中的另一項基本原則——我們絕不帶有夸夸其談或浪漫炫耀的傾向，而是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来对待威胁我們革命和社会主义成就的敌对行为，这是一个以公开、忠实而誠懇的态度对待现实的方法。

反社会主义力量繼續不断地企圖破坏我国劳动人民以鮮血和巨大而英勇的努力所获得的一切，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設的領

域內新根本法一方面規定了最廣泛的民主形式，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使社會主義國家權力機關可以隨時隨地來鎮壓上述行為的方法，這也是很显然的。我們不能允許反革命分子在我們從事恢復任何剝削制度。另一方面，在我們不僅存在發表一切意見的自由，而且存在繁復而龐大的社會組織機構，任何意見通過上述機構都可以發表出來，通過這些機構也越來越容易地發表出來。

自然，新根本法還必須規定由最高國家機關和社會機關在社會共同利益受到損害時——即社會主義發展的利益由於社會覺悟較低或政治與社會經濟的落後而受到損害時——進行干與的可能。

簡單說來，全部新根本法反映了我們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實際情況；其中並不隱瞞什麼，也並不夸耀什麼。新根本法包括我們可以在全世界面前值得驕傲的形式，它還包括我們不能滿足的因素，但是由於政治的和經濟的具體需要，尤其是由於保障我們的獨立和保衛我們革命的果實，在這方面我們必須忍耐，因為我們不得不這樣作。

### 三、對於新的國家組織的發展的政治支持

我們的新的國家機構在南斯拉夫社會和政治發展中顯示出一個新階段。它已經具有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的重要特點，其社會主義和民主的特點不僅顯示在它的努力及其一般發展傾向中，而且顯示在社會主義因素和民主形式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中。

在這個組織機構中，從我們奉為指針的基本原則的觀點看來，無疑地還有許多缺點，這一部分是由於在我們生活中的政治和經濟條件的必然結果，一部分是由於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在進行着先鋒的工作，不能以處理一個學校的事務那樣的方式和平



而簡單地進行，而是以對於物質力量、對於落后狀態、對於社會主義的敵人、對於保守主義、對於較低的社会覺悟、對於實踐主義的慣性等進行艱巨鬥爭的方式來進行。因此，不應該忘記在頒布這個新根本法時，工作距離完成還差得很遠。我們已經奠定了基礎並且已經規劃出清楚的發展遠景。現在，在這個遠景前、在既定的一般原則的精神下，我們必須系統地增加和發展我們國家与社会組織的個別成分。

此外，總的說來，我願意提請大家注意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自覺的社會主義力量在與我們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有关方面的政治任務問題。經驗已經證明我們這一深刻的信念，即：我們勞動群眾將知道怎樣為社會公眾集体的利益，也就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運用各種社会自治的民主形式，將知道這樣作最終他們將必然地以社會主義方式為社會主義服務。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一切的过程將自然而然在本質上顯示出來，並不意味着除仇視社會主義的直接敵人外，什麼困難和危險都不會遇到。

不是的，這樣的一種表現是錯誤的，甚至是危險的。我們不僅要對付反社會主義的反抗和社会結構中經濟与社会的落后性，我們也必須向較低的社会覺悟、机会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地方主義、損人利己的傾向作鬥爭，向對人民財產有害的態度、缺乏對公眾集体利益的認識等等作鬥爭。所有這些和許多同樣的現象在各方面都曾經發生，而且將繼續發生直到能以發生這些的物質条件不存在時為止。但是這些現象却不能有損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不過社會主義的敵人往往抓住這些現象利用這些作為他們的工具。如果我們不積極地以政治手段對這些發生的問題作鬥爭，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對於我們進一步獲得成功就會存在嚴重的危險。為了我們能以對我們制度的弱

点和足以威胁我们制度的危险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缺点和危险。如果我们忽略了这场斗争，我们就可能遇到严重的失败，而引导“行政社会主义”复辟的官僚主义倾向就会重现，即走向极端的官僚主义形式和行政机关的国家资本主义原则的重现。显然，任何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复活就会对社会主义带来严重的政治失败。

因此，单单制定新根本法或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其他规定和措施是不够的。政治斗争是必要的，许多解释也是必要的，同时大力提高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也是必要的。对于这一点，铁托同志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演说中曾特别强调在劳动人民中进行教育和政治工作。

我还认为铁托元帅对于把民族战线改为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这一建议对于实现这项任务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此外，一方面改变社会关系和新宪法制度，一方面建立更广泛的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作为公开的群众的政治基础，这两方面只是同一运动的两种形式而已。

在这方面，不仅新的经济制度，不仅新的根本法，就是政治生活的各种原则和形式——这是我们目前的任务——对于其他一切也都不可分割地联系着。

我们这一切努力的政治意义不仅对于我们国家，并且对于整个国际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特别重大的。以我们的实际成绩和经验，我们正逐步地证明：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垄断独占，相反地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民主才可以实际成为一切人民的共同利益。

我们坚定而稳步地在铁托同志的领导下沿着今后为我们的新根本法所标志的道路向前迈进，不仅意味着对我国劳动人民有利而且意味着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

# 关于工人集团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 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令<sup>①</sup>

(译自“工人管理工厂”小册子，1950年出版)

## 基本原则

工厂、矿场、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和其它国家经济企业，作为全民的财产，由工人集团代表整个社会，在国家经济计划范围内加以管理。

工人集团通过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以及联合几个经济单位的高级经济组织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来管理这些企业。

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工人委员会由工人集团选出和罢免。

在较小企业中，工人委员会由全体工人组成。

工人委员会任期一年<sup>②</sup>。

工人委员会及其个别人员可在任期未滿以前予以罢免。

工人委员会作为工人集团的代表，选举和罢免管理委员会，并具有法律所规定的其它权利。

经济企业或高级经济组织的管理委员会经营该企业，并向工人委员会和主管的国家机关负责；同时，企业管理委员会还向高级经济组织的管理委员会负责。

管理委员会根据此法令及其它法律条例、工人委员会的决

---

① 1950年6月26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了“关于工人集团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令”。

② 1955年改为2年。——译者

議和主管的國家機關或高級經濟組織管理委員會的指示進行工作。

管理委員會任期一年。

前屆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只有三分之一能連選連任。（譯注：指三分之二必須是新人）

管理委員會任何委員不得連任兩次以上。

管理委員會委員在任職期間須在其原來企業崗位上工作。（譯注：指不脫產）

管理委員會委員的工作概不付酬。

管理委員會委員在任期間，其勞動合同不得取消；在未獲得本人同意前，不得調動其工作。

企業和高級經濟組織的首長（經理）管理該企業或高級經濟組織的生產及其它事務。

除非法令另有規定，并要求對企業和高級經濟組織進行正確的技術指導，企業經理將由高級經濟組織的管理委員會，或者如果該企業不是聯合性的企業，則由主管國家機關任命之。高級經濟組織的領導人將由主管國家機關任命之。

工人委員會或管理委員會得建議撤換企業經理。

經理為管理委員會的一員。

企業經理向企業管理委員會、高級經濟組織的管理委員會和領導人、以及主管國家機關負責；高級經濟組織的領導人向他的管理委員會和主管的國家機關負責。

### 企業工人委員會

企業工人委員會由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選出。

所有根據現行條例簽訂勞動合同的工人以及所有企業中的技術人員、工程師和其它職員，均有選舉工人委員會之權。



投票以写票方法进行。每票写上名单上所建議的候选人的名字。

有多少張候选人名单,就有多少張票。

投票人有权勾掉候选人名单上的名字,另写上其它候选人的名字,这些人須是該企業中有投票权的工人或職員。

投票人把他不贊成的候选人名单投入会场特設的柜台中。

投票人把他贊成的候选人名单折起来,投入选举委员会跟前的票箱內。

由大多数工人和職員投票贊成的名单中获得最高票数的候选人就成为工人委员会理事。

工人委员会从其理事中选出主席一人。管理委员会委員不得兼任工人委员会主席。

工人委员会會議將由其主席召集和主持。工人委员会會議至迟六星期举行一次。

在企業管理委员会、工会、工人委员会三分之一的委員,或厂长的要求下,主席必須召集工人委员会會議。

工人委员会在出席人数超过委員一半的情况下,有全权決定問題。

工人委员会的決議由出席人員的大多数通过。

企業工人委员会;

批准企業的基本計劃和最后帳目;

對企業管理和完成經濟計劃作出決議;

选举、罢免和撤換企業管理委员会或其个别委員;

在高級經濟組織或主管国家机关的同意下,拟定企業各項規則;

討論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对該报告作出決議和批准;

討論管理委员会的各項措施,并对此作出決議;

把交由企業亦即工人集團處理那一部分積累，進行分配。

### 企業管理委員會

企業管理委員會由三人至十一人組成，其中包括經理在內。

每一企業管理委員會之人數，根據該企業的大小和結構，由該企業自行規定。

管理委員會的委員中至少四分之一必須是直接參加生產，亦即直接參加企業基本經濟活動的工人，管理委員會的其它成員則從技術人員、工程師和其它職員中選出。

企業管理委員會：

提出對企業基本計劃的建議；

擬定月度執行計劃；

注意企業的經營是否正確；

擬定有關企業的国际組織的計劃和關於職業分類的建議；

草擬企業的規則和條例，並採取措施提高工作紀律；

決定企業行政人員的任命事項；

對職工提出的有關僱傭、解僱和職位分配上的申訴作出決定；

採取措施來提高企業生產，特別是改進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改善產品質量、節約和減少浪費；

決定有關企業的工作定額問題；

決定誰該被稱為突擊工人，並對工人發明家的建議作出決定；

採取措施來提高職工的技术，並正確分配職位；

注意有關企業勞工關係、薪金、工資、提升職工、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險、企業職工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條例的正確實施；

討論和通過年假計劃；

采取的措施来保护和正确利用企业管理下的国家财产，并消灭和防止对国家财产的损坏、浪费和其它不良的表现。

企业管理委员会负责完成计划和正确经营企业。

管理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主席一人。经理不得为管理委员会主席。

管理委员会主席主持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并和经理一起拟定会议议程。

企业管理委员会在一半以上委员的出席情况下，有全权作出决议。其决议由出席人员大多数通过。

管理委员会委员由于工作忙碌，有权补偿其在此期间所损失的工资。

管理委员会有权利和义务向主管国家机关提出关于高级经济组织管理委员会所作的而它认为是非法的或违反企业利益的决议、指示和裁决的意见和异议，但在该主管国家机关作出决定前，它不得停止执行这些决议、指示和裁决。

管理委员会任何委员如不同意管理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得向高级经济组织管理委员会或向企业工人委员会提出他的反对意见。

管理委员会委员只能在工人委员会的管理委员会开会时提出他对经理工作的反对意见。

## 企 業 經 理

经理根据企业管理委员会所规定的法令和条例以及主管国家机关、高级经济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和领导人的指示和命令，来组织企业中的生产过程，并直接负责计划的完成和企业的经营。

经理直接有责任遵循法令、法律条例和主管国家机关的指示，保证在企业中予以执行。

企業經理在經濟計劃範圍內并根據企業管理委員會的決議，得締結合同并指導生產基金的使用。任何合同，經經理簽字后，則為有效。

經理在國家機關以及法人面前代表其企業。在某些法律事務上，他可授權他人來代表企業。

企業經理，除另有規定的職務外，得僱傭工人和職員，并对企業中職工的任务分配作出決定。

企業經理有權決定對職工發通告，除非總條例中另有規定把此權利交予企業中其它人員。

工人和職員，當接到通知或調換工作的決定時，有權向企業管理委員會提出意見，管理委員會當作最後決定。

經理如認為管理委員會的決定違反了法令、法律條例、主管國家機關的計劃或指示，應立即把此情況通知高級經濟組織管理委員會或主管國家機關，并暫時延遲該決定的執行，直至高級經濟組織管理委員會或主管國家機關作出最後決定時為止。高級經濟組織管理委員會或主管國家機關應至遲在十天內作出決定。

如企業管理委員會不及時作出在其活動範圍內的有關決議，企業經理得採取完成計劃和正確經營企業的必要措施。經理在下次會議上，得向管理委員會報告其所採取的措施。

### **高級經濟組織的工人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和領導人**

高級經濟組織的工人委員會由所有聯合性的企業的工人集團根據其工人數字比例選出。

高級經濟組織的工人委員會由三十人至二百人組成。

高級經濟組織的管理委員會由五人至十五人組成，其中包括領導人在內。管理委員會委員至少四分之三必須是直接參加



生产，亦即参加各企业基本经济活动的工人。

高级经济组织领导人由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主席团、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或人民委员会委任之。

关于高级经济组织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选举办法、范围和活动，以及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将另通过特别法令规定之。

## 在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工厂<sup>①</sup>

铁 托

联邦議会在今天考虑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一个法令的草案——关于工人管理国家經濟企業和高级經濟組織的法案。这一法案的通过，将是联邦議會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行动，其意义仅次于“关于生产資料国有化的法令”。在国家接收了生产資料的时候，这还不能說是实现了工人阶级的行动口号——“工厂归工人”。“工厂归工人”和“土地归农民”的箴言，并不是抽象的宣傳口号，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箴言。它們包含着关于社会所有制、关于劳动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綱領。因此，如果我們是在真正地建設社会主义，那么这些名言是能够而且必須在實踐中實現的。

給予工厂和企業工人集团管理这些工厂和企業的权利的这一法案，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發展的邏輯結果。它是我国人民和政府坚决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实行的一系列措施的延續。實現这一法案的条件已經部分地成熟。每一天，我国工人集团都表示出它們的成熟性，表现出他們的高度覺悟，这种覺悟已由他們完成計劃任务的英勇努力表現出来了。为什么我国工人在竞相提前完成計劃任务时表现了如此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呢？因为他們懂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只能依靠他們，他們劳动的

---

<sup>①</sup> 1950年6月26日联邦議會通过了“关于工人集团管理国家經濟企業和高级經濟組織的基本法令”。在該法令通过时，联邦政府总統铁托發表演說，闡述这一法令的性質和在南斯拉夫發展社会主义的目的。

果实是由他們享受的。我国的劳动人民已經能够看出人民政府對他們具有充分的信心，并且关怀他們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国劳动人民是有决心克服他們工作中的最巨大的困难的。我国工人，正在作出这样的努力，正在出产大量的产品方面作出这样的努力和自我牺牲，正在用这样的气力建設着新工厂、新工程和新铁路，對他們的工作表现了如此巨大忠誠尽其全力通过实行新的更好的方法来改进生产資料。难道說这样的工人就不能够自己来管理他們的工厂嗎？当然，他們是能够管理的，而加入工厂、矿場和其他企業的新工人将会向他們的伙伴們學習的。

可能有一些人認為这一法案提出得太早了，工人是不能掌握管理工厂和其他企業的复杂技术的。凡是这样想的人，都是在欺騙自己，因为这种看法意味着对我国工人的不信任和对他們的創造能力的無視，这种創造能力通过对工厂的管理将得到發展。这一法令将为我国劳动人民的未来和我国整个社会开創新的前途。因此，这个法案的提出，不仅不是过早，而是晚了一点。晚了一些，是因为直到共产党情报局的不顧廉耻的決議公布以前，我們的党在接受和在我国实行在苏联所作的每件事情时存在着太多的幻想和太缺乏批判，即使这些事情是不适合于我国的特殊情况或違背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人們要求的是現成的食譜，由別人强加于我們头上，或是我們盲目追隨的<sup>①</sup>曾有过走阻力最小的道路的傾向。

但是在今天，我們自己在我国建設社会主义。我們不用任何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受馬克思主义科学的支配，我們走我們自己的路，照顧到存在于我国的特別情况。从他人那里借

---

<sup>①</sup> 这句话的含义是批評人們在对待苏联的一套时，只貪圖方便去搬弄，对苏联“强”要他們接受的东西也不进行批判。——譯者

来的已定型的思想，已使我們受害不淺，其严重后果今天仍然还能感觉出来。这些定型的思想已扎下了根，現在我国人民很难于清除它們，即使他們想这样作。在最后的时刻，我們采取了措施，从各方面結束这种实践。这就是为什么在發展过程中胜利一日比一日大的原因。馬克思主义科学的胜利实现的經驗，使我們能够与修正馬克思主义的行动作斗争，并为爭取真理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胜利而斗争。我們曾有机会看到馬克思主义科学如何照亮了最模糊不清的問題。凡是想理解馬克思主义科学和能够抓住它的精神的人，是不需要其他的权威的，不需要另外的导师的，不需要馬克思主义科学的代用品的，这种代用品只能使人們离开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

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人們大体上可以找到对于一切問題的原則性的答案。至于这些原理在个别国家的發揚和应用，只能由那些生长于該国、熟悉它的問題、它的历史、它的風俗、它的弱点和力量，亲眼看到在該国正在發生的事情同时又懂得馬克思主义科学的人們去作。这就是說，他們必須懂得它的精神，有效地使用它和将它付諸实现。在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混乱已达頂点的今天，在有条件發展社会主义但却受到外力阻撓的那些国家处于思想和政治混乱的时期中，比以往更加重要的就是不要違背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領袖們有勇气用他們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具有条件应用这一科学的国家能在实践中真正应用这一科学。特別重要的，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关系上应用这一科学，而不是讓它为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人們服务。在用非社会主义态度对待南斯拉夫問題上，苏联的領袖和受他們影响的那些政府正好是这样。



这一演說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駁斥种种指責或批評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同时还試圖概括地联系着这一法案來說明我們的道路是符合于馬克思主义科学的，来指出我們在該学說的基础所已获得的成就和进一步發展的前途。如果我提到由苏联領袖領導的共产党情报局对于我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誹謗，我只是在涉及对于馬克思主义科学作理論上的歪曲和他們国家中实际实行修正的馬克思主义时，在涉及各社会主义国家时才这样作。这是因为这样一种意見已在我国生了根：在苏联已經作过的事情是最好的和唯一正确的事情，只需要将它搬到我国来和在實踐中应用起来而不論其結果如何。然而，我們看出了这种对于时间的非馬克思主义观点，并且走了我們自己的路。

在談到我們的成就时，我这样作并不是为了要与苏联的成就比較，因为苏联無疑地在起初的 15 年到 20 年期間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就（虽然这还不意味着每件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我这样作是为了駁斥背信弃义的不誠实的和完全有害的批評和宣傳，这种批評和宣傳的目的是为了在我国国内在作什么这問題上欺騙全世界。迄今，我們已經通过了作为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一系列法律和措施。但是关于这些法律和措施却談得不多，文章也不多，因为似乎它們本身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沒有将这些事物在国外进行足够的宣傳，这对于我們是有害的，因为我們知道旨在抹杀有关我們的全部事实的共产党情报局报刊和电台广播的可怕喧嚷，正把全世界的人的耳朵都震聾了。

今天，苏联的領袖們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奴顏婢膝的所有領袖們正在瓦解我們的革命和我們的艰苦斗争。他們不仅否認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和我們在建設社会主义，他們还說我們是法西斯主义者。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来毀坏我們的声名。这只

是称得上戈培尔型的和其他人的法西斯代言人的最惯常的不道德的宣傳。我們可以預料，这种宣傳会在进行这种宣傳的国家中和对于我国的实况知之甚少的国家中造成一定的混亂。但是这种宣傳并不能改变我国的事务，因为它不能使我們去适合它。他們的宣傳永远不能使我們对于我們自己不忠实，或出卖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这些偉大思想家的学說。为了防止任何人会認为我們只能用空話来为自己辯护，我将列举最为重要的事实，来说明我們到目前已經作了什么、我国現在是什么样子和我国正往何处走。

第一、在解放战争期間，我們結束了作为侵略者的工具的旧国家机器，这包括：（1）行政机关；（2）維持資產階級統治的警察和宪兵；（3）以米哈伊洛維奇为首的流亡政府的殘余軍事組織，巴維里奇的軍事組織，和魯普尼克的白軍。我們是一貫按照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所規定的原理的精神来进行革命工作的，因为我們全部地应用了他們的学說。我們的軍隊無論就兵士說或軍官說，是一支新型的軍隊。它是由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組成的。它的指揮員，从兵士到將軍，全是参加了战争和人民革命的工人、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民兵和公安部队也是由同一类型的人組成的。国家管理机关是由工人、农民和自由职业者組成的，行政机关特别是如此。經濟部門的行政职位主要是由經過考驗的真正男女自由职业者、工人和农民来担任的，因此，可以說国家政权是掌握在我国劳动人民手中。

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可能說：这是不真实的，解放了我們国家的是紅軍。但是事实正好相反。事实証明：在战争时期，我們爭取实现解放战争的目标的革命工作受到了他們的阻撓。事实証明我国人民政府的基础是在 1941 年奠定的，而当时我們和在退却中的紅軍之間还隔着几千英里的路程。事实証明，我們自己

摧毀了統治階級——南斯拉夫的親法西斯反動資產階級——的軍事力量，在這方面我們的批評者們沒有給我們幫助，我們也沒有管他們的政策。事實也告訴我們，在紅軍于 1944 年秋季到達我國邊境以前，我們自己就摧毀了舊國家機器。事實也證明，我國人民把他們自己武裝起來了，这样就組成一支有 700 萬武裝起來的工农隊伍。在与占領軍和國內叛徒作決死斗争中，成千上萬的我国公民獻出了他們的生命。

第二、敌对行动停止后，我們立刻就宣布南斯拉夫为一个民主的、联邦的人民共和国。在战争时期，我們解决了民族問題，这就在我国消灭了民族压迫。这是由建立馬其頓、門的內哥羅、克羅地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斯羅文尼亞和塞爾維亞各人民共和國來實現的，这也是为此目的已奋斗了 20 年的共产党的工作的結果。我們如此徹底地解决了民族問題，因此我們不僅能真正作为民族問題尚未解决的國家的榜樣，而且也可以作为苏联自身的榜樣。因为在我国，各民族真正地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沒有由一个領導民族由外面强加到他們头上的行政機關。这完全是由于我們不承認有什么領導民族的存在。这是一件如此簡單的事，因此無需多談。我們很容易看出：在今日的苏联，領導民族对于其他民族意味着什么，它对于他族人民能有何等可怖的后果，他族人民被迫离开他們已經生活过數百年和上千年的故鄉，搬到气候和其它条件会致他們于死命的地方去。因此，我們有权利說我国是一切社会主义國家中唯一正确地解决了民族問題的一个國家。这就是說，我們是根据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解决了这个問題的。苏联境內对于各族人民的非社会主义态度和对待保加利亚、匈牙利、羅馬尼亞等等國家內的少数民族的不正确态度，都証實了这一点。讓希望作就地觀察的任何人，不仅到我国來觀察也到上述國家去觀察吧，去看看到底在

那里存在着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更不必说法西斯主义了），是在我们这里呢，还是在把这些事情都推到我们身上的那些国家中呢。

第三、在宣布共和国的成立和通过宪法之后，我们随即完成了为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奠定基础的历史性事业。国家把生产资料从私人资本家手中拿过来了；我们把一切工厂、矿场和其它企业、水陆运输工具、大庄园、贸易（批发和一切贸易）、旅馆、疗养院等等全部收归国有。我们把这件事作得如此彻底，所以在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或矿场或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机构是掌握在外国或本国资本家手中的。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关于假定外国资本家已经重新渗入我国的叫嚣，只不过是轻率的谎言和恶毒的诽谤。在联邦院对于使工人参加管理工厂、矿场、铁路和其它等等作出决定时，这将是对于一切诽谤者的最肯定的和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今后，我国劳动人民将在由他们管理的工厂和企业中发扬更大的创造力，这样来回答这些诽谤者。他们将说工厂和矿场到底是属于谁。

第四、我们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富农最多只能保留25公顷土地。从国有化土地土改时没收富农和教会的庄园和土地中，分配了70万公顷的土地给无地农民和贫农。

第五、我们牢记住：在像我们这样工业落后的国家中，若不创造必要的条件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把政权和生产资料拿到自己手中，并开始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创造条件。我们通过了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的五年计划。这真正是我们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正在胜利地执行这一计划。数以百计的新工厂和企业、新铁路、现代化道路、新学校和新科学研究机关等等就是明证。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呢，还是



社会主义呢？我們的其他某些法律意味着什么呢？例如对于一切違犯者均予以严厉懲罰的“禁止鼓动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和冲突法”意味着什么呢？任何法西斯国家曾經有过这种法律嗎？

此外还有“关于沒收在敌人占領区获得的利潤的法令”“私人經濟企業收归国有法”，“关于敌产交归国家法”（此地說的敌人，不仅仅指与德国合作的人，而且包括階級敌人），“关于敌产收归国有和实行沒收法”，“征用土地基本法”，“合作社基本法”，“在农村过渡到社会主义經濟基本法”，“土地改革和垦殖法”，“农業債務最后清偿法”，“职工及其家屬保險法”（他們全由国家来保險），“关于人民委员会法”（人民委员会是人民政权的基础），“关于五年計划法”。这些法律都是我們社会主义發展的先决条件。

几乎我国的全部法律都是根据这一精神制定的，并根据同一精神来实施的。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些法律也会使我国具有社会主义的特点嗎？当然是这样的，同时它們也是駁斥一切對我們国家的攻击和誹謗的事实。

这几件从历史上看是最重要的事实，都說明我国革命和我国社会秩序的性质。它們証明我們的道路是符合于馬克思主义科学的，是成功的，并且将取得胜利。当我說我們的道路是符合于馬克思主义科学的，我并不是說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和所有国家都必须走同样的道路。我們只是認為，在南斯拉夫这是唯一的道路。各不同国家的不同經濟、文化和其它条件，同样要求不同的形式。使用任何成方或固定的一套是不合适的。我們把馬克思主义科学作为基础，我們所要懂得的，就是如何在實踐中使用这一科学，使它的精神和它的意义获得生命力。我們在此科学的基础上取得的經驗是最好的学校。自然，別人也可使用这种經驗，但是当然不是在細节上。需要先看看在社会

主义国家中已取得的有益的结果，然后再寻找取得那些成就的最适当的方法。同样地也需要看看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消极表现，并尽力避免这些事情和寻找出避免这些事情的最好的方法。另一方面，当共产党人批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弱点和缺点时，他们必须基本上根据存在于各该国家的特殊条件来提出批评，而不是根据存在他们本国的条件来进行批评。他们必须指出这些缺点的根源，把主观的弱点和客观的弱点区别开来，然后批评该国的领袖们自己看不出和没有纠正的各种主观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我提出这种意见，以便我们不犯许多国家（不仅是东方国家，也是全世界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们所犯的同样错误。

一个政党——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在束缚其它政党的领袖的思想方面是成功了，这件事不仅对于工人阶级说而且对于全世界的整个进步运动说，都是一个大悲剧。他们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伟大的列宁的成就——的威信。当然和这事情有关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战前就在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发生了连续多年的危机。但是，那些人中却没有一个人去探求危机原因。由于工人运动的软弱无力，各国的领导者们都怀着日益加强的恐惧和尊敬去看待苏联领袖们所说所作的每件事情，这样便创造出了不可接近的权威和神像，就像在原始时代所作的那样。原始时代的人民不懂得自然法则，认为每件善事和恶事上都看某种神，所不同的是这些神是看不见的，而今天的神是能看得见和能说话的。他们期望在他人的刺刀下建立起来的威信给他们帮助。如果能够对于这些弱点进行一次大胆的调查，我们一定会发现，那些自认为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常常是纷扰的根源。已经证实的事是：在过去和现在，指令和固定的一套乃是全世界进步运动软弱无力的主要原因。这些“永不犯错误的”权威，正好是整个进步世

界正确發展的障礙，并使得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誤入了修正主义的歧途，从而削弱了世界的工人运动。

讓我們举我們自己的經驗作例子。當我們党从国外得到它应当作什么和怎样作的命令时，我們党是軟弱無力的，人数很少，被內部派系斗争攪得四分五裂，它不仅脫离广大人民群众，而且脫离大部分工人階級。但是，自从1936年起，国外的指示一旦减少之后，我們党立即开始日益更加迅速地發展，并且成为广大劳动群众的領導者。在我們准备起义时，我們沒有从外面得到指令，而是根据我們对于形势的估計来作，我們沒有受欺騙。我們沒有問过任何人是否应当起来与法西斯作斗争，而是根据我們自己对于形势的估計，在我們認為时机已成熟时，立刻开始与他們作战。1941年我們在烏茲希舍开始成立我們的人民政府时，很幸运地，我們当时与莫斯科沒有联系，因此我們能够奠下了我們現在作为依据来建設社会主义的第一批基础。當我們在1941年撤出塞爾維亞后，我們开始組織我們的無产階級縱队，并沒有請求什么人允許我們这样作（我們也不能这样作，因为我們当时与任何人都沒有联系）。在我們有可能把这件事通知莫斯科时，他們立即开始對我們已作的事加以攻击和批評。他們不願了解我們是在大多数重要地区都可能發生起义的情况下才組織無产者縱队的。他們不願意了解我們因此要更加強調工人階級参加起义和共产党在起义中的作用。我們的經驗使我們深信，沒有工人階級群众的参加和实行工人階級的自我批評，起义是不会成功的。工人——共产党员和青年，在縱队中的人数不少。工人階級把他們看作自己的突击队；他們和农民一起，就会决定工人階級的前途。并沒有像外国人所想的那样，这批評会吓住我国各族人民，正好相反的事情發生了。它使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具有更大的信心，使党在

共同的苦难中和人民更加接近了。我們并不在乎那种批評，后来的發展証明我們这样作是作对了。在我們筹备在耶拿召开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反法西斯理事会第二次會議时，我們也沒有請求什么人的許可，因为我們知道人們会在我們的路上布置障碍的，我們作对了。在当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和已完成时，我們將既成事实告訴他們。他們回答說，我們在他們背上插了一把刀。我国各族人民与古領軍和国内叛国的統治集团（即反动资产階級）作斗争完成了历史性的偉績——这种偉績乃是超人的努力的結果。这样，我們就保證了人民在战争中的胜利和取得解放战争的果实。可是他們把这称作在他們背上插一把刀子。在这以前和以后，也發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們根据我們自己对于局势的估計和时机的需要采取了更加重要的步骤。

作出这样的結論是完全錯誤的，即認為我們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不考虑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只有那些企图歪曲和按照他們自己意思来解釋，或者否認我国人民英勇的人們，才能这么說。当然，我們有时也采取他們的建議，而在某种程度上說，結果也是好的。但是我們有时这样作了却吃了亏，因为他們的建議不是为了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首先，我想对于我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实质作一个正确的評价。有什么新东西需要作理論上的解釋，或者有什么东西会否定馬克思主义科学在現阶段的正确性，或者至少在某些方面的正确性？当然，不是这样的。我們走向社会主义或者更恰当地說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实质可以用几句话下一个定义：我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于把馬克思主义科学应用于一定的場合，在于使它与存在于我国的特殊条件尽可能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对于我們說来，这一科学不是教条而是一个领导的工具，一个在一切具体情况下的方向，不論它是多么地复杂。



我們力求把这一科学的精神貫注到我們所作的每件事情里面去，因为我們深信这是正确的。实践已經証实：由于我們偉大导师的光輝的科学的預見，这一科学的各項原則都是正确的。在国际發展的現阶段，它們是完全适用的。在任何借口下离开这些原則，就意味着修正主义和不仅对于工人階級也是对于全体进步人类的叛卖行为。

就理論說，我們自己和苏联之間的区别在那里呢？即使要部分地回答这个問題，就必须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實質来考虑我們正在做什么和他們正在做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實質是：（1）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作用及其消亡；（2）党和国家的关系；（3）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或人們現在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阶段的問題；（4）国家或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問題。

讓我們首先来研究我国的例子。如同我在上面已經說过的，我們摧毀了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了新的人民的国家机器，沒有它，我国劳动人民就不能够把政权保持在他們手中并实现生产資料的征收和其它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胜利所絕對必需的許多革命行动。

列宁說：“無产階級必須有国家政权，集中的权力組織，強力組織，既用以鎮压剝削者的反抗，又用以領導極广大民众——农民、小資产階級和半無产階級来‘調整’社会主义經濟。”（“国家与革命”，“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182頁）列宁引証馬克思的話說，不应当忘記，“無产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国家”。

对于这个問題，列宁就是这么說的。資产階級需要的是什么呢？資产階級，剝削階級，需要国家作为一个把被剝削階級即大多数人民保持在屈从地位的永恒力量，資产階級是不想把国家机器削弱的，更不必說到它的消亡了，因为資产階級認為它的

制度是永恒的和最完善的。因此，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论它是如何用民主的幕帷伪装起来，和我们国家之间的区别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是少数人即剥削者阶级手中压迫人民多数的强力工具，并有增强其力量的倾向。在我们这里虽然国家有镇压剥削者少数和新南斯拉夫的敌人的责任，但它却在逐渐消亡，因为它的职能，主要是经济职能，正在逐渐地被转到劳动人民手中去。

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国家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当阶级已经消灭，在已经没有任何人需要加以镇压或者已经没有理由去镇压他们时，国家就会消亡。

在我国，这一消亡过程的起点在那些呢？我只举出下面的例子。第一、实行国家管理权的往下分权制<sup>①</sup>，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第二、把工厂和经济企业普遍交给工人集团自己去管理等等。经济的往下分权制以及生活方面的政治、文化和其他现象不仅是完全民主的，而且它不只内在地包含着中央集权制也包含着作为强力机器的国家的消亡的种子。这是事实，任何愿意核对的人都可以到我国来核对。

十月革命 31 年后的苏联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十月革命使国家有可能把生产资料掌握到自己手中。但是在 31 年以后，这些资料却依然还留在国家手中。“工厂归工人”的口号已经实现了吗？当然没有。工人对于工厂管理，依然没有发言权。它们是由国家任命的厂长，也就是说是由政府职员来管理的。工人只有劳动的可能性和权利，但是这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作用是没有什么大区别的。对工人说，唯一的不同就是苏联没有失业现象，而这就是一切了。因此，苏联的领袖们到现在还没有实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特点的措施，即把工厂和其它经济

<sup>①</sup> 原字为“反集中制”。——译者

企業交給工人，使他們自己來管理這些工廠和企業。因為蘇聯的領袖把國家所有制當作社會所有制的最高形式，他們還沒有把生產資料交給工人管理，或者就是由於他們對國家所有制持有這種看法的緣故，此外，這又是完全符合於加強他們的國家機器的觀念的。這也是事實，任何人都可以肯定這一事實，如果他們想要知道實情的話。

在談到革命後的 31 年，我們並不是要把經濟發展和為社會主義創造物質條件的遲緩速度作為我們對蘇聯的批評的主要目標。這樣作而不考慮到限制發展速度的一切因素，那將是不公平的和不正確的。首先，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認為只是在生產力發展到高的程度，在工業、電氣化和其它事物已如此高度發展以致它們的變為社會所有制成為必需的時候，社會變革即社會主義的必然性才會到來。我們知道：蘇聯政府繼承的是最為落后的工業國家之一；因此，就需要為社會主義創造已經存在於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條件。這是不能迅速達到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國家不能在它達到那種高度的工業化和為社會主義創造了一切必要的物質和其它條件以前，一直把一切職能（包括經濟職能）保持在自己手中。只有那些要修正國家消亡的學說的人，才能够這麼作。這些人也認為社會主義是一躍而蹴的事，認為在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之間可以畫出一條嚴格的界綫。我們是批評另外的一些事。首先，我們是批評妨礙蘇聯經濟迅速發展的管理方法，因為如果方法好一些，蘇聯經濟發展的成就在今天就要大得多。其次，我們是批評蘇聯的教育方法；第三，是他們對於大民族的作用的看法以及其他等等。

在蘇聯國家消亡的情況是怎樣的呢？（此地說的國家不是一個地理觀念或民族觀念，因為它不是與行政區劃吻合的）。在

苏联有将国家职能，經濟的或政治的，轉交給下級机关的任何趋势嗎？有实行往下分权制的任何征象嗎？到現在还一点都沒有。相反地，倒是有日益严格的中央集权制，而中央集权制則是最为露骨的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特点。这种中央集权制的最为明显的标志是：（1）集一切經濟、政治、文化和其它职能于一个中央；（2）一个龐大的官僚主义机器；（3）国家机器如民兵、內务部、內务人民委员会等等的內部武装力量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我可以說，到現在还依然無需考虑其消亡的唯一的国家职能就是军队，因为军队的扩大或縮小，取决于外部环境，取决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外部威胁，其社会主义和平建設和其生存遭受到威胁的程度。但是只能把这一职能当作保衛社会主义国家的手段，絕對不能用它去侵略任何人。它将丧失它的社会主义性質并且具有帝国主义性質，如果它要侵占他人的領土和鎮压他国人民的話。

这种中央集权制是最为鮮明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特点。列宁說过：“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集中的国家政权，产生于君主独裁政体崩坏时代。”（“国家与革命”，“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18頁）

苏联的这种中央集权制和發展的停滯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呢？它导源于苏联領袖們对于馬克思和列宁关于国家学說的解釋。斯大林对于国家的消亡有另一种看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說，国家在無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开始消亡。当然，这是說無产阶级应当是在各方面都真正当权。国家的这一消亡首先由“其經濟职能”、由生产者管理生产、由經濟职能逐渐从国家轉到工人集团开始的，不过这种变化不是跳躍的、突然的，而是逐渐的，以避免無政府状态。

“当任何一个必須加以鎮压的社会阶级已不复存在时，当一



个阶级对于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以及根源于现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单独生存竞争已不复存在，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过火行动也一并消灭时，那时就会没有什么必须加以镇压了，而用以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即国家，也就会再不需要了。国家将来以全社会真正代表资格所作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行动同时也就是它以国家资格所作的最后一次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关系的干涉，将由一部门又一部地成为赘举而自行混没下去。那时，对于人的管理便会由对于物的管理和对于生产过程的指导所替代。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恩格斯，“反杜林论”，英文版第308—309页；译文引自“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174页）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可是斯大林在1939年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了些什么呢？首先，他对于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公式加上了两个条件，他说：

“恩格斯的这个原理是不是正确的呢？”

“是的，是正确的，但只有在下面两个条件中某一个条件下才是正确的：（甲）如果仅仅从某国内部发展方面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而预先就撇开国际因素不说，并为了便于研究起见，把这个国度和这个国家看作是离国际环境而孤立的；或者是（乙）如果假定说社会主义已在所有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中获得了胜利，那时所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包围，而是社会主义的包围，而再也没有什么外国侵犯的威胁，再也没有什么加强军队和国家的必要。”紧接着他又说，国家作为“经济工作的组织者”的职能并没有变化，苏维埃国家没有内部职能，只有外部职能。他说：“这个时期（指苏联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底基本任务就是要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最后的余孽，组织文化革命，组织保卫国家的完全现代式的军队。于是我们的社会

主义国家底职能也因此改变了。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了，消亡了，因为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了，剥削者已不存在了，再没有什么人必须加以镇压了。”他接着说：“至于我们的军队、惩罚机关和偵探机关，那么他们的锋芒已经不是向着国内，而是向着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国家机关底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斯大林就是这样对待国家消亡的问题的，就是这样描述苏联在1939年的情况的。在1939年，人们可以真正说苏联是完全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的邻近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社会主义国家时，资本主义包围苏联的问题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说国家作为武装力量——不仅仅指军队，而且也指所谓的惩罚机关——的职能是向着国外，乃是脱离实际的說法，正如同这和苏联的現况没有关系一样。龐大的、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机器正在做什么呢？它们的职能是向着国外吗？内务人民委员会和民兵在做什么？它们的职能也是对外的吗？誰把数百万各族人民放逐到西伯利亚和極北方去？有誰能說这些都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措施呢？有誰能說整个民族是一个必须加以摧毁的阶级吗？誰在阻撓苏联国内的言論的斗争呢？做出这一切的，难道不正是一个与在逐渐消亡中的国家机器毫無共同之点的、最为集中的、最为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吗？在这里，斯大林有一点是对的，如果把他的话应用于现阶段，那就是这一国家机器真正具有关于外部世界的职能。但是也必须补充一点，即这些外部职能，对于某些国家是必要的，对于某些国家则是不需要的。——它們被用于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和反对那些国家的人民的意志。因此，这和一个在逐渐消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是毫無共同之点的，而倒类似一个爭夺势力范围和镇压其他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机器。

此外，斯大林是怎样提出党与国家的关系的问题的呢？在他的著作中，他从未确定党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他把党的作用降低到管理依然打上阶级社会烙印的国家机器的地位。因此，苏联的党越来越官僚主义化，日益成为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它的同一体，简直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是丝毫不足为奇的了。因此苏联的党失去了和人民的联系，失去了与它应当对之关心的那些事物的联系。党的职责是成为全部政治、文化和经济行动的组织和最积极的参与者，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对之进行监督，用其自身的榜样来提高群众的创造性热情。把党的作用降低成为执行种种措施的官僚主义机器的一个部分，成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这一切全是违背列宁关于党在第一过渡时期的作用的学说，党在此时应当是领导者、教育者，而不是执行者。这种陈套的观点也曾开始在我国生根，但是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并且将在我国对于这一类的东西进行严密的警戒。

苏联的领导者们是如何对待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问题呢？马克思主义从未提到要用跳跃的方式达到共产主义，虽然它曾提到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但是这是指逐渐实现到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整个过程。马克思主义曾提到在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后逐渐发展到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然而，苏联的领袖们却把事情说成这样，宛如他们将能够决定在什么时候应当被認為高级阶段——共产主义——已经达到了。这并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悲惨的事实，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莫洛托夫曾在1948年宣布他们正在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下面是马克思关于进入高级阶段所下的定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当那奴役人们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

經消失后；当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已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經不单单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為乐生的第一要素时；当生产力已隨着每个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泉源都盡量涌現出來时——只有那时，才可把資產階級的法奴底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哥达綱領批判”，見“馬克思選集”英文版第566頁；中譯文轉引自“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243頁）

共产主义高級階段的面貌就是如此。苏联离它还是很远很远的，当然我們也是一樣。

有人認為生产資料的管理問題，只要任命最优秀的工人担任厂长和經理就可以解决。这样一个措施是一件好事情，因為我們把我們能够信任的人，劳动人民的国家能够信任的人放在这些职位上。通过这种由劳动人民自身的队伍中选拔出來的工人厂长，人民的国家能够对于企業的管理进行更好的監督。这样的厂长也能够更好地了解工人的需要，并将关怀这种需要，他也会很好地照料国家的即人民的財產。这是有关国家接收了生产資料方面的最迫切的措施。但是，当然事情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如果我們想避免在一个长时期內可能由此产生的許多不方便的事情。这是一件事情。第二、“工厂归工人”的口号还没有实现，同时国家經濟职能消亡的思想，也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实现。

如同我已經指出过的，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法令的草案，对于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进一步發展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但是，它依然沒有解决問題。它只不过是向共产主义走近了一步。国家在管理經濟方面的各項职能，並沒有完全消失，不过，它們已不是排他的因素。它們變得越來越弱，因為劳动人民被



吸收参加了管理。劳动人民是逐步地而不是一下子被吸收的。这就是說作为生产者，他們正在取得他們管理生产的权利。为什么要逐步地而不是一下子做好这件事情呢？这一逐渐的过程会延續多久呢？还不能对于确切的实践作出答复，因为这是由許多条件决定的，这取决于文化發展的速度，也就是說，对工人进行广泛的教育，使他們能够为社会的利益在各方面成功地管理工厂、矿場、运输和其他等等。沒有文化，工人就不能够对生产保持监督。沒有文化的提高，工人就不能够获得管理方面的充分技术知識。这还决定于生产力發展的速度以及其它等等。

劳动人民这方面文化的提高，在我国是極其重要的，并且是我国的最困难的問題之一，因为就生产力發展的程度而言，我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工業剛剛开始迅速發展。因此，經濟管理的所有职能轉到劳动人民手中的速度是取决于生产力發展的速度，而生产力發展的速度又取决于工人自己，取决于他們对消費品的生产以及他們厉行节约而不是浪费以及其他等等。列宁說过：“当一般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極大困难，奋不顾身地設法增加劳动生产率，設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鉄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是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是归他們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开始了的时候。”（“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2卷第598頁）

为什么我把文化提高的必要性摆在第一位呢？如果我們看看旧南斯拉夫产业工人的数字，今天产业工人的数字以及明天产业工人的数字，那么，就不难猜出問題的关键所在。今天，是誰正在进入工業和其他企业呢？农民。因此，今天有大量的农民、半农民和半工人进入各項企业，首先，必須把他們訓練成工人，然后把他們教育成工人厂长。这既不是一件短时期內能完成的工作也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这是必需以最大的严肃性、

耐心和精力来进行的工作。在教育这些新工人方面，我們要做不少的工作来清除有关他們作为工人的責任方面，他們同国家即人民的财产的关系方面的种种非工人的思想。

讓我們单单考虑这一事实：我們是在我国最落后的地区，如波斯尼亚、桑德查克、馬其頓、柯索沃和麦托希亚、里卡、門的内哥罗等等地方，建設許多工程，甚至是最大的工程。到目前为止，在这些地区，只有很少的工業，或者沒有工業。是誰將要在这些工厂、矿場和其他企業中工作呢？是来自这些落后地区的人民。这些落后地区貧苦的农民，要到这些工厂和矿場去工作，而且他們是会这样做的。他們将从数世紀以来过着最低的文化生活和物質生活的貧苦农民变成为有觉悟的工人，变成他們自己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的建設者。这将不会是一个容易的或迅速的过程。我們懂得这一点，因为我們对于把一个半农民和半工人訓練成为有觉悟的、有紀律的產業工人是多么艰巨的一件事情方面，已經有了很多經驗。必須作出巨大的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也必須向这些半工人說明，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中，他們将不仅成为工業、矿业等等的生产者，同时，也将成为生产資料的所有者。必須告訴他們，他們在进入工厂、矿場和其他企業的同时，也就成为这些企業的所有者。他們的那一小塊貧瘠的土地永远不能使他們过一个真正人所过的生活，而能使他們过一个比他們的祖先們好一些的生活的，是工厂、矿場和其他企業。为什么必須把半农民和半工人变成有觉悟的產業工人呢？这是需要的，首先，这种需要性是由于我們正在建設許多工厂和企業，愈来愈多的矿場要开工，簡言之，我們正在使我們社会主义国家工業化，使它更加富庶，使我国全体公民能享有尚未開發的財富，以便使人民能够利用这些富源等等。为了使这些工厂、矿場等等能够开工，我們需要能够掌握新技术的工人。

半农民是不能够掌握这种现代技术的，他们想到他们那一小块贫瘠的土地的时候，比他们想到已经不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是全社会的社会财产的现代生产资料的时候多得多。这些生产资料已经不再是由资本家或由他们的待遇丰厚的职员和官僚们来管理，这些职员和官僚们只关心资本家的利益和从工人那里榨取最多的利润交给资本家，当然，这些官僚们也因此分得一些利益。在我国将只有工人管理这些工厂和矿场。他们自己将决定如何进行工作和工作多少时间，他们会知道他们为什么工作，他们的劳动成果是如何使用的。为了在全国各地实行这一制度，我们必需坚持地工作来克服我国的落后，帮助半农民提高到有觉悟的产业工人的水平，他们将懂得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责任和权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落后国家中，例如在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是存在着巨大困难的。那么，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是否要等到全体工人都成为同样地聪明和能够管理企业的人呢？当然不是的，因为这样就要等待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在管理的过程中，在劳动和管理企业的不断的过程中，全体工人都将取得经验。他们将不仅熟悉工作的过程，也将熟悉企业的一切问题。只有通过实践，工人才能学会使用记录，学会他们可以使用和节省多少原料，知道他们如何使用剩余的劳动。他们将看到他们企业的积累中有多少应当归入计划的总积累内，和他们能把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多少。他们必须懂得他们能将劳动生产率提高多少，和提高的速度如何。他们将无条件地需要熟悉劳动纪律，因为从劳动人民把参加经济管理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刻起，劳动纪律的问题就成为他们首要的责任问题。

特别重要的是，工人委员会必须使劳动力的分配尽可能合理，不要让不必要的和非生产的工人呆在工厂里而不做事情。

这就是說，它們应当精簡管理机构和减少官僚主义，因为，否則他們就会抬高生产成本和降低它們企業的利潤，从而損害了他們整个工人集团的利益。必須学会区别对于专门人材的需要和多余的、非生产管理机构之間的差別。

把工厂、矿場等等交給工人管理，我們就使得一种名叫官僚主义的傳染病不能在我們这里傳播。这种傳染病是令人难以置信地、輕易地、迅速地从資產階級社会带过来了，而且，在过渡时期中它是危险的，像水螅一样，它的触鬚从各方面障碍和阻撓正确的和迅速的發展过程。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之一，这是恰恰由于它偷偷地渗入了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活动，人民在开始的时候还觉察不出来。認為官僚主义在我国不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想法是錯誤的。它已經鑽进各个机关、国家机构和經濟部門中去。但是，我們知道了这一点，并且已經采取了一整套的措施使它的渗透成为不可能。单单只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定期运动是不够的，必須展开經常的斗争和教育人民。

列宁曾說，技术和文化的落后是官僚主义滋长的最肥沃的土地，但是“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进行到完全胜利为止，只有在全国人民的参加下才是可能的。在資產階級共和国中这不仅是不可可能的，而且还受到法律自身的阻撓。最好的資產階級共和国，不論它是如何民主，也有数以千計的法律障碍阻止劳动人民参加管理工作。除了法律以外，还有不能从属于任何法律的文化水平。低的文化水平使得苏維埃——苏維埃根据它們的綱領应当是通过劳动人民来工作的管理机关——实际上成为通过無产階級的先进部分而不是通过工人群众来工作的工人的管理机关”（“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4卷第145頁）。这是由于列宁所說的文化落后的結果，管理工作的官僚主义化的根源也在于此。



从列宁的話，我們可以看出，官僚主义在落后現象普遍存在的地方是最容易生长起来的。這些話，向我們指出我們应当在哪儿寻找官僚主义的根源。难道这不是証明：官僚主义最盛行的地方，就是人民还没有認識到他們有制止和同一切官僚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权利的地方，就是人民还没有認識到官僚主义对社会主义是有害的东西的地方嗎？单靠上面的命令是不能够根除官僚主义的，每一个有觉悟的人必須在日常实践中与它进行斗争。認為官僚主义只会在高級机关得到發展而难于渗入下層机关，这看法是錯誤的。如果不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它是能够渗透到最基層的国家行政机关和經濟行政机关去的。当然，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說来，如果从最高級的机关到最基層的机关都沾染上了官僚主义，如果领导机关和最高执行机关看不出和不願看出官僚主义的危害性，那么这将是一个悲剧。为了成功地消灭官僚主义，单靠在上面和最高机关中采取措施而認為在下面没有这种危險，这是不够的。我們的經驗向我們指明，它在下面也是很危險的。因此在加盟共和国、地区、县和市的行政机关中，在各种商業和其它經濟机构的管理工作中，官僚主义都是危險的。我們必須在群众的帮助下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不能讓这种对社会主义有害的現象蔓延开来。

今天，在不只是国家管理而且整个經濟都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时候，人民必須对那些被任命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們进行監督，使他們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而履行他們的职责。将要管理工厂、矿場等等的工人集团和工人委员会，有着非常重要的任务使官僚主义方法不能够在管理中使用开来。

### 工会的作用

在工人階級参加管理的新情况下，工会的作用有了某些改

变。现在它们的职能主要是朝向工会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劳动人民的训练和全面提高文化。工会工作的目标应该通过其不断的努力并在党的领导下，帮助新的工人，即以前的农民，使他们尽快摆脱“小私有者”的习气迅速地进步到对生产手段、对工厂、矿山、社会所有制、和对工作有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关系的最有觉悟的工人的水平。必须尽快教育这些新工人，使他们成为不倦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这个社会意味着全体劳动人民将有更美好的和更幸福的生活。

就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或生产管理而言，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削弱。现在，工人们自己通过他们的委员会即通过生产管理委员会来决定这些事情。这也促进了工会的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必须保护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必须照顾到人民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工人逐渐熟悉生产的过程及其全部问题包括积累、生产成本以及过去厂长或者先前的管理委员会和工会不得不单独来解决的各种困难问题，工会的工作也就比较容易做了。无论如何这将大大有助于巩固工厂、矿场和其他企业的劳动纪律。

这一法案表明工人用最民主的方法接收管理的职能。工厂、矿场和企业的工人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工人委员会。这些工人委员会及其委员们所选出的管理委员会，必需得到工会的全力支持。要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管理委员会也必须包括该企业职工工会的代表者。它们因此也负担起它们应负担的管理责任，而不是作为没有任何职权和职责的谘询机构。

这一法案，是在我国提出的最为民主的法案之一。它的实质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让我们单看看工人委员会的职务和权利吧。第二十三条说：“企业工人委员会：批准企业的基

本計劃和最后帳目；對企業管理和完成經濟計劃作出決議；選舉、罷免和撤換企業管理委員會或其個別委員；在高級經濟組織或主管國家機關的同意下，擬定企業各項規則；討論管理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並對該報告作出決議和批准；討論管理委員會的各項措施，並對此作出決議；把交出企業亦即工人集團處理的那一部分積累，進行分配。”

第二十七條講到企業管理委員會的職責：“企業管理委員會：提出對企業基本計劃的建議；擬定月度執行計劃；注意企業的經營是否正確；擬定有關企業的国际組織的計劃和關於職業分類的建議；草擬企業的規則和條例，並採取措施提高工作紀律；決定企業行政人員的任命事項；對職工提出有關僱傭、解僱和職位分配上的申訴作出決定；採取措施來提高企業生產，特別是改進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改善產品質量、節約和減少浪費；決定有關企業的工作定額問題、決定誰該被稱為突擊工人，並對工人發明家的建議作出決定；採取措施來提高職工的技术，並正確分配職位；注意有關企業勞工關係、薪金、工資、提升職工、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險、企業職工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條例的正確實施；討論和通過年假計劃；採取措施來保護和正確利用企業管理下的國家財產，並消滅和防止對國家財產的損壞、浪費和其它不良的表現。

企業管理委員會負責完成計劃和正確經營企業。

此法案的這兩條，說明何種生產職能被轉到工人集團手中去。這些職能從前是由國家主管的並且通過它的代表人并由工會在某種程度上的參加下來執行的。

從現在起，生產資料——工廠、礦場、鐵路——的國家所有制將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較高形式。國家所有制是社會所有制的最低形式，而不是像蘇聯領袖們所認為的那樣是最

高級的形式。這就是我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且是有關國家經濟职能消亡的唯一的正確道路。讓共產黨情報局分子記着吧，他們誹謗性的叫囂，是不能蒙蔽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性的。

另一方面，這一關於工人集團即勞動人民參加我國經濟管理的法案，對於在哪里有真正的民主的問題——是在我國呢還是在大肆贊揚和歌頌的西方民主國家呢——乃是最好的回答。在我國民主是建築在廣大勞動人民享有的物質基礎上。群眾感覺到他們正在使用這個民主來為我國全體勞動人民建設美好和幸福的將來。對於那些大談我國沒有真正的民主，說我國是一個警察國家等等，以及常常喜歡談論我們缺乏物質和我們缺少的東西的西方人士，這就是一個回答。誠然，我們還缺少許多東西，因為我們還不能夠生產製造這些東西的工具，還不能夠生產足夠的消費品和足夠的其他使人民生活改善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東西。但是，我們是正在達到這一目標的道路上前進，而且我們將會這樣做，但不是像在西方那樣僅僅是為了少數人。在西方，商店里堆滿了東西可是人民只能希望有這些東西，這有什麼好處呢；在那里誰能夠滿足他們自己購買這些東西的願望呢？只有很少數的人。統治階級可以滿足自己的欲望，而大多數的勞動人民都不能這樣做。因此，那是一種少數人的民主，因為吃不飽的勞動人民或失業的工人和職員是不能享有這種民主的，這種民主剝奪了他們的勞動果實，使他們能夠生活下去僅僅是為了他們能夠供養其他身強力壯的人並保證這些人能過富裕的生活。但是，我們勞動，是為了使所有勞動的人能享有勞動的果實，這就是我國民主重要的實質。

我們明白，直到我國工人克服了由我國的落后所產生的一切困難時，我們的困難是不會小的，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我



国工人将克服所有这一切困难，因为他们懂得社会主义建设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而且，只有依靠他们自己的坚持的、自我牺牲的创造性努力，这一切才能实现。

我国人民政府，从开头起，就对劳动人民和我国全体人民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在这里，所做的和建设的每一件事情都只有一个目的：使我国工人更愉快，给予他们更好的生活条件。城乡工人自己就是现在和美好的将来的主人。美好的将来，（那时人民再不需要像目前这样努力去干）什么时候会来到，取决于城乡劳动人民自己，取决于他们的坚韧性，自我牺牲和忍耐力。这取决于他们如何辛勤地劳动，取决于更少的人袖手旁观，取决于每一个人对于争取实现五年计划的日常斗争、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生产最好的消费品作出他自己的贡献。已经管理着自己的合作社的农民们和从现在起行将自己管理工厂的工人们，今天已经真正地把他们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了。

## 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新章程

(在 1951 年 10 月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修正通过)

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一切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群众性的、自願的組織。

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做为工人阶级的一個組織，繼承了南斯拉夫革命工会运动的傳統，曾經在为爭取工人阶级的社会权利和解放的斗争中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它在反对旧南斯拉夫資本主义的剝削和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长期斗争中，同时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过程中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成长起来。

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通过团结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并使他們积极参加經濟、社会和政治活动，目前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發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它是劳动人民学习管理国家和經濟事务，以及管理全民财产的一个学校。目前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正在执行它的权利来直接管理經濟和其他国家与社会部門的生活。

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主要任务是：

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工人阶级，并致力在政治上、文化上以及經濟和技术問題上教育工人阶级；

致力加强和巩固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团结，保衛、加强和进一步發展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之間的平等关系、兄弟友誼和团结；

致力加強和發展工人的自治，幫助工人管理機構進行工作，推動和動員工人階級為了進一步發展我們國家的生產力和完成經濟計劃而鬥爭；

關懷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以實現、保護和保持他們的權利；

以無產階級團結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階級，充分擴展和其他國家工會運動的相互關係，盡力覓求世界上一切社會主義和民主力量之間的最廣泛的合作，反對國際關係中的壟斷主義和爭權獨霸，為工人運動的平等和全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與平等合作而鬥爭。

### 一、南斯拉夫工會聯合會的組織原則和結構

1、南斯拉夫工會聯合會是在產業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工會所組成，它包括同一個或有關的經濟部門、國家機關或社會服務機構的一切工人。

自由職業者協會和團體可參加南斯拉夫工會聯合會，在參加以後，他們享有和工會一樣的同等權利和義務。

2、南斯拉夫工會聯合會的會員單位負有如下的義務：

甲、接受和執行本會章程以及本會的代表大會和中央理事會的決議；

乙、積極參加執行本會的任務並鼓勵其單位和會員為此目的的实现而努力；

丙、定期向本會中央理事會和其他機構按規定數目繳納會費。

3、南斯拉夫工會聯合會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來，這反映在一切工會職位的選舉上、負責人有意義向其會員報告他們的活動、下級機構有意義執行上級機構的決議、少數有意義

执行多数所通过的決議。每一个工会組織和領導在決定他們工作範圍內的問題上享有獨立性。

4、工会机构和人員的选举由秘密投票进行，分別对每个候选人进行投票。每个工会會員和代表有权提出候选人和批評候选人。

5、代表大会和大型、小型會議的一切決議和結論由到会的代表或會員的多数票通过。

6、工会組織、工会理事会和工会委员会应相互合作，他們对其他机构負有責任和义务。

7、本会設立下列机构对所屬工会組織进行指导：

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領域範圍內是：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全国代表會議和中央理事会；

在人民共和国的領域範圍內是：人民共和国工会代表大会、共和国代表會議和共和国理事会；

在自治省(或地区)中是：自治省(或地区)工会代表會議和省(或地区)理事会。

### 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

8、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是本会在相应的領域範圍內的最高机构。

9、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各人民共和国工会代表大会和省(或地区)工会代表會議每三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的召开和議程必須至少在开会前一个半月公布。

区(或地方)的工会代表會議每年召开一次。

10、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由其所屬工会在他們的代表大会、共和国代表會議和基層工会會議中选出的代表以及各人民共和国的工会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选出的代表所組成。



代表名額按照該工會會員人數的比例選舉出來。除代表以外，還選出一定數目的后補代表。

南斯拉夫工會聯合會中央理事會有权決定多少會員產生一個代表并決定后補代表的名額。

11、人民共和國代表大會由共和國工會代表會議和地方工會代表會議選出的代表所組成。

共和國工會理事會有权決定該共和國多少會員產生一個代表。

12、省(或地區)工會代表會議由區(或地方)工會代表會議選出的代表所組成。

區(或地方)工會代表會議由基層工會和地方工會代表會議選出的代表所組成。

13、未被選為代表的理事會理事得以諮詢者身份出席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

14、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當選代表出席的話，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議當為有效。

15、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審查相應的理事會的各項報告并做出有關的決議；對其領域範圍內工會組織的工作做出決議和指示；選舉理事會和監察委員會并決定這些機構人員的名額；對提交的請求和批評意見做出決議。

16、如相應的理事會提出要求，或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會員的組織提出要求，得召開臨時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

當此要求提出后，臨時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必須在兩個月內召開，如果在此期內相應的理事會未能召開臨時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時，提出要求的工會組織有权自行設立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在召開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問題上享有和理事會同等的權利。

## 全國和共和國工會代表會議

17、南斯拉夫工會聯合會中央理事會和各共和國工會理事會為解決各項重要問題，得召開全國工會代表會議和共和國工會代表會議。

出席全國代表會議的代表由各共和國工會理事會全體會議選出；出席共和國工會代表會議的代表由該共和國工會委員會全體代表會議和工會理事會全體會議選出。

## 工會理事會

18、理事會是在一定領域範圍內的工會聯合會的執行機構。在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閉會期間，它指導工會聯合會的工作並向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負責。

19、理事會由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選出。

如理事會理事因死亡、辭職或被開除會籍，理事會在其全體會議上得另選人代替。以此方法改選的理事會理事，其數目不得超過原代表的四分之一。

20、理事會從其理事中選舉一個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代理理事會指導工會聯合會的工作。理事會如認為需要，得選舉一個書記處來解決組織上和執行上的各項日常問題。

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共和國理事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根據需要隨時集會。省、地區和地方工會理事會每年至少召開四次全體會議。

理事會的內部組織（如設立部、委員會等）由理事會全體會議決定。

21、理事會代表工會聯合會同國家、經濟及其他團體發生關係。

中央理事会代表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同其他国家的工会运动及国际组织发生关系。

### 监察委员会

22、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选出一个监察委员会，它的任务是执行、监督和审查本会的一切财务和物质措施，并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提出报告。

监察委员会选举主席一人。

## 二、产业工会

23、产业工会一般包括下列机构：

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领域范围内有：工会代表大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

在人民共和国领域范围内有：工会代表会议和共和国委员会。

在省、区和城市内有：省、区和地方工会代表会议，省、区和地方委员会。

在企业、工作场所、车间、机关和办公机构等有：基层工会代表会议和基层工会执行委员会。

24、产业工会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

25、产业工会最高机构为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选举一个中央委员会，它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指导工会的工作并向代表大会负责。

代表大会还选出一个监察委员会。

26、产业工会委员会代表工会同国家、经济及其他机构发生关系；中央委员会代表工会同其他国家相应的工会发生关系。

27、各产业工会的组织 and 任务由其代表大会根据此会章的

精神所通过的章程規定之。

### 三、基層工会

28、工会的基層組織为基層工会。

基層工会在产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每个企业、车间、工作场所、机关、办公机构等只有一个基層組織。

如情况需要，工会章程得例外規定其他方法建立基層組織。

29、工会會員在参加基層組織后得享受权利。

30、工会會員应遵守本会会章，执行工会领导的一切決議，积极完成工会的任务并定期繳納会費。

工会会費应每月繳納。

31、工会會員有权选举和被选举担任一切工会职务，参与做出決議和批評上級领导的工作，享受工会事業的福利并可將一切問題向其工会組織提出。

32、工会會員如严重地損害社会主义集体利益，或其行动严重地危害工会組織的工作和發展，將受到开除的处分。

开除會員的決議由基層工会會員會議做出并需由共和国工会委员会批准后才有效。在共和国工会委员会批准以前，該會員得保持其在工会中的一切权利。

被开除的會員必須將其會員証交还基層工会执行委员会。

33、开除会籍是最重的处分，因此对一个會員的控訴和其罪恶行为必須經過徹底的和認真的調查和証明，一切开除会籍的決議必須附有清楚的詳尽的事实說明。

34、被开除的會員可向其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进行呼吁，但这种呼吁并不約束決議的执行。

35、在工会組織的建議下，或在被开除的會員自己的要求下，或在另一个工会會員或工会团体的要求下，被开除的會員可



以重新加入工会。

重新加入工会的決議由基層工会做出并由共和国工会委员会批准后才有效。

#### 四、經 費

36、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的經費来自工会会費和其他收入。产业工会經費来自入会費、会費和工会事業的收入等。

入会費和会費以及各工会向中央理事会和其他机构上繳的会費数额由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决定。

#### 五、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同其他組織的关系

37、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承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領導作用，接受它的綱領，并为此綱領的实现而斗争。

38、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南斯拉夫人民陣綫。

39、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的組織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其他群众組織进行合作。

#### 六、最后条文

40、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起草、通过和修改会章。

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有权解釋会章并根据会章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对会章內所未包括的一切問題做出決議。

## 工会和政党

(原载“南斯拉夫工会”1953年第1期)

尼古拉·烏亞諾維奇<sup>①</sup>

在我們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現行情况之下，工会是工人阶级独立的、群众性的組織。工会独立的解决一切有关其工作的問題。制定自己的綱領，并为其实现而斗争。共产党员作为工会会员而且当然也是作为劳动人民之中政治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因为假如他們不是这样的话，他們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员），积极地参加工会工作，致力于使工会組織尽可能正确地制定其任务与綱領，使它們坚决地为实现其任务而斗争，而且还以他們的教育活动和榜样影响其他工会会员。然而，他們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联盟所委派的政委，而只是以他們个人的优点与努力所应起的作用来影响工会运动的工作和政策的普通工会会员。

由此，我們可以說，工会联合会的章程<sup>②</sup>中所包括的有关工会綱領的一項規定<sup>③</sup>，現在已經过时了。根据該規定，工会接受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該規定已不复能令人滿意了，因为它只能引起混乱和誤会，而且也不符合事情的真实情况。当然，这不意味着現在工会的綱領可以与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相反（虽然即使是相反，任何地方都不能予以禁止）。工会的綱領不能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相分歧，理由很简单，二者都有同样的出發点和同样的目的：建設社会主义的、不是别的只是社会主义的

① 本文作者是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書記。

② 指1951年通过的新章程。

③ 指新章程第三十七条。

民主国家。这是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工会的綱領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包含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工会的同样的活动中。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工会一定要自动地采取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相反地，工会采取这个綱領中所包括的最主要原則，独立地通过自己的綱領。这并不是因为它们被迫要这样作，而是因为这些原則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当然要工会得到这样的結論，認為它們真正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符合更进一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發展的利益，因而，也就符合于工会自己的理想。

这是某些西方的工会工作者不能了解的事情的一面。这些人还以工会联合会章程中某种形式上的規定出發来看問題。章程上的規定有一种宣言的性質，而且也不再十分适合于我国的社会实际情况，因为我国的社会实况改变得比各种章程和章程中的某些个别規定快得多。甚至于在过去，当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很大的範圍內直接管理社会生活中的各方面时，这个規定也不符合我們的实际情况。

那些人以純形式主义的观点来看的这个規定，其实并不妨碍南斯拉夫工会的自由行动，并不妨碍它自由地制定自己的政策。这个規定只反映了一种思想象征而已，那就是工会，像共产主义者联盟一样，要坚持爭取建設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斗争。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关系，我們也要記住，共产主义者联盟帮助我們劳动人民創造、建立并巩固其工会运动。在这过程中，共产主义者联盟就在工会运动中打下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思想标志，并使工会蒙受了为建設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而斗争的革命坚持性。在我們革命胜利之后，我国基本的有組織的革命因素就是共产主义者联盟和人民軍。那时，还需要建立新的政体，要恢复和建立工会，并要建立起工人的管理机构。共产主义者联盟直接創立或帮助劳动人民創立了他們的自治机构、他們的經

济管理机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机构。现在，既然这些机构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自己站立了起来，共产主义者联盟就废除一切直接管理的组织形式，而只保留思想和教育指导的作用。

無論在过去或在现在，西方各国工会的情况都是不同的。在某些国家，在工人的政党产生以前就已成立了工会。在其他一些国家，至今为止，还没有成立工人的政党，只有工会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政党的作用。因此，假如希望工会在那些国家的发展和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中走同样的道路，希望他们的工会和我们的工会起同样的作用，那简直是沒有意义的。由于这是两种相反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上面的說法就更無稽了。况且，工会不能在某种暖房中发展，不能脱离它们所在的社会制度。甚至在一种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制度)的体系内，也不可能为一切工会规定同样的政策，因为各国工会的情况与任务有很大不同。

某些西方的工会工作者和政治工作者，因为他们不了解(或者是不想了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工会之间的关系，把南斯拉夫的工会說成是一个政治组织，不能脱离共产主义者联盟而自行独立，只是听取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命令等等。然而，事实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只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密切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是不分誰高誰低的，沒有人發命令，也沒有人听取命令。工会在自己的会员中討論后，独立地制定綱領，制定自己的政策和通过自己的决定。

讓我們看一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里原注：我們不打算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批評家們进行討論，因为他们道义上已完全名誉扫地，我們認為沒有必要来回答他們的誹謗)这些国家的工会是否与政党合作？这些国家的政党是否使工会受到任何影响？当然是有的，而这是很自然、很合乎邏輯的。



然而，这并非工会要这样作，而是政党要这样作，因为政党为了要争取人，为了要影响人，于是，也就要为了影响作为劳动人民的群众組織的工会而斗争。因此，西方的工会也与这个或那个政党合作，也被这个或那个政党，或者几个政党所影响。为了说明这点，举几个例子就够了。在英国，工会不仅与工党合作，而且他們本身还属于工党（工会会员不管个人愿不愿意，都通过工会属于工党）。同样地，在西德、瑞典、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也使工会受到很明显的影晌。

是的，在某些西欧国家里，社会党或多或少与资产阶级的政党共同起着影响，但是，工人的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划分对工人阶级的影响，难道是工人应为之奋斗的理想嗎？我們并不认为如此，不只是西方的工人，而且这些国家中很多工会工作者也不认为这是他們的理想。他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得已的弊病，是一部分工人阶级觉悟不够高所造成的結果。我們不能不对我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感到驕傲，在我們国内，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对于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妥协的事实感到驕傲。在我国，对社会主义的热望和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斗争，是紧密地、坚固地联系我国劳动人民广大群众的因素，对此，我們也感到驕傲。

我們了解西方的这种情况，因为我們知道，在一定的發展阶段上或在一定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工人工会运动至少在最低劳工綱領上的团结，他們不得不作各种妥协。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們认为他們很少有理由对于像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国家和像在南斯拉夫的这样一个工会运动提出异議，因为南斯拉夫，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已走在前面，并在較高的水平上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团结，这种团结的基础是一个更高的綱領——这个綱領廢除人剝削人、一个阶级剝削另一个阶级和一个社会阶层剝削人民的制度。

## 工会应当照顾个人的利益， 也要关心集体的利益

(原载“南斯拉夫工会”杂志 1954年8月号)

铁 托

对于工会目前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还是十分缺乏了解的。还存在着不少陈旧的看法和观念，还不知道工会应当在什么地方进行工作。认为工会是一个运动的意见，仍然流行。但是，工会不是一个运动。在社会主义社会，公社正在创建中，工人自己管理着企业——因此，你不能说工会是一个运动。在我们使用工会运动这一名词时，这就包含着它也是一个政治运动的意思，而事实上，只有在谈到以前存在过的制度我们才能说工会运动是政治运动。工会现在已改变了它们的性质，因此也必须改变其作用，因为不论我们是否愿意，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我们的新制度下，工会要保持先前具有的组织机构，那是荒谬的。

在今天，我国工会已不是拥有独立政策的一种组织，因为工会是在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之内推行它们的政策的，也就是说工会与我国劳动人民的其他代表一同参加该联盟的工作。在这方面，工会应当开始有所改变，它们把它们的活动深入到下层去，因为它们的主要地位是在公社内、在企业内以及其他等等。

就联系和监督工作以及消除各种误解的工作等等说，这一切实在都是教育工作。我在这里说的教育工作，并不是指对人进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因为谁也没有给他们这样的任务。我指的是应当教会人民管理国家，教会人民对于我国经济 and 工人集团中的地方主义倾向保持警惕性，务必使这些倾向不

再發展而是逐漸消滅。在今天，這就是工會的基本工作。工會必須照顧個人的利益，但也要考慮社會的利益。它們必須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工人集團身上，但也不應當忽視整個社會。因此，在今天，工會不是站出來與某事或某人進行第一線的鬥爭，因為當企業的管理權掌握在工人手中時，工會應當起來反對誰呢？工會必須作的是與生產本身的各种缺點作鬥爭，是教育和教導工人等等。工會是我們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它們不是一個推行自己的特殊政策的政治組織，而是勞動人民社會主義聯盟的一個成員——由於其組織任務和結構，它是可以促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一個成員。這就是工會的基本任務。

關於這一點，我覺得有必要較仔細地加以研究，並且應當更加嚴肅地來探討這一問題，因為在這方面還存在着誤解。

我們還有許多缺點，還有許多企業的經理和負責人員仍然以過去的方式對待工人，但是這些事並不是我們制度的特點。這是過去時代的殘余，我們應當與它作鬥爭。工會正是應當在這方面採取行動，工會的責任也就在這里，雖然從上面製造出一種上層建築和注意國外說些什麼都是錯誤的。

我們應當對外國人解釋我國是什麼樣的国家。任何外國人，即使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如果要提出我們的工會不像他們的工會這樣的問題，那真是荒謬的提法。當然它們是不像的。那些國家是資本主義制度，而我國是社會主義制度。在這里，我們有一個社會主義政府，在那裡，他們有一個資本主義政府。這是主要的區別，兩種制度中的工會應當有所不同，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工會具有巨大的教育作用。但是，工會在教育方面的活動不應當僅僅局限於組織演講會，雖然演講會也並不是多餘的。主要的事情，我上面談到工會活動時已說過，仍然是深入下層，

但他們要照顧到全面，自然也要注意特殊問題。

我知道，下面犯了錯誤，通常說來，并不是因为人們拒絕走新的道路，因而出于惡意或有意去犯錯誤，而只是由于人民感覺到自己难于適應新的情況。我們的制度是很複雜的，過去又不斷把我們往後拖。我并不是說只有在工會中才遇到這些，因為我們無論在那裏都遇到這些。它們存在于人們的血液中，并且难于清除。但是，我們正在堅持地尋求掃除一切阻礙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東西的機會，和採取我國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新形式的可能性。



## 四年經驗

(原載 1954 年 8 月 13—16 日“拉特”報)

卡 德 尔

我們的工人委員會已經有了四年的經驗。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可以給它們的各種成功和失敗，給它們的正確性和它們將來的發展前途作出完全肯定的結論。

我想，今天國內外不會有任何一個誠實的人，當他着手分析這一經驗時，就事先準備否認工人委員會在我們社會發展中所表現的無可爭辯的積極作用。它們的表現是如此鮮明和強烈，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又是如此富有各種社會主義積極影響，以致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斷定，工人委員會不僅是我們發展的特征，而且，在某種形式上，是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社會主義民主的機體中的必要因素。

首先必須強調指出，工人委員會已成為特別有力的社會主義政治因素，在這因素中，工人階級自發的社會主義傾向和他們自覺的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協調一致起來。顯然，工人委員會在同公社合作之下在直接管理生產方面能夠完全代替資本家和國家行政機關。說工人委員會會破壞生產和經濟的“預言”，就像說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就會使社會滅亡的謊言一樣，是虛偽的，反動的，它的目的是要侮蔑工人階級這一趨向社會主義的社會運動的代表的作用。事實上，正是工人委員會給了生產及一般經濟以新的推動力，使現有物質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加速生產力的發展成為可能。

任何一个人，只要客观地注视我们社会现实的发展，他就会断定，工人委员会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已是如此根深蒂固，它们已变成如此有力的社会因素，以致想消灭它们或本质上限制它们的作用的任何企图，以及对它们的任何进攻都会遭到劳动群众猛烈而一致的反击。尽管工人委员会还只存在了四年，但它们已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我们的劳动者再想像不出其他能代替工人委员会及其经济作用的力量。这一事实不仅是工人委员会的历史社会正确性的最好证明，而且也是它们在社会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极好证明。

对资本主义说来，私有者的利益、地位和作用是社会大厦的骨架，是它的内部机体及政治力量的骨架，而我们工人委员会在共同生产者委员会及公社所发生的特殊联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利益则成了社会主义机体的代表和年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时的政治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一个社会，不管它是革命刚结束的年轻社会抑或是历史上已经过时而人为地苟延残喘的社会制度，如果它的生存特别（或主要是）依靠国家力量，那它就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某一个社会制度，只有当它将成为，并且将一直是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必要的东西，以及人们主导意识中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时，才是真正有力而不可战胜的。当资本家在经济关系中还是必要和不可缺少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才是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如此。如果建设社会主义是国家机构的事，也就是说，如果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劳动群众（他们本身在社会关系中是如此必要，以致他们的意识上不能忍受任何其他东西）自觉和自发的行动，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蜕化。

工人委员会开始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这种内在力量。在对经济实行国家行政管理的体系中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关系中，即

当工人在生产中的具体社会地位沒有改变而只改变了管理和剩余劳动的分配方法（当然，这本身也可能是一种很大的革命变更）时，工人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受“在资本家手下时好些”这一意识的支配。有了工人委员会，这种意向就不可能产生了，相反地，工人委员会开始根本改变工人的思想方式。个人经济利益的命运主要已不在某个第三者手中，也不处于反对制度的状态中。工人委员会制度正在解放从事生产的工人，并指导他们不去同制度或站得比他“高”的人，即同那些决定他们的命运的人作斗争，而去同生产及分配中的困难和缺点作斗争，还指导他们积极参加公社和其他社会管理机关，这归根到底决定着他们的经济地位。因此，他们的总方针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我并没有断言說，所有这一切我們都已实现。我們的制度終究还被許多旧事物的残余压得負担过重，以致我們不能說这一变革業已完成。事实上，我們仅仅向这一方向迈了最初的几步，但是，关于在工人委员会中正是發展着这种意向，而它已在我們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产生着积极后果这一点已是显然而無可争辯的了。因此，今天关于我們的工人委员会也可像关于公社那样說，这是“最終找到的能够借以在经济上解放劳动的政治形式”，这是馬克思当时关于公社所說的話。对社会主义时代說来，工人委员会同生产者委员会及公社一起，事实上是和資本主义时代的第三阶層加入議會，在这議會中取得領導权并消除封建主义障碍以發展資本主义的情况是一样的。当时，资产阶級不仅不再依賴封建貴族，而且也不再依賴君主专制的官僚派。工人阶級借工人委员会的帮助，不仅摆脱了資本家，而且在自己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自觉和自發的行动中已不依靠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正在把这一机关变成自己的工具。工人委员会的偉大历史意义首先就在于此。

工人委员会由于自己这种性质，已成为我们这里对反社会主义倾向、对官僚主义倾向、对国家资本主义倾向以及对那些因旧社会残余而产生的东西的最有力的障碍。从我们有工人委员会以及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生产者委员会和公社的最初萌芽时起，我们的制度在政治方面就开始大大加强，国家的革命强制措施开始逐渐缩减到最少限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工人委员会和公社是这样一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它不仅适合它的短时期的阶段，而且也使它在因生产力发展而进一步发展时成为相当灵活的形式。借工人委员会及公社的帮助，我们的劳动者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在社会上的平等权利以及自己影响社会管理机关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他们正渐渐体验到这种意识，即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不言而喻，这首先表现在物质可能性方面，这些可能性是他们的国家或国家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及他们自己的劳动所提供的，其次，表现在他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相一致上，而他同样是确定这些集体利益的直接参加者。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那些政治宣传家在我们劳动者的眼中不仅是丝毫不吸引人，而且是很可笑的，这些政治宣传家建议我们的劳动者或是要工人委员会和公社而要劳动者在经济管理中没有任何权利，不起任何作用的官僚主义暴政的天堂，或是让旧私人资本主义主人带着他们的一切“善行”回来，而我们的劳动者根据自己的经验是熟悉这些“善行”的。正是在我们国家遭到外来的最沉重的压力时，我们的政治制度却在内部最有力地巩固起来，因此，在这里必须寻找这一极好因素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第二个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农村政策中的改变）。

同时，工人委员会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不如说，工人委员会之所以成为强有力的社



会因素正是因为它在經濟上已被証明是正确的。它和生产者委员会及公社一起，成了生产領域中最接近群众的組織形式，在这形式中，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最好地表現出来并互相补充。因此，它本身必須成为因經濟上及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与其他劳动者相联系的工人阶级發揮經濟方面及社会方面最大限度的主动性的动力及范围。

刺激资本家生产的是高额利潤，这不仅是为了滿足个人的經濟利益，也是为了在社会上取得取决于經濟实力的一定政治势力。除了资本家必須在經濟方面經常加强和向前推进以便經得起竞争这一事实外，这一傾向是主要的动力，同时也是资本家进一步發展生产力的積極性的界限。

在我們的条件下，个人的經濟利益照例也是經濟上进步的極重要的动力。但是，現在，这利益有了另一种表現，而且它的作用的方向也是不同的。

首先不应忘記，我們所講的不是剝削別人劳动力的私有者的利益，而是用公有生产資料来工作的人的利益。借这些生产資料的帮助，工人生产者通过工人委员会在工厂中集体地、独立地进行管理，而通过生产者委员会来决定性地参与公社及全国的总的經濟政策的制定。资本家在爭取高额利潤的斗争中首先方圖加强对工人的剝削。也就是說他的意向是和工人的利益直接相矛盾的。而工人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在为爭取自己的經濟利益而斗争时，他的面前照例只有一条道路——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增加自己的劳动集体的产量和进一步發展自己公社的和全国的生产力。因此，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的集体利益显然是直接互相依賴的。我們的工人日益意識到这一事实，即他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他的整个集体的成就，取决于他生活于其中的整个公社的生活水平，意識到这一生活水平首先

还是取决于公社本身和全国的生产力的發展，当然，这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剩余劳动的基本分配是按照經濟發展的实际需要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則来进行的。因此，在这一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特殊联系中就包含着这样一种动力，这一动力在国家相应的总的經濟政策下，可能比在發达的資本主义条件下争取利潤的斗争更有力得多地影响生产力的进一步發展。任何行政机构和任何专家的数学公式都不能代替社会主义經濟力量通过工人委员会和公社表现出来的这种自觉和自發活动。此外，要吸引千百万劳动者——昨天还是資本家的雇佣工人或国家資本主义官僚暴政的棋盘上的盲目而無权的小卒——自觉地管理社会，要使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种社会形式也是最方便的。这样，它就最有力地發揮劳动者的創造性，并使新的社会关系比資本主义社会关系更有效能，这是新社会关系能够保存并繼續向社会主义發展的主要条件。因此，这就是近几年来所看到的我們經濟中的旺盛現象的一个極重要的根源，这一旺盛現象表现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針中，表现在要搞好經營、要節約、要較好地利用資金和材料、要搞好貿易、要增加出口等等的意圖中。不容置疑，如果我們的經濟制度更快地、更徹底地摆脱旧制度和旧概念的某些因素（这些因素目前仍然束縛着来自下面的主动性，并使得在生产方面和一般的經濟方面难于寻求和运用最有效的方法），那末所有这一切意圖就会起更大的作用。

当然，工人委员会也有其弱点和缺点，而且并不少。首先，这是由这一事实而产生的弱点和缺点，即我們所具有的是刚刚开始生效的完全新的关系，完全新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在我們的工人委员会中可以感觉到它是一种新制度，它还没有素养，从它的經驗中还没有作出实际的，对大家說来可能作为一种

經過檢驗的指南的結論。因此，仍然還有許多需要摸索的地方，仍然會常常徘徊不前，仍然會作許多毫無結果的嘗試和冒進，仍然會有無政府主義的莽然輕信和過分官僚主義的不信任等等。當然，這一切都會造成錯誤。這是一種我們為了上小學而絕對必須付出的代價。不過，我們越是每天對壞現象作堅決的具體的鬥爭，這一代價也就越小。

同時，除了這種因缺乏經驗和素養而產生的缺點外，也還存在着由制度本身所引起的，或者不如說，由制度的組織不夠健全所引起的重大缺點。前面我已經講過，我們的勞動者力圖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工人委員會主要領導他們提高勞動生產率更快地發展一般的生產力。在建立我們的制度和發展經濟關係的目前階段，這一渴望也可能有另一種表現形式，那就是靠沾別人的光，沾別的工人、別的工廠、別的部門和別的公社的光而取得經濟上的成就的意圖。我們的經濟制度組織不夠健全就使這種意圖能夠以政治方面極其有害和惡劣的形式表現出來。我國個別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現象更助長了這一點。這就是我們稱之為本位主義等等的，常常採取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政治形式的那些不良現象的根源。這也是不管勞動生產率而實行平均主義的，也就是和“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一原則相對立的各種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根源。

當然，這些現象並不是單由我們的社會制度造成的。它們是由那些不能馬上改變的客觀物質關係而產生的。但是，由於新的制度沒有能夠用相應的社會機構制止這種意圖的表現，它們現在正在延緩和阻礙這一制度的發展。制止這種意圖無疑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最迫切和最重要的任務。

這任務並不是難以完成的。要徹底消滅這些意圖，首先要進一步發展生產力。但是，現在也已經能夠用採取相應的經濟

上、組織上及其它的相应措施的方法来使它們的作用縮減到最小限度,并且它們無論对进一步發展生产者自治制度,無論对最强有力地刺激个别生产者和个别集体去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都不再是很大的障碍。

我不想在这篇文章中詳細叙述工人委员会制度中的坏現象和为反对这些缺点而作斗争时所应采取的措施。我之所以提到它們只是为了简单地指出进一步發展这一制度时摆在我們面前的任务。同时,存在着这样一些坏現象这一事实,絲毫沒有减少工人委员会在为建設社会主义而作的斗争中的作用;关于这一作用我在开始时已經講过了,工人委员会尽管有着已提到的及其他缺点,但它不仅已确立起来,而且还和公社一起成了最重要的政治及經濟机构,工人階級首先利用这一机构来实现自己作为社会向社会主义,向無階級社会推进的代表的作用。因此工人委员会的意义已越出了我們自己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范围。它将影响全世界整个社会主义的發展。即使在目前,社会主义的敌人也已失去了反对工人階級这种經濟及政治机构的論据。随着工人委员会同生产者委员会及公社的經驗的进一步發展和获得,这些論据将更日益失去自己的影响,而这一經驗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价值将越来越大。



## 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

——1954年10月訪問挪威时，在奥斯陆  
工党积极分子會議的报告

(原載1955年1月1—3日“战斗报”)

卡 德 尔

在西欧，关于南斯拉夫和它的政策很普遍地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第一，在1948年以前，南斯拉夫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是采取斯大林的苏維埃制度的立場；第二，只是由于苏联压力的結果，南斯拉夫才在1948年和以后的年代中被抛上了反对官僚主义和保衛民主的斗争道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反抗这种压力的思想和政治基础；第三，既然南斯拉夫已經走上这条道路，它就必然要或快或慢地沿着正統的西方资产阶級民主的方向进展。

可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和不真实的。所有这三个推測基本上都不符合于现实。

这种情形首先把事件的先后本末倒置起来，因为，实际上，冲突并不是原因，而是南苏国内制度發展上的不同傾向的結果。正是制度發展上的不同傾向和与此相关联的在对外政策傾向方面的差别，影响了两国的关系，而不是相反。显然，后来两国間造成的关系起了相反的影响，就是說加强了新南斯拉夫所特有的国内政治傾向。所以这个问题的国内方面和对外政策方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誰要是企圖把南斯拉夫特殊的内部發展說成只是对外政策冲突的結果，誰就会远离真理，因而也就永远不能了解1948年以后南斯拉夫国内政治發展的实質。

## 一、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

### 現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問題

革命的胜利，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力量的面前提出了現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問題。这些問題是：如何管理那些經過政治行动即經過革命或进化而被收为国有并且已經成了公有财产的生产資料；在生产資料社会化的条件下，人們在發展生产力方面自觉活动的动力是什么；为了保証最有利的条件以开展人們的自觉活动，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制度應該是什么？

在理論上和原則上，所有这些問題都早已获得解决。卡尔·馬克思早已經对它們做了原則的和明确的解答。但是，这些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很明确的原則与远景的实际实现要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治形式問題，却是远不够清楚的。在这方面，馬克思本人沒有得出而且也不能得出肯定的結論。很明显，他根本不願意干那后代人們應該去干的事情。起初，他大概是認為国家机器是無产階級應該借以实现它的社会主义历史作用的主要工具，这当然就要以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后来，馬克思在“拿破侖第三政变記”这本著作里以及在巴黎公社以后，預感到官僚主义的威胁，他非常謹慎地对待每一个独立的集中的国家机器的作用問題，認為这种国家机器應該由“組織成为国家的無产階級”来代替。他宣称巴黎公社即自治公社的全国联合是“那个最終找到了的能实现劳动解放的政治形式。”

### 官僚主义的源泉

俄国革命，在落后的自發势力的压力下，不管列宁怎样努力

想把它的发展导向一个相反的方向，而在斯大林时代却肯定了集中的国家机器是走向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组织形式这一原则。斯大林简单地把这种国家机器同工人阶级的意志和觉悟混为一谈，把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官僚主义危险的警告仅仅归结为官僚式工作者的某些特点（文牍主义、拖延、漠不关心、管理机关的非人道态度）的威胁。这样，斯大林就抹煞了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官僚主义。

然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却摒弃了这样一种看法，就是：随着集中管理国家全部生产资料的国家机器的建立，社会生活中经济力量的每一个独立的自发行动就会基本上化为乌有。

在斯大林看来，国家是全能意识的化身，它能够极详细地确定经济力量的动向。国家计划以及对经济实行集中行政管理的制度，被宣称为人类意识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的唯一表现，而这一领域中的其他一切表现均应盲目服从这种计划和管理制度。这个机构的要素是：上级机关可以完全支配下级机关，而后者又可以完全支配个人；上级监督下级；检查执行情况和处分没有完成任务的人。由此可见，这个金字塔是头朝下倒立的，它不是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出发，就是说，不是从解放劳动力、解放那些用公有生产资料从事工作的人们的创造性意志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说，不是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出发，然后由最高的社会机关来调整、监督和指导人们的这种基本活动和关系。相反地，它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劳动集体都变成神秘的技术计划的盲目执行者，而且这些计划的实质常常是广大群众所不知道的。

当然，这样的制度要完全依靠国家机关的工作好坏。为了这个目的，斯大林便实行了一个从经济上鼓励这种机关的特别制度。机关如果能获得优异的成就，就能得到更好的报酬。因

此，这种經濟上的鼓励不能对劳动者的創造积极性起最大的鼓励作用，而是首先对那控制劳动者的制度起鼓励作用。于是国家机关就开始在社会关系中具有一种完全特殊的經濟地位。

### 个人的物質和精神利益或是行政控制

但是，指令和控制，除了当它們是从事自由創造的劳动人民共同利益的表現的情况外，其本身并不是創造力量。在生产資料公有化的条件下，当然只有每个人自觉的劳动意志才能成为这种力量，而每个人自觉的劳动意志是从他本人的經濟和精神利益中产生的。当每一个劳动者越是認識到他个人的利益是和社会集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認識到經過适当的自治机构他可以以平等地位参加解决有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問題时，这种意志就会越發明显地表現出来。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在生产資料公有化的条件下，人类早已熟知的經驗才能得到充分的表現。这个經驗就是：个人劳动創造的質量，不管是精神的或是体力的，不可能只用外来的干涉(控制和檢查)去取得，而首先和主要的是由創造者本身的質量、由他的創造性意志的質量和力量去取得。社会主义社会首先應該解放这种个人意志，其次应使其經常受到社会教育和专门教育，再其次，应使这种意志建立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上，建立在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上，并鼓励这种意志。因此，高級社会机关的指导和控制职能，只有当它和这个基本趋向一致时，或者说只有当它首先保証这个趋向能得到充分表現的条件时，才能是积极的和創造性的。

以生产資料公有化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時間內起进步作用并获得群众的支持，就是说，只有当这种国家制度的作用是指向消灭旧的剝削关系并为新的社会主义关系的發展創造基本的物質和政治条件时，才能



起进步作用和获得群众的支持。但是，只要这种国家制度一变成自我目的，就是说，只要它的停滞过程一开始，就必然会逐渐引起行政机器（它是会官僚主义化的，因为它独占着经济管理，因为从这种独占当中会产生一种趋向，而这种趋向的实质就是：每一个劳动者仅仅是这个国家独占的毫无希望和毫无能力的工具）和每一个个人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反抗（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他们再不願意去創造比督促他們要做的更多的东西了）之間的經濟和政治矛盾。

这样的制度既能引起經濟的后果，也能引起政治的后果。在經濟上，这种后果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会或多或少地延緩，并且缺乏自下而来的对生产力發展的自發压力。可見，就是这种制度，和任何壟断制度一样，也会产生停滞和生产力腐朽的趋向。这种情况当然要求有一个相应的进行控制和施加压力的政治制度，即要求有一个以政治专橫和普遍不信任气氛为基础的制度。

### 在不發达国家中社会主义發展条件的不同

西欧社会主义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它的方向是通过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現有机构去逐漸地和演变地加强工人階級即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属于这一类的某些具体政策，在何种程度內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现实的一步，当然是值得个别討論的。但是整个說来，沒有一点疑問，通过正統的欧洲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政治机构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对于一系列的国家說来，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成为现实的事实了。

然而这里不应忽視两点。

目前，这种过程主要是在高度發达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因

为这些国家早期便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舞台上，获得了特殊的经济特权，有了经济力量以及与此相应的很高的生活水平，而这就会减弱它们内部的社会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主传统真正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矛盾的调节者，以逐渐加强社会主义的因素。至于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任何悠久的民主传统，而内部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过程的开展要困难得多，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现代国际资本的巨大集中以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落后国家都不能指望沿着正统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求得发展。这样，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不仅面临着解放劳动的方法问题，而且首先面临着使本国从落后状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赖地位解放出来（这是不发达国家达到社会主义的准备条件）的道路和方法问题。

除此以外，不管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任何内部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这种尖锐化是在某种不能在工人运动中实行妥协的制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毫无出路等特殊条件下发生的），都会使这些矛盾的和平的、民主的解决受到破坏。这种尖锐化必然会导向革命的冲突。旧南斯拉夫的情况也正是这样的。如果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出发点，就是说，应该把正统的资产阶级民主方式作为向社会主义发展唯一可能的方式，这就等于制造一种教条，这种教条的危害性，比方说，不比另一个教条——把十月革命的道路强加于一切国家——的危害性小些。目前，有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在一定条件下足够清楚地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今天来否认这个事实，正像当社会主义通过正统的民主形式而逐渐演变已成为一系列国家的历史事实的时候来争论这种演变是否可能一样，也是错误的和可笑的。依我

看来，这两种教条今天都是实现当代国际社会主义的绝对要求的一个巨大障碍，而这种要求就是：找到一条有机的内部团结的道路；不是——比方说——像共产党情报局那样要求一致思想和一致行动的团结，而是要建设性的民主合作，以便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总的运动路线的基础上把各别的国际社会主义潮流联系起来。这样的团结和认真的、批判的交流经验，会大大有助于社会主义运动，使它经常成为一个活跃的因素，使它始终能把自己的行动同具体的条件相适应，并把一切能加速人类社会主义进步的趋向和因素动员起来。

对当前自觉的社会主义思想说来，上面所说的乃是行动的主要领域。国际社会主义已经不再处于思想准备阶段。在思想方面，它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目前在许多国家中，国际社会主义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它首先成了千百万人广泛实践的事业，而这些人自己常常不知道他们正在进入新的社会关系，就是说正在建立这种关系。非常重要的是：使自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国际合作从一切束缚和妨碍它们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使它们真正能够最有成效地依赖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以便参加到各种不同的自发的物质过程中来，并根据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特殊条件把这些过程引上社会主义过程的轨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典型的过渡时期中，全世界的政治结构也是和这个过渡时期相适应的。因此，去发明能够适应一切国家的经济或政治模型，那是错误的。无论我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对官僚行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抱着何等批判的态度，我们总应该了解，比如说，对许多落后国家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说来，这种制度也是前进一步，否则就是踏足不前，使自己窒息在内部矛盾中，就是容忍整个民族继续深陷在落后和依赖的状态中。

不言而喻，如果人类能找到一种經濟援助的方式来加速不發达国家的發展，那末所有这些过程的进展都将会远非那样痛苦。但是，看起来，这种思想的有效实现还是相当遙远的未来的事情。

如果我们估計到这一切，很明显地，任何把某种特定的运动形式作为唯一可能的形式来强加于別国人民和人类身上的傾向，都必然会产生反动的后果。因此，在我看来，努力在不同制度的国家間建立容忍的共处和合作，目前是一个極端重要的因素，这不仅对于保証和平是如此，而且对于保証人类繼續进步以最有利的条件（讓最进步的社会主义傾向能得到最自由的表现）也是如此。

但是問題不仅在于当今的世界分成了落后的和發达的国家。虽然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能成为或长或短地演变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政治手段，但是在一定阶段上，已經获得的社会主义成就必然要开始改变这个旧的民主机构，因为否則后者就会成为繼續进步的障碍。

### 經濟和政治民主

我这里所指的是两个因素，它們迟早都会成为任何带有社会主义內容的民主制度中的占統治地位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由于用演变或革命的办法实行生产資料公有化而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必然要求在經濟領域中也采取民主的管理形式。而且不仅仅要求这样的改变，因为既然生产和經濟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內容，那末很明显，正是經濟領域中这种新的民主形式提供了建筑在社会主义經濟基础上的新的民主政治机构的發展方向和形式。經濟民主的思想是一个很老的思想，但是它过去常常被看成为和正統的政治民主并列的东西，就是說，看成为正統的



政治民主的附屬物。我認为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不應該忘記，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也是經濟民主的一種特殊的形式。資產階級民主的真正根源正是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关系中，它准确地适应这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結構，即适应在其基礎上發展着的社会的經濟要求。因此，經濟民主的現代要求就是要求新的民主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以生产資料公有化为出發点的社会将能自由地發展。

今天，根据社会主义斗争的許多經驗，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肯定地說，正是这个“經濟民主”能成为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就是說，它将成为一切新东西的發展方向和形式，将成为民主政治机构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sup>①</sup>。这个过程同时是摆脱困难的唯一可能的民主出路，而那些停滞在古老的形式中并成为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实际的民主制度却特別感到这种困难。

第二个因素是：通过生产資料的公有化和建立管理生产与經濟的相应的民主机构而获得的劳动解放（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創造意志和精力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應該大大提高个人在社会管理机构中的作用。無疑地，这种發展将日益破坏国家机器的作用和力量，既能加强各种最下層的即与人們、群众最接近的社会自治机关的作用，也能加强一系列与这些自治机关和組織垂直相联的自治系統。

沒有疑問，这也会反映在目前的政党制度和作为政党代表机关的議會制度上。甚至最民主的政党也要限制个人的主动

① 这句话和羅馬尼亞文譯本不同，从罗文譯出的句子是：“……正是这个‘經濟民主’能变为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即是說，会变为在一社会主义經濟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机构的方向和一切新的發展形象”；也和另一种譯文不同，它的句子是：“……它为建基在社会主义經濟上的整个新型民主政治机构提供了發展的道路和形式。”——譯者

性。首先，它在政治战綫上带来某种停滞現象，而这就会破坏人們在有关个人和社会利益問題上的直接而生动的創造活动，或者使这种活动非常困难。虽然大家知道，到目前为止，在充滿社会內部矛盾的社会制度下，这样的政党制度正是由于它的这种作用才在政治上是有必要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說，这种政党制度磨鈍了或指导了对立物的矛头，把社会从盲目的自發势力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并且給社会关系带来了很大的政治稳定性。但是，如果假定存在着占統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經济关系（不用說無階級社会，也不用过远地瞻望未来），那末我們就應該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公开的社会矛盾将要减少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政治制度即政党的这种作用不仅会成为不必要的，而且将阻碍現有的社会力量的充分使用，首先是阻碍每一个人的創造意志的充分發揮。

由于这些原因，應該設想：随着社会主义关系的發展，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組織机构也将逐渐变成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人們广泛实行自治的直接民主制度，就是說，变成为人們在其中将不作为这个或那个政党的支持者活动，而作为对待各种具体社会問題独立采取态度的自觉劳动者活动的制度。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說来更是如此，因为革命是这种制度的出發点，而如果回到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上去，那就意味着放弃革命，使社会倒退，把它投入反民主的怀抱。当然，在直接民主制的条件下，共同的观念能把个人集結起来，但是这种集結不应具有一种受束縛的政党联合的性質。直接民主制的这种發展过程，同时将是作为階級意識工具的国家的消亡过程。这里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間接民主机构（这种民主制在其一切正統形式之下都是对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的肯定）和建立在不断扩大的社会自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直接民主制（这种民主制，归根到底，只是作

为一般阶级工具的国家消亡的政治形式)之间的重要差别。我想,所有一切民主的发展道路都会导向国家的这种改变,不管它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正统机构,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机构。

## 二、南斯拉夫发展社会主义和 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

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及其民主政治机构的内部发展的。因此,我们坚决抛弃上述的设想,就是:南斯拉夫的内部发展必然会导向正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机械的复活。我们的民主实际上只是第一步,但却是走向这样的民主形式的一步,这种民主形式将是正在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反映。

不仅上面说过的主要因素说明事物必须这样发展,而且具体的政治原因也说明事物必须这样发展。在我们的条件下,就是说在管理公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仅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小私有生产者则占全部人口的60%以上的国家里,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极端困难的国际条件下,如果机械地回到正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上去,那就是决心放弃保卫革命及其成果,归根到底就是要放弃我国的独立和在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的事业。

诚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人批评我们的观点。这些批评家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不否认你们的已经推翻了一个反民主的反动制度的革命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但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你们应该建立一个正统的欧洲民主制度。

这种反对意见是非常抽象的。它首先不顾这样一个事实:

旧南斯拉夫沒有过民主并不是由于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根本不愿意建立民主,而是因为它不能建立民主,就是说特別尖銳的内部矛盾不容許它建立民主。由此可见,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反民主主义乃是我国一定的物質和政治关系的表現。

### 战前南斯拉夫的社会經濟和政治結構

战前的南斯拉夫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全国人口中,仅約 10% 从事于工業、矿业和建筑業,而 75% 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中,以相当落后的方式耕种土地。

虽然按水力資源來說,南斯拉夫拥有 660 亿左右匹,仅次于挪威而居欧洲第二位,但在 1938 年按人口計算的發電量却仅为 70 度。而当时在欧洲,每一个人平均分得 350 度,更不用說西欧的發达国家(每人平均量为 350—830 度)或挪威(每人平均量,我想,是 3,300 度)了。

我国鋼产量每人平均为 15 公斤,而在西方国家則为 120—340 公斤。

电力工業的产量比欧洲平均产量小 58 倍。机器制造和金屬加工工業比奥地利小 10 倍,比意大利小 11 倍半,較比利时少 18 倍,比法国小 32 倍,比瑞典小 49 倍。

南斯拉夫在焦炭、石油、汽車、变压器、拖拉机、机制紙等产品方面,則全靠輸入以滿足其需要。

此外,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国内某些地区在經濟發展上有着很大的差別。这样的社会經濟和政治結構,使南斯拉夫不可能在旧阶级的领导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进展。相反地,它使南斯拉夫在經濟上越来越深地依賴外国,越来越相对地落后于發达的国家了。由于这些原因,国内的剝削就必然会日益加剧。这种情况的結果是:整个制度日益腐烂,各种矛盾



日形尖銳<sup>①</sup>。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革命运动才能使我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以便有效地进行斗争，争取把我国从落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因为这样，才发生了革命；也正因为这样，革命才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方针不仅是摆脱内部社会矛盾的出路，而且是使国家摆脱落后状态的唯一可能的道路。

这些物质和政治因素影响了（虽然是在另一种方式下）而且现在还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在革命以后的发展。诚然，革命改变了政权的性质，而且解放了进步的社会物质和政治力量，但是它不能自动地改变国内物质关系，因此也就没有消灭由此产生的矛盾。因此，很明显地，如果我们甚至于在原则上决定这样做，我们一切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以建立即使资产阶级也因社会内部矛盾所阻而不能建立起来的正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企图，也必将全归失败。这些企图不可避免地会把国家投入内战的漩涡中去，或者把国家交给复辟阶级的反动暴政手中去，或者——这是更可能的——交给国家资本主义官僚制度手中去。

### 革命——向直接民主制前进的出发点

由此可见，革命只能成为向新的民主形式即向直接民主制——使任何政治垄断消亡的形式前进的出发点，否则，革命就会丧失它的内容。当革命已经发生的时候，那时只有革命能成为发展的起点。要回到任何旧的、革命以前的形式上去，在政治上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那样革命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革命了。革命应该是改变物质关系的开始，只有这些关系的改变过程才能决定适应于新的经济基础即适合于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新

<sup>①</sup> 据另一种译本，这里还有：政治制度日益反动和反民主。——译者

的民主形式的發展規模和速度。由于這些原因，我們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鬥爭方針不能是把人們錯誤地稱為“一黨”制的革命制度變成為有階級的多黨制度<sup>①</sup>，而是要發展直接民主制，這種直接民主制將會隨着時間的進展，消滅對任何政治壟斷的任何需要，不管這種壟斷是採取“一黨”的形式還是採取“多黨”的隱蔽形式。

但是我們不談論抽象的理論，而且也不願意把社會所不能接受的形式強加于社會的頭上。因此，對我們說來，在我們的條件下，任何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的出發點就是：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從而加強社會主義的政治力量，就是說，加強工人階級的人數、經濟力量和他們對生產力發展的直接影響；最後，加強工人階級在管理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立場。此外，還需要進行不斷的工作來發展社會主義的社會覺悟和社會主義的民主傳統，沒有這一點，就不可能設想直接民主制各機構的工作會進行得好。當然，實踐將首先是提高這種覺悟的學校；但如果讓這一個過程完全自發地發展那是錯誤的。關於這個問題我以後再談。

### 工業化是我們在加強社會主義 經濟基礎方面的基本任務

基于這些想法，在革命以後，我們便首先負起了使國家工業化的艱巨任務。我們的工業化並不是像我們的西方批評家們所常說的教條式的“成見”。相反地，甚至在我們完全不考慮我國所處的具體的國際政治局勢的情況下，我們也要首先從一個非常現實的角度出發來處理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這就是說，社

---

<sup>①</sup> 據另一種譯本的譯文是：……變成為有階級的資產階級多黨制。——譯者

会主义力量，只有当它們能在社会中建立起日益自由的关系时，才能取得对反革命力量和官僚主义的胜利；但是，只有当社会主义力量在經濟上已經如此强大而足以使全国的經濟發展都能随着它們前进时，这种情况才能实现，換句話說，只有当社会主义力量不是成为落后的城乡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中的某种社会主义經濟基础，而是成为一个将以其經濟影响而不是依靠国家力量来排除落后的社会关系的統治因素时，这种情况才能实现。可是，我們曾必須着手改变社会力量的物質关系以利于社会主义。如果我們沒有这样做，那末經濟上相对薄弱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威力主要在于国家机关的現象就会繼續存在下去，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加强官僚主义傾向<sup>①</sup>。

今天我們至少可以說，在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質基础方面，我們已經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对我国今后的政治發展将起决定性的影响。

我不想用数字来疲劳你們，但还是要說明一下我們努力的某些結果。

根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賠償委員会的估計，战争所造成的設備和建築物方面的物質損失占它們总值的36.5%。不用說，为要恢复被破坏了的國家，我国各族人民和每一个人都要尽巨大的努力。还在战后的头几年中就已經恢复了大部分，从而为国民經濟的进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础。但是，特殊的国际局势大大地妨碍了这个發展。南斯拉夫不得不拿出比其他國家更

---

① 這句話的俄文本譯文不清，这里是猜譯的。另外两种譯本的譯文是：如果我們不这样作的話，那末在經濟上相对薄弱的社会主义力量只能通过国家机器来进行工作，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强化官僚主义的傾向；如果我們竟沒有做这些，那末在政权机器中，社会主义力量在經濟上还是相当薄弱的，这种情况会不可避免地促成官僚主义的傾向。——譯者

多的經費用于国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們把国民收入花在国防需要上的百分比如下：1949年是10.2%，1950年是12.3，1951年是14.5，1952年是21.5，1953年是17.2。今天我們仍旧保持最后这个数字。但是，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困难，我們还是能够把鋼鉄和压延品的产量提高到1939年的二倍以上，把电力和机器制造的产量提高到1939年的三倍左右，等等。我国年輕的工業現在已經开始生产許多为战前的南斯拉夫所完全不能生产的产品。这种情况至少反映在我国同外国进行商品交换的结构上。我只举几个例子。

在1939年，我国經濟所需焦煤量是25万吨左右，百分之百是进口的；在1953年，我們则需要50多万吨焦煤，其中55%是在国内生产的。在各项基本工程完工后，預計我們对焦煤的需要量将达110万吨，而我們国产的焦煤可供应其中的61%。在1939年，我們压延鋼材的需要量的53%是进口的；在1953年，我国經濟对压延鋼材的需要量增加了一倍多，但进口却只有22%。

1953年，我国农業获得的农業机器較1939年多60%。但是，如果說在1939年我們所需机器的50%是从国外进口的，那末，在1953年，我国农業就获得了92%本国制造的农業机器。

在1935和1939年間，南斯拉夫平均輸出60%左右的原料，而制成品的輸出仅占5%。1953年，原料占我国出口的47%，而制成品則为17%。在1954年上半年，制成品在我国輸出中所占比重已提高为19%。

可以毫不夸大地說，由于我們的努力，南斯拉夫在战后已經作出了长足的进步，接近了經濟發达的国家。

当然，这样的努力是需要相应的政治形式的。經濟發展的落后使我国社会主义力量受到双重的压力：过去資本主义的力



量虽然在革命中丧失了政权，但仍然是强大的，而且在一定情况下，能给予社会主义政治稳定性以严重的损害。另一方面，这样的斗争和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要求有一个很强的内部纪律、相当高度的政治集中和对经济实行行政管理，要求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机器，而这个国家机器是能够成为官僚主义的源泉的。我们必须经受住这两种压力。革命本身为反对第一种压力提供了武器，但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战线却只能在革命以后建立。必须在原则上解决几个问题，而首先就是关于国家和国家机器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化为基础发展着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

斯大林的基本原理之一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国家及其社会作用的不断加强应该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实际上，这一原理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能起肯定的作用：第一，在工人运动通过正统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来逐步夺取社会地位的条件下；第二，在工人运动借助于国家机构强力摧毁旧的社会关系的这种直接革命的条件下。但是，如果这一原理成为一个一般原则，不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关系自由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而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关系本身时，那末它必然会导致国家机器的绝对权力，就是说，国家不再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武器，而是成为它们的主宰，成为一个超社会的力量和官僚主义的经济基础。

### 国家消亡的过程

和上述理论相反，我们的立场是：革命不仅应该以一种国家机器来代替另一种国家机器，而且同时也应该开始作为一般政权工具的国家的职能的消亡过程。当然，这不能是法律条例的机械改变过程，而是物质力量与社会关系发展的有机结果。只

有当回复到资本主义关系成为不可能和荒謬可笑的时候（正像今天不可能回复到封建主义去一样），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才会成为如此强大和不可动摇，以致阶级矛盾再不会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将不再需要依靠国家了。因此，社会主义关系的物质力量和经济独立越加强，国家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必要性就越减少，更正确些说，国家将更多地转变为这样一种组织机构，这个组织机构不再依靠强力，而是依靠共同的社会利益以及对符合于共同利益的统一的社会纪律的自愿服从。

所有这些都说明，“代表工人阶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不能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建设者、社会主义觉悟的化身和建立社会主义关系中的主要动力。这种社会主义关系只能是劳动人民的自觉的和自发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其他的活动与实践的结果，而劳动人民是在人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劳动、创造、思考和建设的。人们的这种积极性引致新的关系，在这种新的关系之下，人们由于经济和社会意图的影响，自然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活动。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也只能在这种实践中得到发展。显然，在这个意义上说，自觉的社会主义活动乃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像马克思所说：“社会既不能跳过若干自然发展的阶段，也不能用命令废除它们。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时的阵痛。”

### 劳动人民在一切部门中实行民主自治的原则

依我们看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着的民主的组织机构，也应该适应这个客观过程。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直接民主机构能够适应这些任务，这种直接民主机构能保证劳动人民有最大的可能通过生产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的基本管理机

关来实行民主自治。我們的工人委员会、合作社、公社、彼此間有垂直联系的自治的經濟組織以及教育、文化、科学、衛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机关中的独立的社会管理机关，都具有这种职能。这些形式和这种社会活动的日益巩固，同时将是逐漸建立新的民主机构的形式，而这种新的民主机构将在新的社会經濟的基础上有机地成长，而且归根到底，将成为作为权力和暴力工具的国家消亡形式。換句話說，在生产資料公有化的条件下，应该建立这样一种民主的社会管理的組織机构，它将使劳动群众有可能直接地和經常地、而不是仅仅通过其某一个政党来参加这一組織机构。

公民們直接参加社会自治机关，就能通过它們直接决定由誰在高級机关中作他們的代表。任何其他道路都会导致官僚主义和阻碍每个人的社会主义創造主动性。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自覺的社会主义战士的主要活动場所不是狭义的国家的管理，而是劳动群众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的社会自治机关。国家管理应该是一个服从于这种社会自治机关的熟練的机构，而自覺的社会主义战士必須在群众中进行斗争，使他們在相应的民主机关中作出的决定是社会主义的决定，就是說，使这些决定和保衛社会主义免受反社会主义傾向的影响的需要相一致，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的需要相一致。这些就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活动所根据的原則。

革命胜利后，在这方面所采取的的第一个和坚决的实际步驟，就是轉移共产党及其干部的活动重心。提出了一个任务：全体共产党员和一切自覺的社会主义战士都应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但不是通过利用他們在国家行政机关中的地位的办法，而首先是通过經常为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覺悟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在我們的發展过程中与这一任务相关联的另一个步驟，就

是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中逐漸實行分散管理。這種分散管理能保證勞動人民經過生產和公社中的相當的下層自治組織，利用他們對國家機關實行完全監督的權利，來實現最高度的自治。在這兩方面，我們已經前進了很多，而且獲得了很大的成績。

### 三、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民主的機構

我想簡短地談一下我們在实际工作中是如何實現我所談過的那些原則的。我們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力量的自由運動，就是說，如何保證那些用公有生產資料勞動的勞動人民在達到最大限度的勞動生產率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方面能自由地工作和發揚其主動性，並通過這種活動，同時解決他們個人經濟利益的問題。這個任務，首先是由工人委員會來解決的。

我們每一個企業在它的活動中都是獨立的，它僅僅受一般的決定和國家經濟計劃的約束。扣除包括基本工資基金在內的生產費用後所得的純利是公有的，就是說是集體和個人共有的。根據聯邦的法律和計劃的規定，參加純利潤分配的有：國家、公社、企業和企業的職工。屬於企業的收入，其一部分是按照工人和職員的勞動分配給他們，作為輔助工資；而另一部分則作為企業可以自由支配的基金，就是說，企業可以利用這部分收入來投資、改進生產、用於社會需要、建築住宅及其他等類似的目的，所有這些都是由工人委員會獨立決定的。在這個範圍內，企業的活動是自由的，任何行政機關都不能為它規定政策，它可以在市場上自由競賽，它是獨立發展的，並且是獨立地和其他企業進行合作。

勞動集體是通過工人委員會和管理委員會來管理企業的。



劳动集体选举工人委员会，任期一年。考虑到一年的任期的确太短，可能在最近将来把这个期限延长为二年，而且每年只选出工人委员会的半数委员。选举是用秘密投票方式进行的。工人委员会的候选人可以由工会组织提名，也可以由一部分职工提名，但是在500人以下的企业中，这一部分职工至少应占全体职工的十分之一；在拥有500名职工以上的企业中，提出候选人的这一部分职工的人数不得少于必须选出的工人委员会委员的人数。在职工不足30人的企业中，工人委员会由全体职工组成。

工人委员会选出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后者则在工人委员会休会期间执行其决定，并进行企业经济管理方面的日常工作。任何人担任委员都不能超过一年。

任命经理的办法是组织招聘，由一个特设的混合委员会从应聘人中选出，特别混合委员会三分之一的委员是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其余的委员则是各专业组织的代表及人民委员会指定的人士，而在较大的或特殊的企业中，则为共和国政府或联邦政府指定的人士。由此可见，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没有任何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作为个别企业或工人委员会应该加以服从的上级机关。但是，各企业可以在工业局和其他经济局的范围内自由地联合起来，以便在工作或改进生产方面取得合作，为了同一目的，它们也可以建立各种共同的经济和技术机构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

企业的经济政策是由工人委员会指导的，而在技术上这个政策是由经理和该企业的专家积极分子执行的。工人委员会不能直接干涉经理和专家积极分子的这一权利。比方说，工人委员会决定开始进行若干产品的生产，经理则会同技术干部独立地组织生产过程并分配工人。工人委员会不能改变经理在这方面的决定。当然，经理也可以提出有关企业的经济政策的建议，

而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也都可以对企业中的劳动组织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经理的建议如果在经济上是合理的，通常都能为工人委员会所接受，而经理也考虑工人委员会关于组织生产的意见。如果工人委员会不愿接受经理的建议，那末经理可以把建议提交公社的人民委员会。实际上经理请求公社帮助的情况是非常少的。如果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是和现行法令相抵触的，经理就应该向它们指出这一点；而如果它们坚持自己的意见，经理就应该把这种情况告诉给公社的人民委员会，否则他个人应对一切后果负责。如果工人委员会认为经理是不称职的，它可以要求解除经理的职务，并宣布对经理职位的重新招聘。但是，最后的决定权是属于该企业所在地区的公社人民委员会，而且无论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必须是有根据的。

由于市场是自由的，所以各企业是处在竞争的状态中。产品的质量优良和价格低廉就预决了在市场上的成功。这种争取在市场上使产品的质量更加优良和价格更加低廉的竞赛的压力，以及全体工人，甚至所有公社人员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成功的情况，乃是比任何行政监督都更为有力的对提高产品质量的刺激。

### 经济部门的工资制度

正因为这样，过去完全由中央政权决定的整个工资制度，已经逐渐地分散下去了。按照1955年的计划，工资制度将完全由企业 and 公社间的关系决定。根据1955年起生效的决定，工资将根据工资等级评定法来确定。评定法草案由企业管理委员会制定，并要劳动者提出意见。然后，这个草案由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工会组织和人民委员会(公社)加以讨论。如果能取得协议，

工資率便开始生效；而如果不能达成協議，那就把爭執的問題提交一个由工会、公社和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代表組成的并由后者任主席的仲裁委员会审查。为了公社的利益，工資不要高于某些平均水平，因为过份地提高工資会直接减少公社的基金。相反地，受到工会支持的工人的个人利益，也不允許工資低于一定的水平。

根据既有的經驗，这种矛盾通常总是在工会的合作下由工人委员会和公社彼此取得協議来解决的，因为，在这里，相互間的利益是密切地交織在一起的，所以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个人和集体利益間的矛盾才能最容易获得解决。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需要仲裁委员会的調解。工人委员会和公社都是劳动人民的机关，所不同的是，通过公社他們的个人利益便和他們的共同利益碰到一起了，因此通常是能达到協議的。工人自己是不願意用不现实的經濟要求来損害企业的利益的，因为他們个人的地位和物質情况决定于同一企业的成功和發展；他們也不願意这样来損害他們的共同的社会水平所依据的公社的利益。因此，国家在这方面进行干涉的必要性是很小的，而且通过工人委员会与公社而掌握着自己命运的工人，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兴趣去采用罢工或其他类似的斗争形式。

总之，工人关心的是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他們的工資是按照劳动的成效来支付的；他們是关心企业的总的成功的，因为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分享企业的純收入，就是說，他們或者以附加工資的形式获得一部分利潤，或者企业把这些利潤用于改进企业的生产、住宅建筑、衛生事業、教育事業和提高地方組織——公社的社会水平。可見，不仅对于劳动，而且对于積極参加企业和公社的管理，这种經濟刺激都是非常有力的。工人委员会的民主机构和市場上的自由競賽，使劳动者有可能在現有的物質

条件下爭取更大的成就。我們的全部經驗證明，我們各企業的勞動集體真正能夠勝利地解決這種對生產進行社會管理的任務。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繼承下來的落后和不發達狀態不會引起嚴重的困難。困難是存在的，而且刻不容緩地要求我們作最大的努力來提高工人階級的一般經濟知識和業務知識。由於工業的迅速發展，從農村、從落后的環境中湧來大量工人，於是作這種努力就更為必要了。工人們通過聽講、進訓練班、上學校以及借助於其他方法，每天都在擴大自己的知識，提高自己的素養，以便更好地和更有成效地領導經濟。直接領導企業這一日常實踐是特別有效的學校，通過它，成千上萬的工人委員會和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們（他們每年都更換一次、補充新人）獲得日益更新的豐富經驗。

### 工會的作用改變了

顯然，在這種新的條件下，工會的作用也必須有所改變。企業中的工人委員會和公社中的生產者委員會一經建立，工會就開始喪失了它過去作為整個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的直接保衛者的作用，喪失了作為工人對生產實行監督的因素或工人在社會生產中的首創性的代表者的作用。事實上，工人們已經轉而找自己的機關——工人委員會和生產者委員會來解決這些問題了，因為它們代表着工人的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因為它們在這些問題上是有決定權的。現在，全體工人所面對的並不是僱主，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集中的國家機器；而工人是應該保衛自己的基本經濟利益使之免遭資本家和集中的國家機器的侵犯的。現在是工人自己決定生產問題，是他們自己分配勞動成果，當然，這一切都是經濟計劃的比例和一般法律條例（這種經濟計



划的比例和一般法律条例，使整个联邦和各共和国制定的制度统一起来，确定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其他的(社会利益)的范围内进行的。

在每一个人民议会中都有生产者院，它们是在解决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同另一院(政治院)处于平等地位的。生产者院由选举产生，而且是仅由企业、作坊和农村的直接生产者组成的。可以理解，在这种制度下，对于工人说来，作为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工具的工会已经基本上成为不必要的了。

但是，工会还保留有相当多的社会职能。工会在我国条件下的实际发展表明，这些职能表现在多方面任务的解决上。

第一，工会的某些保护职能保存下来了。工会和公社一起确定工资基本条例，因此，在某些方面，这个条例具有集体合同的意义。这样，由于参加工资率的制定，各部门的工会就保证了同样工作的统一的工资水平。在实施工资率时，工会也关心保护个别工人在企业机构或其他地方因素方面的权利。它们为改善劳动保护，为在卫生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等等而斗争。

第二，工会同时能促进全体工人的直接经济利益同个别劳动集体的利益的协调，争取使各地工人的物质权利和其他权利得到同样的保证，反对个别劳动集体可能发生的、危害其他集体的自私倾向。

第三，工会必须帮助工人提高自己的熟练程度，使它们能在生产自治机构和公社中更好地完成其任务，使它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作用，并有可能最积极地发挥它们的在生产中的主动性。因此，工会特别关怀工人们的经济、业务和其他训练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

第四，工会还必须关心职工们的日常需要和他们的休息与娱乐。它们组织或发起组织食堂、社会机构、疗养地、医院、休养

所、体育运动机构等。

这些都表明工会的职能仍然是很大的；但在實質上，工会將逐漸地从工人階級和經濟斗争的战斗組織变成仅仅为职工們的某些社会需要服务的职工协会。从这方面看来，工会事实上正在轉变为直接生产者自治机构中的一个特殊服务部門。

### 在經濟中实行民主自治的两个基本原理

表面上看来，这就是基本的民主机构在生产、运输、貿易即整个經濟領域中的作用和組織。这个制度是以两个原理为基础的。第一个原理是：任何一个集中的領導，不管它有多么英明，整个地和部分地說来都不能自己管理一般經濟和社会發展。这一傾向的結果必然是官僚主义的专制統治。我們認為，一个集中組織起来的自觉的社会主义活动在这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証社会力量和經濟力量及关系的自由發展，实现那个为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的創造力所必需的計劃作用和指导作用。換句話說，自觉的社会主义活动的目的不是去消灭或代替社会發展的物質自然力，而是去指导这种自然力，把社会主义發展的因素从这种自然力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說，比方，經濟計劃必須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配合和指导个人的劳动主动性，經濟計劃不能是一个發号施令的工具，更不能是把直接生产者变成毫無發揮个人經濟創造性的可能的国家雇佣工人的工具，而首先是一个根据物質条件来保証經濟發展中的适当比例并从而防止生产和經濟关系中的混乱和無政府現象的工具。当然，計劃同时还必須指导总的經濟發展，以求获得最好的社会效果。

第二个原理是：个人最大限度的努力和首創性，不是依靠指示、监督以及对执行情况的檢查（虽然在一定發展阶段上或一定劳动部門中，这些工具是起特別重要的作用的），而是依靠每一

个从事劳动和自由創造者个人的經濟、社会、文化和物質的利益。这一利益應該是社会主义發展的主要刺激力。这一利益，不是那个导致壟断和統治人們的官僚主义中心，而是應該成为这样一种社会动力，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代替个别資本家的資本主义的私有主动性的作用。正統的私人資本主义所有制把人們在發展生产力方面的主动性基本上归結为所有主即資本家的主动性，而生产資料公有制則与此相反，它在存在有适当的、生产者的民主自治机构的条件下，能使这样的主动性成为每一个劳动者的生活內容。

### 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方法

根据这种基本原理，人們常常提出下述問題作为新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問題，这就是：如何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来協調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回答这个問題的同时，就可以回答另一个問題：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中的民主形式和政治形式應該是怎樣的。

我們不是幻想家，我們不認為人类的社会觉悟能比它在一定物質条件下所具有的觉悟程度为高。当然，考虑到社会的經濟可能性，人們常常向社会要求比它能够提供出来的更多的东西。在官僚主义的专制制度下，对这种倾向的回答是政治压力、更高度的集中和制裁，而所有这些最后必然会导致国家这一生产資料所有者和工人(他們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会利用現有的手段——从下意識的消極的反抗和不好好工作到各种形式的積極反抗——来自發地、原始地、自覺地和不自覺地进行斗争)之間矛盾的尖銳化。

反对这种压力的社会主义斗争方法，即解决个人和集体利益間的矛盾的社会主义方法，應該完全不同。这种矛盾的最后

解决办法只能是：使劳动者处于这样的地位，那时，他能对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为个人的物质情况造成的经济后果进行充分的监督；那时，他能平等地和直接地对有关这些关系的重要问题作出决定。只有在这些条件得到遵守的情况下，劳动者才能自觉地和直接地通过生产关系而不是通过对国家施加自发的压力来争取他们的物质利益。在这里，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觉悟，特别是对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的统一与相互依赖的认识，都会得到培养。

因此，对我们说来，生产者自治的原则是任何民主的社会主义政策、任何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出发点。不能为这一发展开辟道路的革命，必然会在某一个时期停滞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和官僚主义专制上面。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必须具备下述条件：

(一)使劳动者——生产者——能在组织上影响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机关，就是说，民主机构本身要和这个社会需要相协调。

(二)使劳动者——生产者——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觉悟及其物质和其他利益的基础上，能够发挥一种同时为集体的社会利益所制约的影响。换句话说，劳动者应该对事情的真实情况作必要的和熟练的观察，以便然后在充分估计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即在充分考虑到对社会的责任的情况下，再作出决定。

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社会的全部组织机构，和它的民主方法一样，必须适合于这些任务。而在我们的制度中起这种作用的，首先就是公社，因为公社是这一机构的基础。

### 关于中央社会机构的作用

当然，除了这些，还必须保证劳动者——生产者——能对中



中央社会机构和国家机关关于分配剩余劳动或国民收入的決議起有效的与直接的影响。在这方面，中央机构还保持着非常重要的职能，这些职能实际上在指导和协调整个經濟的發展。这里指的首先是把国民收入分配为社会上的各种基金，保証制度的原則上的統一，为实现社会計劃而制定指令等等。

在正統的欧洲民主制度下，这类职能（因为在私有制下，这类职能一般是作为国家职能而存在的）是由議會来执行的。但除此以外，議會还执行許多在我国是由公社执行的調节任务，因此，这种民主制的中央机关的社会职能范围，比我国發展起来的民主制度下的中央机关的职能大得不可比拟。当然，正統的欧洲民主制度的組織机构是适合于資本主义的社会地位、作用和結構的。由于生产資料私有制和国家集中制的关系，这种組織机构使劳动者無法直接了解事情的真相，無法了解經濟关系和社会关系，使他們完全依赖于他們的政党。如果没有这样的政党，个人就基本上不能代表什么；甚至于在最自由的条件下，个人通过政党对社会管理所起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因为这种影响是間接的和不經常的。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說资产階級民主制是一种社会主义者應該机械地加以抛弃的政治制度。相反地，资产階級民主制給資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力的發展和进步的社会思潮的确定提供了相当大的場所。任何一个社会，都能在这种民主制的范围内，走完它通往社会主义关系的路程的相当一部分道路。

但是我在这里想說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我想說的是：对于社会主义，资产階級民主制度不能是理想，最多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出發点，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巩固和發展，它本身也必然要开始变化。从政党的政治壟斷躍进到每一个人直接参加对問題的決定，这應該是巩固社会主义民主的決定性步驟。而

这种情况只有在这样的民主的社会管理机构下才可能实现，这个机构一方面是实行分散管理，以便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首先是在经济领域中，以人们自治的原则来逐渐地代替“管理人们”的原则<sup>①</sup>，另一方面又要适当地集中，以便保证对物即对公有生产资料和整个社会的物质力量进行最有成效的社会管理。只有这两个过程的平行发展（而不是，比方说，把人变成为集中的官僚主义机关的奴隶）才能最后导向这样一个地步，即：使对物的管理不再是社会“关系”，而是逐渐地变成为真正为自由的人们服务的明显的社会职能。

由此可见，我们并非像国外常常对我们的分散国家和经济管理事宜的政策所解释的那样，排斥社会职能的任何集中。相反地，我们认为，当代的社会发展并不要求仅仅在个别国家内部把一定的社会职能集中起来<sup>②</sup>，而是日益促使人类进行国际合作和问题的普遍解决。但是，依我们看来，这样发展的出发点应该是握有公有生产资料的自由生产者，就是说应该是生产者的自治，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由于集中的国家机器的压力联合起来的人们的自治。只有这样的过程才能成为作为强制工具的国家的消亡形式。自然，这不是今天或者明天就能实现的过程，而是要经过数代才能完成的任务。

### 公社——社会的基本社会经济单位

我说过，我们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机构的基础，除了工人委员会及其他的生产者直接自治的机关以外，就是以人民委员会为

---

① 另两种译本的译文为：“由人们来统治”的原则；“用人来统治”的原则。

——译者

② 另一种译本认为：现代的社会发展不仅仅要求在各个国家内部实现某些社会职能的集中。——译者

首的公社。到目前为止，我国公社的职能首先是由区执行的，因为公社太小，不能执行这些任务，从1955年起，我們已經普遍开始扩大公社的面积，使它們成为一定的經濟整体。同时，我們把属于从前的区的某些职权移交給公社，而新的、基本上被扩大了区，則将成为几个公社的联合。这种区的任务包括：进行若干共同的工作；协调各公社的發展；保証給落后的和不够發展的公社以帮助等等。这种帮助沒有社会援助的性質，甚至沒有補貼地方預算的性質，这不是它的首要任务，虽然这是它的职能之一。这种帮助的目的首先是保証公社的經濟的和社会的提高与發展。共和国对落后的区，以及联邦人民共和国对較不發达的地区和共和国，也是这样。

公社的力量和重大的社会作用首先在于它在經濟發展方面的行动的独立性，其次在于它和工人委员会及其他的生产者民主自治机构的有机联系。因此，公社不仅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首先是社会經濟机构；它的第一个职能将逐步削弱，而第二个职能則会日益增强。归公社支配的剩余劳动的基本分配，事实上也是通过公社进行的。这样，公社就会直接关心其本地区生产力的經常發展。

人民委员会——公社以及作为几个公社的結合体的区的政治与社会經濟领导机关——的組織結構也是适应于这种性質的。公社的人民委员会通常是一院制的，由該公社区域内的成年公民用秘密投票选举产生。

## 选民大会

人民委员会的候选人不得由任何政党提名（連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也是如此），他們是由公民在选民大会上提出的。各有选举一名委员权利的地區的选民組成选民

大会。选民大会除了提名候选人这一特殊作用外，还有其他经常性的职能，这就是建立选民与其选出机关的联系。全体选民，不论属于哪一个政治派别，在选民大会上都有表决权。出席大会的选民从选民中选出主席团来领导大会的工作。每一个到会的人都可以提一名候选人。当选民提名以后，由选民大会选出的候选人提名委员会便拟好候选人名单，提交选民大会。但是，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只能把选民在大会上提出的人列入名单。在确定候选人名单时，对每个候选人都要进行单独表决。多数出席大会的选民投票赞同的公民被确认为选民大会的候选人。如果大会不通过候选人提名委员会提出的整个名单，该委员会便丧失了职权，同一个大会再选出新的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然后再重复候选人提名的程序。如果一切法律规定都得到了遵守，选举委员会就必须确定候选人。此外，任何一部分公民，如果征集到一定人数的签名，都能在选民大会以外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在公社的同一个选区里可以提出数名候选人，但不得少于二人。

这种提出公社人民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办法，已经在形成新的社会意识方面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人们在确定候选人的时候不是机械地根据他的党籍，而是根据候选人个人，同时考虑到未来的人民委员会委员将在公社中为全体公民的利益而执行的具体任务。这里，人们是由他们共同的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而不是由于政治党派或思想动机。当然，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选举运动中都表现出政治积极性，但是他们在提名候选人时是没有任何特殊权利的。

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原则选出共和国和联邦议会的代表。可是我应该提出，上面所说的提名候选人的制度的肯定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挥。在这方面，发展必将带来新的解决办法，



而后者会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以生产和公社中的自治为基础的特殊民主机构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作为公社联合体的区人民委员会是两院制的，由“区委员会”和“生产者委员会”组成；这两个委员会在解决一切经济性质或社会性质的问题方面具有同等权利，而所有其他的问题则由“区委员会”单独决定。

### 生产者委员会

我认为有必要简短地讲一下我国制度中的“生产者委员会”的作用。这种委员会由选举产生，而且只有直接生产者，即从事生产的工人和职员，其次是劳动农民和手工業者等，才能当选。选举是按照生产小组，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的。每一个生产小组选出的生产者委员会委员的人数，取决于该小组对创造该区生产总量的贡献。

生产者委员会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通过民主的办法来消除落后的社会关系对民主的社会自治机关的坏影响，从而大大地、越来越多地减少国家对这些关系进行行政干涉的必要性。所以生产者委员会的重要作用首先在于：尽管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还少于其他居民阶层的人数，生产者委员会今天就已经通过民主的方式保证了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制度中的主导作用，使各种官僚主义倾向没有可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掩盖下来战胜无产阶级及其政权。

因此，生产者委员会不是某种社会主义民主在一切条件下都必要的因素。在发达的国度里，工人阶级的主导作用，在生产资料一成为社会财产时，就会直接表现在任何一个民主的有组织的机构中。但在像我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就必须有特殊的社会机关来实现这个作用，这些机关将补充公社和高级人

民政权机关的統一民主系統，而工人階級在這一統一的民主系統中的代表，不是和工人階級的数量相适应，而是和工人階級的实际的經濟和社会作用相一致的。这就是我国生产者委员会的最重要的任务。

当然，除此以外，生产者委员会还有可能最好地直接观察生产和經濟中的問題，因此它們也就非常良好地影响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議会有关經濟問題的实际决定。

对于我們的制度也是有批評的。有人說我們在公民中間实行歧視，因为工人的权利比其他公民大些。对我們的生产者委员会制度提出这种批評的往往是这样一些人，他們，比方說，認為在我国由生产者委员会执行的經濟作用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完全由私有者执行这样的事实，不是什么歧視。对于他們說来，資本家几乎是經濟領域中統治一切的主人这点是很自然的；可是他們却認為我們的生产者委员会制度是歧視，在这样制度下，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在解决經濟問題方面是按照他們为社会創造了多少国民收入即为社会創造了多少剩余劳动来决定他們的代表的。如果我們从这个观点来看問題，那末显然这里根本談不到任何歧視，相反地，这里所談的只是要保証一个社会主义原則：創造剩余劳动的人，在分配剩余劳动时也应该享有發言权。

因此，在我們的条件下，这个制度現在証明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反官僚主义的最有效的屏障，因为它使工人階級有可能作为一个階級，而不是作为官僚机器来充分發揮其領導的历史作用，就是說，它会阻止斯大林式地把階級的意志去同国家的或执政党的意志混为一談的做法。

生产者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办法和公社人民委员会一样，区别在于选民大会是按照生产小組并在經濟組織中召集的。

目前，区委员会的选举是直接的，和公社人民委员会的选举原则相同。然而，看起来，代表制度，即区委员会由公社的代表组成的制度，更适合于作为公社联合的区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区人民委员会是由区委员会（由各个自治的公社派代表组成）和生产者委员会（由经济组织的自治机关——工人委员会、农业合作社、手工业组织等——派代表组成）构成的。这样，区就同公社和生产中的各种问题有最直接的联系了。目前，我国舆论界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 关于人民委员会的管理机关

人民委员会挑选某些公民组成各种委员会来领导各管理部门，这些公民由于具有专门知识或其他品质，能够最有力地促使管理机关正确地工作。这是一些不领取报酬的人们，是自愿地、没有代价地工作的公民。委员会对有关经济、教育、保健、内政等方面的管理原则作出基本的最重要的<sup>①</sup>决定，并对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直接执行则属于这些委员会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的专门机构。

如果考虑到这种组织机构以及公社和区的广泛权利，那末就会很清楚，公民直接影响公社活动和整个社会生活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之大，而且随着巩固这一制度的每一步骤的采取，这种可能性必然增加。不仅如此，由于这样的机构和这样的作用，公社正在成为把集体的社会利益同劳动者的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的最适当的形式。在工厂中参加决定工资问题和个人的社会保证问题的劳动者，在公社的体系中，也参加对下列问题的决定，就是：关于劳动者生活在其中的那个集体的其他

---

<sup>①</sup> 另一种译本的译文为：较重要的。——译者

社会需求；关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以增加公社的收入；关于撥款給教育、衛生等事業的討論。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像工資那樣和個人有關的。在經濟上每一個個人消費基金的不適當的增加，會經常使對社會生活的其他部門的物質投資減少，並影響到對生產力發展的指導。在公社制度中，每一個人都必須考慮這一切。這些為每一個勞動者所能容易了解的公社的集體利益，就成了克服要求擴大個人收入的盲目壓力的最重要的武器。要求擴大個人收入的壓力是危害整個社會自治制度的。

由此可見，對我們說來，公社乃是一種決定性的因素和組織形式，通過它們，社會主義力量能夠逐漸克服古典意義上的“國家的”東西，即克服作為階級統治的國家的職能。通過公社，過去曾經是資產階級或個別官僚機構的特權的經濟職能在日益社會化，就是說在停止其為國家機關的職能，並且日益直接轉移到直接生產者或他們的自治機關的手中，轉移到工人委員會、公社以及垂直地聯繫着的自治聯合組織的手中。這樣，公社就日益成為一個把社會由充滿內部矛盾並在這些矛盾的基礎上發展着的階級制度轉變為生產者的聯合（就是卡爾·馬克思說過的生產者聯合，它是在生產者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發展的，或者正確些說，是在自覺地解決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間的矛盾的基礎上發展的）的過程解放出來的政治機構。

### 經濟部門以外的社會自治

除了我在上面已經談到的問題以外，還必須解決非經濟部門，即教育、文化、科學、衛生等等方面的社會管理問題。在這裡，原則上採取的方針也是使國家的干涉逐漸縮小到最低限度，把制度的重心轉移到建立適當的自治機構上。在我們的大學、中小學、科學研究機構、文化機關以及其他類似的機構里，已經



开始建立集体的管理机关；这些机关是由国民議會或人民委员会的部分代表和社会机构的部分代表組成的。这些管理机关（理事会或委员会）依法独立地作出原則上的决定，而这些决定的执行，即对日常工作的领导，则由这些机构的管理处、校长、院长負責，即由業務领导者負責。在这个原則的基础上，社会生活某些部門的自治机关在按照垂直的系統發展着。

在这种分散管理和自治的制度中，怎样保証制度的統一和共同性的社会职能的实现的問題，自然是异常重要的問題。如果說我們是在沿着分散管理的道路前进，那么正像我已經講过的，这并不意味着我們認為現代人类可能在某种地方性的联合中閉关自守地生活。公社不是与世隔絕的天地，它們只是执行与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有切身关系的一定的社会职能。所有其他共同性的社会职能，首先是由联邦和各共和国担負的。

### 共和国和联邦的政权机关的組織和工具

此外，應該說明，公社不是“管理人”的机关，而国家在實質上正是这种机关。公社本身很少帶有“国家性質”，它是組織那些以公有化的生产資料从事工作的人們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要他們在符合于他們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情况下来集体参加对各种事务的管理。但是，国家的职能現在还是存在的，而且只要我国劳动者所处的客觀条件仍然要求的时候，国家职能就将繼續存在。这些国家职能首先是由各共和国和联邦来执行的。

联邦和共和国的主要工具，就是一般地确定自治机关的活动範圍的各种法令和决定，以及社会經濟計劃。社会經濟計劃協調各个独立的集体和机关在生产 and 整个經濟方面的活动，保証經濟發展中的适当比例，指导生产力的發展。联邦和各共和

國的領導機關是國民議會。國民議會是由和人民委員會性質相同的兩院組成的。國民議會通過各專門委員會進行工作，而執行職能則集中於執行委員會手中。執行委員會的作用和政府或正統民主制度中的部長會議的作用相似，區別在於執行委員會不分成各主管機關，而是一個集體的機關，它只是作出各項原則決定，並對各管理機關的活動進行監督，直接的執行和監督工作則掌握在直接對執行委員會負責的國務秘書長的手中。在教育、衛生和社會政治方面，共和國國務秘書長的職權是由委員會來執行的。委員會是集體機關，其委員由國民議會根據有關的教育、社會和其他團體的推薦來任命。在這些形式中，同樣也反映了將集中的社會職能置於公民的最大限度的積極和直接影響下的意圖。

可是我應當着重指出，這些新形式在這裏的發展是比在企業、公社和區中的發展為慢的。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的革命還在為其存在而奮鬥，而暫時的政治困難又妨害前進的步伐，並且有時的確阻礙了它。儘管如此，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們在社會主義活動的這一領域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此外，這裏不能超越階段。只有公社和其他自治機構的進一步發展，才會反過來影響整個國家機器的進一步發展。

### 垂直的自治系統——直接民主制機構 中的第三個基本因素

在中央社會職能的各組織形式的進一步發展方面，各個社會活動部門特殊的垂直自治體系也會起重要的作用。這裏我所指的是這樣的形式，這種形式是在各企業、機關、公社和公民為了解決其共同問題而聯合起來的情況下產生的。這些組織就是我們的經濟協會、經濟聯合會、社會保險機構、各種職業團體等

等。目前国家机关所执行的中央职能，将愈来愈多地逐渐轉交给这些組織，而通过后者，社会自治原则就将在共同职能方面确立起来。公社和这种垂直联系的自治組織的發展，就是最后必将改变国家中央机关的面貌及其形成方式的过程。当然，目前还不应该作什么預言。

\* \* \*

我們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賴以發展的基本原理就是如此。我們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这样的：它确实保證每一个公民都能直接参加管理，允許在这一制度中有不同意見的斗争，保證任何个人的首創性以及社会主义力量运动的广泛自由。同时，社会主义民主的統一制度，又能作为一个整体来防御从反社会主义陣地来的襲击。正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使各种政治壟断形式进入逐渐消亡的过程的最恰当的形式。正統的资产階級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直接民主制之間的本質差別就在这里。前者是国家形式，而后者在最后阶段则是国家消亡的形式。当然，国家的变化和消亡过程的快慢，不仅取决于制度，而且首先是取决于客观因素，如：生产力的發展水平，社会觉悟程度，国际条件等等。但是我們毫無疑問地已經找到了这样的組織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生产力發展或社会主义的社会觉悟的發展中的任何进步，都将同时而且自动地成为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关系發展中的一个进步。

只有这样，在我国条件下，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大多数劳动者的自觉的和自願的努力，并且只有通过这个过程它的内部政治力量才会增长；而这一政治力量则会使国家的干涉日益成为多余的，从而将加速日益自由的民主形式的發展。反过来说，由于人們受社会自治的教育而越来越能自觉地結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社会主义民主也将在同一程度上成为越来越自由的和广泛的。

##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劳动人民 社会主义联盟的作用

我們所了解的社会主义民主，絕對不是把社会發展交給社会力量的自發勢力。社会生活中的自觉性和自發性，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如果先进的社会主义的覺悟不占統治地位，那么在目前的条件下，保守主义的和反动的傾向就将取得胜利。劳动者應該給自己提出具体的目标，并为其实现而奋斗。在这种努力当中，他們的自觉努力越适应社会發展的客观規律，他們的成就也就越大。

由于这些原因，像我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或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这样的組織，現在就是爭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了。它們所代表的是有組織的社会主义覺悟，沒有这种覺悟，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的实现是不可想像的。在巩固了的资产階級民主制度下，各工人政党和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为影响国家政策而进行的斗争起着这种作用。在像我国这样的已經經歷了革命的国家里，曾經是革命的代表者的有組織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有保衛革命的成果和經常地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巩固社会主义的力量，才能在政治上保証这一过渡的發展。否則，在國內外反动勢力和官僚主义的壓力下，它們只能投降，而这就会使社会大大倒退。因此，任何想在这些运动尚未完成其历史作用之前就去削弱它們的力量和作用的企圖，特別是在社会經濟結構落后的国家里，必将以一切內部矛盾的尖銳化而告終，而如果这种企圖得以实现，那末其結果将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遭受灭亡，或者至少是受到極大的削弱。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不是一个政党。誠然，它是工人运动的政治工具，但是不是古典意义上的政党。这里，實質上是



思想一致的人們的聯合，他們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經濟的活動是以馬克思的科學發現以及整個科學社会主义進一步發展的原則為基礎的，他們不要求在国家機關中占壟斷地位，而是在勞動群眾及其自治機關的實踐中為實現社会主义的原則而鬥爭。

勞動人民社会主义聯盟也不是一個將国家和社會管理的特權從人民群眾手中取來交給上層政治集團的某種黨派組織。相反地，它成立的宗旨就是要使這種特權成為多餘的，使社會管理的職能尽可能多地直接掌握在群眾手里。勞動人民社会主义聯盟不是舊式的政治上集中的黨，而是一個廣泛的全民議會，一切和社会主义相聯系的傾向都能在其中得到表現，而且關於社會發展和勞動者狀況的迫切問題的不同意見也在其中進行着積極的鬥爭，這種鬥爭對於企業、公社的自治機關以及中央的社會和国家機關的各項決議有重大的影響。此外，勞動人民社会主义聯盟正是通過這樣的實踐來積極地影響群眾社会主义覺悟的發展，影響人們的政治、思想和業務方面的修養，並教育他們去進行社会主义的社會管理，從而不斷地加強對整個社會生活的自覺的社会主义的影響。

這些組織本身並沒有促使官僚主義加強的危險。官僚主義現象的根源並不在於這些組織的存在本身，而是在於這些組織的一定的社會地位，就是說，在於它們是否和萬能的集中的國家機構相溶合。但是，如果它們和直接民主和自治的機器相聯結，也就是說，如果它們不是通過行政機構，而首先是通過群眾去活動，那末它們就應該成為反對官僚主義鬥爭中的積極因素和社会主义民主發展中的自覺行動的代表者。

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共產主義者聯盟或勞動人民社会主义聯盟的某些政治壟斷在我國社会主义發展中是長久必需的，或者我們的政治制度有意要永遠禁止成立政黨的趨向。相

反地，社会主义經濟关系的稳定情况的加强（这实际定会消除在經濟上倒退到資本主义去的可能性），無疑地将逐漸消除人們政治活动中的行政限制。从理論上說，我甚至不否認，在这种情况下，会暂时出現成立正統資產階級民主式的政治联合的傾向，也就是那些在目前仍然存在于我国的反社会主义集团中的傾向。然而我同样确信，这仅仅是落后的政治觉悟性的表現，沒有任何现实的存在前途。

直接民主制机构的發展和社会的自治，将使社会生活的这些形式成为多余的。不同意見的斗争将会直接开展起来，正像目前在我們的社会自治机关中已經开展起来的那樣，也就是說，人們将根据对具体問題的解决和按照对当前社会任务的具体观点組織起来，而不是組織在静止不动的政党形式中，因为这种政党形式仅仅适合于階級斗争的时期，而人們在这个时期是按照階級利益、不是按照共同的迫切社会問題組織起来的。

当然，由于同样的原因，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作用以及其他任何旨在为建設社会主义而进行思想和政治斗争的政治組織的作用，将会随着時間而变化。群众的高度觉悟和以資本主义剝削形式完全不能复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关系的稳定，将造成一种情况，那时候，社会主义关系将成为不容置辯的每日实践，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比方說，会像在十九世紀的英国（这时資本主义已經完全成了英国社会生活的統治因素）来进行爭取資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斗争是多余的一样，也是不需要的了。这样，任何一个以进行爭取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为基本目的的政治組織都要成为多余的，或者根本地改变自己的性質。

### 实际和远景

然而，今天在經過巨大努力后剛剛开始摆脱落后状态的我

国，这个任务还远沒有完成。我們不是那些把自己的願望和客觀现实混为一談的空想家，就是說，我們不是那些看不到所有这些过程和我們社会物質力量的發展之間的相互联系的人。我們每天的实践完全是由我們的物質可能来决定的，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沿着上述方向的發展速度也是从物質上决定的。因此，如果我們把进一步發展的前景揭示出来，那末，無論如何我們都不会墜入認為可以超越我国社会所必經的阶段的幻想境地。相反地，我們面前摆着的前途，絕對要求自觉的社会主义力量去动员和組織那些在目前阶段上能够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發展的政治因素和物質因素。而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及其国家还应该起这种作用。放弃这个作用，就等于放弃革命和社会主义。

\* \* \*

我在介紹这些情况的时候，既沒有談到我們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遭遇的困难，也沒有講到我們的缺点和失敗。我之所以沒有講到这些，并不是由于缺乏批評精神，或者是想把真实情况美化起来。不言而喻，在我国的发展中也有各种趋势在活动着，它們常常對我們的發展起不利影响和阻碍作用。关于这些，我是可以談很多的。可是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暫时的現象，它們有时会障碍事物的發展并使之倒退，但它們終究是暫时的和非本質的現象。重要的是，除了客觀的关系和社会自治机构以外，在南斯拉夫是否存在着能够引导社会主义發展过程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力量呢？重要的是：整个政治机构的运动方向是否明确呢？重要的是：主导的政治力量是在促进这些过程还是阻碍着它們呢？重要的是：日常的政治和經濟活动的結果是否使我們接近这一目标呢？自觉的社会主义的行动必須有明确的直接目的和明确的前景，以免陷于盲目的实践主义，因为在我們的条件下，实践主义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毫無疑問，我在这个概括的

講演中所企圖作的对我国内部發展情况的分析，对这一切問題都会提供肯定的回答。正因为这样，我才只談到了我国内部發展趋势中的巩固的东西，而沒有談仅仅有暂时意义的現象。

总起来講，对于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問題和趋势所作的这一說明，清楚地表明：我們仍然处在醞釀和使形式与內容相結合的阶段，但是發展方向已經明确地确定了。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大家視之为从正統的資產階級政治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今天还在談論着的“經濟民主”，在我国已經开始成为现实，并給我們提供了初步的結果。它是我們社会主义民主的出發点。革命使得資產階級間接民主的多党制不可能重演，因为革命不能容忍在政权制度本身做階級妥协。但是，革命同时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道路，在这种民主制度下，每一个工人，如果他接受并且理解这一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的話，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像我已經指出的，这一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基本形式，就是生产者的自治、生产者委员会、公社、社会管理形式、自治的联合等等。这些因素一旦开始存在和活动，它們便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开始改变整个政治制度。我們認為，这些民主形式的意义就在于此。

这样，它們就成了我国国内社会进一步發展的关键。繼續巩固和發展它們，就是保証我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方向上的进一步的自由發展。任何別的道路都只能使我們倒退。

我們所獲得的結果，作为一般社会主义的經驗，当然对于其他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具有相当意义的。誠然，我們决不認為，我国發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形式可以为任何人所机械地搬用，但是世界上每一个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的人，都不能忽視我們的这些經驗。



## 对有关南斯拉夫国内政治 发展问题的回答

(原载1955年2月1日“国际政治”第116期)

卡 德 尔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驻贝尔格莱德记者路易士·蓬坡里托向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爱·卡德尔提出下列问题：

(一)南斯拉夫是最彻底地争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及国家集团间彼此共处的国家之一，铁托元帅访问印度及缅甸所获得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共处的思想日益为自己开辟道路，如果它成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可能性日益增大，那末，副主席先生，您是否认为这一思想也必然会运用到各国的内部生活？共处实质上就是容忍和互相谅解，放弃强迫方法及强迫人家接受自己意见的意图。在对外政策方面，共处可使战争消除，在对内政策方面，它必然会导至放弃革命（这不等于放弃革命所已获得的成果）。南斯拉夫的内部情况是否允许缓和一下矛盾，放弃某些极端行动，在个别人物间、各个有组织的集团间、人民和政府间建立起比较有弹性的关系？

(二)副主席先生，您能不能向意大利舆论界解释一下您在南斯拉夫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实行的那种您称之为“公社”的新因素的意义？这种新因素将怎样促进你们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民主化？您是否认为“公社”能够消除官僚主义和垄断倾向的危险，简言之，即斯大林主义（它对任何以一个政党为基础的社会都是危险的，而它也不可能利用西欧型的议会制度）的危险？

副主席卡德尔对这些问题的了解答，现在我们把它全部登载出来：

因为您的两个問題实际上就是一个問題，因此我将同时回答这两个問題。

国际关系中的共处政策，照我看来是相当明确的概念。問題在于怎样积极地朝和平的方向和在具有不同制度的各国关系中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方向努力。

不大明确的是应该怎样来理解各个国家内部社会生活中的共处政策。对这問題我可以有两种了解。首先我可以把它了解为这样的問題：我們是否認為对立的社會傾向之間的斗争及社会在欧洲古典民主的各种形式下繼續进步是可能的？即社会通过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逐渐改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方法而繼續进步是可能的？我不能断言說这在原則上不可能。相反地，这种可能性不仅已存在于許多国家，而且它們已开始变成现实，也就是說，在有些国家中，一般說来已不可能有某种其他發展形式。也許这些国家的数目将日益增多；在目前这首先和很發达的国家，即現代资本主义已發展了 100—150 年的国家有关，此外，也和那些直接或間接参加过殖民剝削，从而获得別国所沒有的物質資源的国家有关。漫长的历史發展，在世界上的特权經濟地位，国内較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在这一經濟基础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主傳統，——所有这一切都在緩和着国内社会矛盾的尖銳，——这首先就是利用欧洲古典民主形式逐步把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社会主义关系所借以發展的基础。較晚走上历史舞台（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舞台，也包括资本主义的历史舞台）的国家，情况就不同。今天，世界西部資本的大規模国际性集中不会使落后国有任何可能在自己的内部發展中簡單重复西方世界近百年来所經歷的过程。發达的国家和不發达的国家間的鴻沟正在加深，而在这方面簡單运用旧的經濟工具，例如像老的生产方式所做的那样輸入外国私人資本，就会使这些国

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依附于發達的大國，這不僅使發達和不發達的國家之間的鴻溝加深，而且還使大國之間的矛盾尖銳化。正是這種意圖在關心某一政治制度的借口下干涉着他國內政，這種意圖是大國間進行鬥爭的主要工具，此外，它們還使大國內部的矛盾尖銳化。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具有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其他國家相比之下經濟上處於不平等地位的小國和不甚發達的國家，想保持穩定的歐洲古典民主的政治制度，比經濟上發達的西歐國家困難得多，這在目前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條件下，無疑會產生特殊的形式，它們常常是強大的革命運動的形式。

南斯拉夫的情況也是這樣。舊南斯拉夫是作為一個比較落后的國家而跨進國際資本集中得最厲害的紀元的，它處在外國資本的手中，有着不發達的資本家階級，這一階級基本上是靠外國資本的施舍度日的，它根本不能用某種方法來促進我國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此外還必須補充這樣一個事實，即舊南斯拉夫是一個帶有舊制度的各種殘余的多民族國家，這些舊制度的殘余曾一度統治着我國的某些部分。這些事實使舊南斯拉夫的內部矛盾尖銳到如此地步，以致任何一種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基礎的政治制度都不能在它內部穩定起來，而歐洲古典民主的形式尤其不能發展。從1918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南斯拉夫除了幾次短時期的失敗嘗試外，實際上從未有過西歐型的議會制度，這幾次嘗試的失敗只是証明了在具有南斯拉夫那樣尖銳的矛盾的條件下，這種形式是不可能存在的。

擺脫這些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當革命勝利時，它就必須按自己的邏輯向前發展。革命的目的不在於宣布這種或那種程度的“一切人都能享受的自由”，甚至即使它為自己提出了這個目的，它也是不能付諸實現的，至多害了自己。

革命——这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它的任务是消除旧的經濟关系和政治关系所用来限制国家物質进步的障碍物，以及在已經改变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新的物質过程或使它們动作起来，这种物質过程将会逐渐創造物質条件和政治条件来緩和及彻底消灭妨碍新社会在內政方面完全稳定下来的矛盾。这里我所指的首先是生产資料国有化和努力使国家工業化，这必然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上的稳定創造經濟基础。換句話說，这样就不仅使經濟力量对比关系起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而且也开始了物質基础的建立，沒有物質基础就不能想像在一个数十年来受尽不可調和的內部矛盾的折磨的国家中人与人之间会有自由的关系。显然，随着革命的胜利，在国内的物質关系和政治矛盾方面，除了政权改变之外什么也沒改变。因此，期望革命能确立西欧民主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毫無意义的，这种制度甚至连南斯拉夫資產階級本身也不能确立，即使在革命力量已准备作这一試驗的情况下，这一試驗也会像以往一切試驗都遭到了失敗一样，以徹底失敗而告終，所不同的，只是这次它不仅在社会主義傾向上，而且在一切民主傾向上都会遭到长期的慘敗。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正是在这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返回到西欧的民主形式吧，那就是重新把国家拖入它原有的內部矛盾中，并由于我所提到的原因而重新使民主力量遭到沉痛的失敗。仍旧采取作为革命在生产和經濟关系中的最初表現的国家主义形式吧，則意味着确立和加强官僚主义制度及其一切政治后果，也就是說，有可能使政治专制出現，使內部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我們由此而得出的很自然的結論是：民主主义当然是社会主义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一个經過了革命并用革命的方法把基本生产資料公有化了的国家中，民主形式應該是有機地从新的經濟关系中，从新的社会經濟基础中成长起来，而不



是简单地重复那些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形式。不错，在这条道路上必须开辟一个新的方向，这对肤浅的社会主义者及近视的民主主义者说来当然比回到已被踏平的老路上去困难些。其实，这条道路并不是比较困难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是一条唯一可能的道路。任何其他道路不仅会使革命失败，而且会使任何民主主义都遭到失败。

现在我来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我想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一问题提得更精确些。我不认为官僚主义的威胁，或者您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威胁，仅仅是所谓“一党制度”的威胁。首先，我们的制度不是“一党制度”，而是，简单地讲，“无党制度”的萌芽。此外，您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不仅是“一党制度”的威胁，而且也是任何“党的”制度，同时包括多党的制度的威胁。当国家实行了生产资料国有化以后，同时还保存着纯粹的国家主义形式，即把生产和生产者——工人——放在官僚们的不民主的行政管理之下，我认为这就是官僚主义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即在官僚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思想含义上，即使在西欧已经国有化的生产中，您也能找到随便多少个“斯大林主义”，而且，必然的经济发展越是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生产中的国营成分的干涉，斯大林主义也就会越多。许多民主主义理论家没有看到这一事实，他们手忙脚乱地抓住旧的古典民主形式而没有看见，正是这些形式正在一步步越来越深地陷于国家对生产的控制中（当然，如果它们和国家行政管理相结合的话），它们日益因官僚主义加强而毁灭自己。因此，西欧型的古典议会制度在目前并不是一种治官僚主义的药剂，相反地，它将加强官僚主义，如果只要它在那些要求在生产中及管理社会生产中的民主权利的劳动群众的压力下还不自己开始转变的话，它就会加强官僚主义。

根据我們的意見，唯一的反对官僚主义的现实手段就是从国家主义过渡到生产资料的真正公有，而这就是过渡到生产者（工人和技术人員）在生产资料已公有化的部門中的民主自治。經濟关系中的这一简单改变必然会对政治制度的整个發展起决定性的影响。我相信，正是生产中的工人自治問題是現代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中心問題，但是这本身不是十九世紀的民主主义教条。当我们采取建立工人委员会和生产者委员会的方针时（我要強調一下，这一方针的开始还在和苏联發生冲突之前），就預定了我国整个民主机构的發展（在这一發展明显地排斥机械地返回到欧洲古典民主这一意义上）。我也相信，在各个目前还是欧洲古典民主为統治形式的国家中，欧洲古典民主将要开始，并且从直接管理生产已成为全体职工的民主要求和权利討起已經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地开始轉变为某种新的东西。

这一改变首先是向两个方向發展的。第一，它要求最大限度地分散管理，也就是說，要求有可能使各色各样代表公民的共同利益的复杂問題，能由公民們在自己的民主自治机关基層組織中解决。我們公社的發展是附合这一目的的。在联合了城乡全体生产者的公社的範圍內，公民可以解决大部分有关人們日常生活及在公社区域內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問題，当然，这是在中央社会机关所通过的总的經濟計劃範圍內进行的。經濟計劃并不是对具体實踐的詳尽指示，而是保証經濟上总的比例的指導工具，經濟上总的比例保証每一社会单位都能自由無阻地發展。与此相适应，中央社会机关的职能就很少了，也就是說，它們只留下實質上是共同性的那些职能了。

工人委员会發展的第二个方向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以及同各个社会活动部門、組織和机关的直接需要相适应的自下

而上的民主的自治联合。工人委员会或各个部門的企业联合起来以便解决共同的問題。在社会政策、教育等方面也有类似傾向。在这以前还在国家机关管理下的中央职权日益轉到这种自治联合手中。在工人委员会、公社及这些垂直地联系着的自治制度中，一般說来，那种叫做党的政治方向的东西还没有得到表现。在这里，有关人們之間的关系的問題日益减少，而有关人們共同对待物，有关人們共同管理物的問題却日益获得統治地位。人們为了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直接着手解决問題，而不再通过任何一种典型的政党。政党在这里并不为人們所需要，它妨碍着人們。爭論常常是激烈的、直接的，同时是創造性的，但却不是政客式的，因为在这里，个人利益是和集体利益互相依賴的。因此，这就是我們称之为直接民主的东西。这对我們說来是进一步發展社会民主制度的起点，更精确地說，是稳定民主政治秩序的起点，在这民主政治秩序的范圍内社会主义关系将繼續無阻碍地發展。这一制度在进一步發展共和国和联邦的国家机关时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至于說到工人委员会，則今天我們已沒有任何必要讓国家去保护它們或讓某一个政党在国内从思想上去維護它們。它們簡直已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以致今天已沒有任何人能廢除或削弱它們。至于說到公社和垂直联系的自治制度，則我們还仅仅处在發展的开始，还只走了最初的几步。但是，即使是最初的成果也已經指明：我們的劳动群众正如接受工人委员会一样地接受着它們。明天（我想这明天不会很遙远），当公社和自治制度如我所想那样变得和工人委员会一样有力时，我們的共和国的和联邦的中央机关将更适应这些新的因素。

由于我們政治制度的这种發展，我們得到了两件东西。第一，剝夺了官僚主义的最重要的經濟基础。官僚主义不能通过

国家管理机关表现出来，因为这一机关的职能在今天已缩小到国家这字的最狭小的含义，即已缩小到只是维持秩序而不干涉在公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此外，政治机关在经济中不是生产的主人，而仅仅是生产及生产组织中职工民主自治机构的政治机关。如果官僚主义的残余还起着作用，那末这首先是由于机构还年轻、劳动群众的觉悟还不够高、自治机构的经验还不够，以及由于特殊的内政关系，这种特殊的内政关系一部分是和新南斯拉夫从诞生时起就遭到而直到现在还在遭受着的国际压力有关，一部分是和目前仍然存在，而且在这种国际压力的条件下获得更大意义的内部社会矛盾有关。第二，在我已提到过的直接民主形式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一切政治垄断因素都能逐渐消亡，也就是说，在这种形式中，关于“一党”制或“多党”制的争论将是不恰当的。因为在直接民主的机体中，争论一定能够在较任何“党”的制度下更广泛得多的基础上展开。在这一意义上，要在我国组织某种以社会主义作掩护的新政党和党的议会制（尽管这些党的首倡者主观上真的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尝试，客观上无非是这样一种形式，在这形式中，不愿放弃政治垄断的官僚主义残余把自己和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的生产者自治的发展对立起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直接民主这一逐渐使国家职能消亡（在某些省消亡的快些，另一些省则慢些）并同时消灭任何政治垄断的形式的方针，作为我国自觉的社会主义活动的基础。因此，想要在南斯拉夫建立新政党或党的议会制的企图，无非是把采取恢复某些人（他们已开始抱怨说，他们已不再有以前的权力，他们甚至没有获得权力的希望）的政治垄断的形式而重新确立官僚主义（不管是说旧南斯拉夫的残余或是战后国家官僚主义的残余）的企图同这一反官僚



主义的方針对立起来。現代世界上的內部矛盾的怪事就是明明反民主和反动的行为却表現为維護民主主义。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要使那些不知內情的人把否認某些过时的民主形式和爭取新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当作反对民主。

您关于国内共处政策的問題，我还可以有另一种了解，那就是这样一个具体問題：我們日常政治实践中的爭論形式能不能更自由一些？当然，对于這個問題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您。但是这里涉及两个具体問題，这两个具体問題是講到這一問題时所必須注意的。一个就是进行爭論的民主机构的發展問題，另一个是爭論的出發点問題。因此，由于我前面所說的原因，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建立以党为基础的西欧議會制不仅是向后退，而且在事实上也不可能，我們要进一步發展更自由的爭論形式的意圖，只有在循序漸进地进一步建設我已經講过的直接民主机构的制度时，才能得到結果。这一机构所提供的爭論的可能性，不可比拟地多于古典議會制。今天，我們在建設这一机构中还只是跨了最初的几步，但在許多方面已远远地超过了西欧議會制。这里我所指的首先是社会經濟生活，我国公民对社会經濟生活的影响是比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大得多和直接得多。

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爭論的出發点問題，今天在純粹的实际見解中仍然起着很大作用。在国家經濟發展中或在改变它的社会經濟結構时，我們仍然还没有达到保証社会主义民主机构的令人滿意的穩定性的結果，特別要注意外国干涉南斯拉夫內政的經常的嘗試。因此，我們的立宪制度是用来發展直接民主机构的，是受法律保护的，这种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帶有用革命方式解決問題的痕迹。这一痕迹在我們的立法中逐漸消失，但在有一个問題上它仍然是强大而不可避免的。那就是：我們的宪法在直接民主机构內部的爭論方面越是自由，它也就越殘酷地

反对一切想要把内部发展或是转向国家官僚主义专制或是转向恢复所谓多党制的企图，在我国条件下，这种企图除了是旧社会的残余的结合或国家官僚主义的加强外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政治意图的出发点是两个反动意向，尤其是外国援助还是它们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那末这种政治意图在我们这里实际上是被行政手段所排挤的。在这里，民主权利之所以被限制于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正因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必须防御有意或无意的反民主反社会主义行为，否则它就会被消灭。当然，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稳定也会缓和这一方面的尖锐性，但是今天仍然存在着这一事实，即任何在其内部政治斗争中有意无意地采取这两个意向之一作为出发点的人，事实上必然得到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结果。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为了自由的言词而断送民主的及社会主义的事业。

直接民主机体每向前发展一步，就使我所讲过的这两个意向愈益成为不合时宜的东西。我并不想说，在直接民主制度中，我们在原则上或某种形式上已排除了人们根据他们在解决一定的共同社会任务时所采取的立场而结成的集团，这种集团归根到底也是政治集团。但是这一过程应该由管理着物的人们的实际需要中发展起来，而不是由贪图权势、经济特权或官僚主义地发号施令的人们的虚荣心中发展起来的。直接民主制度中人们的这种集团不需要某种确定了党作为国家制度中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如古典资产阶级民主中所有的那样），而需要积极地参加数目众多的自治机关，这种自治机关正在日益代替古典的国家机体。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不再是国家上层人物中争夺政治垄断的斗争，而变成了只是集体参加社会管理的平等的人们进行争论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每一个决定都有其特殊的多数和少数。当然，这种制度只有在社会对抗性已不再占政治地位的

社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無疑地，我們的民主制度也有它自己很大的缺点和弱點。这是有着自己的前途，并在社会对抗性仍然起很大作用的过渡时期中成长起来的年輕机构的弱點和缺点。在历史上，新事物总是遭到进攻的。因此，进攻我們是十分自然的事；有些人是存心不良，怀有某种同社会主义及民主主义都毫不相干的政治目的，而另外一些人則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

# 关于公社和区的新机构的一般法

(1955年公布)

## 一、基本条款

### (一)本通則的目的

第一条 在通过关于公社和区的自治的联邦法以前，本通則确定公社和区的条例，并保证成立新区和新公社以及通过它們章程的法律根据。

### (二)公社和区

第二条 公社是劳动人民的基本政治区域自治組織，并且是一定区域内的居民的基本社会經濟联合。

除宪法或法律中规定屬区、共和国或联邦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屬实行自治的經濟組織和社会机关的权利和义务之外，公社执行管理公共事务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第三条 区是劳动人民的政治区域自治組織，并且是公社和居住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的社会經濟联合。

区执行和管理对公社有共同利益的事务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事务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 共和国区域内的公社和区由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

由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确定哪些公社組成統一的市鎮区。

第五条 公社和区为了执行它們的权利和义务起見，具有由法律保障的自己本身的收入来源。



第六條 特別聯邦法律和共和國法律規定哪些事務應從區人民委員會的現有職權範圍轉歸公社人民委員會推行。

第七條 公社和區的權利和義務由它們的章程根據本通則的決議以及根據聯邦和共和國關於公社和區人民委員會職權的法律加以規定。

規章並規定人民委員會以及公社或區的其他自治機關的組織、活動範圍和工作方法。

公社章程由公社人民委員會通過，但由區人民委員會批准。

區章程由區人民委員會通過，但由共和國國民議會或自治單位的代議機關批准。

第八條 人民委員會以及公社和區的其他自治機關按照法律和其他指令所規定的活動範圍執行公社和區的權利和義務。

第九條 人民委員會在委員會或議會的會議上執行歸它管轄的事務，行政事務和管理事務通常經過自己的委員會來執行，而管理事務尚須借助於自己管理機關來執行。

第十條 只有根據法律才能在公社中為執行區人民委員管轄的事務而設立直屬區機關的管理機關。

第十一條 區人民委員會不得將自己職權內的事務轉交給公社實施，因為個別事務必定要由聯邦或人民共和國相應職權範圍內所通過的聯邦法律或共和國法律作出決定。

第十二條 區人民委員會應使市區內的公社委員會在市政事務以及其他對公社有共同利益的事宜方面的活動協調一致，並為此而作出決議、總的市鎮集中和正規計劃，批准市政建設的遠景計劃和年度綱領，建立個別市鎮機關，並決定公社參與保證為執行規定事務所必須的資金的事務。

為了執行這些事務，區章程可以規定成立市鎮議會，其組成有市鎮區域內選出的區議會或區人民委員會生產者院的成員，

或一定数量公社人民委员会委員，或区和公社人民委员会委員。每一个公社人民委员会根据其居民人数把自己成員选入市鎮議會。

按照区的章程，只要市鎮区域内半数以上公社提議，就可以成立市鎮議會。

第十三条 区人民委员会或市鎮議会在对市鎮公社有共同利益的事务方面的职权由区的章程加以規定。

市鎮議会的决定和決議是在該市鎮区域内必須执行的，并且市鎮公社人民委员会也应执行，如果在决定或決議本身中沒有規定区执行机关和管理机关應該执行它們。

市鎮議會不能按管理制度作出决定。

市鎮議會的工作是否合法，由区人民委员会进行監督。

如果公社人民委员会認為区人民委员会或市鎮議會的行为侵犯了它的由法律規定的某种权利，它有权向人民共和国或自治单位的执行委员会提交維護自治权的說明，如果公社人民委员会認為区人民委员会的行为侵犯了市鎮議会的由法律規定的某种权利，它也有此权。

### (三) 地方委员会

第十四条 为了使公民尽可能更广泛地参加公社自治以及执行对当地居民有直接利益的个别事务，可以在公社区域内的个别地区內根据公社人民委员会章程成立地方委员会。

第十五条 地方委员会由成立地方委员会的区域內选出的公社人民委员会成員以及由本地区內选民在选民会上选出的一定数量成員組成。

选民册上登記过的并定居于地方委员会所屬区域內的每一个公民都可选为地方委员会委員。

**第十六条** 地方委员会討論对本地和公社有直接利益的事务，并向公社人民委员会提出自己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議和意見。

具有比較重大意义的問題，地方委员会必須預先提交选民会予以討論。

**第十七条** 地方委员会帮助公社人民委员会及其机关組織和执行它們在自己所屬区域中所进行的事务，并且独立自主执行对本地有直接利益的以及由章程或特別决定确定公社人民委员会从其职权中移交出来的事务。

**第十八条** 公社人民委员会有权監督地方委员会的活动。

公社人民委员会有权取消或廢除地方委员会違反管理制度所进行的非法行为和不正确行为。

**第十九条** 为执行地方委员会的任务所需的經費在公社的預算中予以保証。

## 二、人民委员会組織

### (一)人民委员会的組成

**第二十条** 公社人民委员会委員人数以及区議会和生产者院的委員人数，由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根据以下一般限額加以規定：

公社人民委员会有15人至50人；区議会有50人至100人。

区人民委员会生产者院有区議会成員的四分之三到区議会全体成員。

### (二)人民委员会主席

**第二十一条** 人民委员会主席除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共同法

的決議給他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外，還能夠延緩執行委員會違反管理制度而作出的非法法令。

主席必須將他延緩執行的每一個法令提交人民委員會，以便人民委員會在下一次會議上對它作出決定。

**第二十二條** 人民委員會可以有副主席，他和主席同樣方法選出。

當主席暫時缺席或有事時，副主席可代替主席。

副主席執行主席活動範圍內的一定事務，其限度由人民委員會規定。

副主席如果經常忙於執行自己的職責，就有固定月薪和帶薪的年休假權。

**第二十三條** 區人民委員會可以有副主席一人或若干人。

在一個區人民委員會中，最多只有兩個副主席能夠由於自己的工作而領取固定月薪。副主席如果經常忙於執行自己的職責，他只有固定月薪和帶薪的年休假權。

### (三) 委員會

**第二十四條** 委員會是為完成一定行政事務和管理事務而成立。

委員會根據人民委員會的章程而成立。

**第二十五條** 委員會的主席和委員由人民委員會選舉。

人民委員會最少從自己委員中選出二人為委員會的委員，其餘的委員由以其學識和經驗可以促使委員會順利進行工作的公民選出。

如果人民委員會會議的議事日程上有屬於委員會活動範圍內的問題，不是人民委員會委員的委員會主席可以參加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但是不能參加表決。



#### (四) 管理机关

第二十六条 为了直接运用法律和其他指令，为了专门修改和准备人民委员会及其机关的法令，执行它们的决议，为了进行管理方面的其他事务以及属于它职权的行政事务和技术事务，人民委员会设有相应的管理机关。

公社人民委员会的管理机关可以有：分部或独立部、管理署、局、所、管理委员会、检查处、地方局等等。

区人民委员会的管理机关可以有：秘书处或分部、管理署、局、所、管理委员会、检查处、部等等。

各个人民委员会中将设立何种管理机关，它们的活动范围如何，均以人民委员会的事务和需要的范围而决定。

管理机关根据规章或在规章的范围内由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而成立。

第二十七条 管理机关在执行属于它们职权的事务时，按管理制度作出决定，监督法律和其他指令的执行，采取有全权完成的管理上的法令和措施。

第二十八条 人民委员会管理机关执行属于人民委员会职权的一切管理事务，只要其中某些事务已由法律、某种其他指令或章程规定没有转交给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议会、委员会、公社或区人民委员会的其他某一机关实行。

第二十九条 管理机关独立自主地根据法律、最高国家机关的指令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及其界限，并符合人民委员会及其委员会的总活动方向来执行属于它们职权的事务。

除了按管理制度制订的法令以外，人民委员会和相当的委员会能够取消或废除人民委员会管理机关的每一个法令。

## (五) 人民委员会秘書

第三十条 人民委员会秘書关心人民委员会管理机关的組織和活動, 协调它們的工作, 向人民委员会及其委员会提出对較重大問題的法律意見, 根据指令将人民委员会職員分配到各別基本組織单位, 并执行根据最高国家机关的指令屬於他的职权內的其他一切事务。

秘書参加人民委员会的會議, 并且可以参加委员会的會議。他有权参加討論, 但無权表决。

第三十一条 人民委员会秘書可以停止执行人民委员会管理机关違反管理制度制訂的法令, 只要查明它們和法律有冲突, 并且他必須把每次这种情况立即通知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如果秘書認為人民委员会管理机关違反管理制度作出的决定是不正确的, 或执行这种决定将会遭到損失, 他就应立即将此通知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 (六) 法官和法院

第三十二条 在違反公社人民委员会決議中規定的秩序时, 以及在違反其他決議所規定的并且不屬於区法官或其他国家机关管理的一切事件时, 都运用民事和刑事的訴訟法; 这种訴訟法以及案件第一审由公社法官审理。公社人民委员会选举和撤免公社法官及其助理。人民委员会可以选举法官二人或若干人。

第三十三条 公社法官作出的訴訟判決由区法院二审决定之。

法院由法院院长一人和律师法官二人組成。法院院长为区

人民委员会委任的区法官。

律师由地方委员会选举的陪审员名单中推选出。

第三十四条 区法官审理属于他职权内的第一审违反程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

区法官的诉讼判决由共和国内务秘书处直属的法院二审决定。

第三十五条 共和国内务秘书处直属的法院，按照违反秩序根本法第一章第五十七条的精神监督区法院的工作；区法院院长按照同一条款的决议的精神监督区领域内的公社法官的活动。

### (七) 地方局

第三十六条 为了使一定的公社服务机关大大接近居民，公社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章程为个别地区设立自己的地方局。

地方局的活动范围由公社人民委员会的章程和决定根据共和国法律的决议予以规定。

地方局的工作由公社人民委员会委任的职员领导。

### (八) 人民委员会的职员

第三十七条 人民委员会职员是国家职员。

人民委员会职员的地位由法律规定。

在新的职员法通过以前，本通则将适用于人民委员会职员的一定关系。

第三十八条 人民委员会职员遵循相当机关的法律和指示，独立地和个人负责地执行自己在一定的活动和权限范围内的公务。

第三十九条 职员只能委派担任规定的职务。

职务以及审定某一职务资格的条件，在公社人民委员会的机关中，公社人民委员会征得区人民委员会同意而决定，在区人民委员会机关中，由区人民委员会征得共和国或自治省执行委员会的同意而规定。如果应该同意的机关在两个月内未作出决定，那就认为已经同意。

**第四十条** 公社或区人民委员会的职员按聘请的办法任命。

公社职员的聘请由公社人民委员会所属委员会任命，而区职员的应聘由区人民委员会的人事委员会任命。

上面提到的委员会根据规定的行为评定，那些候选人能履行法律和聘请所拟定的条件，并建议委任，更确切说，从履行一切条件的候选人数当中委任执行该公务最合适的人。委员会在其关于委任的建议中应该指出合乎条件的一切候选人的姓名。

人民委员会根据聘请所得的结果任命秘书、主要管理机关负责人和检查员，而其他职员则由挑选任命委员会或人事委员会任命。

如果认为聘请没有根据规定的办法进行，或者认为被委任的人不能履行法律和聘请所拟定的条件，那末参加聘请的人或法律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可以对委任的决定提出控诉。假使解决控诉的机关查明，应聘没有根据规定的办法进行，那它就可废除任命、解除聘请，而在其他场合，它只能废除委任的决定。

**第四十一条** 要委任公社人民委员会秘书、主要机关和管理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公社人民委员会的检查员，必须征得区人民委员会的人事委员会同意。

要委任还不具有委派担任职务所规定的资格或者没有经过承认具有必要资格的考试的公社人民委员会职员，必须得到区人民委员会人事委员会同意；要任命不具有相当资格或没有经



过相当考試的区人民委员会职员，必須征得共和国的預算和国家一般行政秘書长的同意。不合規定資格的条件的职员，只能作为代理职务的人委派担任某一职务，在这种場合，挑选任命委员会或人事委员会必須在共和国执行委员会規定的日期內重新进行聘請来补足这些职务。

如果反对还没有得到上面所提到的人事委员会同意的决定，可以向共和国的預算和国家一般行政秘書处申訴，如果反对尚未获得上述提到的共和国国家秘書长同意的决定，可以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申訴。

第四十二条 关于解除职务或关于停止职员工作的决定，由負有委任职员的职权的机关作出。

要解除公社人民委员会职员的工作，必須征得区人民委员会人事委员会的同意。

第四十三条 人事委员会或共和国預算和国家一般行政秘書处应檢查任免是否根据規定的行为进行，如果委任时遵守法律和聘請所規定的条件，而开除时遵守法律規定的条件，那就應該同意。

第四十四条 人民委员会主席公布关于任命或解除由人民委员会任免的职员的决定，只要法律上規定非这样不可，那人民委员会主席应当作出与这些职员的公务方面有关的其他决定。

人民委员会秘書公布关于任命或解除由挑选任命委员会或人事委员会任免的职员的决定，如果法律上規定非这样不可，人民委员会秘書作出关于这些职员公务方面的其他决定。

### (九) 区人民委员会人事委员会

第四十五条 人事委员会关心維護职员的权利和提高他們的技术，执行本通則規定的其他权利。

人事委员会由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或委员会委任的一个委员以及人民委员会秘书和人民委员会选出的三个委员组成。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或被委任的委员为该委员会主席。

### (十) 纪律法庭

第四十六条 为区和公社人民委员会的职员而在区内设立纪律法庭。

纪律法庭第一审审理纪律行为，并为公社和区人民委员会职员以及机关职员所犯的违反纪律行为作出判决，因为特别指令没有为他们规定其他纪律法庭的职权。

第四十七条 纪律法庭由主席一人和委员两人组成。纪律法庭的主席和委员都有自己的助理。主席及其助理必须法律系毕业。

纪律法庭主席、委员及其助理中的一个由区人民委员会选举和免职。纪律法庭主席、委员及其助理中的一个由人民委员会从区人民委员会委员中、从人民委员会和区内机关的职员中选出。

纪律法庭最少要有一个委员及其助理是人民委员会的委员。

纪律法庭中的另一个委员及其助理由区职工会委派。

第四十八条 向纪律法庭控诉的原告为发生案件的机关为此事而委托的全权代表。

国家职员法的决议适用于纪律法庭的职权和诉讼程序。

## 三、新公社和新区人民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工作

第四十九条 在选举新公社和新区人民委员会以前，这些

公社和区内将成立委员会，其中有并入新公社或新区的现有公社或区人民委员会的选举出来的委员。

在公社或区的章程通过以前，新公社人民委员会委员人数以及新区人民委员会的区议会和生产者院的委员人数，根据本通则的决议和人民共和国的指令决定。

在共和国法律中可以规定，并入新公社或新区的现有公社或区的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加入新公社或新区人民委员会。

第五十条 新公社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并入该公社的现有公社或市镇的人民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公社人民委员会也可以从该公社地区内选出的区人民委员会的区议会和生产者院的委员中选出新公社人民委员会委员。每一个公社的人民委员会选出与该公社的居民人数相符合的委员人数。

在现有公社只有一部分并入新公社的情况下，才会合乎上述决议的精神。

第五十一条 在关于公社和区自治的联邦法未作出以前，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可以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中有生产者院和现在将组成统一公社的那些市镇里，公社人民委员会中应有公社议会和生产者院。在这种情况下，公社议会的委员从现有市镇的市镇议会的委员中选出，而公社生产者院的委员从市镇生产者院的委员选出。如果加入新公社的除了市镇以外，还有其他现有公社或公社的一部分加入，那么在成立公社议会方面，本通则第五十条仍有效。同样，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可以决定：如果新公社将完全包括设有生产者院的地区或者最少包括该区域的一大部分，那末新公社人民委员会可以有公社议会和生产者院。在这种情况下，公社议会的委员从现有区的区议会委员中选出，而公社生产者院的委员从现有区的生产者院的委员中选出。

第五十二条 在没有公社的现有市镇地区或市镇中没有公

社的部分內成立的新公社人民委员会，应有每一个新公社地区內选出的市鎮人民委员会、市鎮議会和生产者院的委員。如果除了市鎮中的一部分，有一个或若干个現有公社或公社一部分并入新公社，那末新公社人民委员会委員則为这些公社人民委员会中每一个并入新公社的公社地区內选出的委員，如果这样还不能补足新公社人民委员会的既定人数，那末人民委员会委員的不足人数由选民會議根据共和国法律的决定进行选举。

**第五十三条** 当新公社区域和現有公社区域相等时，或当現有公社人民委员会所有委員在新公社人民委员会既定委員人数范圍內都加入新公社人民委员会时，現有公社人民委员会可以把区議會或市鎮議会的委員，以及現有区或現有公社并入的市鎮人民委员会生产者院的委員选为本委员会的委員，而这些委員应是在該公社的区域中选出的。

**第五十四条** 新区人民委员会的区議會委員由并入新区的区和市鎮中現有人民委员会的区議會和市鎮議會选出。每一个市鎮議會和区議會选出的委員人数，将根据区或市鎮中居民人数来决定。

如果并入新区的只是現有区的一部分地区，也合乎上述所指的精神。

**第五十五条** 新区人民委员会的生产者院的委員由加入新区的現有区和市鎮人民委员会的生产者院选出。

每一个生产組要选出多少新区生产者院委員，这由生产組参与新成立区的社会总产量多少来决定。

現有区和市鎮的每一个人民委员会的生产者院从相应的生产組成員中选出多少新区人民委员会生产者院的委員，这根据現有区或市鎮的每一个生产組中的生产者人数来决定。

**第五十六条** 新公社人民委员会委員，只要征得其同意可



以选为人民代表——共和国、或联邦国民議會議員，或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人民議會議員，或是戈索伏—密托希亞自治省人民委員會委員，而他应在并入新公社的地区內选出。

选为新公社人民委員會委員的人民代表以及在并入新区的地区內选出的人民代表，也可以当选来履行人民委員會中的經常职务。

第五十七条 在章程未制訂前，現有公社的每一个人民委員會将选入新公社人民委員會的委員人数多少，由新区人民委員會决定，而現有区和市鎮的区議會或市鎮議會以及生产者院将选入新区的区議會和生产者院的委員人数多少，由共和国执行委員會决定。

第五十八条 現有公社和区的人民委員會在新公社和新区成立后，仍須繼續工作，并将执行属于它們职权以內的一切事务，一直繼續到新公社或区人民委員會着手执行政权机关的职能时为止。

第五十九条 新公社和新区人民委員會从1955年9月1日起，根据本通則关于公社和区职权的联邦法律以及相应的共和国法律的決議着手执行政权机关的一切职能。

联邦执行委員會可以根据需要或为个别人民共和国全部地区或为一部分地区而决定的新公社和新区人民委員會于1955年10月1日着手执行政权机关的职能。

在上面指定的日期以前，新公社和新区人民委員會可以成立和批准自己的章程。

共和国执行委員會可以用自己决定来規定，在成立公社的市鎮中，新公社人民委員會在1955年9月1日以后开始工作，但最迟到1956年1月1日，并可以延长这些公社制訂章程的期限。在这种情况下，現有市鎮的人民委員會按原有成員根据公

社人民委員會的職權延續工作，一直到新公社人民委員會開始工作時為止。如果現在不屬於市鎮地區內的公社加入市鎮，這些公社的人民委員會也應延續自己工作，一直到市鎮內新公社人民委員會開始工作時為止。

第六十條 為了進行與新公社和新区人民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有關的準備工作，特別是為了準備每一個新公社和新区規章草案和作出解決幹部問題的建議，以及為了立即使本通則生效，將成立一個提案委員會，該委員會中包括加入新公社或新区的現有公社或現有区的人民委員會代表。

第六十一條 新公社和新区人民委員會在第一次會議上應該選出主席 1 人，並成立一些機關，它們將在公社和区章程未制訂以前進行與人民委員會的組織和解決幹部問題有關的一定事務（如規章和指令問題的委員會、人事委員會等等）。

除了上述規定的事務之外，新区人民委員會還應關心在本地區內的新公社人民委員會的組織。

第六十二條 公社的第一個章程由区人民委員會征得共和國國民議會章程問題委員會或自治單位代議機關的同意加以批准。

由公社或区人民委員會批准的第一個章程，雖然在人民委員會開始工作時，相應的機關還未批准它，但仍將適用。

第六十三條 不管新区的成立，不管由公共計劃產生的個別權宜轉交公社人民委員會，但是，現有区、市鎮和市鎮公社的公共計劃仍將繼續適用於批准該計劃的地區。

現有公社的財產權和債務移交給它們加入的新公社，而現有区和市鎮的財產權和債務移交給它們加入的新区，因為由於下面提出的決議將非這樣決定不可。

新公社和新区人民委員會財政預算的方法，屬於現有区和

現有市鎮的基金轉歸新区和新公社掌握和支配這些基金，以及關於新公社和新区可能改變 1955 年公共計劃的方法和條件，關於把財政權和債務從現有公社、區和市鎮轉交新公社或新区的更詳細決定，——這些都將在聯邦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中加以規定。

第六十四條 為了準備 1956 年的公共計劃和投資計劃，區提案委員會應組織這些計劃的準備工作，並且就此決定必需專家——職員數量。

上述提到的職員必須根據提案委員會的指示進行工作。

第六十五條 現有公社和區人民委員會應當在新公社和新区着手執行行政機關的職能之日起結束在此以前所承受的一切事務，而不可能在規定時期內結束的事務，則應轉交給新公社人民委員會或新区人民委員會，這些人民委員會無論根據現有決議或根據關於公社和區人民委員會職權的決議都是有权處理的。

第六十六條 新公社或區人民委員會在第一次會議上應選出一個專門委員會，該委員會確定哪些財產權和債務應歸新公社和新区，接受加入新公社或新区的現有公社或現有區人民委員會轉來的檔案和財產清冊，並且向人民委員會提出關於這一方面的總結。

新公社或新区人民委員會必須按照整頓保存檔案工作的指令來保存所接收的檔案。

第六十七條 從現有公社的人民委員會停止工作之日起，該人民委員會的職員就歸它們所併入的新公社人民委員會管轄；而現有區和市鎮人民委員會的職員歸它們所併入的新区人民委員會管轄。所有這些職員在沒有最後分配到新職務以前，仍保留他們過去的領取工資權利。

新公社人民委员会根据上述规定把它不需要的一切职员移交区人民委员会支配。

区人民委员会保证所有一切转交给它支配的职员领取工资一直到1955年底。

第六十八条 1955年年底以前，不经过聘请任命也可以录用人民委员会职员，本通则第三十九条的决议例外。

第六十九条 新公社和新区人民委员会最迟到1955年12月31日必须作出关于职务系统化的决定。

新公社和新区人民委员会在相应的最高机关对关于系统化的决定未得同意以前(最迟不得超过1955年底)，可以委任职员去担任人民委员会拟办的关于系统化的决定所规定的职务。

第七十条 新公社和新区人民委员会在1955年年底以前审查和修改并入新公社或新区的公社、区和市镇人民委员会所作出的一切决议，并且作出决定，使这一切决议对公社或区的全部地区都是同样的。

在关于上述提到的决议未作出决定以前，这些决议今后仍将有效，并将在作出这些决议的地区内适用，只要它们不和本通则的决议抵触。

#### 四、过渡条款和完成条款

第七十一条 本通则的决议将直接适用于人民共和国的地区内，一直到它们通过自己的法律为止。

第七十二条 在关于区人民委员会内务秘书处的的工作和关于这一秘书处的职员以及对这些职员履行纪律权能和其他权能方面的特别法令没有制订前，现有一切指令仍然有效。

第七十三条 结婚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精神在特别为



此而預先指定的正式地点进行，該地点在人民委员会所在地或在此以外即本部門職員的住所。

現在保存出生証的地区，在有关国家机关作出相应的決議以前，仍絲毫不变地保留。

第七十四条 新公社和新区人民委员会的选举最迟应在1956年底举行。

第七十五条 授权联邦执行委员会对执行本通則第三章決議作出更詳細的決定。

第七十六条 从本通則生效时起，1952年通过的人民委员会通則第三章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違反秩序根本法第一章第五十一条和第三条、第五十一条，以及其他一切与本通則決議相違背的決議，一概無效。

第七十七条 本通則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上发表之日起生效。

## 关于区和公社的新机构

——1955年6月16日在南斯拉夫联邦

国民议会的报告

卡 德 尔

人民代表同志们：

我們由于实施公社和区的新机构，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的政治形式和一般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上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诚然，这些变化并没有使我国社会发展有了什么新的东西。它们按其实际只是进一步建设和改进政治制度，我們实行工人自治就是为这种政治制度奠定基础。到目前为止，我們的目的就是推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即同企业中的工人委员会和乡村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并存的公社，公社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经济细胞，照马克思的话说，“是最后终于发现的一种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的条件下就可以使劳动解放”。到目前为止，我們的目的是要做到使我国社会成为一个各公社的有机的“民族友好联合”，就是说，不是成为公社的联邦，而是成为统一的机体，它的各个细胞关心整个生命，从整个社会，从自己本身的首创精神中吸取自己的力量。我們在以前就已竭力使这个社会的整个组织机构尽可能接近劳动群众，使他們能尽可能更直接和广泛地参加这个机构。

但是，我們在这一方面进行活动的第一阶段上，曾必须以区为活动重心，而公社的发展是不够的。我們由于推行具有所谓特别权利的公社，确实在从区到公社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是，拥有特别权利的公社的数目却是极少数，它們只能在较发达的城

市建立。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們談到公社时，其实所指的是区。

这种方針符合于我国的社会管理制度借以發展的客观条件，而且不是某种特定的原則性的前提的后果。相反地，我們时常指出，建立实行自治的区只是走向建立实行自治的公社的第一步。确实，現在，我們的社会已經能够在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組織机构的發展上順利地向前迈第二步，就是說，已經能够加强公社的作用，并确定它作为社会主义公社的發展前途。

但是，这一步虽然按其实际質并没有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总方針具有什么原則上新的东西，終究还是我国社会向社会主义道路發展过程中極其重要的行动。我們通过这一步就可以大大扩大社会自治的群众基础，从而扩大我国整个制度的群众基础。我国千百万劳动人民現在可以更直接和更積極地参与解决社会生活的重大問題，这会給予他們新的可能，并将是对他們的新的刺激力，使他們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設的一切領域內，尤其是在进一步發展生产力和提高社会的一般物質与文化水准方面發揮自己的首創精神。根据这一事实，区和共和国机关的作用在很多方面發生变化，而在某一方面來說，甚至联邦机关的作用也逐漸發生变化。因此，如果我們說，現在我們着手实现的举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發展上極重要的阶段之一，那我們絲毫也沒有夸大其詞。

革命已把生产資料实行国有化，并推行了牢固的国家制度——劳动人民的革命政权的工具。当然，在最初發展阶段时期內，这种集中的国家制度在使社会轉入新的社会主义發展道路的事業中起着决定作用。只要有一个集中的和有威信的国家机器，就不仅能够鎮压被推翻階級的反抗，而且能給千百万具有資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形成的習慣、能力、概念的人們指出一个方向，使他們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按新的方式組織起来，

开始具有和新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新习惯、新概念、新的社会意识。但是，不仅如此，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部门要成为我国社会中决定性的经济力量，即成为本身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力量，那还是太薄弱了。因此，必须采取加快工业化速度的方针。而这个任务在其第一阶段上，在它实现的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下，只有严格集中的国家机器才能完成。实际上也是如此，劳动人民的国家及其在经济领域内革命的国家主义的组织形式，在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的事业中，在组织社会主义部门以及建立整个计划经济制度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由此，我国整个社会的物质力量，尤其是社会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物质力量大大增长了，从而使我們有可能在發展人們之間更先进的关系方面更前进一步。

我們，作为社会主义的积极建设者，当然，不可能仅仅限于建设工厂、电力站、道路以及其他企业。如果我們仅仅以经济上巩固社会本身作为方针，而经常不去注意到，随着社会主义物质力量的发展，还应该以社会主义精神日益发展人們之間的关系（因为这也有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那末，我們就忘記了我們是社会主义的有觉悟的建设者。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主义形式在战后的最初发展阶段时期，是必要、有利和有效的，因而也是有潜在力的和社会主义的，要不然它們在劳动群众中就不会得到了如此广泛的支持，劳动群众有权把这些国家主义形式看作是按照他們情緒和意圖来使用的自己的工具，事实也是如此，在它們的条件下，人們之間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它們按其發展趋向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关系，虽然它們的具体的国家主义形式本身还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这些形式只有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起进步作用，而且已起了进步作用，但是，它們一旦成为自我目的，就会变成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保持这些国家



主义形式不仅会造成官僚主义，而且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的稳定性，或换句话说，会破坏这个制度的社会主义主导力量的稳定性。这种关系结果会使工人生产者开始丧失感情，成为生产资料的集体私有者，而在某些方面，他们确实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当然，这就既阻碍了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的首创精神的发展，又阻碍了群众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觉悟的发展，而没有社会主义觉悟，就不会有巩固的社会主义民主制。

这些事实正是我们在我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发展上经常注意到的。因此，革命国家主义的形式在创立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的事业中，在我们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尽管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但很明显的，这只不过是年轻的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仅要取决于社会的经济上的巩固，而且要取决于人们之间关系上的不断变化，以使这些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自由性质得到日益彻底的发展。这个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无疑是逐步克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的国家主义形式，一方面是采取横和直方面，即既在全国友好联合范围内又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内，逐步把国家职能变成民主社会自治的职能，在另一方面通过相应的民主政治形式把各个国家机关逐步从内部改造成为社会自治机关。

当然，这个任务不可能是国家的某一机械的法令的事情，它只是由于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长期有机发展的结果才能实现的。这一过程既取决于物质条件，又取决于人们头脑中新的社会意识发展的速度。在这里，我们奉行了，而且应该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旧原则，——无论自治的程度或国家威望的程度都不是某种绝对的范畴，它们本身不是绝对好的，也不是绝对坏的，但是它们的作用和意义总是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而

也取决于必須具有相应政治形式的生产关系發展的需要。

不言而喻，这个問題不可能用数学方法来正确地規定的。可能很容易跑得太远，也可能更容易落后于需要和可能性。但是，我們在这里避开了某种尚有問題的結構。我們基本上单憑經驗米确定發展速度，我們不断把社会中現存的政治机构和經濟机构同不断增长的自覺和自發的首創精神，即我国劳动人民在其日常實踐中所表現的經濟上、政治上、精神上的社会主义首創精神的需要和运动来作了比較。这种首創精神随着我国生产資料公有部門在物質上的巩固而日益增长起来，并且是用我国劳动人民把自己的習慣适应于生产資料公有制基础上發展起来的經濟关系这样速度增长起来的。我們竭力不断地使这种首創精神和这个运动摆脱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中的一切障碍。正是由于政治形式适应于社会主义首創精神自下而上發展的这个过程，于是，就这样根据經驗确定了社会自治的發展和国家机关的个别职能逐步社会化的速度。正因为如此，我們才沒有落后于可能性，也沒有跑得太远，我們就在这一活动範圍內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已經取得了的成就完全証實了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为基础的方針是正确的。馬克思和列宁早就在原則上提出了这个方針；馬克思——尤其是在分析巴黎公社的时候的，而列宁，則特別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年。但是，列宁在当时絲毫也沒有主張要实施無产階級专政的革命国家主义，也就是說，并不認為在沙皇俄国所遺留下來的物質和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利用国家主义来組織全国向社会主义發展是唯一可能的，但是，列宁总是主張必須日益更加扩大苏維埃政权的群众基础，以便压制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势力并使官僚机构所掌握的职能真正社会化。

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过：“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而后补充说：“低度的文化水平遂使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经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在实际上，却是经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而实行管理的机关，但不是经过劳动群众本身来从事管理。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用长期教育工作才能解决。”

在另一个地方，列宁对这一点还补充说，真正参加管理工作的这个先进无产阶级阶层是“非常软弱的”。这就更有力地证实了他对苏维埃性质的估价。

换句话说，列宁认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只有借助于日益大量而广泛地吸收劳动群众直接参加社会管理工作，采取把为劳动群众而实行的管理变成劳动群众本身直接从事管理的方针才有可能。而要达到这一点，列宁认为：第一，必须使工人和劳动农民相应地组织起来，这样他们就能够对管理机关发生决定性影响；第二，必须要组织长期的教育工作；由于这一教育工作，劳动群众才真正能够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任务。

我们的实践完全符合列宁所提出的前途，并证实了这个前途。当然，由于社会自治制度的发展，南斯拉夫劳动人民不放弃而且也不可能放弃作为自己政权的工具的国家。如果我们从事这种乌托邦的事情，那末我们就会对社会主义作了坏的劳迹，我们是生活在国际对立面发展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其他国家对个别国家内政的干涉是极重要的斗争手段之一，甚至在国家内部，我们也还没有把阶级对抗克服到这种程度，以致它们不再成为对社会主义的更严重危险。这两种情况要求我们年轻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组织能够保卫它的生存及其无限的向前发展。但是，虽然在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及其自由发展而斗争的领

域內，以及在保衛我國各族人民獨立的領域內，情況正是這樣，但是我們仍然認為這不應該阻礙社會主義關係發展方面國家職能將逐步變成社會自治機關的過程，更正確些說，不應該阻礙個別的国家機關本身按其內容將變成應有的社會自治機關的過程。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認為發展工人委員會以及勞動人民在生產和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內的其他一切自治形式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樣也認為他們在公社和區中的自治具有重大意義。很明顯地，正是借助於這種政治形式，沿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社會，才能够而且應該逐步地在其內容和形式上擺脫過去社會制度的殘餘。

\*     \*     \*

在這個過程的發展上，我們到現在為止完成了四個重大任務：

第一、我們建立和鞏固了工人委員會；

第二、在最近關於人民委員會的法律中，我們提出了建立公社的總方針，同時認為發展實行自治的區是為第一階段中的重心；

第三、我們在經濟制度上，從使它符合於建立工人委員會和公社的方針方面來說，作了重大的改變，以便使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濟聯繫——擺脫那些各種各樣阻礙自下而上首創精神的表現和制約官僚主義的有害的、不必要的行政形式和方法；

第四、根據共產主義者聯盟第六次代表大會和勞動人民社會主義聯盟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共產主義者和一切爭取社會主義的覺悟戰士都把自己的作用和工作方法適應於我們社會發展中的這個社會方針。我們最近幾年來，在所有這一切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這些成就完全証實我們的基本方針是正



确的。

工人委员会迅速而有力地发展和壮大起来了。无论在政治方面或在经济方面，它们都得到了良好的成果。很明显地，它们不仅不是障碍物，而相反地，它们刺激了生产力更迅速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关于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斗争的观点，是特别重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劳动群众中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并促进了对我国劳动人民的群众教育，以完成社会管理的任务。我们的各个工厂目前是进行群众性社会教育的最好学校。在这些学校中每日每时成长着新的干部，而且是以从前无法想像的速度成长起来的。这就是能够担任公社工作责任的一些干部。没有这种预备学校，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进行自治的公社。区人民委员会及其整个民主组织机构也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强大的、独立的社会因素。在最近几年来，一些愈益困难的任务已从社会管理、国民经济方面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转到了推行区人民委员会。在它们周围，而通常也在公社人民委员会周围造成了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机关和组织的系统，人民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就依靠这些机关和组织，并通过它们和劳动群众建立联系。这些民主的组织形式向劳动人民表明社会主义自治的真正意义和前途。许多公民因参加人民委员会的各种机关，所以在社会管理事业中以及在应用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组织机构以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方法方面，具有了相当的經驗。由于自己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由于人民委员会直接对选民大会负责，所以它们不仅成为牢固的政治机关，而且在大多数场合变成为强大的社会自治机关，因而在群众中起了重大的教育作用，并造就了大量有才干的和充满首创精神的社会工作者。

在發展新的經濟制度方面，我們也得以克服初期的困难并

取得相当的成績，这些成績同样也証实我們的总政治方針是正确的。經濟生活逐漸摆脱了行政管理方法以及各种官僚主义成分，日益广泛地为生产者独立的社会主义首創精神打开了大門，也就是說为劳动集体、合作社以及和社会主义經濟部門有联系的个体农民打开了大門。这样，大量劳动群众就被吸引来参加直接管理工作，而笨重的管理經濟的中央机构也就不再是必需的了。各种經濟組織按直綫联合成为各个院以及与其相类似的中央自治組織(虽然这些組織还在最初时期就已經有發展)，同样也得到了肯定的效果，現在可以断定說，經濟實踐証实了我們所采取的把中央的某些社会职能从国家机构轉到实行自治的社会主义經濟联合的这个方針是正确的。可見，我們的經濟組織不再是極其詳細地制定的国家計劃的消極行政执行者，而成为統一的社会計劃範圍內即共同社会利益範圍內独立的社会主义創造者。新的經濟制度为这种独立性保證了必要的物質基础。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發展，这一物質基础将愈来愈强有力，因而有助于扩大劳动人民在公社範圍內極其多种多样地表現独立自主的社会首創精神和積極性的界限，以有利于整个社会友好联合，并有利于劳动人民的个人利益。

最后，在政治关系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共产主义者以及一切爭取社会主义的觉悟战士已經在新的工作方法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經驗。他們决不認为自己的任务是通过国家机关来为劳动人民管理社会；他們的任务首先是要教育和教导劳动群众，以便使他們本身能够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相应机构来按社会主义方法管理社会。

正是这样，他們实现着铁托元帅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制定的任务：

“如果我們很明显知道，目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作

用不是要發号施令，它不是作为某个最高仲裁者和审判官来干涉所有一切方面，因为仲裁者或审判官——要对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如科学問題、經濟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又是完全正确和不应改变的，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也就明白，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作用在于它的極重要的任务——思想教育领导，在于它注意使社会主义社会正常而正确地發展；也就是說，共产主义者的作用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我国公民。”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肯定說，为实现这一任务而作的斗争已經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在这个斗争中明显地表現出了在我国条件下有意識和有組織的社会活动的作用。这种工作方法造成了和最覺悟、最積極的社会主义战士——广大劳动群众建立更密切更直接的联系的可能性，便利于他們在群众中的教育工作，并使共产主义者和一切社会主义力量有可能对他們的日常实践發生直接影响。

当我們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种政治發展路綫时，我国以及国外的反社会主义集团指望我国社会主义力量本身就这样斬断自己的根源。但是，他們的希望是徒勞無益的。我們始終認為，实现社会主义的積極战士的力量的經常来源，决不是在于国家机构，而正是在于劳动群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正是通过这些群众，而不是仅仅通过国家行政机构，来引导爭取社会主义的战士走上和群众更密切联系的道路，走上表現他們社会主义首創精神的道路。这使社会主义力量能够壮大起来，使我們的整个制度在政治方面能够更加巩固。这些成就也就是使我們在發展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組織机构道路上更迅速向前迈进的因素。

不言而喻，在我們和完成這些任務相聯系的工作中，我們碰到了，而且還會碰到許多不良的傾向，許多弱點和缺點。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極其廣泛地來說明。但是，由於我們現在在這里所談的問題，這樣做是不必要的。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幻想，說巨大的任務可以不用鬥爭，不和不良傾向發生衝突就能實現；這種不良傾向不僅是由于舊階級制度的殘余而產生的，而且是由于社會主義者隊伍中也可以碰到的某種保守主義而產生的。但是，在這方面，對我們說來重要的是主要的發展傾向，對我們說來重要的是：實踐是否証實了我們的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而在這一點上，實踐作了肯定的回答，這是絲毫也不能懷疑的。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是如此重大，以致我們決不能認為和我們必然碰到的缺點和不良現象作鬥爭是一件困難的事。下列事實就是這方面最令人信服的證明：我們制度的政治上的牢固性一年年越來越加強，這表明，第一、我們真正朝着和社會在生產資料公有的基礎上有規律發展的需要相符合的道路前進。而日益增長的社會主義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力量本身，同時也成為使它有可能繼續向前發展的因素。

\*     \*     \*

我們所獲得的成就不僅為我們造成了可能，而且無條件要求我們在實現政治方面繼續向前進，因為政治是我們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這就特別牽涉到進一步建立公社的問題。

在我們的社會制度的條件下，公社的意義在於，它一方面是一種社會經濟的友好聯合，它可以使勞動人民的個人利益基本上符合於社會友好聯合的集體利益，——我當然不是由此來說明這只是它的任務，而在另一方面，它正是由於自己的這種性質，所以是最合適的政治形式，通過這種政治形式就可以吸引最廣大的勞動群眾來直接參加社會管理事業。可見，極廣大的勞



动群众通过这些形式就会刺激到有意識的社会生活，就能不仅仅透过自己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待个别社会問題的解决，并成为自己生活的能胜任的主人，明显地看到和意識到各种需要以及客观可能性。公社既是生产者的友好联合，同时又是消費者的友好联合。这个事实使得每一个公民不是像在其他制度中通常發生的那样，从这一或那一党的恶意宣傳观点来对待具体問題，而是独立地和充分負責地根据现实的物質可能性来作出决定，以便尽可能更正确地利用現存的可能性。这种任务同时也是公民的初級学校，使他能够从同样的观点来看待最高社会机关对其他社会問題的決定。因此，对我们特別现实的是这个規則：实行自治的公社是社会主义民主制極重要的学校。

絲毫也用不着怀疑，这种公社将是我們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也就是說，它的結構会影响到直到联邦为止的其他一切主要社会机关的結構。我們政治制度进一步發展的前途無疑是这样的：在一般实行自治的組織中，尤其是在公社中，公民将获得社会信誉以及实现社会管理方面职能的才干；正是这些組織将提拔他們成为最高管理机关的代議机关的候选人。

但是，很明显，公社不是而且不可能是秘密的組織，它不是削弱或用其他某种方式阻碍整个社会的統一或其他社会自治机关的独立。但是，整个社会是拥有足够的可能来阻碍这些現象的产生的。

第一、統一的經濟計劃将为公社以及其他自治組織的經濟积极性提供共同的範圍，并提出分配剩余劳动的統一原則。这样，同时将保証整个社会經濟毫無阻碍的有指导的發展，保証公社、自治組織和个别劳动者的自由首創精神，以便使他們能够在自己可能的範圍內达到真正最大限度的成果。

誠然，在这方面最初的發展步驟上，我們也碰到了某些和本

位主义的表现有关的困难。但是，这些现象不是我们总方针的结果，而首先是我们的制度还没有最终建成的后果。在这一年内，这种有害的趋向已大大地减少了，而随着整个制度的进一步改善和巩固，每一个自治机关实际上就会处在一定的物质可能性的条件下，它当然可以在物质可能性的范围内自由地向前推进，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可能性，用不着害怕会使友好联合遭到某种损失，但是，它终究不可能超出这些可能性。当然在一定的领域内，以后将必须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和监督制度，以便保证经济基本上按照统一社会经济计划中规定的比例发展。经济措施和一般行政措施的正确配合使得有可能把友好联合的共同利益令人满意地符合于发挥自治组织和公社的各方面首创精神的需要，这样，国家管理机关对它们的工作和活动进行任何较严重的干涉，都将是不必要的，而它们所关心的将只是这种活动是否合法。

第二、公社以及其他一切实行自治的组织在其共同的活动中的是由于宪法和各种法律的决定而联系起来的，这些决定保证了社会制度的统一，同样也保证了公民和实行自治的组织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一方面，这个事实使公社在所有一切方面，不经过“领导”，更正确说，没有最高管理机关的干涉，来发挥独立自主的积极性成为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使各地对整个社会的任意妄为行动或者利用公社机构来对公民或实行自治的社会组织施加某种政治或精神压力的各种倾向的表现成为不可能。公民和各种实行自治的组织同整个社会发生联系，不仅仅通过公社，而且通过其他的社会机关和组织——地方的、共和国的、联邦的机关和组织，而后者在对待公社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所以公社不可能为损害公民利益、为损害整个社会利益而改变它们。

这种法律机构和各种实行自治的联合一样，按直線組織來說，不仅保證公社不可能变成某种肆意妄为的地方政权，而且阻碍公社中有可能籠罩某种狹窄的和保守的使社会倒退的概念。我們的一切实行自治的机关都應該是充分公开的，以使得先进的社会思潮始終能够把新鮮空气带进这些机关。

我之所以闡述这一切，首先是因为在我們这里有时候在对公社以及一般自治制度的性質上出現一些过份的幻想。如果以为这个制度本身已經可以解决一切問題，或者以为它可以防备一切不良傾向，那是極其錯誤的。相反地，如果公社的發展仅仅是由自發势力所决定的，那么这种公社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变成狭窄的和肆意妄为的政权，甚至变成支配公民及其組織的、政治上或精神上反动的政权。这种制度的后果，無論对公民或对整个社会來說，随便怎么样都要比国家集中制的后果更严重更恶劣。正因为如此，所以决不能把公社看作是某种秘密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組織，而应看作是复杂而統一的社会机体的細胞，公社應該从这个机体中吸取自己的力量和生命力，正如整个机体應該从自己的細胞中吸取力量和生命力一样。所以，我摒弃这种解釋，根据这种解釋，我們的社会應該成为某种公社联邦，我也摒弃这种意見，根据这种意見，自治的發展應該表示削弱那些無論为整个社会利益或社会各个部分利益都應該集中的社会职能。

第三、在我們以后的決議中，我們應該特別注意正确决定經濟企業及其自治机关的地位和作用。我們到处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意見，說我們在分散管理的过程中把企業“交給”区或公社。这是極其錯誤的观点。社会从来都沒有把这些企業“交給”这些企業范围以外的任何各个机关，而是把对企業的管理这样地托付給劳动集体，使得在社会計划和指令的界限內，能同时規定

这些生产者自治机关对社会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各企业，即它们的联合，也规定自己同从公社起到联邦为止的各种国家机关和社会机关的关系，因此，现在我們不再有联邦的、共和国的、地方的企业，而只有实行自治的社会企业，但它们又是联盟的、共和国的、地方的企业，同时又不是任何人的企业，就是说，都是社会的企业。

不言而喻，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方面，企业和公社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联系，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才有可能基本上相符合，这就是一种使企业的独立性不致变成劳动集体的肆意妄为行动或甚至变成反社会主义的因素的前提。但是，尽管企业和公社的联系原则上具有这种社会意义，没有改变的事实是：公社对企业只能具有整个社会以其宪法和法律所给予它的那些权利。

对企业的独立性之所以必须作这样明确的规定，是因为在我们社会中，和在每一个现代社会一样，企业按直线条系统、按其各个部门的联合应该起着重大作用。如果我们要把中央的各个社会职能从国家管理机构转移到这些实行自治的联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确定这些企业对社会、对中央机关所负的责任。可见，在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关系的斗争中，社会将不仅经过公社进行活动，而且经过这些实行自治的经济联合来进行活动，而在某些部门中甚至大部分是经过这些经济联合来进行活动的。

第四、这一切也关系到各种非经济的实行自治的组织及其活动，例如，关系到教育、保险等等组织。比方说，马克思当时说过，国家首先应该停止干预教育问题。他要求教育同教会和国家分立。当然，不可能把这个领域交给自发势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的条件下，这个社会具有很大的困难并在旧社会成



分劇烈反抗情況下而為自己开辟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時，我國也存在有廣大自治組織在這個領域內發展的可能性，這些組織保證社會主義力量以領導作用，但是，它們同時在教育領域內進行非官僚化和民主化，也就是說，使這個領域變成為直接吸收到這一領域內工作的極廣大組織和公民表現創造性勞動和首創精神的場所，但首先是那些與這種積極性直接有關的人即我國勞動者表現創造性勞動和首創精神的場所。如果我們為使教育不成為無聊官吏的事情而鬥爭，那末，這決不是說把教育交給保守的庸俗之徒或亂搞一通的市儈分子，他們却通常要求為了某種虛假的專門領導和虛偽的科學自由而達到這一點，而是必須把教育通過相應的民主的社會管理形式交給社會，交給勞動人民。我們在教育組織方面已經順利地沿着這條道路前進，而且在這個事業中已取得了初步經驗。很顯然地，今後還必須走這條道路。在這個領域中，國家應該首先通過法律和指令，並應該少用管理機構大規模干涉方法來實現自己的作用。對於公社也是如此。我決不是由此就說，公社不應該關心這些問題。相反地，公社應該在財政方面保證初級教育和群眾教育工作。因此，公社不能不關心這個領域內的工作內容。但是儘管如此，公社還是應該依靠這個領域內的以民主的社會管理機關為首的一定的實行自治的組織，這些機關的一般權利和義務將由公社的法律和章程來加以規定。因此，公社除了物質方面外，首先應該保證教育和教育機關不成為某人的世襲領地，使它們屬於社會、勞動群眾及其社會管理和社會監督機關所有。如果在這一切機關中，實現社會主義的覺悟戰士將是真正積極的，那末，就不必害怕這種發展會給社會主義造成某種損失。相反地，這只會有利於社會主義的。

我在這裡僅僅提到了教育部門，以便尽可能更清楚地指出

和国家主义方法相反的社会自治的实质。而在社会活动的其他领域中，我們当然也必須走这条道路。这一切都不是新的，因为我們在这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我提到这个问题时，希望指出在这个领域中，公社的权利也不可能是不受限制的。

第五、最后，我还想注意到同一方面的另一个问题。必須使公社在其整个积极活动中成为公开的社会組織，它对选民大会和整个社会負責，始終應該受公民及其組織公开的社会批評，也应该受最高国家机关从保証法制的意义上所作的檢查。为了要保証公社在这方面不致变成某种秘密的狭窄地方主义的組織，为使它不致成为某些地方小集团人物的影响范围，公社同公民、同自治組織以及同最高社会机关的一切关系就必須用章程来加以規定，每一个公民可以在章程中找到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义务，以及自己給予公社管理以影响和通过公社給予整个社会管理以影响的一切可能性。

此外，还必须确定公社的行政机构和专家机构的地位。确实，这个专家机构只應該原則上为代議机关准备草案和实现它們的決議，而这机构本身不應該施行政策和解决基本問題。但是，这一机构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某种盲目順从的旧式官吏的团体，它的成員中應該包括决心創造性参加我們社会进步事業的觉悟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也是正确的。也就是說，这个机构决不能了解成为人民委员会的单纯机械的工具，它應該有自己的規定了的对人民委员会、对最高社会机关以及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个机构應該在法律范围内工作，并且要人民委员会注意它的決議中可能有的不合法制的情况；这个机构的職員只能根据一定的、公开的、人人可以接受的、排除各种主观影响的行为来任命和解职，而工作的質量和合理性應該由最高机关干預

人民委员会事务的一定权利加以保证。只有专家机构的这种条例才使它的质量达到相应的水平，并阻碍它变成地方上肆意妄为的无论什么样政策或本位主义的工具。

到现在为止所进行的实践同样也证实，如人民委员会中的议事会、选民大会这样的机关以及类似的、公民同人民委员会合作的形式是适当的，并且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目前所提出的人民委员会的法律和章程草案中，这些形式还得到更加巩固和发展。毫无疑问，这也是将会促使防止公社可能向否定方面发展的因素之一。

我根据两个原因略为详细谈谈公社的权限和裁判权的问题。首先，我国还有一些人，他们期望说，正因为公社是实行自治的，它将是各种落后的或反动的倾向的保护者，甚至是使社会主义社会免除进步影响的保护物。其实，我以上所阐明的一切都充分指出这类希望是没有根据的。在另一方面，我国有非常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但也有某些一旦开辟新道路时就变成保守的人，这些人害怕实行自治的公社不会成为防止有害的本位主义的堡垒，因此他们极其乐意地要奉行旧的行政领导方法。如果注意到我所说明的一切因素，那末很明显地，这种害怕完全是多余的和没有根据的，社会友好联合拥有保证制度的统一和保证友好联合本身的基本利益的广泛可能性，尽管它将为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首创精神及其自治组织开辟广泛的道路。

公社建立联邦委员会也考虑到了这一切原则，它在同相应的共和国机关和区机关进行合作下，配合和指导了准备新的区和公社章程的工作，以及把共和国划分为新的公社和区的工作。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法律以及补充提交本议会审查的指令，就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

\* \* \*

可見，在組織区和公社問題方面整个活动的第一个結果，就應該是今天摆在你們面前的法律，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下列三个任务：

第一，必須加强公社在我国制度中的作用，用实行自治的公社的精神来發展它。这当然要相当大地改变区的法律条例，区要把自己的許多职能移給公社，但是，它作为公社的友好联合，仍然在配合和指导公社的工作以及保證对个别机关極必要的物質、政治和行政的帮助方面，在監督法制、指导經濟活动或發展生产力方面，在保證公民和組織在自治領域內的权利以及保證制度的統一方面，在反对各种各样反动傾向的斗争方面等等，保持重大的作用。这样，主要的社会自治机关就会接近于劳动群众，因而就有可能把千百万公民吸引来参加直接社会管理事業，他們到現在为止，由于公社發展不充分，还没有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在这个領域中的積極性。

第二，同时，区和公社之間权限的新划分，要求更加精密而正确地确定公社本身的現狀以及它和公民之間的关系；它和企業或实行自治的机关之間的关系；它和区人民委员会、最高社会自治机关之間的关系；它和它本身的自治机构之間的关系等等。部分地加在所提出的法律草案中的这些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是現在正在准备并将一一提交議會的其他共和国或联邦的法律的对象，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在公社和区的章程中以及其他自治組織的章程中加以規定，——同时进行闡述这种原則将是对改善和巩固我們整个政治制度的事業所作的重大貢獻，并会消除我們到目前為止必然碰到的許多困难。

第三，一开始就已明白，如果不在目前的区和公社的範圍內进行相应的改变，就不可能实行这种改組。現在不太大的公社無論如何不可能完成目前交給它們执行的任务，它們也不可能



充分利用它們所獲得的權利。我們現在的公社應該成為一定的基本的經濟友好聯合，也就是說，成為某種生產消費的友好聯合，它應該強有力得足以成立和我們目前發展水平上公民的基本社會準則相適應的社會組織。公社的增加也就必然引起區的增加。因此，在關於新的政治地域劃分的共和國法律中，規定縮減公社的數目，從過去的4,121個縮減到預計的1,438個，也減少過去區的數目，從341個減到預計的107個。這種新的劃分使得大多數公社和區不僅能夠從自己的經濟來源來滿足自己本身的需要，並把大量精力放在發展生產力的事業上，而且能夠造就更熟練的、能擔負起擺在他們面前的新任務的領導者。尤其是現在，各區都能有好的領導及其真正精通事理的機構。這樣，新的區將在物質和政治方面以及專家幹部方面更能幫助公社的工作及其發展，此外，它們本身也能夠用最適當的方法來利用一切物質和其他可能性，以求得它們所屬地區內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進步。

此外，區和公社之間權限的新劃分使得有可能把共和國本身的權限逐步交給區，這樣，公民就能通過公社和區對比目前廣泛得多的一些問題的解決發生直接影響。此外，區的新劃分給我們提供一種可能性：聯邦的經濟計劃將大大依據區的經濟計劃，由此我們的整個經濟計劃制度從現實性和穩定性意義上來說，就獲得很多東西。

我不願意再列舉關於新的政治區域劃分的更詳細材料，因為附在法律草案后面的材料及其論據基本上已作了分析，對材料作了闡述。我只想要你們注意新的組織單位，首先是區的社會政治結構。

根據預定(初步)材料，大多數居民為非農業人口的新區。數目如下：

人民共和国	
塞爾維亞	3 (总数为 42)
克羅地亞	5 (总数为 27)
斯洛文尼亞	8 (总数为 11)
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	2 (总数为 15)
馬其頓	1 (总数为 7)
門的內哥羅	0 (总数为 5)
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共計	19 (总数为 107)

可見，在比較少的區(占 19%)將大部分是非農業人口。如果注意到我國人口的總結構，根據總結構可以知道，農業人口占南斯拉夫全部人口的 61%，那末，這歸根到底就會明白了。此外，20 個大城市及其郊區占所有一切區的十分之一，包括全部非農業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顯然，非農業人口集中在這幾個區內就會影響到農業人口占優勢的區數目的減少。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居民參與國民收入結構的情況，那麼情形就是另一種樣子了。由非農業活動所取得的國民收入超過全部國民收入的 50% 的各區的數目，根據 1955 年的計劃，將如下：

人民共和国	
塞爾維亞	24 (总数为 42)
克羅地亞	18 (总数为 27)
斯洛文尼亞	10 (总数为 11)
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	13 (总数为 15)
馬其頓	6 (总数为 7)
門的內哥羅	4 (总数为 5)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共計	75 (总数为 107)

可見，新的政治區域劃分就將使大約 70% 的區的非農業活動的收入超過全部國民收入的 50%。可見，就是從這方面看，社

会主义力量在我国进一步向前發展事業中起主要的影響是有保證的。大多數區的這種經濟結構不僅有可能使這些區中的落后公社和農業公社得到更迅速的和經濟的發展，而且還會對那些社会主义成分還沒有在其中起決定性的經濟作用的區，發生強有力的影響。

不言而喻，必須注意到絕大多數區中非農業經濟部門的國民收入之大並不是經常反映它們的高度發展的事實，有時候，即在不發達的部門中，這種情況首先是證明這些非農業部門中的農業發展是薄弱的。尤其應該指出馬其頓，它把烟草生產的收入也列入了非農業活動的收入。而在另一方面，發達的農業區中農業所占的比重，無論如何都不是總的經濟發展的薄弱的表現，而只是一定的經濟結構的表現。但是，儘管如此，上述的對比關係却極其正確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成分在南斯拉夫的力量，因此可以說，非農業活動的國民收入占多數的各個區的數目，不僅不會減少，而相反地將增加。

\* \* \*

我認為還必須談一談某些多多少少有原則意義的具體問題，這些問題在委員會工作期間引起了極其廣泛的討論。

我想首先注意的問題是：我們在公社中是不是需要生產者委員會。正如在總結報告中所闡述的，聯邦委員會開始時認為，公社中不應該建立生產者委員會，因為他們不可能在自己基本的政治職能和社会職能中充分表現自己。但是，在委員會工作進程中終究弄明白了：第一、在公社中建立生產者委員會的這個要求，在各個地方是非常強烈的；第二、同時始終令人信服地發覺了，生產者委員會的經濟作用本身證明在公社中建立它們是正確的。甚至在具有比較發達的農業生產、具有合作社以及在生產方面具有多少發達的公有部分的純農業公社里，生產者委員

会这个农业中最进步因素的表现,也可能是有益的,对于进行混合生产的公社尤其如此。现在所争论的仅仅是:在那些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占主要地位、生产者委员会的成员可能完全和公社委员会的成员一样的公社中,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种例外现象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影响到我们的共同决定,特别是因为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帮助落后边区尽可能迅速地发展起来。因此,联邦委员会和联邦执行委员会赞同并支持了在公社中也成立生产者委员会的方针。但是,在现阶段,由于技术性的原因,已不可能成立生产者委员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立刻进行选举,这样就会大大延迟实现即将来临的改组,而这件事情我们又无论如何不能拖延,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得不在下一年度内和困难作斗争。因此,委员会和联邦执行委员会采取了这种立场:目前仅在那些以前就存在有区生产者委员会,并且就要变为公社的中心地区,应该延迟成立生产者委员会,其余的公社可以在不设立生产者委员会的情况下成立,以便在进行人民委员会新选举以前,在所有一切公社中建立生产者委员会的原则加进相应的法律和最后的章程草案中去。在这些决定的基础上也就制定了摆在你们面前的法律草案。

在委员会的工作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个问题:从法律制度的观点看来,是否只需要建立划一的公社,还是要建立几种类型的公社,因为国内各个边区的条件是不同的。委员会采取的观点是,认为公社应该是划一的。不同类型公社首先会使行政关系受到很大的困难;其次,最重要的是,公社的不同地位从公民平等的观点看来是不可能采取的。归根到底,落后的公社不会永远是落后的。从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在它们的区域内达到一定的阶段时候起,它们也能够享有一定的权利。因此,我们认为,不应该利用法律制度来保存落后现象,而相反地必须鼓励极迅速



地克服落后现象。因此，公社的法律地位的基础不是落后的公社，而是发达的公社，区人民委员会负有责任并采取必要措施来帮助那些还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履行法律所赋予的一定职能的公社。

根据同样原因，委员会不能同意关于门的内哥罗实行特殊类型公社而废除区的建议。诚然，开始时，委员会同意在门的内哥罗废除区的可能性，但是有一个条件，即这个共和国中的公社地位将是和整个南斯拉夫一样的。因为很显然，这个条件如果不危害到行政机关的正确工作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决定门的内哥罗暂时延迟成立区。我国公社的地位和结构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可能仍让门的内哥罗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此外还产生一个问题：章程是否要叙述公社这一社会友好联合的情况及其一切内部关系，或者只应该是公社人民委员会的章程。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样解决了：目前的临时章程草案基本上是两种观点之间的妥协，章程主要还是研究人民委员会的组织和作用。委员会认为这实际上是现阶段唯一可能的，因为由企业、机关等等的自治领域中产生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章程本身又做不到这点，而且首先只能通过联邦和共和国的法律才能做到。但是，尽管目前情况是这样，我们仍然应该努力，以便将来用其他因素来补充公社的章程，也就是说，使章程成为公民在社会管理制度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最近的法典。这样，今后章程仍然应该是公社的整个结构及其对公民和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反映。但是，这已经是属于今后改善整个制度方面的工作范围了。

由此又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必须完全具体地在章程中规定公社的物质来源何在，以便从而更牢固地确定公社自治的物质基础。委员会认为，在章程中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首先，我国

社会收入分配的整个問題，無論在原則上或實踐上都还没有得到最后闡明，如果使目前存在的只可能是暂时性的某些形式具有固定的性質，那是完全錯誤的。但是不管怎样，收入的分配总是取决于当时决定整个社会的各种各样客观形势和社会需要。因此很明显，章程中不可能过早地詳細規定收入來源的性質。社会友好联合，即它的中央机关無疑應該原則上作出这样决定。因此法律和章程中仅仅規定了公社和区应有自己的由法律确定的收入來源，并且它們独立地支配这些收入，不受任何一个最高管理机关的干涉，除非問題涉及到法制監督的情况。根据同样原因認為，章程中也不可能解决基金問題。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們已着手建立和發展公積金，首先保證公社达到某些最大限度的正常物質生活的需要，以便不是根据政治机关即联邦或共和国、区或公社的主觀决定，而是自动地保證这些基金的資金。当然，建立基金同样也将是既取决于現在的物質資料，也取决于收入的总分配。此外，整个友好联合还应该保留关于資金花費的方針的某种权限，尽管这些基金通常将仅仅花費在建立基金的地方，即花費在公社中。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問題暂时必須根据联邦的指示来解决，而不是用章程来解决。

大中城市的組織問題是引起长期討論的特殊問題。因为关于这一点已經写得和說得很多了，我不再重复，这个問題實質上在于：第一，不把大中城市和它們的郊区分立；第二，使它們的管理机关充分地接近公民，以便后者能給它們以影响，但同时又使地区不丧失自己的市政統一。問題是这样解决的：在城市內部有公社的各个城市中，規定有可能建立特殊的在市政建設範圍內具有一定規章的城市委员会，由此也就保證了城市的市政統一及其在市政建設問題上不限制于农業郊区。

至于不大的城市，它們也能够因农業郊区不可能了解城市

的市政需要而遭受損失，委員會認為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解決：如果很大的郊区不加入城市，那末就可以保證城市居民在這些公社中的主要影響。

提交給你們討論的法律草案也就是以這些原則為基礎的。當然，實踐中所取得的經驗以及將來條件的變化，以後會要求重新解決某些問題。但是，在目前條件下，聯邦執行委員會認為這些決定是最合適的。

\*       \*       \*

我還想簡略地談一談實現法律所規定的措施的問題，也就是談談擺在我們面前的某些具體任務的問題。因為在關於聯邦委員會工作的總結報告中，這個問題已經詳細地說明了，我要你們僅僅注意幾個最重要的任務。

法律首先規定在目前人民委員會選派的基础上成立區和公社臨時委員會，這些臨時人民委員會制定也具有臨時意義的章程，並主要根據到目前為止所應用的組織原則組成它們所必需的機構。如果我們要在一定時期實行全部改組，那末，我們就不可能走別的路。如果我們一開始就進行選舉，那末這就會使我們喪失很多時間。但是，最必要的是：要使新區和公社的經濟機關立即着手工作，以便在制定和批准新區和公社的1956年計劃方面絲毫不致拖延，因為這些計劃在制定聯邦計劃時是必須考慮到的。此外，產生一個問題：在新的友好聯合還沒有走上正軌之前，稍許過早的選舉能不能產生這種完全符合要求的代議機關。

根據這些原因，聯邦執行委員會認為，必須給與臨時人民委員會充分的時間來實行公社和區機構正常工作所必需的一切組織措施，而且只有當這一工作結束時，才能進行新的人民委員會選舉。新人民委員會的任務就是要在過一些時候並取得新經驗

以后，补充和完善以前的临时章程，并批准它們作为固定的最后的章程。已經提出的法律，規定正式的职权来实行这整个过程。

除了这些組織措施以外，在批准这个法律以后，还将必須直接着手最終制定其他一切为建立公社和区的新組織所必需的法律措施。联邦国民議会在最短时期內将有一个关于公社和区人民委员会的权限的法律，这个法律應該通过具体的权限来确定作为我們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基本細胞的公社的新地位和职能，确定作为公社友好联合的区的相应地位和作用。因此，共和国的立法，尤其是必須确定新公社和区的区域并以此代替現存的政治区域划分法律的法律，将起着重大作用。同时，各共和国議会也将批准关于公社和区結構的法律，这个法律應該补充和具体化今天你們所討論的联邦法律，也还應該根据現有的关于权限的共和国指令来批准关于公社和区之間权限划分的共和国法律。联邦执行委员会对未来人民委员会預算撥款方法以及和建立新公社和区有关的其他經濟財政問題，将作出決定。

在闡明上面提到的指令以后，就應該把主要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草拟公社和区的章程上。联邦公社建立委员会所制定和公布的某一具体公社和具体区的章程草案，是制定我国其他各公社和区的章程的基础，而在某些方面來說，甚至是基本公式。但是如果以为这些章程是简单的死板公式，它們應該并且可以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公社或区中一模一样地和机械地被接受和应用，那是錯誤的，特别是如果这关系到建立管理机构的話。在成立人民委员会內部組織时，要大大注意和謹慎地对待各个具体的公社和区之間的差別。在不太發达的公社中，甚至在具有較简单的經濟結構并且各种事务实际上很少的公社中，必須实行比發达的公社更簡便的自治組織。

此外还不應該忽略，公社不仅是作为我国統一的社会制度



和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而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由許多相互的共同利益和問題联系起来的，因此，借助于共同的机关和資金，就可以很容易地用較少費用共同解决这些問題。在我国各地的友好联合中，應該存在有極其多种多样的市政合作形式，而这在章程本身中也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在一个公社中，兽医、陪审員以及其他職員或专家的工作很少，那末，就沒有理由不在两个或几个公社的区域内利用他們的工作。这尤其是关系到专家，他們仍然是有缺点的。同样地，凡是有条件和有必要的地方，都应该成立个别服务部門的共同机关。我們未来的立法对这些机关應該特別注意，并为它們确定相应的地位。

为要正确估价和解决这一切問題，为要保証我国一切公社和区中統一的自治标准，区委員会的章程将由共和国議會批准，而对公社章程，除了区確認它們以外，这一次还必須得到該共和国国民議会的委員会同意。以后这將是不必要的，目前必須采取这个措施是为了保証在实行区和公社的新組織方面有一个統一的基本方針。此外，联邦和共和国的一切机关在其任务和权限的范圍内，應該关心相应的章程決議和相应的組織決議以及有关区或公社中干部問題的決定，帮助人民委員会，使它們的決定成为合理的和适当的。同样地，正如某些共和国中已經在做的那樣，除了經常关怀組織—法律任务的立法問題秘書处以外，还必須成立一些經濟問題、組織—法律問題、法律問題、預算問題以及其他問題的审查小組，这些小組将注意人民委員会的活动，并給予它們以業務上和技术上的合作，而必要时可以訪問一定的区或公社。

干部問題也是極重要的。这里應該首先指出两个問題：第一、現有干部的分配；第二、培养新干部，正确些說，提高人民委員会現有干部的政策。由于我国的公社和区的数目的减少，就

造成了条件，使新的人民委员会，从专门知识、能力、社会主义觉悟和經驗来说，能把干部问题比以前解决得更好，而且水平更高。首先必须保证区的熟练干部，但公社没有熟练干部也是不行的，尤其是在这些职位：秘书、某些服务部门的首长、陪审员等等。在区中首先应该既为区的需要又为公社的需要训练和培养新的干部。公社中所有能力高的人尽可能调到区里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有自己的方针，而在专家和职员的面前则应该有改进和推动他们业务的前途。

这方面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造就人民委员会的新干部和改造现有干部的政策。如果没有精通事理的、有能力的和受过教育的职员，我们就不可能使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达到所期望的质量。但是，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普遍用我们各专科和中等学校所培养的新干部来代替人民委员会管理机关中通常还没有相应的形式上的或真实的熟练程度的现有干部，那是不可能的、完全错误的和不合乎政策的。除了吸收新干部外，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首先给现有干部提高熟练程度的可能，其次要求他们利用这种可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使管理机构免除那些尽管给予他们可能，但既不劳动又不愿获得实现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所必需的真正熟练技能的人。因此我们应该立刻，但当然是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在法律系和某些特殊行政学校（它们有助于补充现有人民委员会职员的知識）中实施一定的学校教育、训练班等等形式。必须给予这些学校和畢業文憑以一定等級，并从保证比率方面来规定它们的法律地位等等。此外，还必须帮助人民委员会的政治领导干部，以便使他们尽可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这虽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当然不是我们面临的一切干部问题。共和国机关应该解决一系列其他问题，例如，补发工資的多少，不再在新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干部的生活状

况，保証职員的住宅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刻不容緩的問題。

公社和区的新区引起不直接包括在市政自治內的机关和組織中相应的变动和适应的必然性。这关系到法庭、檢察机关、律師組織、地方軍事机关、合作社組織、經濟联合以及各院的問題。到現在为止存在的法庭，按理應該保留在自己的中心区，而且它們的数目不应减少。檢察机关也是如此。但是，統計部門同計劃机关一起，只應該存在于新的区中心。同样地，也必須把合作社联合会以及其他經濟联合这一类机关集中在区的一个中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証直接的政治帮助以及其他各种帮助形式，也才能实现制度的統一。

我們現在要通过的法律还規定，目前的人民委员会将照常工作，一直到新人民委员会完全进行活动时为止。但是，根据法律，甚至新人民委员会在今年年底以前，即在 1955 年經濟計劃还有效时，不可能作出决定并采取措施，以改变各地友好联合对联邦和人民共和国应負的規定义务。为要使公社和区的改組不致在国内經濟生活中引起中断，这些措施是必需的。

人民代表同志們，由于我們現在摆在議事日程上的法律，我們可以說進到了实行我国公社和区的新結構的那些法令和組織措施的最后發展阶段。正如我一开始时所說的，我們由此就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机构和一般社会主义关系的發展上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些措施無疑会使我国劳动人民和政权机关以及社会管理机构更加有力地团結起来；更加强有力地發揮他們的社会主义積極性及其社会主义首創精神；更多地利用地方首創精神和地方資金来解决具有社会意义的問題，来發展生产力，同时也是对改善公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条件的事業作出新貢獻，实现这个任务，将是对我国劳动人民为建成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个極有力的精神推动力，会使我国制度在政治上更加稳定，并在

頗大程度上加速我國的發展。我們在這條道路上取得的成功，同時也將最好地証實我們的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方針是正確的，這些成功從而將是整個國際社會主義的重大經驗。聯邦執行委員會根據這一切原因相信，你們，人民代表同志們，不僅會通過這一法律，而且會在人民委員會中，在自己選民中間，竭力盡可能更正確更迅速地實現這一法律以及由這一法律而產生的其他任務。



## 在新条件下的我国国家管理

(原载 1956 年 3 月 25 日“战斗报”)

卡 德 尔

现在提交联邦国民议会通过的国家管理法和联邦管理机关法之产生，是由于去年联邦国民议会原则上决定了设立关于国家管理条例的联合委员会以调整国家管理的组织并使之在新条件下得以进一步发展。

几年以前，当我们从原则上改变了国家管理机构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后，我们也就根本紧缩了国家管理的组织、权力和范围。这种改变首先表现在大量分散国家管理工作，其次就是裁减机关和工作人员。为了说明这点，我想以联邦管理机关为例，联邦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在 1948 年约有 47,310 人（国防国务秘书处除外），目前为 10,328 人，其中外交国务秘书处和内务国务秘书处就占 3,194，因此我国联邦管理机关其他部门只有 7,000 人左右。各人民共和国管理机构的情况也同样改变了，各人民委员会改变的程度则比较小，因为实行分散管理以后，人民委员会就必须担负起比以前更重的任务。当然，管理机关的组织机构的改变仍然是比较大的，因此它们的数目也减去了很多。

在我们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巨大改变的同时还采取了紧缩国家管理机构这样根本的措施，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有可能我们便想通过这些改变，以各种社会管理和自治的形式代替行政领导和下达命令的形式。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发展工人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各委员会和各机关的各种社会管

理組織，并在教育、衛生和社会活动部門發展集体执行、集体管理的社会組織，例如各共和国的委員會等。其次，我們为了通过一种比較民主的形式来保証在經濟部門里集中某些必須加以集中的职权，便在經濟方面建立了各种局、經濟协会和上下統一的自治組織的其他形式。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一直在發展着这样一种上下統一的民主形式。

我們的目的在于使这些社会管理机关和自治机关能够更加独立地进行工作，但須根据法律、計劃和代議机关的決議，換句話說，它們是直接而独立地执行法律和計劃，并不通过国家管理机关傳達行政命令的系統。

虽然在这种条件下，我們並沒有低估国家管理的意义和作用，但为了使旧的形式和習慣不致于阻碍上述的新的民主的組織机构的發展，有必要使国家管理机关及其組織形式和职权与新的政策相适应。此外，当时我們还無法估計，新制度的成效如何，国家管理的詳細情形如何，以及何时这种新的社会机构得以完全生效。由于以上这些情况，我們就在国家管理机关的干部数量和机关数量上都根本地加以裁減，以期在取得了新的經驗以后，能把进一步健全国家管理机关的新任务提到議事日程上来。

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这方面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加以分析，以便得出一定的結論指导今后的工作。

### **實踐証明了我国方針的正确性**

至于我国制度內的国家管理的一般作用和地位，我們並沒有加以改变。實踐証明了我們方針的正确性。几年前我們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改变，确是十分有助于削弱官僚主义以及在社会主义發展道路上的某些过渡的政治形式的停滯傾向，而这种停滯傾向与官僚主义也是有联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多种多样的

形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强有力地發展起来了，这就使南斯拉夫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表现了积极性，也使他们对解决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日常问题表现了积极性。我可以引用几个统计数字来说明这点。

最近（1954年）10,350个企业单位进行工人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有职工201,296人被选进了工人委员会（这些企业的职工总数是308,533人<sup>①</sup>）。即职工每7人中有1人直接参与了社会生产资料的管理。在最近社会保险局分局及县社会保险局的选举中，选进社会保险委员会的约有11,500人，这些委员会将作为社会管理机关来指导社会保险局的工作。

我们6个共和国的首都共约有200万居民，而在其各种社会管理机关和自治机关中就有155,650人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显然，这种社会力量在社会实践中是不能以任何一种甚至是最好的行政机构来代替的，特别当我们想到它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所能起的作用。虽然，在这种条件下，许多不良倾向也表现得很强烈，但是近年来社会活动的全面开展证明我们广泛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方针并使国家管理的作用与任务符合于这个任务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国家管理要保证法律和社会计划的正确贯彻和执行，保证对各机构和干部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日常问题给予专门的帮助，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还是薄弱和不足的。

### 严格监督法律和计划的执行

这个弱点首先表现在国家管理对遵守法律行为进行的监督

---

<sup>①</sup> 原文如此。——译者

并不怎么有效。这种监督也包括对执行总的社会计划所规定的任务的监督，民主和自治不仅包含着权利也包含了社会自治机关和公民对社会整体所承担的义务。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民主和自治的力量以及它们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取决于每个社会组织遵循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因为不这样，社会的统一就会遭到破坏，而社会统一如被破坏就会产生矛盾，也就会阻碍某些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的发展，而且官僚主义和其它反社会主义的倾向也会得到加强。

因此，如果我们想保证不间断地实现以建立社会主义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路线，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我国各级的社会制度，从联邦一级到市一级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其它社会组织内，保证严格地监督对法律和计划以及依法律和计划制定的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这个任务首先交给国家管理机关，我们就一定要使国家管理机关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正如我以上所说的，目前在这方面我们所处的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某些情况下，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是裁减太多了，或者在组织上是不发展和不巩固的。某些机关缺乏相应的权力。在管理方面，经常存在职权不明确的现象，因此在某些机关的工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重叠现象。这一切都妨碍着管理工作的进行。

某些国家管理机关有时任务和作用不明确到这种程度，以至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部门里，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统计制度。

在这种条件下，国家管理对不良现象的反应是太慢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各共和国执行委



員会公开的非法行为都得以在事情發生几个月以后才被揭露，至于人民委员会就更談不到了，法律对它們行为的监督更是薄弱和迟緩。显然，这些情况就引起了各种公然違反社会秩序的行为，以及在最近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全会上所揭發的其他不良現象。

自然，这些不良現象对于加强社会管理的民主形式这样一个政策有很大的危害性。我不想断言，这些不良現象的危害性大到可以威胁制度的存在，可是，事情摆得很明白，如果我們不同它們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不良現象会給我們整个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损失，甚至会助长官僚主义的傾向。

国家管理的弱点也表現在它很少通过行政管理机构对各种社会管理机关給予專門的和其它的帮助。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国家管理的組織本身还不宜于进行这样的工作，其次，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国家管理存在一种机构过于臃肿和法律形式主义的現象。

我們的国家管理机关是偏重于国家机构的性質，缺乏社会机构的性質，这也就是说，它們只限于在規定的权力和职责范围内进行工作，除此之外，却經常忽視在社会生活的同一部門里工作的人們之間还存在着一种正常的人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即使是出于完全自动的磋商，交談和專門的建議等等都經常要比上級对下級所規定的老一套文牘式的命令好得多。

我們建立了各个方面的群众性自治机构。我們把必要的权力交給了这許多机构和公民，使他們能發揮主动性，并能通过民主的方法表現出自己的意志。对于我們的經濟制度和其他一切的关系，我們是这样安排的，使得既包含个人和集体的，又包含物質和精神(政治)的刺激因素，能够永久起作用，这个刺激因素将鼓舞劳动人民在工作崗位上和自治机构內为不断发展生产

力，促進社會主義關係和提高社會主義思想而發揮出主動性。這樣，我們就為社會主義的社會力量向前推進建立了健康的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

但是，這還不夠。還需要負有領導責任的社會主義政治組織和負責國家機關以及其他社會機構雙方面的主觀努力。就社會主義政治組織來說，首先就是共產主義者聯盟和勞動人民社會主義聯盟。這種努力首先應該包括注意情況的發展，對不良現象能迅速採取措施，給予幫助，進行解釋，從中掌握並予以統一的安排。我們的做法是一方面通過法律、條例和社會計劃來掌握，另一方面靠政治組織的工作。可是，國家行政負責幹部也還有他們的任務。這任務有兩種性質，一種是因為他們是公務人員擁有的權力而產生的，另一種是他們作為負責政治責任的人應該可以通過給予各種形式的幫助和合作執行的，而這些幫助和合作的基礎就是各機關和組織在其社會實踐中利益的一致。

今天，實際上這種情況在我們這裡很少有，因此很多自治組織經常踏步不前。其實在很多情況下，只要略予幫助，它們就能判明方向，就能更好地、更正確地行使自己的權利，更有效地發揮自己的主動性，並使協同的努力對於整個社會和各自治單位能產生更多更好的效果。但是，就是連這樣一點幫助都經常沒有，一半是因為管理機關在組織上沒有具備幫助的能力，一半也是因為他們在主觀上很少面對這些任務。由此，在某些管理方面就缺乏相互配合，上下聯繫，以及統一安排。雖然行動上的相互配合能以較少的資金和力量獲得較快較好的效果；但由於上述種種情況，經常就在某些地區出現原可以避免的錯誤，或在很多部分投入了不必要的雙倍力量和資金。

## 管理組織缺乏獨立性使它們的主动性受到阻礙

最后，管理組織的活動缺乏獨立性也阻礙了它們主动性的發揮，削弱了它們的責任心。我們在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机构的最初阶段，使管理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領導的政治代議机关和执行机关（即議會和执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及其所屬各委員會），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我們就保證了較快地过渡到新的关系。

但是，这种情况也有其不良后果。管理机关在很多問題上觉得自己并不負直接責任，对当地的一些現象反应很慢，而另一方面，执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及其所屬委員會却又忙于解决很多管理机关本身能够也应该由本身来解决的管理問題。执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及其所屬委員會这种过重負擔，首先使正确地肯定管理机关的作用以及促使管理机关的發展成为不可能，同时也就阻礙了这些領導机关本身充分集中力量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重大問題，这必然影响到它們在国民議會和人民委員會中的主动性不能充分發揮。

此外，因为管理机关在法律所規定的权利、义务和职权範圍內缺乏獨立性，它們对正确地执行法律和計劃就不可能負起責任。显然，这种獨立管理是会产生錯誤的，但是我認為宁可慢一些糾正这些錯誤而不要讓独立的机关的活动因过分依靠上級政治执行机关而陷于癱瘓無力。

联合委員會和联邦执行委員會因而就需要解决这些任务。

首先，必須弄清楚建立各級国家管理所依据的原則，并在这一意义上来創造条件和更加具体地規定权限、关系和对个别組織授予与其任务範圍相适应的职权的方法。应特別注意法律监督和檢查的作用，并在某些机关和組織內加强这方面的职权。

必須進一步保證國家管理的組織機構更加恰當，並從內部和幹部方面加以改善，以便它們在組織上能完成規定的任務，而且，提出了這樣的原則，每種管理工作不管其範圍大小都應有中央管理機關。過去，正因為國家管理欠缺在組織方面的發展，在很多情況下就經常沒有適當的管理機關來解決某些具體的管理任務。

最後，為了保證對進行情況有逐級的記錄，並保證管理機關提供全面專門的幫助和合作以方便於改進和有效地推動公共事務，就有必要用同樣的方法把機構上下聯繫起來。這種措施無論如何也不等於過去那種上級向下級機關布置任務的舊制度的復活。這仍然屬於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今后的任務。但是，它們應保證各機關在對工作是否合乎法律加以監督及改進公共事物方面進行必要的合作。根據這種精神，法律規定給予上級管理機關一定的權限過問其下級管理機關的性質和組織機構，否則就不能保證制度的統一和公共事務的進行有統一的标准。在這方面，應特別注意到或多或少的有上下級之間聯繫的檢查制度，沒有這種制度管理機構的分散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們實現這些任務的方法是一方面通過現在提交國民議會的這兩個法律，另一方面通過另外幾個即將提交國民議會或各共和國國民議會依據總的聯邦條例採納的那些法律。

很明顯，以上所提出的措施在實際貫徹的時候和解釋的時候，都不能認為是脫離了我們的社会和國家秩序所賴以建立的制憲原則。相反，它正是說明這個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是保證社會主義民主的組織機構和法律機構進一步發展和正確履行職責的必要措施。這些措施在任何方面也沒侵犯到憲法所規定的自治機構的權力。相反，民主的社會主義自治機構只有在我已指出的條件下，即保證對一切組織和個人履行權利遵守義



务进行严格监督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正确的发展。因此,这些措施正是加强法治的重大贡献,因而也是对加强一切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的重大贡献。

依据所提出的这些基本任务和原则,国家管理法案规定联邦和共和国的管理机关如下:国务秘书处、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管理局、管理处、检查处、管理机关和委员会。此外,还有共和国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

其中个别组织的建立是根据联邦和共和国在国家管理的某些方面的权力范围、根据具体事务的范围和性质、根据独立的程度和权力的性质而决定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对共和国、县和区的管理机关的关系,根据我以上所说的精神或在现行宪法的条款范围内加以解决。

依据我国宪法中众所周知的原则,即联邦、共和国、县和区的管理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号施令制度,而是法律所规定的共同权利和义务,国家管理法规定了这些权利和义务,同时指出这些关系的基础是自由而适当的合作、交流经验和专门帮助,以及每个管理机关有权发挥主动性和提意见或有权对改进同一管理部门一切组织的专业工作和业务提出建议。

该法的特点之一是有专门条款详细规定了各管理机构在执行专属联邦职权的事务和与联邦及共和国共同有关的事务中的相互关系。

宪法对专属于联邦职权的事务作了一般的规定,而国家管理法综合和整理了我们的经验和需要,规定了对联邦和人民共和国共同有关事务的种类(如规定了检查事务、刑事、统计和财政监督)。

国家管理法在阐明这些事务的同时,明确了以下这一概念:

这些事务只能在联邦和各人民共和国的职权范围内通过联邦和各共和国的法律来确定。在执行这些事务时，联邦管理机关对各共和国管理机关以及联邦和共和国的管理机关对县和区的管理机关都有权下发指示，并有权责成它们坚决贯彻为执行相应的任务所需要的最起码的系统化条例，有权执行某些主管管理机关没有完成的管理事务，以及一些原属于联邦职权范围内的，但因有些共和国管理机关的非法行为而被联邦秘书处所取消的事务。

根据以上这些纲要，制定了进行同一检查事务的检查机关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条例。联邦和共和国检查机关履行的职责是专属于联邦的和对全南斯拉夫和全共和国直接有关的，或者就是通过适当的共和国、县和区的检查机关去履行职责。

### 保卫自治的法律手段

以这种方法在有关联邦与人民共和国关系和我国地方自治地位的制宪原则的完全支持下，我们确定了保证那些法律和事务统一执行的关系，这些法律和事务的执行是联邦和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在这些和其他一切相互关系中规定着共和国、县和区管理机关的法律手段，即对联邦和共和国机关的行动认为是违法和侵犯自治权利的，可以提出异议和申诉。这里再一次地强调了这样的原则：任何人甚至最高级管理机构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它们不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条例以及法律条例所赋予的职权进行工作。

国家管理法阐明了关于管理机关法律行为的基本条款，确定了各管理机关法令的内容及其法律性质，规定了各个管理机关能采取这种决定中的哪一种以及其在这方面的职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們国家机构中有许多制定法律条例的机构。

这种法权的调整是加强法制的新贡献。一切执行机关和管理机关，首先应该以身作则一贯尊重法律，以实现自己的任务并起到保证公民、组织和机关都能尊重法律的作用。

### 国家管理机关最主要的特征

由于国家管理法附有详细的说明，详细地解释了国家管理的组织机构及其具体的法律关系，所以我在这里就不想谈这些问题了。我只想指出国家管理机关，首先是联邦管理机关某些最重要的特征。

在联邦，职权牵涉很广，需要有强有力的和独立性很大的国家管理机关的部门，我们建立国务秘书处。这首先指的是那些在或大或小程度上需要有事务上统一的上下联系的地方，或者是为了有效地执行既定政策、或者是为了保证对法律制度的监督。国务秘书处和委员会是依法组成的，而联邦其它管理机关是根据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法令组成的，但某些机关需要经过国民议会通过。所以对国务秘书处和委员会的独立性应特别予以强调和保证。为了使这些管理机关在具有全国意义的最重大的管理事务上能够对联邦执行委员会和联邦国民议会负责，它们的高度的独立性是不可少的。国务秘书处在联邦执行委员会指示的范围内独立地发布法令、命令、行政措施和其它所规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

国家管理法注意到国务秘书处的这种特征，不仅规定了秘书长的职权，而且也规定了作为秘书长代替者的副秘书长的职权。此外，该法规定人民代表能担任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职务。在这方面，该法并未规定必须如此，但是提供了可能性。这首先是为了强调这些管理职位明显的政治责任，此外，实践证明在某些情况下，的确需要由人民代表来担当这样重要的管理职位。

当然，人民代表仍不能担任秘书长助理以及其它行政人员的职务，这些职务不能由人民代表来担任的原则仍然是有效的。

### 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制定决议

分析说明，由于国务秘书处的这种性质，我们除了国防国务秘书处、外交国务秘书处和內务国务秘书处外，也需要财政国务秘书处和商品流通国务秘书处，根据这点所提出的联邦管理机关法规定取消现有的国民经济和预算行政两国务秘书处，建立上述两个新的国务秘书处。

在一般情况下，在联邦管理机构內也建立职务和权力与秘书处相同的委员会，所不同的是委员会是作为集体机构通过决议，它们的委员是那些独立的管理机构和有充分权力的社会组织的代表。而这些机构组织的工作都是由委员会统筹的。因此，委员会主要的不是独立地推动实际事务，而是对其它的独立的管理机关的工作作出必要的决定。当然，除此之外，委员会主席本身依据法律或者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条例可以有全权独立执行属于作为管理机关的委员会的一般职权的某些管理事务。

所提出的联邦管理机关法，只规定在联邦管理范围内成立一个委员会，即对外贸易委员会。的确，我们曾讨论过成立交通委员会的可能性。但是联合会和联邦执行委员会认为这是种类如此繁多的事务，在这方面委员会不可能有助于交通各个方面的改进。除领导交通部門的完全独立的管理处和管理局外，根据其情况，成立一个联邦执行委员会的秘书处，负责给各独立的管理处和管理局提供必要的管理方面的帮助，监督它们的工作，同其它相应的组织共同努力进行必要的配合，向联邦执行委员会提出相应的报告和建議，并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独立地解决不属于管理处和管理局职权內的管理任务，这将是更有利、更有效



的。当然，如果事实表明这样一个机构还不够，就可以寻求其它的解决办法。

第三种国家管理机关是联邦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这种秘书处过去我国的管理制度中也存在，但它们的性质与所提出的法案所规定的性质有某些不同。在过去的实践中，这些秘书处首先是联邦执行委员会内部的专门机构，内部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秘书处主要地只是为联邦执行委员会准备材料和方案，而它们本身对某一管理部门情况并不负有责任，也没有能够独立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权力。新的国家管理法在极大程度上使这些秘书处能独立地工作并给予它们为执行主管事务所需要的法律手段。

在那些联邦管理职权比较小，而且不需要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统一工作的部门建立联邦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此外，这里所指的是那些部门工作重心已经由国家管理转到工人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以及委员会、局和协会等各种社会管理机关和自治机关。

显然，在这些部门联邦执行委员会有责任保证制度的统一以及遵循联邦条例所规定的一般原则。考虑到在这方面的这种相互交错的职权，在这方面的联邦组织当然必须加强同联邦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因此，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各秘书处不能有宪法规定给予国务秘书处的那种程度的独立性，而是严格地在联邦执行委员会条例所授予的权力范围内进行工作。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们是独立的，并对相应的管理组织的情况负有责任。原则上它们和国务秘书处是同类型的管理机关，但它们的活动范围和权力范围比较小。它们的任务是注意事务进行的情况，干预其权力范围内的事情，并在必要的时候向联邦执行委员会提出条例和措施的草案。

## 各管理机关将不仅是政权机关,而且还是 专业的助手和顧問

此外,管理机关在保証給予下級管理机关专门帮助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它們發揮主动性的基础应该是同共和国和地方的管理机关保持接触和合作,进行各种非定期的协商和专门会议以及其他等等,这将促使我国管理机关不仅成为政权机关,而且也成为专业的助手和顧問。毫無疑問,这些工作方法,也将有助于改进我国管理机构和各种社会自治机关和組織的专门机构,并有助于促进它們之間非正式的、生动的和有伸縮性的合作和联系。

我不願一一列举各个秘書处及其职权范围来使你們厭倦,因为在这方面法律及其附加說明的条文已很够了。我只想补充一点,根据法律,秘書处的首脑应该是有国务秘書处副秘書长級或国务秘書处秘書长助理級的秘書长。

第四种联邦管理机关:管理局、管理处、檢查机关和管理机关,即局、研究所等。所有这些机关在国家管理机构內可以具有或大或小的权力、或高或低的地位,但是它們的权力仅限于那些法令已經規定清楚的事务和任务。实际上,这与过去的情况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这些組織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它們对执行委员会的关系更加明确和固定了。

最后,法律規定了一种特别的联邦管理机关——委员会;是为了解决那些条例所規定的需要集体解决的具体任务,而在需要更广泛和經常不断专门协商的地方規定了专门委员会。

### 各人民共和国和各人民委员会內部管理机构的建立

各人民共和国和各人民委员会內部的行政机构基本上是根据

据同样原则建立的。各人民共和国内部，除了国务秘书处外，也建立具有国务秘书处权力的，作为集体执行的管理机构。顺便说一下，除了某些小的补充外，这只是肯定了目前的情况。

在那些采用社会管理的部门内建立共和国委员会。

除了新设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是机构上的重大改变外，我在这里所谈的一切组织上的改变并没有什么本质上原则上的改变。

在讨论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联邦执行委员会内部不设立秘书处，而增设国务秘书处。不过，联合委员会和联邦执行委员会决定拒绝这种意见，这主要是因为国家行政管理各个方面的权力和工作的性质有巨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说过了。

当然，如果在确定的管理范围内联邦管理机关的权限有了重大改变的话，那么，将来实践会表明，某个国务秘书处可变为秘书处，或者某个秘书处可变为国务秘书处。但是，这些任务的具体分析说明，在目前的情况下，所提出的联邦管理机关的安排最适合实际的需要。

此外，在那些联邦的权限相对小的管理部门设立许多国务秘书处将会导致普遍地削弱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务秘书处的独立性和意义，这可能与其任务发生矛盾（正因为这些矛盾，我们作了目前的组织措施），或者导致个别秘书处在各个管理业务方面的自动加强和片面强调技术的倾向，这可能使我们的社会管理机关和自治机关的发展及它们的直接联系遭受到严重的损害。

最后，在全世界最近数十年，国家管理职权的严格划分日益改变，由一系列相配合的机构和集体的政治执行机关所限制，代替或补充。这种新的组织的产生首先是由于生产资料的日益国有化，经济中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职能。这适合于资本主

义国家，但更适用于像南斯拉夫这样拥有如此广泛的各种社会自治机关网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国民議會集体的执行机构的执行委员会的任务不仅仅是管理性质的，因为现在这种任务比起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已交给独立的管理机构；并包括了经济的社会管理和一般社会关系的更广的方面，而这里需要一个集体负责的执行机构，如果根据从前那样的内部职权分工，只能阻碍它在为实现既定政策的斗争中执行自己的任务，也阻碍它执行调整和指导的任务。

因此，独立的管理机关与作为集体的政治的执行机关，以及在自己的工作中直接对其负责的执行委员会的各管理机关的结合是最适合于我国的条件。

我們努力从实践中取得关于各个管理工作的工作范围的极确定的结论，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管理机关的任务和作用，依法进行管理机构的分门别类。因此，各个管理机关组成的方法和名称也有差别。我們因此在整个管理机构中建立了秩序和制度，但是同时，这整个机构将保持其进一步发展的灵活性和可能性，但是同时，如果我们想避免因管理机构的某种呆板而阻碍社会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对个别的政治形式经常适应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的发展形成一种阻碍，保持整个机构进一步发展的灵活性和可能性是有必要的。

在应用关于建立管理机构法案原则时，整个共和国的管理机构应与联邦管理相适应；除非联邦和共和国的任务和权力中的区别不要求相适应的补充和修正。除了人民委员会独立地根据需求和各县的特殊情况而组成的管理机构外，县人民委员会必须包括保证执行不属于联邦权限范围内的事务，以及对联邦和人民共和国共同有关的事务的那些管理机关，即，秘书处（财政秘书处、经济、外交、行政）。当然，在某些最发达的县里，上述



管理部門的管理机构可能扩大。区的管理本身可能要有为执行一定的管理事务的适当的管理上的分工。根据宪法和联邦的国家管理法条款,所有这些问题应由即将通过的共和国法律和县、区法律来解决。

### 在今后几个月内将制定几个重大的规定

在这一方面,人们应该注意到另一件事情,就是目前提交讨论的这些联邦法律草案的目的,在于使南斯拉夫的整个国家管理机构,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为机构的具有伸缩性的有效联系和制度的统一,是执行今天摆在我国各管理机关面前的重大任务的主要条件。

最后,我想指出,这些法律并没有解决国家管理在有关其对我国各种消极现象展开更加有效斗争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一切组织上和工作上的问题。在今后几个月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我们将要批准几个比较重大的规定。我愿意提请你们特别注意其中的几个。

首先,有必要通过联邦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毫无疑问,根据目前提交国民议会的法律的精神,有必要对内部组织和工作方法作一些改变。随着管理的加强,执行委员会将大大地摆脱一系列的行政事务,从而使它有可能以更大的注意力集中于其主要任务。

过去负担了最多的管理问题的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委员会现在将比过去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只是执行委员会内部进行工作的手段,因而使它有可能进行更精细的分工,也就是根据具体的要求和任务更好的予以组织。同时,也有必要加强内部工作上个人分工和个人负责,从而使联邦执行委员会有可能同所有的联邦管理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和组织保持更为直接的和生动的持

久联系。

### 即将进行的銀行制度的改組

我們的另一項任务就是改組銀行制度，这种制度已不再能适应我們目前的經濟制度和社会的政治組織。毫無疑問，我們將对銀行进行更細的分工，在这方面当然仍将保持它們之間的相互联系以及中央發行銀行和信貸銀行的充分控制权。随着这一銀行制度的改組，而且正是在改組了的銀行制度的範圍內，我們必須加强对社会财产和經濟事务日常的社会监督并改变这些社会财产和經濟事务的現有状态，不論管理这些财产的是什么样的机构。

根据最近几年的經驗，关于經濟局和經濟协会的条例也应予以进一步的研究。尽管在那些組織里，仍然存在許多缺点，但是可以肯定他們在調整和指导經濟中的各独立的管理机构的經濟活动方面已經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經驗証明，社会可以赋予这些机构更大的任务，但是，当采取某些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决定时，联邦执行委员会和联邦管理机关應該用适当的方法予以合作和监督。因此，这些条例的目的應該是使得在那些民主的自治組織內工人委员会的主动性和要求及其經濟实践与整个社会的利益获得充分協調。

为了貫徹目前提交討論的这些法律的总的原則，也有必要立刻通过关于一般管理程序的法律，这一法律的大部分已經拟好；并有必要通过关于条例效力的法律，其內容是关于规范和法律文書制度的綜合以保証法律、社会计划以及其他条例的执行，簡言之也就是关于一般法律制度的原則的充分应用。

关于国家的和一般的公務人員的法律也应尽快地予以通过。在这方面，在我們国家或者根本沒有規定，或者是运用非常

陈旧的規定，因而非常妨碍在改进公共事务和改善工作人員工作方面的协调的有組織的努力。

当然，在我提到这些新規定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在管理机关及我們宪法所規定的与其相称的代議机关的关系方面的某些改变。然而事实很清楚，我們整个社会最直接关心的，举例來說，是人民委员会的管理机关在事業上和組織上都适合于执行联邦和共和国国家机关的条例和決議所赋予的任务。这些新規定应保証使联邦和共和国的国家机关能够經常注意一定管理范围内的各管理机关——直至区人民委员会——专业上的改进。在这意义上，可能有必要制定一套关于公務人員的資格、升迁和級别的統一制度，并保証对职务的分門別类和一般管理机关的工作合法性給以更多的控制。

在今后几个月內，这些規定将是建立我們政治制度方面的主要任务。当然，并不止于这些。联邦执行委员会認為，批准国家管理法和联邦国家管理机关法，以及早日通过我以上所提到的法案和条例将十分有助于克服我們社会生活中的缺点，最近以来政治組織的各种會議曾对这些缺点展开了討論，首先曾在最近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全会上进行了討論，同时以上的措施也将成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結構所賴以建立的政治社会基础的因素。

# 現代南斯拉夫的基本問題和 南美关系(第一、二部分)

(原載 1956 年 7 月美国“外交季刊”)

卡 德 尔

在目前南斯拉夫的政治生活中有三个主要問題，其中两个問題屬於国内政策方面，第三个問題屬於外交政策方面<sup>①</sup>。这些問題都是我国加强一切政治和社会工作的出發点。这些問題是：第一，必須使我国摆脱原先落后的境况，寻求以生产資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經濟关系的最适当的形式；第二个問題是必須繼續建立那种符合南斯拉夫新的社会基础和經濟基础的政治制度；第三个問題是保証南斯拉夫具有足以使它能够在和平和独立的环境中最迅速地达到自己目的的国际地位。这些問題的简单分析有助于闡明南斯拉夫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要点，闡明是哪些利益确定着它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关系。

## (一)經濟方面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曾經有两个基本任务。第一个任务是發动那些有助于消灭我国在經濟、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落后現象的力量。第二个任务是开始进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革，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第一个問題在我国可以在社会主义方針的基础上而且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获得解决。

我現在举几个例說明战前南斯拉夫的落后情况。

根据 1921 年的正式調查，80%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从事农

<sup>①</sup> 第三部分編入本書第 597 頁。



業，十年以後(1931年)，這個數字還在76%以上，戰前一直沒有多大改變。

1937年，南斯拉夫每人平均商業用电量只抵歐洲(蘇聯在內)的平均指標的十分之一，只抵美國的三十三分之一。由此可見，落后的、原始的和生产率極低的農業是當時南斯拉夫經濟生活的基础。農產品輸出國外，工業消費品則由國外輸入。

收入和生活水平反映了這種經濟概況。根據勞動保險中央管理局的材料，戰前南斯拉夫工人的平均工資在1930年達到了最高水平——689狄那爾。在同一時期中，四口之家的工人家庭的起碼生活費達2,500狄那爾。在1934—38年間糖的消費量，如果只拿消費方面的一個數字來看，每人為4.5公斤，而英國在同一時期內每人可得49公斤。

由於國內資本不足以及由於國內不斷發生政治危機使一大部分資本投入非生產部門，工業發展十分緩慢。此外戰前國民經濟基本上是受外國資本操縱的，這就是說，絕大部分利潤要流往國外。根據股份公司年終結算和其他材料說明，1938年約60%的股票操在外國人手裡。外流的利潤十分大，有時候竟需要用輸出總值的約35%作為償付外國資本的利息、股息和利潤。

這一切情況使南斯拉夫的經濟陷入絕境而處於停滯狀態。這種後果當然也加劇了社會和政治的反感情緒，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革命。在那種情況下，國家如果再繼續把舊的社會制度保持下去，那就沒有任何希望擺脫落后。無論從經濟方面、社會方面或政治方面考慮，都有絕對必要將生產資料社會化。

革命的浪潮掃蕩了南斯拉夫戰前的社會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和政治障礙，為經濟和社會的進展鋪平了道路。這次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樣，一開始就建立了革命的政治機構，其任務就是保衛革命的成果，特別是保衛生產資料的社會化。

但是，革命沒有能够进行进一步的工作，因为革命不能够在一瞬間就消除掉国家遗留下来的落后現象以及国家經濟發展的低水平，这些情况是需要特別的社会和政治形式来克服的。进步的条件是社会內部的不断发展，而發展的速度基本上是由生产力發展的速度，也就是說社会的經濟基础和社会意識在新条件的影响下發展的速度决定的。这里不可采取任何硬性方針，也沒有任何捷徑。如果形式主义的或教条主义的采用另外的經濟和社会背景所产生的政治形式，那只会使这种过程延緩。

总而言之，我們不相信会有什么对所有国家，甚至对南斯拉夫本国發展的各个阶段都适合的万灵的政治规划。由于条件的不同，社会發展的方向以及經濟和政治組織的形式也应该有所不同。这就是我們呼吁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應該积极和平共处的原因之一。

到将来，社会制度的差別是完全可能消失的，在历史上的过渡时期通常發生这种情况。但是在現在，要說这一种或那一种以生产資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政治或經濟組織的形式是絕對必需或是絕對宝贵的，那还嫌早。这个問題应由实践来解决。这里最重要的是，应当創造这样一些政治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經濟关系上以生产資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政治形式能够自然而然和自觉地而且極其灵活地适应生产力和社会意識的發展。

南斯拉夫革命的特点之一是，它能够（这方面也有客观条件的促成）随着本身的發展既避免了純粹为了适应的做法，也避免了教条主义的極端做法，拟訂了适合于生产力和經濟关系逐步發展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就可以說明，为什么南斯拉夫和別处通常的情况不同，它在整个变革过程中內部的震动要小得多。

沿着社会主义發展的道路前进的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組織社会的生产資料，如何找到对下面两个問題的政治

答复：怎样分配社会主义生产部分的国民收入，广义地说，怎样展开社会经济计划工作，使这种工作不致变为阻挠个人创造主动性的行政障碍。这一来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国家的作用的问题，更正确一点说，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政府的作用的问题。

如果按照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划分，我国到现在为止经历了两个阶段。当然，不可能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因为第一阶段的许多因素在第二阶段也还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这种差别反映了南斯拉夫社会发展总的倾向。

革命从建立管理机器开始。它的主要特点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广泛使用行政手段以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很大程度的集中，这是一切革命具有的典型现象。我们当时也不能避免这种行动方式，因为我们要保障新的社会制度，在战后要恢复正常状态，要进行革命的社会变革。虽然在第一阶段中这种方式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这种制度中的不健康的征兆终于开始产生了影响，并且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产生了国家主义(Этатизм)，即阻碍着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正常发展的官僚主义和惰性。

过去对创造性的努力和创议的物质鼓励比较少，对经济的管理基本上是根据指示和政府规定的详细计划进行的。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会逐步造成监督和检查系统的臃肿庞大，造成管理机构的不不断扩大，使居民中从事生产劳动和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的比例日益不均衡。当时已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官僚主义倾向开始真正地阻挠着经济主动性，这就造成了有害的政治后果。

南斯拉夫社会不得不去解决一个新的任务——防止当时的政治结构永久地保存下去的趋向。它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办法，以使用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和精神的鼓励(对集体的和个别的)来逐渐补充和代替政府的经济职能，这种鼓励是以生产资料的公

有制为基础的。这样一来，过份集中地参預各个生产单位的工作就成为多余的了。換句話說，要用“内部监督”来逐渐地和尽可能完全地代替集中的行政监督和检查制度。这种监督的基础应该是各企业的工人集体、各个工人和基本社会单位（即市或区）的经济关心和社会关心。同时这种关心应该鼓励集体以及各个工人改进工作的愿望。要达到这一目的，个别工人和整个集体一定要像他们所在的居民点一样地来关心成果。个人的物质和精神鼓励应该逐渐代替政府的参預以及集中的指示和来自上面的监督制度。近年来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的进展。这点不在这里再詳細談了。但是，毫無疑問，采用上述原則对我国经济各方面的结构起有深刻的影响。现在已不需要有广泛的政府监督来监督经济，不需要有龐大的集中的管理机关来实行这种监督。代替这些监督的是经济上的鼓励，是各企业由于提高生产水平的实际上的必要而在职能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合作和联合。同时这也就是給如何集中实现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需要集中实现的职能这个问题的一个民主的回答。

中央的经济计划也正是根据这一原則制定的。这一计划只是拟訂了分配产品和收入的总的方針<sup>①</sup>。它也决定应该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根据的总的政治方針。

中央这个计划由各经济組織当作一項法律来直接实现，而不像过去仅仅当作国家行政措施来实现。中央经济计划是唯一的一个立法基础，它給各个共和国和公社的经济计划以及各企业和经济机构的经济计划規定了总的准則。其余的计划和綱領則在这些非常广泛的範圍內自由地拟定。这使得它們有可能在

---

① 原注：计划規定利用生产能力、工資基金、集累和投資之間的比例，規定分配集累的基本因素。



最大程度上反映各个工人以及各个公社和共和国的利益。只要为它們創造了可能促使爭取到更大物質成就的鼓励因素，它們的生产会不断增加，它們会去适应消費者的要求，从而做到節約和提高質量，以及保証商品的多种多样。它們可以以这种方式对改进每一个公民的生活經濟条件和增加这一居民地区的共同社会水平作出最重要的貢獻。

由于这样，行政职能的量趋向于减少，而这些职能在这以前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現在行政机构的作用减少了，它的作用被归納成監督一般經濟計劃的执行，維護法制，保証社会制度統一、某些調整和組織的职权。这样，执行責任就轉移到由选举而产生的机构（联邦議會、各共和国議會和人民委员会），自治机关（公社）和社会团体（公民委员会）、以及教育机关和社会保險机关等等。这样一来，就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不断的和全面的进步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同时，关于各別公民的創造性的努力的問題也得到了解答。个体不再是一部机器上的一个螺絲釘，不再只有狹隘的活动范围了。个人不仅仅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为他自己的利益在良好的、更有效率的工作的基础上創造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他也关心自己的同志（工人和整个企業）的工作，他的个人的成就以及企業和公社的成就也正取决于这一点。他不再是只关心于为自己賺得面包的一个个人，他成为一个社会的、自覺的工人，他越来越積極参加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和經濟生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別也逐漸地有可能得到消灭。

最后，公社、市、区直接关心于尽可能迅速發展生产力。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越大，各个劳动者越是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既提高自己的工資，也提高公社的收入），那末整个的物質生活水平也就提高得越快。公社發揮和鼓励了生产力，并且大大減

少了国家监督方面的开支，而这也就是削弱了官僚主义倾向。

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和社会保持密切的、经常的联系。社会已不再强制个人，也不阻碍他的主动性，社会也不再用统一的方式来束缚他的创造性努力，而是诱导他，帮助他。我还不能肯定地说，这一原则在我国已有了可靠的实际运用，但是我認為，現在已經可以說，有着实现这一原则的一定倾向。

無須指出，在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方面已碰到了，而且还在不断碰到困难。虽然这一发展过程是在逐渐地实现，并且一直在受到实践的檢查，但是，要完全避免錯誤是不可能的。况且，由于机构本身还不完善，使得各种利己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倾向造成了額外的经济性和政治性的困难。我們一方面力圖消除这种倾向，同时我們要搞清楚，机构中哪些因素需要糾正，需要采取哪些新的经济、政治和調整的措施。毫無疑問，虽然今后类似的新的困难将会产生，但是，我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第一个发展阶段充分地取得了它所期望的结果。在最近几年中，可以看出生产力特别迅速的发展和产品量的增加。这当然并不就是我所說的那些变化的结果，但是毫無疑問，这种变化是促使达到这种成就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們获得的成果在我們对立法所作的修改中有了非常鮮明的反映。过去，決議和行政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依靠加强的管理制度来鼓励生产和貿易的主动精神。現在的主要目的是調整和运用这种主动精神，并且使这种主动精神适合于社会的条件和要求；这里的监督只須达到为下述目的所必需的程度，这个目的就是使个别的经济組織活动不致为整个社会的利益带来損害。

这种变化說明，我們达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并且把个人的物質和精神鼓励变成在目前的社會制度範圍內的社會进步的決定性因素。同时，这有可能使得经济能更自由地發展，以及使更

民主的經濟管理形式能逐步發展。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在这方面不应当忘記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这种鼓励在本質上是社会主义的，它是生产資料社会所有制的組成部分。这一事实本身，排斥了生产的所有制恢复到某种私有形式的可能性。新的社会制度的內部政治力量恰恰在于：它促进和加速社会生活的新的民主形式的發展。

忽視某种政治制度和輕蔑地給它扣上专政的帽子是非常荒謬的事。我不想就专政和民主之間的差別的問題进行理論上的爭論。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否定，历史上不仅有反动的专政，而且也有打开自由世紀的进步的专政。与此相反，也有过破坏自由的坏民主。在南斯拉夫的深刻和广泛的革命改变中所誕生的革命政权，不論从国家的社会关系的改造和發展来看，或是从实现政治方面深远的民主变革来看，都执行了和繼續在执行重要的政治职能。

## (二)政治方面

南斯拉夫新的經濟条件对国家的整个政治結構有極重要的影响。

首先，我們称之为“地方分权”的工作正在进行。就实質來說，这不是一个合适的名称。因为，这一發展过程不仅包括地方分权，也包括新的組織形式。这就是用民主的管理形式和由新的經濟关系中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經濟刺激素中所产生的組織代替与“国家主义”有关的管理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基本生产单位和社会单位当然需要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責任心，因此，这就有必要使管理机构大大地实行地方分权，并把管理机构的許多职权移交給这些单位。在这样的基础上会逐渐形成民主組織的新形式，以便授予这些經濟单位以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的职权，但这种职权不包括行使政治权力。

这种地方分权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工人委员会。它由各企业全体职工从本单位工作同志中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工人委员会不占有企业，它仅代表全社会管理企业。因此，它是民主的政治机关，基本上与市或区的人民委员会<sup>①</sup>相似。

这种机构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没有所有权。它不能超出全民计划和其他法令范围之外。然而它具有一定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保证它有作出决定的必要的独立性以及直接支配和使用收入的权利。

公社也不是一个各自为政的自治机构，因为它需要履行一定的社会职能。虽然公社不是协调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唯一手段，但是它至少是这方面主要的手段。它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它是第一个反映个人和社会整体物质要求的矛盾的机关。在这里这种矛盾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和影响下求得解决的，这就对社会意识的形成起有最良好的影响。当然有时也发生个人利益超过社会整体利益或者对于一般生活水平作过多的压制的情况。我们过去是常碰到这两种困难的，而且将来定然还会碰到这两种困难。但是，有了经验之后，计划和调节的制度会不断改善，这些有害的倾向也会随之而逐渐削弱，这样也就可以巩固自治的原则。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成长的社会自觉性是促成这一点的有力因素。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些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协调起来的新方法，其表现形式是对个人起作用的经济和物质鼓励，这一来国家机器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成为多余的了，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必要性就减少了。

我不打算硬说，这样做后，由个人和集体利益的矛盾产生的

<sup>①</sup> 原注：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正式名称。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它们的规模，不如称之为苏维埃或地方“议会”更合适一些。



一切問題都完全解決了。這些問題之中有一些必須依靠其他民主自治形式——借助社會團體、各種組織、工業協會、農業協會、商會等等——來解決。這一方面主要責任當然落在南斯拉夫聯邦和參加聯邦的各共和國的議會身上，因為它們是最高社會和政治代表機關。然而我們在發展公社方面所已經取得的結果明確地指出了在經濟生活的社會主義成分中民主協調個人和集體利益的未來趨向。

經濟活動和管理需要越來越民主的形式，這是改變了的經濟基礎的進一步的後果。如果在舊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管理的範圍內實行地方分權，結果就會是地方機關和各個企業中的官僚主義和專斷的風氣的抬頭，這實際上就是歪曲了公共掌握生產資料的全部用意。從一開始就很明顯，如果不同時使管理制度和管理機構民主化，就不可能保證有個人的經濟的和其他的鼓勵，也不能擴大經濟機關和公社的自治權。經驗結束了這樣一種概念：似乎組織生產這是顧問和專家的事，而民主只應該限於政治方面；經驗證明，只有用民主改造各級經濟管理的辦法才能糾正官僚主義。

這種傾向使得兩種新的民主的政治組織形式出現了，這兩種形式我已經提到過，這就是工人委員會和公社。它們是我們整個制度的基本特點，並且在逐步改造我國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方面起有巨大的影響。

工人委員會不僅僅是諮詢機關。政權還保證給它們以通過決議和實行管理職權的權利。工人委員會有以下基本職權：通過關於工資的決議、批准企業的經濟計劃、分配它有权支配的那一部分企業收入、通過關於由企業自行支配的全部經費如何使用的決議、以及選舉管理委員會和監督其工作。這種管理委員會是工人委員會的直接執行機關。不錯，工人委員會不能干預

生产的技術問題及其經常的營業事務。这是屬於企業經理和企業的技术机构的职权范围的。可是在經濟計劃范疇中的企業的总的經濟政策正是由工人委员会拟定的,在这方面,工人委员会可以对行政上在技术和營業方面的工作結果加以表揚或批評。

經理由于他的职位,負責直接管理企業、組織生产、执行計劃,也就是說由他来分配給职工以各种任务和义务,而职工要服从經理。經理有义务督促遵守必要的紀律。如果工人委员会認為經理的作法不符合企業或是整个居民点的利益,工人委员会可以要求撤銷他的职务。在經理这方面,如果他認為工人委员会的工作不符合于現行的条例,他有权利也有义务报告公社人民委员会。在發生分歧时,人民委员会可以解散工人委员会和要求重新选举。

企業的經理由委员会的候选人中选出,这个委员会是由人民委员会代表、工会代表以及企業的工人委员会委員組成。工人委员会委員占委员会人数三分之一。当选的人随后要經人民委员会正式批准。企業經理是工人委员会的当然委員,但永远不能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工人委员会如同其他民主的經濟組織形式一样,密切关心公社的活动,关心它所能支配的資金的数量和这些資金的如何使用。公社代表公共的利益,它从物質上关心避免發生这种情况:个人和公社公共的要求相違背。正因如此,解决这些問題的人也参加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經濟組織的自治机关,于是公社就变成了調协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重要的工具<sup>①</sup>。

工人苏維埃和公社日益深远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和組織机

<sup>①</sup> 原注:从行政观点来看,公社这个字的普通意义就是包括市的轄境。但是在我們的国家中,它有更广泛的权限,尤其在生产方面,因此說,它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組織形式。我們通常把公社理解成是市和区的职能的联合。

构。公社，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的代議机关包括由直接参加生产的人中选举出来的生产者會議，在关于公共收入的分配問題方面，他們具有同一般机关一样的票數。这是保証社会主义成分——工人——領導社会生活的民主方法，并且这样一来，政府不再有必要采取行政措施或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进行直接干預。不但如此，这些机关还能够最充分地反映經濟的实际需要，并因此而能够最好地保証各种規章符合这些需要。此外，它們是官僚主义的唯一反击力量。

工人委员会的活动也涉及到各工厂的职能上的合作。除了中央政府在解决和計劃經濟活动方面的职能外，显然还有其他應該加以集中的經濟职能，例如，从技术方面改进生产过程的組織工作，各种生产計劃的協調工作，鼓励和促进各企業之間的合作，組織額外的特殊供应工作，分配材料——換句話說，就是有关現在生产和分工方面的合作的所有問題。

許多原先有过的部和为数更多的掌管各經濟部門的委员会現在已經为企業联合会和这些联合会的团体（如工業协会、农业协会和商会等等）所代替。这些联合会的領導机构总是由工人委员会选举出来，获得技术人員的协助。政府在这些联合会中还有代表，可以就有关共同利益的一切問題直接表示自己的意見。这些形式的經濟組織在我国还处在初期阶段，不过已經很明显，它們具有重大的社会作用。無論如何，关于在經濟生活中职能联合的問題已經得到民主的解决。这使得能够把那些在目前經濟条件下應該集中起来的职能加以組織，以便保証一切反映經濟实践需要的企業和它們的工人委员会的直接影响，以及保証为整个社会謀利益的議会和政府的影响。

工人委员会和公社在經濟范围以外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例如，在教育 and 公共衛生事業等方面；但是，这样一来，总的行政机

构失去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許多特征。这里还有許多原先是各級政府机构所行使的职能，現在也交給民主选举出来的各种自治机构。这使政府在这些部門的監督达到最低限度，因而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的傾向。

我举几个例子說明这一过程的意义。南斯拉夫三个最大城市——貝尔格萊德、薩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的人口总共为1,435,189人。約有123,400人積極参加了經濟範圍內外的各种自治机构，他們具有我已經說过的那些广泛的权力和职能。另一方面，由五个国务秘書处和許多下層行政机构組成的整个联邦行政机构有10,328个負責人和職員(不計算国防国务秘書处)。

下列数字說明，政府行政机构已經縮減到怎樣的程度，而由于地方分权，中央政府的机构裁減得特別多；1948年，联邦机构(除国防外)有47,310个負責人員和職員。現在減少到10,328人，同时，其中約有三分之一人員屬於外交国务秘書处和內政国务秘書处的編制。我認为，这些数字很有力地表明了我国社会和政治發展总趨勢。

新的民主形式不是故意制定和故意实行的。它們是生产資料公有制的直接結果。因此，如果想从基础为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民主制度观点出發来探討南斯拉夫情况，是不可避免会走入迷途的。

在像我們这样一种制度中，主观因素，也就是决定社会意識的政治組織有巨大意义，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些組織的任务就是以新的社会关系精神教育群众；它們要进行一般政治工作和闡明可能發生的实际問題，以圖影响各种代表机构作出徹底的社会主义决定。

在我們制度的領域中，这一必要的社会职能主要是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担当



的。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它們在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同于旧式的多党民主制国家中的政党的地位。

因此，談論所謂一党制和多党制的区别或是把社会主义民主問題說成是以什么方式可以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的問題，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尽管这两个政治組織在我們社会生活中有特別领导作用，在生产資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發展的民主組織形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党外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人們則可以不經過一个党或几个党，而直接获得这种民主。

为了举一个例子說明我們政治制度如何起作用，我想談一談如何确定議員候选人的問題。議會选举是以普遍秘密投票方法进行的。然而南斯拉夫直接民主制有它另外一种特别的地方，这就是候选人提名过程。候选人是在选民大会上提出和由許多公民提出的。全体选民都有权参加这些大会，参与当时正在討論的决定。大会上要选主席团。任何一位选民都可以提名候选人。然后从用这种方法提出的人員之中以多数票选出候选人，这一决定就成为大会的正式提名。

要是在一个选区中，选民大会参加者有四分之一拥护某一个人，那么他就可以被提名为候选人。要是有几个人都得到了选民大会全体票数四分之一以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提出几个候选人。这样，候选人就是由选民提出的。此外，可以由至少达到 200 名公民（其中每一个市至少要有五名公民）的公民集体提出一名候选人。由此可见，候选人的确定与党籍無關，也不取决于党籍。任何党派，甚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或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都不能确定正式候选人；只有选民大会或公民集体才能提出候选人。政治組織积极支持可能的候选人，这是完全自然的。然而，候选人提名的最后决定还是取决于选民自己。

工会也像上述組織一样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培养公民在生产

資料公有制範圍內解決國家大事的任務。在目前條件下，它們自然應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保持某種領導。發展速度不可能任意規定，這要取決於社會對抗的性質和發展，但是總的趨勢已經是十分明確了。

我決不打算肯定所有這些可以毫無困難地取得。相反，還有許多缺點存在。我們碰到了官僚主義和保守趨向的對抗，還存在着從機會主義或利己主義的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的偏向。

我也不想說，我們已經對全部問題找出了最好的解答。在某些方面，我們至今還不能用更民主的組織形式來代替行政監督制度。另一方面，有些時候，我們在這一方面過於大膽、走得太遠了，這往往就造成了紀律的鬆懈，甚至造成無政府主義偏向。

但是，要是我們把這些消極現象同已經取得的結果對比一下，那麼消極現象就顯得比較小了。也不可能指望，像這樣深刻的社會變革可以毫不遭到困難、錯誤或失敗而就能實現。我們正在根據經驗糾正我們的錯誤，因為我們永遠不是拒絕學習日常生活實踐的教條擁護者。然而經驗證明，我們基本見解是正確的。完全可能，某些實際組織形式障礙着許多變革，但是我所說的總趨向將說明我們社會今後整個發展的特點。

毫無疑問，我們並不妄圖給自己或給世界其它部分建立一個理想社會。理想社會是沒有的。我們希望的是，讓我們的勞動人民都能為自己以及為後代盡最大努力，從而促進人類社會普遍進步。實質上，他們已經能夠在現有可能範圍內做到這一點。我們不準備說，我們在這一方面有多大成就。歷史將會作出結論的。除了我們總的理論見解以外，我們在一切方面都遵循着下列兩點：通過實踐檢查和人民支持。我們認為，兩者都可以說明我們採取的方針是否正確。

# 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議会的演說

## (第二部分摘要)

——1956年12月7日

(原載1956年12月9日“战斗报”)

卡 德 尔

卡德尔說，虽然我比較詳細地談了匈牙利事件，但我还是打算对这个事件作更深入的分析。在联邦国民議会討論过程中，我想談的主要是这一事件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在我們自己的政治建設上是可以作为借鑒的。这一事件証实我們的原则是正确的，我們將繼續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發展我們的社会結構和民主政治結構。最后，匈牙利事件對我們指出了解决这类問題的全部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必須更勇敢地前进。虽然我們已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显然我們是不应当满足于这些。問題不仅仅限于今后几年我們应当逐漸解决的生活水平的问题。而且我們必須在我們的政治制度的發展方面，在社会主义民主机器的建設方面和在我們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領域的进一步民主化方面都向前迈进。这不仅是我們的要求，这也是整个社会主义的要求。在决定我們的經濟政策的时候我們应当考虑到这点。

匈牙利事件再一次証明，我們是何等正确：我們既坚决反对了斯大林主义的主張的压力，又反对了企圖以南斯拉夫必須有政治自由为口实去恢复傳統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政治形式。这两种趋势把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拖向后退，并且引起一系列的內部矛盾，同时使社会主义进步力量处于暫时的瘫痪状态。显然，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应当从它的社会經濟基础

上有机地形成起来，也就是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中形成起来。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最大的创造性的努力来进一步发展那些新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式，因为这些形式保证着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我把各个人的最广泛的主动性和他们的努力也列在这里，这种主动性和努力的目的在于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从属于自己的物质的和政治道德的利益，这些利益产生于他们对社会生产资料所付出的劳动。

当然，这是新的东西，不可能简单地捏造出来并且强迫社会接受。新的形式应当产生，而且不断从社会矛盾的本身中产生（这些矛盾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所特有的），这就是说，从社会进步和经济进步的要求中产生。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应当以这样的方式建立：即能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大众对它发生直接影响，而且仅只依靠易犯官僚主义的某一执政党产生影响是不够的。新的政治形式仅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常地表现出来：即与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同时成长起来的劳动人民的进步意愿真正能够表现在社会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有关民主机构中。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社会关系各方面的民主（这种民主自然要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因素的发展和作用）的不断进步，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进步。只有这样的道路才能保证逐渐消除过渡时期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那种社会关系中的官僚主义因素。

这是我们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我们从经验中取得了教训，从过去的民主传统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倒退，我们力求从新的社会关系中创造出相应的新的民主形式。



## 政治和民主結構的穩定

显然，这个过程不可能而且不应当仅仅取决于上級有意識的行動。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結構应当有机地从那些在以生产資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中形成的主要社会經濟关系中成长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不应当在某些最高利益的借口下被变为某种国家机器的奴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只是在生产資料私有制的地位完全巩固以及它本身完全摆脱了封建主的暴虐、官僚主义机构、君主专制，以及摆脱了官吏专横、雅各宾独裁以后才得到稳定。只有从这样一个基本的細胞中才能逐渐發展起稳定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

我不准备作机械的比較。然而上述例子畢竟証實了我們的这样一个論点：为了發展过渡时期国家的某种稳定的民主政治結構，必須首先加强社会基础中的經濟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且使这种关系成为不依赖于国家机构的日常政策的关系。这首先就是說，第一，必須加强用公有生产資料进行工作的各个劳动者在工作中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地位，第二，必須加强企業劳动集体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地位，第三，必須加强地方自治单位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地位，这种单位在社会主义生产者的大家庭中应当逐步成长。在这种大家庭中应当基本解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間的矛盾，从而解放劳动，即讓每一个工人变成为了他自己的物質和精神利益，同时也为了全社会的利益而奋斗的自由創造者。

这同时也是使一个劳动生产者成长为一个自覺的社会工作者的唯一途徑。馬克思就曾提出要求，“不完备的个人、一定社会职能的真正代表者”（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条件下的工人的情况）“已被全面發展的个人所代替，对这种全面發展的个人來說各种不同的社会职能正是意味着交替互換的活动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

我覺得，在各種社會主義運動中常常引用馬克思的話的許多人忘記了馬克思的這種觀點。他們也忘記了馬克思的下列原理：

“公社會想要把個人所有權變為現實，方法是把現在主要用作為奴役和剝削勞動的工具的生產資料、土地與資本變成自由集體勞動的真正工具”(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如果他們沒有忘記這一點，那麼他們便不會從個人利益絕對服從所謂“‘集體利益’的最高利益”(集體利益，只要它一排除個人利益，就實際上不再成其為集體利益)這個意義上來看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係，而會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係看成是矛盾的統一，這種矛盾的統一是社會主義物質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之一。用某種中央集權的官僚主義國家結構來抑制這種規律的作用實質上就等於把社會推到停頓和反常的路上去。通過相應的社會主義民主結構來為這種規律的作用打開道路，就能保證不斷地用演進的方式解決這種矛盾，也就是保證社會主義的不斷進步。當然，這個過程不可能沒有曲折地、毫無困難地直綫前進，因為人們的意識不是一直都和物質條件相適應的。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定的、逐步的社會主義發展可以拒絕那個終究仍然占統治地位的原則。

我們也應該從這個觀點來談談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斯大林的理論中流行着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內國家所有制和公有制在概念上是一樣的。這個理論符合官僚主義關於國家的作用的概念。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屬於公有制的企業的產品，不能認為是屬於國家所有，也就是說，不能認為是那些不受工人（參加這些產品生產的生產者）直接影響的機構所支配的財產。這種產品

是生产者的集体所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关系中的矛盾的統一。若把这两个要素相互分开，那就或者是使工人变为某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奴隶，或者是廢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有可能用和平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解决这些矛盾：第一，劳动集体在以民主方式通过的总的社会计划的基础上自己管理企业，而社会计划应当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第二，在公社范围内，以及通过公社在高级组织中，劳动集体也直接影响剩余产品的主要分配。由此可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概念必然包涵有某种物质上和生产上的独立的必要性，也就是包涵有社会经济基础的不稳定性。当然，社会的公共利益要求有相应的最高机关和特别的基金，以及一些集中的职能。但是，它们的权力和权限应当服从于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利益。

然而，狭义的对非生产资料的物体的国家所有制当然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认为这种所有制在我们的制度下仅是一种对物体的集体个人所有制的型式。

当然，不仅仅是某些理论结论在这方面推动我们，我讲这个并不是为了对这些问题作理论上的探讨。我们的全部实践证明，作为我们主要的社会因素——在企业、公社和区的公有生产资料基础上劳动的个人在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方面的不够稳定是许多过程的源泉，这些过程不仅带来政治危害，而且经常直接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人们在劳动和社会活动方面的主动性。最后，这几天来在这里的会议上所进行的讨论主要是谈由我们这个主要缺点所造成的后果。

我认为，从这些事实中产生的问题和任务是同样重要的，在拟定我们未来的经济政策时除了考虑如何进一步努力来消除主要的物资上的不平衡以外，还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比其他任何一个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的

国家要多得多。但是，只有在我們已經作出某些成就之后，才实际上徹底弄清楚了，这个問題的意义有多大，还必须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建立基础中的稳定关系，这种稳定关系可以而且能够由关心物質和政治的人自己而不是由国家的行政力量来加以保衛。

由此看来，我們的首要任务过去和現在都是加强我上面所講的那些主要的社会因素的地位。从这个基础出發，在所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因素积极活动的情况下，独立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形式将日益發展和壮大。这些力量和形式将符合社会最进步的願望，将随着物質基础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發展逐步地从我們社会結構和政治結構中排除掉资产阶级的右傾的因素和官僚主义的因素这样一些旧的因素，这些因素目前在我国制度中还必然存在。我們應該为这条道路而頑强斗争，这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整个社会主义。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有所成就，那就是我們在克服国际社会主义所处在的过渡危机方面的一个貢獻。国际社会主义之所以处在这个危机中，并不是因为它沒有能力生存或是社会力量拉它倒退，而是因为它已經处在需要向前进的成熟时期而又遇到阻碍它进一步發展的障碍。

我們不認為自己有任何思想意識上的壟斷，虽然最近有人这样責难我們。但是，我們懂得，我們的社会主义实践、我們在进一步發展社会主义关系和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努力可能是对国际社会主义事業的一个实际的貢獻，而且現在这个貢獻比任何时候要大。

### 国民經济方針的重新确定

我認為正是在現在对我国經济政策进行討論的过程中必須注意这一首要的政治的和經济的任务，因为，我們在这条道路上



是前进还是落后，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这一政策。如果我们落后，那么任何投资都不能弥补我国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损失，不仅是政治上的损失，而且是经济上的损失。我觉得，我们有时忘记了这一任务的决定性意义。在我们作出我们的经济计划的时候，我们对这一点思考得特别不够。我认为，大体上已被克服了的教条主义，其残余现在在这方面在实践中还在对我们继续产生压力。我们在制定我们的经济计划时，不能脱离我们对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所抱的主张。我不能说，除了可能是一部分专家和拥护技术至上主义的人之外，大家是有意識地支持这样一种倾向。然而我认为，我们在解决同我们的新的经济方针有关的一些问题方面，是有一定的拖拉现象的，而这种新的经济方针是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的政治形式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谈到拖拉现象问题，那么应该着重指出，重新确定方针，这从物质观点上来看尤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谁都知道，在国民经济中我们对之进行斗争的困难并不是我们现行的经济政策造成的后果。这些困难首先是物质不平衡所造成的，而物质不平衡是我国国民经济在战后发展中从它的结构中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困难，这也是十分明显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并且不得不基本上依靠自己力量的国家，发展是不那么容易的。我们在过去时期取得很大的成绩并且使国家能够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但是很明显，过去我们制定经济计划时所依据的特殊条件、当然还有初期经验不足以及错误等都使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出现了一定的不良因素。

卡德尔说，近年来我们在向着建立工人委员会、公社和其他民主的公共管理形式方面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步骤，但是在发展这些组织方面是“落后”了。甚至可以說，在最近两年左右的时期里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的独立活动已被各种经济决议和其他决

議限制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某些問題上它們的活動已縮小到難以容忍的最低限度（例如在工資制度方面），這樣，我們的這種干預在某些地方已具有直接轉變為行政官僚的領導方法的傾向。此外，根據我們的決議，現在的公社幾乎在一切小的問題上都要征得區的同意，而區又要征得共和國的同意。

卡德爾說，此外，也必須承認，在我國整個政治發展的制度中我們對若干懸而未決的問題還沒有找出相當的解決方法。因此我們時常採取臨時性的行政措施，實行這種措施在一兩年內是能容忍的，假如今後仍然採用這種措施的話，它們將成為很大的妨礙。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會阻礙一連串部門的發展。例如工資和制訂預算的辦法就是這類未解決的問題。由於我們還沒有找出有機地從我們社會結構和它的經濟關係中產生出來的解決辦法，我們採用行政措施已是第三個年頭了，這些措施凍結了工資，同時也使我們沒有可能來為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進一步發展公社制度和發揚地方群眾主動性而進行鬥爭。還有別的這一類例子。

卡德爾說，進一步發展工人委員會、公社以及其他社會自治機關的獨立自主和主動性這樣一種方針無疑應當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

卡德爾說，必須在最近採取一些政治措施和組織措施來保證任何自治機關的活動的合法性，從而更快地和更大膽地擴大這些機關的職權範圍和社會作用。

我們應當使如此加強的民主自治機關逐步地和越來越直接地同各共和國的以及全聯邦的國民議會和執行委員會取得聯繫。

但是，我們在發展工人委員會和公社方面產生困難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我剛才說過的那些問題上。主要原因在於我們的

經濟狀況和我們現有的經濟關係，我已經講過了，由於客觀的和主觀的原因這種關係改變得很慢。譬如說，應當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的工人委員會和公社獨立自主活動的現有物質基礎還是很狹窄的。我認為，我們在發展工人委員會和公社方面以及在發展整個社會主義民主結構方面落后的主要原因就在這裡。

愛德華·卡德爾說，在工人委員會和公社自治的狹窄物質基礎上實際上不可能充分出現勞動人民自治機關的結構，而自治機關的結構也不可能去影響解決巨大的物質問題。正是這個狹窄的物質基礎首先影響這些機關的活動停滯不前。由於這種情況，我們就遭受到經濟上的巨大損失。同時，這些事實表現了我們經濟政策舊有的弱點，從前我們不得不執行這種政策，但是，如果我們繼續執行這種政策，它就會給我們社會造成危害。這裡我指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不正確地和沒有充分地利用現有的生產能力，也沒有給社會主義生產者以足夠的物質資料和自由，讓他們在爭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鬥爭中表現自己的主動性，能把現有的生產能力發展和改進到現代技術的水平。在企業和公社中，資金是這樣的缺乏，以致於企業常常處於技術上和經濟上停滯的狀態。

卡德爾接着說，過去好些年來，南斯拉夫一直在困難的情況下基本上採取了正確的方針：迅速建設能夠保證國家經濟獨立的那些工業企業。但是，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比較長期地實行這種政策是有害的，因為它終究是在削弱着整個社會穩定所依靠的經濟、政治基礎。

卡德爾強調指出，這裡還要指出一點，各企業、公社和區對它們支配的資金並非一貫使用得正確。他說，例如，我們清楚地知道，南斯拉夫在建造許多不必要的東西，至少是用地方基金在

建造，而要建造最必要的东西又感到資金不足。服务范围很小的大批各种机构靠地方預算来維持。

卡德尔接着說，我国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應該是巩固企業和公社的地位。他說，我們應該采取逐漸加强企業和公社的物質基础的堅定方針，因为这不仅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提高生活水平的特別重要条件，而且是使我国一切經濟关系和政治关系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

卡德尔說，常听到有人这样說，上述的發展方針無异于放慢国家的經濟發展。人們往往認為，只有投資才是提高生产和增加收入的泉源，也就是說，只有大量投資才永远是經濟發展的最好途徑。卡德尔指出，此外，在南斯拉夫还存在有这样一种观点，經濟計劃的根据主要是投資所能預期达到的結果，而对其他的經濟因素、例如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則估計不足。这种傾向会使現有的經濟不平衡現象扩大，会对現有的生产能力、首先是生活水平給予越来越沉重的压力。

卡德尔指出，我們的投資政策應該是以穩定的經濟为依据。它也应该依靠劳动生产率的發展。現在我們的投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得緩慢的影响。因此，有时建造一些在某种正常情況下誰也不会去建造的企業。新的投資政策應該反映整个社会的物質成就，不應該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

因此，对今后几年內实行放慢投資速度的政策的后果感到恐惧是完全不必要的，只要这种政策能有利于稳定国民經濟就行了。

卡德尔說，还有人害怕，降低投資水平会影响到我国一些工業部門、例如机器制造業中的就業狀況。

虽然这样的問題确实存在，这种惧怕不应当阻止我們执行已拟定的經濟方針。当然，对这些企業和劳动集体不应当放任



自流。首先必須讓它們有可能在給國外買主賒購的基礎上以及依靠為國內市場生產新產品等辦法來增加出口。

卡德爾談到了國防支出。他說，近年來我們預算中的國防支出略微減少了。但是絕對數字仍舊維持同樣的水平。這是南斯拉夫很大的負擔，如果沒有外國資金的流入那就不能在實質上避免這種情況。他着重說，同時現在的國際形勢又是這樣，以致我們今年大概還不能夠着手大量地削減軍事預算。

卡德爾說，我想談談最近一個時期在社會主義國家某些報刊上發表的惡意的說法。這些說法認為，南斯拉夫國民經濟只有靠外國援助才能存在。這種說法對我們說來已不是什麼新東西，要不是因為它們的真正目的是中傷我們的制度，也就是中傷我們人民實質上賴以經受得住1948年以後落到我國頭上的種種沉重打擊的制度，這種說法本來是不值得一談的。關於援助本身，情況是這樣的。根據經濟援助而得到的資金總共只占投資總額的5%或相當總的投資淨額的7.8%（1955年年終的時候）。我們當然不會低估這種援助，相反的，感激這種援助，因為它大大地幫助了我們克服困難的局面。然而，如果硬說我們整個國民經濟就靠這種援助，那就是對事實最粗暴的歪曲。關於這方面還應當補充，南斯拉夫過去由於同東歐國家斷絕貿易上和投資上的協定而帶來的直接損失，大大超過我們所獲得的援助。這些材料完全明顯地駁斥了對南斯拉夫國民經濟真實情況進行歪曲的企圖。

卡德爾說，我們應當時時刻刻記住，資金的重新分配只能使我們稍微減少一些經濟關係中不均衡現象的作用。歸根到底要改善我國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以及要增加其他一些消費，就得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建立國民經濟中的正確物質關係。

愛德華·卡德爾強調指出，由此可見，如果不是具體地去處理生活水平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不是把生活水平問題同爭取

更高的生产率、更合理地發展生产力、爭取在这个基础上使企業和公社趋向更加稳定的状况和爭取实现我在上面說过的我們經濟政策上的改变这許多問題当作一个整体問題来研究的話，那末对生活水平的批評只会使政治上遭受損失和迷失方向的。

卡德尔說，我們在貿易活动某些方面的現象使这一整个情况更为尖銳。不过，第一，这些現象不是原因，而是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物質关系的后果，第二，它不是現有經濟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假如工資和总的消費量的增长比消費品增长快的話，物价是不会低的。好几年来在南斯拉夫就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怎樣的呢？

卡德尔說，这种情况首先就是我們过去的投資結構所促成的。我們过去投入生产資料生产的企業的资金很多，而投入农业、日用品生产的企業的资金却很少。一年年地有越来越多的新工人从农村中来，可是我們却無法保證我們的商品、粮食和紡織品等等的增长也能适应这种情况。如果新工業企業产品的出口能够抵消消費品的进口，那么这种不平衡的現象也就可以消除了。当然，出口是增加了，但是还不足以消除上述不平衡現象。低的劳动生产率使得这整个问题尖銳起来。

卡德尔說，我們的報紙在广泛討論农产品收購和出售价格之間的差別的問題。我个人認為，提出這個問題是錯誤的。我并不認為，有些价格一定不可以提高，也就是說根据市場上的某种情况而提高，而这归根結底又往往是由于商品总量不足以及貿易装备不良和組織薄弱等等的結果。但是在目前的关系中收購和出售价格的巨大差別的情况不会無緣無故和永远意味着一种不好的現象并且导致物价的高漲。它，这种差別，現在首先是我們这里人为地維持着很低的收購价格的結果，而这，也是由于我們的商業企業在农产品貿易中壟斷的結果，也是通过商会規

定的所謂合同價格的結果。

卡德爾強調說，可見，收購和出售價格的重大差別基本上不是我們貿易上的某些人為活動的產物。這是資金從某一個國民經濟部門通過貿易流入其他國民經濟部門的形式。

卡德爾說，現實的不平衡是我們困難的基本原因。這種不平衡首先可以用另外的物質關係消滅，而不是用反對後果的言論來消滅。如果我們進行批評和訴諸於人的意識，那麼必須指出應當怎樣行動去消滅什麼地方的缺點。顯然，首先必須改變物質關係。但是問題就來了，怎樣改變這些物質關係呢？要達到這一點，當然首先要減少會產生我所說過的一切後果的投資，其次要加速工業品的出口和增加消費品及食品的進口。但是如果期望實行了這些措施就可以做到一切和達到整個目的，那是沒有意義的。此外，這種重訂方針只能做一次，而且如果不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總的生產，特別是消費品和出口商品的生產，那麼這種重訂方針在某一期以後就會失去效力。

卡德爾指出，目前我們這裡有人抱怨某些消費品沒有達到需求的水平。同時某些人也在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多的投資，在要求更多的預算資金和更多的社會支付資金等等，然而他們卻沒有費神去了解一下現實物質關係，以及在这种關係的範圍內試圖找出解決的辦法。也有的同志認為，只要向投機分子施加壓力，消除盜竊，只要把物價凍結在一定的水平上，只要貿易組織採取各種行政措施使商品按低價出賣，那么就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並且也就會有足夠的錢來進行各項工作了。當然，我講到這些庸俗的見解的時候有些誇張，但是這一幅漫畫同實際情況相差不遠，並且照我看來，我們那些在各處這樣解釋我們困難的原因和這樣指出擺脫這種情況的辦法的政治積極分子，實質上是在自欺欺人。

卡德尔說，在我們这个以劳动人民自治为依据的制度中，如果我們要想使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结构作为自由生产者的社会的基础而得到进一步發展，那么就不能仅仅由中央来决定生活水平。因此这只能看作是一个暂时的办法。将来我們要做到使生产者自己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發展生产，更好地組織生产活动和使生产合理化等等来为自己創造更高的生活水平。联邦計劃将在这方面保証必要的物質刺激，对内部关系我們應該用新的工資制度来解决。

卡德尔指出，現在已經是最坚决制定工資制度的时候了。过去我們在解决这个問題时做得緩慢，这首先是因为，在研究这个問題的时候，常常有这样一种傾向：即認為这个問題应当在某一种統一的、集中的、行政制度范圍内解决而不是通过保証每个企業内部最大的自主性的办法解决。

对解决工資制度这个問題來說，重要的不仅是这种制度的技术方面，重要的首先是企業和公社的状况。应当使这两种組織的物質状况和享有的权限足以使它們有可能为爭取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爭取生产的增長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努力。

卡德尔最后談到农業問題。他說，在农業投資方面，必須掌握两个原則：第一，必須把資金投到那些可以明确知道資金用途和其成果的地方。第二，必須把資金首先投到我們能够以最少的开支而最快地获得成果的地方。



## 关于經濟情况和今后經濟 政策基础的會議

(原載 1955 年 10 月 2 日“政治報”)

为制訂新的远景計劃，1955 年 9 月 28 日在鉄托同志主持下在貝尔格萊德举行了关于經濟情况和今后經濟政策基础的會議。

會議肯定了一直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工業化的政策，已經为我国經濟和社会今后全面的进一步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工業基础。

这样的發展，要求更多的投資，并要求在投資比例中把大部份的資金投入基础工業，但加工工業和农業的投資是不够的。这种巨額的投資和保證优先發展生产資料的生产，而使消費資料的生产 and 整个农業的生产速度却大为緩慢的投資比例，不可避免地減緩了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同时也減緩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的發展肯定地带来了某些不良的現象。这也就是各种經濟困难和工人、職員生活水平困难的根源。它使得市場遭到破坏，使工人和職員的生活水平不穩定，特別是在城市里和工業中心地区。

### (一)

會議肯定：至今为止的經濟發展的結果使我国将来时期的經濟政策有可能，也有必要以下列几点为根据：

一、应在符合国家生产力的普遍增长和适合于个别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保證稳定和逐漸地提高劳动者的生活

水平。

二、应本着消除目前的不平衡现象，并从而保证实现既定的生活水平政策的目的，来规定投资的数额和比例。今后的总投资额，不应超过既定范围，因为超出范围就会使劳动者生活水平的稳定和逐渐提高成为问题。在投资比例方面，也必须保证日用消费品，即农业和加工工业产品的增长。在住宅和城市公用设备方面也是如此。

为了能尽量合理地利用现有的、整个的社会资金，必须在投资政策上执行以下原则，即资金应投入那些使国民收入稳定上升方面能达到最大效果的地方，以有助于实现上述任务。

三、通过国民收入分配的适当政策，通过投资政策以及加强储备来尽可能地保证市场稳定。

四、通过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来保证我国经济在独立和平等的原则下，用增加产品交换等方式来进一步地参加世界经济。

五、最近几年来我国在农业和农村的经济政策毫无疑问地使农业情况开始有了改善，即整个农业的生产都在增长。但这仅是一个开端，它证实了在增加农业生产上也能达到更大的成果，但要完成这一任务，便必须更好地利用一切因素。这首先就是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经济的加强及其经济上的积极作用是整个农业生产，特别是个体农民的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极重要的条件。其次就是国营农场、农业研究所、拖拉机站和其他改善农业生产的机构。在农业生产总的增长方面，个体经济生产的提高在我国条件下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提高首先就可以通过农业合作社来实现。

六、社会今后将根据上述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来帮助落后地区，因为这是我们总的政策的一贯原则。

## (二)

为了实现这些任务，必須采取若干措施以便所有的主管机关都致力于这些任务的实现，并将全部資財都运用于这一方面。

一、采取一些措施使制度更趋完善，并使其适应于既定任务的实现。

制度特別应当保証完成計划范围内的和特定方面的投資，以及根据物質上的可能来調整資金的使用速度。这样我們将来就可以不必經常冻结自治机构的資金，从而使得自治的原則进一步巩固起来。

必須采取若干措施来消除在貿易中，特別是农产品貿易和采購中的不良現象。例如：使消費者对貿易进行监督，使运输工具和其他工具更好地为采購网服务，利用农业合作社采購产品并消灭中間商人。

二、应对各級行政机构，即联邦的、共和国的、县、市的机构加以更多的注意，使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更有成效地完成規定的任务。

三、凡是提交各級代表机构——各級国民議會、人民委员会批准的联邦的、共和国的和地方的經濟計划都应在这个基础上來制訂。

## 經濟發展的協調和提高生活水平

(原載“我們的社会”杂志 1955 年第 2 期)

伏克曼諾維奇

不久前在鉄托同志主持下召开的經濟會議，从決議中可以看出，我們下一階段的經濟政策將有所改變，這種改變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已順利地完成了過去所提出的任務和目的。另一方面過去在發展經濟中所實現的重大成果也使我國改變經濟政策成為可能。

如果總的來看一下我們的經濟政策，那麼，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這一經濟政策的根據就是：經濟發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應當屬於勞動者，並為其生活的不斷改善服務。

但是，這種美好生活，不能僅依賴於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期望，首先決定於我國的經濟，能否以足夠的產品，保證不斷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我們得到的遺產——經濟基礎，是舊南斯拉夫的不發達的經濟，落后的工業，又遭到戰爭的破壞，因此，在戰後存在着很大的困難。無論在最高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關係的發展方面，或與此相關的在不斷提高生活水平方面，都阻礙着我們革命目的的實現。舊的半殖民地的經濟，既不能與最高的社會關係相吻合，也不能與最高的社會水平相適應，同時也不可能成為國家政治獨立的穩固基礎。

我們已勝利地完成了改變我國經濟落后的任務

這種情況對我們前一階段的經濟政策有着決定性的意義。



这种經濟政策应当是直接解决改变我国的經濟落后；建立关系整个經濟的工業發展基础，因此也要解决为国家經濟独立創造条件等任务。

尽管我国拥有巨大的自然财富，但旧南斯拉夫的落后还是众所周知的。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工業。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們有發达的紡織業和皮革工業，而没有原料基地。例如：棉織工業沒有足够的棉紗。而在另一面，生产了原料，但在全国找不到制造工業。如电解工業、冶炼工厂和压軋工厂都感到不足。几乎没有机器工業，如各种电动机、發電装备和运输器材的制造工厂。

国家經濟在各方面都要仰賴于外国。它以極低的价格把自己的原料卖给外国公司，而又以極其昂貴的价格从它們那里买进別的材料——主要是半制品和一定数量的机器。我們出口的是銅(里面含有金的成分)，而进口的却是电纜；我們出口的是鉄矿石，而进口的却是鋼和鋼的制成品；我們出口的是鉄礬土，而进口的則是鋁；我們出口的是牲畜和皮毛，而进口的則是已加工的毛皮。这就是半殖民地性質經濟的所在。国内有过掠夺性的經營，在这方面，外国資本曾占居絕對优势，物价的低廉，不用大量投資和現代技术就能吸取高額利潤。当然，这种片面的經濟發展——为外国資本家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和建設供应外国資本的輕工業——是对外国剝削者有利的。因此，我国愈来愈落后于比較發达的国家，而陷于負債，絕大多数的居民陷于貧困的境地。

很明显，我們絕不能够容忍这种情况，应在最短期間尽一切力量使我国摆脱这种落后現象。第一步是工業国有化，沒收外国資本家和本国資本家的企業，这仅仅是开始。下一步就应当进行工業化。工業化首先应当集中發展重工業、冶金和机器制造工業的基础上，因而也应当为正在發展的工業和居民的需要

而發展電力基礎。實際上它不僅意味着擴大礦產的開采，而且還意味着創建從原料加工到制成品的各種企業。

現以銅為例：銅是需要加工制造的。首先我們建立了電解設備，并使金子從冰銅里游離出來。其次，我們還建設煉銅廠。再次，就是建設電纜廠。最後，我們才有了發電機和電力發動機工業。同時也要創造絕緣材料，變壓器等工業。隨着所有這些工廠的建成（它們已經投入生產），我們已完成了從銅到發電機、變壓器和無線電收音機的生產品規模。

同樣情況還可提出鉛、鋁、鋅、鐵和鋼、非金屬礦產、木材等問題。到結束階段，到處都需要新的補充生產的工廠，自然，也需要擴大和改善現有的礦井、選礦廠、冶煉廠、以至開辦新的工廠，為了改變經濟的性質，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動用一切所有的物質財富。

舊南斯拉夫的動力基礎，僅僅在外國資本家感到興趣的那些自然財富方面，才有利用的可能。沒有統一的動力體系。各個礦井附近和市內的火力發電站和水力發電站之間是沒有聯系的。我們應當改變這種情況，提高電力、煤、石油的產量，并把電力動力體系同遠距離導電體系連結起來，否則要把國家從落后的狀態改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是不可想像的。這裡我們應當花費巨額的資金。但困難在於修築大堤、安裝透平機和電力發動機時，沒有足夠的有經驗的幹部。這一切都必須在實踐中通過解決最複雜的任務時生長出來，——這些任務即使對具有豐富經驗和具有長時期工業傳統的国家來說也是很困難的。

現在我們的發電量比 1939 年增加了 3 倍多，而煤則增加了 1.5 倍。

發展機器工業，是一個巨大的任務。舊南斯拉夫除幾個修理廠外，沒有機器製造業。一切都要從頭建設起。在這方面，我們

獲得了最大的發展，建立了鐵路運輸工具——機車和車輛工業。我們正在順利地發展載重汽車和其他交通運輸工具的工業。我們已經有強大的造船工業，它還能夠為其他國家建造大型船隻。如果沒有這些能力，我們就不能解決發展和改善運輸業的問題。

我們也建立了農業機器工業：打谷機、拖拉機和其他機器。如果沒有這些機器和工具——拖拉機、卡車，沒有保護植物的器材——我們就不能認真地解決農業上的問題。之後，我們又建立了為制糖、榨植物油、水果加工、磨粉等工業生產設備的工廠。

如果我們回顧前一階段和對經濟發展所獲得的成就給予評價時，我們不能不看到，我們在完成使國家擺脫落后的基本任務的同時，還要解決另一個重要任務——捍衛和鞏固民族獨立。在短期間，我們既要在工業發展方面、也要在捍衛獨立方面堅持巨大的鬥爭。這就迫使我們必須在幾年內加速建設強大的軍事工業。建設製造大炮、坦克、機關槍、步槍、火箭炮、子彈、炸藥、現代化飛機等工廠，並為這些工廠培養幹部，這些都是不容易的。然而，我們順利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甚至，我們的軍用產品，還出現在世界市場上。

這樣，我們所肩負的重担，堅持的鬥爭，以及我們已取得的成績，都不落后於我們在人民解放戰爭期間所進行的偉大鬥爭。

現在，我們可以說，這一建設時期基本上已結束，並已達到了規定的目標。我們現在是以一個擁有進一步發展的鞏固基礎的工業國代替了落后的國家。我們發展了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動力和原料基地，以及機器的生產。但是，如果分析一下，就能發現由於首先加強基礎工業的建設而造成的某些不良後果。到現在為止，工業已在我國經濟中造成了新的矛盾。它引起了生產資料生產的急劇高漲。但，加工工業，消費品工業和農業則處於落后狀態。

其發展情况与 1939 年比較，1955 年的增长数字如下：

生产資料的工業（机器工業）	……8倍
动力	……2.5倍
加工工業	……1.7倍
農業	……停留在同一水平

这說明我們首先發展了經濟的主要部分。我們必須建設有現代化設備的企業，这些工厂企業的造价很貴——每項工程需要几十亿几百亿狄那尔。我們从哪里取得这些錢呢？西欧工業是經過几百年發展起来的，其中每个国家都是依靠別国的丰富資源和通过对殖民地的剝削，或者經由借外債的途徑發展起来的。荷兰的資本曾借給英国，而英法两国的資本又支持过美国的工業化。我們則是利用本国的資源。老实說，由于經濟不發展的結果，这些資金就受到限制。如果，我們想在最短期間創造用机器生产的現代經濟基础，我們就得把每年大部分产品用在这一工業化的消耗上。牙布拉尼查、澤尼查、路加瓦茨、弗拉西那、茲沃尔尼克、馬夫罗沃、尼其西奇、巴諾維奇、“拉德·科查尔”工厂、“尼古拉·塞斯拉”工厂、里托斯特罗、基德利捷沃、烏澤尼查和其他几百个工厂，以及鐵路、隧道等等就耗費了許多亿的資金。因此綜合产品方面的投資一年比一年增加，最近几年来情况是这样：

单位：亿狄那尔

年度	年产量值	投資总額	投資的百分比
1953	11.1	3,406	30.7%
1954	12.6	3,898	31.0%
1955	13.4	3,950	29.6%

（計劃数字）

其次，最大部分的投資集中于經濟建設上，而提高社会水平



方面則非常少。列表如下：

年度	經濟建設投資		居民社會公共事業活動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1953	3,044	89.4%	362	10.6%
1954	3,182	81.6%	715	18.4%

作為發展經濟的巨大投資額中，偏重於經濟基礎部分如下表：

年度	動力、冶金、(非金屬)金屬加工和化學工業的投資	其他經濟部門的投資
1947/52	82.5%	17.5%
1952	86.7%	13.3%
1953	75.5%	24.5%
1954	81.0%	19.0%

總投資中只有四分之一，有時是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是用在其他經濟部門。其中包括建築材料工業、林業、養蠶絲工業、造紙業、紡織、皮革、食品、印刷、煙草和電影工業。很明顯這些經濟部門必然會落后，我們從現有的收入中，只分出了一小部分給這些經濟部門，以及住宅和市政建設。此外為了供應巨大的經濟建設，我們不僅動用了加工工業折舊費的大部分，而且也動用了市政企業的折舊費。如果我們把國防經費（在某些年份內占國民收入的22%），也加在經濟開支上。那麼，很明顯，一部分資金是靠犧牲人民生活水平而取得的。

到目前止，我們所從事的建設影響了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因為這些建設單位——堤壩、水力、發電站、冶金聯合企業——需要很長的建設期限，就是說，我們在許多年消耗在這些建築上的洋灰、鋼和木材像山一樣，還要進口設備，但我國的經濟，在這個時期內，什麼也沒有得到。如：那些占用大量勞動力的工作；尤其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機器，有時只得利用鏟子和鎬

头进行操作——因此，非常明显，在另一方面需求也迅速地增长了。

一方面，生产資料和原料生产工業的經濟取得了飞快的进步，但原料变为成品后又都消耗在几年內一無所获的基本建設上。因此生产中从事劳动的人数和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都增加了。而另一方面，生产日用品的經濟部門則落后了，倒退了，农業經濟也落后了，而住宅建設和市政公用企業也停滯不前。加上軍事的、社会保險的及保健的基本建設費用，又因商品儲备、农業产品、住宅面积、市政公用企業不足等原因，与購買力之間产生了新的不平衡。因此，形成生活水平下降和严重的市場波动。

我們下一阶段經濟政策的主要一环就是解决这种不平衡現象。这个政策必須繼續貫徹，同时还要注意世界經濟的發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設要求进一步工業化，但是發展速度和比例将有所不同。将使整个經濟發展，并开始能使生活水平获得不断提高。

## 下一阶段經濟政策的基本趋向

鉄托同志所主持的會議的決議，确定了我們今后經濟政策的方向。如何来实现这个決議呢？

首先，在下一阶段的投資額与社会产品总值比較应适当地降低。明年投資額将比今年减到 4,200 亿狄那尔。

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品的大量增加，投資額即使較高的話，也不至像过去那样困难。要是收入能达到 15,000 亿狄那尔的話，那么撥出 3,000 或 4,000 亿投資是不困难的。如果收入仅为 10,000 亿狄那尔，那么事情就困难了。第二：对今后的建設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更重要的是另外一种投資的方案。重点

要轉移到加工工業、農業、運輸業和提高社會水平方面，即保證整個經濟協調的發展和消除目前存在的不平衡現象。

實際上它意味着什麼呢？下一階段是把收入在最大程度上撥給那些落后的部門，並保證折舊費不投于重工業，而是留在每個原有的部門和企業里。這樣就可加速加工、紡織、食品等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同時又能加速住宅建設和其他公用事業的發展，今後各項建設時間就會比雅布拉尼查或者某些軋鋼廠的建設縮短很多。經過一年，最多經過二年，這些新的力量將投入生產，並將增加日用品。這就是增加收入、收效最快的投資辦法，亦即增加我國的物質財富最快的投資辦法，鉄托同志所主持的會議將徹底幫助我們去理解這種經濟投資的方法。這就必然會增加日用消費品的商品儲備。同時也將增進市政公用事業的能力和住宅面積。

### 提高生活水平的經濟方法

下一階段的方針，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應獲得效果。勞動人民所作的努力，已創造了經濟基礎，這就使他們能夠直接感到自己勞動的效果。所以我們不用簡單的增加工資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單純提高工資，不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個人消費品的商品儲備，那就只會加劇市場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的壓力。我們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條道路。遺憾的是有人認識錯誤和輕易的借債。今後的經濟政策要消除市場的不穩定和波動現象。這個政策能使經濟法令更有效地在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價格和提高工資等方面發揮作用；在審查個人、企業和公社的技術水平和成就上起作用以及在增加社會產品方面起作用。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每個從事於經濟工作的人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着直接

的关联,或决定于人們的技术水平,它将摆脱过去产生的一切波动现象,这些波动曾助长了某些投机现象以及产生个别人物和社会机关不能完成任务和决定的现象。

这样,我們不采用人为的提高工資的办法来提高生活水平,而是采用实际可行的办法。因此我們才这样調整經濟政策使它能为提高生活水平創造基础。

另一个使生活水平必然提高的客观原因。我們以前常常以生活水平的費用来供給建設。劳动价值的降低,就無法避免,我們在許多堤壩和鐵路等建筑工程中沒有足够的机器。現在由于机器工業的高度發展,对社会來說,利用机器工作是最經濟的,同时在最短期間就能产生效果。因此,国民收入就会很快的增加,这样必須引起在生产中更大量地利用机器进行工作。实际上再也不需要用手和鉄鍬来修筑堤壩和道路了。采取机械化的办法,这样意味着我們可以減少从事劳动的人数,主要是縮減不熟練的工人。至于人民的生活問題,可从两方面来解决。一方面,可以減少大量不熟練工人所造成的商品儲备的压力。这些工人大多数是农民,他們是土地和房子的私有者,他們放弃了农業,不供給市場产品。如果回到农村,就能很好的影响农業部門的發展,促进商品儲备的增加。这样,他們就不是消費者而是为市場增加商品生产。我們以劳动机械化和減少投資額的政策,就可以在明年縮減十万工人,除去他們十个月內的工資和社会保險費用外,仅就进口食品一項,我們就可节存 1,500 万美元。这是一个很大数目,我們可用它購買原料和大大地增加消費品的生产。

今后的經濟政策坚决地把我們的力量引向农業的發展,同时应注意到农業生产的增長,必然要引起市場問題,即生产者在市場上出售产品,能否获得最大的利益,其次是引起农業机械化



和减少生产费用的问题。很显然，这样必须要加速生产公有化和加强合作社的作用。因为经济生活将要求这样作。这是一个应予特别重视的问题。在这里只是提醒一下，因为我国工业坚决要求农业的改进和机械化，要求农业使用国产的各种机器和设备。

因此，我们具备一切先决条件——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的条件——满怀信心地瞻望着将来，比较容易的来努力实现我国今后的建设。在平衡和协调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大量生产消费品的基础上，我们将有更稳定的市场，狄那尔的购买力会使生活水平很快提高。在执行具体的任务中，要求社会机关和个人提高积极性和遵守纪律。

## 南斯拉夫的經濟問題

——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  
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报告

(原载 1955 年 11 月 28 日“战斗报”)

铁 托

同志们！在这次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我们将讨论南斯拉夫的經濟問題。近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及各种全体会议和代表会议、各共和国的政治会议和經濟会议等对这个問題已經討論得很多了。所有这些討論以及报纸上所发表的文章都证明，对我们的工业和整个經濟的远景计划作某些变更，或者更恰当地說，提出某些修正以及消灭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各种消极现象和不正常状态的时候已經到来了。我认为，这个代表几百万会员的劳动人民的組織的高级机构，应当研究南斯拉夫經濟的一切最重要的問題，因为，这个群众性的組織有任务發揮出最大的积极性，以便使那些由于在經濟中發生变化而采取的措施能够正确地貫徹。

过去的經驗证明，只是用行政的办法，并不能有效地貫徹执行南斯拉夫人民政权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已經通过的法律和決議，由于对它們的解釋不够或者不完全确切，常常被理解錯誤或不正确，因而發生了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違法行为。对正确执行所采取的措施加以严格的监督，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过去，因为没有监督，所以經常引起各种危害社会的后果——个人和集体的犯罪行为。由于缺乏警惕性，由于

忽視群众性的監督，便使得形形色色的敌視社会主义的分子，在国民經济中爬到了最高的位置，并且在那里肆意地进行自己的敌对活动来損害劳动人民的利益。所有这些今天都必須在这里談一談。在下面我要举出一些例子。

現在，如果我們在某方面改变南斯拉夫进一步工業化的方針和整个經济投資的結構，这絲毫也不意味着，在此以前，我們都做錯了。过去我們基本上注意建設重工業，并且用去了大量的資金，因而使我們的其他經济部門便落后了，特别是那些对提高我們公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部門，如农業、輕工業等等。不，这并不是錯誤，而是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由于我們工業發展非常落后和物資缺乏的緣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不能进行广泛的建設，也就是說，不能进行包括所有經济部門的建設，以便有可能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更迅速的提高。由于沒有重工業，所以我們就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重工業建設上面，因为如果沒有重工業，就無法推进更全面的建設。

但是，在这里我們应当弄明白重工業的建設进行得是否經济和正确这样一个問題。不，并不是一貫正确的；在用款方面縱容了很多的錯誤，并且把原来就很有限的資金用在各种非預定的目的上。問題在于，用来建設大工程的基本建設資金被随便地花在各种非生产的目的上，因此数十亿狄那尔並沒有用于重工業，而是用于建筑豪华的高楼大厦和滿足地方的各种需要上面，这样一来，大工程的建設便放慢了。

現在，我們在重工業的建設方面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以后，我們可以依靠这个基础較慢地进行建設了。居民的迫切需要要求減輕他們到現在为止所担負的重荷。为了尽快和更多地為居民生产日用必需品，并使价格能够适合他們的購買力，这样做是迫切需要的。市場上商品的缺乏和大量需求引起物价的上

漲，这就为那些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牺牲消费者来积累資本的各种投机分子和商業企業造成了良好的条件，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再談。

我們应不应该繼續进行重工業的建設呢？当然应该，不过要慢一点，并且不是百廢俱兴，而是逐漸地进行建設，因为南斯拉夫有巨大的尚未利用的原料資源。原料非常丰富，但这些原料只有当我们拥有足够的資金来进行投資，以便把原料开采出来并进行加工的时候，才能加以利用，因此，今后我們必須在我們的物質条件許可的速度下来进行重工業的建設。而現在，应讓那些对于提高生活水平和平衡收支很快就能产生效果的部門优先發展。必須使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工業和电力生产之間达到一定的比例。这点应在远景計劃中加以考虑，這項計劃应当是分析过去的缺点和将来的可能性的結果。

### (1) 企業間必須更多地合作

由于社会拥有的資金有限，所以我們必須对資金更多地关心，以便使这些資金能够合理地花在我们所預定的那些目的上。决不能百廢俱兴。例如，在改造、扩大或者更新生产工具，就不能允許这些投資和用来建設新企業的投資一样多。必須关心到用最少的資金很快就能获得最好的結果。

直到現在，我們不仅不能建設足够的輕工業来生产日用品，而且我們对現有的輕工業的投資也仍然不够。某些企業陈旧了，机器用坏了，因而，产品的成本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現在，这些企業必須优先改建和重建。必須把旧的和損坏的机器換成新的。可是，必須根据我們的物質条件一步一步地去做。这样就首先要从紡織工業、食品工業和其他輕工業部門的旧企業做起。

扩建工業，并不是要大兴土木，进口很多机器和大量投資，



而只是补充和获得一些对扩大生产所需要的新机器，也就是说对生产新的成品或者更换旧的、業已损坏的机器所需要的那些新机器。

我不願意在这里对这样一个問題默不作声，即削減工業中个别部門的投資，这同样是我們的过錯，因为我們曾經允許把企業的折旧資金不仅是部分地，而且有时甚至是全部地花在新企業的建設上面。現在，我們必須制止經濟政策中的这种現象，因为折旧資金始終应当全部由企業掌握，以便革新業已损坏的設備。这些資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花在其他目的上。我認為，从企業的折旧基金中抽出的資金，应逐步地交还给它們，特別要以貸款或者補助金的形式交还给那些有困难，有严重损坏情况的企業，以便使这些企業能够較快地革新技术和生产出有利可圖的成品。

同样必須加强企業間(包括軍事工業)的合作。从而可以节省用来購買各种零件和机器的外匯資金，也可以稍稍減少我們所欠的外債。直到現在，个别企業到国外購買本国工厂能够制造的机器，几乎仍然是常見的現象，这样做的結果，我国支付差額的赤字便增加了。

在这种情况下，企業所持的理由是，国产机器和零件似乎太貴，而質量也比較差等等。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同时，不應該忘記，我們的成品在国外市場上卖的非常便宜，这就使我們取得外匯受到了影响。

避开自己的企業而到国外去購買貨物，在这后面經常隱蔽着各种各样的勾当和貪污受賄等行为，因此就使国家遭到損失。另一方面，本国企業在这个問題上也有一定的过錯，因为它們有时力圖获得壟斷地位，以便于抬高自己的成品价格并造成过分的积累，这种积累不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靠消費者来取

得的。

## (2)对地方条件缺乏足够的估计

投資結構和工業分布問題对經濟同样重要。有一种傾向直到現在还没有根除，即各共和国的很多地方有不顧一切要建立大工厂的傾向，它們不問条件是否具备，甚至在該共和国或者整个南斯拉夫这样的工厂已經有了一个或者几个，它們也全都不管。

現在，我举出这样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我們需要多少工業企業和什么样的工業企業，如何能把这些企業的能力充分發揮出来这样的問題，人們很少予以注意。在冶金工業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說道：“在未来十年中，我們为了更新旧的汽鍋最低限度需要4,500吨汽鍋，而最高限度就需要7,500吨。汽鍋制造業的現有力量已經超过了南斯拉夫的实际需要。它們不是两班制的工作，并且力量也沒有充分發揮出来。現在，它們的生产能力是6,500吨。而市場上的要求，最大限度是7,500吨，但是，有人希望进一步进行建設，要把生产能力提高到13,000吨或者15,000吨。”报告中接着又說：“要使南斯拉夫有6个汽鍋制造厂，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比較發达的国家中，这种工厂都比較少，例如，奥地利有2个，意大利有3个，法国也只有3个等等。这种做法，会使我們的力量和投資資金分散。”

在食品工業工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會議上，曾談到建設和改建食品工業企業方面的要求和可能性，同时也談到：“正在起草或者已經起草好要在彼多利、奥尔莫西和科文等地建立3个新的制糖厂的計劃和預算。其他某些地区同样想建立制糖厂。这3个制糖厂的建筑費約120亿狄那尔。而現有的制糖厂，对14万輛車皮的甜菜进行加工，和出产17,000輛車皮的糖，并不須

要費很大的力氣，这就差不多可以滿足我們目前的需要了……而关于革新鍋爐間、改建現有工厂和使卸甜菜的工作机械化，只需要 15 亿狄那尔的投资。”

这些例子証明，人們對我們的要求和可能性缺乏遠見和了解，不想一想我們是否有資金。往往有这样一些情况，一个委员会当它手里有了两三千万狄那尔的时候，就着手用这笔錢来建設大工厂或者某項工程（一般都沒有制定好的藍圖），而建成這項工程却需要几亿甚至几十亿狄那尔。这笔資金由哪里来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摆在共和国或联邦面前的是既成事实，但它們也不能拿出这样多的資金。于是，通常是这样来处理的，就是共和国或者联邦为了不使已經投入的極少数資金白白浪費，便从規定用来滿足其他需要的那些資金中抽出一部分，这样就延緩了那些重要的、具有关键性的工程的建設。这种昂头闊步不重視計劃的做法，超出了原来就很有限的物質条件的范围。同时也應該考慮到，不是建成一个工厂就算了事。还必须解决这个工厂是否必須輸入某种原料的問題，要解决這個問題就得动用我們非常少的这一点外匯。我們的某些企業由于依賴进口原料的关系，有时不得不縮小生产，因为这个緣故，它們的能力只發揮到 60%，难道这种情况在我們这里还少嗎？我們很希望建設一些大工厂，因为这些大工厂将能够滿足一个居民点或者一个地区財政上的一切需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來說，对于滿足預算以及解决各種問題，包括进一步的基本建設等等問題的一切需要，这些大工厂将起工作母机的作用。

过去和現在，我們都有建設大工厂的願望。但是，一个城市或地区的負責同志估計到原有的条件，而能尽快并且花錢不多地便获得良好效果的現象却是不多的。他們不想建設小企業来對該地区的农产品进行加工，他們过去和現在对于用正常的稅

收來保證預算收入等工作都不關心。只有估計和用完原有資源的時候，才能向共和國或聯邦要求給予補助資金，以便使地區得到更快的發展。

### (3) 現在各地區已有更平均發展的可能

現在和將來，都應對落后地區的發展示予更多的注意，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這裡也應指出一種過分急躁的現象，這種急躁現象在其他情況下具有地方沙文主義的性質。人們忘記了南斯拉夫在經濟上還沒有強大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致能夠同時發展所有落后的地區，和建立成本很高、而在很多情況下又沒有獲利的客觀條件的企業。換句話說，就是存在着要在沒有贏利條件、沒有原料、沒有交通聯繫、沒有干部的地方，建立巨大而成本昂貴的企業的傾向。總之，就是要建立那些將在長期內成為整個社會的負擔的工廠。

其實，工廠應當建立在有較好的贏利條件的地方。為了本身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一切地區，包括落后地區在內，都應該獲得贏利的好處。我不準備否認在落后地區創造條件來建立工廠的必要性。例如，如果某一個經濟落后地區有原料，而根本沒有鐵路和運輸工具，那末，國家首先便應該保證交通聯繫，也就是修築交通綫，只有這樣作了之後，才可以建立工廠，這種工廠的原料由該地區供應。現在，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齊頭並進。我們應該考慮到我們的物資條件一步一步地做起來。其次，我應當對那些做經濟和計劃工作的同志提出批評，因為他們在新的計劃草案中，在規定哪些投資應該停止，哪些投資應該削減時，把所有共和國都同等看待，並且沒有考慮到這樣一種情況，就是不能把馬其頓同其他較先進的共和國列在一起。如果說在目前情況下，我們沒有力量付給更多的資金來



發展这个共和国,那末,我們就沒有权利减少撥款。問題在于付給資金的目的何在。尽管过去和現在我們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不能否認,某些落后地区靠整个社会的帮助,在自己的發展上已經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当然,那些現在業已失去它的意义的因素,曾經在工業設施的分布中起过重大的作用。目前,各地区的平均發展已經有了更加良好的条件,自然,首先还应当特別注意那些工業上落后的地区,由于1948年以后南斯拉夫处于不正常状态的緣故,对这些地区未能予以注意。

#### (4) 很多落后地区只要有少数的投資 便能使經濟大大地發展

當我們談到未來的投資政策的時候,我們認為,首先必須把這些投資用來滿足國內的需要,也就是首先用來加速國內的發展,然後才用來為國外市場進行生產。如果我們首先指望進口原料來為出口生產產品,那麼,在目前我們的力量還薄弱的時候,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會很緩慢,因為我們的工業品,由於成本高,很難經得住國外市場上的競爭,而且這筆費用的支付將要在人民身上想辦法。我之所以談到這個問題,並不是因為我反對工業品出口。不,我之所以談到這一點只是因為,我認為僅僅通過輸出各種工業品的辦法,來為平衡支付差額尋找出路是錯誤的,因為這類工業品在國外市場上遇到過分強烈的競爭,而且在製造這類工業品的時候,用的是價格很貴的進口原料,我們特別清楚,由於信貸條件的困難,我們必須以高於世界市場價格25%的價格來購買這些原料。我主張首先建立並發展那種為我們自己的原料進行加工的工業部門,因為輸出制成品,比起輸出運輸困難而售價又比較便宜的原料要有利得多。今後我們應當為農產品的出口尋找新的機會,因此,必須對發展那些現在已經

超过我們本身需要的商品的生产，給予更多的注意，并且更多地注意农产品的加工。很多落后地区只要花費少量的投資就同样有較多的發展的可能性，并且能对各种农产品进行加工，因为这种地区有条件来种植这些农产品。

我們現在才来着手解决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成本的問題。这不仅是因为客观上的困难，例如，旧工厂中的生产工具变旧，而且更多地还是因为主观上的原因。要知道我們也有用最新的机器装备起来的新企業，但是，这些新企業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水平。这些現代化企業中产品成本仍然很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認为，原因在于生产組織的不正确、不切合实际，在于缺乏专家干部，在于各企業中大多数工人都是半农民。劳动生产率很低，具体表现在产品成本很高上面，这不仅使消費者受到損失，而且也使企業中的工人受到損失，因为这些企業不是用降低产品成本的办法，而是用人為的抬高成品价格的办法来获得利潤，这样就必然要影响到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用說，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是不在此列的。

#### **(5) 提高生活水平，不是用增加工資的办法，而是用扩大生产和降低成本的办法达到的**

我們說必須降低产品成本，并不是为了借此来建立更多的积累和扩大投資。不，我們这样做，首先是为了用生产足够数量的消费品并使价格适合劳动人民購買力的办法，来提高生活水平。用生产足够数量消费品和降低它們的成本的办法，我們就能够更容易地制止人為的抬高物价的現象和形形色色的投机活动，关于这一点，在下面我还要談到。

我国劳动人民的亲身体驗和实践証明，在消费品缺乏的情况下，任何用提高工資来提高生活水平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

的，因为，这样只能使物价上漲，而物价上漲，在許多情況下都超过工資提高的速度。解决这个問題的關鍵在于生产，特别是在于各企業的工作，因为这些企業拥有生产資料，并且它們的生产已經有了良好的安排。至于生产以外的一切消極現象，是比較容易消除的，如果需要，还可采用行政的办法。

現在我想談一談今后我們的經濟發展問題，也就是談几句关于計劃进一步發展經濟時必須作一些改變的問題。

首先，我想強調地指出，在提出這些改變的時候，我們不應該陷入另一個極端，而應當非常嚴肅地處理這個問題，並且應當深入地研究我們的一切可能性。這點正是我們過去的計劃方法中的弱點，以前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缺乏深入的研究。一切都是辦公室里靠簡單的數學計算，並且認為這是制定遠景計劃的基礎，而不是本着嚴密注視我們經濟生活中日常實踐的精神，以及本着深入分析過去這一段時期的所有缺點和積極因素的精神來制定計劃。對結果考慮得較多，而對原因則考慮得較少，即使注意到了原因，也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就消除經濟中某些弱點和缺點所提出的建議和採取的措施，往往成了產生更多弱點和缺點的原因。我不想在這裡談得很詳細，而只提一提在採取和執行各種措施時的保守性和公式化問題。原因在哪裡呢？原因在於，在制定計劃和採取保證實現這些計劃的措施時，沒有作充分的全面考慮，除了對良好的結果加以考慮之外，是否對可能產生的不良結果也加以考慮，這樣考慮的道理是什麼呢？我不願意在這裡只是責備制定計劃的工作人員。不，我們都有過錯，那就是消除和糾正各種缺點太慢，通過各種計劃太倉促，而且在這些計劃實施之前，缺乏足夠的研究。

在談到對待計劃的膚淺態度時，應當說，這些缺點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在制定 1956 年的社會計劃以及制定遠景計劃的新

材料中見到。例如，1956 年的材料中就談到，產品成本提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企業中工人太多（這是真實情況）。在另一處又說到，儘管工業化的計劃已經縮小，但還要招收 25,000 名新工人參加工作。至於現在各企業中有多少剩餘勞動力，有剩餘勞動力就會提高產品的成本，這為什麼就只字不提呢？為什麼不提剩餘勞動力應當轉到那些需要新工人的企業，或者把它利用到農業中去呢？是否明白，把勞動力從那些勞動力過多的企業中抽調出來，將會產生怎樣的財政效果呢？這一點誰也不知道，因為誰也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

### （6）必須降低建築成本

人們對於改建和擴建問題，也只是順便談談而已。例如，人們對於個別共和國和整個南斯拉夫有多少這樣的企業，以及對於革新這些企業需要多少資金是否了解呢？我懷疑究竟誰了解這一點。但是，了解這一點本來並不难，因為這些企業經常親自向我們和銀行要求貸款，可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沒有結果，由於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大規模的新投資上面，所以誰也沒有看到，用小量的資金能夠很快獲得良好的效果。我們必須立即着手收集關於所有那些舊企業的材料，以及收集關於那些投入少許資本便能有效地迅速擴大的企業的材料。

當然，為了不再發生濫用和不節省投資的現象，也即為了不再在擴大企業的借口下興建龐大的建築物和新企業，專家們就應該對擴大和更新企業的建議的正確性進行監督和檢查。通常，在我們這裡興建龐大的和高貴的建築物，甚至是興建在那些完全對它們不需要的地方。建設簡陋的廠房來保證正常生產的人是很难找到的。一般都建設得富麗堂皇。必須看一看在其他最發達的國家是如何進行建設的，例如在美英等國。在那里，常常



可以看到，生产是在非常簡陋的厂房里，甚至是在木棚里进行的，并且这是真正有利可圖的事情。我認为，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像我們南斯拉夫，也应当关心如何建設得便宜和有利可圖，特别是在了解到我們的物質資料正在感到严重缺乏的时候。不是牆壁和雄偉的建築風格能够保證提高生活水平，而是通过生产資料所取得的東西。我認为，最正确的是，联邦院和各共和国院能够組織特別委员会，对所有正在建立的工厂和組織进行視察，并且精確地确定建設輔助性和生产性建築物的开支。因而，我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建設中执行加紧節約的措施，以便停止我們工業和运输業等方面不按規定的投資撥款，到那个时候才可以談得上新的投資、新的企業。

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問題，就是为什么某些大的、具有关键性的建築物完成的这样慢，并且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所要求的資金比計劃中規定的要多得多呢？对这个問題的回答，在建設工厂的地方到处都可以找到。在那里，可以看到各种造价很貴而又高大的輔助性建築物、宏偉富麗的工厂管理处的办公大樓，例如，在洛茲尼查、澤尼查、布戈伊諾等地。可以看到耗費數十亿狄那尔的新旅館、俱樂部等等建築物，而像工厂这样基本的建築物就被拖延下来，所有这一切都成了領取補助資金的理由。

联邦和共和国当局撥出了資金，但是，並沒有对这些資金的支出进行監督和檢查。地方当局指定的建筑单位便可以無限制地和不受監督地支配这些資金。难道还不應該知道，規定用来建設我們所必需的各种工程的龐大資金，究竟是用在什么地方嗎？我認为，应当制止这种做法了。联邦执行委员会应当对具有联邦意义的各項工程計劃进行审查，并对这些工程的建設資金的支出建立監督。各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必須对資金的支出加以監督，对具有共和国意义的工程建設計劃加以审查，进行這項

工作不是借助于由那些关心这件事情的专家所組成的委员会，而是借助于由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人所組成的委员会。应该特别注意，要建設得比較簡朴和比較便宜。在制定企業的計劃草案时，必須將这一点考虑进去。我深信，这一定能够節約下来数十亿狄那尔，这笔資金可以更好地用来造福社会，从而也就減輕了工業化的負担。

到現在为止，誰也沒有关心到某項工程的造价是多少，而只关心如何能把這項工程建設得更大一些。人們总想使全部工程完工，甚至窗台上放上鮮花之后才开始生产，而不去設法如何更快地把這項工程建立起来，并使它开始生产，虽然不能完全开工，但以后还可以再添建，再对工厂管理处的房舍和其他建筑物进行裝飾。現在，当我們还感到物資缺乏的时候，不需要那种紀念碑式的工厂。我們需要那些馬上就能生产出便宜产品的工厂。我們有些工程师和建筑师完全不关心他們所設計的建筑物的造价，而热衷于用某項特别的和高貴的藍圖来使自己流芳百世。

### (7) 我們能够而且必須根除投資政策中的片面性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議上，曾經討論过关于必須改变我們現行的工業計劃方針的問題。討論這個問題，是因为过去的工業化計劃太緊張，不符合我們的物質条件，构成沉重的負担，并且威胁到劳动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同时，又因为我們在重工業建設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多的成績，而且現在我們能够沒有多大困难地逐步来發展全部工業。我們不仅能够消灭，而且也必須消灭我們在投資方面的片面性，并对生产日用品的輕工業給予更多的注意。今后我們必須減少投資資金，特别是外匯，不然就会增加南斯拉夫原来就存在的支付逆差。这一切都是目前当我們在困难的时期必須去做的，我們之

所以遭到这些困难,并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由于客观环境造成的。在这期间,我们应当确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关心保持它们之间的比例。

现在,当我们采取措施来消灭工业发展中的不平衡,也就是消灭在建立工业企业中的失调现象的时候,由于必须建立轻工业企业,所以我们将能比较容易地来逐渐消灭南斯拉夫落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这些地区有发展轻工业的条件,这种工业比较因缺乏物资需要长时期才可以建成的巨大建筑物,能更快地产生财政上的效果。我并不是用这一点理由来说明,就是将来也不应在那些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大企业,例如,在马其顿等地建立冶金联合工厂。

我非常奇怪,现在当草拟新计划,考虑到必须减少投资的时候,人们却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机械地并且缺乏深刻分析地就提議停止建設某些快要完工而又必要的工程。我之所以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是由于,在这里仍然缺乏严肃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对能够保证执行进一步工业化方针的、某些平均的实际可能性没有确定,这种进一步工业化的方针,考虑到我们的物质条件和提高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必要性。人们对这个问题所抱的态度是,好像是要么一步登天或者什么也不要。

我认为,目前在这里不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要完成那些我国经济上所缺乏,而且需要外汇和其他资金又不太多的企业和工程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第一,1955年我们将不开始建設新的巨大的建筑物;第二,刚刚开始并对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决定意义的工程,将延期或者暂时停止建設;第三,建設需要大量资金的企業也要延期进行;第四,那些快要完工的工程,我们要尽快地把它們装备起来,以便不等全部工程完成就投入生产,并且讓企業自己去进一步扩建和完成。应当特別注意

充分利用現有的能力，正如我在上面所說的，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包括軍事企業在內的各企業之間保持合作的一切可能性。這些問題應當加以詳細的分析，然後提出建議，也就是說在分析的基礎上制定遠景計劃。但是，我認為，在將來的建設中，那些能夠全部或大部分用自己原料來進行生產的企業，應該有優先權，因為大家知道，不僅基本建設和輸入裝備需要外匯，就是輸入原料也需要外匯，因此外匯便是支付差額中的重擔。

我們現在所採取的這一切措施的目標就在於：減輕人民的負擔、平衡我們的收支差額、保證經濟更平均地發展，從而消滅重工業和日用品生產之間失調的現象。但是，問題不僅是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失調；而工業和電力工業間也同樣失調，這就使電力工業受到損失。大家都很清楚，1954年和1955年，很多工廠由於電力缺乏而停工或者不能全部開工，結果，使社會遭受了好幾十億的損失。這一切問題都應該很好地加以研究，然後才可以根據可能來通過關於實行新的經濟措施的切實可行的決議。

我強調指出，上面我談到的那些措施不是長期性質的，因為這些措施並沒有改變我們進一步建設重工業和電力工業的路線，因為沒有重工業和電力工業，我們就不能在物質上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只是取得暫時的和有限的喘息機會，在這期間，我們將聚集新的力量來更有力地、和更加有計劃地前進。

### (B) 農業和合作化的作用

差不多在戰後所有年代內，我們對農業的關心超過一切，由於農業的落后，所以它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要比工業少得多，同時，由於常常發生自然災害和生產率很低，農業便成了我們一個經常性的問題。根據聯邦統計局的材料，1954年工業占國民收入42.7%，而農業只占國民收入26.6%。我們的農業水



平之所以这样低，是有着很多原因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由于我們大力地搞工業化，所以就沒有对發展农業予以足够的注意。第二个原因便是，农業缺乏机器，战前拥有的一些机器或者已被破坏，或者已根本損毀。由于我們缺乏外匯，所以不能大量地从国外輸入农業机器和人造肥料。过去，农業不得不等待建立自己的工業，而現在，优先發展农業的时候已經到来了。

当然，在这里我並沒有提出大量投資的問題。在这方面必須用極少的資金，并在最短期間內取得良好的效果。談到关于大量的投資，我指的是，我們不應該着手进行大規模的土壤改良工作或水利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只有在几年之后才能产生效果。我們要在能够尽快产生效果的地方进行投資。在这里，我們應該逐步地前进，但是，要比过去快得多。

如果今后我們还要撥出更多的資金用于农業，那末，我們就應該知道，我們为什么拿出这笔錢，社会将从这里得到什么。例如，过去虽然撥的資金不多，但我們还是給农業撥出了資金，可是並沒有产生預期的結果。在这方面，資金是花得不合理的，我們的国营农場便是最好的例証，它們虽然拥有农業机器等等，但仍有很多国营农場是不贏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應該指出的是，組織的不好、土地耕作不科学、由于劳动沒有成效而成本高和工作人員过多等等。同样不可以說，国家沒有帮助合作社和个体农民。事实上，国家已經尽力以貸款和取消債務等等形式帮助了他們。但是，在这里也沒有产生我們所預期的結果。在这里同样有人把用于工業化，即用于基本建設的資金这样处理的：拿出資金之后，对如何使用这些資金便不去过問。

我認為，对农業除了給予物資外，还必須給予技术上和組織上的帮助。假使我們拿出錢，提供农業技术和其他一切，而农業生产者仍旧本着祖傳的保守而又不科学的概念，用古老的方法

进行工作，那末，我們将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在农業中同样應該利用科学成就。像工業一样，农業生产也經常要求寻求新的可能性，利用科学的生产方法并使它不断地臻于完善。难道我們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比北欧和欧洲其他国家还差嗎？我認为，不是差，而是好。但是，上述很多国家的单位面积产量却超过我們1—3倍。这个問題的原因我已經談过。人們經常說，农業必須深耕細作；而他們却不知道，深耕細作是怎么一回事。我深信，在給予农業以科学和技术援助这一問題上，我們應該亲自給予更多的关怀。

1956年的新計劃規定，农業投資比1954年增加65%。但是，我認为，第一，这大大地超过了我們目前的可能性；第二，計劃中对于为什么撥款，撥款給誰，社会将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却只字未提。必須确切地研究，这些資金用在那里和用在什么上面最合理，以便使这些資金能够产生最大的效果，因此就應該給予很好的监督和全面的帮助。

我們曾經希望用建立农業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来局部地摆脱严重的粮食状况，但是，我們的希望沒有实现。我們对各种非常重大的因素沒有給予足够的考虑，这些因素过去和現在都一直在农村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預备在这里列举在建立农業生产合作社时所暴露出来的一切缺点，我只想強調指出，当时对于广泛开始發展农村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既沒有主观条件，也沒有客观条件。对于这样大規模地建立生产合作社，我們在技术、物質和精神上都毫無准备。我們在需要和不需要的地方都建立合作社，也就是說凡是在沒有合作社，并且可以想像得到，不是馬上就会有实现建社的条件的地方也建立了合作社。因此，我們曾經不得不解散大多数生产合作社，只是在志願的基础上把那些能够进一步發展，和在短时期就能获得良好效果的

合作社保留下来。是不是解散的只是那些沒有进一步發展前途的合作社呢？不，絕不是这样。解散那些有發展条件的也是常有的事。在这一点上，不仅是土地私有制的傳統的精神上的因素在起着重大作用，而且投机的和敌視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在起着重大的作用。大部分过錯同样是由于合作社組織工作薄弱等等的緣故。

### (9) 合作社應該帮助单干戶并且 把它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我們是不是因此就放弃了在农村中發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呢？当然不是，因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它有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願望，就不可能有两种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現在，問題的實質是，必須有步驟地，利用各种办法来帮助巩固农村中現有的合作社，使合作社成为能够吸引一切单干农民的因素，因为这些单干农民还在盘算，他們还是不加入合作社好。

假使我們的合作社成为一些排他性的組織，和仅仅变成整个农業中增产的手段，它們能不能在农村中巩固下来呢？我認为，在給予单干农民以全面帮助的时候，合作社必須尽可能多地把单干农民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且取得他們的信任。单干农民之所以反对生产合作社，并不是因为这些合作社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質，而是因为物質上的利害关系，他們認为不加入合作社要好些，但是，只要农民一旦体会到，加入合作社生活得更好一些，他們便会自动地加入合作社。

現在，我們除了生产合作社和一般合作社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合作社。目前，我們把向单干农民采購农产品的职能交給合作社，我們这样做，是为了堵塞那些哄抬农产品价格来損害消

費者的、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的道路。假使我們給予合作社以这种信任,我們便有权希望,它們将能够光荣地完成自己的这项职能,并且不会允許合作社再去掩护各种投机行为来危害整个社会,特别是掩护形形色色的私人投机分子。我們希望合作社在执行它的这项职能时,能够尽快地去發展自己的生产,并且我們相信,这将不会讓我們失望的。这里我指的是它們自己的生产,因为,如果它們不去注意自己的生产而变成一些商業企業等等,那就錯誤了。这种办法可能造成相反的而不是我們所預期的結果,不可能增加生产,而可能进一步减产。一切生产合作社,不管它們目前的性質怎样,首先都應該扩大农業生产,而采購的职能應該促进它們的这项任务。直到現在,我們在給予农業以各种优待和其他帮助的时候,都抱着刺激和改进农業生产的願望。但是,并没有产生預期的結果。有过这样的情况,由于給予过多的优待,便产生了相反的作用。結果是,农民把这些資金理解为一种提高他們生活的社会补助金。合作社和单干农民都有过这种情况。自然,我們要竭力提高农村中的生活水平,可是,我們要竭力扩大农業生产,因为这对整个社会,其中包括农業生产者,也就是农民,都有好处。在我們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乡村和工厂有一个同一的准則在起着作用,也就是說社会要求扩大生产和降低成本,以便使价格符合消費者的購買力,而这是同工农業所生产的一切消費品有关系的。如果一种經濟,它讓生产者利用消費品缺乏的机会来抬高物价以謀取厚利的意圖占統治地位,便不可能是一种健康的經濟。誰喜欢商品缺乏和謀取暴利,他便是投机分子,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在农村还是在工厂。同时,就整个來說,这并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大家的生活水平,只有少数人除外。



## (10) 必須成立一个專門的農業銀行

既然我們把農民看作是生產者，那末，僅僅給他們以資金和其他資料，然後就希望從他們那里得到什麼，這是不夠的，而必須像在工廠和其他企業一樣，採取各種幫助的措施，如給予技術上、組織上、科學上等等的援助，並用實踐向農民說明，為了本身和整個社會的利益，用什麼方法他們能夠比較容易和更快地擴大生產。各種合作社在這方面是能夠起重要作用的，它們能夠，而且應該成為農業高漲的范例。我認為，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的同志們，已經在短時期內在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很高興地讀完了布科維奇同志的作品，這是為了讓我能夠知道他們用什麼方法在農業中取得了這些成就而請他寄給我的。我相信，假使能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並使它實現，這將是很簡單的事。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個人的信議和一些最負責的領導人員，包括巴卡里奇等同志的建議，在農業中實施這些新方法是可能的。在我看來，有意義的是結果，而不是某些空洞的理論。我認為，所有其他有條件種植某種農作物的共和國，能開始更大膽地採用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所取得的經驗，這將是很好的。

我在看遠景計劃和1956年的計劃的材料時，看到它們對農業所規劃的前途非常暗淡，因為，雖然規定給農業以巨大的撥款，而計劃中却規定，每年最大限度只能增產到10%。在這個計劃中，把依據農業的原始經營方法所得出的平均數字作為基礎。這裡只談到雨水，陽光和一切可能發生的自然災害，而對如何防止自然力的影響則只字不提。他們只是依據多年來的原始經驗來證明他們的說法，而不談關於在農業中採用新的、先進的社會主義經驗，關於先進的農業技術和新的耕作方法。

我非常重視對農業的有效撥款的方法，因為我認為，以前通

过人民銀行撥款的方法，并不是很好的和有效的方法，因此，就必須建立帶有分行的專門農業銀行，这个銀行將能更正确地估計給予貸款來提高農業生產的必要性，而且能够使農民乐于把自己的積蓄存到那里去。

如果我們能够很好地掌握这件事情，并且在貸款的同时兼用其他的一切办法，我相信，在五年內，我們至少能够把某些農業部門的生產扩大一倍。

### (11) 对外貿易

我国的对外貿易經過了各种發展阶段，开始时是絕對集中的，当时，它处在相应的国家机关的監督之下，一直到完全分散經營为止，这也就是現在的情况，而現在它已經沒有必要的監督了。开始时，国家通过貿易供应部下面設立的对外貿易管理局进行監督，而 1946 年便成立了对外貿易部，这个貿易部一直存在到 1951 年。但是，在 1947 年，出口机构的数目增多了，一定的分散經營已經开始了，并且还扩大了貿易机构网，把权利交給各共和国并提高它們参加对外貿易的作用。

显然，对外貿易的集中管理有着某些弱点，并且阻碍了对外貿易的更活躍的和多方面的發展。所有外匯一般都由部來掌握，而留給企業的仅仅是一小部分；这样就不能刺激出口的增加。在分散經營和 1951 年解散对外貿易部的同时，出口机构的数目便迅速地增加了，大部分外匯收入都掌握在这些机构的手里，这就使它們能够自由地用来刺激出口貿易，此外还建立了外匯兌換站，这些兌換站可以自由規定兌換牌价。

1947 年，我們約有 50 家各種的貿易公司和工業出口机构及代办处，而在 1955 年，我們已經有 536 家已注冊的貿易机构和其他出口机构。对这样多的出口机构沒有很好的監督或者根本

沒有監督，使對外貿易產生了很多各色各樣的弱點和現象，这样就給國家帶來了很大的損害。現在，我們的出口企業之間，在國外市場上開始了非常盲目的和沒有信義的競爭。在這種沒有信義的競爭的情況下，我們的成品在國外市場上的售價比成本低，而在國內市場上，這些成品的價格卻很高，因此，我國的消費者就要補償在國外市場上所遭受的損失。此外，雖然可以在這裡或其他地方買到很便宜的商品，但由於賄賂和各種詭計的結果，過去和現在都一直按高價輸入這些商品，这就給社會帶來了損害。由於缺乏有才干的專家，所以舊貿易機構中的各種抱有敵對情緒的利己分子，或者那些利用詭計、賄賂或買貴賣賤來同外國人分肥而為個人取得令人不能容忍的高額利潤的人，都鑽進了我們的對外貿易機關。這些詭計都是在所謂送禮的招牌下進行的。有時他們被揭發出來，這時便把他們交由法院解決。但是，有多少這樣的情況還沒有被揭露出來，而我們的社會因此又受到什麼樣的損失呢？！

這並不是普遍的現象，因為對外貿易中大多數工作人員都是為國家的利益誠懇地在勞動着，儘管如此，而少數不忠實的人還是給我國經濟帶來了非常重大的損失，今後必須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來制止這種現象。

在國外進行很多不必要的和糜費的旅行，派遣和供養國外的很多貿易代表，其中包括不能帶來任何好處，而只是花費外匯的代表，同樣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失。這些所謂“代表”，現在在各國的各經濟企業的 117 名代表，以及正式在外國公司中工作的我國企業的職員，應該在國外促進我國貿易的發展。但是，情況却常常是這樣，由於他們的工作沒有任何監督，因而他們的行為便使國家遭到損害。這一點特別關係到拿外國公司薪金的南斯拉夫的職員，以及在國外建立的聯合公司，這些情況使得我

們某些企業有可能逃避关于外匯决定，而把外匯記入某些人在外国銀行所开的戶頭上面。必須在这里建立严格的监督和采取一切措施，一直到采取行政上的严厉措施，来消除經營中的这种不良現象。

我国对外貿易中的第二种非常不良的現象，便是了草率的态度。由于包皮不好和包装时的粗枝大叶，貨物便要遭到損坏和退回或者廉价出售，使我們的外匯和狄那尔遭受了巨大的損失。我国的对外貿易，由于它曾企圖提供劣質的貨物，或者由于其他不老实的行为，便大大地損害了自己的威信，并且遭到了重大的物質損失。对出口也沒有必要的监督，現在，應該采取紧急的措施，以便使社会不受物質上的損失，并挽回对外貿易中的声誉。

最近，在我和同志們談到关于我国出口的可能性的时候，偶然地知道了另一种恶劣的現象，就是在某些情況下，对外貿易局阻碍着个别企業的成品出口，而出口这些成品可以使我們获得外匯。在这种情况下，抵触的意見是，輸出什么商品和什么商品不能輸出。我認为，这种恶劣的現象必須立即予以消除，并且把对外貿易局放在健康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使它能够保持社会主义关系和一般貿易的利益。

最后，我还想指出对外貿易中我所不喜欢的另一种現象。由于人們只顧眼前的利益，所以对外貿易經常采取同我們外交政策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行动，而且这些目的最終还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利益的。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使对外貿易能够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

### (12) 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反对商業 投机和抬高物价的行为

分散經營活躍起来了，对外貿易也扩大了。但是，由于分散



經營而产生了各种恶劣的現象，这些恶劣現象經常都帶有刑事的性質，这些現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沒有規定防止它們的行政上和法律上的各种措施。

你們和我一样，对于我国国内的貿易网、它的弱点和貿易网中的恶劣現象都很了解，因此，我仅仅指出那些使我們不愉快和引起消費者憤慨的一些現象。第一，国内貿易，不論按它的組織結構或者技术装备來說，都不能順利地完成自己的职能；第二，在国内貿易中，社会主义成分要比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貿易特征的那些成分小得多；第三，自由的供求制度，以及在市場經常缺乏消費品的情况下自由規定价格的現象，是造成形形色色的投机和哄抬物价的最良好的基础。从事投机和哄抬物价的不仅是个别的投机分子，而且主要地还是那些在社会主义部分工作的人。直到現在，我們还不能在社会主义貿易部分用行政的和其他的各种办法，来阻止这些帶有特別刑事性質的現象，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認为，沒有一件事情能够像各种恶劣現象、在市場上投机和在很多情況下毫無理由的哄抬物价一样，給我們带来了如此严重的政治上的損失。

我不在这里談得过于詳細，因为这个问题每天都有人在写着和談論着。現在，我只想強調指出除了加强政治工作外，采取很多行政措施来阻止貿易中非社会主义現象产生的必要性。如果有时在市場上或者国内暫時根本沒有某些消費品，我們就能够很容易地解釋，为什么沒有这些消費品和它們为什么这样貴。但是，如果国内这样的消費品有足够的数量，例如今年的馬鈴薯、水果和各种蔬菜就是一个例子，而它們的价格却仍然上漲，那末，我們便無法向人民解釋，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須采取各种措施来制止投机行为。

貿易中的很多缺点，不仅是由于貿易工作者投机的結果，有

时买主也有过錯，他們的神經過敏和不信任造成了市場上的混亂。他們不問价格高低买进大大超过他們需要的商品，从而使市場上現有商品的正确分配遭到破坏。

我們全体公民應該知道，在現有消費品总額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借提高工資和其他貨幣支付的办法，来提高生活水平。要想达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增加消費品的总額、降低产品成本、加强紀律、实行節約和合理供应，另一方面要实行严格的措施，以便不仅使我国貿易，而且也使整个經濟健全起来。

### (13) 动员社会主义联盟盟員去消灭經濟中的缺点

同志們！我們在今天的全体會議上討論經濟問題，是为了使我們的群众性組織的全体成員積極地参加消除經濟中各种弱点的斗争，这些弱点是不能用什么行政措施来加以消除的，今天的討論，同时也是为了使我們在經濟中所采取的新措施，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盟員的帮助下，更容易貫徹。在爭取正确貫徹国民議會即将通过的各种經濟措施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盟員应当走在前面，他們应当同对我国社会非常有害的各种地方傾向和沙文主义格格不入。共产主义者联盟和作为几百万盟員的劳动人民組織的社会主义联盟，以前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远远沒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人們簡直都忙于日常事务，并且由于自己对于經濟發展缺乏远見，他們竟忘記了整个社会。

在談到各种錯誤和恶劣現象的时候，我們不應該忘記，社会主义联盟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盟員本身，也常常表現出地方傾向和其他恶劣現象。我們應該把这些不良現象从社会主义联盟的队伍中，特别是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队伍中根除掉，只有在此以后，才能对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信心，就是我們能够把

經濟發展放在堅固和健康的基礎上，並且能夠保證使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上所作的努力獲得必要的成就。

同志們！我在自己的報告中，批評了在我們努力的过程中所產生的、並且需要儘快糾正的一切惡劣現象。我絲毫沒有談到勞動人民的創造性工作的巨大成就。但是，社會主義社會勞動人民偉大努力的成果本身，就是一個確鑿的事實。我之所以要批評，是因為當我看到，如果沒有這些缺點和惡劣現象，我們就有可能用較少的勞動做更多事情的時候，而感到非常惋惜。這種批評之所以需要是為了警告，現在已經是我們不應當再容忍這些現象的時候了，因為再容忍下去就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而責任將會落在我們的身上。

## 关于我国合作社政策的任务

——1956年4月23日在南斯拉夫合作社  
联合会总会第二次全会的讲话  
(原载1956年5月24日“战斗报”)

卡 德 尔

同志們！

我們对本次全会首先期待两件事：明确地提出我国合作社今后發展的任务，保証我們在农村中社会主义行动的統一。最近几年，即在农民生产合作社改組以后，我們对农村政策問題，特别是普通农業生产者合作社問題討論的很多，而且，各处都表现出不同的观点，采取了不同的作法。我不認為这是有害的。相反地，在討論中对各种問題多方面地提出各种观点，并在实践中去檢驗这些观点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現在，我們在合作社方面已有了非常丰富的实践，我覺得，我們已能从实践中做出确定的具体的結論，并依据这些結論提出統一的基本任务。当然，我并沒想說，在本次全会上我們要解决一切問題，或是为农村的全部进程制定出某种确定的、最終决定。我們必須制定今后奋斗的統一的方針，具体問題則留待实践中去解决，实践会給予我們新的經驗，并修正不妥当的地方。

我不想談报告和討論中都討論过的具体的組織、技术問題和其他問題。我認為这类問題應該在新的法律和法令中詳細闡明，在新的法律的制定过程中要考虑到一切有关方面的意見，而其他法令的实施也要进一步地討論和協商。这里，我想扼要地



談談普通農業生產者合作社的幾個基本問題。

(一)

我覺得，在討論中談到的，以及我們的普通農業生產者合作社今天正與之進行鬥爭的那些困難，只有一部份是由于客觀情況產生的，其最重要的根源還是對我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遠景認識模糊和不够一致。

在我們努力地急速發展合作社並加強其作用的过程中，常常有這樣的印象：我們的幹部、特別是一部份專家（他們還未能擺脫某些固定的公式），還一直有些缺乏信心，首先，他們對於作為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最主要的組織形式之一的普通合作社的作用缺乏信心，其次，不相信合作社能擔負所提出的任務，好象必須事先使它們具備這種能力。但是，我認為，不應該等待合作社“能夠”接受各種任務的時刻的到來，而應立刻吸收它們來完成任務，而且，也只有這樣來建設合作社。人只有下水才能學會游泳。事實上，通過實踐合作社獲得這種能力。不言而喻，與此同時合作社必需得到負責的國家機關、社會機關和社會團體的一切支持和幫助。

我覺得，在本次全會的討論中產生了一種一致的觀念，認為必須從如下事實出發：在我國條件下，農業生產的發展絕不能脫離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我正是想談談這個問題。

我認為，農業的發展及其社會主義改造是統一的問題，也只能統一地解決。我同意這種說法，就是，脫離開發展農業生產的鬥爭就不可能談到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沒有改變農業社會關係的明確方針而談論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是有害的。

自然，談到農業生產的發展，我所指的不僅是各種農業技術

措施(虽然,它們也要求一定的社会組織形式),而且也是农业資金积累的过程,农业投資,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以及农业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因素。

在各种討論会中,甚至报刊中,特别是专门刊物里,常常可以听到一种意見,这种意見大致归納起来就是:当前,主要的是發展农业生产,社会主义的任务可以晚点解决。根据这种看法,应该首先使个体的小农經濟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而不管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問題。

这种傾向有时是由一种绝对正确的观念在实践中产生的,这种观念认为任何使劳动生产率降低的社会形式都是不正确的,而正确的只有那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形式。但是,从發展生产需要的观点来看,这些同志从这一正确观念中作出上述錯誤結論就不对了。他們所推荐的道路,意味着使农村任其自發的、社会分化和經濟分化的摆布,以此为资本主义的自發势力敞开大門,这就是說使一部份个体农业生产者靠牺牲弱者而加强。自然,这也会导至大型农业經濟的建立并使它成为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因素,換句話說,成为对农业的机械化和現代化投資的承担者。

誰都清楚,無論从政治观点还是从經濟观点来看,我們社会主义社会都不能允許在农村进行这种冒險。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拒不保护小农免受这种资本主义的剝削,第二,这一道路将造成农村階級矛盾的尖銳化,严重地威胁政治上的稳定性并由此而延緩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的發展。因此,很明显,在我們剛剛犯下这种錯誤,当在实践中不照顧后果而采取了这种方針时,就不得不采取紧急行政措施来中断这种發展,因为实践中的不良的反社会主义的現象将迫使我們这样做。不必特別強調,这将給我国整个的經濟带来極大的害处,特别是使农业生产倒退。

而且，这不仅是未来的事。就是現在，从增产的观点来看我們从这种方針也是什么都得不到，更不必說其政治后果了。所增加的資金大部分将用于提高少数富裕农民的生活水平，而用于投資和發展生产的只能是一部分。不容置疑，通过合作社和合作社的資金积累我們能够使农业中积累起来的絕大部分資金用于發展农业，而且是合作化了的农业。

換句話說，發展个体經濟的方針不是导致生产的發展而是导致死胡同。由于我們为建設社会主义关系而斗争，就不能允許农村资本主义自發势力的發展，因此，在我国，通过个体农户發展农业生产，是很局限的。所以，采取这种农业政策是沒意义的，因为我們事先就已知道，这种政策不久就会与我国整个的社会主义發展發生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冲突。

## (二)

另方面，有些同志不相信通过發展普通农业生产者合作社的政策，通过社会主义因素和經濟因素对农村的影响，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主义的結果，而幻想总有一天自發势力本身就能为生产合作社和农业中其他的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的迅速發展創造条件。的确，由于我們过去以运动式的、非經濟的方法建立生产合作社，得到了非常坏的經驗和非常不良的經濟后果和政治后果，今天在建立生产合作社中，我們不太傾向于以某种形式回到老方法和旧的組織形式。誰都知道，这将意味着使我国农业生产 and 整个經濟倒退，我們且不說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同时，如果我們简单地安于这种情况，而放弃农村中进行有覺悟的社会主义活动的其他形式，首先是借助于經濟手段的形式，我們就会获得和这些同志的期望正相反的結果：我們將使农村反社会主义的自發势力加强，而且在农业生产中实现社会主义形式的斗

爭在今后將更困難。期待有一天，通過簡單的運動，來實現農業中完備的某些社會主義的公式，我們就能完成農村的革命，這是非常有害的幻想。這裡沒有完備的計劃和公式。在這方面的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極大障礙，而且在當前國際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已產生了許多害處。

最後，目的是明確的。問題只是如何達到這一目的。這方面的發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這一過程首先取決於生產力的現狀及其發展，也取決於許多其他的主客觀因素。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是簡單地“採用”生產合作社，而是全面地、有組織地推動現在農村的經濟關係中那些能保證社會主義力量的逐漸發展，同時為這一發展建立物質基礎的主客觀因素。

我們過去的生產合作社運動中，主要的思想弱點和經濟弱點在哪裡呢？這一弱點首先在於機械地、無批判地接受如下觀點：認為無論生產資料的發展和性質如何，簡單地把土地聯合起來並進行聯合勞動就能產生巨大的經濟結果並建立起社會主義關係。如果說這是準確的，那麼在中世紀農村里就可能有社會主義了。這顯然是一種公式主義的原理，它與馬克思主義毫無聯繫。我們確實有過很多生產合作社，但是，在這些合作社里勞動生產率降低了，社員不滿，社會得到的是經濟和政治上的害處。這樣是實現不了社會主義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社會主義只能以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和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來和資本主義對抗。因此，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正确方法和速度只能是同時發展農業生產並提高勞動生產率。在我國條件下，即農業的分散、落后，而且私有關係特別牢固的條件下，成功的基本前提是：清楚地意識到戰勝土地私有制不是機械地聯合土地的事情，而是與基本的生產資料和其他生產資料的發展及其社會化的速度密切聯繫着的。



当然，这并不等于生产合作社在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不占重要地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及它们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就要讨论了。我们本身的经验对这一问题已作了非常明确的回答。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现存的生产合作社，试问它们为什么没象其他许多合作社一样地在改组时被解散，我们就会看到，这里发生作用的首先是三种因素：或者是合作社拥有从国有土地中拨给的大量土地；或者在投资中投入了较大量的社会资金和国家资金，它们改变了生产的性质；或者是合作社拥有大量的现代化生产工具。我并不是断言没有其他因素（良好的地方物质条件或主观条件），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合作社里发生作用的确实是上述三种因素中的一个或全部。这就是说：在三种情况下，都有大量的社会基金，这些基金增加了社员劳动收入和从合作社总收入中所分得的收入，而所投入的土地的报酬则起着次要作用。简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与一定的社会基金联系着，这些基金使他留在合作社里比作为个体农民的收益多。这一进程也有其不好的方面（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在本次讨论的范围内没必要谈），但是，它还是证明了如下的原则：导向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不是以机械的和运动式的鼓动方法，合并土地和采用简陋的联合劳动的形式，而是在农业中建立相当的社会基金并以此使基本生产资料社会化。我国一切普通合作社的组织，都必须符合于这一目的。通过这种组织，社会应该真正地成为农业中扩大再生产过程的主要承担者，保证建立农业中的社会基金以进行投资并加强农业的社会生产资料。在这一过程中，将建立并发展各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形式，也有生产合作社和联合土地及劳动的其他各种组织形式，但是，是在已发生了有利改变的条件之下。

最近几年，我們在生产合作社的發展上向前跨进了一步，这正是由于：第一，我們在吸收入社方面取消了任何强迫或半强迫的作法及任何政治压力，第二，我們使生产合作社摆脱了各种人为的刺激和政治公式而把它們导入正常的經濟生活并放在健全的經濟核算的基础上。而在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我們把土地私有权和土地报酬与就業、劳动和劳动报酬問題分开了。这样，我們生产合作社就不再把阻碍了农業机械化正常进程的多余劳动力包下来了，而且使生产合作社开始作为社会主义的农業企业正常地發展着。所以，由此取得的进步不是說明要回复某种人为的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运动，相反的，是說明如果我們想使生产合作社繼續健康地發展，必須坚持我們当前的政策。毫無疑問，与我們在普通合作社方面获取成就的同时，生产合作社将首先成长并巩固其成果。

### (三)

因此，我認为，我們在这次全会上討論的道路就是通过把扩大再生产的重心轉給合作社和农村中其他的社会主义經濟組織，使农業生产資料逐漸社会化的道路，归根到底，这是在我国条件下通向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短的途徑。在这种条件下，我們通过合作社和其他社会主义組織从农業中取得的每个狄那尔都是“社会的狄那尔”，我們重新把它們投入农業也就意味着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部門、社会主义的經濟力量、社会主义的关系，同时也是發展农業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与这一切相联系的，我想特別談談土地私有制問題。我認为，在討論我国农業的社会主义改造时經常从联合分散的农户这一問題出發（或者通过改变所有制关系，或者通过許多組織形式、生产合作社的形式，也就是把土地机械地联合起来的形式使

土地合并),是完全錯誤的。而且,我們都同意,在我国的社會条件下,国有化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不在考虑之內;我們也一致認為,以运动的方法建立生产合作社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對我們都有害。因此,如果我們停留在这种出發点上和这两种解决办法上,那么,我們就使自己不能前进,而且就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但是,毫無疑問,社会主义国家有足够的經濟力量,政治力量 and 手段以通过正确的經濟政策阻止土地私有权成为农村社会主义發展的某种絕对的障碍。換句話說,尽管存在着土地私有权,我們也能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关系的發展上做出显著的成績来。譬如,我們普通合作社有一切条件来掌管社会生产資料,組織农業生产,并通过这一工作把个体农民和合作社,即和社会生产資料联系起来,而不直接触犯土地所有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們不应坐待時間的賜予,而应积极地指导这一进程,当然,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是經濟手段,同时,依靠更好地了解农村經濟發展的客觀法則。

为了能做到这点,必須極其重視通过基本生产資料的逐渐社会化,通过普通合作社和公共企業內社会生产資料更高度的集中和正确分配把个体农民联合起来。依靠这些社会生产資料,合作社吸引劳动农民作为工人,用这些社会資料进行劳动,同时又作为使农民与合作社建立一定的关系,而能够日益成为个体农户农業生产的組織者,而农民与合作社关系将使个体农户的土地与合作社的生产資料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生产資料将最終地决定耕地的方法。显然,这种关系必然逐渐地使个体农户的成分發生根本变化。它与社会生产資料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也就必然影响到社会基金的不断增长和农業中社会主义部門的作用的不断增长。

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对社会所有的机械設備加以简单的

分配，因为，这样做会在农村造成寄生主义的倾向，而且只会造成不良的经济后果。财政资金应真正是在农业中获得的利润，而且合并到合作社基金和其他社会基金中去。只有在此种条件下，我们才能期待机械设备合理地用到农业中去，得到正确地分配和被很好地利用；才能对农村经济关系的逐渐改变产生我们所期待的影响。

坚持不渝地执行和实现农业生产中的这种政策最后使土地私有变成获取一定的土地报酬，而土地报酬不能成为农村中任何社会主义运动的障碍。相反，在我国已有这样的例子：合作社通过机械化和适应于机械化的生产组织把农民联合起来，由这些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地私有制实际上已丧失了原有的性质，而且实质上逐渐的化为土地报酬。此外，也应指出，这一过程的发展本身就能改变农村中人们的心理状态，而且，这一过程本身就经常地产生着各种社会主义形式。

所以必须指出这点也由于我觉得，在我国，当我们谈到农村的社会主义时，经常是过多地谈到土地。而一谈到土地，自然就产生与个体农业生产者的冲突，与他们的心理状态的冲突，因为，这种心理状态今天还牢牢地与土地私有制联系着。因此，虽然我们有许多可能性加速并指导这全部进程，但是，仍毫无必要地踏步不前。因此，我们对机器和其他基本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当我说到生产资料时，所指的不仅是拖拉机，而且也指的其他机器、轻便机械设备、各种交通工具、小型加工的工具、人工繁殖牲畜站、种子服务站、牲畜保护站、仓库和地窖等。

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我想也提醒一下，现在我国某些方面的人士正在进行的关于“供农村用的小型机器”的讨论。如果我们看到农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我想，供农村用的小型机



器問題就不能象討論這一問題時的那種提法。小型機器掌握在個體生產者手中，在我國，事實上就等於保留小農經濟。據我看來，允許這種方針就意味着在發展我國普通合作社方面的全部行動和我們所談過的一切遭到破產。當然，我並不是想以此說明我們不應該生產小型農業機器並在經濟利益和生產過程本身要求使用這些機器的地方加以使用。但是，我認為，“供小農戶用的小型機器”的口號是明顯的政治口號，在我國經濟條件下是荒謬的，與農村社會主義發展是矛盾的。我們應該集中於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而且，我國農業機械化的政策也要適應於這一目的。當然，這裡除大型機器外也需要小型的，但是，它們的分配應該由經濟因素來決定，而不是通過分散的個體農戶發展農業的可能性的幻想來決定的。

#### (四)

我想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合作社政策的本質。表面的觀察家可能把這種政策解釋為發展某種進行聯合耕地的合作社組織。但是，這不是我們政策的實質，儘管在我們合作社的活動中有這種觀念的因素。這種合作社形式適合於沒有現代化生產工具的不發達的農業。相反，我們的全部政策正是基於快速地把現代化的機械和與之相聯系的農業技術措施投入農業生產中去的遠景上。因此，我們政策的實質不僅在於生產合作社（雖然，不言而喻，它是合作社正確發展的條件之一），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在於通過社會對基本生產資料的絕對控制使擴大再生產的過程逐步地社會化。因此，如果我們想與農村的某些經濟關係形式進行一些比較的話，那麼，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只可以把我國農村中農民和合作社的機器耕作組之間的經濟關係與蘇聯的機器拖拉機站和集體農莊間的關係加以比較，但是，有幾個巨

大的差別，我想提一提其中的三點：第一，我們合作社的機器耕作組直接與個別農民聯繫，即它在合作社範圍內，在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條件下，在統一組織生產方面直接行動；第二，它不是與合作社分離的，而是在合作社範圍內統一組織生產的組成部分；第三，它和農民間的經濟關係建立在自願和雙方經濟利益的原則上，這一原則當然受着統一的社会經濟政策的普遍指導。

因此，這就是這樣的过程，個別經濟直接地與農業生產的社会主义部門聯繫并由此必然逐漸地改變本身的成份和利益。總之，我們不應該拿某些固定的合作社形式作為唯一的或是最主要的，而應該指導農村朝着加強農業生產的社会資料方面發展的全部進程，在這一發展的各個階段將產生出適當的社会主义的組織形式。我們的普通農業生產者合作社對於這些進程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廣泛的領域。當然，不能在一天之內就取得成就。這裡需要一定的時間、全部合作社領導機構的活躍工作和社会主义的領導力量通過相應的經濟政策和組織工作進行的頑強的、經常的指導。過去的結果已表明，這是農村社会主义發展最健康的道路。而且歸根到底是最快的途徑。而特別重要的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不提出任何公式和教條，而是允許各種各樣的形式，為了使我國農村所特有的條件和積極趨向的各種差別得到充分的表現，這樣做是必要的。

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一切，那麼，首先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如何形成農業中的社会基金，投入現代化機械和其他農業生產資料的基礎和標準將是什麼。今年我們已開始通過一定的農業基金來解決這一問題，這些基金將屬於合作社及其專業協會<sup>①</sup>、公社和县，基金的來源原則上由社会計劃確定。依靠這些基金和貸款，合作社將逐漸地獲得生產資料，將參加到生產中去，並以相應的方法，通過組織收購、與農民簽訂各種生產合同和為農

民服务而取得的报酬等不断增加这些基金的資金。当然，这里所說的不仅是普通农业生产者合作社。国营农场和农民生产合作社甚至社会企业都应以相应的方法参加这些任务的实现。

合作社和合作社专业协会在尽多地收购农产品方面的努力对合作社基金的建立必然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合作社发展的现阶段；但是，一切经济机构必须保证这样的原则：合作社收购的愈多、收购价格愈低，它得到的資金就愈多。此外，必须保证使收购价格和合作社出售价格差额的一部分作为偿还金或以其他形式归还给农民<sup>②</sup>。因为，这对于加强合作社在收购方面的作用和由此而加强合作社基金和社会基金是必要的刺激。没有这些刺激，农民就会把自己的产品带到自由市场上去。我们所依据的应该是，只有经由物质利益引导个体农业生产者到这个方面时，他才能够通过我所說过的那些形式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这里我所指的当然是在我国占绝对优势的（特别是在把土地面积限到10公顷以后）劳动的小农（相当于贫农）和中农，不这样，他就不愿意与合作社联系。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他与合作社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削弱作为前进的推动力的物质利益的作用，而这样，我们只能遭到经济上的损失。

但是，不应该把个体农民的物质利益理解为某种绝对的和不可改变的东西，即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绝对不能指导和改变的

① 专业协会设于合作社县联社之下，掌管合作社各种专门业务和各专业合作社的事务。如：农业机械、种植葡萄、饲养牲畜、农产品加工等专业均设有专业协会。专业协会也有自己的企业，如农业机械专业协会，有直属的农业机械修理厂等。——译者

② 原注：按国家法律规定，收购价格和出售价格间的差额固定不变，该差额的30%应归还给农民，但现在实际上给农民的是6—10%，多少由各合作社根据情况决定。

东西。相反，这种利益取决于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普遍发展，也就是说，取决于由于一定的发展而造成的客观因素；也取决于社会主义力量对这一发展的主观指导，即取决于我们整个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通过对物质利益上的自发势力的正确指导可以取得完全肯定的积极成果。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今后更能够通过自己的经济政策影响农民物质利益的形成，并以此把它指导到确定的方面。我们在农业方面比在任何方面都更需要作为经济专家来行动，而不能作为官僚主义的行政人员来行动。

这也涉及到合作社本身的问题。仅通过对合作社的宣传和关于更好的合作社组织的讨论我们不能取得成绩。只有经济措施和其他措施的总合才能产生效果，这些措施决定并指导农民对合作社、对农业生产中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出于个人利益的兴趣。

而正是在这方面，在我国存在着思想模糊和混乱现象，许多措施正好起了相反的作用。我只让你们看两个例子。

我们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贷款政策经常完全不合理地帮助了商业收购企业而且直接地影响到自由市场和集市上物价的上漲，这一部分由于法令本身的缺点，一部分也由于人民银行实践中的缺点。这当然直接地破坏着合作社对个体农民的影响。

或者，我们谈谈私有农业机械问题。我们都知道，农业机械仍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而首先是通过国营农场和合作社不断流到私人手中。如，根据 1955 年的某些材料，仅伏依伏丁那一地，普通农业生产者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未包括在内）有拖拉机 300 台，而私人手中的拖拉机超过 800 台。我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有这样的情况，两三个农民联合起来，合买农业机械，拖拉机及其他，而且用这些拖拉机为其他农民耕地。一



部分富裕农民购买拖拉机的来，而我们某些专家还总在向我们证实，好象合作社把钱都浪费在农业机器上了，说不能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农业机械化。如果使这一进程继续下去，必使农村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而使我们最后不得不以行政手段加以干涉，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无好处，对农业生产的提高和合作社的发展也无多少帮助。关于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各种政治会议上经常谈到，但在实践中很少采取措施来制止这种反社会主义的现象。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边谈过的，如果我们想通过普通合作社确实保证扩大再生产过程的社会化，那么，我们就应该进行系统的工作使基本生产资料更多地集中到普通农业生产者合作社及其专业协会，当然，也集中到生产合作社和社会企业中去。只有通过这样的道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定的农业资金才能合并到合作社的社会基金中去并作为能改变我国农业结构的社会资金回到农业中来。这样，合作社不仅成为农业生产直接的组织者，而且是决定农村经济关系发展的经济因素。当然，同时合作社的社会资金应该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其他社会资金一样，受共同制度的约束，在实践和工作方法上可以有所变通。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只有当我们使农民相信能够获得个人物质利益，只有当我们了解他们的这一利益并通过全部经济政策自觉地指导这一利益时，我们才能在这一道路上取得成就。

## (五)

与此相联系地，在我国有时有人提出一个根本问题：机械化应该完全在普通合作社范围内进行，还是在合作社体系以外更好地组织机器拖拉机站。我认为，原则上讲，这两种组织方式都

可以采用,即,可以通过合作社,也可以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型的社会企业,这些企业按照经济核算进行工作,并像其他一切企业一样设有工人委员会。但是,我认为,从经济合理性和经济利益来看,通过普通合作社及其专业协会来进行机器服务更适合我国当前的条件。

首先,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合作社才能成为生产的真正的经济组织者,社会基金才能充分地起到应起的联合个体农户的作用。第二,在这个范围内可以更好地组织整个服务,并使之与其一切辅助部门联系起来,也可以降低物质开支,特别是,如果各工作组<sup>①</sup>里工作的仅是农民——合作社社员,他们按劳取酬,但是工作组不替他们担负极大部分的社会义务(指社会保险费),而企业对其经常的工人就得负担这样义务。最后,在这种制度中能实行更有效的社会监督。还有许多论据是证实这种组织的。

当然,不会也不能在任何一个合作社里都发展机器站,因为,许多合作社太弱,太小,特别是对某些种机械来讲。其次,不应该把一切机器都集中在一个机器站里。我觉得,正是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需要专业协会,因为它能够组织整个的服务并且适当地把机器站分配给一个或者几个合作社。此外,这种专业协会同时能组织一切必要的服务部门(修理工场等)。我认为,只有通过专业协会及其分会和它组织的经济活动把各个合作社的机器站联系起来,我们才能解决我国的农业发展,特别是农业机械化的主要问题。那些机械设备能力超过其需要并可以

---

① 工作组是合作社进行各种专门业务工作的分工名称,如:一个合作社里有种小麦的、有种玉米的、有饲养家畜的、有经营机器的、有经营作坊的等,这些工作组不是独立的生产单位,而是合作社的组成部分,原文是“POGDN”,但中文无恰当的名称,故暂译为工作组。——译者

用来为个体农民耕地的国营农场，生产合作社，各种独立企业等的活动应该作为合作社网的补充。不言而喻，人民委员会也应该以适当的方法支持这整个体系。

尽管专业协会在组织这些服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合作社本身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组织上都不能与这些服务脱离。合作社基金应该是其财政的基础，而合作社代表应该参加这些服务工作的相应的管理委员会，无论是仅供应一个还是供应几个合作社的机器工作组。

不言而喻，这种政策和發展农业生产的一切措施要求农村有一定的稳定性，要求农民有坚定的信心（无论对他们掌握自己的土地及其对合作社经济关系的自愿性方面，还是关于其整个经济地位问题）。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才能充分积极地發展生产并与合作社建立一定的经济关系。在这方面，行政措施（它们可能使农民与合作社建立更进一步的经济关系）只能造成不良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对那些将土地撩荒的农民采取较严格的行政措施，因为这是危害整个社会的。在我们的制度中，对土地及土地耕种的社会监督应该成为坚固的原则，对于那些非常错误地认为“因为他们是土地所有者，就可以使土地荒废”的人应采取一切坚决的措施。

我认为，我国农业中当前的情况使我们能够通过我国的立法、经济制度和管理制度、通过具体实践保证这两个任务的实现。

合作社在其生产的组织者作用方面不应仅限于社员本身，而且应该把社员和非社员联系起来，解决整个的农业生产问题。我们的普通合作社不应该是排他性的机构。它不是集体的私人组织（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样），而是适合于土地私有制情况

下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参加通过生产资料的逐渐社会化，改造私有制的过程。因此，在一切方面都必须使合作社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与社员和非社员一起进行广泛的工作，计划整个生产并参加社员和非社员的土地耕种。当然，因为社员在组织之内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应该有某些优先权，但是这些优先权绝不能造成社员和非社员间的隔膜，而应该鼓励农民加入合作社。

## (六)

在以前的会议和今天这次全会上都谈到，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和各地区的农业远景计划。这的确是现在的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因为，只有我们看到具体的前景和确定的目的时，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到的政策才可能实现。

最近几年，我们对农业的投资开始稍有增加，今后还要更多地投资。因此，我们的农业计划就不应该仅限于扩大耕地面积和有限的农业技术措施或者是（像讨论中所指出的）“天气预告”等问题上，而首先应该依靠合作社、国营农场、农业局等组织作用，以采用新的现代化的生产资料 and 一切可能同时采用的农业技术措施的计划为基础。联邦执行委员会及其各专门机构基于这一基础已制定了农业的十年远景计划草案，这一草案经过一些修正和补充后将进行广泛的讨论。这个计划将为全国规定出一般的范围，还需要在县、合作社联合会、区和合作社里把它具体化。这事实上应该是与所规定的农业技术措施、改组等相适应的，财政和生产资料、机器站，发展农业某部门所需投资等的分配之长期计划。当然，这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详尽的计划，而是大体上的规划，它确定行动的目的和方针，而不包括合作社和其他经济组织的独立性、主动性和责任问题。也很明确，这些计划不包括利润的分配，而且规定尽少的贴补费用。只有以合



合作社達到的經濟結果及其所獲社會基金的數量來作為衡量其貸款能力和投資能力的尺度。不言而喻，合作社的這種經濟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而且常常是在最大程度上取決於合作社聯合會，特別是專業協會所給予的專門幫助和經濟援助。

另一方面，只有在这一遠景計劃的基礎上，才可能系統地實現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實現我們在本次全會上所談的原則和方法。而這裡我們也必須自覺地、系統地工作，就是說一切都不要期待於自發勢力，而是明確地確定目的和基本方針及達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如果我們明確的回答這些問題，如果使我國農業物資發展的遠景計劃也適應於这一答案，那末，我們就能按時把農村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項任務和目的具體化。而遠景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常常正是由於缺少確定的鮮明的前景，造成農村的社會主義組織在實踐中的方向模糊以及許多弱點和錯誤。

### (七)

在討論中，關於專業協會問題談了許多。我想，我們都同意，這種協會對於貫徹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政策是必要的。據我看來，它們與合作社的企業並無矛盾，在我國合作社的體系中需要企業也需要專業協會。但是，必須明確地規定它們的作用和性質。我覺得，在那些我們要直接組織個別農業生產者的地方（為農產品本身、加工工作和組織收購）必須有專業協會。作為社會企業而有其完全具體的目的和任務的商業企業和工業企業不能更全面地組織農業生產者。它們對於这一工作只能有些幫助，而不能成為这一任務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承擔者。我不認為要通過訂契約、合同等方法使企業停止過去所進行的工作，但是，我認為，對組織企業這種作法不能期待的過多，因為，企業的

首要目的不是組織个体生产者，而是在本身任务的範圍內和他們一起工作。

順便說一下，必須使工業企業改變与个体农民簽訂各种形式的合同的工作方法，不是避开合作社，而是更多地通过合作社來訂合同，因为，合作社應該以企業的名义組織農業并履行農業技术和經濟上的一切事务。这样合作社就能把过去个体的中間人和企業的代理人所得到的資金获取过来，而且，實踐也表明，通过合作社能得到更好的結果。这将是使农民入社的一种长远形式。

但是，另一方面，我認为，如果把这种关系变成合作社的在行政上某种固定的独占权，是不好的。因为独占权和特权并不能保証合作社的健康發展。工業企業應該寻找更順利的条件，因此不一定非通过合作社不可。但是，企業應該給合作社以平等的条件，而且，如果合作社接受了这种条件，企業就沒有理由拒絕。

如果我們想掌握并指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那么也应该通过专业协会來組織个体农民。专业协会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是巩固的經濟組織。我們不需要只派遣宣傳員和专家到各村向农民介紹農業技术措施的专业协会，因为，专门服务和既存的合作社联合会能够执行这一任务。专业协会首先應該是農業生产和收購的直接的經濟組織者。因此，也要掌握一定的物質資料、基金、工作組等。如果专业协会在其活动中获得了利潤，它們基本上和其他社会企業負有同样的社会义务。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专业协会未实现任何利潤，全部利潤都集中到合作社基金里去了，合作社在对社会执行了一切义务之后，根据合作社联合会會議的決議从合作社基金中抽出一定数量的或一定百分比的資金作为专业协会的基金。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使所

實現的合作社基金的一部分集中到專業協會里作為相應的基金，為了使專業協會成為農村的經濟因素，就是說使它能作為一種經濟力量而不是行政機構來行動，這種基金是必要的。這一問題應該儘快地研究並決定一個最適當的辦法。

專業協會對合作社能起有力的動員作用，而這正是農村的經濟因素。不能認為合作社里一切都將自然而然地進行得令人滿意。現在，政治領導、專門的教授和指示還不足以使合作社充分發揮其作用。如果使它們處於自流，只給予紙上的指示，許多合作社就會停頓或消極地發展。最後，它們將每日受到小私有制的自發勢力的壓力，這種勢力是具有物質經濟性質的。如果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物質經濟力量不能抵抗這種壓力，就不能希望合作社成為積極的社會主義因素，因為，在這些合作社里將由相互矛盾的利益統治着。這裡除其他社會主義企業外，專業協會應該首先表現為經濟組織者。如果工作做得好，它們就能把合作社導入一定的經濟關係，以此使其積極起來，並引它至確定的方向。因此，專業協會能夠大大地促進消除自滿、消極現象和各合作社里各種企圖保持農村現有關係等傾向，而在这方面能起作用的首先是經濟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和其他類似手段。

但是，我想指出，由於專業協會的建立而產生的某些危險。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走的太快，特別是不適當地把專業協會分散。經常有人說，必須使專業協會分散。在那些各個農業部門很發達又握有一定數量現代化生產資料的地方，或者是，由於當前國家對發展農業的投資而可能發展的地方，無疑地需要專業化的協會。但是，如果談的是生產不發展又只握有有限的現代化生產資料的地方，我認為，分散是有害的，因為，这样就取消了專業協會最主要的作用，它的營業性，它在生產中直接的經濟作用

(不仅是專門的組織作用)。專業協會應該是經濟組織，不這樣我們就會恢復過去那種過時的專業協會。擁有大量工作人員，他們“寫”小冊子，提出“建議”，而不是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力量進行工作和發揮作用。這些協會所以被淘汰，正是由於它們不適用於需要。因此，我認為，某些專業化的專業協會可以建立，但要看它們是否能成為農業生產中的真正經濟因素來決定。

因此，在建立專業協會方面要穩步前進。在進行原始的農業生產，沒有很多資金的落後農業區，迅速建立很多專業協會只能是停留在紙上，而不會有任何實際意義。

我特別想使你們注意到專業協會官僚主義化的危險性。它們是很容易官僚主義化的，因為，它們的活動不僅限於經濟工作，而且還有一定的專門技術任務。防止官僚主義化的良藥就是民主的社會管理。專業協會應該設有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由合作社及其分社的代表組成，它應該對專業協會政策的基本問題作出決定。當然，在規定任務時，人民委員會也應該對這些管理委員會給予支持和幫助。

與專業協會相聯系的，也要談談專門合作社問題。我認為，如果我們開始匆忙地改組這種合作社，特別是，如果我們解散它們，是非常錯誤的。生活本身將逐漸把它們導入專業協會的體系。這裡應該逐步進行，使事情按其自然進程發展。我們絕不應該違背事物的自然進程，因為，這只能使這些基本上是有利的、良好的經濟組織削弱。如果在普通合作社里組織適當的分社，它們就會影響專業合作社的政策。此外，在個別農業部門極其發達或占統治地位的某些地區可能需要專業協會和區域分會，這樣，舊有的專業化合作社可以作為某種專業協會也被吸收入這一體系。

在討論中很多人談到合作社在收購方面有壟斷的危險性，



特别是,如果每个合作社严格地限制在本地区,而且被保护着免受外来的“竞争”的话。某些同志又认为,这种危险不存在,或者是不大。我相信,正确地建立合作社和个体农民间的经济关系能使这种危险减少到最小程度,但是,我们必须创造这种条件,我觉得,在我们没有造成这种条件的时候,合作社的垄断权可能在收购中和整个合作社正确发展中造成严重的混乱现象。垄断地位可能使合作社不太去关心收购的数量,而更关心高价的出售。使它致力于商业而不致力于生产。使其内部更难于发展为这样一个健全的战斗的核心,它是以提高生产,机械化,投资,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措施和工具作为方针。因此,我认为,在现阶段应预见到并组织那些经济因素的活动,这些因素将使合作社不能处于与农民交换中的垄断地位。另一个问题当然是,哪个企业、怎么样、什么时候能与农民建立类似的经济关系,但是,我怀疑,没有这种因素的压力合作社会健康地发展。我觉得,在这一意义上,当前的批发市场也可以有积极作用,只要我们的经济政策对这一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关系产生相当的影响。

## (八)

在合作社和工作组及企业的关系方面,各地也存在着非常混乱的现象。为解决这方面的問題,首先应该确定原则,其次要非常具体地规定组织形式、关系及旨在制止歪曲所提出的原则的社会监督机构。

我认为,建立制度的巩固基础应该是如下的原则:

(1)该工作组或企业是否为合作社或合作社联合会的组成部分,这问题不应该由它们给合作社带来的物质利益,这种物质利益的多少、工人数量和基本资料的价值来决定,而只应该由它与农业的直接联系来决定。

(2) 合作社和合作社联合会組成部分的工作組和企業，作为公共生产单位，原則上应按与其他公共企業同样的条件对社会执行同样的义务。只是，它可以根据自己的經濟政策制定自己的条例来决定各企業和工作組收入的分配方法。

(3) 企業、工作組、合作社和合作社联合会积累的資金只能作为社会基金来处理，原則上要与其他的这类基金接受同样的社会监督和同样的分配形式。

当然，應該根据实践和我国農業生产的結構使这些原則和关系具体化。属于合作社联合会和合作社的企業的情况不能和其他企業有任何区别。首先，應該使合作社和合作社联合会有尽少的企業，就是說，使它們仅握有与農業生产和农产品貿易有最直接联系的那种企業。这些企業对社会負有与其他企業相同的义务，只是，联邦社会計划对这些义务可以规定某些有利于合作社社会基金的改变，只要这样做有利于更迅速的農業投資。同时，这些企業与合作社和合作社联合会的必要联系也絕不能限制工人委员会的权力。这里，保証合作社組織对企業的生产性質發生影响的，建立該企業的合作社的必要权力应給予合作社組織，但是，合作社組織不能有其他特別的权力。不言而喻，由于合作社組織用自己的基金对这些企業投資，它們依法應該保留貸款者的物質权力。

換句話說，“合作社的企業”是“合作社的”这仅仅是說，它通过合作社組織与管理農業生产的机构發生組織上的联系，而它的社会地位按其性質來說与其他社会企業沒有也不能有区别。我們在新的“農業合作社組織法”中将規定的合作社組織与其所建立的企業間的关系之法律条例也要适应于这一原則。

工作組問題稍有不同。当然，在社会性質和本身性質方面，对企業談的一切也关系到工作組及其收入。但是，它对社会担

負財政义务的方法可以不同。这里作为生产的組織者的合作社在某种意义上对工作組有着社会企業对其車間的作用；即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担負財政义务。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里也不能由一个規定解决一切。首先，在我国，这些工作組的性質和形式非常复杂。有很多工作組与农業沒有任何联系，只在能得到报酬的情况下才为合作社服务。事实上，这是对合作社进行社会援助的一种形式。虽然，我認为，如果这种活动推动合作社的积极性，就不应完全抛弃它，但是，我觉得，我們合作社的方針應該是逐漸地从中去掉那些与农業生产沒有直接联系的因素。自然，当合作社里有这种工作組时，它的收入只能作为加强社会农業生产資料和發展农業生产的基金(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工作組未直接交納社会义务，而且这样做对这种工作組也是最正确的)。对其他工作組，我觉得首先应考虑到如下因素。

一方面，在一些强大的合作社里我們已經有許多非常独立的工作組，随着我国农業的發展，还会有更多的此类工作組，特别是在合作社联合会里，它們拥有大量的常备劳动力，在几个公社範圍内工作。事实上这些工作組就其發达和独立的程度来说是企業(大多数都是进行加工或是为农業服务的)，但是，由于与农業生产的某些过程联系密切，必須作为合作社和专业协会中的工作組組織起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工作組的收入应单独計算，即这些工作組应独立地执行其社会义务。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这出于許多实际的原因，即为了制止合作社組織的投机，形式上把企業变成工作組而輕易地由事实上屬於其他社会組織的基金中获取大量資金。这里，工人自治制度也应该充分發揮作用。当然，所屬机关的社会計劃可以規定，把这些工作組收入的一定部分轉为固定的合作社基金，作为这些基金的

社会补助金。

另一方面，有很多与农业生产有最直接联系的工作组和对许多农产品进行小型直接加工的小工作组，在实践中很难使它们单独对社会负财政义务，而且这样做也不适合，因为，这会使合作社丧失对建立这种工作组的积极性，而这类工作组是我国合作社政策最重要的工具。因此，它们应包括在合作社统一的核算中。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工作组的收入要真正作为合作社固定的社会基金而决不允许转账，因为，这可能是不正确地花费社会基金。

在这些社会基金的建立和花费方面，应该像其他社会基金一样，保证以有效的社会监督。当然，我这并不是说，负责的社会机关应该干预这些资金的具体用途，但是它们应该保证：第一，基金的社会性质；第二，遵守有关该基金花费的计划和其他法令。

对这类工作组，如下的原则也应该适用；在其中工作的应该主要是农民—社员。合作社的工作组在农民私有土地上为他们做的工作，农民应付适当的报酬。合作社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让农民工作时，应按照优秀的生产合作社里同样的原则给予劳动报酬。毫无疑问，在这种条件下，合作社工作组服务的价钱农民非常易于接受，这样他们就与合作社联系更巩固了。应该最坚决地抛弃合作社工作组仅雇用固定工人的方针，因为这样它们就必须担负一切社会保险费。这种方针在经济上也是不好的，因为它使一切加工工作的价格上涨；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因为它阻碍农民—社员之间通过劳动，通过参加合作社劳动的报酬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应该努力做到，在合作社工作组中工作的主要是农民—社员，并且把工作报酬作为农民的补助费，它们应该摆脱固定工人的工资所需付出的一切或绝大部分的社



会保險費。因此，工人自治的形式只能个别地采用，按特别的形式并与社会管理形式同时采用。

我認为，严格遵守这些原则是極其必要的，这不仅是，我們要保証对收入分配的社会监督，而且也是为了在合作社里真正地發展起这样的觉悟：它們的發展及其社会基金的力量只能由它們提高和發展农業生产的行动来决定，使它們停止靠各种社会資金、貼补金和对社会企业的压力等进行投机。而現在是存在着这样的傾向的，它們是加强农業中社会主义比重这一健康方針的極大阻碍。

譬如，最近在我国的某些地区極其普遍地存在着这样的現象：各种企业都被并入合作社，这常常是通过对这些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加以政治压力的方法实现的，希望这样使合作社得到某些額外的物質利益，而通过合作社，人民委员会也获得这种利益。这种傾向在經濟上是非常有害的，而且使建立該企业的組織不可能获得自己部分的收入。很明显，在我国的經濟制度中不能允許，仅通过把独立的企业与合作社联系起来就使該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和对社会的义务加以改变。我們的方針應該是，合作社依靠自己的發展和农業生产的發展，依靠积累自己的基金来建立企业并使之独立，而不是指望对別人所創造的企业資金的权力。因此，必須制止人为地使企业并入合作社的运动，因为这对合作社，专业协会和企业沒有任何好处而只有害处。

也提出了合作社和局的关系問題。我認为，基于我們所談的这一切，我国普通合作社的性質在某种程度上也發生了变化。譬如，現在国家把比过去多得多的、广泛得多的任务交給了普通合作社，給予它比过去多得多的資金。但是，由此，加强对合作社所掌握的社会資金的社會监督就極其必要了。我这里所指的不仅是审查、財政檢查一类的监督，而是对合作社基金中資金的

使用进行原則上的、計劃上的指导。因此，我們應該以适当的方法努力使合作社联合会与农业局联系起来，因为，农业局在这种指导上能起極重要的作用。

除解决上述任务外，必須作出極大努力，在从經濟上加强合作社方面、在建立更多的秩序和責任及加强民主方面，更迅速、更系統地改善合作社內部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必須給合作社以具体帮助，同时对合作社的工作必須保証以必要的專門的和財政的監督。我同意全会所提出的意見，即在合作社联合会里必須开展并加强审查工作，因为这种工作能有助于情况的繼續改善并保証对合作社机构的工作进行必要的財政監督。过去在合作社联合会以外对合作社的审查工作是沒有效果的。另一方面要制訂合作社和合作社联合会的工作組的章程。在章程中应明确规定申請基金的手續，它應該保証在每种情况下的有利投資。譬如，現在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非法的把一种基金轉为另一种基金，甚至用来弥补合作社消費店的赤字。过去資金比較少，害处一般地也比較小。但是，今后資金将大大增加，由这些資金所产生的害处也可能会增加。應該尽快地制定“合作社法”，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合作社联合会总会也应着手拟定一切条例，这些条例对合作社和专业协会的良好經濟工作，特别是对于合作社基金的正确使用是必要的。

任务很多而且不簡單。但是，目的是明确的：發展和提高农业生产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是統一的。今天我們在这里規定了具体任务并明确地确定了政策。現在，成功取决于在日常實踐中鍥而不舍地实现这些政策。

## 南斯拉夫的經濟情况<sup>①</sup>

### 生产者管理企業

南斯拉夫采取一种既不同于私人資本主义，又不同于国家資本主义的制度。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既不是私人資本家，又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工厂和其他生产資料直接交給生产者——“工人集团”管理。

南斯拉夫經濟發展的轉折点是有关“工人集团”管理国家經濟企業的法律的頒布。

根据这项法律，一个企業的整个“工人集团”首先从他們当中选出“工人委员会”，然后产生管理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都要向工人集团負責。

“工人委员会”代表“工人集团”领导那形成总的人民财产的工厂、矿場、交通、运输和其他經濟部門。“工人委员会”从他們当中选出它的首脑机构——企業的管理委员会，作为“工人集团”的代表。

“工人委员会”批准计划和決算，决定企業所应遵循的领导路綫以及如何实现經濟计划，选举、罢免和停止管理委员会和它的个别委員的职务，通过企業的業務条例，討論管理委员会的报告并批准它的活动。此外它分配积累中某一部分交給企業独立支配。“工人委员会”是以普遍平等和直接投票的方式秘密选出

<sup>①</sup> 这是“南斯拉夫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南斯拉夫手册”中的一章，篇名为“人民經濟”。

的，所有工人、管理人員和職員都享有“工人委員會”的選舉權。

管理委員會制訂企業的基本計劃草案，決定領導職位的分配，解決職工對解除合同的爭議，以及企業內的勞動分工，工人的工資、薪金和獎勵，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的措施。特別是改善企業中就業的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措施。管理委員會也制定每年休假的計劃。管理委員會的委員至少有四分之三必須為直接從事生產的工人。

“工人委員會”實現着著名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企業屬於工人。

通過屬於領導地位的工人組織作用的加強，經理的作用同時將要減弱。在新的經濟制度下，可以預期經理人選將會是最好的專家和第一流的職員。他自動地，在由不同工廠和車間的工人們所組成的管理委員會中，擔負起他的職務。

為了使自己的半成品和必要的工業材料有保證，各工廠相互間有着業務上的聯系。凡是勞動組織很好的，商業經營得法的，能干的“工人集團”都享有一切條件，保證可以自由地在市場上獲得生產所需的原料和自由地出售產品。

市場不受任何管制。市場上價格的形式根據供求法則，國家只通過經濟手段來影響價格的形成，如貨物銷售稅等。

從社會政治的立場來看這個制度的最高成就是，直接生產者參加生產工作中的果實的分配，當人們從實現的收入中，按公共的資金增加機器的資金和擴大工廠的資金等項分配完畢之後，“工人集團”就以一種贏利的形式，來決定分配其餘的利潤作為正常的工資。

國家只盡它作為一種調節器的功能，並向工人保證，無論財政情況如何都照付最低工資。

因此不難看出“工人集團”是關心生產的擴大和合理化的。



## 消灭对生产者的剥削

这种新制度不仅已为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奠定了基础，并且也将导致国家生产力的巨大的飞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中劳动组织的改善，剩余劳动力现象的消灭而最后是生产的提高。

这些情况特别在工业中容易看得出来。一些引用的指数将做出最好的说明。为了比较，选择 1951 年作为基数 (100)，在这一年各项事业仍然是用旧方式经营，到 1952 年就实施了新的经济制度。

	季 度				全年平均
	I	II	III	IV	
工业生产	89.7	103.2	102.6	111.4	101.7
工业就业	80.8	79.5	80.0	79.0	80.0
工业劳动生产率	111.0	129.8	128.3	139.6	127.1
工业品中的小手工工业产值 (烟草业在外)	81.0	82.0	80.0	79.0	80.6

从这些指数中可以看出在提高生产的同时，减少了劳动力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企业领导的民主化

新经济制度在实施的头一年就已经证实了它的正确。南斯拉夫的经验确实说明是一种进一步的民主化。

对于工人领导必须进一步加以肯定。根据这个方向，将建议在“工人集团”方面取消管理委员会，并且将领导交给新的，稍加转变的“工人委员会”，它将从“工人集团”中得到劳动指示。

目前趋势是“工人集团”不仅不应选聘所谓经理，并且不应在一种不合适情况下选举这种经理，这种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这意味着“工人集团”对它最高的职员——经理的影响的加强。

## 战争损害

### 牺牲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牺牲了 1,706,000 人。根据 1948 年联合国在巴黎举行的赔偿会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南斯拉夫和一些联盟国家的损失如下：

	人 数	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数
南斯拉夫·····	1,706,000	10.08
印度·····	759,000	0.2
法国·····	653,000	1.5
希腊·····	558,000	7.0
英国·····	368,000	0.8
捷克·····	250,000	1.5
荷兰·····	200,000	2.2
美国·····	187,000	0.14
比利时·····	59,000	0.7
加拿大·····	41,000	3.34
阿尔巴尼亚·····	28,000	2.7
澳大利亚·····	12,000	0.2
新西兰·····	10,000	0.6
挪威·····	8,600	0.3
南非联邦·····	6,000	0.06
卢森堡·····	5,000	1.7
埃及·····	3,000	0.02

南斯拉夫的損失占总数 34%，这就是說超过所有参加巴黎的賠償會議的联盟国家的三分之一。在南斯拉夫每 9 个人中有一个战争牺牲者。特別显著的損失是 9 万名熟練的產業工人和矿工，4 万名知識分子和将近 100 万农业工人。

南斯拉夫陣亡的战士的数字也是很大的。南斯拉夫軍事上的損失总计有 35,000 名陣亡战士，占全体人口的 2%，受伤者的百分数也接近此数。18 个联盟国家計有 1,779,000 受伤者，即占这些国家人口总数的 0.25%。南斯拉夫在这方面也占据首位。上次大战中南斯拉夫有 425,000 战士受伤，或者是总人口的 2.7%。这占全部受伤战士的 24%。因此南斯拉夫的战争殘廢比 18 个联盟国家的平均損失多 11 倍。

此外是：

生还的战俘	170,000	
生还的拘留者	320,000	
被暴力劫走者	530,000	
强压劳动者	270,000	
在暴力下迁移者	320,000	
总 計	1,610,000	占全人口的 10.2%

### 物 資 損 失

南斯拉夫的战争損失按照 1938 年的物价(牌价是 1 美元合 44 狄那尔)計算为 469 亿美元。仅仅物質財富的損失一項即达 90 亿美元，即占有 18 个国家总的損失的 17%。这个損失超过英国全国損失的 1.4 倍，荷兰的 2 倍，捷克的 2.2 倍，希腊的 3.6 倍，比利时的 4 倍，美国的 7.2 倍。

在战争中，822,237 幢建筑物被毀坏，因此無处可住和失掉房产的南斯拉夫居民达 350 万。

矿山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没有一个完好的。战后统计,142个煤矿,7个铅、锌矿,2个云母矿,8个镉矿,9个铬矿,10个铁矾土矿,12个铁矿,33个其他的矿被毁坏了。

产业损失如下:

化学工业	16,000,000美元	52.2%
纺织工业	23,500,000美元	53.4%
五金工业	27,500,000美元	49.8%
电气工业	18,000,000美元	30.2%
食品工业	14,000,000美元	22 %
建筑工业	7,000,000美元	17.8%

农业方面的破坏如下:

果树	18,000,000株	24.2%
葡萄园	84,496公顷	38 %
马	798,132头	61.6%
牛	2,397,343头	55.6%
羊	6,324,000头	63.3%
猪	2,123,282头	58.7%
家禽	12,206,817只	54.4%
蜂	329,450箱	41.6%

占领军劫走了各种粮食 1,910,364 车皮,羊毛 1,760 车皮,牛奶 252,212 车皮;等等。

交通系统和交通工具也同样受到严重的损害,机车有 976 辆被破坏,468 辆受损坏,30,301 辆车皮失踪或者被开走,15,900 辆车皮被毁损。南斯拉夫失掉了 36 条大型内河轮船,15 条货轮,505 条拖轮,此外还失掉了 650 条大型的和 8,800 条较小的船只。

全国铁路中有 28,380 公里(总数为 43,600 公里)被破坏,此



外有 8,300 公里公路受損失。13 座长达 5,450 公尺的桥梁被炸毀，此外还有 1,685 座总长为 41,180 公尺的較小桥梁，和 1,875 座总长为 45,627 公尺的木桥。电报、电话設備也受到严重損害。

衛生机构方面有 210 个病院，7 个肺結核防治疗养所，17 个兒童医院和 22 个医科学校附屬医院被毀坏了。

450 个希腊正教教堂也被破坏了，800 个遭到損失，同样遭到損毀的还有 120 个天主教堂，756 个伊斯兰教寺院和 106 个犹太教寺院。

## 重新建設和五年計劃

随着国家各个地区的解放，志願工人小組的运动也發展了。工人小組在他們的行列里集合了成百万的公民、男女青年、老年人和妇女。这一段名为重新建設的有着象征意义的时期，到 1946 年底結束。結果重新建立了被燒毀的乡村，修复了敌人在撤退时有系統破坏的铁路和桥梁，城市的瓦砾被清除，工厂重新开始生产。

1947 年初已經具备了走上計劃經濟的条件。国民議會提出了从 1947 年到 1951 年国家工業化和电气化的五年計劃。

当然有某些弱点，这个計劃在执行过程中作了修改，但在一些經濟部門中，1951 年底已經實現了五年計劃。不过在一些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中，情况却并不如此，完成五年計劃还必需延长一年，要到 1952 年底才能最后完成，而且在許多部門中这也完全是估計而已。

其所以需要延长一年才能完成五年計劃的理由有三：

(一) 苏联及其控制下的国家的經濟封鎖；

(二) 由于苏联及其控制下的国家对南斯拉夫的敌意的侵略

的压力，以及国际形势尖锐化的结果，人民防务的支出增加了；

(三) 这一时期所遭受的自然灾害(旱灾)使全国收获量减少。

### 一些由于苏联及其控制下的国家的 经济封锁而造成情况

这里必须同时予以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和苏联及其控制下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范围直到有名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决议发表前，占南斯拉夫全部贸易总额的51%。1949年即已降至31.6%，1950年降至零。因此南斯拉夫的输出，特别是以东方国家<sup>①</sup>为对象的某些货物的输出衰落了，1950年仅为1948年的80%。这就带来对外贸易结算方面的大量上升的负债(1948年为6亿狄那尔，1950年为59亿狄那尔)。

南斯拉夫除在对外贸易上的损失之外，还受到苏联及其所控制的国家未完全执行投资协定所造成的损失。协定中规定1947年到1951年的总额为1,875,000万狄那尔，但是只实现了118,400万狄那尔，计为6.3%。由于未完全执行投资协定(在交货期限上)给南斯拉夫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失，这和不履行贸易协定所造成的后果合并计算，使损失上升到42,900万狄那尔。

1946年，南斯拉夫为了人民防御的目的支出了30,500万美元，1947年为31,600万美元，平均每年为31,050万美元。这笔支出从1946年到1952年总计将为217,350万美元，假如没有苏联及其控制下的国家的侵略的威胁的话。但由于这个威胁，这笔支出在1948年提高为43,000万美元，1949年为52,800万美元，1951年和1952年平均每年为36,500万美元。因此在这五

<sup>①</sup> 指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译者

年期間的特別支出为 140,750 万美元。

在同一时期，南斯拉夫通过援助方式获得 24,120 万美元。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农产品的平均年产值总计将近 4,520 亿狄那尔，1950 年，由于旱灾降到 3,330 亿狄那尔。1952 年又因旱灾降到 3,080 亿狄那尔。总的损失将近 2,630 亿狄那尔，或者是 88,000 万美元。

以上我們把战前和五年计划前的情况作了对比，简单介绍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情况。

## 工 業

### 冶 金 業

黑色冶金業的主要产品(吨)

年度	生鉄	鋼	軋制品	压延产品	鍛制品
1939	105,672	240,539	213,500	2,500	400
1946	84,000	202,000	112,000	200	500
1947	162,000	311,000	191,000	8,200	600
1948	172,000	368,000	247,000	11,400	200
1949	190,000	401,000	250,000	13,200	1,200
1950	212,000	428,000	278,000	11,900	1,200
1951	248,000	434,000	301,000	13,600	2,000
1952	273,000	445,000	293,000	11,800	4,100
1953	270,000	515,000	320,000	13,800	4,800

战后的南斯拉夫正在清点过去的残破的遗产：一个富有矿产和原料的国家以可笑的价格把这些财富输出到其他国家；这些矿产和原料在外国加工而南斯拉夫却用高过 50 倍的价格买进这些用他们所输出的原料制成的成品。战后，人们走上建设自己的工业的道路，这就要进行建设许多新工厂的巨大工作。

有色冶金業的主要产品 (吨)

年度	电解銅	鉛	鋅	錫	鋁	水銀	鈾	銀
1939	12,463	10,651	4,918	1,500	1,703	378	—	1.3
1949	14,162	56,760	9,903	1,643	2,493	441	38.1	59.6
1951	14,004	60,068	13,223	1,229	2,828	505	87.8	95.3
1952	21,390	67,180	14,463	1,329	2,563	504	96.7	80.1
1953	27,764	70,796	14,549	1,410	2,792	492	98.5	94.8

1953年南斯拉夫最大的塞伏伊納軋鋼厂落成了。由于这个工厂的开工,將給有色金屬生产带来根本的改变。

### 机 器 工 業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斯拉夫几乎没有机器制造工业。战后,人們在頗为远大的基础上开始了他們的建設。許多炼鋼厂建立起来了。接着新的工作母机工厂(在柴洛茨尼克和立托斯特劳耶)建成并且开工了。它們工作的成果立刻就显示了出来,战前产量为3,500吨,到1952年就增加到47,000吨。战前机器輸入总計为32,000吨,因此1952年的生产量就已超出战前的整个輸入量和生产量。

鑄制品和机器的生产 (吨)

年度	鋼鑄件	原动机	建筑机器	农业机器
1939	5,037	95	45	3,233
1946	—	—	104	1,772
1947	3,869	176	587	4,742
1948	6,196	637	1,348	7,607
1949	7,887	1,002	1,459	10,393
1950	8,238	1,600	1,256	10,662
1951	9,225	1,322	1,734	11,452
1952	10,460	2,013	966	9,714
1953	10,666	2,611	1,379	11,179



1952年建筑机器和农业机器产品的减少是社会經濟计划中某些削減建筑業和农业投資的决定所造成的結果。

虽然这門工業的产品是絕對地增长了,但必須強調的是,無論在量方面和品种方面,它仍然不能滿足国家的需要(1951年輸入机器在3万吨以上)。

## 五金工業

在战前五金工業方面的工厂有200多个。主要是一种技术很低,劳动組織不健全的小厂。这个数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沒有增加,但是这一工業部門的构成为了适应生产而进行了改革,并运用了新的操作法。

### 鉄的生产(吨)

1939	101,000	1949	100,000
1946	84,000	1950	212,000
1947	162,000	1951	248,000
1948	172,000	1952	273,000

### 五金加工業的主要产品(吨)

年度	鉄鑄件	鉄构件	鍋爐	滾珠 軸承	家具	容器	汽車 (輛)
1939	14,500	6,703	140	—	181	—	—
1946	—	10,614	575	—	399	—	—
1947	29,875	17,718	404	—	1,082	—	229
1948	49,118	15,490	1,872	—	1,498	—	472
1949	64,010	24,680	4,115	2	2,977	6,570	535
1950	69,247	20,279	4,307	30	2,833	7,172	826
1951	64,443	20,619	3,046	49	2,957	6,479	803
1952	54,621	24,990	2,371	87	3,950	5,649	699
1953	66,854	39,442	2,855	117	5,891	4,398	1,329

年度	鋼的生产(吨)	电解銅的生产(吨)
1939	235,000	12,468
1946	202,000	12,925
1947	311,000	14,078
1948	368,000	14,441
1949	401,000	14,162
1950	428,000	14,676
1951	434,000	14,004
1952	445,000	21,300

鉄鑄件增长得特別快，1951年比1939年多生产了将近四倍。鑄造業方面的构成有了轉变，1939年总計手工鑄造为1万吨，机器鑄造为4,500吨；1953年絕大部分产品为机器鑄造。

### 电气工業

这一工業部門同样也在战后有了长足进步，这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年度	电动机 (座)	变压器 (座)	开关設 备(吨)	供电 綫 (吨)	电 綫 (吨)	真空管 (只)	無錢电 (座)	灯泡(只)
1939	—	—	24	44	1,030	—	—	1,563,000
1946	3,156	72	—	84	3,161	—	—	1,240,000
1947	8,747	377	48	245	5,698	—	—	3,423,000
1948	17,148	746	142	405	5,896	—	23,147	3,428,000
1949	22,636	572	223	459	5,872	—	37,880	2,963,000
1950	26,110	397	263	501	6,429	—	26,001	3,753,000
1951	34,800	964	432	467	6,304	7,350	25,503	4,736,000
1952	47,690	881	550	530	4,836	53,369	27,298	5,560,000
1953	42,616	2,067	547	840	4,219	39,022	37,613	5,174,000

虽然电气工業的主要設備和最重要的电力中心还未落成。

但是从表中可以看出战后电气業方面的成就：比如 1951 年电纜生产 6 倍于战前，电灯泡的生产 3 倍于战前。許多战前所沒有的器材現在已能生产。

#### 电力的生产(百万度)

1939	1,100	1949	2,186
1946	1,144	1950	2,408
1947	1,456	1951	2,550
1948	2,007	1952	2,700

#### 非金属製造業

这是战前很少能够滿足自己国家需要的工業部門之一。战后有了突飞猛进。非金属礦的製造業的主要产品。(吨)

年度	水泥	耐火磚	建筑用陶制品	平板玻璃(一千平方)	高級玻璃	菱鎂矿	石棉纖維	电气用瓷制品
1939	894	16,683	2,895	1,678	12,000	32,887	—	300
1946	696	18,686	2,729	1,734	11,000	12,601	—	161
1947	1,088	25,252	4,205	2,201	14,991	38,458	309	403
1948	1,169	33,416	5,386	2,470	17,276	51,721	749	492
1949	1,288	41,335	5,013	2,894	19,864	87,934	1,111	601
1950	1,219	40,940	5,839	2,182	17,364	59,269	958	894
1951	1,159	35,254	7,086	3,775	19,440	89,915	1,523	1,232
1952	1,313	35,862	7,059	3,415	20,333	37,782	2,506	1,047
1953	1,281	51,608	6,896	3,267	20,038	122,517	3,748	1,059

#### 煤的生产(吨)

1939	6,973,000	1949	12,107,000
1946	6,804,000	1950	12,866,000
1947	9,291,000	1951	12,042,000
1948	10,724,000	1952	12,098,000

## 化 学 工 業

在战前化学工業有一些較大的生产無机酸, 盐酸, 人造肥料等产品的工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化学工業的构成沒有重大的轉变。有一些新的工厂建立起来了, 但是化学产品的需要也同样地增加了。因此化学产品这部分在对外貿易中沒有增減。

化学工業产品的發展如下: (吨)

年度	硫酸	盐酸	純碱	燒碱	碳酸鉀	硫酸銅	人造肥料	肥皂
1939	14,100	1,190	22,296	14,513	54,920	12,833	72,770	11,668
1946	26,122	789	20,677	5,958	17,671	12,498	51,785	13,113
1947	36,849	2,252	31,623	17,332	24,688	22,565	69,009	15,369
1948	45,530	3,838	35,050	18,560	41,059	20,318	79,631	12,349
1949	44,654	3,566	35,141	18,582	38,399	16,827	80,707	12,542
1950	40,427	3,893	31,884	18,625	40,593	13,730	66,518	14,588
1951	40,864	3,947	30,505	19,132	37,829	16,976	58,691	16,743
1952	32,272	3,970	33,004	20,248	39,684	14,358	60,717	21,224
1953	40,275	3,668	34,358	22,545	41,346	15,133	93,713	21,068

硫酸和盐酸主要依金屬加工和硫酸銅工業中的再生产而定。它的产量随着金屬冶炼業的金屬产品的提高而提高, 同时也和硫酸銅产量的提高相应。另一方面碳酸鉀和氰化鉀主要是用来輸出。由于对外貿易的市場沒有和国内市場同样的扩大, 因此这两种产品主要仍停留在战前的水平。

## 木 材 工 業

到战前为止, 南斯拉夫有着大量的木材儲存。因此木材工



業是最發展的工業部門之一。戰前南斯拉夫擁有 3,954 個工廠和企業，在木材工業方面計損失了 570 個工廠，占總數 15%。

年度	總數 (立方 米)	針葉樹木 料 (立方 米)	闊葉樹木 料 (立方 米)	鑲嵌板 (立方 米)	膠合板 (立方 米)	藝術木 料 (平 方米)	提煉品 (噸)
1939	2,073	—	—	—	—	—	—
1946	952	—	—	—	—	349	—
1947	1,869	1,437	432	—	13,972	428	7,309
1948	3,106	2,386	720	—	15,294	660	8,459
1949	3,219	2,596	623	—	13,369	887	8,719
1950	2,960	2,351	609	—	13,982	795	8,113
1951	2,263	1,695	568	6,622	13,932	918	9,214
1952	2,122	1,612	510	6,164	14,945	668	9,689
1953	2,107	1,631	476	6,681	15,431	1,556	9,823

#### 鋸木業產品(立方米)

1939	2,073,000	1949	3,219,000
1946	952,000	1950	2,960,000
1947	1,869,000	1951	2,263,000
1948	3,106,000	1952	2,122,000

木材工業的個別品種產量停滯，其他的下降，同時只有膠合板產量提高了。這是木材儲量減少的結果。因此南斯拉夫日益向着生產膠合板和藝術木料方面發展。

#### 造紙工業

造紙工業生產情況的擺動尺度如下：(噸)

年度	木材	纖維	紙和紙板	紙漿
1939	9,853	28,324	50,210	5,896
1946	8,558	12,456	32,253	3,968
1947	11,057	20,050	53,314	5,151

1948	16,710	22,134	58,228	6,754
1949	17,605	22,886	58,044	6,826
1950	19,156	26,522	57,067	7,604
1951	21,002	31,452	55,860	7,213
1952	14,989	34,162	49,240	5,262
1953	18,993	36,053	59,268	7,180

## 紡織工業

紡織工業是南斯拉夫最發達的工業。紡織業中就業工人有8万至10万人,占加工業的工人总数的22%。可是該業也有許多缺点,生产能量存在着不平衡的現象。織布厂根据市場的需要扩大了,但是足够的棉紡厂未能相应地建設起来。

战后采取了一种进一步投資的綱領。根据这个綱領,應該平衡生产能量,并且扩大产品的范围。从下面表格里可以看出这一措施已得到好的效果。

1951年棉織品的生产达到1939年的水平,1952年沒有多少变动。可是另一方面棉紡品的产量提高到一个很高的百分比。这意味着棉紡方面的生产能力已和織布能力相适应。

年度	棉紡品 (吨)	毛紡品 (吨)	棉織品 (千平方米)	羊毛織品 (千平方米)	絲織品 (千平方米)
1939	19,018	6,558	110,617	17,143	11,300
1946	21,400	6,741	77,434	15,700	1,335
1947	27,700	10,750	144,000	21,800	3,375
1948	28,606	13,032	161,480	26,037	10,289
1949	29,156	13,324	154,905	27,941	10,877
1950	29,936	13,098	144,356	24,437	6,567
1951	26,894	13,408	122,810	23,330	4,184
1952	25,909	10,290	111,910	19,983	6,795
1953	27,720	7,671	128,712	17,291	10,544

絲織品方面可以看出有很大的变化。1951年絲織品产量非常小,与1939年产量相比为二点五比一。原因在于絕大部分絲产品視入口而定。为了其他目的所需的外匯更为重要。以后产量又逐漸上升,并在1953年达到战前水平。

### 皮革和橡胶工業

皮革和橡胶工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經可以滿足国内需要,但由于消費者的購買力很低,使生产能力不能發展。这种工業产品的需要在战后是增长了,特別在質的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个别“工人集团”(貝尔格萊德的“11月29日”工厂等)有了巨大成就,达到芝加哥和紐約等地的国际标准。这一工業生产情况如下:

年度	鞋面皮 (吨)	鞋底皮 (吨)	汽車輪胎 (只)	胶鞋和皮鞋 (双)
1939	2,000	7,600	7,900	12,800,000
1946	1,869	4,828	4,100	—
1947	1,916	8,654	27,500	12,799,000
1948	2,534	10,352	35,800	16,150,000
1949	2,767	12,327	43,500	18,105,000
1950	2,785	11,554	53,600	17,676,000
1951	2,598	10,291	63,000	13,967,000
1952	2,299	8,150	55,200	13,122,000
1953	2,440	7,668	59,600	11,245,000

### 农产品加工業

据1951年初的統計,农产品加工工業方面約有1,300个大小工厂。其中最多的是面粉厂(909家),其他是制糖厂,釀酒厂,炼油厂,面包和罐頭工厂等。这一工業完全可以滿足国内需

要。个别产品(如魚、肉等的炼制品)輸出到各邻国,并且在質量上也一直是著名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工業的构成有了显著轉变。以糖厂的生产能量来講,总数 8 家的糖厂的生产提高了,根据蘿卜的产量每年可以产糖 10 万至 15 万吨。这一工業部門的产品除去油料和啤酒由于旱灾而低落外,总的方面是不断上升的。

农業品加工業的主要产品

年 度	面 包 类 (吨)	淀粉类 (吨)	食 油 类 (吨)	酒 精 (十万块)	啤 酒 (十万块)
1939	—	—	—	—	427
1946	17,944	—	24,376	—	574
1947	21,687	4,988	24,083	—	682
1948	20,499	7,592	37,026	—	1,187
1949	21,652	9,006	23,916	—	1,411
1950	18,316	9,380	23,314	10,432	1,144
1951	21,658	9,336	20,127	10,071	1,188
1952	23,857	9,410	19,158	13,851	922
1953	28,443	2,050	26,390	7,529	568

### 烟 草 工 業

烟草工業在培育着高質量烟草的南斯拉夫农業中有着优越的原料基础。

战前有将近 30% 的烟叶用以出口,其余在国内加工。5 家工厂每年生产总值为 100 万狄那尔左右,为战前工業总生产量的 5.2%。

战后的烟草加工業情况如下:(吨)



年度	發酵烟草	烟草产品
1939	16,525	10,794
1946	—	9,638
1947	16,372	12,141
1948	39,048	16,896
1949	26,968	20,836
1950	21,343	19,270
1951	15,380	14,146
1952	24,368	12,571

人們可以看出产量上显著的减退。这是由于农业中烟草产量不平衡所致。部分是 1950 年和 1952 年大旱灾的结果。此外，对于南斯拉夫整个加工業生产額来讲，烟草产量已经适度了。

## 农 業

南斯拉夫算是一个十足的农业国。南斯拉夫的这一特点不仅是某些地理和气候条件所造成，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还没有独立。

### 战前的农村构成

四分之三以南斯拉夫居民以农业为主，但是这个数字在不断下降。在 1931 年，农、林、渔业中就业者占全体居民的 76.58%，至 1948 年已降到 68%。

南斯拉夫是人口过剩的农业国。在农业中 144 人耕作 100 公顷土地。而同样是 100 公顷土地，在罗马尼亚是 97 人耕种，波兰 91 人，匈牙利 72 人，捷克斯洛伐克 70 人，德国 52 人，法国 48 人，丹麦 36 人，英国 30 人，美国 17 人，加拿大 11 人。

南斯拉夫农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划分。在 1931 年，

10,645,980 公頃的耕种面积就有 1,986,000 經濟单位。这就是說,每个經濟单位占 5 公頃土地左右(同一时期,法国每一經濟单位是 15 公頃,英国 30 公頃,美国 80 公頃)。全部經濟单位中战前占有 5 公頃以下土地者为 67.8%, 在 5 公頃至 10 公頃之間者为 2.5%, 超过 10 公頃者为 11.7%。

平均产量是非常低的。虽然占 75% 的人口从事农业, 但这一經濟部門在全国总收入中只占 50%。

### 土地改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向农民許諾的土地改革, 在战前的南斯拉夫从未实现。战前南斯拉夫将近 40 万农户沒有自己的土地, 他們多半是农业工人。

小土地所有者們都負有債務, 負債总額达 70 亿战前狄那尔。

这种情况需要加以根本改变。还在人民革命的时期, “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即已提出。

这个原則之得以实现首先应归功于战争中和战后立即严厉执行的社会政治的改革。容許最高土地占有額为 35 公頃, 并且只限于以从事农业为职业者。超过此数的土地無代价地予以沒收。

土改后, 从已判决的人民敌人和不劳而获者那里沒收土地与森林 150 万公頃, 并将其分給贫苦农民。246,000 农户以这种方式得到 258,000 公頃耕地。贫瘠地区的农户移居到优耶伏狄那的荒地来者, 也得到了土地。将近 45,000 移居的农户得到 258,000 公頃耕地。和土地一齐交給农民的还有無偿的农具, 对于移民并且給了住宅和所有附屬于田庄的建筑物。

战后农民的一切債務也同时一笔勾消了。

1953年5月联邦国民議會通过了有关人民财产的土地基金和有关分配土地給与农业机构的法律。法律规定，人民财产的土地不得轉讓。超过10公顷以上的全部私有耕地归作人民财产，参加农业土地基金。

新的措施一方面对任何人剝削人的现象作了頑强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是全国向土地基金方面过渡的一种努力，以便創造大农业經營，和工厂一样建立工人自己的管理組織。土地获得者将按土地的质量，付出由于土地基金法而得以經營的那部分面积土地的适当代价。

### 农业中的合作社方式

战后在南斯拉夫为了扩大和巩固合作社而作了很大的努力。由农业生产者所組成的合作社在經濟生活中有着最大的意义。因为在南斯拉夫沒有大农场、合作社和农庄，使用农业机器和技术沒有可能，也沒有为提高农业生产的較大的經濟組成形式。通过农业中的合作社，农民作为生产者而联合起来。

人們可以将农业中的合作社分为两个范疇：

(一)农业合作社

(二)农民生产合作社

在农业合作社中，农民保持着他們的私有土地，为了共同出賣农产品和共同劳动而在合作社里联合起来。共同的手段是提供农业器械和机器，帮助农产品的加工，帮助选种和供应种子，为合作社社員买进工业品和其他产品。

在生产合作社中，农民作为生产者而联合起来，并将他們的土地、农具和牲畜帶进合作社，共同完成工作并按工作量付給工資。入社的社員保有他的土地的股份和他所帶來的农具和牲畜。在所有农民生产合作社中，每家可以保留自己的一塊“宅

旁园地”（这是很小的私人财产，其大小在合作社条例上有规定）。

1953年初根据关于改组合作社的法律，农民们有充分的自由，自己决定采用什么形式组织他们的合作社。关于合作社内部的组织，政府不加以明文限制。

1953年底，南斯拉夫有7,170个农业合作社，共有社员3,271,918人。1,258个生产合作社，共有社员244,237人，此外还有237个专业合作社（果树、渔业、畜牧），有社员35,152人。

### 丰饶的地区

南斯拉夫的果树面积总计占32%，如伏尔伏丁那，斯洛文尼亚和多瑙河、沙瓦河、摩拉瓦河和慕拉河的大河谷土地的一半以上是畜牧区。亚热带区域沿着亚得里亚海而伸延到马其顿。这里种植着小麦、玉蜀黍、特别是亚热带的工业作物，棉花、烟草、胡麻、鸦片、油料作物等等。

主要作物是粮食，工业作物，蔬菜、饲料。下表是这些作物总的播种面积的百分比。

年度	粮食	工业作物	蔬菜	饲料
1931	87.9	2	5.9	4.2
1939	86.3	2.8	5.9	5
1945	84.7	2.9	7.2	5.2
1948	82.3	5.1	5.5	7.1
1951	78.9	5.9	6.8	8.9
1952	81.6	4.5	6.2	7.7

一眼就可以看出粮食的巨大比重和不相称的饲料和工业作物的比重是南斯拉夫经济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絕大部分是小麦的种植(在整个国土上,特别是在伏尔伏丁那, 斯洛文尼亚, 波沙維納, 馬奇瓦和波木拉夫耶), 其次是玉蜀黍(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亚占欧洲的玉蜀黍产量的主要部分), 大麦, 燕麦和大米。在工業作物中占首位的是大麻, 亚麻, 向日葵, 糖萝卜, 蓖麻, 棉花, 烟草(1939年种植了18,937公頃, 1952年30,056公頃)。

南斯拉夫也种植了各种不同的医疗植物。人們很难找到像南斯拉夫这样有着适合这些植物發育的优越条件的国家。

### 果 木 業 (株)

結果的树木	1939	1952
李 子	43 803,000	55,420,570
苹 果	8,912,000	8,896,330
杏 子	4,695,000	4,840,513
核 桃	2,859,000	2,333,626
橄 欖	4,689,000	3,998,995
各种水果	8,731,000	8,704,629
总 計	73,689,000	83,689,663

南斯拉夫的李子和苹果是特別有名的。李子的年产量总计5万車皮。

### 葡 萄 园 業 (公頃)

#### 葡萄园業的發展

	1939	1952
塞爾維亞	95,080	124,820
克羅地亞	85,767	87,738
斯洛文尼亞	27,651	22,640
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	3,870	3,689
馬其頓	8,466	10,581
門的內哥羅	1,148	764
总 計	212,982	250,232

## 畜 牧 業

	1939	1945	1948	1952
馬	1,278,500	766,100	1,050,000	1,102,498
騾	20,700	27,200	34,200	30,524
驢	132,300	110,800	161,200	159,879
牛	4,322,400	3,494,100	5,295,900	4,826,682
水牛	38,300	56,550	78,300	64,116
羊	10,281,900	7,045,700	10,602,600	10,518,084
豬	3,564,000	2,639,800	4,128,000	3,989,769

## 漁 業

在亞得里亞海魚類很多，將近 350 種。但是捕獲的魚類 60% 至 70% 是青魚類。最著名的是：鯡魚、青花魚、金槍魚等。其次是鮫魚，占總捕魚量的 25%。戰前每年魚產量為 7,200 噸。青魚類約占 5,000 噸，其他魚類約 2,000 噸。貝類，梭子魚，海蟹約 200 噸。1952 年產量提高到每年 10,700 噸，也就是提高 50% 以上。從事捕魚業的人數將近 2 萬人。絕大部分魚產（約 50%）由私有制漁民所提供。國家漁業捕魚占 27%，合作社占 23%。

## 銀行和信貸

### 聯邦國家銀行

全國所有銀行與貸款業務集中於國家銀行，它發行鈔票並保護國內幣值、經營外匯業務並管制外匯、經營國內匯兌、籌措短期的或長期的資金和經營信用貸款。

國家銀行的全國中樞設在貝爾格萊德。在南斯拉夫人民共

和国的首都有六个共和国的中樞。它們的營業机构是散布在全国各区的分行，总計有 450 处，国家銀行全国中樞的首腦是总监，共和国中樞的首腦是总經理。

### 信 貸 業 务

款貸資本的来源是銀行的現金收入，它包括資本的总基金，企業和机关日記賬上所未动用完的基金，企業中用于自由支配部分的基金，居民們的节余，子女教育儲金，合法的、行政上的儲蓄等等。国家通过銀行完成对工業中主要部門的投資計劃。

法律規定何種資金为長期貸款，何種为短期貸款。

### 投 資 的 筹 集

1947 年至 1952 年期間的財政情况有如下表：（百万狄那尔）

年 度	預算資金	銀行貸款
1947	36,718	734
1948	45,415	928
1949	58,783	1,176
1950	51,432	1,029
1951	44,502	890
1952	43,300	866

上表不包括人民防禦方面的投資。

### 幣 制

南斯拉夫的發行貨幣的职能屬於联邦国家銀行。流通的貨幣有紙幣和鑄幣。

流通的紙幣票面的狄那尔有 1,000、500、100、50、20、10、5 和

1 不等。貨幣有 5、2、1、0.5 狄那尔不等。

由于保持貨幣的周轉和生产范围与速度的协调，使幣值得到保証。

貨幣周轉(百万狄那尔)			
1945	17,811	1949	45,396
1946	20,501	1950	53,946
1947	29,686	1951	47,760
1948	39,466	1952	49,935

狄那尔的对外价值相当于 2.9622 毫克黄金。这个等价从 1952 年 1 月 1 日生效，据此确定外匯牌价。

狄那尔对外匯的比值：

100 捷克克朗	600 狄那尔
1 英鎊	840 狄那尔
100 法国法郎	85,714 狄那尔
1 美元	300 狄那尔
100 瑞士法郎	6,850,561 狄那尔

## 对外貿易

南斯拉夫在最近三年来对外貿易情况如下：(百万狄那尔)

年 度	出 口	入 口	总 額
1950	46,263	68,358	114,621
1951	53,602	114,860	168,463
1952	73,957	111,924	185,822

这样一种連續的飞躍对于一个在 1950 和 1952 年遭遇旱灾的国家說来，不是沒有意义的。



## 出 口

1952年在出口中占最主要地位的是植物产品，特别是玉蜀黍，为出口总值的27.1%。其次是各种矿砂，金属，金属产品，这一部分占出口总值的25%。其中主要出口项目是：精炼硬铅，电解铜，黄铁矿，铬，锌，铁铝氧石，镉，水银，银的合金等等。同时也有加工的产品输出，特别是钉，镰，镰刀，洋灯，容器，火爐，金属装饰物等等。出口中居第三位的是木材，占18.7%；第四位是牲畜和畜产品，占10.5%；第五位是食品工业产品，主要是李子干，油浸鱼，烟草，酒，玉米粉等。其他在1952年出口项目中有重要地位的是药品和化学产品，占3.2%，非金属和矿物占2.6%，再其次是润滑油，沥青，纤维素，纸板等。

南斯拉夫出口的重点仍然是未加工的，或简单加工的产品，可是在输出中，高贵的加工产品逐渐增加了。农产品和矿砂在1951年的输出中占出口总额的94.2%，在1952年占93.3%。

## 入 口

在南斯拉夫进口的构成中占最主要地位的是高贵的加工产品，占总额的46.4%，未加工的产品占28.3%，简单加工产品占25.3%。

南斯拉夫和外国经济关系越来越频繁。1952年向南斯拉夫输入的国家已由1951年的50个国家扩大为58个。

1952年在南斯拉夫出口中居首位的是西德，占23.6%，其次是美国，占14.6%，英国为4.8%，瑞士为2.6%，埃及为1.1%等。

1952年向南斯拉夫输入货物的有40个国家，而1951年只有35个国家，在输入中，西德居首位，占总额20.2%，其次，美国

为 19.3%，法国为 7.6%，奥地利为 6.8%，以及英国，土耳其等等。

1952 年貿易結算方面呈現出 3,796,700 万狄那尔的債務。1951 年債務更为增大，总計为 61,258,000,000 狄那尔。債務的一大部分通过外国的經濟援助加以平衡。对外貿易結算中的債務仍然很大。1952 年的旱灾使得平衡結算中的付款問題更为迫切。

## 国内貿易

战后头一年，在国内貿易方面对于貨运和为个人需要而分配的貨物的行政管理方面是有特点的。农民有义务将他的产品中的一部分依照預先規定的，显然低于市价的价格供給国家。絕大部分必需品是根据購物券卖给消費者的。

在战后时期，作为一般缺点而存在的这样一种制度是不可避免的。

1951 年，人們过渡到一种新的貿易制度。貨物的轉运和分配按照供求的作用而發展。取消了对購買的約束和購粮券，因此市場价格就根据供求情况而自由地形成。

在商業中，支付工資采取如下方式：規定工資总額，然后按照职工劳动地位的重要性和劳动方式，按照每个人劳动成績来分配。

## 交通与通訊事業

南斯拉夫的交通事業有各种形式：鐵路、海运、內河航运、公路、航空、邮政。

## 鐵 路 交 通

國內交通中鐵路綫全長在整個交通綫中占 85%。

鐵路網是由四種不同軌距的鐵路綫所構成的。情況如下：

	軌 距	百分比
標準軌	1.435公尺	73.0%
窄 軌	1.000公尺	1.4%
窄 軌	0.760公尺	22.0%
窄 軌	0.600公尺	2.8%

整個鐵路網中除了 100 公里的一段使用電氣機車外，其餘都是蒸汽機車。

貨車車皮統計：

年 度	1939	1945	1946	1950
輛 數	53,524	5,600	42,723	63,112

### 鐵 路 綫 和 交 通 工 具

	1939	1945	1946	1952
鋼 軌(公里)	10,522	4,405	10,531	11,587
機 車	2,295	400	2,079	2,368
客車廂	5,189	520	3,610	3,890
貨車廂	53,524	5,600	42,723	64,664

	1939	1945	1946	1950
鐵路綫(公里)	10,522	4,405	10,531	11,561

## 海 運

南斯拉夫在亞得里亞海東岸，海岸綫以直綫量測為 750 公

里(如算上所有曲折的实际长度,計有 5,500 公里,这說明在發展海上經濟有着优势地位)。南斯拉夫有大量的港灣。

今天远洋交通的發展主要是利卡—苏沙克港(年約200—300万吨),西貝尼克(30万吨),斯普利特(30万吨),波洛采(22万吨),杜布罗夫尼克—格魯茲(26万吨)。

利卡是最重要的出入口港灣。这里可以同时停泊 20 只大型远洋輪船和一大批沿海輪船。

在西培尼克同时可停 4 只大型远洋輪船,斯普利特 3 只,波洛采 2 只,杜布罗夫尼克 9 只。

南斯拉夫商船队拥有輪船 183 只,总吨位为 25 万吨。

### 內河航运

最主要的內河埠头如下:

沿多瑙河有貝尔格莱德,斯末德雷伏,普拉豪伏,瑙維,桑博,伏考瓦尔。

沿薩瓦河有貝尔格莱德,薩格勒布,波桑斯基,沙瑪茲,布罗德茲科,西薩克。

沿德拉瓦河有奧西耶克。

### 公路交通

南斯拉夫的公路不仅具有經濟意义,并且由于它絕大部分是通过風景秀丽的地区和古迹,对旅行也有很大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大战后对于公路的翻修和現代化方面曾給予很大的注意。应该提出的是,在战后新型的貝尔格莱德—薩格勒布的全长 400 公里的新型公路已完工了。

下表是摩托化車輛的数字:



車 輛	1938	1948	1952
公共汽車	943	589	1,127
汽 車	13,561	6,203	6,378
摩 托 車	4,286	11,351	15,973
載重汽車	7,666	8,952	11,332
拖 車	153	2,405	1,498
特殊車輛(如油罐車等) ——		1,067	1,394

本表中未列入陸軍的輜重車輛。

### 航 空 交 通

南斯拉夫民用航空在 1950 年有 12 條國內航綫和 2 條國際航綫。1952 年國際航綫擴展為 6 條：

- 貝爾格萊德——沙隆尼基——康士坦丁諾波爾
- 貝爾格萊德——薩格勒布——蘇黎世
- 貝爾格萊德——斯柯普耶——沙隆尼基——雅典
- 貝爾格萊德——薩格勒布——格拉茲——法蘭克福
- 貝爾格萊德——薩格勒布——慕尼黑——巴黎
- 貝爾格萊德——倫敦

空中交通事業比起戰前有着巨大的進展。1939 年計載運旅客 12,687 人，1950 年為 86,555 人。

### 郵政、電報和電話

戰前南斯拉夫有 4,019 個郵政局，1945 年為 2,308 個，1950 年為 3,802 個。郵政用載重汽車的輛數在 1938 年是 120 輛，1953 年為 270 輛。

各城市的電報電話綫路在 1939 年是 28,500 公里，1954 年是 31,700 公里。電話用戶 1939 年為 46,000 戶，1954 年是 77,000 戶。

## 关于南斯拉夫的一些統計数字

(根据 1955 年南斯拉夫手冊)

### (一) 人口(1953年統計)

全国	16,927,000
男	8,211,000
女	8,716,000
每平方公里平均	66人
人口增长年率	約 30 万人

### (二) 主要城市 and 人口(1953年統計)

貝尔格萊德(首都)	470,000
薩格勒布	350,000
卢布里雅那	138,000
薩拉耶窩	136,000
斯普利特	122,000
鉄托格勒	16,000

### (三) 全国职工人数(1953年統計)

部 門	职工人数	連家屬在內
工業	530,000	1,165,000
礦業	128,000	336,000
建築業	199,000	505,000
運輸、郵电和倉庫	162,000	477,000
商業、旅館、 銀行、保險	240,000	573,000
預算机关、自由職業	466,000	1,072,000
林業	57,000	167,000
共 計:		
產業工人	1,076,000	2,650,000

非产业部門职工	706,000	1,645,000
合 計	1,782,000	4,295,000
占人口百分比	10.5	25
手工業者	425,000	961,000
农民	5,179,000	10,134,000

失業人口有451,000人，連家屬有1,537,000人。

#### (四) 政治团体和工会會員(1953年統計)

共产主义者联盟	608,000人
社会主义劳动人民联盟	7,775,000人
工会	1,457,000人

(按工会會員在1955年已达180万人)

#### (五) 工人管理机构(1954年統計)

工人委员会	10,350个
有會員	201,296人
每个委员会平均有會員	20人
企業管理委员会	10,087个
有委員	54,462人
每个委员会平均有委員	5—6人

(按企業管理委员会是工人委员会选出的执行机构名称)

#### (六) 工業产量

类 別	1939	1954
电力(百万度)	1,173	3,440
煤炭(千吨)	7,032	13,645
鋼(千吨)	235	616
鋼材(千吨)	3	19
生鉄(千吨)	301	356
原油(千吨)	98	880
生銅(千吨)	42	30
精鉛(千吨)	11	67
鋅和鋅粉(千吨)	5	14

类 别	1939	1954
汞(千吨)	378	498
水泥(千吨)	878	1,340
工业机器(千吨)	5	23
农业机器(千吨)	2	9
载重汽车(辆)	0	1,651
电力发动机(瓩)	4,300	231,000
硫酸(千吨)	23	60
纸张(千吨)	35	50
棉纱(千吨)	19	34
棉织品(百万方公尺)	111	166
糖(千吨)	108	132
食油(千吨)	21	35
纸烟(千吨)	6	15
整个工业生产指数	100	208



## 南斯拉夫經濟發展的十年

(原載 1956 年 10 月“南斯拉夫新聞公報”)

从解放到現在这一长期間內，南斯拉夫的經濟政策有两个显著的基本特点，即：

第一，生产力迅速發展的趨勢；

第二，在这个發展中特別強調建立基本工業。

由于过去十年来的努力是放在消灭落后現象上，工業中出現了惊人的發展，个人經濟部分在全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改变了，我国的落后地区走上了进步的康庄大道，而且在所有这些物質变化的基础上，人口結構也有了改变。

下表說明主要經濟部門在全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以及 1938 年到 1953 年期間在这方面所起的变化：

	百 分 比	
	1938	1953
製造業和采礦業	19.0	42.1
農業	50.3	30.4
其他	30.7	27.5
	<hr/>	<hr/>
	100	100

同时，人口結構方面也發生了下列变化：

調查年份	人口总数	農業人口	非農業人口
1931	100	100	100
1953	121	97	200

上列数字表明，人口总数增加了 21%，農業人口的絕對数略有減少，而非農業人口則增加了 1 倍。今天我們还可以更清

楚地看出这种变化,因为这个国家的高度就業水平在1954年和1955年(当时每年差不多有10万个新手加入劳动者的队伍)达到了高峰,那就是說,是在上表第二行数字所表明的1953年的人口調查之后达到了高峰的。

生产力迅速增长的趋势在大量的基本建設投資中可以看得出来。从1947年到今年年初为止,投入到基本工業建設中的新資金的总数达到23,000亿狄那尔,也即每年平均約有2,600亿狄那尔。这样巨大的一笔投資吸收了25%左右的国民收入,在某些年份中甚至还更多些。这种基本建設投資的比率在世界上要算是最高一类的了。

这笔資金的大部分是投在基本工業中的。由于基本建設投資如此大量地增加,南斯拉夫才能在它头十年的工業發展中大大地發展它的生产力。在这种經濟高漲中,工業产量的增长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 工業产量比战前差不多增加了1.5倍

在这个过程中,基本工業的發展尤其迅速。电力生产增加了2.7倍,鋼鉄增加了差不多2.5倍,金屬工業增加了3.25倍;等等。与1939年相比,机器和工具的生产差不多增加了8倍之多。

显著的工業發展既表現在每人平均工業产量的总的增加上,表現在制造一系列的新工業品种上,也表現在建立战前的南斯拉夫实际上完全沒有的整套新的工業部門上。此外,战前的南斯拉夫所不能生产的一系列的品种今天都能生产了,其数量之多,甚至还可以供应出口。特別显著的是机器制造和电力工業的增长。

南斯拉夫从一个農業国和一个工業極不發达的国家一变而为一个拥有比較發达的工業的国家了,这种工業为它今后进一

步的發展提供了基礎。

這些都是為發展基本工業而進行大規模基本建設的政策所取得的無可懷疑的成績。這樣的一種政策同時也就不能不形成生產力發展的片面性。

與基本工業的大力發展相比較，輕工業的發展就大大地落后了，特別是就它的基本部門如紡織工業、皮革和制鞋工業以及食品工業的生產而論。然而，即使是在這些方面，每人的平均產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長，例如：紡織品產量增加了40%，皮革制品和皮鞋增加了34%，食品增加了48%。

近幾年來——從1953年起——對發展農業採取了一種增加幫助的政策。然而，在這個短短的時間內，這個政策並沒有帶來較大的農業增產。去年是一般認為產量正常的一年，農產品的數量只比1939年的水平高出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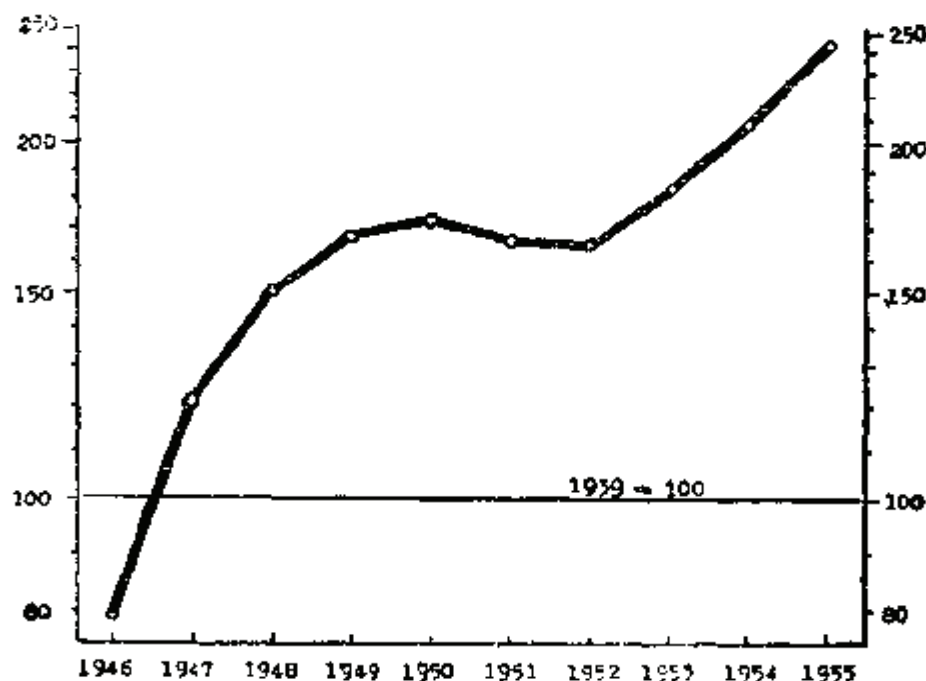
政府當局對農業也不再採取行政命令的辦法。在戰後最初的幾年內，行政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它們並沒有刺激農業的充分發展。早期的繳公糧辦法、播種計劃和其他一些行政措施都沒有實行，相反地當局實行了一種更能刺激生產和更加穩定的稅收制度以及一種較為廣泛的信貸制度，特別是讓人們能在自由銷售和自由制定價格的基礎上進行更為集中的交換，通過這些辦法為生產和交換創造了一種更為有利的經濟條件。

農民的勞動合作社也在這個時候改組了，從此經濟關係和經濟動機的原則便在它們的具體活動中很強烈地表示出來了。一般農業合作社的較為成功的全面性工作也受到了鼓勵。

在這段期間，農業比以往得到了更多的物質手段。農業上的投資從1952年的1,120億狄那爾增加到1955年的2,390億狄那爾。除了增加農業機器外，人造肥料的应用1955年比1953年增加了4倍，比1939年增加了8倍。

南斯拉夫的經濟政策的特色更進一步表現在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這一經常性工作上。在這方面主要是採取步驟增加消費品生產和加速農業發展，因而生產力發展不平衡的狀態正在，也一定會消失掉。

### 工業生產指數



在戰後的年月里，南斯拉夫的工業產量顯然有了驚人的提高，因此，在過去幾年中，它被列在生產量增加得最快的一類國家中。以1955年為例，它的工業產量就比1939年增加了1.42倍。

### 1955年開采1,500萬噸煤

近年來，煤的開采量在不斷地增加，1955年達到了大約1,500萬噸。這比1939年增加了1倍以上。

與1939年相比，褐煤增加得最多，產量增加了將近4倍。



南斯拉夫的烟煤开采得比较少。去年的煤的总产量中约有一半是褐煤,其次是木煤,占43%,烟煤只占7%多一点。这是因为我国的烟煤蕴藏量较小的缘故。

#### 南斯拉夫最大的几个煤矿

产煤的种类	矿名	产量(吨)
烟煤	拉沙	800,000
	巴诺维奇	1,200,000
	特雷波维耶耶	900,000
	卡刚尼	650,000
	查戈里耶	570,000
木煤	克里卡	2,050,000
	维伦尼耶	1,100,000
	科斯多拉茨	620,000
	科鲁巴拉	600,000

#### 基本工业产品

	单位	1939	1955
电力	百万瓩时	1,173	4,349
煤	百万吨	7	15
焦煤	千吨	—	731
原油	千吨	1	257
提炼过的石油	千吨	97	744
生铁	千吨	101	514
钢	千吨	235	805
压延钢产品	千吨	151	494
电解铜	千吨	12	25
铅	千吨	11	76
吹气玻璃	千吨	11	29
水泥	千吨	394	1,563

硫酸	千吨	23	73
肥料	千吨	73	203
农业机器	千吨	2	13
载重汽车	辆	—	1,921
自行车	千辆	—	48
锯木	千方	1,922	1,873
纸和纸版	千吨	42	72
棉织品	百万短公尺	111	174
毛织品	百万短公尺	12	26
皮鞋	百万双	9	15
食油	千吨	21	37
啤酒	千公石	427	804
烟草制品	千吨	12	16

### 电力为 1939 年的 4 倍

1955 年所发出的电力等于 4,340 百万瓩时。下表是 1939 年和 1955 年电力情况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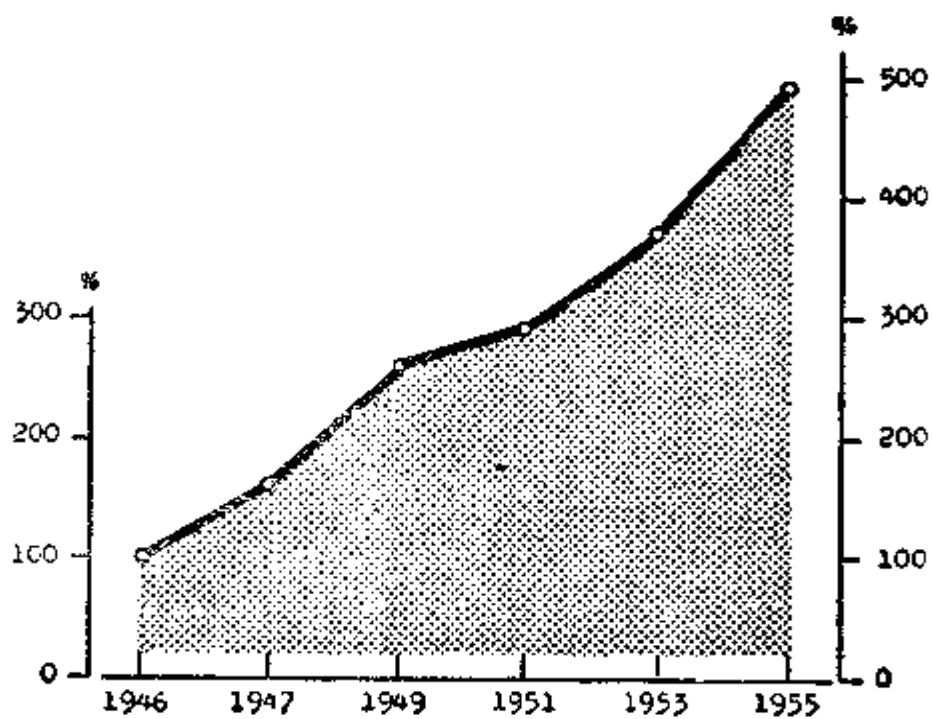
	1939年	1955年
	(十亿瓩时)	
电力总量	1.2	4.3
水力发电厂所发的电	0.6	2.4
火力发电厂所发的电	0.6	1.8
平均每人瓩时	73.0	240

上列数字表明，1955 年的电力生产几乎为战前总产量的 4 倍。电力产量这样迅速增加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建立了新的大规模的水力发电厂和必要的高压输电网的缘故。

尽管电力增加了这么多，据粗略估计，去年还缺少 2 亿瓩时的电。但是今年的情况就将不同了。只有局部的地方缺电，这

主要是因为远距离的高压輸电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緣故。

### 金屬加工工業和机器制造工業



## 南斯拉夫生活水平

(原載 1955 年 6 月 25 日薩格勒布“信使報”)

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关于第二次大会到第三次大会期間 (1952—1955) 的工会工作报告中提到职工的生活水平,下面是有关这一部分的摘要:

虽然近几年中我們的生活水平有相当的提高,国民收入按人口計算不断地上升,但仍然低于工業發达的国家。国民收入的上升是依靠我們工業生产的發展,但这种上升并不稳固,同时也不是平均地分配。最大的發展是在于基础工業,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关系經濟独立和全国發展的基础。消費品的生产却没有这样快,特别是在 1952 年和 1953 年曾有显著的停滯。

### 工業生产的發展

由下表看出工業比战前增加了一倍多,各項工業中有着相当的差别:

	1939	1954
工業总产值	100	208
工資基金	100	785
生产資料	100	193
消費品	100	181

工人管理制,行政权的削減和經濟法令更順利的起作用,在工人群众提高生产率的主动性和企業及全部經濟的發展中得到了明确的反映。



## 投資和國民收入

工業在增加國民收入方面已占決定性的地位。農業不僅是落后和產量低，而且由於兩次旱災遭受到嚴重的打擊，為了克服我國經濟落后，保證我們經濟的正常發展和南斯拉夫的獨立，我們不得不付出比其他發達的國家較大比例的巨額國防基金。1952年的國民收入的開支比例有如下表：

	英	法	挪威	南斯拉夫
基本建設	16.5	21.8	30.5	22.7
國防費用	10.0	11.6	6.0	22.3
總計	26.5	33.4	36.5	45.0

由上可見我們將幾乎一半的收入用在基本建設和國防方面，這樣的政策已經證明是正確的。現在將有可能逐漸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提高社會生活水平。去年無計劃的投資的增加，使得基本建設基金大大增加，這是價格上漲和社會生活水平降低的原因之一。

## 生活水平的其他因素

投資發展的規模，國防費用的需要和幾年的歉收使得對外收支不能平衡。這也在職工的購買力方面反映出來，因為我們的工業生產在原料供應上有困難，反過來又使消費品價格上升。

生活水平還取決於勞動生產率。雖然南斯拉夫的勞動生產率还是很低，但自從採用工人管理制以來則有些上升的趨向。聯邦統計局的數字指出1953年全部生產的增長比1951年增加9.9%，但這個百分比並不是均勻分配的。在1954年有些工業部門的生產有下降的趨向。

這些是生活水平的根本的，但不是唯一的依據。然而，當我

們对它作估价时应将职工所享受的其他一些福利計算在內。如很高的就業水平（工業部門的职工比战前多了一倍），社会保險事業的高度發展，社会公用事業的發展等也在生活水平中反映出来。

### 消費的組成

消費組成中显著的是高比率的食物消費，占50%多，小部分的收入用于工業品，住房，服务，社会及文化費用。从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的职工預算中有如下表：

每人每年平均开支

	塞爾維亞		克羅地亞		斯洛文尼亞	
	工人	職員	工人	職員	工人	職員
总收入		100.0		100.0		100.0
食品	51.8	51.7	48.2	46.4	46.5	46.6
烟酒	5.8	4.2	7.1	6.4	7.6	7.1
衣服	13.0	13.3	12.7	13.5	16.3	15.7
住房	2.3	2.4	2.2	4.9	2.0	2.0
取暖，电灯	6.1	5.5	5.0	5.2	3.6	4.8
家用物品	5.6	3.4	4.1	1.2	5.6	4.9
服务	4.4	6.4	6.2	6.9	4.6	6.1
社会文化生活	4.7	6.6	4.9	6.3	5.0	7.6
另用	6.3	6.4	9.6	9.2	8.8	5.2
面包等	190公斤		126公斤		108.5公斤	
雞蛋	50个		206个		104个	
糖	8公斤		19公斤		25.8公斤	

高比例的食物消費不仅影响物价，也影响我国的社会習慣。各种食品价格的差别大大地影响到人民吃什么的問題，由于上

等食物价格上涨，使得价贱的食品特别如面包也上涨了。与其他欧洲国家比较，我们在小麦制品的消费比率是比较高的，我们在鸡蛋，糖，肉，水果方面的消费量是低得多。为要改善城市居民的营养，我们必须增加食品的生产 and 减低它们的价格。

在工业品的价格方面也是相当的不平均。有些工业品价格比有些食品价格上涨得快，因而在工业品方面就消费得少些。在纺织品方面情形是特别的，它的指数比工业品价格的平均指数高得多。

在职工的生活水平方面基本上有两个互相依赖的令人不满意的因素：食品消费的要求和对工业品消费低。大多数职工有着同样的情况，因为他们有同样的收入，这就产生一种不良的结果，同时增加消费信贷。在1952年末有244,246人获得消费信贷，价值455,700万狄那尔，而在一年之后(1953年)人数增加到867,000人，借款1,586,200万狄那尔。在原则上消费信贷是正常的现象，但日常费用所需的借债的增长，这些日常费用本来应该在正常的收入中付出的，这乃是我们的生活水平低的结果。

### 与物价高涨作斗争

影响生活水平的其他因素还有：社会公共事业的不发达和不好的居住条件使妇女们外出工作感到困难，以及饭店食物价格很高使那些不能在家吃饭的人不得不付出很高的膳费。工会组织已尽一切可能不使生活水平下降（即使目前仍不能提高），如以设立经济食堂和相似的饭店和提起社会舆论的压力，在这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成功，只是在1954年中有几个月，当农产品价格相当的上升时，给人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加了较重的负担。

## 职工工資的購買力

下表以一个四口之家在战前的消費指数与战后的两年指数来比較，得出社会生活水平的輪廓，显示購買力的真正情形：

	1938	1952	1954
工矿业中的工人	100	179	165
职员	100	80	91

可見普通工人的处境比战前好些，工人群众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善，而职员則稍为差了一些。如果根据資历来看工資購買力，那么熟練工人剛剛达到战前的水平，半熟練的工人达到 177 这样一个指数，而不熟練工人則为 258。职员的情形是同样的，但那些不領子女津貼費的职员的情况則不同。一个单身工人的購買力与 1938 年相比只有 91%。

## 住房情形

目前在房屋方面缺 224,000 組住房，城市居民每年增加 4.3%，但住房仅增加 1.4%，1947—1953 年每年平均建造 18,300 組住屋，而每年单单是增加的城市人口所需的房屋就要 18,500 組之数，在城市中每人平均住房 11.6 立方公尺，而在别的欧洲国家中則每人平均占 15—20 立方公尺。低廉的房租妨碍房屋的發展，工会組織在尽一切可能在各地建造更多的房屋来改善住房情况。



## 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經濟关系

(根据 1956 年 12 月 19 日南斯拉夫新聞社  
出版的“經濟公报特刊”綜述)

### 一、两国貿易:

1949 年以来,南斯拉夫对美国的出口日益增加。1952 年达到最高水平,对美国的出口占南斯拉夫全部出口的 14.67%。出口增加是由于輸出战略物資(特别是鉛和銅)的增多,如 1952 年南斯拉夫輸出 11,000 多吨銅和 53,000 多吨鉛給美国。此外,由于朝鮮战争关系,有色金屬的价格急剧上漲,因此,出口額有了很大的增加。1953 年后,因国内建設的需要,有色金屬(鉛和銅)减少出口,同时朝鮮战争已告結束,銅和鉛的价格下降,这也直接影响到出口額的减少。美国 and 南斯拉夫自 1949 年以来进出口情况如下:(单位:一万美元)

年 度	出 口	进 口 (不包括援助)	逆 差	順 差	进 口 (包括援助)
1949	1,704.1	3,087.6	1,383.5	—	—
1950	2,147.9	5,061.0	2,913.1	—	—
1951	2,683.2	3,830.9	1,147.7	—	14,656.0
1952	3,614.3	2,771.1	—	843.2	7,203.0
1953	2,600.3	3,391.8	791.5	—	13,584.8
1954	2,289.6	2,275.2	—	14.4	9,482.0
1955	2,770.3	4,077.4	1,307.1	—	14,416.6
1956 上半年	1,374.3	1,732.2	357.9	—	9,576.2
共 計	19,184.0	26,227.2	7,900.8	857.6	68,918.6

南斯拉夫在美国市場同其他国家竞争是有許多困难的，因此不得不在最近两年中改变对美国出口物资的结构，但有色金属仍占一半以上，情况如下：(单位：一万美元)

类 别	1955年	占总出口 百分比	1956年 上半年	占总出口 百分比
有色金属	1,538.5	55.4	747.8	54.4
非 金 属	163.3	5.8	108.8	8
化学工业	16.7	0.6	6.7	0.6
木材工业	155.6	5.7	99.6	7.2
纺织工业	31.0	1.2	12.0	0.8
制革工业	83.4	3	36.2	2.6
食品工业	138.7	5	64.4	4.7
烟草工业	349.9	12.7	242.5	17.5
粮 食	63.0	2.3	23.4	1.7
畜 产 品	27.4	0.9	3.8	0.3
医 药 品	46.6	1.7	24.4	1.8
其 他	156.2	5.7	4.7	0.4
共 計	2,770.3	100	1,374.4	100

## 二、美援(经济援助)：

1948年后，为了解决经济上面临的困难，南斯拉夫从1950年起接受美援的数字如下：

年 度	数 字(单位：一万美元)
1950—1951	9,400
1951—1952	7,800
1952—1953	12,400
1953—1954	6,500
1954—1955	12,100
1955—1956	10,000
1956—1957	9,800
共 計	68,000

以上数字若再加上美国国会通过在 1956—1957 年给予南斯拉夫的 1,350 万美元，总计为 69,350 万美元。

截至 1954—1955 年度为止，美援是同时用来购买食品和原料的，其中包括焦煤、石油、皮革、人造肥料、化学品和医药原料等。从 1955—1956 年度起整个美援转为用作向美国购买农产品，如小麦、棉花和油脂等。

美援的形式最近也有所改变。1954—1955 年度以前为“无偿援助”，从 1955—1956 年度起开始采取贷款形式，1956—1957 年度全部改为贷款。情况如下：

	(单位：一万美元)
“无偿”经济援助	54,100 <sup>①</sup>
40 年长期贷款	9,800
南支付情况改进后将偿还的美国援助	4,800
	总计 68,700

---

① 原注：这笔援助的一部分（起初是 5%，后来是 10%）用来作为美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各种费用。

##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声明

(1948年6月20日)

致情报局：

由于被邀请派遣代表参加为“讨论南共情况”而已经召开的情报局会议，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将下述声明通知情报局会议：

南共中央一向是愿意参与情报局的工作的。但它不能派代表参加情报局的这次会议，因为它不能同意会议的议程。这是考虑到对于送给我们的议程单的问题——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南共中央意见分歧的问题——的解决自一开始时起到情报局举行这次会议为止都被放在一个不正确的基础上，理由是：

(一)联共中央致南共中央的第一封信并不是本着同志般的批评的精神而写，让南共中央可以用同样语调来回答；该信采取的形式是一种粗暴的、不公平的谴责，这种谴责，考虑到它的虚假性，我们如加接受只能有害于我们党和国家，否则只好根本不加接受。

(二)南共中央认为这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即：对于一个兄弟共产党的谴责是根据某个人的单方面的情报，或者根据孤立的引用语，而不是根据对于在战前、战时和战后曾经历过如此巨大考验的我们党的整个活动所进行的分析。

(三)联共中央所提出的某些最严重的谴责显然是根据我们党在战前、战时和战后曾向其展开斗争的反党分子的情报。南共中央认为，让过去南共中央的分裂主义派的显著的残余分子



取得联共中央的支持，是不能容許的。

(四)情报局各成員党的領導者不加批判地同意了联共中央對我們党的指控，不向我們索取任何材料，便用書面聲明對我們党加以譴責，并且拒絕考慮我們在答复联共中央第一封信時提出的論証。他們之中某些人，在他們党内廣泛的圈子中和在公開的場合，都作了對我們国家有害的行為。

(五)联共中央對我們答复它的第一封信的許多論据，連一個都沒有接受，而在回答我們那封信的時候和以後，却對南斯拉夫共产党提出愈來愈大的和完全沒有根据的指控。顯然，这种立場使我們沒有可能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來討論問題。

所有這些事實都是為什麼南共中央沒有同意把意見的分歧向共产党情报局提出的理由，因为它認為这样做只会加深而不会解决這些分歧。

南共中央指出，它曾向联共中央建議派遣它的代表到南斯拉夫來就地共同調查有爭論的問題。联共中央沒有接受這個我們認為是唯一正确的办法，而甚至在還沒有收到我們的答复以前就把分歧提給共产党情报局的其它党，即，它在把信送給我們的同時，把信的抄本送給了它們，于是所有各党，法国和意大利党除外的領袖們，就向我們送來書面聲明，通知了它們對我們党所作的判斷。

這種行為是不符合諒解精神的，也不符合共产党情报局所根据的自願原則的。

南共中央繼續保有它的信念，即，联共中央和南共中央在南斯拉夫本國直接接觸來共同討論有爭論的問題，是解决目前存在的分歧的正确办法。南共中央深感遺憾：意見的分歧在联共中央方面竟已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南共中央再一次向联共中央和情报局呼喚，要求它們同意我們关于联共中央和南共中央有

必要进行直接接触以解决分歧的主張，并为此从議程上撤消对于我們党的情况的討論，了解到沒有得到我們同意的这种討論是不正确的。

南共中央向各兄弟共产党致意，并声明任何分歧意見都不会妨碍南共忠于它同联共和其他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团结和最密切地合作的政策。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1948年6月20日

##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党 情报局对南共情况的决议的声明

(1948年6月29日)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具有一段以前的历史，从决议内容看是很清楚的。

决议的根据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若干信件。这些信件的第一封日期是今年3月27日，在该信中联共中央提出了对南共中央的谴责。这信也同时发给情报局的所有其他成员，这一事实未曾通知南共中央。此外，经由联共中央收到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支持苏共中央立场的一封信。匈共中央的信也送给了其他各国共产党。南共中央曾收到除法国和意大利外的情报局其他各国党的类似信件。南共中央指出，上述各国党接受了联共中央的立场作为它们的根据，而没有听取或倾听南共中央的意见和反驳。在联共中央的这封信和其他各国党中央来信以及南共中央4月13日答复联共中央的信之后，5月4日和22日又收到联共中央的两封来信，这些信件大体上坚持第一封信的方针。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本质上是联共中央这些信件的重复。

在这些信中，联共中央指控南共中央，并要求南共中央承认错误如下：第一，南共领导人口头上奉承苏联而暗地诽谤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第二，南斯拉夫领导人员诽谤苏联军队，苏联专家被敌意所包围，而苏联公民和尤金同志则被国家保安人员钉梢；第三，党的干部处于内务部长监视之下，党内没有民主和批评，党被一种军事领导制度所统治；第四，南斯拉夫政府希望通过问

謀討好帝國主義國家并置身于它們的控制之下；第五，黨使自己溶化在人民陣綫之中，因此不能認為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組織，它受到伯恩斯坦分子、布哈林分子和伏爾馬分子關於資本主義成分在社會主義中和平衰亡的理論所支配；第六，某帝國主義國家的大使在南斯拉夫宛如家主一般，而南斯拉夫人民的劊子手聶迪茲的親友在南斯拉夫政府和黨組織中輕易地為他們自己找到了安逸的職位；第七，南斯拉夫領導者把蘇聯的對外政策和帝國主義政府的對外政策等同起來；第八，南共領導人員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第九，德國傘兵部隊摧毀了南斯拉夫“游擊隊”司令部，結果使民族解放運動發生了嚴重危機，此後蘇聯軍隊前來援助，解放了南斯拉夫并為南斯拉夫共產黨取得政權創造了條件；第十，南共過於夸大它在戰爭中的成就，雖然它的貢獻并不超過波、捷、羅、匈、阿、保等國的共產黨。除了這些指控以外，還有在情報局的決議中所作的指控，此處不一一列舉了。

從南共中央政治局對情報局會議所提出的聲明（另作附件）中，顯然可以看出，在事情的真實情況未被証實以前，在捏造的指控沒有被從聯共中央或情報局任何其他成員黨中央真正的原則指責分清以前，南共中央不能同意以聯共中央根據誹謗、捏造和對南斯拉夫情況的無知而提出的指控為基礎來進行討論。

關於情報局決議的發表，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聲明如下：

（一）決議中的批評是基于不準確的和無稽的斷言并顯示企圖在國內外毀壞南共的名聲，在國內群眾中和國際工人運動中引起混亂，削弱南共黨內的團結和黨的領導作用。令人驚奇的是，聯共中央竟拒絕如南共中央 4 月 13 日信中所建議的就地來查核它的論斷。



(二)決議未引証任何証据而硬說南共領導方面執行敵視蘇聯的政策。關於在南斯拉夫蘇聯軍事專家遭受不尊重的待遇以及蘇聯公民被國家保安人員監視的說法，完全不符合真實情況。直到他們撤回時為止，沒有一個蘇聯代表向南斯拉夫代表提出過這種事情。蘇聯任何公民，更不用說尤金同志在南斯拉夫被監視一點，完全是虛構的。這種說法，特別是有關尤金同志的說法，其目的純粹是在其他各國黨的面前損壞南共及其領導的名譽。

相反的，正如4月13日給聯共中央信中所說的情況才是正確的而且是根據南共黨員給我黨組織的許多報告和我國其他公民的報告的，即自從解放到現在為止，蘇聯情報機關企圖召募他們。南共中央過去認為，現在仍認為對待一個以共產黨為領導政党和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這種態度是不能容許的，這將導致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公民道德敗壞，削弱和損害政府和黨的領導。南共中央過去認為，現在仍認為南斯拉夫對蘇聯的關係必須完全建立在信任和忠實的基础上，依照這個原則南斯拉夫國家機關絕未想到對蘇聯公民釘梢或施行任何監視。

(三)決議批評了南共關於進行階級鬥爭的政策，特別是南共在农村的政策。在這方面，引用了列寧著作中著名的章句。南共中央指出，它的限制农村資本主義成分的政策，是受列寧著作中的上述和類似章句的指導的，決議的起草者——假若他們曾花些功夫的話——可以從黨所印發的文件和文章中讀到這些章句並相信這一政策是實際執行着的。因此，決議和聯共中央所作的指控事實上是無的放矢；客觀上，這些指控不可避免地會鼓舞和支持城乡反動分子和資本主義分子並引起人民中的混亂，使他們誤認為南共中央及其政策應對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間的客觀困難，特別是供應方面的客觀困難負責。南共中央認為以從鬥爭不同時期摘引的個別言論，或以個別的、

孤立的和歪曲的事实为根据来估量它的活动，是一种不能容許的方法。南共中央認為在估計南共的政策时，同估計其他各国党的政策时一样，必須首先考虑的是党的实践——党在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有没有获得成就，从整体来说，资本主义成分是在削弱还是在增长，国民經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是在削弱还是在加强。

(四)南共中央不能不以深深的憤慨拒絕下列断語，即所謂南共領導者們离开正路而走上富农的路綫，走上取消南共党的道路，所謂党内沒有民主，所謂在党内培植軍事領導的方法，所謂在党内党员最基本的权利被踐踏，和所謂党内对缺点的最温和的批評都遭受严厉的报复，等等。曾經在千百次战争中無畏地面对死亡的党员，能够容忍党内存在这样一种对人和对共产党员都不配的事态嗎？所謂党内不允許批評的断語和类似的說法是对我党每个党员的可怕的污辱，对党的英勇的和光荣的过去以及对它現在为我国的重建和發展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貶低。南共中央強調指出，不能因为某些党组织尚未举行选举，就認為党内沒有民主。这些都是南共所經歷过的战争时期和战后剧烈發展的遺留物，其他党和联共党在他們历史中也曾發現同样情况。

至于說党正消失在人民陣綫中，党的領導者走上富农党的道路的断言，它在客观上将导致以工人階級为領導而在統一的組織人民陣綫中所實現的劳动大众联盟的瓦解，导致党从劳动大众的孤立。这个断言的根源除已提到的以外，还在于对南斯拉夫党和人民陣綫之間的关系的誤解和对人民陣綫在南斯拉夫的實質及工人階級在人民陣綫中实现領導作用的方式缺乏了解。在这个問題中，分歧之点也不在于事实，而在于捏造的断言，随之以利用列宁名言来进行爭論，而列宁的这些名言在南共

党内没有一个负责人曾加以争辩。事实以及在整个战时和战后所作的许多声明——不仅是共产党人所作的而且有人民阵线中非共产党人所作的声明——都表明：第一、共产党在人民阵线中是领导力量；第二、共产党并未在人民阵线中消失，相反地，党正在思想意识和政治上提高人民阵线的成员群众，以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精神教育他们；第三、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实际上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假若如决议中所说，杂色的政治团体，如资产阶级政党、富农、商人、小企业家之类在人民阵线中起着任何重要作用，或者假若它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间的联盟或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取得协议的一种形式的話，那么情况当然不能是这样；第四、党并不是接受人民阵线的纲领，而是人民阵线从共产党得到它的基本方针和纲领，鉴于党在阵线中的领导作用，这是很自然的。

南共中央在这里要强调指出，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人民阵线成员群众在思想意识和政治上的进一步团结以及党的政治活动同人民阵线的活动和阵线的全面性活动的联系。

最后，南共中央委员会指出，它的成员中绝大多数不是指定的而是选举出来的。联共中央在它的计算中没有把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中分别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们计算在内。为了这个理由，政治局的七个委员应该加添到联共中央在一封信中所提到的南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二十二个委员的数目上去。南共中央因为在战争中丧失了它的十个中央委员，已主要从南共中央候补委员中指定出七个同志来补足他们的空缺，以此来责备南共中央，是很奇怪的。

南共中央拒绝关于南共党的非法地位的断言，认为这个断言是可笑的和不真实的，并认为这也证明了对南共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时间的工作方式缺乏了解。南共的工作方式是我党

长期革命实践的具体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这些工作方式在實踐中業已表明是正确的并且曾是党贏得群众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南共中央拒絕下述指控,認為它是沒有价值的,即所謂一个土耳其式的制度在南共党内占着統治地位,和所謂南斯拉夫的領導者們对党隱瞞“对中央委员会的不正确政策的批評,对党和人民隱瞞对赫布朗和朱約維奇同志采取殘暴措施的真正理由”。南共中央不能公布联共中央的信件,直到联共中央自己已这样做的时候。然而,南共全体广大的、活动的成員知道联共来信的内容,而且全体黨員都被告知了赫布朗和朱約維奇的案件。

情报局成員党的代表們不向南共中央詢問詳細情况就把赫布朗和朱約維奇置于他們的保护之下,南共中央对于这种做法不能不表示惊奇。南共中央不能了解为甚么像朱約維奇这样的人竟受到庇护;他在1937年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曾和哥尔吉茲一道被开除出南共中央委员会,或者像赫布朗这样的人,他在烏斯塔希警察<sup>①</sup>前有过叛卖的行为,在这件事情上他欺騙了党;这些人曾在南共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加以破坏并对南斯拉夫的發展和工業化的进展进行怠工。这难道不是对于宗派活动,对于叛徒和对于反对南共党的破坏活动的鼓励嗎?中央委员会为此将它有关赫布朗和朱約維奇的材料作为一个附件公布。

(六)南共中央拒絕下列断言,認為它是荒謬的,即所謂最近南斯拉夫領袖們过急地和为了煽惑的緣故采取了小規模企業和小商店的国有化措施。事实上,这些措施是在联共中央对南共中央提出指控之前六个月就已准备好了的,并且是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和發展的结果。

① 克罗地亚恐怖組織,战时被德国占領軍用为警察。——譯者



从卡德尔同志演說中割裂出来的引語只有一般的意思，而他的整个演說事实上說明了党在現阶段逐漸排挤資本主义成分的路綫。

联系到所有这些，可以了解，为甚么情报局机关报、苏联报纸和其他某些党的报纸最近沒有發表关于南斯拉夫經濟發展中的成就的任何新聞，例如，进一步削弱資本主义成分的措施、实施計劃的成就、团結在人民陣綫之中的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在大会前夕的群众竞赛等等。但是事实終归是事实。对这些事情保持緘默，并不能掩盖对于南斯拉夫政府的經濟政策和南共中央在經濟事务方面的路綫的武断的和毫無根据的批評。

(七)南共中央断言，它的領導者中沒有一个人認為，南斯拉夫在其建設社会主义和維護独立的斗争中不需要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援助。只有那些丧失了和现实的一切联系的人們才能够作任何这类的断言。南共中央在这里必須強調說，这种援助和合作的扩大不仅有賴于南斯拉夫，而且也有賴于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南共中央認為，这种援助必須同南斯拉夫的对內和对外政策联系起来，而不能同它不能接受以謊言为基础的毫無根据的指控一事联系起来。

所謂南斯拉夫領導者們正准备向帝国主义作讓步并在南斯拉夫的独立問題上和帝国主义討价还价的断言，全然是捏造并且是反对新南斯拉夫的悲痛的誹謗。

然而南共中央必須強調指出，在某些人民民主国家里，党和国家机关已無端地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侮辱南斯拉夫人民、他們的国家和国家代表，这种行动导致上述的合作的削弱，导致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恶化。南共中央并不認為自己将来对于类似行动必須保持緘默。

(八)南共中央并不認為，它之拒絕討論它所未犯的錯誤，在

任何方面損害了共产党陣綫的團結，这个陣綫的團結并不是基于对捏造或制造的錯誤和誹謗的承認，而是基于一个党所采取的实际上是否是国际主义政策的这一事实。然而人們不能忽視这个事实，即情报局已經破坏了作为它的基础的、規定了每个党可以自願作出結論的原則，然而情报局不仅逼迫南共的領導者們承認他們並沒有犯过的錯誤，而且号召南共黨員在党内进行叛乱，粉碎党的統一。南共中央决不同意以捏造和缺乏互信的非同志态度为基础来討論它的政策。这样的基础是非原則的，而在这种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样意义上，南共中央才認為，它在討論中不是处于平等地位，它不能接受在那种基础上进行討論。而且联系到以上情况，南共中央坚决拒絕关于南共已轉人民族主义立場的責难。南共以它的整个对内和对外政策，特别是以它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斗争和对南斯拉夫境内民族問題的正确解决，已証明了事实是恰恰相反的。

由于以上不公正的指責，我們的党，我們的工人階級和劳动大众，整个南斯拉夫的人民和他們無私的英勇的斗争，已遭到历史上最大的不公正。

南共中央很清楚，联共中央对南共中央的指責将被敌人的宣傳利用来誹謗苏联、南斯拉夫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然而南共中央宣布，它对所有这些現象不負責任，因为它並沒有以自己的任何行为来挑起这种現象。

南共中央号召黨員在实现党的路綫和更加加强党的團結的斗争中團結一致，号召團結在人民陣綫中的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大众在建設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国方面繼續更加坚决地工作。这是用行动来充分証明上述指責的不公正的唯一道路和方法。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

1948年6月29日貝尔格萊德

## 对于苏联和对于社会党的态度 的言論(摘要)

铁 托

### 关于对苏联的态度

1948年11月11日，铁托在塞尔维亚科学院庆祝会上說道：

“如果認為我們对苏联在我們的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估計不足，如各方面对我們的譴責那样，那就完全錯了。沒有，我們並沒有过低估計苏联的这个作用，因为苏联担負了反希特勒联盟战争的重担，相反地，苏联在偉大的解放战争中挽救了世界，使其摆脱了可怕的悲劇，从奴隶制度下拯救了世界許多国家的人民，其中也包括我国各族人民。”（塔斯社，1948年11月18日）

1950年3月5日，铁托在斯科普里选举大会上宣称：

“我們不想在各方面都仿效苏联。我們所要仿效苏联的是肯定的东西，但我們不想采用否定的东西。”（塔斯社，1950年3月7日）

1951年10月7日，铁托在兰科維奇渥市所作的演說中說道：

“我們知道，对我們的这种恶意是从何而来，对我国的这种仇視是从何而来。这不仅是对我国領導人的仇視，而且是对全国的仇視。这种仇視之产生，是由于他們离开了在自己国内建

設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仇視我們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铁托文集”第5卷，第329頁）

1951年11月28日，铁托接見“战斗报”記者时宣称：

“第一个極重要的区别在于，我們在建設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在苏联却蜕化为独裁的官僚主义帮派領導的国家資本主义的国家……那里既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又沒有文化上的民主以及生产上的民主……在苏联，民族問題只是在理論上解决了，但實質上，什么也沒有实现，除了形式上成立了各个共和国，而統治这些共和国的只是一个民族，即俄罗斯民族……在苏联，人是一个普通的单位，而人民是無个性的群众，他們必須毫無怨言地执行站在人民头上的領袖的命令。”（“铁托文集”第5卷，第423頁）

1952年8月20日，铁托在回答土耳其新聞記者的問題时說道：

“俄国人所引起的冲突，以及我們同苏联的决裂之所以發生，首先是因为專关經濟和政治的屈从的問題，总之，是关于我們喪失独立的問題。”（“铁托文集”第6卷，第185頁）

1952年11月，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宣称：

“同志們！ 1948年，我們同苏联之間所發生的糾紛不是什么偶然的現象，就是說对各个国家間的关系上經常發生的某个問題的爭論。更不是两党之間的爭論，或者是如苏联的領導人所想像的那樣，是由于对两党的指导者的关系而引起的爭論，是由于我們似乎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而引起的爭論等等。这种糾紛首先是想用武力奴役一个独立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同这个国家即南斯拉夫之間的糾紛。这种糾紛有它深刻的思想內容，并且是在我們已經明白了苏联对我国



所抱的目的、而苏联已經看出我們是不会讓我們的国家受奴役的时候發生的。这种糾紛是在大家都十分清楚地看出苏联不仅在自己的国内政策,而且在外交政策上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則,并公开走上帝国主义擴張主义道路的时候發生的。”(“鉄托文集”第6卷,第260頁)

1953年12月,鉄托对“人民军队”总編輯說道:

“我們看到我們方面的很大的优点,因为我們要建立而且已經建立了一支军队,它是人民的一个組成部分;西方和苏联的军队是人为地脫离了人民的生活的,这些军队的軍人是純粹用侵略的和軍事的精神教养的,不允許他們在军队里进行一般的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等等。”(1953年12月22日“战斗报”)

1954年10月17日,鉄托在接見意大利安莎通訊社記者时說道:

“外国报刊刊載,鉄托回到莫斯科,这是錯誤的。”(1954年10月17日“战斗报”)

### 关于对“社会党人”的态度

1951年2月28日,鉄托在接見路透社記者时宣称:

“但是不言而喻,我認为英国工党是工人党,它在實踐中是以社会主义科学的因素为指南,尤其是在解决本国的經濟問題时。”(“鉄托文集”第5卷,第156頁)

1952年11月,鉄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說道:

“我們党,即它的領導,开始同各国社会主义組織,例如英国工党、法国、比利时、西德、挪威、瑞典、印度、緬甸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的領導人物建立关系……我認为,現時由于在对某

些重要問題的看法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及由于我們党的作用和組織性質，因而也就根本談不上我們党在形式上加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但是我相信，在許多具有国际性質的問題上，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合作是可能的。”（“鐵托文集”第6卷，第283頁）

## 在印度国会的講話(摘要)<sup>①</sup>

——1954年12月21日

鐵 托

鐵托總統今天在印度国会發表的演說中說，南斯拉夫人民长久以来就对印度人民怀有友情。他說，尤其在最近，由于人們知道印度人民不仅正努力保證他們費力贏得的獨立，而且还努力為維持和平和同其他国家和平共處而進行着不屈不撓的斗争，这种友情就更加發展了。

鐵托總統表示他相信印度人民也了解南斯拉夫人民所作的同样努力，相信这就是这两个国家紧密團結在一起的原因，尽管地理上的距离把它們分开了。他又說，他是应印度政府的邀請而來印度的，为了同印度的政治領袖們就对两国利益有关的問題交換意見。

### 否認要建立“第三集团”

鐵托總統說，有人認為我这次訪問和加强南斯拉夫同印度之間的关系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第三集团，这种推測是不正确的。他說，这些人只能看到世界是分裂为集团和势力范围的。我們希望增加这样的国家和人民的数量，就是他們以保衛和平为第一位，他們为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关系，为国际的和平合作，和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積極和平共處而斗争。但是我們并不設法以建立一个第三集团来实现这点，而是通过積極合作，反对世

---

<sup>①</sup> 这是南斯拉夫通訊社的一篇电訊。

界上那些消極現象，這種消極現象始終像一把暴君的劍懸在人类的头上，以毀灭来威胁着人类。

鐵托總統指出：他知道印度領袖們為了盡最大力量促使目前的世界緊張形勢緩和而在國際方面所作的努力。他說，我們認為我們對於許多不同的問題都抱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我們渴望團結我們的力量為保衛國際間的和平與和平合作而鬥爭，並不是什麼意外的事。

### 南斯拉夫外交政策

鐵托總統敘述了南斯拉夫人民的解放鬥爭和他們在戰後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的簡史。他講到決定南斯拉夫目前外交政策的因素，並陳述了南斯拉夫之所以堅持拒絕參加任何集團以及堅決保持獨立的原因。他接着說明南斯拉夫為什麼反對把世界劃分為各個集團和勢力範圍，為什麼支持具有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間積極共處的原則，為什麼不僅贊成局部的整體化而且也贊成世界規模的整體化，他認為那些落后的國家在它們的開發工作上應該得到合理的援助。

鐵托總統然後提到外國有時候提出的某些反對意見，這些意見大意是說，南斯拉夫是一黨制度，沒有西方國家那種形式的民主等等。鐵托說，如果人們真正想要仔細地和毫無偏見地觀察我們整個社會的發展，以及了解它的話，他們就不可能不了解到這個事實：我已提到的這個發展的種種要素為一個新型的，和正統的即西歐所理解的那種民主不同的民主提供了物質的基礎。我們的民主是奠定在物質基礎上的，它的成長是和國家的經濟發展分不開的，並且是和這個發展平行的，它必然達到和經濟發展所達到的同樣程度的發展。很明顯，當我們國家還是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占優勢時，換句話說，在經濟企業還不是由工人



集体管理之前，这种民主不可能得到發展。虽然国家資本主义制度在一定时期內是必要的，但是在以后的阶段中，它变成我們的社会生活在沿着民主和社会主义路綫向前进一步的發展中的一个阻碍。铁托接着說，你們清楚知道，在整个的那个时期中，我們面临着各种客观性質的困难，我們被迫来应付起源于外国的一些極其严重的阻碍，这些阻碍是采取了封鎖以及其他的形式的。結果是，我們的进展比假使我們只需要来克服內部的和物質上的困难所会有有的进展較为緩慢，并且沒有那样容易。

铁托总统說，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奉为指針的一直是、今后仍将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則。我們認為，在战后国际关系的緊張气氛中，这个組織提供了唯一的可能办法，使緊張局势有了某种程度的緩和，減少了世界上的战争危險，解决了不同的爭端，減少了这些爭端的数目。在这方面，联合国的努力到現在为止取得了显著的成績。如果联合国具有普遍性，換句話說，如果它的會員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的話，它的成績显然还会更大得多，因为联合国只有在普遍的基础上才能起人类期望它起的作用。联合国之所以到現在为止不能解决国际上的一些重要問題的原因，首先在于組織結構方面有某些缺陷，例如安全理事会中的否决权等等。原因还在于把世界分成集团的趋势在这个組織本身的机构中表現出来，这种趋势妨碍它正确地进行工作。

总统追述道，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南斯拉夫对于西方盟国对它采取的远非友好的态度感到失望，特別是在和約方面，在这方面，对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貢獻和牺牲是很少考虑的，于是它就主要倚靠苏联的支持，而苏联那时的外交政策也不太注意新南斯拉夫的利益。铁托又說，这一切只是加强了我們的这种信念：我們首先必須靠自己，我們一定不要使我們自己成为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的附屬品。这还加强了我們的这种信念：如果我

們要維持我們的獨立，在建立我們的國家和一般說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方面遵循自己的方針的話，我們不能容許任何國家干涉我們的內政。

鐵托總統又說：這些實際上就是 1948 年使蘇聯以及以後使東歐的其他國家廢除它們和南斯拉夫所訂立的條約，斷絕其他聯繫，並且開始進行一種持續了五年多的暴烈運動的基本動機。

鐵托說：在這種分裂以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只經過了某些修改，這就是說，我們依照我國的具體情況，更堅決地走着我們自己建設的道路。我們的外交政策也沒有任何本質上的改變。但是，由於經濟上的封鎖，從經濟方面來說，我們就不得不轉向西方。應當承認，由於若干原因，我們在那里得到了支援和諒解，我們一刻也沒有在我們的外交政策方面或是我們的內部發展方面損害我們的獨立。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嚴重地面臨過任何這種情況，我們也絕不會接受這種情況，即使這樣做意味着更多的困難，和引起比我們在 1948 年所遭受到的還要嚴重的後果。我們對這種性質的問題所抱的一貫態度，不僅反映了領袖們的立場，而且還受到我國全體人民的支持。當他們作為他們自己命運的主人的權利已處在危急的關頭的時候，他們始終是準備接受他們獨立的最大犧牲的。

鐵托總統然後列舉了南斯拉夫所以贊成國家和人民之間有平等的關係的理由和它反對任何方面干涉他國內政的理由。他強調指出第一個理由是，這種干涉是侵犯並且危及其內政受到干涉的國家的獨立。第二，這種干涉極其生動地反映了把世界劃分為勢力範圍，而這種勢力範圍的劃分是充滿新戰爭的危險的。第三，這種干涉說明了把世界變成一個整體是不可能的，因為以附屬國家和民族為一方，統治國家和民族為另一方實行整體化是不可想象的事。

鐵托說，正是从这个总的态度出發，所以我們一貫反对殖民主义制度的原則，因为殖民主义具有所有我所說过的那些消極因素。因此我以为，今天所有的禍害都是起源于四个因素，这些因素使人类产生了很大的恐惧和不安，而目前，在所有进步男女看来，它們不仅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荒謬的。这些因素是：第一，国家与国家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間，关系不平等；第二，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干涉通常实际上正是一些大的和有較高度發展的国家进行的；第三，世界分为势力范围和集团；第四，殖民主义。在这些因素在国际关系的實踐中消除以前，人类是不会对它自己命运沒有恐惧的。

鐵托總統表示了这样的信念：按照軍事和意識形态界綫来組成集团，是充滿着对世界和平最严重的危險的。他又說，这些集团是企圖在軍事力量和潜力上取得优势，以使用武力，而不是以和平的外交方法——一切方法中最合乎邏輯的方法——通过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联合国来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問題。和集团以及按照意識形态界綫来划分世界的政策相反，如果人类要避免史無前例的浩劫的話，我們这方面認為，有着不同制度的民族和国家共处是真正有可能的。我所想的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共处，而是一种積極的合作，和一种对于各种問題的和平的和商議的解决办法，以及消除所有那些傾向于妨碍大小国家之間进行广泛合作的因素。此外，这种共处不仅仅是实际上有可能，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們要避免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及由于使用如原子彈和氫彈这些最新式的大規模毁灭手段而引起的种种严重后果的話。

鐵托總統然后說，直到目前为止，不仅高度發展的国家，还有那些还没有达到特別高的發展水平的大国經常利用落后国家的貧穷和苦难来达到干涉落后国家的内政的目的。和这种作法

相反，我們認為，落后的国家應該得到物質和技术的援助。归根到底，这种援助不仅对得到援助的国家有利，而对給予援助的国家也是有利的，因为后者的生产能力已經达到了目前最高的可能的水平，并且由于它們的产品不能被銷納的原因，正面临着停滯，或者甚至倒退的危險。

鐵托總統追述，南斯拉夫以極大的物質牺牲的代价，建立了一支从欧洲的标准說来可以称为是强大的軍事力量。鐵托說，这是必要的，因为我們国家处在失掉它的独立的危險境地。我們的軍事力量的唯一的目的現在是以后也永远是保衛南斯拉夫人民的和平發展和独立。換句話說，我們的軍事力量無論如何永远不会被利用来达到任何侵略的目的的。相反地，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軍隊，仅是它的存在就在欧洲的我們那一部分起巩固和平的作用。

鐵托總統談到南斯拉夫和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之間关系的正常化時說，在这問題上，苏联先提出倡議，接着現在的苏联領袖們發表了一項声明說，在1948年曾錯誤地对待了和譴責了南斯拉夫。这种声明以及終有一天将为世界所知道的其他的声明有助于使我們接受建立正常关系的建議，尤其是因为这是和我們的願望一致的，我們的願望是和所有遵照平等的原則願意和我們合作的国家进行合作。

鐵托接着說：正常关系的建立已因这种事实而大大地促进了：苏联的領袖們已宣布他們尊重平等关系和不干涉我国內政的原則，并且他們接受我們的观点：不應該牺牲我們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来和他們建立正常关系。和其他东欧国家——保加利亚、羅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也正趋于正常和得到改进。因此，我們和这些国家的疆界上所存在着的緊張局势——往往达到惊人的程度——現在已經平



息，情况也已趋于正常。这给我们自己和这些邻国都带来了相当大的慰藉，并且在全世界来说，即意味着对和平的加强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尽管南斯拉夫自1948年以来遭受了巨大的物质上的损失，我认为它已通过使它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和得到改进而提供了实际的证据，证明它是愿意为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利益而接受相当大的牺牲的。另一方面，我确信，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改变不仅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在斯大林逝世以前，苏联曾有人故意对南斯拉夫进行捏造的指责。这种情况在同样的或是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改变的结果，这种改变是苏联现在的领袖们所实现的，虽然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这种改变，尽管我认为承认这种改变只能对他们有利。

铁托总统最后表示希望南斯拉夫和印度之间的友好合作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并且表示深信印度人民在建设和发展他们的国家以及走向更幸福和更光明的前途中将克服他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 在南斯拉夫国民議會关于 外交政策的报告(摘要)<sup>①</sup>

(1955年3月7日)

铁 托

铁托总统今日在南斯拉夫国民議會會議上重申：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维护和平和国际和平和合作、尊重各国和各民族的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通过联合国并且在联合国协助下和平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問題。铁托总统說：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就是我們决心维护我国人民得来不易的独立。它的基础就是使人类免遭又一場战争的願望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积极共处的观念，因为要想避免又一場世界大战，别的办法是沒有的。

铁托总统今天在国民議會两院联席會議就南斯拉夫外交政策和南斯拉夫去年同其他国家进行經濟合作的情况作了报告。

核子能使用問題：

铁托总统指出用于战争的核子能对人类的威胁。铁托說：假如我們把核子能的發現和应用只看作是提供了造福人类而不是毁灭人类的無限远景的手段，那么，我們就可以明确解答国际关系應該朝什么方向發展的問題。这告訴我們：国际关系必須朝着各国在一切促成人类繁荣的問題上联合和合作的方向發展。

铁托总统說：我們認為：如果把这种巨大力量用作摧毁和毁灭的手段，那就会給人类劳动的成果和人类带来巨灾慘禍。我們相信：保証人类进步的唯一正确途徑是：把核子能用于和平工

<sup>①</sup> 这是南斯拉夫通訊社的一篇电讯。

業用途，以提高生活水平和鑷除貧困和落后現象。当然，这首先就需要揭開籠罩着这一全人类的成就的秘密帷幕，就需要讓一切国家都可以利用这一成就。另一方面，我們觉得，有必要銷毀現有的一切核子武器并且把这些材料用于动力用途，为人类繁荣服务，而这在技术上是輕而易举、可以很快办到的。因此，我們主張只把核子动力用于和平用途，当然，要有有效的国际管制，这将使得这种惊人的科学成就不致被任何一方濫用。

鉄托总統接着告訴議員，南斯拉夫已經获得相应的手段来創造把核子动力用于生产用途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已經在貝尔格萊德、薩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建立了設備精良的机构来进行核子研究工作。相应的野外研究机构在發現核子原料方面已經获得非常良好的成績。这些成績显示，南斯拉夫拥有充足的原料来把核子动力用于和平的工業用途，而且現在它能够直接从事走向生产核子动力的工作。所有这些成績总的說来是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获得的。外国科学机构殷勤接待南斯拉夫科学家和外国科学家来訪問南斯拉夫科学和技术中心，这些条件都是很宝贵的，但是仍然是不够的。

鉄托总統強調說，除非科学普及而且享有自由，否則科学就不能順利地發展，这是世界上科学思想和經驗發展的基本条件。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阻止自由交換这一方面的經驗和發表这一方面的成果，实际上是普遍地束縛發展和絞杀进步。鉄托总統說，因此，我們希望，而且我們正在努力同那些与我們具有同样願望的一切国家人民充分合作，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平等、互助和努力实现一个共同的偉大事業；使核子能提供的新的巨大的幸福泉源为人类服务。这是我們要实现的計劃，我們一定以我們的一切力量致力于这一計劃。为了使这个計劃成为可能，我們正在采取一切可貴的步驟——組織方面的和其他方面的——以

使南斯拉夫可以参加一切具有上述目的的国际組織。

铁托总统强调說，他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知道，核子能不是某一大国的壟断品，他們知道，在他們这样的小国中，也存在着珍贵的核子原料，和利用人类头脑的这一卓越發明来使南斯拉夫人民繁荣的真正希望。

关于联合国：

在談到联合国时，铁托总统强调說，这个国际組織成立的宗旨是使各国在政治上因結一致，在各方面合作，不幸的是，它到目前为止并未能滿足人类各个方面的希望，虽然，它在許多重要的、緊張的問題上确乎起了重大的作用。它曾經通过积极的決議，成功地消除了使世界局勢恶化的因素，或为解决国际經濟、文化、衛生及其他方面的合作上的各种問題創造了条件。不幸的是，在某些繼續使欧洲、亚洲以及全世界的緊張局勢保持下去的最重要的問題上，联合国沒有获得成功。它沒有能够在政治上把世界联系起来，而只有从这个起点出發，才能够成功地解决国际問題。

铁托总统認為，联合国失敗的原因在于阻碍国际关系發展的某些矛盾，即联合国为之而創立的建設性的傾向和某些大国的自私的傾向之間的矛盾，这些矛盾正在繼續不断地發展，以致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背道而馳。某些大国正在开始忽視和輕視这个組織，把解决最重大的問題的斗争焦点轉移到联合国以外，并越来越沉迷于軍备竞赛。

铁托总统着重指出，这是極端危險的道路，因为它意味着把世界分成敌对的陣营，意味着狂热地儲存大規模毁灭性的武器，这是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一种潜在的威胁。铁托总统追述說，南斯拉夫能够理解为什么各国在目前不安全的时代里那么关心它們的防御，但是，他接着强调說，南斯拉夫反对把世界分成集团，



反对軍备竞赛。因为經驗已經証明，軍备竞赛通常总是引向战争的。

南斯拉夫政策是以積極共处的原則为指南：

鐵托說，如果要获得一个持久的和平和国际合作政策，那末，它必須以積極共处的基础为基础，以和平合作和国际問題的耐心的、逐步的解决为基础。積極共处的政策基于承認这一事实：就是今天世界已經成为一个整体，世界任何一个部分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世界的另一部分，这就是說，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積極共处的政策就是同一切国家进行合作，不管其社会結構和政治制度的不同。

鐵托总統強調指出，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上的因素——有人在国际生活中把这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上的因素用作恫嚇的因素——往往是一种掩盖着各种消極的和危險的趨勢的帷幕。

鐵托总統表示相信，積極共处的政策会使联合国的原則复活，并会創造加强联合国本身的作用的条件。積極共处的政策是取代国际关系重新尖銳化、取代一次新的冷战浪潮以及取代它会带来的一切危險的唯一真正的办法。由于这一理由，爭取真正地 and 广泛地实现積極共处的努力今天就成了和平政策的根本任务。

鐵托总統在指出南斯拉夫的政策是以積極共处的原則为指南的之后說，南斯拉夫去年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了若干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加强它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的国际威信方面。他說，去年成功地解决了的最有意义的問題是：（一）巴尔干三国协定，即希土南三国协定的締結；（二）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間的所謂的里雅斯特自由領土問題的解决；（三）在使得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匈牙利、保加利亚、羅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同其中

某些国家已締結了一些关于貿易交換和其他問題的協定；(四)去年还到希腊和土耳其作了国事訪問，目的是为了更加熟悉情况，加深并扩展互相合作和友好关系；(五)訪問了亚洲友好国家印度和緬甸，这次訪問在进一步加深和扩大相互关系和合作，和对加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方面都有非常良好的成績。

鐵托总統在談到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三国合作的良好前途时，表示他相信三国人民知道怎样保衛它們在邦交上已經取得的成就。他駁斥了种种心怀叵測的預言者的說法，說他們的說法是沒有根据的。这些人不仅預言，而且据說还觉察到巴尔干協定签字国間的关系正在恶化，他們心怀叵測地預測協定的解体，把南斯拉夫說成是掘墓人。

鐵托总統說：为了答复这种說法，我願意在这里着重指出：我們的邦交不但沒有恶化，而且大有更加巩固的可能，尤其是当巴尔干諮詢議會今后开始工作的时候。

鐵托总統追述說：这个純区域性的協定的締結，为的是保障三国独立和三国国内和平發展，为的是緩和局势和巩固欧洲这一地区的和平。同时，这也意味着对巩固全世界的和平的貢獻。这个協定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文字，并且規定有种种合作——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軍事的。这个協定是說明有可能不是消極共處、而是在共同有关的各种問題上进行極为密切的合作的典型例子。

鐵托总統着重指出：巴尔干協定首先应当促进签字国内部关系的巩固和互相建設性的合作，促进它們防务的巩固，不过不是趋向具有某些其他目的的軍事集团，这种軍事集团是会使得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緊張起来的。巴尔干三国防御能力的大小也首先取决于建設性互相合作的坚决程度。

鐵托总統追述說：去年解决了的里雅斯特問題，这不仅有助

于緩和和穩定歐洲這一地區局勢，而且有助於全歐洲局面的大大穩定。他着重指出：這個問題的解決使得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有可能大大改善關係，因而已經解決了某些問題，而其他問題正逐漸獲得解決。鐵托總統說：我相信，我們正在走向實現愈來愈好的關係和全面的相互合作，這沒有疑問對兩國有很大的好處，特別是在經濟方面。

#### 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在談到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時，鐵托總統強調指出，南斯拉夫同這些國家的合作正本着友好和諒解的精神正常地發展着。

鐵托總統說，我們的努力集中於爭取在維護和平和實現完全互相尊重主權、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等原則方面同西方國家實行最具建設性的合作，並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實行全面的合作。

鐵托總統強調說，南斯拉夫沒有忘記某些西方國家在最困難的時刻給予南斯拉夫的物質和道義的援助，以及它們現在為了減輕我國的經濟困難仍在給予我國的援助；在這方面，必須着重提出整個三國援助，特別是美國所給予的援助。

鐵托總統說，他認為過去一年中得到了發展的南斯拉夫同西方國家之間的合作是對彼此有利的，是對整個和平事業有利的。我們必須繼續執行這種同西方國家友好和合作的政策，因為這同我們奉行的在平等、尊重獨立、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進行國際合作的總的政策是一致的。換句話說，我們的合作是符合於我們關於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間實行積極共處的主張的。

鐵托總統強調指出，過去一年中南斯拉夫外交政策所關心的不僅限於在雙邊、三邊的基礎上發展同西方國家的合作，而且也反映在爭取在歐洲範圍內實行更加廣泛的、更加全面的合作方面。在國際大家庭走向更加密切的經濟和政治的結合這種總

的發展趨勢之下，在世界不同地區的区域規模上存在着一切進行國際間建設性和積極的合作所必不可少的條件。這種區域性的結合是使在世界規模上的結合成為可能的一個必要條件。

鐵托總統宣稱，南斯拉夫指出某些目的在於實行歐洲合作的計劃和嘗試的缺點或片面性，而建議在內容和範圍上都要在更加廣泛的基礎上進行合作。他說，在這種活動方面，南斯拉夫政府認為首先必須發展和擴大具備有利條件的進行合作和更加密切的結合的方式，因此它已經決定派遣一個駐歐洲經濟合作局的常駐觀察員。

鐵托總統說，如果一部分基本問題——這些問題仍然是在歐洲和一般說來在全世界造成不安定和不穩定的根源——得到解決，歐洲合作就會獲得強大的刺激力量和大為方便。他又說：“我認為，首先是德國問題。我國以前指出，以後將仍然指出，必須承認要實現這個國家對統一的權利。必須使它能够統一成為一個主權國家，它還將擁有保障自己獨立的必需的手段，因為承認這個權利不僅有利於德國人民，而且有利於和平和創造歐洲更廣泛合作的可能性。”

鐵托總統指出，解決奧地利問題也可以促進同一目的。這個問題在實質上僅僅是各集團現有政策的反映。鐵托說，這個勤勞的小國人民有資格獲得完全獨立，這樣一個行動將提供正當的希望；在歐洲也有一種踏上新的道路的願望。他又說，他滿意地歡迎這兩個鄰國共同表示要進一步發展和加強睦鄰關係和友好合作的願望。

與中蘇和東歐民主國家的關係：

鐵托總統說，南斯拉夫同蘇聯和東歐國家關係的正常化，不但對穩定歐洲這一部分的和平是一個重大的貢獻，而且有助於緩和世界普遍的緊張局勢。到目前為止，人們一直認為潛在沖



突的最危險的焦點之一是在這個地區。但是，隨着關係的正常化和逐步改善，這種猜疑必須加以拋棄了。

錫托總統說，也終於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兩國不久即將互派外交代表。

談到同東歐國家的關係，錫托總統說，已經同它們締結了解決邊境事件的協議，所以現在整個說來南斯拉夫的邊境情況是正常的。此外，在這些國家中的南斯拉夫少數民族的境況，同以前幾年的境況比較起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它仍然沒有達到應當有和能夠有的程度。

錫托總統追述道，東歐國家去年停止了反南斯拉夫的宣傳和移民團體公開敵視南斯拉夫的工作。他說，差不多所有這些國家的特點都是努力在各種會議上向共產黨員們和一般人民解釋同南斯拉夫關係的正常化，說得好像南斯拉夫仍舊像被人指責的那樣，不過它現在多少了解到它的妄想，它正在努力改正自己。錫托說：這是胡說，而且這種說法自然可以使得我們懷疑那些國家的最負責人士關於 1948 年對南斯拉夫的不公正指責所當面發表的言論的誠意。當然，莫洛托夫在向最高蘇維埃發表的報告中關於南斯拉夫的部分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並且是和那些言論有幾分一致的。我們相信這是再度以我們為犧牲而向他們的人民蒙蔽真相的一種嘗試。現在是依照事情的實際情況和發展情況解釋事情，而不要半途阻撓正常化並且使得人民更覺疑惑不置的時候了。這一類的表白並不能有助於改進關係，相反的，卻只能阻礙這個過程，在對我國做了一切不對的事情以後，在對我們加上了一切我們並無過錯却不得不接受的侮辱以後，要改進關係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錫托總統追述道，南斯拉夫和東歐國家之間已經建立了某些文化上的和體育上的聯繫，已經同蘇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

克和波兰訂立了数达 1,900 万美元的补偿貿易协定，最近并簽訂了貿易和支付协定，同时同保加利亚和羅馬尼亚进行的談判正接近完成。

鐵托指出南斯拉夫認為这一些正常化的迹象都具有積極意义，它希望关系的正常化除了产生上述積極結果外还将导致互利的合作。

与印緬的关系：

鐵托講到他对印度和緬甸的訪問时表示南斯拉夫希望同这些国家直接地和在联合国範圍内进行最密切的和最广泛的合作。他然后追述道，在新德里和仰光会談结束后發表的宣言中所表示的共同綱領，具有一种远远超过南印关系和南緬关系範圍的重大意义。这些宣言否定某些人士所說它們在建立任何“第三集团”或“第三势力”的想法，反对目的在于加剧国际关系的傾向，它們的唯一目的就是在目前情况下改进国际关系和为和平和国际合作的长期政策奠定基础。

鐵托总統說：他在回南斯拉夫的途中曾同埃及总理納賽尔和埃及其他首脑人物作了很恳切而有用的会談。他說：这次会談証实了这种想法：准备对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基本問題采取積極而富于建設性的态度的国家的範圍是越来越大了。鐵托总統接着追述說：他接受了請他今年去埃及作国事訪問的邀請，他認為这次訪問将有助于进一步發展埃及和南斯拉夫間的友好关系并且有助于稳定世界和平。

鐵托总統在詳談对印度和緬甸的印象时指出：这两国的經濟和社会發展过程說明：它們正走着自己的道路来实现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他說：多半是社会主义者的緬甸領袖們和以尼赫魯为首的印度領袖們，都認識到这一事实：他們的國家只有經由社会主义建設才能实现國家的充分發展和繁榮。

鐵托總統指出發展南斯拉夫同印度和緬甸貿易交流、技術互助合作以及文化關係的有利條件；他接着指出，對於東方和中東各國也存在着同樣的或者類似的可能。他特別着重指出南斯拉夫和埃塞俄比亞關係的良好發展，賽拉西皇帝的友好訪問南斯拉夫對這一點是大有幫助的。

鐵托總統還提到同拉丁美洲若干國家友好關係的良好發展，去年南斯拉夫政府貿易代表團在訪問拉丁美洲期間簽訂了一系列的貿易協定，這鞏固了和擴大了這種友好關係。此外，南斯拉夫去年同印度尼西亞、泰國、利比亞和阿富汗建立了正常外交關係，擴大了南斯拉夫的對外聯繫。

對外貿易：

鐵托總統接着談到同外國的經濟關係和貿易發展，在過去一年中，這方面的目標是同外國，特別是同美國和西歐，在最近還同東歐各國，發展最廣泛的貿易和其它聯繫。去年，締結了幾項新的貿易協定和安排，擴大了現有的一些協定，因此現在南斯拉夫同 41 個國家有着經濟協定，並同另外 8 個沒有締結任何正式協定的國家進行着貿易。在經濟合作發展的範圍內，某些南斯拉夫企業締結了關於在其他國家進行各種根本性的及其他建設工作的新合同。

鐵托總統說，南斯拉夫對外貿易中的中心問題是支付赤字，這主要是由於幾年的封鎖、三年的干旱和加強國防的努力所造成的。他又說，現在正在予赤字以進一步的注意，辦法是努力增加出口，削減進口，把短期和中期的貸款變成長期的債務。赤字問題由於英美法三國的三邊經濟援助和美國政府在小麥方面的特別援助而得到緩和。

鐵托總統在敘述了南斯拉夫經濟去年在增加出口、減少支付赤字和擴展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方面的成就後，提到有必

要采取一定步驟來消除國家經濟生活中的某些弱點，特別是對貿易企業工作中的弱點。

鐵托總統在演說結束時表示希望議員們批准南斯拉夫至今為止的外交政策，這是“一個爭取和平和保持我們的獨立的政策，一個同尽可能多的國家在政治上進行合作的政策，因為只有在各國之間實行全面、積極的合作才能既有助於共同利益又有助於世界和平事業。”



## 答丹麦一杂志編輯問(摘要)<sup>①</sup>

卡 德 尔

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总書記爱德华·卡德尔說，社会主义已贏得世界范围的历史性胜利，这就是說它正在完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阶段，日益成为人类日常經濟实践的問題。他強調說，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正在对国际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思想 and 实践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爱德华·卡德尔这番話是在答复丹麦的进步刊物“国际展望”的編輯向他提出的一些問題時說的。今天的“战斗报”刊載了上述刊物3月份1期中發表的这篇談話的相当大的部分。

这家杂志編輯提出的第一个問題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劳工运动分裂的問題。国际劳工运动走向了两个發展方向：第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它重視保證政治發展的民主性質，从而，忽視了或者無視了用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对社会結構作断然的改革的方法来加强民主的重要性。第二是集权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它重視生产的改变，从而不仅無視了俄国革命所創造的民主的进一步發展，反而破坏了它，并且带来了一种集权的政治状态。对民主和社会主义两个内容同样重視的南斯拉夫能够在这两种傾向之間起調解人的作用嗎？

卡德尔強調說，在他看来，在原則上統一国际劳工运动的問題并不在于上述这两种傾向的机械的結合，而在于克服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两种排他的教条。虽然，作为社会主义运

<sup>①</sup> 这是南斯拉夫通訊社1955年4月7日的一篇電訊。

动的总方向，只有一个社会主义，但是它的运动的路綫和方式是五花八門的，在不久的将来大概不会使它們比現在接近一些，而且相反地还会使它們更加分歧。

南斯拉夫無意在政治意义上或是在謀求这两种傾向的机械的結合方面进行調解。如果它在任何事情上是必要的話，那只能是下面一項原則：国际劳工运动應該承認，正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的路綫和方式——这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条件——的可能性是社会主义合作的基本原則，正像休戚相关的命运和所有这些过程的相互依賴一样。

卡德尔強調，在国际劳工运动的發展中的这两种傾向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在产生它們的具体的社会、經濟和政治环境中有着深深的根源的。在国际社会主义發展的最初阶段，当爭取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建立起来的斗争剛剛开始，它的經濟因素仍旧非常薄弱，也就是說十月革命剛剛打开了社会主义的紀元的时候，这两种傾向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的理論討論不仅是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中心問題，而且又只縮小成为走向权力的两条可能的道路的問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卡德尔着重指出，今天情况是完全不同了。国际社会主义已經从社会主义的政治行动和从它的物質發展中取得了丰富的經驗。現在有一些国家經歷了这个革命，但是并不是在平均地和通过同一的形式發展。現在还有一些国家，它們的劳工运动已經通过古典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結構贏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和多少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社会主义成就。除此之外，而且在整个事情中最重要的就是世界水平上的社会主义的經濟因素已經發展到这种程度；資本主义的提倡者的政治地位正在越来越动摇。这特別适用于許多剛剛取得独立，或正在从殖民压迫下解放自

己的落后国家，因为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按照旧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可能发展的。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潜在地也是社会主义的。

卡德尔强调，社会主义已经赢得了世界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它正在完成观念形态和政治的准备阶段，并且正在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经济实践的问题，这种经济发展正在迫使人们在经济的死胡同中寻找一条出路，或者是有意地采取社会主义解决办法或者是通过自发行动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根据最后分析，它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

卡德尔强调，现在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毫无疑问地在对国际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劳工运动的实践作出很大的贡献。由于建立适合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殊民主形式，它毫无疑问地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这两种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它靠了它的存在和它的国内发展的性质“进行了调解”，它国内的发展表明了在目前的社会运动中为克服停滞现象的非常进步的社会努力，产生停滞现象的原因就是：这个运动受到由国家官僚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倾向，或某种过时的政治形式或信条的束缚。

卡德尔对于第二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这个问题是：是否南斯拉夫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从南斯拉夫本身，他说明，在比较狭义的经济意义上来了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是可能的。卡德尔又说，然而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把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简单地联系起来，因为这种机械的联合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牵涉的问题是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基础上的一种有几分新的民主机构的有机发展。

卡德尔说，调和的古典的政党议会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然而，生产的垄断也先以政治的垄断

为必要条件。把古典的国家机器和生产的国家壟断凑合在一起,这必然会产生官僚专制主义。因此,民主制度不是通过盲目坚持过时的民主形式而获得的,而是通过一起打破生产中的壟断、卡特尔和托辣斯壟断以及官僚国家壟断而获得的。

卡德尔强调指出:因此,现在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管理国有化生产的问题,即怎样克服国家壟断以及导致政治壟断的官僚政治的问题。卡德尔认为,正是民主制度的命运决定于这里,而不是决定于口头上对“一党”和“两党”制的优点的争辩。

卡德尔强调指出,在南斯拉夫存在着以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劳动人民自治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制的新形式。南斯拉夫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生产者的自治正在开始消除国家的壟断,并以把不久前的领工资的工人变成一个参加直接使用和管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平等参加者的办法来使他们成为自觉地进行创造的人。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政治稳定的基础是通过自己的党来影响国家的主要决定的私有者的固定而巩固的地位,那末社会主义的政治稳定的基础就是通过自己的自治机构——工人委员会和公社——部分地直接决定各种问题和部分地影响由自治机构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中央社会机构的决定的个体劳动生产者的确定的和巩固的地位。卡德尔强调指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南斯拉夫在这个过程中仅仅走了第一步,而且南斯拉夫迄今的经验证明它是走着正确的道路。

卡德尔在回答关于建立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关系和政治民主制的问题时说,南斯拉夫曾以在企业中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办法作为建立直接民主制的机构的初步工作,现在,这种新制度的这种基本因素正在逐渐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的事例中。企业中的工人委员会是所有职工自行管理作为公有财产的企业



主机构。

卡德尔举出了較低級的管理机构公社作为第二个因素。公社把当地社会的公共利益同工人集体的利益，以及一般劳动人民的个人利益同社会的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公社工作中的最重要的調节机构是把几个公社連結起来的区。区内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区委員会和生产者院。在前一种机构内，各公社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占完全支配的地位，在后一种机构内，企業和乡村合作社中的工人委员会的力量占支配地位。一切問題就在这里通过意見的民主爭論取得解决，各种利益也通过同样的途徑取得一致。

卡德尔在进一步談到南斯拉夫的制度的基本因素时指出，企業和机关——換言之，就是它們的自治机构——互相之間的关系是在全国水平上的縱的关系，同时保持自治的性質。关于这方面首先是經濟組織，这种組織以民主的形式調度各企業和机关的工作和相互利益。在南斯拉夫的社会生活中，这种自治組織正在成为甚至更重要的因素，它們将逐步更多地接收至今为止由国家机器——就是政府——履行的社会任务。

卡德尔着重指出，南斯拉夫的民主的發展中的这些占优势的趋势，还只是在实现的初期。在个别的具体形式方面，实践大約将导致一些修改，但是，到目前为止所得到的結果足以令人認為：这里已經不再是像西方常常說的那种已經解决了的实驗了，而是一种以自然的發展法則为基础的社会过程，它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發展打开了新的前景。

卡德尔最后在回答关于南斯拉夫是否能够以某种不同于通过它自己的例子的途徑作为目前国际劳工运动的两种方向之間的調解者的問題时說：我認為，南斯拉夫能够采取的行动主要是通过它自己的例子和通过它的願意同所有有同样經驗的国家有

批判地交換社会主义經驗的意願。我相信，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的成就，对国际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有很大的好处。当然，除此以外，我們还在奉行一种同全世界一切社会主义运动積極合作的政策，以便促进国际社会主义的合作、加强社会主义及巩固全世界的和平与国际合作。

# 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 联邦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宣言

(1955年6月2日)

由苏联最高苏維埃主席团委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尼·謝·赫魯曉夫，苏联部长會議主席尼·亞·布尔加宁，苏联部长會議第一付主席阿·伊·米高揚，苏联最高苏維埃民族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員、“真理报”总編輯德·特·謝皮洛夫，苏联外交部第一付部长安·安·葛罗米柯和苏联对外貿易部付部长帕·尼·庫米金組成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和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統約·布·鉄托，联邦执行委员会付主席愛·卡德尔，亞·兰科維奇和斯·伏克曼諾維奇—泰波，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員米·托多羅維奇，外交秘書长科·波波維奇，外交付秘書长維·米丘諾維奇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从1955年5月27日到6月2日在貝尔格萊德和布里俄尼島举行了会談。会談在友好和互相諒解的气氛中进行。在会談过程中，双方就苏、南两国所关心的国际問題交換了意見，并且全面地研究了兩國政治、經濟和文化关系的問題。

## (一)

会談的出發点是，两国政府对于用談判方式来和平解决国际問題并且加强各国人民与各个国家間的合作的共同願望。

两国人民和两国武装部队在他們同其他各国爱好自由的人民共同对法西斯侵略者作战的年月里特别增进了彼此的友誼和

战斗合作。

两国政府同意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便使两国的关系正常化和發展两国的合作，两国政府确信：这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是对緩和緊張局势以及对巩固世界和平事業的一个貢獻。在会談过程中，两国政府对进一步發展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全面合作表现了真誠的願望，这完全符合两国的利益以及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而且現在也存在着实现这个願望的客观条件。

在討論作为会談的题目的各項問題时，两国政府本着加强国际信任和合作的目的，从下列原則出發：

和平不可分割，集体安全只能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

两国在彼此的关系中以及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都应尊重他国的主权、独立、領土完整和互相平等；

承認和發展国际間的和平共处，而不問各国間的思想体系的不同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这就是指各国在一般国际关系方面特别是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合作；

互相尊重并且互不以任何(經濟上的、政治上的或是思想体系上的)理由干涉內政。因为国内制度的問題、社会制度的不同和發展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的不同是各国人民自身的事；

發展双边的和国际的經濟合作，消除經濟关系中一切妨碍商品交換和阻滯世界上以及在各国經濟范围以內的生产力發展的因素；

通过联合国的相应的机构以及用符合于联合国原則的其他方式对各国的經濟以及对經濟落后的地区給予帮助，以利于这些地区的人民和世界經濟的發展；

終止散布不信任和在任何方面有碍于造成建設性的国际合作和各国和平共处气氛的任何形式的宣傳、錯誤报道以及其他



行动；

- 譴責任何侵略和任何對其他國家建立政治和經濟控制的企圖；

認為軍事集團的政策加劇國際緊張局勢，破壞各國人民間的信任和加深戰爭威脅。

## (二)

兩國政府的政策是從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出發的，雙方同意必須進一步努力以加強聯合國的作用和威信，而這一點將特別由於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地位而得到肯定。接受一切符合於聯合國憲章要求的國家為這個組織的會員國也是同樣重要的。

兩國政府一致認為，各國人民應當作新的努力，爭取這一類世界性的重要問題在談判中取得積極的結果和協議。這一類的問題是：裁減和限制軍備以及禁止原子武器建立普遍的集體安全，其中包括以條約為基礎的歐洲集體安全體系，以及把原子能用於和平目的的問題。

經過這種努力，就可以創造一種氣氛，使許多頭等迫切的國際問題得以和平處理，例如德國問題的按照德國人民的願望和利益以及按照普遍安全的利益在民主的基礎上取得各方都同意的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合法權利的滿足。

兩國政府歡迎萬隆會議的結果，認為這是對國際合作思想的重大貢獻，是對亞非各國人民加強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獨立的努力的支持，並且認為這一切有助於鞏固全世界的和平。

## (三)

對兩國到目前為止的關係以及兩國關係今後發展前途的分

析受到了十分重視。考慮到最近几年来两国关系中有很大的不協調，而这点無論是对有关双方或者是对国际合作都造成了損害，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表示决心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發展今后的关系，并且依据本宣言中所闡明的原則同意下列几点：

一、两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建立正常的条約状态，它們将在这个基础上調整和保証关系的正常發展，以便两国在双方政府所关心的一切方面扩大合作。

二、必須加强两国的經濟联系和扩大两国的經濟合作。

为了这一目的，两国政府同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消除由于两国經濟关系中正常条約状态的破裂而产生的后果。

两国政府还同意締結必要的条約以調整和促进經濟关系朝着上述方向發展。

三、为了發展文化关系，两国政府表示准备締結一項文化合作公約。

四、两国政府認為向公众报道消息对發展国际間的友好合作有很大的意义，并且为了使公众能得到确切、客觀的消息，一致認為有必要本着联合国決議的精神和关于在締約国任何一方的領土上設立这种新聞报道机构的地位和特权的互惠原則締結一項新聞报道公約。

五、两国政府支持联合国提出的关于各国在和平使用原子能方面进行合作的建議——这对巩固和平、对全世界的进步有重大意义，因此同意在这方面建立相互的合作。

六、两国政府同意采取措施締結条約，以便解决关于居住在对方国土上的締約国一方的公民的国籍，或者相应地进返的問題。两国政府同意，对于同上述問題有关的人員，条約必須以尊重人道原則和以公認的自願原則为基礎。

两国政府还同意保証一方行使在对方領土上保护一方公民

的权力的行使，这也指保证公民有权保留他们在到达締約国另一方国土以前的国籍。

七、两国政府本着本宣言中所陈述的爱好和平的原则的精神，并且为了两国人民更好地互相認識和了解，同意支持和协助两国社会团体通过建立接触、交流社会主义經驗和自由交換意見等方式进行合作。

八、两国政府同意，为了进一步發展两国之間的相互了解，为了發展国际合作和巩固世界和平，将尽最大努力来实现本宣言的任务和决定。

代表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苏联部长會議主席 尼·亚·布尔加宁(签字)

代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統 約·布·鉄托(签字)

1955年6月2日于貝尔格萊德

## 論社会主义各种力量合作的形式

(原載“共产主义者”杂志 1955 年第 6、7 期)

列里可·弗拉赫維奇

目前形势的發展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在發展中發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給当前局势刻上特殊的烙印，对現在和未来都起着独特的影响，同时使目前的事变具有許多新的，在 15 年—20 年之前尚不为人所知的因素。为了認識目前的局势，并了解目前發展的各种道路，首先必須对社会最近的变化进行仔細的分析。只有經由这种分析才能預見未来事变的进程。

研究目前的發展，对于那些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自觉的战士们，对發展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对寻求社会主义力量合作的各种形式和道路，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毫無疑問，在目前社会和社会关系發展中，所出現的一系列新的現象，与以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对这些現象所做的理論解釋之間，存在着某些不相符合之处。

馬克思主义思想在解釋一切事变和現象时，多半局限于工人运动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即多半是局限于实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預备阶段。

从十月革命到現在，在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的發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对社会主义發展过程本身具有巨大意义的事件。因而，只要列举这些事件，就足以了解当前工人运动理論与实践和發展現代各种社会主义力量所面临的巨大任务！

首先，現在殖民地問題的情况已不符合于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时在他們的著作中对該問題所作的詳尽分析了。最大的



两个殖民地——中国和印度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設过程。那些不久前尚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位的其它許多民族，已取得了民族独立；現在正或多或少地積極參加到反映当代人类矛盾的事变中。甚至經典式的殖民主义对于資本主义社会，即对于最發达的資本主义国家說来，也成为他們資本入侵扩大領土的障碍。可以說，現代資本主义已抛弃了殖民主义的典型形式。代替这些陈旧形式的是适合于目前新局勢，首先是适合于現代經濟發展的新形式。

这种發展，多半反映在国家作用在經濟生活中的加强和国家資本主义因素在經濟中的增长。我們在各种組合中，在財、軍、政的組織中，都能看到这些新的形式。因为在各种組合中，在財、軍、政的組織中反映出政治經濟的傾向，而在思想方面，則反映出最反动的政治力量，甚至連联合国組織的某些机构也未能摆脱这些傾向。在这些机构中加强小国作用的进步运动的主張，解决發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間彼此矛盾的力量，經常同反映对政治和經濟霸权的追逐的那些傾向發生冲突。

不論是为發展理論，或者是有必要为社会主义自觉力量的斗争作出实际的結論，都需要对这些新現象加以認真的、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

由于殖民主义制度崩潰的結果，給过去殖民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提供了新的条件，因为殖民主义不仅阻碍了殖民地民族的發展，掠夺和剝削了劳动人民，同时也是宗主国工人階級的障碍。現在这些鎖鏈已被粉碎。这个事实不仅影响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同时对宗主国工人階級提出的新的任务也有影响，目前局勢的复杂性同样反映在那些过去是殖民地，如今已經独立的国家在国际关系的作用中。这种局勢使我国——虽然是一个不大的国家——但在目前情況下，能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不

願各个集团的压力而繼續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同时在国际关系中起着積極的作用。

这种情况同样也保證其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起独立自主的，良好的作用。目前局势迫使那些过去拥有殖民地的国家也反对现代帝国主义的某些傾向。这种事变的發展給工人階級提供了对壟断寡头或者对国家政权施加更大压力的可能性。由于这种有时是自觉有时又是不自觉的压力的結果，工人階級得到对方的讓步并获得新的陣地。因此作为一个階級來說，应激励它不管各种政治派別的不同和思想的差异，为获得更多的讓步而繼續不断地斗争。

原子能的發現和和平使用原子能的問題是当前一切矛盾發展中新的强有力的具有巨大意义的因素。可以大胆地說：蒸汽机創造了工人階級，即蒸汽机在生产力發展的过程中創造了巨大的飞躍；电力的出現是旧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發展的强大动力，开辟了無产階級革命和革命斗争的新紀元；而原子能的發現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进一步發展中一个新的，巨大的阶段。原子能的發現，同时也标志着自發的和自觉的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發展中的新的、巨大的阶段。

上述所有这些新的因素，都証明了那古老的真理，它說：現代社会的發展乃是人类为社会制度的新的社会主义的形式进行了数十年斗争的反映。如同一百年前一样，馬克思的这一論断在目前仍然有效；人类不願意按照旧的方式生活，但它也不知道如何按照新的方式来生活。生产力的全部發展推动社会去寻求解决近代的各种矛盾，寻求新的生活的形式。生产力愈發展，寻求新的形式就愈为必要。和平利用原子能和若干其他加速生产力發展的發現，都将对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的發展有所影响。

像过去和現在一样，各种社会主义力量在将来的發展也是

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已成为社会主义發展的規律。它同时也表現在各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道路中。由于各种情况互相錯綜的結果，在某些国家內，例如在过去的殖民地国家內，民族資產階級在为消灭世世代代的落后現象，發展經濟的斗争中，不得不創造产生社会主义关系的这种經濟基础。近十五年来，在工業發达的国家中，国家作用已有显著的增长。这种作用同时也标志着資本社会化的过程。但在它改变了的形式中仍保存着全部資本主义剝削的因素。这个过程也同样意味着这一基础的加强，在該基础之上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和壮大肯定地将得到發展。

社会主义發展的不平衡性和两个集团的理論，即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間具有很显著的、肯定的鴻沟的理論是有矛盾的。这种不平衡性对只有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理論也是不符的。最后，它同那些想在工人运动中，即在爭取發展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加强組織上或思想壟断的企圖也是有矛盾的。

以十月革命为开端，并以中国和南斯拉夫的革命相繼續的無产階級革命，提出了实际有效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問題，同时也肯定了社会主义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并提出了某些新的問題。例如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关系和在若干国家中領導社会主义建設的各政治党派間合作形式的問題。因此，各种社会主义力量間的合作形式的問題是可以这样来研究：首先借助于工人階級运动發展中的丰富經驗，对过去合作的各種形式，加以典型分析，和对工人階級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准备阶段以来所發生的各种变化加以科学解釋，最后借助于对那些由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国家的存在，而由生活本身提出的各種問題加以透徹的研究。

談到旧經驗，它确实足可証明借助于旧的合作形式是不能

解决现代社会主义力量間进行合作的要求的。

企圖在共产党情报局的形式下复活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一切打算，証明了在現有的条件下恢复旧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乎邏輯和完全不可能的。这再一次地証明了不能以旧的观点来看待现代局势的真理。

被简单地称为共产党情报局和南斯拉夫之間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壟断主义傾向与现代發展間的冲突。现代情况的發展，反映在社会主义發展的不平衡性中，它要求打破陈規旧套和壟断主义。

共产党情报局的組成再一次表明：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当工人运动能在个别国内产生的情况下，設立任何一个领导各国工人組織的中心，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有害的。共产党情报局忽略了当共产国际解散时所闡明的一切論断，而企圖复活甚至加深当时共产国际在其活动中所具有的最恶劣的現象。

必須強調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解散共产国际的論断在原則上是对的。

特别是在这个決議中所作的如下的論断：早在战前就已日益明显，根据个别国家的內部情况和根据它的国际地位的复杂化，任何国家中工人运动的任务，如要以任何一种国际中心力量来解决的話，那将会碰到不可克服的阻碍。

各个国家历史發展的道路有着很大的差別；他們內部結構的性質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社会政治各方面發展的水平 and 速度，以及工人的自覺性和組織性也都不尽一致，所有这些就决定了各国工人階級面临着各种不同的任务。

1935年所举行的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考虑到国际局势和工人运动中的变化，同时考虑到这些变化，要求各支部在解决它們所面临的任務时，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所以它当时



就已經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必要在解决工人运动的一切问题时，应估计到各国具体的情况和特殊的条件，并照例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和组织的问题。

共产党人从来不拥护已经过时的组织形式，他们总是使工人组织的组织形式和该组织的工作方法，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基本的政治利益，服从于具体的、特殊的历史情况，和由这些情况而直接产生的任务。

若干共产党就共产国际解散而发表的决议和信件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件事所发表的文件特别值得注意。它这样断定：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得到共产国际很大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人早就有可能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和特殊的条件而独自确定和实现政治路线。”

如今很明显，从共产国际解散后而开始的工人运动发展的良好过程，由于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而终止了。这不仅中断了良好的发展过程，而且形成了复活和采用那些同社会主义发展格格不入的方法的条件。这一活动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可以感觉到，因为它是不会瞬息即逝的。

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使得第二国际的恢复加速了。但现在的第二国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恢复的第二国际的黯淡无光的翻版。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第二国际，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二国际的退色的翻版。事变的发展和第二国际的活动，都证明在它的活动中发生着的过程，实质上包含着取消陈旧的组织形式的因素。这个过程不仅被亚洲国家的社会党大会的立场和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运动近代思潮的方向肯定下来，而且首先是被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运动肯定下来。虽然有着共产党情报局和第二国际的主张和死板公式，社会主义运动

在南斯拉夫仍然得到了發展。組成第二國際的歐洲社會主義政黨內部不斷急劇地加強的派別，也是這個過程的特徵。

當我們談到有關過去的工人運動的經驗時，必須談談第一國際解散期內的經驗和工人運動剛開始形成時期的經驗。雖然現在的情況同七十年前已有不同，但某些現象還是值得注意的。巴枯寧曾為建立一個具有壟斷地位的組織形式而進行宣傳和鬥爭。由於馬克思、恩格斯同巴枯寧之間的意見分歧，而使第一國際終於解散了。關於這件事恩格斯在 1872 年這樣寫道：“這種新的組織會把我們引向何方？這種新組織會下降到普通公民和那些奴隸們的胆小如鼠、毫無原則的組織。這些奴隸以感激的心情承受了任何踐踏，不用說，他們三百年來是搖尾乞憐地才獲得了他們宗教的勝利。毫無疑問，無產階級是不會採取這種革命方式的。正如首批基督教徒把自己臆想出來的天國當做他們的典型組織一樣，我們也應該把巴枯寧先生的未來社會的天堂當做我們的範例。”當第一國際顯然再不能繼續存在下去的時候。恩格斯於 1874 年 9 月在致左爾格的信件中這樣寫道：“要想使共產國際具有新的生命的任何努力都是愚蠢的，是白費的。因為它的陳舊形式已經過時了。”

現在我們明白，要使工人運動現有的統一形式，具有新的生命的任何企圖都是愚蠢的，同時也是無益地浪費時間。目前局勢要求適合它的組織形式。如要現在就預先和過早地決定未來的組織形式，這同樣是愚蠢的。必須首先為在各種社會主義力量合作中剛開始出現的一切的積極因素的加強掃清道路，這就是說必須拋棄現有的組織，摒棄任何想用人為的方法，來使這些組織壽命延長的企圖。

當然這種組織不可能很快就完全被拋棄。雖然這一過程，無論在客觀活動中，或在人們的思想中，都應該逐步發展。但可

利用当前情况和現代發展的要求，加以科学分析的方法来加速这种过程。

这种抛弃的过程，也意味着放弃在工人运动中强迫接受壟断主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給工人运动的企圖，同工人运动本身有同样长的历史。这些企圖的表現形式各不相同，但总是阻碍着社会主义力量的發展。

社会主义力量的进一步合作，将在經常不断地反对这些企圖的斗争过程中發展起来，这些企圖的表現形式各色各样，甚至将来也会为个别的人或集团下意識地采用。例如，美国某些工会領导人物对我国工会的态度，和他們硬說不應該同南斯拉夫工会合作的說法，按另一种方式来解釋，就是这些人企圖在国际工会机构和組織內，無論在思想、政治方面，或是組織方面，都占有着壟断的地位，难道这是可以的事嗎？今年5月23日紐約时报所刊出的“自由工会正在为反对鉄托主义的滲入而斗争”一文，最能說明这方面的情况。該文指出，近来南斯拉夫人，在同世界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各成員工会建立联系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南斯拉夫未必能在这方面的陣綫上打开任何一个較大的缺口。該文作者显然是把工人运动中进行合作的全部問題，归結于在这个合作中誰吞并誰的問題。在这种基础上进行合作，等于是为了爭夺壟断，为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給工人运动。而我們同各种社会主义力量和工人組織的合作，却根据另一种看法。把自己的組織和政治运动的意志，强加給同我們合作或者希望同我們合作的那些組織和政治运动的想法，同我們是格格不入的。我們的这种立場并没有束縛自己的手脚，我們敢于公开地批評我們所不喜欢的人的一切东西，而不怕这种批評会被人曲解。我們也能很好地听取他人的原則性的和善意的批評。

因此，社会主义力量未来的合作，不应仅仅建筑在交換經驗的基础上，同时应建筑在有科学根据的相互批評的基础上。并坚决避免把自己意見强加給他人的任何傾向。这种批評應該以社会主义的發展为出發点，并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範圍内进行。这种批評應該是善意的、建設性的和原則性的。

社会主义力量在未来的合作，應該是促使一切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組織之間，政党之間和运动与运动之間建立起無所不包的联系。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形成时所設想的情况：“具有各种不同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都加入統一的国际組織”将会逐漸形成。但这不等于說要在思想妥協的基础上进一步發展合作，必須創造这样的条件：除了在各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外，同时必須进行思想斗争，而且是非常尖銳的思想斗争。

在我們的实际体验和經驗中，有着今后社会主义力量合作的某些因素。我們的实际經驗更加促使我們不仅要同工人运动內部的各集团和組織进行合作。而且也同实际上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一切政治运动进行合作。

过去我們經常听到：“再瞧瞧吧，是否应把你們接受到我們的圈子里来”的說法，我們的政治組織和社会組織，并不以謀求馬尔可或者揚科能把我們接受到自己的圈子而作为奋斗目标，原因很簡單，我們本来怎样，现在就怎样生存在世界上，并不在于任何別人是否喜欢。我們不是脱离世界而独立存在的一塊天地，我們住在这个世界里，同它生活在一起，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組成部份。根据这一原理，我們就应寻求同各种組織和运动，特别是同組成我們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工人組織和工人运动相接触的共同点。目前局势的要求，已指出这种合作的必要性，而事變的發展，甚至迫使那些故意逃避合作的人，会逐渐改变自己对这一过程的想法。根据这一原理，即我国正在



建設的社会主义不是超出于空間和時間之外的；我們的國家是客觀世界的組成部份；而且了解到我們應該同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優點和弱點共同存在和活動，我們便很明白應該求得同一切希望這種合作的人進行合作的道路和方法。但是這種合作並不造成我國人民的幻想，這種幻想會妨礙他們看清楚那些同我們合作的組織和黨派的嚴重的思想錯誤，或者妨礙我們耐心傾聽別人對我們看法的批評和意見。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社会主义力量間新的合作形式，將給自己開辟一條不以某些人的希望和意見為依據的道路。如果這種合作的必要性愈大，則它的強度的增長會愈快，而合作道路上的一切障礙消失得也就更快。如果通過健康的、原則性的討論，能夠闡明各種社会主义力量間合作方式的概念，這一事實將具有很大的意義。為這種合作創造條件而作的一切努力將不斷地遇到教條主義、陳規舊套，各種成見、錯誤的理論立場和拙劣的實踐的後果。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务。這個任务要求未來社会主义力量的合作，在本身形成過程中就適合于社会主义發展的現有形式。目前這些發展的形式的巨大作用，不是分化社会主义力量，而是引導它們聯合起來，因而任何一種有意識的分化活動，都是阻礙發展的，並注定了要遭到滅亡。因為雖然社会主义發展形式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是走向社会主义社會的運動的統一過程的組成部份。由於這種原因，必須指出以下一個事實：目前某些工人運動的領導者，已看到使工人黨和工人組織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和更加廣泛地接近的必要性。但當實際建立這種合作時，他們卻以舊的，過時的方式為指南，所以必不可免地不斷遭到失敗。當建立人民陣綫時期，那些導致人民陣綫崩潰的形式，正在復活之際，而企圖建立社会主义政黨、共產主義政黨間的合作，這也是同樣要失敗的。那些企圖在根據舊的刻板公式建立起來的，帶有十分明顯

的集团概念的国际政治組織或工会組織中，扩大合作形式的打算，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这完全不是奇怪的事：这些国际組織停滞不前，發展受着阻碍，白费力气地去企圖吸引这个或那个組織，这个或那个个人到自己这方面来，而真正的發展，却朝着完全不同的方面，它要求的不是在建立集团和誰并吞誰的原則基础之上，而是在真誠的，創造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原則的和建設性的政策之上建立联系。还記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某些国家建立人民陣綫的时期。当时的那种“合作”沒有看重有关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这个問題，它的整个活动是按照誰并吞誰，誰能在工人运动中取得壟断地位的路綫进行的，这种活动耗費了工人运动的力量，造成了扩大反对資產階級斗争陣綫的幌子，而實質上却縮小了这一斗争，即形成了两条斗争的陣綫，促成了法西斯和近代社会最反动的力量的胜利。未来的合作，应以能促进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和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反对資產階級斗争为自己的依据。

过去的經驗是很寶貴的。对这些經驗的分析教导我們一点：在相互关系中沒有誠意的話，合作是不可能的；如果有爭奪領導权的企圖，有強使工人运动接受思想壟断和組織壟断的企圖，則合作是不可能的。

現代的經驗教导我們，社会主义的發展正在轉变成千百万具有寶貴經驗的人的實踐。它同时告訴我們，当分析合作形式的时候，我們再不能仅以工人运动在致力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准备的阶段为出發点。

此外，尚須加上千百万人民在社会主义實踐中日益增长和丰富的經驗。这些經驗中有着可以帮助我們获得那些合作形式的因素。这些形式既能适合于現代的情况，又适合于社会主义力量增长的現代过程。現代的，經常是自發的社会主义發展过

程不仅要求被人了解,被加以說明,而且要求由于这样而在过程中永远有着社会主义的觉悟。这种觉悟只能产生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即运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現代社会主义的發展过程加以分析的基础之上。結果,不仅能获得适合于这一过程的最好的合作形式,同时也能获得当前發展尚沒有的那种合作形式:自發的發展中将带有更大程度的自覺的因素,該因素反过来又会推动这种發展,加速他的运动并将便利于反对資产階級影响的斗争。

因此,工人运动力量的联合問題,将不再是脱离近代發展过程的机械的、抽象的問題,将产生在同社会主义近代發展的要求的有机联系之上。

在这方面,那些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負有很重大的責任和作用。如果在这些国家里人們会很快地懂得,現在在确定工人运动的方向方面再不能仅仅采取那种一个集团或者一个党派的宗派主义观点时,則联合工人运动各种力量的过程,将会更快地發展起来,这种联合可以体现为目前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設而进行实际斗争的各种力量的合作。

## 南斯拉夫对于联合国的展望

——1955年10月24日在贝尔格莱德联合国宪章  
十周年庆祝会的讲话

卡 德 尔

在十年前的今天，联合国宪章成了一件有效的工具。它现在已经成了人类一切人道的、进步的努力中最重要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之一，它阻止以暴力作为解决国际关系中所发生的问题的一种手段。

当全世界似乎正展现出一个更为持久的和平时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受到了人类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支持。基本上它现在仍享有此种同情和支持。

它成功地经过了“冷战”时期的考验而本质上没有丧失其作用和威望，这清楚地说明：此种支持的道义上一政治上的力量过去是、现在仍旧是联合国活动与工作中的一个有力的因素。正如1945年的宪章中所表明的，联合国组织并不像某些抱怀疑态度的人所常常断言的，只是一场战争后的全面松弛缓和期间所形成的一些和平主义的思想或幻想的跳板而已。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那末就不能期望这样的一种组织能成功地经得起巨大的国际冲突与矛盾的任何压力。

### 联合国与世界的社会和經濟进步

但是，联合国的意义比这要多得多。它实际上体现了强烈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是根深蒂固地在现实世界的社会与經濟过程中生了根的。首先，这样的组织与合作显然



是今天人类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必需的社会与政治的工具。它是这样的一种工具，没有它，在我们这一时代里，不但是国际合作，就连个别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进步也将成为不可能。

联合国的创立是当代使世界成为一体的强烈的物质与政治倾向的产物。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在这一水平上，这些生产力已经不能够完全约束在国界以内。旧型国家的时代正在走向它的尽头。发展了的经济力量要求在国际组织的范围内重新进行社会分工。这是人类进步过程中向前迈进的重大的一步。

在人类历史的较早期，由于生产力处于不发达的状态，社会分工并不要求比狭窄的社团或省份更为宽广的界限。人类的意识也是在这样狭窄的组织范围内形成的。

只是在资本主义时期中，由于生产与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巨大的技术进步，才刺激了新的社会分工，这种新的社会分工要求更为宽广的组织范围，即国家的组织范围。这就是为甚么资本主义时期才是近代国家意识形成和加强的时期。

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此种发展在生产中又将必然表现为核子能、电子学等等的更为广泛的应用）相适应的当代的社会分工，在统一人民的过程中又向前推进了。它把全世界的统一问题提到议程上来了。它还开始产生这样的意识，即国家与个人的利益不再只是国家界限以内的事，而是远远地超越这些界限的，并且最后将是世界界限以内的事。

但是，这一社会倾向，虽然是合法的、进步的，却同时既是进步和民主的政策的基础，又是国际关系中反动的或反民主的经济与政治行动的基础。我说到后面的这些行动时，我心里想的是所有这些倾向，它们的目标是要以新的方式保持或把这样的关系强加在别国头上，如强者的领导权、扩张、权利的不平等、依

存性、剝削、特权以及花样極為繁多的各种政治压力。

这些傾向的目标或者是要保持世界上現存的經濟和政治关系，在發达与不發达国家之間增加歧异或矛盾，或者是它們用任何可能的办法，使所有国家的相互的經濟利益从屬于某一国家及其統治階級的个别的利益。所有这些傾向不但导致国际冲突与战争，还是国与国之間亲善睦邻的最大的障碍。它們阻碍世界的統一，虽然有时候它們看起来似乎起着創导这种世界的統一的作用。

正是为了这一理由，只要有这些傾向存在，爭取实现独立的原则，尊重国家主权和民主的国际关系的努力将是人类在国际政治領域中最重要的进步活动。

然而，在当代的国际生活中，日益抬头的是第二种傾向，即进步傾向。这种傾向确实在导致各国日漸趋向于亲善睦邻，并通过各国間以平等权利和民主关系为基础的愈益广泛和無所不包的国际合作而导致全世界的統一。这些关系不仅是各国間亲善睦邻，进行更大的合作的捷徑，也是达到稳定的和平的唯一可能的基础。

这正是为甚么国家独立与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應該成为旨在追求上述目标的各种政策的基础。

### **只有通过积极的共处才能保障和平**

联合国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今天世界上所存在的这一运动。确实，前面所說的两种傾向都在联合国中反映出来了，并且有时还發生了冲突。这一事实便是这一組織将来产生危險的主要泉源。但是这一組織能够建立起来并且在整个冷战时期中能够維護自己，这个事实証明了两件事：爭取建立民主的国际关系的斗争正在开花結果；而且在这一方面，人类正处在新的历史时

期的前夕。

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間必然和平共处的这一日益现实的理解是联合国所賴以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因素。过去几十年中普遍存在于所有国家中的社会發展給世界社会力量間的关系带来了这样的变化：只要有誰認為可以叫历史的車輪倒轉，他就是很愚蠢的。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大家都必然認識到：只有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能予以保障，才能保持和平。此种和平共处不能仅仅是一种消極的暫定条約，而是一种積極的合作，依靠这种合作世界才能对那些有关所有国家（不論其內部社会制度如何）的相互利益的問題上趋于团结一致。

联合国在其宪章中也体现了这一認識。虽然事实上这一組織的普遍性原則到現在还没有得到滿意的解决，联合国能以其目前的結構形式建立起来，就是和平共处的原則在历史上已到了成熟和确認的地步的最好的証明，尽管事实上在后期——这里我指的是冷战时期——的發展中，这一原則受到了严重的考驗而且今天它仍还有强烈的反对者。

最后，应该指出联合国也体现了許多其他起因各不相同的趋向于和平的傾向，因为它以許多国家在一致行动时才产生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以及一般的集体安全的普遍适用的制度的影响，解决了爭端，进行了协商和調解。这些傾向的由来和目标是不尽相同的，但是联合国的講壇是足够寬广而使它們有統一的可能。

这就是这一組織的实际重要性之所在。为了联合国的存在和进一步的發展，維護这一講壇的寬广性是絕對必要的，也就是說，向联合国提出的具体要求不應該超过界限而使一系列在

联合国本身之内起着作用的不同的因素不能接触和合作。

联合国宪章是以所有国家之间维持永久和无所不包的合作的观念为基础的，是以彼此彻底尊重主权、平等权利、独立和领土的完整为基础的，也是以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在国际关系中不进行威胁不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禁止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这些观念为基础的。

这些当然是伟大的、爱好和平的、民主的、进步的原则。只要它们能得到尊重，它们本身就的确足以保障和平。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原则受到了破坏。它们正被联合国某些成员国所破坏，如果我们以为它们将来不会受到破坏了，那末我们就是在幻想了。

然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不只是纸上的字句而已。仅仅这些原则作为道德准则而被肯定下来这一事实，就是人类向前大大地跨了一步的证明。破坏这些原则已不再像过去一度那么简单、方便的事情了，那时，今天在道义上普遍予以谴责的行动还是每一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

事情到了像今天这样，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人类正开始在社会发展上进入了这样的水平，履行这些原则正日渐成为经济与社会进一步普遍发展的条件。在道义上，这些原则已赢得了胜利。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无疑地将继续加强这些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就在这样的发展中，联合国代表着一个重要的因素。

### 联合国的建立

建立这一组织自然是全世界一致欢迎的。它使所有国家对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前途抱着巨大的希望。然而，战争结束后在国际领域中所出现的一些事件，却不允许这一重要的、爱好和平



与进步的創举在信任与相互爱好和平的努力的气氛中有所加强和进一步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是可以为謀求未来和平的原則奠定一个基础的。但是，当它們开始解决这样一些問題——新世界的面貌具体應該是怎样的以及在這一世界中各大国間的巩固关系應該是怎样的——的时候，正如通常在战后的情况一样，出现了新的矛盾，結果就引起了冷战、集团的建立、軍备竞赛和世界的經濟分裂。所有这些过程無可避免地都反映到联合国中来了。而且，关于是否應該选择保持联合国宪章所規定的原則还是改变它的性質这一問題，在这一組織中还真的發生了疑虑。

### 联合国克服破坏傾向

在冷战極度緊張的年头中，联合国不得不經受各种不同的有害傾向所产生的强大的压力，这些有害傾向开始严重地破坏对这一組織的前途、也就是它将来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所抱有的任何信心。有这样的傾向，它們的目的是要把这一組織变成一个进行宣傳活动的普通的講壇，从而使它不能真正解决爭执問題，而解决爭执問題通常并不需要宣傳性的演說，而需要善意和諒解的心願，相互讓步，等等。

而且，有这样的傾向，要使它变成某一种太上国，成为这样的一种力量，它会干涉个别国家的內部事务，或对它們的独立地位施加压力而为这一国家或那一国家，或者为这一国家集团或那一国家集团謀取領導权，这种状态就無可避免地会导致这一組織的民主基础的破坏。

还有这样的傾向，想将联合国变成进行思想战争的工具，这些傾向旨在反对不同社会制度共处的原則——这一組織的基本原則之一，而且毫無疑問是它作为由各国組成的一个普遍的世

界組織而存在的条件。也还有其他类似的有害的傾向，都反映出那一时期国际关系的情况。

不能說所有这些現象在这个組織本身甚至在某些決議中沒有留下某些痕迹。但是今天我們可以說所有这些趋势都未能得到强有力的發展，以致直接影响这个組織的存在。即使在冷战最緊張的时候，联合国仍然作为一个凌駕于各个集团之上的机构来討論国际問題，并且使某些建設性的力量得以表現出来。

虽然在这方面它未能取得甚么重大成就，但是它制止了那一时期內在若干緊張問題上的冲突，使它們不致于进一步复杂化。

这一时期內，联合国在解决印度尼西亚、克什米尔、巴勒斯坦、突尼斯和前意大利殖民地問題上以及柏林危机期間在建立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在解决裁軍、实行自决原則等問題上和發展殖民地国家的一般問題上所取得的某些进展，以及在其他問題上所起的作用，还只是联合国在維護和平和安全方面进行具体的積極的活动的少数几个例子。

### 联合国的成就沒有辜負人类的期望

虽然国际局势仍然令人很担心，但联合国对远东的复杂局势在某种程度上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它阻止了那些企圖扩大冲突的趋势，从而作出了相当大的貢獻。

同时，联合国在經濟和社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例如組織技术援助，为發展落后国家的經濟而建立特別基金，成立“粮食与农业組織”，消除国际貿易的障碍（虽然在这方面廢除歧視問題仍然存在），解决充分就業問題，等等，都应当特別着重地指出。

联合国国际兒童緊急基金这个机构的活動是杰出的，它在社會福利事業方面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如世界人權宣言（現已提交联合国大会），惩治种族殘杀，召开妇女政治权利大会，供給有关社會保險的資料，保护家庭和兒童等等，都是这个机构的貢獻。

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在国际生活的各个領域內对于發展国际合作也或多或少地做出了貢獻。

虽然联合国及其机构在上述某些方面和其他方面到現在为止所取得的成績不能令我們完全滿意，甚至我們在原則上不同意某些具体決議，然而每一个客觀的人都必須承認，已經取得的成績基本上是符合各国在这个組織成立時对它的期望的，特別是我們应当考慮到，这些成績是在国际政治危机异常尖銳的时期取得的。

今天全世界願意和平的人們都在庆祝这个組織的十周年紀念日，他們正如过去在它成立時满怀希望一样，对未来还是满怀希望，虽然联合国在它存在的最初十年內未能完全实现它在成立時确定的原則。对它的未来抱着期望是根据联合国在自己的基础似乎不够稳定的时期內所取得的成就，根据它在国际关系中創造新的、更加有利的气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过去几年中的那种国际气氛，今天毫無疑問已經大大好轉。在这方面，有特別重大意义的是万隆會議、貝尔格莱德會議、日內瓦會議、在奧地利問題上取得協議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件。仅仅在几年之前世界还处在战争与和平的十字路口，还找不到一条道路来和平解决以前的盟国之間的矛盾。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遺留下来的爭执問題只有一部分得到了解决，但今天已經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向和平方面轉变已經成为国际关系發展中主导的和經常的方向。这一事实再一次証

明，具体的爭執問題本身与其說是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基本矛盾的原因，不如說是它的結果。

这就是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間共处的条件成熟得越快，这些問題也就越容易解决。共处的条件并不仅仅是主觀的，即不仅仅决定于政府的善良願望，而且决定于世界上客觀物質力量的对比。

### 裁减軍备是巩固和平的重要因素

国际关系好轉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首先應該提出的是，分裂的世界上各个不同部份之間建立了某种物質均勢。但是这种均勢也包含着使它不稳定甚至于遭到危險的严重弱点。重整軍备已經达到很高的水平，这种局面是不能够再繼續下去的。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逐漸裁减軍备不停止下来，如果完全解除軍备的可能仍然是一个問題而無限期地拖延下去，那末目前高度的軍备水平不仅使和平不能够真正稳定下来，而且会破坏在緩和緊張局勢方面所已經取得的成果。

除开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客觀物質因素之外，某些主觀因素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起了作用。这方面应当首先指出的是，一切侵略的傾向总是在各国遭到强烈的反抗。新的苏联政府对和平事業的貢獻也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因素。

新的苏联政府为改正过去的某些行动包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而作出的爱好和平的果敢的决定，的确已为全世界所公認。这个决定不仅其本身意义重大，而且也是說明新的苏联政府的整个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

毫無疑問，这一政策的成果之一就是消灭了对于独立的畏惧，許多国家已經不存在这种恐惧了。同时有一种趨勢已經加



强了：即各集团間尖銳的矛盾趋于緩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日益增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間積極共处并进行进步的和平竞赛的有利条件也日益具体地被創造出来。

另一方面，苏联的这种政策得到了西方国家领导人物的建設性的反应，这在日内瓦會議上及以后的發展中可以看得很明显。毫無疑問，这一事实不仅使苏联現政府的政策成为可能并証明它是正确的，而且对和平事業进一步获得良好的發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尽管世界上有些人企圖在将来繼續保持因冷战政策造成的不信任。

还必須着重指出，对于这种發展也作出了重大的、真正的、具体的和具有政治意义的貢獻的，一方面是像南斯拉夫、印度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埃及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等等的一貫的積極的不参加集团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其他許多国家以及虽已参加某种集团体系但由于客觀或主觀原因反对加剧緊張局势和走極端的个别国家中的领导人物所执行的爱好和平的政策。

如果这一切因素在将来繼續起作用，那末毫無疑問，在我們現在可以預見到的一个时期內，重新回到灾难性的尖銳的緊張局势或者冷战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局势下，不管各个集团間的界限而促进各种方式的国际合作，为加深和加强国际信任而努力，是一切真正想为进一步巩固和平而作出貢獻的国家和政府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对这个問題采取積極态度，今天已經变成热爱世界和平和民主的一种标志。

很明显，改善气氛其本身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目的，而且如果不同时去直接解决今天的重大問題，这种气氛也是不可能保持下去的。毫無疑問，各国越是積極地、建設性地去寻求通过协商来解决問題的途徑，建立国际信任的进程也就越發迅速，越有成效。日益增长的国际信任也将促进今天最困难的爭执問題的

解决。

在这样的局势下，积极共处必定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实际政策的基础。这一事实本身就肯定了它的必然性。自然，我们的态度并不是出于某种和平主义幻想。我们的态度是由于对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对比作了现实的分析 and 估计，这种力量对比表明，在我们已经进入的这个时期内，实现某种程度的稳定的和平是确有可能的。

### 联合国当前的問題

今天，很明显，在这样的形势下，面临这样的可能性，联合国具有一种特别重大的作用。因此，联合国在它开始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問題。按其世界意义和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性来说，下面的問題是最突出的：裁軍問題，和平利用核子能問題，联合国的普遍性問題，国际財政問題，等等。

在解决这些問題的同时，解决德国問題、欧洲安全問題、远东和近东的問題等复杂問題也是绝对必要的。即使这些問題中的某些問題在现在和将来不正式列入联合国的議程，但它們一定会大大影响联合国的工作，反之亦然。然而，联合国将能間接地对解决这些問題發生重大的影响。

很明白，不應該期望迅速获得結果。这些爭执問題最好是慢慢地求得解决，而不要采取武力和威胁政策来强迫作某种解决，因为那样就会积累并加剧矛盾，以致于有一天各国会不能控制自然發展的力量，从而陷入不可避免的灾难。

由于在国际关系方面出現的新的更加有利的气氛，裁軍問題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打开冷战年代的僵局。去年一年內，对于保持和平負有重大責任的人們已就这个問題的某些重要方面达成了有重大意义的協議。裁减軍备和在相应的国际监督下禁

止核子武器，不仅会为世界安全和和平打开更好的前景，而且会把大量的物资解放出来用以改善全世界的生活水平，即使这个问题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

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如不同时解决其他国际问题，裁军问题在短时期内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认为，作为一般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联合国的会员国现在可以单独地在裁军的道路上采取某些步骤，例如保证不增加军事预算。由于某些国家已经宣布裁减军队或者削减军事预算，这就更加有可能了。

### 和平利用核子能

和平利用核子能问题基本上是同裁军问题互相关联的。为了未来的社会发展而把核子能、现代电子技术和其他技术应用于工农生产的全部意义，现在还不能估计。和平利用核子能使社会和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因素。核子能的未来发展和有关它的全部问题肯定地要求密切的国际合作。发展核子能资源的前途及其和平利用，将逐渐地迫使各国不仅关系更加紧密，而且趋向于使世界减少其复杂性。使各国分裂的那些因素将要削弱，而国际合作必然会加强。

中心问题将是：这种统一过程的发展是建立在民主的国际关系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由强者来支配的原则上。很明显，最重要的是在利用核子能方面进行国际合作这一点上必须克服一种真正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是，这种合作变成经济强大的国家来加强它们对世界其他部分的霸权的基础和形式。

如果这样的话，不仅会使许多国家丧失独立，而且会使世界划分成更加固定的排他性体系，从而使国际关系更趋于紧张。

另外一种危险是这种合作会扩大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

間的裂痕，为整个世界經濟和各国的独立造成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無疑地会使世界局势严重化。

所以，我們認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組織必須：第一，它是建立在权利絕對平等和民主的原則上，其次这个組織必須以适当的方式附屬於联合国，經常地向它报告自己的活动，总之，这个組織应当放在所有国家充分的民主監督之下。

### 裁軍、欧洲安全和德国統一是一个問題

德国問題也是和裁軍問題密切关联的。我在这篇發言里不想就今天国际关系中的爭执問題作詳細的論述，不过德国問題在这些复杂問題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因此，我想簡單地談談这个問題。

德国問題所以特別重要是因为，这个問題与其說是一个因矛盾而分裂的世界的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或者这个集团或另一集团的这种或那种地位的問題，不如說是一个实力問題。

因此，解决德国問題同世界力量对比問題——也就是物質力量均势問題——有非常密切的、决定性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所以解决这个問題比任何其他問題困难得多。另一方面，在这方面取得任何成就，毫無疑問会有助于解决世界上所有其他引起爭执的問題，包括远东問題。

由于这些原因，如果真有解决德国問題的願望，同时又要使国际局势不至再緊張起来，那末只有根据下列原則才能逐步解决这个問題：

- 一、基本上不破坏力量的对比关系；
- 二、不使德国人民处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
- 三、不用国际决定的办法强加給德国一种内部制度，这應該是德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正因为这几点，裁减军备或限制军备问题、欧洲安全问题以及德国问题才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而必须整个加以解决。如果在裁减军备和军备监督方面能够取得任何进展，同时这种进展又可以作为欧洲安全体系的基础的话，那末，德国以平等的地位加入这个体系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这种解决办法不会破坏目前的世界力量对比关系，不至因而引起一种新的局势和再一次削弱国际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德国统一问题就不会具有像现在这样尖锐的国际性质，而会逐渐基本上变成德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最近苏联政府就欧洲安全问题屡次提出的建议以及西方国家的反应，说明德国问题现在已经跳出几年来一直进行的纯粹宣传攻势的范围，而进入了具体地真正地解决的阶段。毫无疑问，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然我们很明白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许许多多困难，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希望局势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正因为这样，所以联合国在解决裁军问题方面更迅速地采取一些更有成效的措施，对于解决德国问题以及欧洲安全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今天许多其他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世界和平是否能够得到保持，最后都要看这些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 联合国的普遍性

由于联合国具有普遍性这一原则没有充分实施而引起的不良后果，现在比国际局势紧张期间看得更加明显了。从联合国的概念和它的基本原则看来，这个组织只能是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的组织，特别是今天，整个世界都出现了一种越来越有力的积极趋势，同时国际关系终于开始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创造条件来和平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阻挠实现普遍性

这一原则对于积极因素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害处。

的确，现在是在联合国的普遍性这方面采取坚决的积极的步骤的时候了。最近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十周年纪念大会和目前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进行的辩论，都说明这种步骤在联合国内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同时还得到世界舆论的全力支持。

人民中国没有出席联合国这一问题是普遍性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联合国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失，今天它的价值已经降低了。现在为了努力巩固世界和平和创造有利的条件来解决重大的争执问题，绝对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事实上它也必须代表它的人民在国际事务方面负起自己的责任。正确地 and 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再没有理由拖延这个问题了。

### **对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都有利的经济援助**

过去联合国曾经彻底地研究过国际资金问题，即援助世界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问题，并且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在发展经济方面进行援助的基本概念在于这种援助必须对发达的和不完达的国家都有利，也就是说，必须对整个世界经济有利。

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建立联合国促进经济发展特种基金的问题。尽早建立这种基金，毫无疑问是联合国的主要任务之一。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整个世界的社会进步和直接的经济利益，也就是为了提高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用国际基金而不用私人资本或者通过普通国家协定来加速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会大大削弱通过开发不发达国家来进行经济扩张的因素。因此，一方面这种办法可以加速

那些国家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使它們保持独立,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平等权利,而这样也就可以加强和平。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們从一开始就毫無保留地积极贊助实行这个办法。最初这个主張遭到的反对非常强烈,但是今天我們已經可以說,这个主張正在日益得势。这种發展不仅是由于鼓吹这种主張的人作了許多努力,而且是由于在目前的社会、經濟和政治条件下,解决不發达国家的經濟發展問題越来越成为發达国家摆脱国内的經濟矛盾和困难的唯一可能的出路。

要有健全的經濟,就要加强国际交流;如果整个大陆还停留在落后状态、甚至自然經濟的状态,那末,这种交流就無法發展起来。因此,不給予不發达国家国际援助,世界經濟交流的水平就不能大大提高。正因为这样,所以国际緊張局势的进一步緩和,毫無疑問地使这个問題比截至目前为止的任何时候更为重要了。

在国际关系緊張的时期,許多方面指出了联合国組織机构的缺点和联合国宪章中應該加以修改的条文。几年来,認為廢除或者修改某些条文就可以加强这个組織的一些国家,一直把爭取修改宪章作为它們的一項任务。

的确,1945年在旧金山通过的宪章是有缺点的,不过还不限于大国居于特权地位这一点。事实說明,阻撓联合国进一步發揮作为和平、安全和国际合作的工具的作用的,并不是宪章,而是不健全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之間的关系。

不仅如此,宪章中可能建議加以修改的是这样的条文:如果那些在建立联合国方面起作用最大的国家不同意,那末任何修改企圖都沒有用。因此,只有全面地、积极地發展国际关系和逐步解决最重要的国际問題,才能解决这个問題。如果条件还没有成熟就强制修改,那就会妨碍目前国际生活中的积极趋势,破

坏目前的均势而增加不信任的气氛，同时还会使这个世界性組織本身遭到打击。

### 南斯拉夫的貢獻

南斯拉夫作为十年前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 50 个會員国之一，从联合国宪章的原則和目标方面得到了鼓舞，并且坚信这是国际統一体在我們这个时代为了向前發展而應該走的道路。在联合国成立以来的整个时期中，南斯拉夫一直是積極主張实现这个組織的基本原則的国家之一。

南斯拉夫在联合国以及它的附屬机构內積極工作，为达到这个組織的目标和加强这个組織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貢獻。甚至在大冲突的危險籠罩着整个世界，联合国本身由于这种發展而遇到困难的时候，南斯拉夫也从来没有放弃联合国的原則。它曾經主張在国际关系中也采取这种态度。今天这种态度至少已經部分地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的一种实际可行的政策，即坚持不渝地实行联合国的原則和目标的政策，積極共处的政策。

如果我詳細地叙述南斯拉夫在發揮联合国的作用方面所作的貢獻，那就要耽擱太多的時間。这样做是沒有必要的，因为世界上很难找得出哪个政治人物会否認南斯拉夫是以最有建設性的态度对待这个組織的国家之一。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过去南斯拉夫仅仅在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內，就曾单独地或者与其他国家一道作为一百多件有关重大国际問題提案的倡議者或者参加者。在其他国际机构中和在次要問題上采取类似行动的次數还要多好几倍。

关于联合国的經濟活动，南斯拉夫一貫主張，沒有歧視的多方面国际經濟合作是發展世界經濟和保持和平的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南斯拉夫抱着这种态度和認為国际經濟



合作是不可分割的世界經濟的一个必需条件，它譴責了孤立和自給自足的政策，以及强迫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集团与世界經濟隔絕而最后使这些国家和世界經濟都遭到損害的一切措施。

南斯拉夫还在有关不發达的国家和附屬国的問題上一貫地全力支持这些国家。同时它还在社会、人道和文化方面进行非常積極的活动，并且在这方面努力使联合国在解决經濟、社会、衛生和其他問題方面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最有成效的工具。

南斯拉夫首先倡議，經濟和社会权利是人的自由人格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所謂傳統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样。經過几年的討論以后，統一这两种权利的思想終于占了上風。

現在我简单地总结一下：南斯拉夫認為联合国是促进和平、安全、国际合作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工具，它抱着这种看法在联合国的一切工作中一直給予多方面的支持，并且进行建設性的活动，从解决最严重的政治問題到广泛地参加联合国中一切組織机构的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

今天在联合国十周年紀念的时候，我們可以再一次满怀信心地說，这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毫無疑問，今后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的具体工作中必須而且一定会保持这种态度。我們采取的这种政策，正像我在这篇發言中所說明的，不仅是为了加强和平，而且由于这一点也是为了社会主义，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不能是两个不同的和可以分割的概念。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們从来沒有忘記这一点。

我們向来反对外来的力量将任何社会制度强加于任何国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制度，正像我們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一样，即使这种干涉来自社会主义方面。这种行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有害的和反动的后果。社会主义是一个国家内部社会發展的問題

題，它的形式是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来决定的。

另一方面，毫無疑問，国际合作的全面發展是以平等的原則为基础的。各国的社会主义力量都会在这种發展中通过国家的政策或者直接的方式适当地表现出来，同时这种發展会大大地加速社会的进步和加强今天世界上許許多多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經濟和政治的因素。而今天的世界無疑地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正处在迅速地改变各种社会結構的形式、首先是它的經濟基础的过程中。

国际合作無疑地会建立或者加强联系，会相互影响这种进步的發展过程。因此，共处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和平的利益以及社会主义的利益的。

今天在紀念联合国宪章生效十周年的时候，我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相信，实现积极共处的原則就是維護这个世界性組織成立时所建立的那些原則。在联合国和所有的国家为了建立更加持久的和平而作的努力中，这些原則越是能够真正地成为主要因素，人类就会越加肯定地能够滿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在促进这种發展方面，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一定会尽力作出自己的貢獻。

## 铁托致函苏联共产党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原载1956年2月20日“战斗报”)

亲爱的同志们：

請允許我代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向你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致以同志的祝賀；真誠地希望，你們为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际关系与合作进一步發展而进行的工作，获得胜利和巨大成就。

我相信，你們这次的代表大会不仅对苏联国内今后的建設和巩固方面有很大意义，而且对外政策上，对加强和平及和平解决各种爭端問題也有很大意义，这些問題在目前因其尖銳性和迫切性而使世界不安，为了解决这些問題，必須团結和加强世界一切进步力量，来阻止新的战争冲突和对整个人类具有可怕后果的破坏。

今天，我国清楚地知道，貴国在工業化方面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同时我們也看到过以前貴国在这方面的落后性；所以，在获得这些巨大成就的过程中，苏联人民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共产党员們表现了怎么样的列宁主义的徹底性、坚决性和頑强性，我們是能够很好地估計到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的經驗、阻力、困难和各种干扰使我們能正确地估計到你們为达到今天这样高度的發展水平所需克服的一切困难和阻力。

自去年(1955年)，貴国領導者——赫魯曉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揚等同志来南訪問和被称为貝尔格萊德的宣言通过后，不仅在發展我們两国关系和我国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上开始了

新的阶段,而且在国际关系的發展上,在加强和平力量和各国間逐漸建立信任和互相諒解方面,在緩和新战争的緊張及恐怖气氛方面,有其重大的积极的作用。

我認为,我們远不能对目前的国际形势感到滿意,但我們可以相信,和平的呼声一定会越来越大于战争的叫嚣。

同志們!我最后認为,我們两国关系的逐漸不断地改善,是使我們滿意的,也正是这种渐进的道路对于促使双方信任和合作的加强是健康的,所以它能够日常实践中扫除那些有可能阻碍我們双方信任得以巩固的因素。

此 致

同志般的祝賀

鐵 托



## 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两国 政府發表的联合声明

(1956年6月20日)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应苏联最高苏維埃主席团和政府的邀請，在1956年6月1日到23日，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訪問。

在铁托总统訪問期間，两国政府的代表举行了多次會議。南斯拉夫方面参加會談的，除铁托总统以外，有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外交国务秘书长波波維奇、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員托多羅維奇、克罗地亚人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兼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員布拉热維奇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駐莫斯科大使米丘諾維奇。苏联方面参加會談的有：苏联最高苏維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苏联部长會議主席布尔加宁、苏联最高苏維埃主席团委員赫魯曉夫、苏联部长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和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长謝皮洛夫、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庫茲涅佐夫和苏联駐貝尔格萊德大使費留賓。此外，南斯拉夫方面参加會談的还有共和国总统秘書长維尔范和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弗拉阿薩；苏联方面参加會談的还有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員伊利切夫和外交部第五欧洲司代理司长列維奇金。

这次在誠摯友好的气氛中以及在坦率和彼此完全諒解精神下举行的會談，使我們有可能就过去一年国际局势的發展以及进一步發展两国之間的关系和全面合作問題广泛交換意見。这种意見交流表明了，在对国际局势的發展和現存的国际問題的估計方面，两国政府的观点有广泛的相同之处，而且在进一步加

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聯盟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間的相互諒解和友誼方面，具有共同的願望。

—

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滿意地認為，国际緊張局势在过去一年中有了进一步的緩和。两国政府欢迎国际接触的扩大和日益加强的要求通过談判途徑解决未决的国际問題的趋向，認為这是国际緊張局势緩和的标志。

双方一致認為，1955年7月的日內瓦四国政府首脑會議在这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去年的事件發展表明，不可能指望“冷战”时期累积起来的各項問題能迅速得到解决，可是两国政府認為，爭取扩大可以促进各国人民之間信任的国际合作的努力得到了加强，这个事实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在这种新的气氛下，联合国爭取在一切国家有組織地平等地参加的情况下討論和成功地解決問題的力量和能力增加了。1955年8月联合国在日內瓦召开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會議的成就和在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的工作的良好开端是同这种气氛有密切关連的。联合国的作用和能力的加强还表现为，由于接納了新會員国，在把联合国变成一个無所不包的組織方面已經取得了成就。两国政府欢迎联合国从欧洲国家以及亚非国家中补充了新會員国，亚非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这一点在万隆會議上已經有了反映。联合国这一行动促进了这些洲的各国人民在世界上的平等作用。

然而，两国政府遺憾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到現在还没有得到承認，它們将坚定地努力爭取这个偉大国家的這項权利得到承認。

两国政府仍然确信，关于台灣和其他島嶼的問題必須按照

中国对这种領土的合法权利来求得解决。

两国政府認為，在“冷战”期間形成了互相对立的观点，积累了很多不信任，因此，希望能够輕易地消除解决国际爭执問題方面的一切障碍，并且就所有問題迅速达成協議，那是不合乎邏輯的，也是办不到的。

本着这种观点，两国政府認為，必須努力就現在已經可能解决的問題尽力达成協議，两国政府同意，坚决要以一定的优先或是一定的程序来审查爭执問題、坚决要在一定的时期內解决这些問題的这种做法，是不可能导致有益的結果的。两国政府从这个角度上研究了裁軍和集体安全的問題以及使世界、特别是使欧洲陷于分裂的其他問題。

鑒于裁軍問題对人类命运的整个意义，两国政府同意，迫切解决這個問題的条件已經成熟了。

同时，两国政府着重指出，就裁軍問題那怕达成局部的協議也是有意义的，并且一致希望，实行单方面的裁減武装部队，可以加速和促进这个協議。

为此，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不久以前苏联政府作出的关于裁減軍备和武装部队的決議，認為这是对促进解决普遍裁軍問題的一个重大貢獻。

考虑到和平利用原子能对人类經濟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两国政府同意，應該鼓励和支持各国人民間在这方面各种形式的、平等的和民主的合作，因此它們还同意，根本禁止原子武器而使原子能只用于人类的和平目的，應該是共同的目标。

它們認為，当前的国际局势使得有可能采取更坚决的步驟，以进一步消除在“冷战”时期阻碍欧洲各国人民合作的否定因素；并且認為，在全欧集体安全、經濟合作和加强文化联系上更

广泛的協議，会有助于消除欧洲分裂为軍事集团的情况，并且会有利于解决發展欧洲各国人民間的全面合作道路上的主要爭执問題。

至于德国問題，两国政府認為，在战后德国的領土上形成了两个主权国家的今天，要达到德国的統一，必須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間的談判。它們还認為，其余的国家，首先是大国，应当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在整个国际緊張局势已經大大緩和从而展开了广闊远景的情况下，两国政府也注意到由于国家間的地方性冲突和磨擦所可能引起的危險。它們表示要坚决努力通过联合国以及通过它們同各国的直接关系来促成这一危險的消除。它們今后仍将以承認一切国家人民对民族独立發展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为出發点。

两国政府坚信，改善国际局势的重大条件之一就是国与国之間日益增长的經濟联系，——必須要使一切国家人民越来越多地参加物質和精神財富的交流，要吸引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国际合作和接近，以利于世界的共同福利、和平和进步。两国政府同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須尽最大努力爭取尽可能广泛地發展国际貿易和經濟合作，在国际經濟关系方面取消一切形式的歧視（包括禁运），以及对各个国家自由發展經濟的阻撓。

两国政府認為，加强文化科学交流方面的接触和合作，也是促进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因素。在同一意义上，它們今后將繼續支持附屬領土解放的过程，在这方面，联合国應該起头等重要的作用。

两国政府同意：發达国家和不發达国家之間深深的鴻沟是



現代世界最大的問題之一，要解決這一問題，各國必需作相應的努力來援助不太發達的國家，首先是通過廣泛的國際集體行動的途徑。

它們今後將繼續本着這一精神，爭取在聯合國範圍內採取愈來愈廣泛和有效的措施，對不夠發達的國家給予經濟和技術援助。兩國政府認為，這種援助以及在提高不太發達國家的經濟方面的合作，應該在不附有軍事和政治條件的情況下實行。

兩國政府重申它們堅持以自主、獨立、領土完整、互不侵犯、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為基礎的和平積極共處的政策；這種政策是最近幾年國際局勢的發展所形成的要求的結果，也是進一步鞏固和加強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之間全面合作的最有效的工具。

## 二

在會談期間，特別注意地研究了兩國之間的關係，並且非常滿意地指出，在蘇聯和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兩國政府 1955 年 6 月 2 日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指導它們互相關系的那些原則，為全面的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礎，並且有效地促進了和平和國際合作的利益。

由於雙方的努力，在解決宣言規定的條款方面取得了重大結果。

兩國政府滿意地指出，已經圓滿地解決彼此的要求的問題，從而促進了早先中斷的經濟關係的恢復，並且促進了互利的經濟合作的發展。在這一方面，已經建立了正常的貿易，簽訂了長期貸款和投資協定、科學技術合作和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合作的協定等。

簽訂了文化協定，從而為有效地文化合作和交流建立了廣

泛基础。

簽訂了新聞报道工作的协定。

苏南两国政治和其他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以及它們取得的成就表明，两个关心和平和社会主义利益的国家的合作，为全面地、有效地發展它們之間的友好关系提供了最广泛的可能性。这种合作是以互相尊重貝尔格莱德宣言中关于独立、平等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为基础的，这种原則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國家日益广泛的采用。

这次会談使两国政府有十分有利的机会来考虑今后互相合作的可能性。两国政府表示了自己的希望和打算：今后繼續进行直接的接触和双方代表定期就政治問題和双方关心的其他問題交換意見。

进一步扩大經濟联系問題和貿易水平問題的可能性已經得到肯定，并已經达成協議，同时指出了长期經濟协定是有利的。

决定扩大科学合作，互派科学家、专家、学生和交換科学書籍。

在已經締結的文化协定的基础上将拟定必要的文化合作工作計劃。

两国政府十分重視不久以前簽訂的关于双重国籍問題的协定，認為这是在調整两国关系方面的一个很大的貢獻。两国政府要尽一切努力来促使这一协定的执行。

鑒于政治、社会和工会組織在这以前为了交換社会主义經驗和交換意見而进行的接触已經得到了成功的發展和带来了有益的结果，两国政府同意，今后將繼續帮助和促进这种在实际的基础和符合两国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的接触。

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認為，在会談的过程中就討論中的一切問題进行的有成果的交換意見，証明了

以共和国总统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对苏联所作的访问，是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之间为了两国人民以及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而进行的友好合作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

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尼·亚·布尔加宁

代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

约·布·铁托

1956年6月20日于莫斯科

##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 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的宣言

(1956年6月20日)

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1956年6月1日到23日正式訪問苏联期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書記鉄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書記卡德尔，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員布拉热維奇、米丘諾維奇、波波維奇和托多罗維奇，作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員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揚、莫洛托夫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員謝皮洛夫，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代表，本着同志的真誠和坦率的精神，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和合作問題交換了意見。

他們在会談中就下列各点达成了一致的意見：

一、1955年6月2日的貝尔格莱德宣言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奠定了健康的基础，宣言中宣布的原則在它們的互相合作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二、貝尔格莱德宣言签署后两国之間的合作和关系的总的發展，以及两国人民的政治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間的接触，也替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間的合作創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根据上述情况，并且考虑到現代社会主义运动發展的具体条件，本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



者联盟代表团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一致認為：繼續进行和發展两党目前的接触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繁荣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实行合作，为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就許多当前社会主义發展的問題实行合作，也是为了發展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的世界各国人民之間的和平共处和合作，为了和平、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同时，两党代表認為，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間的关系和合作的进一步發展，無疑地将有助于进一步發展苏南两国之間的合作，有助于巩固南苏两国人民的永久友誼，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工人階級执政的国家中的領導政党，并且两党的共同目标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保障人类进步和持久和平。

三、双方相信：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發展道路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發展多样形式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加强，并且認為任何一方都不得有强迫对方接受它的关于社会主义發展道路和形式的見解的任何傾向。双方本着这种看法同意，上述的合作应当以完全自願和平等、友好批評以及就两党的爭执問題进行同志式的交換意見为基础。

四、基于上述原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合作首先将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相互全面地介紹两国建設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就对社会主义實踐的發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發展方面共同关心的問題，以及就有关和平、各国人民之間的接近及相互来往和全人类进步的問題，进行自由的和同志式的交換意見。

五、現在世界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变化表現在社会主义力量的蓬勃增长上，表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上，表現在工人階級在解决当前国际形势發展的具体問題方面的作用的增长上；

这种变化向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許多重大問題。这个事实說明，也有必要对种种現象、主要的物質的和社会的因素以及現在世界的發展趋势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这些原因，他們同意，将本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尽力鼓励在他們的相互关系上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相互合作，鼓励在社会主义科学思想方面交換意見。

六、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間具体的合作形式方面，双方代表团同意，将通过下列办法进行合作：直接接触、書面和口头的陈述和交換意見、代表团相互訪問、交換材料和書籍，以及根据需要举行党的領導者的聚会，討論双方关心的迫切問題，总之要利用一切建設性的同志討論的形式来实现合作。

七、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認為，这种合作是他們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接触的組成部分。

八、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認為，为了爭取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为了爭取社会进步，一切进步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須进行广泛的合作，这一点在全世界範圍內越来越强烈地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現出来。这种合作是现代社会發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关系應該是平等的、开誠布公的、民主的和为世界輿論所能够接受的。这种关系应当促进互相了解和就共同关心的种种問題进行协商，應該有助于在耐心解釋的基础上互相了解各方面的立場和观点。同时，不用說，这种合作的每一个参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發展条件，在符合合作的参加者所追求的共同的进步目标的情况下自由行动。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相信，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工人运动在上述原則和形式的基

础上进行合作，会有利于双方的人民和有利于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相信，这样，他们就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之间的普遍的接近有所贡献，而这同样也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代表、总书记

约·布·铁托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第一书记

尼·赫鲁晓夫

1956年6月20日于莫斯科

## 对美国“埃迪·薛伍德” 研究班人員的談話

——1956年7月16日在希里俄尼島

(原載1956年7月22日“战斗报”)

鐵 托

埃迪·薛伍德首先代表研究班人員講話說，雖然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基督教徒，但他們對鐵托元帥是友善的，這種友善不是以思想類別為基礎的。然後，他就提出了有關鐵托總統訪問蘇聯的一些問題，與此有關也提出了南斯拉夫與美國今後關係的一些問題。

鐵托總統歡迎他的客人並感謝埃迪·薛伍德先生熱誠的言辭，隨即回答他的問題：

我願意作一個一般的說明。首先，我願意告訴你們，今天我很高興又能夠同埃迪·薛伍德研究班的人員見面，我相信你們是我們的朋友。我願意每個人都成為我們的朋友，人們不分為各個不同的集團。我們努力的目的就是使世界建立起尽可能多的友誼，人們彼此都尽可能的接近。因此，一開始我想先回答埃迪·薛伍德先生最後提出來的那個問題：我們是否同以前一樣保持着友誼，一切是否同以前一樣，以及是否走錯了路。我們的願望而且相信和以前一樣我們仍舊是朋友。在我們方面，沒有任何因素會損傷這種友誼。

**我們訪蘇歸來感到十分滿意**

我們訪問蘇聯不是為了損害我們同另一方的關係，我們也



并不認為如果在将来我們的友誼只朝向東方而不朝向西方，特別是美國，会更好一些。我們訪問蘇聯是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必然的發展，這種關係由於去年蘇聯領袖赫魯曉夫、布尔加寧和米高揚訪問南斯拉夫而獲得了新的內容。這些訪問對我們兩國關係有什麼內容呢？首先，消除對南斯拉夫的一切指責。其次，南蘇兩國關係確定了新的基礎，這樣的關係是我們所期望的，在我們看來是應該存在在大小國家之間的。現在的蘇聯領袖接受了我們的願望和觀念。這包括以下的內容：完全平等的關係，無論在內部發展和外交政策上都應尊重主權和完全獨立，不干涉內政，在經濟、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就兩國所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合作，為了鞏固和平、緩和緊張局勢，並避免各國人民之間的衝突在國際事務方面進行合作，最後蘇聯領袖堅定地聲明拒絕以戰爭為解決國際問題的手段。所有這些符合於我們願望的因素，都是被接受的因素，而且體現在貝爾格萊德宣言里。

我們訪問蘇聯是由於蘇聯政府的邀請。蘇聯政府將以同級的回訪答謝我們這一訪問，因為去年蘇聯領袖訪問南斯拉夫是為了正常化。我們這次訪問蘇聯是在我們之間的关系正常化了一年之後，這種關係已日益具有良好和積極的內容，因此我們的訪問目的是為了再一次討論所有的問題，看看貝爾格萊德宣言是否已充分運用，也是為了就國際局勢和擴大我們相互关系的辦法交換意見。我們代表團之所以如此組成，原因就在於此。

當然，這次訪問是符合於不同社會制度的各國共處和合作的我們外交政策的原則的。這種共處和合作，不僅僅是在內部發展上有若干差別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並且也適用於不分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制度的國家之間。這次訪問也體現了我們的願望，那就是致力於世界緊張局勢的緩和，各國人民之間的接近，消除戰爭危險，並尋求解決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的新道路。

我們前往苏联並沒有錯。相反是我們从苏联归来感到十分滿意。首先我們除了早已認識的三位苏联領袖外，得以認識其他的苏联領袖，并得以同工人、农民、知識分子队伍的广大苏联人民群眾接触。这使我們有可能看到苏联在内部發展上已达到什么程度，并自从斯大林时期以来發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現在請讓我扼要地談談我們在苏联的見聞，我們怎样認識那兒的發展以及我們对現在的苏联領袖，他們的要求和願望是怎么想法的。

### 南斯拉夫不放弃同西方国家的友誼

首先我一定得告訴你們，我們在那兒受到了苏联領袖們完全平等的接待。我們不仅受到了最高的荣誉而且也获得了領袖和人民两者最热烈的欢迎。在关于許多国际問題和内部發展問題的交談中，显然是他們絕對地尊重另一方的意見，在这里也就是尊重我們的意見，虽然在某些問題上我們的意見并不是一致的。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时期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当然我們对所討論过的問題的意見有許多是完全一致或几乎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关于緩和緊張局势和認為有必要为进一步巩固和平和防止战争而斗争。双方对于中东問題表現了特别的关切，因为那兒的局势还不明朗。双方都表达了这样的願望和决心，有某种必要与其他国家一道以和平的方式消除这一不仅可能貽害于中东而且是全世界的焦点。在莫斯科發表的宣言里关于我們取得一致意見的許多問題，也肯定了我們对国与国之間关系的意見。

現在我想回答埃迪先生所談到的这样一个問題：你們美国人当中对于我們訪問苏联表現出严重的猜疑和神經過敏，因此对于这一訪問所意味的是什麼，提出了許多問題。我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訴你們，苏联領袖中沒有一個人說过南斯拉夫應該加

入他們的任何集團的話。沒有說過一句話要限制南斯拉夫的獨立，使它陷于某種集團的從屬的控制體系。因而我們同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也是如此的。沒有說過一句南斯拉夫應該放棄它同西方國家的友誼的話。相反地，蘇聯領袖自己就着重指出，他們不僅絕不希望南斯拉夫削弱它同西方的關係和使這種關係惡化，而且認為如有可能應該改進這種關係。因為，他們說，雖然南斯拉夫是個小國，但它今天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是積極的，特別是關係到緩和緊張局勢，為了使南斯拉夫能根據它的可能成功地執行它作為和平戰士的使命，當然有必要儘可能的同一切國家建立最友好的關係。關於使西方，特別是美國困惱的東西，我要講的就是這些。無論如何，人們必須耐心地觀察將來的發展，人們應該相信南斯拉夫和它一貫的外交政策，因為我們沒有理由要放棄使我們獲得好處並且在我們認為是有助於世界局勢緩和的原則政策。

### 蘇聯人民感到從壓抑他們的夢魘下解放出來了

現在我願意談談關於蘇聯人民。我一定得說蘇聯人民所給予我們的歡迎使我們感到異乎尋常驚奇。一次兩次地或者還可能把人民組織起來歡迎某個人，但沒有人能夠強迫人民在一路上一路從邊境起、每個車站甚至不顧深夜和大雨，佇立在那里等待着，只是為了能夠握一握手，說一兩句熱情的話。而我們在蘇聯幾千公里的旅程就是這樣，更不要說在莫斯科、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索赤、諾沃西皮爾斯克、基輔、以及其他城市，蘇聯人民對南斯拉夫那種巨大的不加虛飾的友好場面，在那里成百萬的公民聚集在街頭。這之所以特別使我們感到驚訝，因為蘇聯人民多少年來沒有被教育以這樣的方式來歡迎人，因為在斯大林時期，是沒有人到街上來對任何人表示歡迎的。可是現在蘇聯人

民已經来到街头像我們南斯拉夫人民一样那样自在和明朗，愉快地以滿面的笑容来緊握你的手。每一个跟我們交談的人都这样說：“讓我們为和平而斗争。我們也要求和平，我們經受了战争的苦难，我們看到如果有和平，我們就有可能为我們更加美好的生活进行大量的工作。”如果这些話只是某个領袖对我說的，我很可能不費吹灰之力来接受他的話而且还可能怀疑他多少帶有一些宣傳，可是說这些話的都是普通人、农民、工人、科学家和普通公民。

是什么使得成群的人以这样宏偉的場面到街头来欢迎我們呢？这是怎么可能的呢？在我看来不仅是因为苏联人民从来没有相信过南斯拉夫是像人們所指責它那样的一个国家。这决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我認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自从斯大林时期以后，苏联本身所發生的那些变化，这使得他們松一口气，不再受到压抑他們的并使他們低头的梦魇的控制。这些是在苏联新的領導之下非常显著的成就，現在有可能进行更自由的討論，有可能更自由的表达各种意見，現在在工农业發展上都有了成就；苏联人民看到了所有这一切，知道一个具有更强有力的进步推动力的时代已經来到了。从这里苏联人民获得了無限希望，如果这种發展将按新的領袖們所开导出来的方向推进，則这种过程將繼續下去，他們將更多更快的获得成就。总而言之，他們有了更光輝的远景。

我們也看到了自从我在1946年訪問以来他們所建立的新工厂和技术上的长足进步。我們看到农业的危机已經克服了，因为新的領導已經把农民从斯大林所强加的重稅負担下解放出来。所有这一切我們都是看到的，可是我的同志們和我最为惊奇的是苏維埃人。今天的苏联人民看起来已經是完全不同了；他們像自由人了，他們知道能够对人批評了。他們有了远景。一



句話，他們知道現在個人能够自由地表達自己，不再是無足輕重的小細胞了。這些可能性今天存在，今後還會繼續增長。好在你們就要去那兒將會親自看到這一些。

我應該告訴你們，我不是那種會一時沖動的人。我從發展上來觀察每件事物。蘇聯發生革命的時候我在那兒，在革命以後的1935、1936、1938以及1939年我又去過那兒。我了解蘇聯人民。我知道人民在沙皇時代是怎麼生活的——那簡直是奴隸般的可怕；我也知道在此以後蘇聯人民為了戰勝落後，建設工業曾經怎樣艱苦地生活。這就是為什麼現在這一些對我是一種啓示。這和它以前的情況是完全不同了。

還是回到那個問題上來，為什麼南斯拉夫代表團，一個小國的代表，在蘇聯竟受到這樣的歡迎。無論在戰爭時期或平時南斯拉夫人民都顯出了他們是值得人尊敬，有時甚至是值得人贊揚的。可是蘇聯人民——這樣一個占全球土地面積六分之一、擁有22,000萬公民的大國——這樣歡迎我們並不是因為他們感覺自己軟弱要我們同他們結成同盟。決不是因為如此，相反的，他們感到他們自己比起別人來是強大的——所以原因不在此，而是因為他們尊重這樣的民族，它們在必要時候，如在上次大戰中，肯為了自由和獨立而付出犧牲的并和蘇聯人民一樣矢忠于和平願望的。他們這樣告訴我，而我也完全相信這一點，他們除了和平外不求其他，他們決不要戰爭。他們要我把這一點轉告南斯拉夫人民。不要以為我在宣傳；你們自己到了那兒就會知道的。

我願意告訴你們，我們的訪問蘇聯以及發表的聲明是十分有助於世界的緩和和和平的鞏固的。在那兒無論在內部發展和外交政策上我們都沒有束縛住自己。我們可以利用在他們發展中所日益運用的一些積極的東西，他們同樣的也不拒絕我們的

積極經驗。我們願意同每一個人維持友好的關係，包括美國和其他國家，不管我們制度的不同，不管我們是共產黨人你們是資本家。（在這裡我的意思並不就是指你們而言——你們中間有些人或許是資本家，有些人則是普通的美國公民。）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內部秩序是這一國人民自己的事，決不是我們別國人的事。如果有一國人民要某一種制度，那就讓他們有這種制度。我們在這裡建立我們自己的制度，可是這個制度也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而且我們也不停留在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東西上面。我們正在不斷地使我們的制度臻於完善。我們認為沒有價值的東西就加以改變，以更好的形式取而代之。換句話說，我們是設法使我們的人民過得幸福。我們的全部生活的目的就在於此，今後當繼續朝此方向努力。

最後，我想再一次強調那已經不存在疑問、不存在問題的一點，那就是我們忠於和平事業，我們希望各國人民之間建立和平和和平合作。

研究班人員歡迎鐵托總統的結束語，並對他的整個談話報以長時間的鼓掌，隨後就向他提出了幾個希望他予以解答的問題。

### 與東歐國家的關係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在 1948 年蘇南衝突時期，南斯拉夫同其鄰國的關係，是否從這些國家獲得任何支持。

鐵托總統答：鄰國既沒有給予我們支持也沒有給予我們幫助。相反地，他們所做的正好相反；他們同樣地攻擊我們，有些態度甚至是更壞一些，直到斯大林死後才停止。可是我們倒是充滿了勇氣。

現在他們對南斯拉夫的態度有些什麼改變？

現在在某些国家多多少少的都有了些改变，特别是在貝尔格莱德宣言以后。我的意思是正面的，也就是說我們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都有了改善。

南斯拉夫是否有可能接受对于欧洲这些共产党小国集团的领导权？

铁托总统答：我們并不打算领导其他国家，因为这将造成一种不会起积极作用而只会起反作用的因素。这不是我們所求的。我們一直反对建立共产国际，因为这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友好是没有用处也没有好处的。如果各国的人民自己决定它們所希望的制度，那是最好不过的。苏联領袖們已經採納了南斯拉夫的这种态度，同时这一点也已經在关于两党之间关系的莫斯科宣言中确定下来了。斯大林絕不会採納这一点。这是显著的进步。

### 关于波茲南事件

我还不能作仔細的分析，因为我对于这个事件所牵涉到的各項因素并不是了解得很清楚。因此我現在还不能說波茲南事件是起因于这个或那个因素，不能說事件是简单的。可以肯定是有些問題的，因为波兰人民正在建設工業，条件是够艰苦的，所以我可以相信工人中間存在某些不滿。可是另外方面，我也相信某些势力是插手其中的，它們想制造分裂，它們与工人并無共同之处，利用了这显然的不滿。有一部分武装示威就特別說明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只能說这一些。我認为这种事件并不是一条正当的道路，因为人們恶意地利用了这原只是局部的事件。可以說是十分不当地利用了工厂管理在工資問題上的誤解这样一件事情。

在这里我可以这样說，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所有其他的东欧国家，对各种斯大林主义方法的廢除以及整个民主化过程發展

得非常迅速——所以企圖对这种进程施加外来的压力，或用以其他目的服务，只能起反作用，也就是說只能有害于这个过程。如果有一个人插手了，別人也就有权利来插手。事情就是这样。

### 关于巴尔干同盟

然后有人問到同希腊和土耳其同盟的情况，他訪問莫斯科是否也可能影响到巴尔干同盟。

鉄托总統答：首先我必須說，苏联方面沒有問过一句我們为什么建立巴尔干同盟的話。而当我在談話中提到我們对德国問題、中东問題以及同欧洲和非欧洲国家关系的态度时，我倒是也談到了我們如何对待巴尔干同盟的問題。我說，由于希腊同土耳其之間的冲突，巴尔干同盟在今天已經不像原先那样巩固了。我說，巴尔干同盟在今天首先不是強調軍事性質，而由于其对整个世界局势和增进我們之間关系的关切，条約已經具有使三国日益沿着和平合作道路發展的这种性質——这也就是說，它的作用是朝向稳定普遍和平和这一地区各国之間的合作，起一种積極的功能，不但絕不威胁任何人而相反是有助于維護世界的和平。苏联領袖同意我上述的解釋。而这也是最为現實的道路。

### 对建立新德国軍隊方法的担心

問：我們才从德国来，我們看到那里的人民要求統一他們的國家。你認為这是否适当并应如何达成？

答：我想今天沒有任何人會說这是不适当的。因为这样就需耍解釋不适当的理由，而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們一定得承認，屬于同一民族的一國人民尋求統一他們自己的方法是積極而正當的。可是我認為棒子由別國來裁



剪是錯誤的，因为这有可能剪得太长或太短。由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是比較好的，因此最好設法讓东西德之間建立接触，由他們自己开始商談統一的方法和双方的国内地位以及内部制度。

問：我們去過德國，建立第一批德國軍事單位的時候我們正在那里。你認為在西德建立軍隊并加入北大西洋公約对于世界是有好处呢？还是有危險呢？

答：我并不掩飾，我对于現在建立新的德國軍隊的這種方法是担心的。人民或者還認識不到這一點，可是以後會證明這樣的做法是錯誤的，因為這是以建立軍隊為開始的。進而言之，雖然國際局勢在變化，戰爭危險已經減退或可說是已經消失了，但是事情的發展還完全按着原有的慣例像過去西方受到威脅一樣。如果把德國武裝問題推遲到德國統一以後就好得多。這樣東德或西德都不會武裝他們自己了。如果這個前景還是遙遠的，不明朗的，那麼我們就必須等待裁軍談判的進展，以便關於大小國家的裁軍獲致了成就，可以決定德國軍隊適當的人數。這就會是現實的，不致于使任何人擔心。現在的辦法是令人担心的。你們不會擔心，因為你們離得遠，可是這使我們擔心，因為我們相距咫尺，我們不知道明天會意味着什麼，將來在德國會發生些什麼，總之，我認為今天整個的國際局勢是這樣一種局勢，沒有必要過急地武裝西德。我可以肯定，如果西德不武裝，東德在道義上也就沒有權利去武裝。我從最近看到消息知道，東德裁減了30,000人，所以現在東德軍隊在90,000人左右。

一句話，經常總有人不是用最有益的方式，而是從錯誤的角度出發開始某些工作。裁軍——建立國與國之間及各國人民之間的信任是今天的基本問題。建立越多的信任，也就越容易解決最嚴重的問題。

## 关于南埃印三国会谈

問：你对于同納賽尔总统和尼赫鲁总理第三次会见有何期望？

答：我希望我們交換意見并就与我們相互关系以及普遍有关的至今仍为世界所关切的各項問題进行商談。自然，在这方面我們將設法获致一定的結論，关于这样一些国家應該并可能做些什么，它們不要战争，要求保持独立，譴責以战争为解决国际問題的手段，为争取自决权而斗争并反对殖民主义。

## 关于改善生活水平的措施

問：我想知道你認為哪些是南斯拉夫这两年来最重大的經濟和其他方面的成就？

答：在經濟方面，在这两年內我們作了些改变，例如在今后投資的分配上。我們削減了建立主要工業的投資，而把較多的款項轉移于消費品工業和農業。除此以外，我們在國內政治管理机构、分散管理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展，把經濟、文化以及其他問題交到公社，这样从中央的机构到下面的机构，行政权是越来越分散了。我們在去年秋天采納了这种方法以后已經获得了显著的成就。除了某些季节性的农产品以外，市場的价格已多多少少的稳定下来。貨幣的流通已經减少了相当数量（約100—120亿狄那尔），这一切說明我們在今后發展方面找到了正确的路綫。貨幣的流通尤其說明了这一点。总而言之，我們已經找到各个工業部門之間的正确比例，并集中力量在使我們最快地获致生活水平改善的部門。

## 关于教会的地位

問：目前在南斯拉夫教会的地位如何？人民在一般信仰上

的自由以及在履行宗教义务上的自由达到什么程度？

答：我已經不止一次的談过这一点。我不想在此重复我以前所說的——但我願意簡單地告訴你們，如果你們对此有何猜疑，你們可以在星期天到南斯拉夫任何一个地方的教堂去，同各个教会的負責人談話，举例說东正教会的主教或者是伊斯兰教的代表或者是新教以及其他。也可以同天主教的代表們談談。天主教的主教斯得必納茨仍受着管制但有权利去教堂內进行弥撒。他是自由的，但根据法庭的判決，他不能履行作为教会領袖的職責，这种職責由他的代表代行。教会人士只要合乎規定可以享受养老金待遇，国家負担对某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的維持費，例如修繕教堂、养护历史紀念物。

鉄托總統接見“埃迪·薛伍德”研究班人員到此結束。埃迪先生感謝總統接見他們，并強調他和其他訪問團人員正如他們来时一样作为朋友向鉄托元帅告別。

# 現代南斯拉夫的基本問題和 南美关系（第三部分）

（原載1956年7月美国“外交季刊”）

卡 德 尔

## （三）国际方面

因而，南斯拉夫經歷着一个在經濟、社会和政治方面發展的緊張时期。在某些方面，这一發展过程同其他国家一样。但是，我們的这一發展过程有着某些特点，当然，在这些特点中有一部分也是有国际意义的。为了胜利地实现我們人民所要求的努力，必須要有和平和独立的条件。因此，我所講述的这—發展过程在外交政策上就有着这样一种明显的反映。

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可以归納为下列几点：

第一、保証独立和平等；我指的不仅是政治的独立、而且是經濟的独立和独立的国内發展的权利。

第二、保衛和平，对世界安全事業、对各种形式的合作，貿易和文化交流作出最大的貢獻。

第三、排斥任何干涉南斯拉夫国内發展的可能性，保証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完全独立。

第四、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密切的經濟关系，而所用的方式应能促使南斯拉夫摆脱自己过去的落后状况和尽速地發展生产力。

第五、为了消除或是至少减少發达国家和不很發达国家之間的悬殊現象，在試行利用适当的民主方式外国資助来加速世界上不很發达地区的經濟發展方面作出最大的貢獻，因为这种



悬殊正是一些国家在經濟和政治上有依賴性以及国际关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六、在社会主义方面以及在其他問題上同一切按照社会主义原則發展的国家合作和交流經驗，也同全世界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合作，只要它們願意在平等和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而不打算強使別人接受它自己的政治方針和观念形态。

当然，如果这些条件在全世界还没有具备，南斯拉夫也不能指望保証自己有这些条件。即使我們不談南斯拉夫完全支持集体安全的原则，我們也应该明白，如果和平不是普遍的和平，如果在执行着同防止侵略和保障打破集团界綫的广泛的国际合作毫無关系的利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那末在目前的国际环境里，一个国家要和平生活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是十分困难的。南斯拉夫不能也不願意执行这类的政策。因此，它的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最大程度的世界安全，因为我們很了解，南斯拉夫只有在普遍安全的环境里才能获得本身安全以及达到自己的目标。

这些就是南斯拉夫对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和積極共处的概念的基础。这不是出于和平主义幻想或是利己的民族主义的中立政策。这是目的在于支持一切和平傾向以及和平清除或是緩和集团之間的敌意的傾向的積極政策。

当然，采取这种政策是根据南斯拉夫社会發展在物質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基本要求而决定的。但是，如果我們所主張的共处不是以现实的国际情勢为基础的話，那末它至多不过是虛信的願望或是和平主义的自欺，甚至可能是利己的民族主义傾向的表现。換句話說，我們应当自己問問自己，就更广泛的国际关系来看这种政策是否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它是否符合和平和

历史进步的利益，它是否以现实地估计国际舞台的现有力量为基础。

我們認為，分析现在的国际情势可以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政治和社会进化所特有的逻辑鲜明地表明，积极共处是避免战争的唯一道路。

现在世界上的力量对比说明，世界任何一部分或是任何一个国家集团要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或者是即使在某一段时期中使自己处于经济孤立和政治孤立而又不影响自己的发展速度，这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各国的社会革命日益加强和存在着由于许多因素造成的目前国际关系的形式，政治体系或是政治集团之间的界限同各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界限是不相符的。这种情况将日益明显。

在全世界范围内，硬说战争是唯一出路的这种呼声越来越微弱。原因之一是：根据现有世界力量的对比，——这种对比不可能由任何增加军备或加强集团体系而发生重大的变化，——战争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非常冒险的事情。况且，即使战争爆发，那也未必就能解决当代的矛盾。在毁灭性的热核子战争之后，在世界上遗留下来的东西将碰到同样的矛盾，只是形式上有所变化而已；因为这种矛盾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种矛盾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它是人类现阶段物质和文化发展情况的反映。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国际紧张局势就有了缓和，并且有了日益肯定的和平趋势。换句话说，和平共处的主张成为现实的东西，虽然这种共处是由于形势所迫而仍然处于很不巩固和没有成果的状态。

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中丝毫没有轻视矛盾发展趋势的力量，或是现在作为共处的基础的不巩固的均势本身所包含着的

新的变化的危险性。它也知道这种政策对普遍和平以及对南斯拉夫本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更具体地说，对它的独立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这一点不应当妨碍我们正确地估计局势中的积极因素的意义和力求把这些因素摆在第一位。

因此，我不是说，立刻就可以根据和平和积极共处的原则来解决问题。我只是说，在这方面影响到事件发展进程的物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到可以使现实政策作为支持，并且使人有理由希望它将产生合乎愿望的结果。

对南斯拉夫外交政策所依据的情况估计就是这样。这种政策不是从幻想出发的，而且它也没有低估最近在国际关系中所出现的一切新因素，这些新因素表现在世界力量对比的总变化和苏联外交政策的有利进展之中。

正是根据这些新因素，我们认为共处的政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现实的，也是最符合我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

南斯拉夫希望自己在集团体系以外有独立的地位，这种希望说明它积极设法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积极共处的主张。但是，尽管国外时常产生的那种不正确的想法，而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从中立主义出发的，更不必说狭隘的民族主义了。这种政策是南斯拉夫在目前世界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也由于这种地位而成为可能的，这也是它的发展特征的结果。

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强而有力，它的必要性和固定性是出于上述这点情况，尽管外国观察家有时不注意到这点情况，宁愿主观地推测，而不愿意客观地分析那些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物资和政治力量。问题不在于是否相信关于外交政策的某个声明，而在于是否相信国家特殊物资和政治利益所产生的某些基本政治因素的现实性。

这就是南斯拉夫对美国的政策的出发点。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也不同的大小国家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是十分复杂的。在美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中就时常令人感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近年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很好，并且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果，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两国之间有传统的友谊。但是应当承认，两国关系中也时常发生困难和某些缺乏互相了解的情况，这大概主要是由于对我们之间关系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偶然发生了误解。我已经说过，如果一方面进行枉费精力的主观猜测，这决不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而只会引起混乱。两国间友好关系的正常发展首先要求现实地估计它们的利益的性质和范围，因为利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决不想否认或者缩小道义因素在一般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南斯拉夫和美国之间的传统友谊的意义。近十年来，这方面的考虑在国际事务中所占的分量比以往增加了。我也不想低估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在为巩固和平和国际安全进行友好合作这方面所承担的义务的历史意义。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两国之间关系巩固的程度首先取决于它们相互的物质和政治利益，取决于它们是否愿意和是否善于至少在某些方面调整它们共同的国际利益。归根到底如果问这些利益是什么，不用说，那就要看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化情况以及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正确和现实地估价它们可以协调到什么程度，应当是两国之间进行合作的起点。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关系是现实的，也是平等的，它可以保证建设性的合作。而不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关系可能很容易地让人得出错误的借口，或是违反平等原则，而这些现象对关系本身有不好影响。



这就是国际关系的总原则。在实力上、结构上和社会制度上各不相同的美国和南斯拉夫两国之间的关系中，这一原则有特别的效力。所以，我们南斯拉夫人深信同美国积极的和友好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在竭力使这种关系在我们的相互利益、特别是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利益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成为密切的和包罗万象的关系。毫无疑问，这种健康的现实主义不应该同无原则性和机会主义混为一谈，它是我们两国间在目前的条件下的最好桥梁。

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关系中应当考虑到这些情况。自然，大国主要应当从它领导的世界政治体系的观点来研究它跟小国的合作。而小国在这方面鉴于自己的平等和独立可能遭到威胁而稍稍采取谨慎的态度，这也是同样自然的。

这点特别同今天的南斯拉夫有关，因为如果没有完全的独立，它在国内就不可能有特殊的发展方式。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不能够赞同下列这样方式的国际关系或国际合作，在这种方式下他们将不再成为国际政策上的“主体”而成为“对象”，或者这种方式会使他们在国际活动中在某种程度上失掉为他们的合法利益所要求的和符合他们对国际安全的看法的平等和自由。由此可见，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关系不可能建立在把南斯拉夫拖入西方集团的前景的基础上。南斯拉夫在这方面的态度始终是坦率和真诚的。不久前在国际事件中表现的趋向再次证明南斯拉夫这种现实的态度。

我们对两国关系的看法也不应该存狭隘思想，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就不能正确的估价那些不管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正在促使友好合作成为可能和成为现实的客观因素。换句话说，我们两国的关系不能建立在希望南斯拉夫恢复老样这种基础上。南

斯拉夫应当采取它现在的样子，它有着我曾经说过的那些变化和目的。南斯拉夫人民经历了为摆脱半殖民地的过去和落后状况而进行的严酷斗争，现在正在创造新的经济条件，以建立符合他们需要的新社会关系。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并且他们还准备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些努力、意图和目的决定了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对这一事实如果估计不足，就会不能理解南斯拉夫外交政策在巩固本国独立和在国际关系中促进积极共处方面的动力和作用。至于在美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合作方面，任何这种倾向都只能带来很大的害处。

当然，这一切是适用于南斯拉夫估价美国对我国政策的一些主要特征的。有时，我们的舆论在这方面出现某些引起恐惧和错觉的错误概念。但是，请原谅我，我在这里主要谈的是美国舆论不能理解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些表现，不理解我们的对内政策怎样影响到对外政策。

我想通过简短地分析南斯拉夫发展的一些主要趋向和特征来谈一谈南斯拉夫的最重要的利益。我认为，这种分析对于估计我国外交政策会提供更好的根据，而胜于任何外交声明。甚至从表面上分析也能够清楚地证明同美国的友谊——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不仅是为了巩固和平共同的目的，而且还为了我们的独立和平等。所以南斯拉夫不管能不能得到美国的帮助，都要极力保持同美国的友好关系。

这种帮助对南斯拉夫人民曾是很有益的，南斯拉夫人民非常珍重这种帮助。但是这种帮助过去和将来都不能作为断定我国同美国关系的主要根据。这种关系有它更深远的根源，牵扯到两国人民对和平和安全的共同利害关系，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的目的是保卫我们的独立。所以和美国的友好关系是我们外交政策中固定的因素。

我們同苏联的关系的明显的改进并没有使这方面发生什么变化，尽管最近評論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一些膚淺的文章中作了相反的暗示。事实同这些評論相反，我們同苏联的关系已經大大改善，并且成为巩固的友好关系，这一事实証明了南斯拉夫在自己的外交政策中执行了正确的路綫，这一路綫使我們获得了成功。我再补充一下：我們欢迎这种改善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們一貫是和平和东西方之間积极共处的捍衛者，我們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們主張加强文化和貿易方面的接触。

和独立的南斯拉夫發展友好关系，对美国是否有利呢？南斯拉夫执行不参加任何集团的政策，它支持有利于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积极共处的一切力量和見解。我們深信，这个答复是肯定的，这种合作很明显是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因为只有执行現行政策的現在这样的南斯拉夫才能够促进欧洲的稳定和安全，才能够促进世界普遍和平。因此，如果从按照美国某些人的心願要我們同集团發生联系这种观点来看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那就意味着对整个国际安全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带来坏处。这只能使我們两国間的友好合作蒙受損失，而这种合作已經被証实对我們两国彼此的利益是絕對必要的。

美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所以有这样重大的成果，正是因为它至今一直是在健康的现实的基础上發展的。我們認為，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还给未来的良好的关系打下健康的基础。不論常常产生怎样的困难，但这些困难都是由于某方脱离了现实主义态度的結果，而这种态度是由两国共同利益和它們对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問題的共同意見所决定的。我們今后必須保持这种态度，从而避免誤解、不信任和危險。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我們的关系才可能是巩固的和可靠的，才可能不仅繼續給我們两国带来益处，而且还为全世界的安全事業带来益处。

##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 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的宣言

(原载“共产主义者”1956年第7、8期)

米·托多罗維奇

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間的关系，已較迅速地达到并已走过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阶段，現在具有更加广泛、全面建設性的和友好合作的性質。两国关系的这种發展是和总的發展相联系的。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对內和对外政策，特别是在苏南关系方面开始了并还在繼續着的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改变，保证了这种关系的發展。特别是去年苏联领导者的訪問貝尔格莱德和著名的貝尔格莱德宣言，促进了这种关系的發展。至于談到南斯拉夫，則它的一貫执行的整个外交政策原則，特别是自1948年开始的众所周知的冲突后对苏联的政策，保证了我們相互之間的关系开始具有了如此友好和和平的性質。南斯拉夫曾在这方面不断地積極地努力，我們反斯大林的斗争促进了社会主义力量和国际和平的巩固，并为建立苏联人民对南斯拉夫的信心和友好关系創造了基础。

以鉄托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訪苏，苏联对代表团的接待以及两国政府談判的結果，完全肯定地確認了这一切。当时，在苏共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間也进行了談判，談判后并發表了著名的联合宣言。两党关系和合作的建立及發展，是两国之間总的合作和关系的合乎邏輯的一个組成部分；两国关系包括两国間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关系，以及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运动的、科学的和其它团体的



接触。但这个宣言具有特别的意义。

苏南冲突在形式上是以党的冲突、“党的路綫”冲突而开始的，但實質上它确实是当时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的攻击，这一点我們南斯拉夫人从一开始以及以后一直这样認為。因此，两党之間接触和合作的建立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它应表明，在从前的关系已經产生的那方面把这种关系取消到何种程度。这种形式的一面具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冲突具有党的形式不是偶然的。此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共对社会、政治和其他生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此它們之間的合作和接触将發生显著的良好作用，并将有助于两个国家和人民間的合作和友好关系的更全面的發展。

根据确定两党关系的联合声明，从其內容上說它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首先是对两国和两党的关系。但同时对各工人党及其整个的發展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根据它所产生的条件，它的出現是列宁逝世以后各共产党之間最新的关系史中的特殊的和第一个文件。它不是一个偶然性的文件，它的出現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新时期、新成就和新要求的产物。因此，宣言不是也不可能是某种策略的步驟；它具备并且保持着它的牢固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虽然有人主观地把它看作临时策略步驟。首先宣言确定，我們的关系是建筑在民主的原則上，建筑在“完全自願和平等、友好批評、对我們党之間的爭論問題进行同志式交換意見”的基础上。至于合作的对象，則根据上述原則，将始終按照任何一方面的創議而具体确定。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繁荣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实行合作，为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就許多当前社会主义發展的問題实行合作，也是为了發展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的世界各国人民之間的和平共处和合作，为了和平，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这将一直是关系到两国人民直接

利益和符合于一定的进步目的的問題。

这些原则是任何建設性和有成效的关系和合作的不可改变的条件，它对双方和整个进步，对任何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首先是社会主义的政党（特别是具有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政党）的合作和关系是有利的。这是从馬克思时代起，各国工人运动間的关系，所根据的或应当根据的一些原则，这是馬克思的原则。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为国际工人組織和双方面具体关系中的这种关系而斗争。对这些原则的任何脱离，必然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壟断和統治，强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意見，別有用心地把工人运动硬栓上別人的馬車。这又将不可避免地引向从屬的工人运动或估計不足的工人运动的削弱，使它脱离本国人民的条件、可能、需要和利益（自己本身的利益），并使其丧失主动性，陷于孤立，沒落以至于灭亡。这对社会主义力量，其中也包括对实行控制，統治的一方沒有益处。相反的，这必将导致渴望領導权的其他非社会主义成份的产生和壮大。在这方面，也不可免地将在国际关系中把自己从其它工人的、民族解放的和其它的进步运动和力量中孤立起来。

这种实践从而也会削弱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败坏国际工人团结的思想以及整个的社会主义思想。它还将阻塞社会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进步运动，削弱和平力量和各国人民之間的和平合作。

平等关系的前提及其内容，是自由而平等地对双方所感兴趣的一切問題交換意見。这就是对个別的問題进行公开的建設性的同志式的爭論，爭論的条件是任何国家（小国或大国，發达的或不發达的，以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或者是反对馬克思主义的）准备心平气和地叙述自己的意見，不要求对方必須同意自己的意見，要耐心地听取对方意見，不要因某种原因就反駁它和輕

視它，但若不同意它，也不一定要接受它。但爭論中的這種耐性絕不意味着腐朽的折衷和虛偽的態度，在這種條件下馬克思主義者是無法表达自己的意見和保衛自己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相反的，只有在那種平等、自由和自願的關係及合作條件下，以及不強迫對方接受別人意見的時候，雙方才能發表意見，公開而正直地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有這種交換意見和經驗的方法才能夠確定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不是，誰是馬克思主義者和誰不是。唯有在關係不平等的情況下，思想上的妥協，對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歪曲，暗示式的談話才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種關係的本身就脫離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則的立場。

我們接觸和合作的初步經驗已經顯示了良好的結果。例如，我們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勞動人民聯盟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所一貫堅守的平等自願的原則上，已經同歐洲、亞洲和南美等地的其它各種社會主義運動和政黨建立合作的初步形式和聯繫的經驗，表明了各國的各種工人運動間建立合作和聯繫的廣泛可能性，証明了通過和平共處和人民接近的辦法達到鞏固和平的可能性，以及交流和發展各種社會主義因素和力量的可能性。現在世界上社會主義因素和力量到處皆是，它們具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雙邊關係並不排除早已確定的多邊合作的關係，但這種合作，因時代情況的需要，將在新的基礎上發展。以這種或類似原則為基礎的雙邊關係表明（唯有它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在現在和將來，多方面的合作和聯繫，將以什麼樣的形式、在什麼基礎和哪些問題上取得發展。此外，這必將產生合乎實際生活的那種形式。

工人運動近代史的全部經驗令人信服地証明，國際組織的硬性的集中形式對一般人類的前進與愛好和平的發展，已經是

不适合的不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特別对巩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就更加有害。情报局的全部簡短的历史証明了这一点。第二国际的实践在現在和最近几十年内也都十分明显地証明了这一点。这种組織，或迟或早，粗暴地、公开地或隱蔽地、不可避免地要变成一国或某些国家的工具。这就使得某些个别国家中工人运动的切身重要的方式遭到破坏。这种組織是最近世界一切矛盾尖銳化和發展的最有利的基础，从而也就成为近代世界存在的那些冲突的舞臺。而它也只能是这样的。

在以前，当工人階級还不十分强大，当它还只占社会上很少一部分的时候，那时社会主义問題只与無产階級中的很少数的最觉悟的人們是有关系的，——“在最尖銳的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即指共产国际的初期）<sup>①</sup>，那样的或类似那样的国际組織形式是可能有意义，并且証明已經是有意义的。但是在目前，那样万能的硬性的集中組織事实上会严重地縮小世界上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陣地。首先对一个这样的組織來說，無产階級人数变得太多，太擴張了（引用恩格斯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語）。此外，这个組織孤立了工人階級，更确切地說，在政治方面它使一部最觉悟、最積極的工人与其他劳动者脫离，与整个社会脫离，而每个国家的社会中大部或絕大部份人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直接或間接关心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各种形式的發展和巩固，即关心它的胜利。

現在，社会主义，就其本質來說，已經不是必須借助某种工人階級的共同的牢固的組織就能捍衛住的彼岸的一个不大的据点，或是一个不大的桥头堡。現今的世界，現今的人类社会——

<sup>①</sup> 原注：这里必須提醒的是：列宁在共产国际中所提出的集中制是有另外意义的；在共产国际存在的初期，根据列宁的原則与实践，除了共同綱領和目的外，也还存在着自由交換意見和作为这个組織内部的經常原則的平等的、民主的辯爭。



假如可以这样說的話——总地說来已經深深地“长入”社会主义，已經成为社会主义的了。这不仅因为在許多国家中工人阶级已掌握了政权，因而自觉地公开地發展新的社会主义关系与形式，也因为近代世界的物質基础，在生产和运输方面等等的科学技术和工艺規程成就。現代生产資料的性質保証和要求，并决定要有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正在成为經濟生活以及社会整个生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这对社会主义国家來說是十分明白的。

但是現代国家資本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还不就是用新的社会主义手段来“延长”資本主义世紀（已在社会主义門前了）或是以此来“拯救”旧的生产方式。換言之，这是拯救私有制，拯救私有制的被消灭。塞爾維亞文是以拯救私有制来消灭私有制。誠然，目前首先是用非社会主义方法来实现消灭私有制的。但这总是消灭所有制，因之它現在已經不仅表现为个别工厂的国有化，甚至还表现为个别部門的国有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这是对資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它使用否定的方法因而也就否定了自己，所以它無疑是一种过渡形式。

目前这乃是一种改造形式（形式之一），或直接准备改造的一种形式，把資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人們、人民、科学、人类社会目前正在实现这个历史使命，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什么是社会主义，不管他們是否被社会主义所鼓舞或已經不想要它了。他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应该这样做，發达的国家必然要走这条道路，因为它们不可能用老办法来保持已經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进一步發展生产力。它們必然要这样做的。不發达的国家也应该寻找社会主义新形式，因为这是加速發展經濟和保持不久前取得的民族独立的条件。

这样，国家生活和国际生活直接实践中的許多具体問題（它

們的數目正在日益增加)就逐漸變成與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問題相同的了。在這方面，工人階級在各種民族和國際問題解決中的積極作用(和責任)也增長了。

這樣，目前社會主義獲得了更為廣泛的社會政治基礎。現在這已不只是某些政党和甚至工人階級本身的事情了；現在這是絕大多數人民的事情了。民族問題在許多國家和差不多在每個國家(以及在世界範圍內)現在已不僅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事情了。這些國家與另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區別在於：在這另一些國家里，社會主義成份正在萌芽和盲目地、自發地為自己打出道路，克服各種反抗，從那些客觀的、自發的反抗到追逐狹窄的階級利益的統治階級的反抗，克服困難，不斷經歷過階級鬥爭和妥協的時期，因此必然會發生變形、歪曲、滯塞等等現象；而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人們正在為新型的社會主義關係开辟着自由的道路。确切些說，社會即統治階級正在自覺地、有計劃地，根據自己的主客觀力量，克服困難，給新的社會主義成份以幫助，力求為它們开辟自由的道路。不承認這個事實，想在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的國家里來壟斷社會主義因素和力量的發生和發展，這在實質上意味着直接否定馬克思所發現的經濟和其他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性質，而現代的實際已如此清楚地証實了這些規律。這是把階級與黨混為一談，把自己的主觀意識和願望與發展的客觀規律、客觀的實際混為一談。所以，如果說社會主義的存在正在鞏固和加速全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如果它們確實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式進行的話)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麼個別社會主義國家的產生、出現和發展是整個成熟過程和人類社會向社會主義方向改造的反映、結果和組成部分的說法也是正確的。由此可見，單是這些“社會主義民族”之間的關係、組織和合作，是狹窄的，宗派主義的，人為的，并削弱自己本

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是加强全世界建立集团的倾向和妨碍和平发展的因素。

与此客观过程同时，在此过程内及通过此过程，工人阶级内部和外部愈来愈多的人不可避免的要求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也正在发展和增长。因而随着物质基础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客观（经济）必然性的尖锐化，主观意识因素，虽然带有固执性，但必不可免要发展和巩固起来。

因此，目前对某一国或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有害。因此，现在不可以过早地推翻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经验。因此，目前把各个工人运动区分为先生和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害。目前谁都可能并且就既是先生也是学生。因此，目前在各种最生动和最广泛的接触和争论时，在交流各国（尽管存在思想分歧或其他分歧）工人运动之间的经验和合作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都需要最大限度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等等。只有在这过程中，以后才可以成长起社会主义团结的新的独特的形式。

在民族范围内现今很分散的、在国际规模上和国际关系上被隔离分割的现代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建立在充分自愿和平等原则上的双边关系是这种广泛、生动接触和合作的基本的、最有效的形式。看来实践将证明，在这种双边关系中，将产生多方面的<sup>①</sup>各种形式的合作。正是因为它们显然是从这种自由的民主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定将产生某些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任何一个工人运动就许多国家关心的某一问题或几个问题提出自己创议的条件下，是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自愿参加的前提下，即在每个参加者根据它的具体

---

<sup>①</sup> 也可译成“多边的”。——译者

条件、可能和利益，同时也根据共同的社会主义目的而行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产生的。

因此这种关系的特点将是耐心解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采用说服和耐心的方法。因此它们常发生在地方性的基础上。看来，这是真正团结社会主义力量为人类进步和社会主义直接具体目的斗争的事业中唯一可能的方法，特别是如果考虑到目前全世界工人阶级思想多么分离，而它的国际政治活动又多么相抵触和矛盾的话。

在目前这种条件下，1864年马克思的，或是1889年恩格斯的，或是1919年列宁的共产国际，难道还能够实现并且还有什么意义吗？

在各工人党之间的团结和关系的这种形式的特点，按其民主性和广泛性来讲，预定了所有这些联系、接触、谈判和决议等，应该是公开的，并使世界舆论所能了解的。工人运动是一种大联合这已经表现出来了。鉴于工人阶级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个别国际问题的解决起着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国际民主舆论对这种国际组织活动的监督就成为必需的了。因而，社会主义力量应该发展自己的民主实践，反对国际生活中的幕后的和各种秘密的协议，一般说来，这种协议都是反对个别的首先是小的民族和进步运动的自由和独立的，也是对国际和平和进步的一种威胁。这只能刺激工人阶级愈来愈广泛、愈来愈有力的国际合作。这种广泛的形式及其深刻的民主精神可以把工人和一切其他的民主的和进步的运运动团结在一起，这种运动的确也是关心人民的和平和安全，关心社会进步的。

情报局主义，即国际关系中的斯大林主义破坏了各工人党的国际合作，它不仅恐吓和迫使各种民主运动、人民解放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放弃广泛的合作，而且也恐吓和迫使有社会主义



綱領的工人黨本身放棄廣泛的合作。

第二國際在其內部關係中雖則有一定形式上的民主和自由，但這裏大國與小國，發達與不發達國和統治國與附屬國間，或是說這一組織的成員——社會主義政黨與其他工人政黨的實踐活動破壞了國際主義，引起對其他抱不信任的態度，特別表現在附屬國，半附屬國及其他落后國家的工人運動和其他人民解放運動中，以及在那些工人階級已通過革命掌握了政權的國家內。如要克服這一切，正需在工人運動的國際關係中來實行上面所提及的深刻的民主原則及運用範圍的，能為最多政黨和運動所能接受的形式。至於工人階級執政國家的黨，它們首先應該為發展本國社會主義的利益，也應該為國際利益去進行這種合作，即在各種形式中都應該是積極的，不應該忽視和拒絕現代潮流和形式的豐富多采的光譜中的任何一種色彩。否則就必然會受到孤立，從而削弱本國陣地，削弱自己對國際發展的社會主義影響。

在宣言中確立直言不諱的原則和世界輿論可接受的原則是國際工人運動中這些和類似這些歷史要求的反映，是我們在國際政策中有着深刻的原則性、開誠布公和一貫大公無私的表現。

在各工人黨之間發展這種接觸、聯系和合作，可能會最有效地保證實現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團結。在現代社會發展的條件下，這種發展應該是這一團結的一種形式（表現）。自工人階級產生以來，工人的國際團結這一重要因素，由於工人階級作用不斷增長，在解決國際發展的具体問題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更廣泛的基礎，並且一般說來它（工人的國際團結）不能在過去的形式中表現出來，因為這種形式對我們時代和迫切發展的要求來說太狹窄了。

例如，爭取各國人民和平和獨立的鬥爭，爭取大小國之間的

平等的斗争，争取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斗争等等，都是用来检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事。恰恰相反，忠于积极共处的原则是目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主要实践的表现之一。因此，旧的硬化了的和新的生硬组织形式无论如何不能和现代改造世界强使我们接受的广泛要求相适应。

此外，必须把真正的国际主义同虚伪的、形式主义的国际主义区别开来。列宁常常说，国际主义不是在于表示声援、不是在决议中，而是在实际行动上。而所谓实际行动的国际主义，这首先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因素，即为在自己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这一点也包括着为奉行正确的社会主义的国际政策的斗争。这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乃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中的主要的、最本质的东西。至于国际组织，则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并没有写着，而且也不可能写上这一点。那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否需要建立一种国际性的组织和它应该是什么样的组织，——这是一个实践问题，是斗争的具体形式和方法问题。因而，从一定的工人政党就其理论和实践而论，应当是国际主义的事实中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本身就是这样的党那种推测中，决不能得出它们应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自己的（而且特殊的）国际组织的结论。

可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终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建筑在对某一个事先建立了的国际组织的赤赤裸裸的、硬性的纪律上，或者是建筑在对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忠诚上面。它是建筑在对阶级地位相同和利益一致的意识上面，因而也是建筑在对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赞同上面。

至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正是这种民主的道路为我们的活动和为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念和原则的斗争创造了

最广泛的条件。思想上的一致，即对各个问题的观点的相同，必然导致各个政党和运动相互策应，即他们的代表们在各种会议上或在其他的场合实行合作。在某个地方建设特殊的国际组织的必要性是取决于“是敌人有了自己国际组织”……。

当然，这纯粹是形式上的根据，因为正是现代的经验表明，贯彻决议的保证在于观点和立场的同一性以及各个运动的（党的）意识和感情；它的立场、建议等等均可以，并体现在国际关系和合作当中。

我们的愿望应当是，保证使最广大数量的工人党和运动作出积极的，更大的贡献，这样才能表现出它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主义立场和行动。

宣言中规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完全合乎这种国际关系的发展。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它们之间的相互合作是它们同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接触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同社会主义的和其他世界上进步运动接触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而且，我们之间在这一基础上的合作，只能鼓励双方与其他运动的联系，并总的说来会促进国际工人的合作。

两党赞同必须在进一步发展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进行积极的国际的合作。如同宣言所表示的那样，这一赞同也是一个新的、有益的倡议。尽管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日复一日地在全世界发生并集中大量的事实、新的变化和现象，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最近几十年来，由于斯大林的垄断而被抑止住了，由于斯大林式的教条而变得狭窄了，变得贫乏和被窒息了。它的发展大大地落在现代社会发展的真正要求的后面了，而且这种情况正发生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特别需要的时期。首先斯大林以其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解说和加工，而建立了自己的完整的中

心体系，歪曲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强迫各共产党队伍内外的整个一代的人接受錯誤的，實質上是对这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概念。

众所周知，这对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际活动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發展發生了何等有害的影响。但是不能說在这一时期里在發展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沒有进行任何工作。生活仍然是前进着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在苏联和苏联以外的地区展开了，是的，它們各有各的独特的形式。但是，只有南斯拉夫的反对斯大林专制的斗争在这一方面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在实践和理論上实现了对斯大林主义基本的，直接的批評。目前，当社会主义的理論和实践开始取得新的，更加广泛的規模的时候，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在摒弃斯大林造成的痛苦后果的基础上，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理論方面的合作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社会主义社会在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的国家里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不断地發展着。其他各国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在成长和活动着。因此，集中和分析这一切經驗，并加以总结，是極其重要的，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成就，并列入人类社会进步的成就宝库；也只有这样，这一經驗才可能，而且也应当服务于世界劳动者，成为他們自觉地願望和爭取根据自己的特殊条件和需要来建設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武器。所以，宣言中写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在这个問題上得出的結論，無疑地得到了其他的具有社会主义綱領的工人党，首先是馬克思主义政党的良好估价。在这一方面的实际合作，将导致在不久的将来出現相应的、最适当的形式，这些形式在宣言中沒有、而且也不可能談到。

必須尽快地、完全真誠地、善意地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正如同其他类似的事件一样，这一宣言，其中所闡述的原則，要在实践当中来檢查的。它（宣言）的出現在全世界引起了



很大的兴趣，同时，它的出现也伴随以热烈的评论，特别是在一系列共产党、社会党及其他工人党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的一个短促的时期里，对宣言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些人說，它是不平凡的东西，因为过去没有过，因为它是与旧的做法不一样。另一些人說，它还不够完整，因为它没有解决实践已经提出来的某些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所指的是：这一宣言，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是新时代的反映，这个时代要求在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有新的决定和新的形式。因此，许多使之难以了解工人运动中合作的全部问题的困难和障碍（如分成集团），在宣言中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来。然而，尽管存在这些让步的成份，它仍意味着在解决这一合作中的问题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现在我们来做结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在莫斯科的谈判和宣言中所表示出的协议，除了为两党在最近期间并在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全部关系和合作的范畴内进行实际的合作奠定基础以外，不追求任何其他更广泛的目的，如果这将被贯彻到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一点本身就意味着许多东西。同时，鉴于这一宣言中贯穿着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精神，鉴于它所具有的原则性，尽管宣言受到一定问题的圈子的限制，它仍获得更加重要更加广泛的意义。

有鉴于此，最后我认为必须援引宣言中的这些话：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工人运动在上述原则和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会有利于双方的人民和有利于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相信，这样，他们就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之间的普遍的接近有所贡献，而这同样也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 在普拉南斯拉夫人民軍俱樂部向 伊斯特里亞的共產主義者聯盟 積極分子發表的演說

——1956年11月11日

(原載 1956 年 11 月 16 日“戰鬥報”)

鐵 托

同志們!

昨天我曾經表示希望利用我在布里俄尼治病的机会，到你們這里來，向你們談一談我們對於目前非常錯綜複雜的國際問題的看法。

你們都讀報紙，可是報紙並不能包羅一切而加以全面的說明，特別是報紙上沒有說明今天匈牙利所發生的事件以及在埃及——在那裡，發生了以色列—法國—英國的侵略——發生的事件的原因。今天的形勢相當複雜，我們不能說目前不存在發生大規模衝突的一定危險，但是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力量——我國也是其中之一——已經在聯合國中表明，依靠它們堅持不懈的努力，它們能夠減少發生國際衝突的可能性，而且它們已經使得世界能夠希望和平仍然能夠保持。

首先，我願意談一談今天匈牙利所發生的事件和波蘭發生過的事件，這樣我們對於這些事件就會有一個正確的概念。這些事件非常複雜，特別是在匈牙利。在那裡，很大一部分工人階級和進步人士手執武器在街頭同蘇聯武裝部隊發生了戰鬥。當匈牙利工人和進步分子開始以示威、接着以抵抗和武裝行動來

反对拉科西的方法，来反对进一步执行这个路綫的时候，我深信，是談不上反革命傾向的。人們只能說，反动派竟能够在那里找到非常肥沃的土壤，使事情逐漸对自己有利，利用匈牙利發生的正当反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令人遺憾的和可悲的。

###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

你們大体上知道造成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我們有必要回溯到 1948 年，当时南斯拉夫第一个給斯大林一个有力的答复，当时南斯拉夫說，它希望保持独立，它希望按照它国内的具体情况来建設它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它不允許任何人干涉它的內政。当然，当时沒有發生武装干涉，因为南斯拉夫已經是团結一致的。由于我們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經消灭了反动派的主力，各种反动分子無法进行各种的挑衅。其次，我們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磐石般团結一致的共产党，它經过了战前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鍛炼，我們也有着一支强大的和經过鍛炼的军队，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有着体现了这一切的人民的团結。

一旦关于我国的真相大白，同那些在那不光采的決議通过之后跟我們断絕了关系的国家恢复正常关系的时期就开始了，东方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希望我們不再提起对我們所作的事，希望我們不究既往，我們同意了，这完全是为了尽速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但是你們后来就会看到，对于那些今天又在开始誹謗我們的国家，那些在东方国家的、甚至某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中占居领导地位的某些人們，的确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他們在过去这四、五年里，甚至更久一些，对南斯拉夫所做的事。当时我們不得不在各方面进行斗争，来維護我們人民革命的成就，維護我們已經开始建設的东西——社会主义基础，一句話，洗雪他們希望用各种各样的誹謗加在我們身上的耻辱，証明真理在哪

里。我們应当提醒他們說，就是這一些人當時用一切可能的辦法譴責我國，說我國是法西斯主義者，說我們是嗜血成性的人，說我們正在毀掉我國人民，說我國勞動人民不擁護我們，等等。今天他們又希望把波蘭和匈牙利的事件的責任推到我們肩上，我們應當提醒他們，叫他們記住這一點。這種背信棄義的傾向起源於那些頑固的斯大林主義分子，他們在各國黨內設法繼續保持他們的職位，他們再一次希望鞏固他們的統治，把這種斯大林主義的傾向強加在他們人民頭上，甚至別國人民的頭上。關於這一點，我以後還要談到。現在我只希望告訴你們，我們必須根據整個發展情況來看匈牙利事件。

### 問題不僅僅是個人崇拜，問題是使得 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

由於蘇聯的希望和倡議，我們同蘇聯恢復了正常關係。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新領導人看到，由於斯大林的愚蠢，蘇聯處於一種非常困難的境地，處於一條死胡同里，不論是在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上都是如此，而且，由於斯大林的吹毛求疵和強迫採用他的方法，在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里也是如此。他們了解到所有這一切困難的主要原因在什麼地方，他們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譴責了斯大林的行動和他的直到那時的政策，但是他們錯誤地把整個事情當作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不是當作一個制度問題。而個人崇拜，實際上，是一種制度的產物。他們沒有同這個制度進行鬥爭，或者，就是說他們進行了鬥爭，也是在暗地里這樣做的，而口頭上却說，總的來說，一切都很好，只是到了最近，由於斯大林老了，他開始有點愚蠢起來，犯了各種錯誤。

我們从一开始就說，這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根源就在這裡，這就是



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以作到的事。这些根源在哪里呢？在于官僚主义組織机构，在于领导方法和所謂一长制，在于忽視劳动群众的作用和願望，在于各种各样的恩維尔·霍查之流、謝胡之流以及有些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党的其他领导人，他們抗拒民主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而且他們对斯大林制度的巩固出了不少的力，他們今天正在努力恢复这个制度，使它繼續占上風。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糾正的。

### 除了南斯拉夫和苏联之外，莫斯科宣言 是供更多国家应用的

就我們而論，我們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已經作了很大的努力。我們已經改善了关系，締結了一整套的經濟協議，这些協議對我們很有益，是根据非常有利的条件，等等。同时还通过了兩項宣言，一項是在貝爾格萊德通过的，一項是在莫斯科通过的。这两項宣言不仅對我們两国相互关系，而且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都应该有实际的意义。但是，遺憾的是，这两項宣言沒有这样被人所理解。有人認為：好吧，既然南斯拉夫人这样坚决，我們就尊重和执行这两項宣言，不过，这两項宣言与別国無关。因为在那里，情况到底和南斯拉夫有点不同。南斯拉夫是一个有組織有紀律的国家。南斯拉夫人已經表明他們是当之无愧的，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刻里，他們也坚持不屈，沒有讓資本主义制度复辟，等等。这也就是说，他們跟你們东方国家的人不同，在你們那里，是我們使你們当权的。而这就錯了。因为，那些在1948年引起南斯拉夫进行反抗的分子，在这些东方国家里，在波兰，在匈牙利，甚至在別的地方，也是存在的，有些地方多一些，有些地方少一些。當我們在莫斯科起草关于我們党的关系——主要是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

的宣言的时候，这遇到了一点困难。在这一点上，我們不能完全同意，但是即使如此，还是通过了一项宣言，在我們看来，这项宣言是供除了南斯拉夫和苏联之外更大的范围应用的。我們当初一直提醒說，那些在以前曾經在南斯拉夫引起这样有力抵抗的傾向，在所有国家都是存在的，有一天也会在其他国家中表现出来，到了那时就更加难以糾正了。

你們知道，赫魯曉夫曾經到这里来休息。那一次我們在这里举行了会談，在貝尔格莱德又举行了更詳尽的会談。由于我、兰科維奇同志和普察尔同志被邀前往克里米亚，我們就去了，并且繼續进行会談。我們看到，对于其他国家，这件事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苏联的领导人对于其他国家抱有不同的态度，因为他们們对于同这些国家、同波兰、匈牙利等的关系有过一些錯誤的和有缺点的看法。不过，我們对于这一点并不看得很悲觀，因为我們看到，这不是整个苏联领导方面的态度，而是一部分人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强使另一部分人接受这种态度。我們看到，这种态度是那些过去一般來說是站在斯大林主义的立場上而且現在仍旧站在这种立場上的人們所强加于人的，但是，尽管如此，那些主張在民主化方面有更加有力和迅速發展，主張放弃一切斯大林主义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建立新的关系，而且这方面的發展也應該在外交政策上發生的分子，仍然有可能通过內部的演变而在苏联领导机构内部取得胜利。我們从某些迹象上，从会談中看出，这些分子并不弱，他們是强大的，但是这种朝着进步方向，朝着放弃斯大林主义方法方向發生的內部發展过程却受到了阻撓，而且也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阻撓，它們由于它們的宣傳和不断重复有必要“解放”这些国家而在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和妨碍这些国家之間的关系的迅速發展和改善。因为苏联認為，由于这种对內政的干涉已經在电台宣傳，用

气球运送物品等等方面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如果他们完全对这些国家放手不管，而且让它们——比如说——得到像南斯拉夫那样的地位，那就会产生不愉快的结果。他们担心，在这些国家里，那时反动派势力可能得胜。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他们对于这些国家的内部革命力量没有足够的信任。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所有后来这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对这些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力量没有足够的信任。

### 我国的活动一直很积极有益

当事情发展到你们大家都熟悉的波兹南事件的时候，苏联人中间对我们的态度发生了一种突然的转变。他们开始冷淡起来了。他们认为，发生这一事件得责怪我们南斯拉夫人。是的，我们是该受责怪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现状，因为我们建立一个目前这样的南斯拉夫，因为它的活动的影响达到了我国境外。即使我们并不希望这样，我们的国家仍然会是活动的，而且活动得非常积极和有益。尽管有过各式各样的迫害，并且采取了斯大林主义的摧残干部的方法，但是波兰仍然留下一个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领导人核心，他们在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有力地掌握了局面，果敢地采取了自己的新道路——就是争取民主化、争取他们完全独立但也争取对苏联的良好关系，坚决地抵抗对他们内政的干涉，由于波兰这一情况，必然存在的反动势力才没有公然抬头，而这种势力是一直希望在共产党人发生冲突时抬头的。由于苏联领袖们的成熟的考虑和态度——他们在适当的时刻停止了干涉——波兰的情况现在已大大地稳定下来了，而且有了相当好的发展。

我不能说，波兰的这种与我们非常相似的积极发展，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中受到了何种欢迎，相反，它受到了批

評，不過是在私下、在他們中間受到批評，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公開受到批評。在這些國家中，波蘭甚至還沒有得到它在已經同意了波蘭的態度的蘇聯領導人那里得到的那么多的支持。在“社會主義陣營”某些國家的那些領導人物中間，甚至在西方的某些共產黨中間，波蘭並沒有得到諒解，因為斯大林分子仍然在那里掌權。

當那位自命為歷史學教授在法國講課，並且說，南斯拉夫是帝國主義的陰險的代理人，當法國共產黨中的掌權人物在這樣一個可悲的、困難的時候，在千千萬萬的人民面前提出這種嚴重的指責的時候，那末這是否會成為社會主義事業會在將來正確地發展的保證呢？不能。這些不負責任的墮落分子的過份行為，應由那個黨的領導人來負責。或者，舉例來說，如象恩維爾·霍查這樣一位除了只知道在口頭上說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再講不下去了的自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寫了一篇關於南斯拉夫的文章，雖然沒有提南斯拉夫的名字，但是打擊的是南斯拉夫和波蘭，在文章中他堅決地譴責了根據自己的具體條件選定道路和發展的傾向，甚至反對了赫魯曉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已經承認了的東西——走向社會主義有各種具體的道路。這樣一種方式不但敢於中傷和反對南斯拉夫和另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甚至打擊了蘇聯領導人自己。這種斯大林主義分子認為，可以在蘇聯找到一種斯大林牌號的人物來支持他們，來幫助他們繼續騎在他們的人民的頭上。同志們，這種態度是致命的。

當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當然也會談到波蘭、匈牙利和其他國家。我們說，拉科西政權和拉科西本人毫無資格來領導匈牙利這個國家，來促進內部團結；正相反，他們只能造成嚴重的後果。不幸，蘇聯同志不相信我們的話。他們說，拉科西是個老革命家，正直，如何如何。說他是老的——這沒有問題——但是這



不够。說他是正直的——就我所知道的，我可不能証实这一点，特别是在拉伊克审判和一切其他事情發生之后。对我來說，这些人是世界上最不正直的人。苏联同志們說，他是慎重的，說他会得到成功，并說他們不知道在那个国家里还有其他的他們可以信賴的人。正因为我們的政策，不論是国家和党的政策都反对干涉別国内政，而且为了不再同苏联同志發生冲突，我們并没有充分地同苏联领导人爭論要把象拉科西和格罗这种班子鐘除掉。

### 格罗同拉科西絲毫沒有两样

当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人們十分奇怪我为什么不取道匈牙利。正是因为拉科西我才不願意这样作的。我說，我不打算从匈牙利走，即使那样会使旅程縮短三倍我也不干。当那个国家里共产党队伍本身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不滿的时候，当他們要求叫拉科西下台的时候，苏联的同志認識到事情不能象这样繼續下去了，他們同意撤換拉科西。然而，他們犯了一个錯誤：沒有讓格罗以及其他那些在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的拉科西追随者也被撤換掉。他們提出了条件：只有保留格罗才能同意撤換拉科西。而这是一个錯誤，因为格罗同拉科西絲毫沒有两样，他奉行同样的政策，他同拉科西一样負有罪責。

同志們，你們看，我們能够怎样做呢？我們看出来事情不是按应有的方式进行的。当我們在克里米亞的时候，格罗“恰巧”也在那里，而我們“偶然地”碰到了他。我們同他进行了会談。格罗譴責了以前的政策，說那是一种錯誤的政策，說他們曾經污蔑了南斯拉夫，总之，他把过失都承包下来了，并且要求建立良好的关系，答应以前的一切錯誤都要糾正，旧的政策再也不再采用。我們希望表明我們是不念旧恶的，我們不是心胸狹窄的，所

以我們同意同格罗和准备到南斯拉夫来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举行会談。我們希望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建立关系，因为我們希望不使匈牙利的党孤立，这样可以比較容易發生影响，使这个国家国内有正确的發展。

然而，事态已經發展得深远得多了——这是我們当初所沒有料到的——，以致格罗到南斯拉夫来以及我們所發表的联合声明已經無济于事了。匈牙利人民絕對反对仍然当权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們要求撤換这些人和采取民主化的政策。当格罗率領的匈牙利代表团回国的時候，格罗發現他自己处在一种困难的局势当中，而他却現出了他以前的面貌。他把当时还只不过是举行示威的几十万示威者称为“暴徒”，这样就几乎侮辱了全国人民。想一想他的愚昧到了什么程度、想一想他是怎样的一個領導者吧。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当一切都在混乱中、当全国都在不滿的時候，他竟敢用“暴徒”这个字眼来污蔑人民，而这些人民当中有很大一个数目，甚至也許是大多数，是共产党人和青年。这就足以点燃火藥桶、引起爆發了。于是，冲突跟着就發生了。

### 請外国軍隊来教訓自己的人民 是一个严重的錯誤

現在去調查誰放的第一槍是沒有意义的。軍隊是由格罗請来的。在示威还在进行的時候把苏軍請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錯誤。請別国的軍隊来教訓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个严重的錯誤。这个举动結果更进一步激怒了人民，因此發生了自發的暴动，在这个暴动中，共产党人發現他們自己，事与願違地同各种反动分子站在一起了。反动分子混在这次暴动之中，利用它来达到他們自己的目的。难道那里面沒有很多霍尔蒂分子嗎？誰

改造了他們呢？难道能够期望拉科西改造他們嗎？我們大家都知道，霍尔蒂在匈牙利有强大的法西斯势力，有“卅”組織，各种各样的其他反动分子，費倫茨·納吉的信徒們等等。总之，有很大数量的人不赞成共产主义，他們不仅反对拉科西，而且反对整个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混进这次暴动里来。以前，尽管国外要他們进行暴动，尽管他們从国外得到援助，这些反动势力是不敢抬头的，而且只要他們觉得党团结得和磐石一样，他們也就沒有造反的力量和勇气。但是他們一看到党分裂了，很大一部分党员起来反对拉科西集团和过去的残余了，他們就立刻插足进来了。

这些反动势力在两三天內很快地暴露了它們的真面目。由于在全体人民反对过去的一切作法的暴动中，当权的领导沒有表示願意消除那些激怒匈牙利人民的因素，从而开始沿着考虑到匈牙利一切内部具体方面的真正的在匈牙利發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事情很快地發生了不同的变化，反动分子开始日益得势。这个反对一个集团的正当的反叛和起义变成了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全国性暴动。等到反革命分子把局势掌握在他們的手里，参加这次反叛队伍的共产党人終于無可奈何地發覺他們参加的斗争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恢复旧制度。他們發覺他們事与願違地处在这样的一种境地之中了。

現在是否可能阻止这种情况呢？看来似乎已經迟了。如果納吉政府比較有魄力，如果它不是搖搖擺擺，如果它坚决起来反对無政府状态，阻止反动分子屠杀共产党人，如果它对于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抵抗的話……也許情况本来会向一种正确的方向發展，也許不会有苏联軍队的干涉的。而納吉作了什么呢？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来抵抗苏联軍队，并且呼吁西方国家进行干涉。

在兩方，蘇聯的干涉被充分地利用了。迫不及待地要進攻埃及的帝國主義者利用了這種干涉。他們正是在匈牙利悲劇的這個階段進攻埃及的，他們進攻埃及，是希望蘇聯很難分身，因而不能干涉這個侵略。于是在匈牙利戰鬥又起。蘇軍得到了增援。納吉逃跑了，同時一個新政府建立了。同志們，我可以對你們說，我知道這個新政府的人員，並且據我看來，他們代表的是匈牙利最正直的人。他們在拉科西時代受過迫害，他們坐過牢，並且真誠擁護有新的發展。你們已經讀過的卡達爾宣布的綱領本身証明了這一點。可是蘇聯的干涉削弱了整個綱領，因此這個政府的處境非常困難。

### 關於蘇聯在匈牙利的干涉

現在可能有人問，蘇聯的干涉是否有必要？第一次干涉是不必要的。應格羅的請求而進行的第一次干涉是絕對錯誤的。第二次錯誤在於：負責人士竟等待第二次干涉，而沒有立即採取他們後來在蘇聯進行第二次干涉的時候所採取的行動——那就是，他們應該成立一個新政府並且發表一項宣言。如果他們起初建立了一個新政府、發表了這樣的一項宣言的話，工人和共產黨人原會從反動分子當中脫離出來，從而會比較容易地找到一種擺脫這種嚴重局勢的道路的。

在我談到蘇軍的第二次干涉以前，我必須說，匈牙利境內的局勢已經達到了這樣的規模——你們對於這一局勢已經看到了很多的消息——以致於那里顯然會有一場可怕的屠殺，一場可怕的內戰，而在這種屠殺和內戰中，社會主義會被徹底埋葬，第三次世界大戰會因而爆發。因為，那種來自西方的干涉和霍爾蒂分子以及前反動分子的重新當權，是蘇聯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這些反動分子做了些什麼呢？我剛才已經說過，他們在很



早的时候，就已經露出了真面目。事情已經很明显，他們越来越多地在上層占据了統治地位，并且开始禁止使用“同志”这个詞和要求摘掉紅星。当一个共产党員不能說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員，否則就要被弄死的时候，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了，而且共产党員被活活吊死这个事实也使得这一点很明白了。假如說这种事件只發生过一次，假如說他們所吊死的某一个警察人員是一个出名的做坏事的人，那末也許可以說这种事件之所以發生，是一群人自發的反抗的結果。但是，發生的是一次普遍的屠杀。在索普倫，他們吊死了20个共产党員。他們在大街上公开捉人杀人，如果这些人是穿黄色皮鞋的話，因为警察是穿黄色皮鞋的。他們破門入戶杀害共产党員。所有这一切都是野蛮的法西斯反动暴徒們做出来的勾当。

納吉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事来防止这种行为。它繼續在电台上哭哭啼啼呼救，而没有对这种行为展开斗争，用某种方式表示要制止屠杀共产党員和进步人士的决心。它沒有那样做，却發表一篇宣言，它在这一文告中退出了华沙条約，宣布自己的独立等等。就好像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似的，就好像它的退出华沙条約是有意义似的。

許多人現在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为什么会發生苏軍的第二次干涉事件？很明显，我們已經說过而且将要繼續那样說：我們反对干涉，反对使用外国的武装部队。可是現在那一种的坏处比較少一些呢？是混乱、內战、反革命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呢，还是苏軍的干涉（事实上是發生了）？如果是前者的話，那会是一次大灾难；如果是后者的話，那会是一种錯誤。当然，假如那样做意味着可以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那末，同志們，虽然我們反对干涉，我們可以說，苏軍的干涉是必要的。但是，假如他們該做的事情早一些做了，那末就不会有軍事干涉的必要的。

这一錯誤不幸是由于他們認為軍事力量可以解决一切問題的想法而产生的。而事实上軍事力量却并没有解决一切問題。看吧，赤手空拳、武装很差的人民当他們抱定一个宗旨——争取自己的解放和独立——的时候，会作出怎样猛烈的反抗。他們已經不再在乎自己所要争取得到的是哪一种独立，对于是否会恢复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制度也不再在乎了，他們所在乎的只是应该保持民族独立。在人民中間占优势的就是这种想法。当然，我現在只能这样说，第一件事是能够發生的事件中最糟糕不过的事，而第二件事——苏軍的干涉——也同样是不良的；但是，如果它能使社会主义在匈牙利得以保全，也就是說能够在那个国家里进一步建設社会主义，能够导致世界的和平，那末終有一天这将成为一件好事情，但是条件是：一旦那个国家的情况稳定和平靜下来以后，苏联軍隊立即撤出去。

我們已經把这一点向苏联同志們說过。我們沒有隱瞞什么东西。苏联同志們說，他們的軍隊那时是要撤退的。应该記住：苏联現在也是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他們的眼睛現在已經打开了；他們發覺进行作战的不仅是霍尔蒂分子，而且还有工矿企业中的工人；他們發覺整个民族都在战斗。苏联的士兵們到那里去是不会有愉快心情的。悲剧也就在这里。

在我报告完了以后，你們可以提出問題，因为我或許沒有把每件事情都說得很清楚。但是你們可以放心；我們从来沒有劝告他們使用軍隊。我們从来沒有作过这样的劝告，即使現在他們处于危机的时候，我們也不会那样做。在这一严重的局面下，我們只能告訴他們，应该注意糾正过去的錯誤。这就是問題的中心。因此，对于我国国内流傳的那些認為苏軍的干涉純粹是一种干涉主义者的行动的謠言，我們必須加以扑灭。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同志們，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我完全相信，匈牙利境內所流的血和匈牙利人民所作的可怕牺牲，将要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苏联的同志们，甚至那些斯大林分子們，会理解和認識到，事情是不能再那样地做下去了。我們所痛心的——我們大家所痛心的——是：社会主义遭到了这么可怕的打击。它受到了損害。而你們，同志们，是否还记得，我們常常說过，这种方法只会損害社会主义？我們确实說过这些话。我現在并不要大家拍拍胸膛，兴高采烈地說：“我們早就这样告訴过你們了。”

### 匈牙利的事件可能将是最后的一次悲剧

关于这一悲剧，我有一句話要說：假如那些依靠斯大林主义方法而仍旧在各国共产党中当权的那些不負責任的分子劝苏联根据他們的想法办事的話，实际上是对苏联的一种很不好的支持。我認为，在这一切党內，一定有比这許多斯大林分子看得更远的正直的共产党人。他們确实要看得更远些。而如果他們要想改善那里的情况，并不用匈牙利方式，而是用一种和平的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善情况，那末他們就應該批評消極的东西，傾听群众的呼声，黨員的呼声，以及全国人民的呼声。因为，如果这些預言家和謀士們繼續以破坏的方式进行活动的話，如果他們認为有必要一味誹謗我国，繼續污辱我們的話，那末，社会主义当然会要碰到更困难的时刻。南斯拉夫脚跟站得很穩，它到目前为止已經經過了多次的打击，因此来自国外的这些誹謗是不会使它离开自己的道路的。虽然我們还不能完全滿意于我們的国内發展情况，但是我們將努力使我国人民尽量得到滿足，不管我們現在和将来怎么样，我們一定要加倍努力，使这种預言家和謀士們無法实现他們那种目的在于制止南斯拉夫在1948年所开始的而目前正在波兰繼續着的过程的企圖，我們也一定不讓

他們把这种过程引导到斯大林主义的軌道上去。

有一次我对苏联同志說，即使斯大林沒有死，这也是会發生的，如果他活着的話，这甚至会發生得更迅速些。他們并不否認这一点。我們無权告訴他們應該这样做或那样做，我們只能指出他們的这种或那种行动可能引起的錯誤的与消極的結果。我相信，匈牙利事件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悲劇，促使苏联同志們以及仍旧看不見这一点的其他各国的領導人，尽一切力量来避免在其他国家中發生与目前匈牙利情况相同的那种局势。

在东欧的某些国家里和党内，有些領導人在說，这种事是不可能他們的国土里發生的，他們說他們有一个强大的組織，一支强大的軍隊，一支强大的警察部队；他們說他們的全体黨員已經知道了一切情况；他們說他們能够控制整个局势。这一点格罗也說过；这一点拉科西也說过。但是这对他們有什么帮助呢？如果他們不改变他們的工作方法，如果人民一旦起来反抗的話，那是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的。他們1948年以来所播下的种子，現在得到了收获了。他們当初播下微風，而現在却收获到暴風了！

### 我們的發展前景和当前的任务

匈牙利的这些事件使我国也存在的各式各样的人和分子受到一些鼓舞。他們为数不多，但是却大放厥辞。他們有些人一味梦想發生混乱，以便从中漁利。我从来沒有說，我們已經完全消灭和改造了所有烏斯塔許分子、契特尼克分子和那些頑固的梵蒂岡的支持者們。我始終說，只有人民團結一致，才能防止他們在我国作任何嘗試或取得任何成功。今天，人民和党的團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必要，但是，这并不是因為我們害怕在我国可能發生什么事情，因为南斯拉夫畢竟是不同于匈牙利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我們通过我們自己的流血、通过解放斗争，进行了我



們的革命，我們在革命期間已經徹底掃清了我們的內部。我們是不存在這種危險的。

我決不會說，我們的人民完全滿足了，我國的一切事情都是合乎要求的。而且連我自己也不滿意。但是，南斯拉夫的情況是十分不同的——我國國內是存在着前景的，而且南斯拉夫的勞動人民正在不斷地創造更远的前景。此外還有什麼使我感到不滿意的事呢？同志們，他們會記得，我去年作過一個報告，我在那個報告中指出必須改變我們的投資政策的方針。我深信，管理我們的經濟的人們會記住這一點，而且我們應當認真地首先關心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方面，已經有了某種轉變，市場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穩定，物價的飛漲——這種飛漲可能引起通貨膨脹——已經制止下來，但是並不是我所期望的一切都做到了。我們現在再次決定要更加大力地抑制一味搞建設的傾向。我們現在必須努力改善生活水平，同時還加強我國的國防。這兩者都是最重要的，我們一定要注意它們。在這方面，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現在我願意談談各種分子——我國存在的各種分子。他們的想法是這樣的：“現在匈牙利發生了騷亂，霍爾蒂分子以及梵蒂岡分子和其他分子將會在那裡取得政權，這是我們的一個機會。”照他們看來，南斯拉夫將再度被孤立和包圍，他們將能在南斯拉夫比較順利地進行活動。現在仍然有這種分子，但是我要說，他們是大錯而特錯了。因為，我們的黨內並沒有80萬黨員——格羅說，他們的黨有80萬黨員，我聽到這句話以後我看了他一下，感到有點懷疑——但是我們有大約60多萬黨員，他們是曾在革命和鬥爭中受過考驗的幹部，他們不是帶着各種追求地位的和其他的傾向參加我們黨的，他們的肩上都負着建設我們國家的重任。我們會始終知道怎樣及時阻止可能要破壞我們國

家的任何人。在我們的国家里有着拥有60多万盟員的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拥有七百万盟員的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

这700万人都是自覺的社会主义建設者。他們有自己的綱領,而且知道他們的目的是什么。这700万人随时可以發表他們的意見,如果他們認為不能再这样繼續下去,如果他們認為我們不能再把这样龐大的款項投入基本建設方面,或者如果他們認為这件事或那件事是必要的。当然,不管是我或者我們的全体領導人員,無論誰也無权反对我国各族人民的这种願望,即:应当用在今天可能达到的速度来建設我們的国家。同志們,你們知道,当你們每天碰到这些問題的时候,当你們看到这个或那个工厂要是建成的話明天就会产生足以立即改善局势的結果的时候,当你們又看到要保證大量增加生产只需再增加数以百万計的投資的时候,当你們仅仅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些其他东西——我們的人——就有点受到忽視了。你們仅仅看到工厂而沒有看到人。

显然,我們仍然处在困难的境地。我們的对外貿易中有很大的逆差,这种逆差現在仍然不断增加,尽管在过去一年半期間中,我們締結了一些相当有利的协定、主要是同苏联締結的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即以2%的利息取得的大宗貸款的协定。其次,我們已經締結了关于德国賠償支付办法的协定。捷克斯洛伐克已經勾銷了——这就是說抵去了一亿美元,同时和匈牙利之間的債務将要根据它的可能来解决。由于締結了这一些协定,我們已經改善了建設方面的状况。最后,我們已經用信貸的办法从美国得到总值約为一亿美元的小麦和某些原料。我們的状况并不像某些人希望把它說成的那样困难。粮食和面包将不愁缺乏。在我国,市場有些紊乱,因为这些人太不注意設法讓市場有充分的供应了,虽然在这方面全国存在着非常有利的条件。以貝

尔格莱德为例，这个城市附近有潘切瓦奇基·里特农场，那里有极适合种植蔬菜的条件。有许多县和其他一些公社<sup>①</sup>可以为市场生产大量消费品，但是它们却并没有生产这些东西。例如，今天正在从卢布尔雅那运蔬菜到科巴尔去。这是一种什么政策啊，因为我们知道，科巴尔以前是供应的里雅斯特蔬菜的。在我们的国家内存在着一些这类不好的现象。

### 我们必须帮助今天的卡达尔政府

同志们，我稍稍离开了我向你们谈的问题。我希望告诉你们，从将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目前的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我们应该帮助它，是因为它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反对所有那些现在正在不负责任地把全部过错都归咎于俄国人的分子。是的，苏联同志们没有在事先发现和纠正拉科西政权的错误，没有让那些得到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信任的人们能够执政，他们应当对这些情况负责。因为谁也不能强把一个领袖加于一个民族——那是办不到的。

在波兰，情况已经开始稳定了，但是并不是十分巩固的。同样的分子也在那里活动，这些分子是反对波兰同苏联有良好关系的。你们知道，那些有着反动观念的波兰人是憎恨俄国人和苏联的。必须使波兰人民摆脱既憎恨苏联而又憎恨社会主义本身的这种反动势力。因为波兰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有着远大的眼光，知道他们可以从苏联得到什么支持。例如，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波兰人就很难保卫奥得—尼斯河边界，而德国人是从来没有承认过这条边界的，他们是会对这条边界再提出要求

---

<sup>①</sup> 南斯拉夫最低行政单位。——译者

的。总之，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相互帮助和支持。

同样，我們必須同波兰政府和党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尽我們的一切力量来帮助他們。我們必須同波兰同志們一起来反对其他各国的党——無論东方国家的或西方国家的——內出現的那种傾向。同志們，这个斗争将是困难的和长期的，因为实际牵涉到的問題是：新的趋向是否会在各国共产党內得胜——这种趋向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曾經为这种趋向創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現在的問題是：是这条路綫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綫再度得胜。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須在各方面努力，不过不是用从內部破坏这些国家而在那里引起消極的濫用权力的現象的办法，而是要在思想方面，通过联系和交談，以求保証新的精神获得胜利。我們不應該不去批評这些党內不好的現象。你們已經讀到了“战斗报”上那篇文章，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作为第一篇文章是写得不错的，但是它还不够，关于这个問題还需要再写文章。向我們盟員解釋这个問題，是你们共产主义者和在人民中間工作的領導人的責任。我想你們是同意我的話的。

### 关于对埃及的侵略

現在讓我簡略地談談对埃及进行侵略的問題。你們已經讀到关于我們在联合国所采取的态度消息和我就这次侵略事件發表的声明，你們也讀到了我們的报纸。但是我还是想談談过去的情况。当我在訪問印度后的归程中第一次会見納賽尔的时候，他向我談到了他們在埃及的一切困难的确实情况。埃及是一个工業不發达的国家，生活水平非常低，并且沒有任何强有力的內部組織——可以依靠的一个党。納賽尔說，埃及的領袖們都是这样一些軍人，他們把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以便为他們



的人民服务，为人民爭取自由，保衛它的独立。当他陈述所有这些困难的时候，我們看来这些困难实际上几乎是难以克服的。后来，第二次，当我们訪問埃及和开罗的时候，我們又进行了談話，并且看到这些困难是艰巨的。但是我們注意到那个国家的人民已經开始覺醒，它已經开始有了民族覺悟。由于长期被占領和法英的殖民主义行动，这个国家的人民过去是受到压迫并且是处于冬眠状态的。我們認識到若有和平，納賽尔和他的人員在执行他們艰巨的任务的时候，是可以依靠人民的。

在同納賽尔談話的时候，我曾經公开表示我恐怕难以相信帝国主义者会讓他們有和平，同时認為他必須小心，不要給帝国主义者絲毫可能得到任何动机来干涉中东事务。当然，我不能够詳細告訴他应当怎么做，而我只可能指出隱隱出現的危險。我告訴他，他应当知道帝国主义者是沒有良心的人，他們現在还没有放弃他們的野心，他們認為埃及——它是世界这部分的最强大的国家——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和亚洲的屬地来說是最危險的，埃及的強盛和發展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国家阻止埃及为了發展它自己所作的努力。我們的看法（我在同納賽尔举行的會談中表示了这种看法）是，他們应当首先加强內部，他們应当建立一个內部政治組織，建立一支强大和坚定的軍隊，他們应当在經濟方面来提高他們自己，爭取获得他們可能获得的貸款，讓人民馬上看到新的政权是有一些作为的，可以感到有一定的改进。这就是我們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他們已經欣然接受。

在第一次會談中，納賽尔就已經對我們說，他将不得不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因为埃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是不能容忍外国来管理它自己的領土的。当然，他們有充分的权利把它收归国有，所要選擇的只是适当的时机。当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的时候，英法这两个大殖民国家反应很猛烈，当时有发动武装进攻来阻止国有化的威胁。但是由于联合国，这个第一个战争的威胁得以防止。当时决定进行谈判以便使得这个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进行了突然的侵略。埃及最先遭到以色列的进攻，后来遭到了英法两国的进攻。整个这次侵略大概是联合计划好的，发动进攻的时机选在令人遗憾的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对匈牙利的混乱表示欢迎，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英法两国利用以色列的侵略作为说明它们必须保护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借口。

### 以色列表明它是大国的一个工具

这是同殖民国家过去发动的传统侵略没有任何区别的典型侵略。这完全是一样。在我看来，发动这次侵略的人今天已在后悔，因为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第一，他们当初以为他们会在几天以内毁灭埃及，废黜纳赛尔；第二，他们以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在世界上占优势，那就是人们将不会出面干预，联合国将不会谴责他们，因为他们在这个组织中会得到多数票。但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情况恰好相反。埃及没有被毁灭，虽然它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它的军队打得很好，侵略者没有能够占领整个苏伊士运河，虽然他们仍然在进行战斗。埃及人民并没有像艾登所预料的那样废黜纳赛尔。在英国本身，工党对侵略和政府的政策采取了一种非常尖锐的态度。在联合国，绝大多数都谴责这种侵略行动，为埃及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的工作现在正在进行，我们也表示愿意为这支部队提供我们自己的部队。这就是说，埃及人自己要求这样，所以我们大概也会派出我们的部队。

这次以色列表明它是大国的一个工具，因此它构成了对和平的危险。不错，在阿拉伯人当中，存在着对以色列的强烈的

反感，因为将近有 150 万阿拉伯人被赶出世界这个地区，这些人现在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生活着。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愿意締結和約，也不愿意保証它們將把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看待，即它們不承認它。它們現在仍然拒絕承認它，但是这并没有給以色列發动侵略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没有給它这种权利，虽然英国人和其他的人希望說成这样。阿拉伯人是否將承認以色列，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和平談判和說服，取决于自从停战以来所产生的所有悬而未决的問題的解决。在我看来，最悲哀的是法国社会党人丢了臉，并且再度表明他們是那些企圖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旧的、傳統形式的殖民主义的人們的忠实的僕从。他們的臉上將永远洗不清这个污点。他們希望通过对埃及的侵略不仅解决阿尔及利亚問題，而且在其他近东国家获得好处。他們以为这次冲突会蔓延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他們从而可以加强他們的殖民地位。英国人以为，在占領苏伊士运河以后，他們將在近东有一个比較坚固的地位，在毀灭埃及以后，他們將能確保他們在中东的利益。这种侵略居然在法国議會得到大多数議員的支持，这是可悲的。只有共产党人和一小部分社会党人反对它。这是非常可悲的。

同志們，这样就迫使我們要謹慎小心，因为，这已經表明所謂西方民主的維護者——法国和英国仅仅是在口头上主張和平、正义和民主，而实际上，它們是在机会到来的时候可能走向極端反动和侵略活动的温床。我确信，正是因为以居伊·摩勒为首的法国社会党人奉行的这种政策，不幸的法国人民总有一天会不得不付出昂貴的代价。

我們希望帮助法国解决阿尔及利亚問題。我們对納賽尔說，我們認為要法国人离开阿尔及利亚是困难的，而且最好还是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間建立联盟的办法来解决這個問題。当我

們訪問法国的時候，我們對法国領袖們也說了同樣的話。“與其每天花10億法郎來維持你們現在駐在阿爾及利亞的軍隊，倒不如把這筆錢的半數用來提高那些人的生活水平，用來修築道路和建設其他工程，這樣阿爾及利亞人民就沒有什麼可以反對你們的，他們就不會反對以和法國結成聯盟這種形式來解決問題了。與其一天花10億法郎（那就是一個月花300億），你們倒不如走這條道路”。有些法國領袖認為這是正確的，可是另外一些領袖說，法國的威望那就成了問題。現在他們有威望了！他們已經在全世界面前丟了臉。全世界都譴責法國政府的行動，侵略的行動。

### 南斯拉夫很活躍，在聯合國中積極活動

同志們，問題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現在還沒有搞清楚他們的目的何在，他們將做到什麼程度，我懷疑，國際警察部隊這個計劃是否能順利進行。英國人可能會這樣希望：他們的一部分軍隊可以以警察身份留在埃及，但是，不論根據聯合國章程還是因為他們是侵略者，這樣做是不可能的。他們不能留在埃及。埃及決不會同意這樣做的，任何正直的人都決不會同意這樣做的。他們永遠能找到借口來恢復他們的侵略行動。由於蘇聯政府更積極地過問這個問題，他們才有點慌了，開始小心起來。

我們必須比以前更加要用我們的全部力量來維護世界和平。南斯拉夫很活躍，在聯合國中積極地活動。在我們這方面來說，我們應當盡我們一切力量來維護世界和平。絕大多數人民是不希望發生戰爭的。如果說世界上有人珍視和平的話，我認為那就是我國的人民，他們熱望和平，為的是能夠在和平中來建設他們的美好的生活。在上一次戰爭中以及在前幾次戰爭中，我們受够了苦難，我們流了够多的血，因此我們有理由要用



我們的全部力量來為維護世界和平而鬥爭。但是，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越出了我們一國的疆界。

我們的國家是團結的、堅定的、磐石般一致的。現在的問題是改善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們的團結一致——這種磐石一般的性質和沉着，這種對世界上發生的即使是最嚴重的事件鎮靜對待而毫不慌張的態度，這種冷靜的判斷——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們決不允許各種各樣的可疑分子大放厥辭。下面的人民、群眾應當制止他們發言，防止他們散布不和。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我們願意隨時效勞，我們始終可以向你們解釋這裡所涉及的問題。顯然，有的時候有些事情是不能談的。你們不應當認為我今天把什么事情都談了，因為我不能這樣做。但是，有一件事我是可以告訴你們的，那就是我所沒有告訴你們的事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好的方面的。南斯拉夫今天在世界上起了一種受到重視的作用。為了使它能夠繼續起這種積極的作用，我認為我們必須繼續執行我們一直到現在都在執行的始終如一的政策並且保持我們今天擁有的力量。

同志們，這就是我所要告訴你們的。我已經簡單地說明了基本輪廓和最重要的一些事情，我認為這在你們向我們的人民解釋這些問題的時候對你們可能是有用的。

## 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議会的演說 (第一部分)

(原載 1956 年 12 月 8 日“战斗报”)

卡 德 尔

我想乘討論我国經濟政策中的迫切問題的机会，談一談这些問題的政治方面。如果我順便談到了某些同我們的經濟政策沒有直接关系，然而我看来在政治上是同它紧密相联的問題，那就請主席同志原諒。在討論經濟計劃的过程中，有人有的时候会忘記政治方面，忘記我們政治制度的發展，忘記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的进一步的社会主义發展。重犯这些錯誤可能产生極其有害的后果。我們的政治制度、国内社会主义民主的發展取决于我国經濟政策的性質。我們整个社会的内部稳固以及它的順利的社会主义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方面的进步。

每个人都知道，一方面实行極端緊張的、要求全体人民作出巨大努力的經濟政策，另一方面又要保証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無阻碍地發展民主，这是不可能的。譬如，大家清楚，假如把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的物質基础縮小到最低限度，那就談不到充分發揮它們的創造性。

我們过去对这种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关系可能是关心得太少了。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是由于种种客观困难，由于我們所处的特別困难的国际环境，由于我們这样一个年輕的社会缺少經驗。但是假如有了自己的和別人的經驗，我們还繼續犯

这些錯誤，那么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原諒这些錯誤了。

在原則上以及在實踐上我們早就放棄了斯大林主義的論點，按照這種論點，要發展社會主義只要共產黨掌握了政權，然後依靠一定的國家、政治和計劃機構來“建設社會主義”，也就是建設工廠，實行農業集體化，給人們規定工資，而這一切都為了保證黨的領導作用。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建設社會主義的概念無論在實質上或者形式上，範圍還更廣泛，內容還更複雜，它只有一部分是取決於領導力量的主觀願望的。過去我們這種觀點常常受到攻擊。然而，最近的匈牙利事件再一次提醒了所有不願意考慮事實的人，以及認為隨着革命的勝利或者某一個共產黨獲得了政權，客觀的社會規律就會停止起作用的人。正相反，誰要想輕視這些規律，誰就會吃苦頭。

共產黨的真正社會領導作用不能由法律規定。黨只有根據客觀的社會發展規律行動，才能成為真正的領導力量，也就是成為最進步的社會因素。由於這些法則是通過人，通過各種社會階級起作用的，共產黨或某種其他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應當組織得使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傾向能通過它以及整個社會結構表現出來；它自己也應當隨着社會主義關係的發展而改變。假使一個政黨不懂得這點，無論它怎樣大拍自己的共產主義胸膛，無論它怎樣炫耀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標榜它的歷史領導作用，它仍然會對社會主義的發展起阻礙作用。如果它繼續硬要走這條道路，甚至可以變為反動力量。如果認為，一個黨只要稱為共產黨就可以保證自己的政權的進步和民主性質，那就是嚴重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看法。這點在匈牙利表現得很明顯。在那裡，一個官僚專制的反民主制度，違反勞動人民大眾的意志，多年來奉行了一個小集團的某一種專制政策。這在最後引起了武裝行動，行

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也就是只能体现匈牙利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这里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谁利用了工人阶级这种愤怒，不在于工人阶级在自发地起来反对社会上不可容忍和反动的东西以后跟着什么样的口号走。重要得多的是要肯定这样一个事实：某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治制度，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以致促使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力的工人阶级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因为除此以外它没有任何途径能表达自己的意志。

匈牙利事件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悲剧。这件事尤其是对国际社会主义的教训和鞭策。这次事件首先使所有进步的社会主义愿望受到鞭策，体现这种愿望的观点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应当使已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形成的觉悟的劳动人民群众，能够经常地表现出他们的最进步的物质和精神发展，没有阻碍地改变旧制度。这就是要求民主化的含义，目前这种要求正是在许多沿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的国家里的主要要求。

如果某个国家内部社会结构复杂，那就可以有一些革命的政治限制暂时存在。但是，这种限制的存在不能使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自由发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会变成官僚主义的专制统治。不言而喻，在一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运用国家威力并不是充分解放社会主义力量的手段。不应忘记，只要作为强力工具的国家还是经济关系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就谈不到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谈不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终究应该摆脱官僚主义的障碍，以便使它能够通过自己内部的动力发展，能够依靠社会经济关系本身的稳定和内部力量以及通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的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和自觉的主动性得到巩固，并且以此自衛。正



因为这样，如果没有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各种特殊形式的民主的平行发展，社会主义便不可能进步。

我国运用这一原则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有时成绩大，有时成绩小）。斯大林批评我们的共产党消失在人民阵线和群众之中，实质上正是批评我们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这种民主倾向。但是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恰恰是由于发展了这种民主并且同时反对了把社会倒拖到过时的政治形式去的假民主的空话而巩固起来的。而匈牙利社会主义的危机则恰恰是由于缺乏一切民主而引起的。

匈牙利事件清楚地表明，解决这些问题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多么大的意义。此外，这些事件还表明，目前我们主要的任务不仅仅是解决当前迫切和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在我們解决这些问题时，应当保证迅速地发展我们的民主结构。

目前在共产党的报纸中进行这样的辩论：匈牙利革命事件爆发的原因是过去政府所犯的一些错误还是政治制度。显然，虽然产生了一些错误，但是如果群众过去有可能表达出自己要求改变威信扫地的领导机构的政策以便纠正错误的愿望，那末产生个别错误这件事本身不致会引起群众这样坚决的反抗。社会主义劳动群众既然没有可能表达这些愿望和纠正错误，那就很明显，问题正是在于把群众同政权隔离开来的某种政治制度。

这种制度在领导机构的政策和劳动群众的基本利益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迟早总会首先使这个领导脱离群众，然后引起这些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政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使他們没有可能去影响对社会关系中各种事务的管理。

可见非常明显，我们所说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指社会主义，也不是指让群众有可能去影响国家和党的政策的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我们这里指的政治制度是下述这样一些政治形式和方法

的总和；这些政治形式和方法隔絕了社会主义劳动群众，不讓他們有可能直接影响政权，加强了党和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因素，并且使它們逐漸掌握政权的一些杠杆，結果，政权就会变质而成为不同于工人阶级政权的東西了。在匈牙利，正是这种过程使共产党脱离群众，促成某种官僚主义集团的专制，这个集团根本忘記了要去关心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本国人民的希望和願望。作为馬克思主义者，我們时刻不能忘記，各种官僚主义，特别是經濟技术至上主义，根据其本身的邏輯来看，在过渡时期势必会把社会推向这种官僚主义的政治制度。一旦这种过程（如果內部的社会主义力量沒有擋住它的話）采取巨大規模的时候，就不仅会产生斯大林，而且还会产生匈牙利事件。

目前，社会力量的国际关系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今后的命运已經不再由保衛社会主义成果的情况来决定（因为社会主义不再是世界上的孤島了），而首先是取决于这种成果的进一步扩大，取决于社会主义本身的进一步發展。社会主义不需要对在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內和在社会主义国家間的相互关系中所已經取得的各种成就作空泛的歌頌。相反，社会主义需要对自己的成就采取健康的、民主的和批判的态度，它需要一种不可抑制和深邃的願望去謀求最好的解决，首先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决。現代社会主义的整个政治制度应当組織得使这种趋势和这种願望到处都能够表現出来。只有群众不断提高才能产生这种进步的願望。因此，民主毫無疑問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組成因素。正因为这个緣故，社会主义需要討論，需要对匈牙利事件进行开誠布公的馬克思主义的分析。

### **对匈牙利武装起义的两个錯誤估計**

現在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常听到对匈牙利武装起义有两种

估价，然而这两种估价都是錯誤的，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發展是同样有害的。有的人說，这是一种事先策划的反革命，而过去的政治领导所犯的某些錯誤使一部分群众倒向了反革命那一边。另外一些人确认，这是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革命；而他們对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概念都是抽象的，模糊的，結果是把自由理解为傳統的资产阶級民主的多党制度，把独立理解为回到匈牙利民族主义的旧立場。

从头一种估价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反革命必須鎮压，只要糾正过去某些錯誤，問題就可以解决，也就是說可以再走过去走过的道路。这种意見不仅是巨大的錯誤，而且是一种幻想。这样的結論会麻痹社会主义意識，但是远不能說是对真正原因已有了認識，因此远不能說正确地解决了問題。抱有这种观点的人甚至沒有考虑到，自从匈牙利工人阶級憤怒爆發后，匈牙利社会主义进一步發展的出發点已經同1945年不同了。用这样的方法已經不能夠解决問題了。这样做只会使匈牙利悲剧产生的原因变本加厉和日趋复杂。如果誰真正想找到和說明当前危机的实在原因，那就得設法去寻找和說明这个危机的真正原因。这就牽涉到社会主义中極其重要的一些問題，因此，真正珍視社会主义的人就不敢忽視真正原因。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沒有足够的力量去保証通过进化过程来改变一个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社会中的某些政治形式和社会关系，那么就难免發生政治危机。对事件作客觀的馬克思主义分析的人可以根据第一种估价首先提出几个很实际的問題。首先，如果問題只在于拉科西—格罗集团所犯的某些“錯誤”，而不在于那种对社会主义發展已經开始起反动作用的官僚主义制度，那么为什么这回匈牙利劳动群众只有采用武力和拿起武器才能反对产生这些“錯誤”的政策呢？

匈牙利工人階級为什么沒能够通过相应的代表机构，或者即使是通过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它曾經被人說成是工人階級最先进的队伍，而其实，它已經失去了同工人階級的任何联系）以正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願望呢？最后，硬說工人階級在获得自己胜利的第 11 年跟着反革命跑了，这难道会使社会主义的良心感到寬慰嗎？即使我們假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們畢竟还应当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在这种情况下應該对工人階級使用大棒呢，还是應該对把工人階級弄到使它不得不起来反对自己的历史利益到这种荒謬地步的政治制度使用大棒。

然而，这种錯誤邏輯不能不使人得出一个同社会主义，特别是同馬克思主义絲毫不相干的荒謬結論：任何一个党或者是国家可以在沒有工人階級，甚至是違背它的意志的情况下建設社会主义。

### 当前匈牙利的關鍵問題是必須从根本上 改变政治制度

从實質上来說，匈牙利工人階級的自發行动畢竟是社会主义性質的，而且正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行事的。不錯，在对国家制度、民主和党—政治关系的观念方面，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各种小資產階級的抽象自由言詞的影响，但在同时，它坚定地起来保衛生产資料的公有制。不仅如此，它通过組織工人委员会的方式进一步發展了这种成果，把这一所有制由国家所有制形式变成徹底的公有制形式，也就是变为归生产者大家庭的直接民主管理的所有制。值得注意的还有，工人群众主張建立統一的工人委员会和使它們自下而上地團結起来，以便造成条件来直接影响中央国家政权。这件事的本身就証明：匈牙利的工人階級虽然思想上陷入了自發的混乱，但它实际上还是找到了



取得政权的正确道路。

当然，今天很难讲匈牙利工人阶级在为政权而继续进行的斗争过程中能不能保住在企业中的这一阵地。毫无疑问，必然会得到国外愈来愈大的支持的、复活了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企图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在这方面的方针是很明确的。在第一个阶段，这些反动势力企图利用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瓦解来重新夺取国家政权。在这个阶段，这些反动势力乐于泛泛地谈论自由和民主（这特别是因为他们很软弱）。一旦夺得政权以后，它们很自然地就会至少部分地取消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且无论如何都会要限制工人委员会的作用和不断取消工人委员会。

党在中央的一切垄断（不管是一个党或几个党）同生产者群众通过企业和公社中的工人委员会来实现的真正的决定作用是不相容的。因此，毫无疑问，匈牙利的新的“多党制度”很快就会同工人委员会发生冲突，这正像想重新建立某一个官僚化政党的旧式垄断的一切尝试目前的遭遇一样。

可见，如果认为11月4日以后匈牙利的革命冲突已经走上了某种正常的发展道路，那就是巨大的错误和陷于片面了。恰恰相反，为匈牙利彻底的社会和政治管理形式进行的战斗，在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并且，任何不愿意臆测的人都不能说这场战斗会怎样告终。当然，可能性最大的是社会主义力量保住了匈牙利社会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是不管怎样，工人阶级在通过斗争和失败获得经验以便老练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新的民主结构以前，会不得不流大量的血和经受许多失望。此外，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失败，从而使匈牙利变成极端危险的国际冲突的对象。

## 对苏联第二次干涉的看法

对苏联的第二次干涉我們也是这样来看，不管这种干涉的出发点是什么。这里不仅考虑到人民有权自己解决自己内部的矛盾，同时还因为干涉（指在社会危机的时候）本身永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干涉只能把这些问题的解决延缓一个时期，但它也会使问题尖锐化。在这种意义上讲，苏联在匈牙利的干涉的本身对匈牙利内部矛盾的解决也不会有任何帮助的。但是，如果这次干涉将阻碍内部政治制度的各种问题的解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是为希望保证匈牙利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所必须的话，那么这次干涉无疑会使情况复杂起来，并且引起严重的后果。但是，我們同样认为有一种情况是可能的：那就是只要这种干涉能制止继续流血并且提供可能来组成这样一个政府和实行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府和政策能在某种改变了的政治制度基础上把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团结起来，并且保证工人阶级能通过工人委员会和工人阶级的其他类似机构，真正对国家政策产生过去没有产生过的影响，那末，在匈牙利具体条件下的苏联干涉的祸害，可能会小一些。只有这种积极的后果才能说明苏联的干涉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些后果，那么干涉的行为本身也会受到历史的谴责。

我們的这种态度今天处于两面夹攻中。有些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名义，谴责我們没有无保留地支持苏联的干涉；另外一些人以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民主原则的名义，非难我們没有无保留地反对这次干涉。

与此同时，我們认为，在今天，当匈牙利社会处于这样深刻的内部危机的时候，苏联的干涉根本起不了决定作用。这次干涉不是错误的开始，而是错误的结果。因此，这次干涉并不能把

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从危机中挽救出来，而只是更清楚地表明拉科西-格罗时期的匈牙利政治形式是站不住脚的。

我个人的意见是，在苏联干涉匈牙利期间，起着主要作用的不是社会主义问题。起着主要作用的是现今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对比问题。一切稍有现实感的观察家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在今天的国际情况下，当匈牙利的内部发展已开始为其他方面的干涉创造了条件，即是说西方可能在匈牙利建立政治基地的时候，苏联的干涉是不可避免的。否则，那种局势会大大地破坏目前欧洲的力量对比，会严重破坏目前的均势，甚至会危害欧洲的和平。各种“自由欧洲”之类的机构，以及匈牙利的形形色色的狂热的民族主义领袖都证实了这类看法。毫无疑问，这种因素甚至对我们的态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要说苏联政府的态度了。因此，我们尽管对苏联在匈牙利的干涉和这种干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后果感到十分忧虑，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仍然认为，今天东欧的社会主义的命运，不决定于宣布拥护或是反对苏联的干涉，其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次干涉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目前国际局势所引起的。

实际上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一个曾经发誓忠于社会主义的政府当政11年之后，在一个被认为比较发达的、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国家中，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事情怎么会演变到恰恰是由这个阶级来发动武装斗争，怎么会使这种愤慨心情发展到要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干涉呢？把这种过程称为革命也好，称为反革命也好，反正事实是这样：工人阶级，并且是多数，起来反对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权，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末从起义中就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现在也正是工人阶级在反对这种干涉所带来的东西，反对恢复旧制度和旧方法，毫无疑问，

这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拉科西—格罗政治制度的社会性质。

因此，目前的匈牙利的主要問題正是某些国家共产党今天坚决否認的事实，并且正是今天应当談一談的問題。这就是必須徹底改变政治制度的問題，而不是撤換一些人和任命另外一些人和糾正个别錯誤的問題。只有在做到这一点之后，才能大大减小苏联干涉对社会主义所造成的消極影响。

从这些前提出發，我們認為必須給卡达尔政府以政治上的支持，期待或是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并且乐意同工人阶级，即同工人委员会以及同匈牙利的其他真正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派别、包括前納吉政府人員建立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卡达尔政府就可以成为某种首先依靠工人委员会的社会主义民主力量集中的出發点，这才能建立自主的、并且是足够强大的、民主的、同时毫無疑問是社会主义的内部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建立秩序和人民的信任，能为苏軍的撤退以及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創造条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卡达尔政府才能在解决匈牙利的国内社会矛盾方面成为进步的、公正的因素。不然的話，即如果这个政府不采取这种方針，例如最近發生的某些情况（首先是南匈两国政府之間就不再給納吉和其他人避难权一事达成的南匈協議遭到破坏，以及把这批人送往羅馬尼亚去的事实），使人有理由严重地担心。这种趋向可能在匈牙利得胜。如果是这种情况，这种唯一的机会也就錯過，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就要再一次受到打击。这种發展就会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思想意識的动力而抬头，而劳动群众本身就会被引得更向右轉了。

因此，我們認為，这就是苏联干涉匈牙利所引起的主要問題。



## 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

在最近發生的匈牙利事件中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共产党员竟然害怕工人委员会。列宁曾經大胆地提出过“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虽然当时布尔什維克在苏維埃里还不是多数。但是，列宁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有充分根据預料到，劳动群众在感到对政权的責任的时候，他們的行动必然会符合自己的利益，亦即按照社会主义方式去工作。結果并没有錯。在匈牙利，却沒有人有勇气提出这种要求，連工人委员会也是这样，工人委员会受小资产阶級抽象的自由主义口号影响太大了。但是，不管工人委员会成了什么样子，它們总是唯一现实的社会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能在企業、自治单位和中央担負起执掌政权的主要責任，它可能很快就会摆脱有害的反社会主义的影响。由于匈牙利的共产党人过去和現在都沒有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工人委员会，而只是着重宣傳必須开始工作，不提工人委员会的政权；这實質上是共产党人自己把工人委员会越来越严重地推向小资产阶級的和民族主义的冒牌民主分子和空話的影响下。

事实就是这样。对这些事实熟視無睹或是保持緘默都無助于社会主义，無助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結。可見，把匈牙利事件估計为一次有組織的反革命，可能使个別人的社会主义良心人为地得到一点安慰，但是这种估計不能解决在匈牙利造成了流血悲劇的政治制度的内部問題。

对匈牙利事件的第二种估計認為，凡是在自由和民主的幌子下提出来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和进步的。在大街上和在知識分子的各种俱乐部里，空談家們支持那些能最快地把这些口号变成無政府主义的謬論的人，忘記了喋喋不休的冒牌的爱好自由的空話的实际后果，不外乎是在人們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而后使

他們服从真正反革命的同时完全是实际存在的派系；这些派系在这种空話的帮助下首先是企圖偷运傳統的多党制度，而后自己篡夺領導地位。

我并不是說，很大一部分甚而可能是大部分主要持有这种枉然的抽象的自由主义的匈牙利知識分子，主观上不希望真正的民主和人道主义，也不是說反社会主义目标对他們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任何人为了領導革命运动，仅仅是真誠、爱自由和人道主义是不够的。他应当清楚，他所希望的是什么。但是，在提出了大量的枉然的宣言和口号的知識分子中間却没有一个人有才能和有勇气告訴群众，自由和民主的后面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力量对比，一定的社会結構，而在革命行动时没有一定的实际社会力量的話，它們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沒有告訴群众革命的主要問題首先就是建立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是社会主义力量，只有在此之后才能真正地談到一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的一定的清晰內容。不过，在匈牙利知識分子的各种宣言中，关于这些問題考虑的太少了。在现实的物質社会力量的世界和基本物質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世界正在他們身后發生激变和力量的重新集結的时候，他們只有一大堆口号、幻想。这个充滿着物質的和社会的矛盾、利害关系和对立的世界归根到底一直决定着一切，其中也包括自由和民主的問題。誰忘記了这些事实，誰就会很快地被抛在一边。这里所講的那些匈牙利民主知識分子集团恰恰是很快地就被抛到一边去了。这些知識分子只是看到了匈牙利过去的政治結構的不良后果，看不到同时也沒有能力弄清楚它的原因和指出解脫这种局面的出路，来把社会主义和民主引向进步。这些知識分子不善于創造，而只是破坏。当这个工作已經做了，知識分子又采取了十九世紀虛伪的民主和民族主义傳統的綱領。这實質上就是投降，是向斯大林主义和資产阶

級制度的投降。這是承認自己完全軟弱無力。但是在一點上這些知識分子仍然是前後一貫的：直到最後一刻，他們仍使工人委員會不能掌握真正的政權。他們在匈牙利各地建立或者是承認各種各樣的偽革命委員會，但是他們沒有一次曾經公開主張政權不應當交給一個或者多個已經破產了的黨派，而是應當交給一個一定的機構，這個機構的核心應該是工人委員會、地方自治單位和社會主義公社。這樣，在匈牙利知識分子的整個思想混亂中，仍然有某種前後一貫的東西。這種一貫性說明了，匈牙利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行動也是受到官僚主義、也就是官僚主義的物質和社會利益的強烈的思想影響的。

在第一階段，匈牙利知識分子曾經向格羅要求自由，而格羅老早就不把人看做是有意識的獨立的生物了，在第二階段，知識分子期望從恢復起來的資產階級黨派得到自由，而資產階級黨派的“民主傳統”在過去早已為人們所深知了。同時，在任何一个階段上，知識分子沒有能夠指出可以作為自由和民主的體現者的真正的社會力量，就像我已經說過，沒有能夠指出工人委員會、公社和其他類似的社會主義民主形式。

在思想上這個運動的實質是空洞的，這個運動只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基礎上的深刻運動的表面的和被歪曲的反映。因而，這個運動最後歸結為大批互相抵觸的自由主義口號，其中有許多口號變成了空談和幻想，有一些口號成了假面具，被利用來偷運各種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某些匈牙利知識分子集團既然沒有能夠進行什麼創造性的工作來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奠定新的道路，最後，只好從歷史的破爛中找出舊的（它們再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的了）資產階級政治機器和匈牙利舊的民族主義。匈牙利的革命悲劇正是在於，這些思想上空虛的分子隨着形勢的發展而成了革命的政治領導者，因為當時沒有任何其他的領導。

但是更大的悲劇是，当时在匈牙利沒有任何其他的力量和社会主义意識的中心能够向匈牙利工人階級提出某种其他的选择，叫它不要后退到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或者斯大林主义的立場。

### **必須改变政治制度，而不仅是撤換人和 改变机构的名称**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階級的行動是自發的。但是只有工人階級的行動是社会主义的和真正民主的，它建立起工人委員會，并且有着把这些委員會联合在全国統一的系統中的傾向。这就是匈牙利工人階級在直接實踐的範圍內所能做到的一切。

从工人階級的多少帶有自發性的活動中還明顯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傾向：工人階級以工人委員會和工人委員會聯合會的形式組織起來，就好像一個國家一樣。這種傾向是自發地出現的，它既基於工人的切身利益，又出於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匈牙利社會的需要。這實際上就是擺脫匈牙利社會內部危機的唯一正確的社会主义出路。

不幸，這個進程沒有發展到底。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它缺乏自覺的方針和目標不明確。缺乏这样一种多少成熟的概念：孤立斯大林主義的和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治因素（它在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和冒牌自由主義的背後集中起來），通過把政權交給工人委員會的辦法來改造匈牙利社会主义。此外，這個健康的工人階級的社会主义結構受到了政治上、物質上和思想上的嚴重影響，這種影響一方面來自抱資產階級民主幻想的人物，另一方面來自斯大林主義分子和教條，對前者來說工人委員會作為一種能夠保證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力量起領導作用的政治形式而起了阻礙他們的作用，對后者來說工人委員會限制了執政黨的壟斷。



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匈牙利劳动人民自發的激情心情的主要特点是，革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主观因素沒有發生任何影响，而这种因素本来是能够依据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行动綱領推动工人阶級起来通过工人委员会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自治机关进行爭取政权的斗争。

于是問題就發生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怎么会遭受这么严重的思想失败？

匈牙利的革命斗争實質上就是以暴力来清算社会主义进一步發展道路上的障碍的第一个鮮明的实例，这种障碍是某种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物，而在某种情况下也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自然的社会現象。但是这些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和思想还剛剛萌芽，經驗还很少，而社会發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求在政治制度和思想生活方面迅速取得进步。此外，一定制度的物質上和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又以过去丰富的革命傳統为口实，来抗拒这种进步。因此，在匈牙利現在發生的那种社会运动的情况之下，不自覺的自發的激憤情緒可能占上風，这种情緒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只要缺乏明确的思想中心或根本缺乏主观因素的領導，那么在进一步發展的情况之下，这种情緒就可能导致严重的消極的后果和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在革命事件当中，只要自發势力占了上風，幻想也就在人們的头脑中占优势，而实际行动却倒退向某些固有的而在目前加以理想化的旧形式。換言之，那些在混乱的时刻沒有能够在森林中找到前进道路的人，首先开始向后轉，然后甚至向后跑，尽管他們这样会使他們肇始的事業陷于悲惨結局。

匈牙利發生的事情也就是这样。从前的拉科西—格罗政权以及占統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不仅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同时还使社会主义战士的头脑空無一物。在这个官僚主义制度

中，广大真诚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战士受到这样的教育：即在革命胜利以后，主观因素只不过是去建立企业，无止境的投资，保证国家的收购，宣传政府的措施，尽量从国民经济中取得资金来尽量投资和尽可能达到最高的计划指标。置身在这个官僚制度中，任何一个政治家和党的活动家都不得不死记各种各样关于国民经济的数字，这些材料常常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同时甚至没有特别感到有必要能够看到或者弄清楚，在人中间发生了什么？在发生着怎样的社会过程？出现了什么样的新的社会力量？什么社会力量正在衰亡？发生了什么矛盾？矛盾的形式怎样？什么地方出现了蜕变的趋向？什么地方的社会主义进展决定了旧东西的消灭等这一类问题，以便随后使经济政策也适合这些指标。

但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对鸡和马铃薯品种要比对人更了解得多。可是，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就消失了，只剩下讨论计划数字、讨论钢和机器的生产、讨论马铃薯和玉蜀黍、讨论——如我已经说过的——饲养牲畜的方法等等。当然，我决不否认进行这种讨论（尤其是在专家中间）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只限于这种讨论，那么这就是一个征兆，说明并不是一切都好。指导人们如何饲养牲畜的责任不能包括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社会机关和政治机关的任务里。当然，它们应当保证有专门组织随时给予一切询问的人以专门技术和物质上的必要帮助。可是这些中央机关的主要任务无疑地应当是通过社会上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机构，随时给各个岗位上的每个人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以使他生产得更多、更好，同时给他们以充分的独立性，以使他们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主动精神。当我们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假如我们要努力保证，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它的发展中依靠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行动自由，而不是依

賴于國家的力量的話，那麼這一點應當是我們社會結構建設中的主要目的。

我們始終強調，社會主義的建設（假使我們把這個不十分準確的、宣傳的名詞——社會主義建設——用來表示那些致力於發展社會主義關係的人們的自覺行動的話），在這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建設並不是像房子建設的那種過程。這不是可以在官僚主義的辦公室里指揮和領導的過程。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有機的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領導力量應當只是致力於社會主義力量的解放和維護這種力量，防止各種因素的干擾。

在這個過程中，有着各種社會力量，從過去的殘余力量一直到過渡的新的現象，例如，官僚主義，它可能變成非常嚴重的社會力量。工人階級本身正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發生變化。工人階級生存於其間的內部關係正在改變，工人階級的覺悟也在改變。只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的出發點這個角度，也就是說只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來理解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在思想上是荒謬的，而在政治上則是反動的。由於這種觀點，就產生了对共產黨當權的國家里所存在的一切東西作不斷的、自動的謳歌。似乎那里的所有社會問題都永遠被解決了，也就是說，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按照法令去和平解決，並且每一個問題不用任何關心就能够等到這樣的時刻：中央集權的行政機關的某個辦公室將認為，解決這個或那個問題的時候成熟了。遺憾的是，這個唯心主義公式不僅僅是諷刺，而且是現實。根據這個唯心主義公式，便斷定，在過渡時期既不會經常不斷地、每日每時地產生社會發展的良好結果，也不會經常不斷地、每日每時地產生社會發展的不良結果。

## 社会主义对自己的成果需要有健康的、 民主的、批判的态度

如果把过渡时期社会發展問題的討論仅仅归結为被推翻了  
的資產階級殘余現象，那是非常錯誤的。在一个还比較發達的  
国家里，經過10年社会主义發展之后，这些殘余應該是在政治上  
沒有多大作用的因素。过渡时期的国家結構也产生着另一些因  
素，这些因素比上述因素重大得多，抗拒社会主义进步的历史反  
动势力也以新的形式在这些因素中体现了出来。正如我們大家  
都知道，这首先是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以斯大林主义和資產  
階級民主主义的形式出現。只有当官僚主义专制同社会主义进  
一步發展的需要之間的冲突極端严重，以致引起工人階級的憤  
怒和迫使它来向这种官僚主义进攻的时候，資產階級的反革命  
力量才可能是严重的政治因素。不要忘記，法国反革命力量之  
得胜，不是靠他自己內部的力量，而只是在雅可宾党的恐怖政治  
完全与法国社会發展的实际需要和可能發生矛盾之后。反革命  
虽然表面上取得胜利，它却不能消灭那种对資本主义繼續發展  
頗为重要的东西。但是在此以后，就不得不前后相繼發生一連  
串的冲突和革命，这些冲突和革命逐漸清洗了政治体系中的那  
些阻碍社会迅速發展的因素。

拉科西时期的匈牙利的特征是，对过渡时期的社会發展过  
程缺乏任何比較認真的分析，不但如此，在死刑的威胁下禁止討  
論社会关系和其他一切不符合下列神話的問題，即正在建設社  
会主义的社会中除資產階級殘余外沒有反动的和保守的因素。  
按照这个学說，匈牙利的發展是与政府的政策一致的，因此，政府  
應該享有絕对的权力。根据这种概念，宣傳和解釋政府的措施  
是自覺地願意促进社会主义事業的人們的唯一任务。这也是社



会科学的任务。根据这点，整个思想工作丧失了任何创造性的刺激，淪于無原則的實踐主义的奴僕的可怜地位。

产生了这样的問題：这种制度能够造就怎样的社会主义干部，它給社会主义的自發势力提供过那种可能性来糾正所謂領導力量的政策；总之，劳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自觉——这种最終应当成为整个社会制度保持稳定的基础的自觉——怎样才能形成呢？当然，在上述条件下，对所有这些問題的解答只能够是否定的。实际上，政治制度本身和按其地位說来应当是国内最进步的力量的政党本身，并没有培养出能够成为匈牙利社会主义进步傾向的表达者和代表者的干部。这样一来，群众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領導之間的裂痕就愈發不可收拾，而匈牙利工人階級在思想上被解除武装，并且受到四面八方来的各种思想的影响。

只有这种不正常的情況才能解釋：为什么麦多菲俱乐部这样一个包括各式各样知識分子（从非常进步的、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一直到小資产階級無政府主义分子和公开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的团体在起初能够成为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唯一的精力發泄之所，而后成为主要的思想和政治指导者之一。

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形式本身和这个作为社会主义憤怒的主要思想力量的清談俱乐部的活动，表現了拉科西—格罗的官僚主义制度留下来怎样一片思想上的荒蕪。

匈牙利工人委员会也是在这种思想气氛中發展起来的。我們已經看到，和它們对立的是拉科西—斯大林分子和小資产階級自由主义。指責拉科西—格罗政权并且脫离这个政权的那些共产党员們也不了解它們。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仍然处在旧的斯大林教条影响下并且已习惯于不信任群众、不信任工人階級社会主义覺悟、不信任使工人階級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行动的物質

上的必要性，他們不明白工人群众怎么能够直接地、而不是仅仅通过党或党的领导机构来参加政权系统和决定问题。在10年中間仅是仗着官僚主义的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统治国家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瓦解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不再能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因素了。虽然如此，这个党只是改换了名称，企图使匈牙利劳动人民相信，这样问题就解决了。然而，匈牙利工人起来反对的是官僚主义制度，而不是反对建立这种制度的那个党的这种或那种名称。匈牙利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不必在恢复共产党和别的政党方面枉费心机，实质上在过去革命的日子里应当为直接民主的原则的胜利而战斗，其办法就是建立统一工人委员会和自治公社作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基础。只有在这样的民主机构中社会主义力量才能重新再起，这样再起的力量才能再成为这种机构的直接要素。然而，僵化了的、过去的教条重担非常沉重地压在匈牙利共产党人的头上，他們不能作出这种彻底的转变；不管事情显得多么荒谬，共产党人宁愿转向传统的资产阶级多党制度——縱使这样会把匈牙利交付给反动势力，也不愿放弃对自己的群众性政党的幻想，而事实上群众已离开了这个党，因为对群众来说这样的党是官僚专制的化身。在那些日子里匈牙利非常需要进步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战士，但是需要的不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战士，也不是組織在旧政党（不論它用什么名称出现）内的社会主义战士。这些战士本应当在有工人阶级的地方、在工人阶级中間出现，而为了这一目的，必須找出新的組織形式和新的工作方法来。

由于这种意見对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看来是异己的，并且因为他們無論如何也摆脱不掉陈旧的公式，在最頑固的斯大林分子初步孤立以后，他們中間又發生分裂。一部分人受到虛偽的爱好自由的口号和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美丽憧憬的影响，

开始建立和工人委员会平行的、最终是反对工人委员会的政权，因为这两种形式是不能调和的。

我们且不谈，在匈牙利的社会冲突如此尖锐的情况下，把希望寄托于某种传统的、和平的多党民主是纯粹的幻想。即使实情不曾如此，人们仍然要问：为什么共产党人仍然陶醉于他们事实上已失去了的所谓群众性的党，而拒绝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真正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工人委员会里，并且能成为新的政治结构——匈牙利社会主义民主、直接民主的中坚力量。当初如果这样对待匈牙利工人，他们是会明白的。但是一个恰恰由于不让真正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表达机会而遭到可怕的崩溃的政党，现在又在发展他们入党，他们就不能明白了。根据哪一点工人们能够相信旧的祸害不会重演？仅仅根据调换了人吗？没有的事。必须改变政治制度，而不是仅仅调换人和改变组织名称。

另外一部分好共产党员眼看事态发展到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真正越来越嚣张的程度，就给吓慌了。同样的恐惧心理麻痹了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并且使他们变得消极被动，这些工人那时已经不能从纳吉政府看见自己的前途，同时又害怕再回到老的、斯大林主义的路上去。因此就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从纳吉政府中分裂出来，他们有的变成消极旁观，有的到苏联军队中避难。对这一部分共产党员说来，革命的工人委员会是一种异己的机构，这种机构据说威胁共产党在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因此它不能作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起点。后来苏联的干涉和亚诺什·卡达尔政府的成立便是这种局面的必然的结果。

### 社会主义最重要的问题必须公开讨论

我上面已经说过，考虑到匈牙利的整个局势，事前已经很明

白：当匈牙利成为另一方面的干涉的场所时，便不可避免地产生苏联的干涉。而匈牙利开始成为这样的场所是从这个时候起，即拉科西的旧的政治结构没有用真正进步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结构代替，而开始用一种老的、在匈牙利的条件下不能接受的、资产阶级国家（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的政治结构来代替。那样的匈牙利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匈牙利。那样的匈牙利便会破坏欧洲原有的力量对比，从而会引起敌对的国际力量之间的冲突的尖锐化。

由于从来没有一个严肃的共产主义派别能够就工人委员会——匈牙利社会主义的革新的政治结构的中坚力量——的作用、任务和目的提出一个明确纲领，甚至没有企图这样做过，工人委员会越来越受各式各样假民主口号的影响，这些口号追求的目的实质上是把工人委员会同政权隔离开来，使工人委员会的作用仅限于在不依赖工人委员会而建立的国家机器中作为工人的某种政治工会代表。甚至在初期以特别真诚和进步的态度对待工人委员会的那些匈牙利知识分子也没有能起决定性的积极作用，相反的，却往往因为他们辨不清方向而使工人阶级迷失方向。由于这些知识分子除了要恢复旧的资本主义结构以外，没有能力提出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拉科西的制度，这些知识分子便把工人委员会抛在一边，使工人委员会丧失了任何前途，简直时常把它们变成进行实际抵抗和拟定标榜民主的政治纲领的大本营，并且越来越向反革命势力让步了。

因此，应该到这些因素中去寻找匈牙利悲剧的原因，寻找社会主义民主的愿望在这次起义中遭到失败的原因。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作为起义原因的进步趋势也受到了失败。也许，它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在它们不得不和反动势力作的斗争中慢慢会对工人委员会中的社会主义愿望和民主愿望的总和得到



更加明确的概念。但是事件發展得比新意識形成的过程还要快，因此工人委员会的整个体系便陷于不成熟和瘫痪状态中了。

此外，應該注意到，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太缺乏克服官僚主义的經驗，还談不上能从其中最后总结出一种民主政治的形式。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实际上只有南斯拉夫比較認真地探求并且找到了某种从政治上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办法，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了群众的自治机构，从而使社会摆脱了官僚主义分子力图借以使整个社会陷于停滞不前的那些政治形式和方法。当然，我們誰也沒有說，我們所做的一切对所有的人都是唯一可行的和最好的，——最近四面八方都这样責难我們。我們所說的、以及鉄托同志最近在他的演說(这篇演說遭到了很多的攻击)中所說的只是一个事实：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第一个开始通过逐步改变整个政治制度的办法来把官僚主义当作一种社会势力加以彻底清算；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避免这个任务，如果它希望清除道路以使人們之間的社会主义关系和民主关系得以不受阻碍地發展的話。自然，每一个国家都将自行确定这条道路。由此可見，只有生活和今后的發展通过种种成功和失败才可以給社会主义国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提供必要的經驗和必要的理論結論，来保證社会主义在进步的社会主义覺悟的日益强烈的影响下进一步發展。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它可以保證将来避免匈牙利式的流血事件和危机，它可以保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發展是真正地在不断地逐步演进的条件下實現的，而不是在严重的社会动蕩的条件下實現的。

假如这些都是对的話，那末就很明显，我們沒有权利对現代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問題熟視無睹，不論是我們，不論是其他珍視社会主义的人都沒有这个权利。用不着馬克思主义者也能够知道：匈牙利事件不是偶然的，不是用于反共宣傳的数亿美元所产

生的后果。只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的人们才重复上面的論調，并且以此自慰；他們簡直像鸵鳥一样把头藏在沙子里，等候不愉快的日子过去。当然，他們是錯誤的。不愉快的日子并不会这样容易地过去，因为他們有深刻的根源。如果个别的共产党繼續欺騙自己和欺騙跟随他們走的那一部分群众，那么，这些日子毫無疑問将会重演。

無論如何，我們的历史責任是：我們作为馬克思主义者，應該毫不猶豫地、無偏見地、不顧及一切地正視事实。首先必須深刻地分析导致匈牙利起义和东欧类似現象的原因，并且作出結論，以帮助社会主义力量更迅速、更徹底地摆脱斯大林专制的遺產。同样地，必須根据以往的經驗就过渡时期社会运动的結構作出一些总的結論，因为恰恰在这里，斯大林的某种理論和这种理論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运用带来了最大的危害。

建設性的、同志式的和社会主义的討論只会有助于像在匈牙利發生的那种自發过程不再重演。这样做是特別必須的，因为匈牙利悲剧令人信服地証明，这个事件不仅对社会主义是个打击，并且对欧洲和世界和平也是一种危險。为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繼續發展，和平高于一切。

我不想談匈牙利未来發展的前途。很明显，匈牙利最近所采取的措施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否正确，那就要看匈牙利以后的政治、社会关系是否按照我上面所說的方向發展了。如果是企圖恢复过去的政治制度（即使它的粗暴程度比較小一些）的趨勢赢得了胜利，那么問題将不能解决，历史和匈牙利的劳动人民，迟早将要指責匈牙利当权的和在野的起决定作用的分子今天的政治行为，因为，在这过渡时期中，他們沒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和独立的基础上找到一条取得一致的道路。

##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机构發展的必然規律 就是不断地扩大民主管理形式

——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訪問  
南斯拉夫期間和隆哥的談話

(原載 1956 年 12 月 24 日“战斗报”)

卡 德 尔

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訪問南斯拉夫期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及意大利共产党双方代表于 1956 年 10 月 14 日，在卢布尔雅那举行了最后會談。首先隆哥同志發言，他談到自己的各种感想，提出自己的意見，敘述了代表团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們，各共和国、区、地方的領導人、工人委员会及工人团体的代表們进行的交談情况。

卡德尔致了答詞。他着重談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設中的某些經驗和存在的問題，同时也談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意大利共产党間的各种关系。他特別談道：我們之所以非常重視隆哥同志对南斯拉夫的情况及其發展的評價，不仅是因为它将会推进我們两党的合作，而且也因为我們認為建立在彼此諒解基础上的合作對我們共同的社会主义目的和世界社会主义事業能做出重大貢獻。

我对隆哥同志對我們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分析，感到高兴，特别是因为这种分析是从基础出發，而不是从現象出發的。显然，生产資料的社会化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对社会主义來講是基本因素。事实上应根据这点來評價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質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力量。如果这些前提都得到了保證，那

么各国工人阶级就应根据自己的条件，寻求一种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形式。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在我国是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在一切国家都应该采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能了解我们发展过程中的实质，同时希望他们不要通过过去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公式来看我国的发展。

在转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时，卡德尔同志特别强调指出，在国内政策方面在一个已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里，从一开始，基本方针和注意力就集中在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发展的问题上。

###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的一切形式 在不断地发展着

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阶段，把重点放在国家的物质建设，放在工业化上——放在国家全面的经济建设上，这也是非常自然的。

同时，在解决这些主要的任务时，我们并没忘记，归根到底，社会主义不仅要用经济力量去粉碎资本主义，而且首先由于人与人之间社会主义关系各种形式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来粉碎它。如果共产党人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会束缚物质力量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永远的和不可避免的在不断进步。认为共产党人完成了革命，建成了以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并开始更快、更好地建设工厂，也就完成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的想法是荒谬的。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点上，那么我们会落入使社会停滞和失去群众支持的危险中。这里所指的首先就是各种民主形式。这些形式必须逐步保证每个劳动人民更直



接地参加經濟管理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机构。在这方面，我們所依据的观念是：在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个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行动首先不是取决于社会主义最自觉力量的领导（虽然我們并没有忽视这一因素的作用），对这种思想和行动的主要推动力，应该是建筑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个人和集体，在物質上、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利益。如果我們以这种先决条件为出发点，那么很清楚，不断地扩大劳动人民尽可能的直接决定問題的民主管理形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过渡时期政治机构發展的必然規律。由于实现这一規律的条件不同，显然这种發展将是不平衡的。

现实很快就使我們南斯拉夫人注意到上述事实。当我們在第一阶段，不得不首先集中發展我国的物質方面时，自然地产生了官僚主义，由于我們是在一个不發达的国家建設社会主义，官僚主义就产生的更快。

我們并不是把官僚主义理解为官僚机构的特性，即文牘主义、对人的冷酷态度等，而是把官僚主义看作一种社会經濟范疇和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中的某些过渡現象。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能通过适当的民主形式来保証劳动群众更多地直接参加經濟社会管理，那么它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發展的極大威胁。根据自身的經驗，我們确信国家集中管理的那种过时的形式以及党和国家管理机构的結合会使过渡时期某些必要的社会形式停滞，甚至退化。因此后来我們在發展我国社会政治制度中，改用了新的方法。由于这种方法，我們同斯大林發生了冲突，因为斯大林認為只有他有权决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

我們的出发点不是把社会主义建設这一事情視為是某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据我們的理解，这是一种有机的过程，

它应建筑在社会的物质基础上。打个比方来说，建设社会主义和盖一幢房屋是不同的。它是一种这样的植物，各种机械式的行动是不能影响它的生长和发展，而只能为它的生长创造各种良好的条件。我们应该改良土壤，这是植物生长的基础，而不应该强使它变成人为的形式。

国家的任何干预，不能对社会条件尚未成熟的东西创造什么。因此我们应使劳动人民处于这样的一种地位，这种地位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制度中按社会主义的方式不断指导他们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他们由于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必然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行动和考虑问题。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

隆哥同志正是对我国实践的这方面给予特别的注意，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认为如下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是在某种程度上替工人思想，或者是阻止工人走向某种非社会主义道路。如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工人在生产中所处的社会关系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使他们日益更多地参加企业管理，那么，一般地说，工人不仅能够自觉地，而将自发地采取社会主义态度。例如，有这样的情况：信仰宗教的人，或对共产党人尚抱怀疑态度的人，被选入工人委员会。我们的某些共产党人开始也以不信任的眼光来对待这些人。但当这些人加入了工人自治管理机构，处身于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进行工作的地位时，他们在实际行动中与共产党人是无区别的，他们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行动，同时也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行动，因为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促使他们这样做，而这在本质上也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在这种制度中，工

人們由于個人的物質地位，不僅是自覺地，而且是自發地，自然而然地成為每一個工人委員會中社會主義關係的保衛者和捍衛者。這就有可能使國家在生產範圍的作用日益縮小。

我們的國家機構，沒有代替社會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的任務。簡單地說，它的任務是：保衛新的民主機構中的社會主義力量毫無阻礙的發展（實質上發展和建設社會主義就是通過這種機構進行的）。

我們認為國家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的作用應該是日益縮小。資本主義的國家也不是迫使資本家們成為私有財產者，相反地，它的使命是在工人階級的壓力下保護私有財產者的基地及其自由。換句話說，我們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方面，不斷地發展社會民主，這對社會主義最迅速的發展是不可缺少的。

我國的工人委員會和公社是建立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這就是這樣的機構，它必須保證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社會主義關係和勞動人民個人自由迅速的增長。當然，在我們的社會中，尚有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因素和反社會主義的傾向，如：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官僚主義的等等。但無疑地，隨着工人委員會和公社以及在直接民主機構今後發展中物質基礎的發展和加強，這些異己的因素會逐漸地從我們社會生活中清除出去。

### **公社是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相符合的基本形式**

接着卡德爾同志談到公社問題，他強調指出，公社對我們來講，已不只是一個政權機關，而在將來，在國家權力機關的意義上，公社的政權機關的性質日益減少。

公社對於我們，首先是在馬克思所理解的意義上的社會關係的社會主義形式，馬克思說過，“歸根到底公社是所找到的能

够解放劳动力的最适合的形式。”对我们来讲公社是使我们社会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一种基本民主形式中，成长和發展起来整套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机构。同时，公社在当前条件下也是工人阶级，即生产者与其他所有劳动人民进行联系的形式。

但这不等于我们硬要说，在公社發展中我们已达到某种完善的程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这方面“居民联合会”将起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并不是把这些联合会只是视为管理房屋的机关。这些联合会首先应该是在调整一系列涉及到个人和家庭日常生活问题上对公社的辅助。在这种范围内，我们考虑解决下列诸问题，如保护儿童、调整家庭居住问题、使妇女摆脱繁重的家务，对商业网进行社会监督等。因此必须要为公社和那些联合会不断地创造强大的物质泉源，使它们能以自己所有的物质资料解决上述诸问题。我们借助于这将能获得更多成就，而公社，由于其所负的任务，将能按照全体公民的利益促进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这种方式，我们又在一个部门大大地减少国家和行政对社会生活这一部门干涉的必要性。

卡德尔提到了隆哥同志所提的意见，即在一种复杂的形势下，会不会使我们现有的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将不可能很好地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得不采用另一种新方法。他把这种意见理解为在一定的复杂的条件下，必须采取国家更强有力的干涉并说：“我们估计只有在复杂的国际情况要求我们给予极大的努力时，才有这种可能性。一般来讲，将来的一切方法只能在我上面讲过的基础上成长和發展。在较发达的经济中，自治机构将会得到巩固并缩小国家对这方面直接干涉的必要性。”

### 农村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问题是意大利同志非常关心



的对象。因此卡德尔同志提到了这些問題。他強調指出鑒于我国农業在經濟上仍一直起伏于战前南斯拉夫的水平上，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各种形式，落后于其他各部門的社会主义关系，这一事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經濟基础上，即建立在鉄鍬和农業中原始的牛馬牵引的农具的基础上。

卡德尔同志講：“过去几年我們曾試行过集体化。我不能說，在行政时期沒有获得一定的成績。但是在我国經濟中愈是更多地表現出經濟規律，則反映出我国战后第一阶段的制度的弱点也就愈多。而且，很快地就表現出几乎完全同于苏联集体化后直接产生的那种后果。农業生产和农村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我們这个小的，不發达的国家，显然是不能长期忍受农業生产的停滞。因此我們早在几年以前就在我国乡村的政策中列入了許多全新的因素。当时，我們是以下列根本性的原理为出發点的。在乡村中，只有在保証劳动生产率高于資本主义形式，即个体劳动形式条件下的生产率时，才有可能沒有国家的直接压力和强迫来建立社会主义关系。众所周知，如果大經濟生产只是采用原始的劳动工具，小經濟照例是优于大經濟的。

我們認為我国的經驗，当然也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經驗都表明了同样的結果，即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永远必須从联合土地开始，而是从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开始。我們認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的成果将取决于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供給农業最新式的劳动工具，而这些工具只能作为农業中社会所有的資料，而不是指个体劳动的資料。

鑒于个体农民的思想方法和农業生产者的保守主义所产生的因素也在农業中發揮作用，我們对我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一系列平行的形式。

同时，我們确定了这样的关系，使个体农业中的大部份的而且是愈来愈大部份的积累，能自然地通过社会机构，以社会生产资料的形式，回到农村中去。因此我們就逐渐地加强着农业的社会主义部門。即我們不是从土地出發，而是从生产资料和在有土地上使用这些资料所形成的关系出發。

个体农业生产者和合作社的关系（个体农民通过合作社可以使用社会主义生产工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及个体生产者个人的经济利益上。仍做为私有土地的主人的农民，将根据其个人利益，为改进生产而使用社会生产工具——拖拉机、播种机等。当使用牛馬牵引愈不合算，他們就愈会使用社会主义生产工具。因此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工具的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它对土地的私有权，将日益变成取得地租的形式。而地租的高低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义部門的能力，即取决于工具，私有个体农民经济中使用社会主义生产工具的速度。因此很清楚，社会主义生产工具投入农业中越多，我們在农村的基地也就愈巩固，因为这些工具使个体农民经济与农业中社会主义部門，日益密切地联系达到改变农村经济结构。

我国这一发展过程的基本形式就是合作社，我国的合作社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是一样的。它具有和其他社会所有制完全一样的检查原则和分配原则。但是我們所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使我們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吸引最广泛的个体农业生产者。这些組織共同的特点就是他們把自己的劳动建立在农业生产者个人物质利益的基础上。我們深信，而且我們过去的經驗也证明了这在我国的条件是农村中社会主义最迅速发展的保证。

应该注意到，南斯拉夫东部的农民在十九世纪初，在塞尔维亚第一次起义时，在 150 年以前就获得了土地，而西部的农民、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农民也早在 100 年前就得到了土地。由于过去的封建关系，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农民的意識中存在的，或今天中国农民的意識中仍存在的東西，在我国农民的意識中沒有。虽然我国的农民是落后的，但他們总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因此，如果他們本身的經濟利益沒有引导他們这样做，我們是不能通过任何方式，特别是不能通过运动式的土地集体化，把他們导入某种社会主义关系。我們努力通过整个政策創造出这样的条件，使他們为了个人的經濟利益和改进生产与合作社發生联系，以便通过合作社使私有农業者的一部分积累变为社会所有。今天甚至已有了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給合作社的現象。因为合作社能較好地耕耘土地，并能按照市場价格支付租金，而本身还能賺錢。同时以这种方法，合作社也能完成重大的社会职能，因为它可把該农民作为工人分派到这块土地上，并使用社会主义生产工具进行生产。

这样一来就影响到农業生产者的精神的变化。由于农民生产所采用的現代化的生产工具，同时也由于农村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这种精神日益摆脱遺留下的保守主义和个人主义，并在小私有者的自發势力中改变着。正如你們所看到的，在这种条件下出現了非常典型而有意思的、新的、土地社会化的形式。

隆哥同志曾提到我国不發达地区問題以及在這些地区我們所获得的成績。卡德尔就这些問題發表談話說：

“我們認為，正如隆哥同志所正确講的，如果把国内各發达地区所創造的資金，机械地通过預算拿到不發达地区，作为預算的補助金和滿足其他需要或直接提高生活水平的資金，就不可能达到进步。这實質上是我們把發达地区的工人导向貧穷化，而不能促进全国生产力的發展。因此有这样的意圖，即把流向落后地区的資金，首先放到發展生产力，即放到工業和农業上去。

我認为我們在这方面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显然这种發展是不平衡的,例如馬其頓到目前為止發展的成就尚相当的少,而波斯尼亚—黑塞哥維那發展得很快,有着很大的进步。波斯尼亚—黑塞哥維那人民共和国在解放后是我国最落后的地区,而今天已成为工業發达地区。当提到落后的共和国时,我們就認为还有馬其頓、黑山和戈索夫密托希亚自治区。我想,今后数年中我們能从基本上改变它們的状况。”

### 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

卡德爾同志就隆哥同志所提到的有关工人階級領導作用這一問題,指出在外国共产党人間有人不了解我們在这方面的立場,特別是在無产階級專政的問題上。卡德爾接着說:有人責備我們基本上是放弃了無产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当然这是不确实的。不过我們对無产階級專政的看法确实与其他共产党的看法有些不同。

首先,我們認为,如果我們实际上實現着社会主义政权,并通过民主的方式使更多更广泛的劳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政权,如果我們知道無产階級專政這句話并不能說明一切,那么就沒有任何必要不停地揮搖着無产階級專政的紅色手帕。劳动人民政权正是以不同程度表現于各种形式中,从工人階級的極端專政开始,直至联合政权和两重政权等,而这些政权中工人階級起主要作用。而且,我們認为工人階級政权應該朝着把人民政权的各种民主形式扩大到更广泛的公民階層的方向發展。無产階級專政只应标志着工人階級無条件的領導作用,而絕不是剝夺最广大階層的劳动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和社会管理的各种民主机构的可能性。尽管我們今天的發展中尚存在着某些缺点,但實踐証明了我們基本原理的正确性。同时我們是根据馬



克思的原理而行动的，即無产階級不应由于本身的胜利而創造出某种事先臆想的思想制度，而只应把在旧社会内部發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力量解放出来。依我們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就是解放这些力量，保衛它們摆脱反动势力的反击而自由發展，也就是在上述意义上所理解的無产階級专政。

談到这問題时，卡德尔同志曾提到我国社会主义直接民主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生产者院的机构。“这在本質上也是無产階級专政的一种形式，因为通过公社，各共和国以及联邦的生产者院，我們以民主方式保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虽然它在数量上是較少的。一方面，我們通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作用和政权机构中生产者院的作用，以民主形式体现出工人階級的社会領導作用，另一方面，我們努力通过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管理及各种自治机构的广泛的組織系統，通过各种代表机构来保證每个具有各种不同思想观点的公民直接、平等地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

## 几 点 意 見

——評北京“人民日報”的文章

(原載 1957 年 1 月 6 日“戰鬥報”)

北京“人民日報”的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世界工人運動普遍感到關心的一些問題的看法。這些問題是：關於蘇聯的經驗、關於斯大林的作用、關於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問題、關於工人和它們的政黨的國際團結。

首先，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參加關於當前工人運動中某些問題的討論，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事實，不管我們對他們的某些意見是同意、部分同意，還是不同意。

這種討論，特別是這種深入到問題的實質，以求加以徹底闡明的討論，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只會有好處。假若在討論中把一切以無原則的立場來對待嚴肅問題的企圖都打消的話，則尤其是如此。對於這種討論是沒有反對意見可以提出的。

從這樣一種觀點來看待“人民日報”的文章，我們想立即指出一個事實，就是，這篇文章所談到的問題，以及中國對於這些問題的意見需要進行透徹的討論。顯然，將來會有方便的機會來作這種討論的。現在，我們只就北京報紙的文章提出幾點初步的意見。

這篇文章中有好些論點、分析和估計，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可以馬上同意，完全同意，或者在某些保留下同意。例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的意見，就是這樣，這些意見是為經驗所証實了的普遍真理。例如，認為“在過去時期的匈牙利，勞動人民的

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然而，太糟糕的是，中国的同志们没有设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年代中，匈牙利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而建立了什么？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就不能不对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得出别样的结论了。如果那样的话，在我们看来，他们就会用别样的眼光来看待卡德尔同志的演说了。但是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整个说来，对斯大林行为的总的批判是正确的。关于工人政党中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的分析也是这样，只是要指出，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扣得稍微随便了一些。而且，这一帽子以隐含的方式也加到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头上来了。中国的同志们公正地称赞了南斯拉夫为保持独立、为社会主义建设所进行的斗争，公正地称赞了我国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北京报纸上的文章在关于各国共产党保持独立和在相互合作时保持平等的必要性问题上，包含有宝贵的意见。这一切都有助于对当前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现在已经扩大到几乎所有的工人运动中去了。

然而整个来说，这篇文章，特别是其中直接提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意见（即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最近演说）的那些部分，有一些段落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中国同志们在讨论社会主义发展的迫切问题时提到南斯拉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两个党在态度上有分歧，也是可以理解的。凡是对于我们的意见的客观的、有根据的批评，这里将以谅解的精神和注意的态度来接受。“人民日报”发表了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演说，使得中国的读者们能够知道它们的内容，在有了这个无疑是积极的事实之后，我们曾经希望的，而且现在仍然希望的正是这种讨论。读到中国共产党

報紙上的這篇文章，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我們的一些反對意見，主要是關於中國同志們處理對南斯拉夫的態度估計問題的方式。

讓我們只舉幾個例子來看。

“人民日報”的文章的作者們在設法闡明他們的看法時，竟然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給予某種政治上的特性，這種做法既無助於闡明有關的問題，而且在共產黨人之間討論問題時也是不能理解和不能認為是正當的。例如，他們企圖在“西方資產階級和右翼社會黨人”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之間尋找相同之處，因為“西方資產階級和右翼社會黨人”也談“反斯大林分子對於斯大林分子的鬥爭”（他們的“惡意是顯而易見的”），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也把斯大林分子和那些相信“斯大林主義方法”不正確的共產黨人區別開來。把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的觀念相提並論，不能認為是有原則的和正確的。這兩種觀念的維護者們所致力於的目的恰恰相反——一種是要削弱和破壞社會主義運動，另一種要鞏固和恢復社會主義運動。

根據這樣一種邏輯，文章的作者們提出了具有對鐵托同志的指責的性質的一些論斷，說他公開表明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態度，破壞了國際工人運動。表明自己與別人不同的態度而把別人的態度說成是破壞工人運動，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因為無論在過去還是今天，經常在當事的那個或幾個工人的政黨不知情的情況下背地里提出指責或者提出反對意見已經成了習慣。我們認為，只有公開的、建設性的、同志式的交換意見才有助於闡明國際工人運動所面臨的問題，只有這樣，這個運動內部的統一組織才能建立。有人認為，對於存在分歧意見的問題進行任何公開討論只會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敵人，而有害於社會主義，如果我們同意這種意見，那麼什麼討論也不會有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會引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一些章節段落，而生活在思想完全停滯的狀態中。但是，生活是豐富多采的，社會主義發展是不可抗拒的，不可控制的，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它逼得我們進行討論，面對面表明我們的態度，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

“人民日報”文章的作者們把整個問題縮小為我們隊伍內部善與惡的鬥爭這樣一個簡單化的範疇。如果我們同意有這樣一個範疇存在，並且它的存在和活動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關係，那麼不可避免地就發生這樣的問題，這種惡的性質如何？它是在什麼土壤上滋長起來的？為了減輕這種惡，使它失去作用根除它，就必須研究它、闡明它，並且公開討論它。可以用各種方法來研究和根除這種惡，而不把在必要時進行公開討論排除在外，當然這一切並不會幫助帝國主義者和一般的反社會主義勢力，反而會防止他們在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隊伍中為他們的政策找到支持者。

說鐵托同志對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許多共產黨都進行了攻擊，說他對兄弟黨採取了敵對態度，是沒有根據的，除非是，對某種要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保持不平等關係的傾向或者對某種保持斯大林時代的消極遺產的傾向的批評，就是等於對社會主義本身的攻擊。這樣做意味着從錯誤的角度來解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的態度。

對卡德爾同志的演說也作了類似的解釋。

凡是仔細讀過卡德爾同志演說的人，一定要問中國共產黨人從哪里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據說卡德爾同志曾經勸告匈牙利共產黨人干脆把政權交給布達佩斯工人委員會或者索性反革命。從卡德爾同志的演說中可以毫不含糊地看出，他責備匈牙利同志們未能堅決地維護工人委員會，責備他們由於他們同工

人委员会的关系也使得一部分工人委员会落在各种各样的异己的、非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卡德尔同志的批评中所表示的还有一种想法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不同意这样的意见，就是过去的错误和缺点可以用已经被实践所否定的老方式和老办法来解决。只能寻找符合新的情况的新的解决办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种新的解决办法将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力量，而不会求助于拉科西时代的方法。

显然，共产党同志的那种态度是根据这样的论点的：社会主义和那个用或多或少确当的“技术名称”斯大林主义称呼的东西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斯大林主义只能意味着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日报”的文章包含了许多关于斯大林的工作的令人感到兴趣的想法，但是，它的作者们只满足于指出斯大林不时地犯了一些零星的错误。在全世界已经知道了这许多情况之后，特别是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知道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数量和性质（其中包括要把有些共产党整个摧毁这样的尝试，例如，包括对南斯拉夫革命以及这个革命所主张的一切东西的攻击）之后，这样的说法一定给人一种不充分和不完整的印象。

“人民日报”的文章正确地指出：“甚至在基本（社会主义）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量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遗憾的是，文章的作者们在这个问题上也仅仅满足于作一番事实的说明，因为，如果他们继续分析他们的意见，那末，他们就一定会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性质、那个充满错误的制度的性质、那个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的概念的概念的政府制度的性质，得出令人感到兴趣的结论。显然，在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分析的人就必须更公正地对待这些矛盾。

北京報紙上的文章在几处地方呼吁必須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和运动的团結，認為对其中某些国家的政策和領導的批評是有害于团結的。我們目前还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們必須說，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結和消除斯大林主义障碍絕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的，是互为补充的。因此，如果企圖以团結和保护社会主义不受外来进攻为名而忽略对危险性不小的妨碍社会主义發展的东西进行認真的、科学的分析的話，是沒有理由的，甚至是危险的。这样做最后只会損害工人阶级政党之間的思想一致和合作。

我們遺憾的是，中国報紙上的文章中沒有更多地說明这些由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实践所証明了的真理，对于有益地闡明我們时代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問題，它沒有作出人們原来期待像中国党那样重要的党、像它那样經驗丰富的党应作出的貢獻。

## 在紀念列宁逝世的时候

(原載 1957 年 1 月 21 日“战斗报”)

普·佩罗維奇

今天,当我们紀念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宁逝世 33 周年的时候,我們無意通过本文指出列宁天才著作的偉大及其意义。时过境迁, 列宁时代的政治風暴和革命的轉变已肯定地載入史册, 而我們今天所处的長時間距离里, 历史已能对弗·伊·列宁的全部思想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及其意义作出客观的判断。他的活动是人所共知的, 他的成果已成为爭取一个更美好、更合理的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現代社会中一切进步力量的不可分割的財富。因此, 今天甚至社会主义的敌人, 列宁革命思想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認我們时代的这位偉大智慧和締造者, 并对他感到尊重(或敬畏), 这是很有意义的一点。

我們不准备再加以贅述了, 因为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們在本文感兴趣的是列宁遗产的另一方面——在現代爭取社会主义斗争条件下, 列宁主义的运用問題, 我們称之为对待列宁学說的态度問題。这里我們要声明的是, 本文所談的絕不是对上述問題的全面而完整的答复, 我們只不过試圖提出这一問題并指出它的某些方面。

列宁一生从来也沒有說过他脫离开馬克思或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創造了甚么新的学說。他把自己看作只是馬克思的忠实的学生, 列宁的全部活动也正是坚定不移地运用馬克思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精神实質来解决当时各种問題的奋斗过程。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創造者和天才人物的列宁, 在他解决当代的理



論和实际問題的时候，不能不对馬克思主义这門科学的發展作出貢獻，不能不丰富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宝庫。你看吧，沒有一个馬克思学說的重要方面和馬克思学說的領域，列宁不是以其巨量的著作来加以补充、深入，并使其具体化的，至于列宁以其革命实践把馬克思学說变成千百万人生动的实践，从而使之成为物質力量和改造社会与社会思想發展的有力因素，那就更不必說了。

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正確地被列为馬克思主义者，成为三大偉人之一，他們把解釋社会本質和社会發展規律的科学，把改造社会和寻求日益新穎、完善的生活方式的行之有效的科学交給工人階級和社会进步力量手里。在这个意义上，我們——不論正确与否，这个問題是值得反复研究并作出答复的——把列宁主义看作是一种意味着理論与实际相結合的現象的名称，当然，这种現象是建立在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也有某些独特之处，因为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所面臨的問題。然而，即使这样，也絕不能把列宁主义理解成同馬克思主义分开的东西，更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学說，并認为这种学說的最深邃基础最主要的原理不是奠基于馬克思主义，也不是奠基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思想的偉大發現。

乍一看来，好象是很清楚的：似乎斯大林在把列宁主义描述为“帝国主义—無产階級革命时代的馬克思主义”时，他也是这样理解这一問題的。實質上斯大林对待列宁主义的态度是把列宁著作，因而也就是把整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和教条化的历史上特別的一章。对列宁著作的歪曲和教条化在列宁逝世以后“第二天”当斯大林着手在其著名的“論列宁主义基础”一書中闡述列宁的学說时就已开始了，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不闡明列宁的世界觀，而是利用下述的荒謬論点“列宁的世界觀与列宁

主义的基础，按范围来说(1)，并不是一回事”。

今天，常有人重复地说，斯大林——无论如何——“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且不去深究这个问题，因为历史将“无论如何”会作出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贡献”的判断，但是，也应该指出，斯大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已经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列宁主义的态度上了。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他是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列宁主义是不能同“列宁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同马克思主义分开的。当然，斯大林曾下定义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列宁主义代替了马克思主义，而他现在在新的“时代”里就是最伟大的人物了。这种定义显然是为斯大林服务的，是为了在事实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置之脑后，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保留在以前的“时代”里。

这可以从斯大林用来阐明第一条定义的第二句中得到证实。他说：“更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底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底理论和策略。”

这里没有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中的贡献”。斯大林公然解释说，这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和工作在革命以前的时期，当时帝国主义还没有得到发展”，于是，制定这种理论的任务就落到列宁身上了。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问题早就制定了最基本的原理和注释了，这一点列宁自己在社会主义斗争的新条件下运用和发展这些原理时就意识到了。

斯大林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把它同马克思主义分开，把它说成是或多或少的独立学说，以便更加轻易地歪曲它，使它教条主义化，滥用它。这个计

划的第二阶段是——以“新的經驗”和“理論”——即斯大林主义，来“补充”和“进一步發展”已被断章取义的、歪曲的和順应的列宁主义。于是，就要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时候，不仅馬克思主义消失了，而且列宁主义也不見了，或者在最好情况下，保留了空泛的、用以掩飾門面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詞句和保留一个形式上表面連貫。当然，从这个發展的簡單縮影中是不能看出困难的、充滿了斗争、灾难和牺牲的30年历史，和一直到今天为止的状况的。在这种情况下，把列宁宣布为馬克思主义的第三位偉人并不是一件难事，而且也不無一定的道理，特别是由于想获得第四位这样称号的繼承人的野心，加之斯大林主义已日益取代了列宁主义（因为“新的时代”需要有自己的“馬克思主义”），而列宁的名字和列宁主义也日益落入“个人崇拜”太陽的陰影之下，这种“个人崇拜”的过于强烈的陽光刺痛眼睛，并使人中暑。

我不能不在这里引述列宁远在1910年所写“論馬克思主义历史發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的一段。他在文章中就象預見到他的著作的命运一样，談到了那些从馬克思主义中挖去其“生动灵魂”而把它变成为“片面的、畸形的、毫無生气的东西”的人。列宁写道：“我們的——恩格斯关于他自己和他的那位著名友人說，——学說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这个典型定义中鮮明而有力地着重指出了馬克思主义往往被人忽視的那一方面。忽視这一方面，就会把馬克思主义变成为一种片面、畸形和毫無生气的东西，就会剝去馬克思主义底生动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理論基础的辯証法，即关于包罗万象而充滿矛盾的历史發展的学說；就会打破它与那些随历史每一次新轉变而發生变更的一定实践时代任务之間的联系。”

所有这些话，所有这些生动而又深刻的思想对我们时代和我们所談的問題具有多大的意义！斯大林主义最明显的表現形

式只能是粗暴地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教条主义和庸俗的实用主义，實質上就是一种修正主义。不論拿馬克思主义領域內的哪一個問題，例如关于階級斗争、国家和無产階級专政的学說，关于战略和策略的問題，关于工人階級政党的作用和关于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团结等这一切問題的理論方面，在斯大林的手下都变成了死教条、粗暴的實踐主义、“沒有灵魂”、与现实的“时代任务”沒有“联系”的理論，而且有时是用来掩飾極其駭人听闻的行为和举动。

實質上，斯大林主义的理論和實踐早已成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發展的障碍，成为阻碍發展的保守力量，这种力量如不消除，社会主义力量要在整个国际發展的範圍內繼續高漲和进一步順利地向前發展是不可能的。因为斯大林主义（無論誰企圖怎样解釋这种現象）是历史事实，它是一定階級、历史条件形成的現象，如果它在一定的發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現象，那么它在一定阶段內，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向前發展的障碍。

这种情况对于辯証法，关于全面的和充滿矛盾的历史發展的科學，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經常提到的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不是陌生的，愈早了解这点，就能愈快的解决發展的矛盾，更容易克服时代的困难，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到来也就更快。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現思想停滯，各种派別（它們虽在口头上与馬克思主义相似，但實質上是違背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的現象已不是第一次了。从历史上来看，列宁和列宁主义也是在反对曲解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在爭取恢复和新的創造性的表现这个关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社会的生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學的斗争中产生的。同时也須要弄清楚，斯大林主义，这是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形式，如果不通过斗争，它是不会輕易讓位于基于馬克思主义和現代實踐基础上的新的規



点的。它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进行反抗，延迟其寿命，这种情况部份地也受着产生斯大林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的制约。但这些因素也从属于内部变化，辩证发展的法则，在这里也发挥着作用，当然没有任何疑问，胜利将属于新的一方，它将不顾一切地诞生出来并获胜。

在去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发表的时候，全世界都表示高兴，特别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战士们，他们高兴那里吹起了一股新鲜的风，消除了象魔鬼一样压迫着呼吸的沉重的遗产。口号是共同的：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恢复列宁主义，恢复列宁主义科学的真正根源。不管在这方面走了多远，这是新东西，这是标帜该国生活新阶段的一个深刻的转折（而且不止是这个国家的生活）。可能有人害怕这种政策，也可能有人喜欢这种政策，但是不管谁怎么想，这一政策已获得良好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将被载入现代社会进步运动的史册。

在这种情况下，在否定和抛弃斯大林主义方面“回复列宁主义”的口号有着完全确定的进步意义。因为列宁主义是理论宝贵的富有成效而取之不尽的泉源（这不仅在于党的生活的准则和集体领导的问题中，——这些问题经常被附上省略符号），恢复列宁主义，实质上就是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原则，这在今天来讲是具有很大的意义。

但这里包含一种新的危险性，即适应于当前条件的列宁主义新的教条化。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对这种危险的不安还只是预感，而在最近局势的发展中得到了肯定。

所指的是甚么问题呢？

列宁逝世已有 30 多年了，而离确立本国无产阶级某些任务和工人运动一般任务的时候已有 60 多年了。也就是说从列宁生活的时代至今已有好多年了。在这段期间内发生了许多具

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各国的内部关系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有着极大影响。

列宁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其具体政策中在决定立场和制定任务的时候，考虑到的不仅是30年的变化，而是3年的，甚至还少些。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及一切伟大的科学著作中包括有两方面：一种是长久的，是著作的精神和思想，另一种是短时期的，暂时的，仅适合于当时需要，直接实践活动需要的学说，如果我们抓住列宁的每一句话，抓住对当时很正确在今天完全另一种条件下采用并不适合的每一种评价，那么我们是太幼稚了。

今日有这种现象，而且也很多。假如谁想对当前资本主义的情况及其关系进行解释，那么他就只停留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一名著中所下的结论上，不顾列宁写这书的时间过去已有40年了，不顾在这40年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和过去任一时代所不能预知的深刻的、具有很大意义的变化（当然这不是说，列宁的发现不精确，但是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结论今天是否嫌不足，是否需要进一步做新的研究和求得新的发现）。从列宁著作中断章取义更多地作为引言（这还是在斯大林时代学得的艺术）。硬在新内容上套上老的一套，不仅失去这种作风的体现者的作用，而且也歪曲了列宁的著作。如工人运动国际主义大团结的口号是很美的，无疑它对解决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和斗争问题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如果以十月革命时期所采用的方式来实现这一口号（更别提在斯大林时期），那么我们一定会落后于时间，我们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水平也就太低了。

列宁曾多次强调，在所提到的文章中也强调说，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生动的主义中，如果具体的社会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不可

避免地首先会体现在该主义的各方面。例如今天很多人谈无产阶级专政时想到的主要是加强国家的作用，首先是国家的暴力机构，而很少谈，甚至一点不谈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虽然现代条件要求使民主得到更明显的表现（我们且不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逐渐消亡论，首先是指在经济方面的国家作用，关于这点某些热烈的列宁主义者什么也不敢讲）。

我已说过人们常引证列宁，但他们不愿了解，尽管是引证列宁的话，也不能够解决现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问题。这里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具体对待生活和斗争中的各种现象，至于谈到对列宁作品的态度这不能有第二种态度，而只能是象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样的态度；不把它看作是死的教条，而首先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吸取其活的思想、精神和方法，把它视为解决具体问题和实际问题的普遍思想指导。

使列宁主义教条化的最新企图不会带来丝毫好的东西，它们再一次地证明，教条主义倾向在工人党和共产党的队伍中还很强，对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这同样证明，反教条主义、反对空谈和宗派主义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的巩固和今后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当前社会主义进步力量的主要任务之一。

今天，当纪念这位教条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反对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时候，提醒这一任务不是没有好处的。

## 新道路（摘要）

瑪·維尔范

南斯拉夫“国际政治”杂志 1957 年 1 月号發表了一篇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对外关系委员会秘書长瑪丽亚·維尔范的文章，題目叫做“新道路”。文章中說，对匈牙利事件有各种各样的說法。西方各种集团的政治鼓吹者認為匈牙利是“共产主义崩潰”过程最明显的例子，仿佛这种崩潰的过程正在东欧所有的国家中發展。据他們的意見，“民族共产主义”（他們如此称呼南斯拉夫和波兰現在的情况）可能只是这个崩潰过程的最后阶段，而且迟早要被西方型的自由所代替。他們还說，南斯拉夫的例子起了“腐蝕”作用。

东欧的一些保守分子把匈牙利事件說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攻，是国内外反革命分子想复辟資本主义的企圖。毫不奇怪，他們也或多或少地公开把在东欧起这种“腐蝕”作用的責任加在南斯拉夫头上。

这两种都沒有看到东欧事件的实质；这里指的是，这种过程正在这些国家（其中即使最發达的国家也还是比较落后的）中到处自成一格地發展着，那里的工人阶级已經意識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意識到經濟發展問題的头等意义，并且把民族自主当作这个發展的基础。西方称为“共产主义崩潰阶段”的过程，实际上是这样一些东欧国家复兴的过程，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已經强大到足够摒弃强迫它們接受的、在战后特殊条件下發展起来的刻板公式。这个过程在匈牙利采取了悲剧的形式，因为匈牙利一直处在特别严重的从屬情况下，因为匈牙利采取了



經過拉科西政權發展的極端斯大林公式，並且因為西方國家對匈牙利奉行集團政策。

正因為東歐國家的發展過程到處是依靠同一的力量——工人階級這種首先關心國家經濟發展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有覺悟的社會力量，因此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相同的發展形式和勞動群眾相同的要求。因此，如果波蘭的工人階級把建立工人委員會的要求列在他們首要要求之一，正如1950年南斯拉夫工人階級由於歷史錯綜情況而較早地表現了獨立作用一樣，這是不足為奇的。

華沙汽車廠的工人並沒有對某些保守的工會分子的言論感到奇怪，這些人說，工人們要求自治，是機械搬用南斯拉夫的樣子。工人們要求建立工人委員會來作為表現波蘭工人階級作用的手段。他們來不及等到通過法律就選舉了工人的管理機構，把工廠的領導權掌握起來。同時他們又派遣代表到其他工廠中去，號召這些工廠的工人學習他們。

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採納了工人階級的要求，並且建議建立新的工人管理機構。波蘭部長會議1956年11月1日把一份關於工人委員會的組織和職權的決議草案提交公開討論。11月19日議會批准了這個草案。

波蘭民主發展的實質在於通過在波蘭建立工人委員會打開了工人階級直接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的遠景。波蘭民主運動的實質並不在於我們給以適當評價的出版自由，也不在於恢復了一些政黨，因為恢復政黨基本上只是反映了波蘭當前政治發展階段——消除斯大林主義殘余階段的特点，而斯大林主義的政治形式已經不能團結人民來完成發展國家的任務了。

波蘭民主主義發展的實質在於波蘭的工人階級通過工人委員會來直接決定經濟發展，從而使工人階級成為國內的首要政

治因素，这个民主主义發展的實質还在于：当重要的事件發生的时候，波兰工人階級在反对一切保守的、斯大林主义以及反对資产階級复辟力量的斗争中特別表現了他們的社会主义觉悟。

匈牙利的工人階級为了保衛社会所有制并且自發地爭取在社会进程中表現自己的作用，也在起义之初組成了工人委员会。新政府在工人階級的压力下把在企業中建立工人管理机构的条文列入了政綱中，于是工人委员会开始在國內許多地区組成了，并且甚至当匈牙利事件最紧急关头之时也在許多工厂中存留了下来。卡达尔政府把这些工人委员会作为十月起义的成果列入了政綱。

捷克斯洛伐克也沒有处身于这种过程之外。三个月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責工人們企望通过工会对企業管理發生更大的影响是“無政府—工团主义的一种表現”。可是不久前捷克斯洛伐克高級的工会和政治活动家們又回到工会的作用問題上来。強調了“劳动人民积极而广泛地参加生产管理工作是發展国民經济最重要和決定性的因素”（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主席弗·苏普卡）。“加强工会的作用是进一步發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要求使工人对許多有关生产問題产生作用并积极参加这些問題的解决。”（威·西罗基）维尔范写道，东德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由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發生，企望用一切力量来抵制这种逆流，于是在11月20日發表了一項关于建立工人委员会的決定，其中指出，要到工人們認識到企業的任务就是他們切身的事業，要到他們能够利用权力来保証他們可以在解决这些任务方面实行合作，社会主义建設和利用科学技术上的最新發明来提高生产率的基本任务才能完成。

在东欧社会改造的过程中，新的进步力量無疑已經开始粉

碎斯大林的所謂社会主义社会中除了同資產階級反动派殘余的冲突以外，別無其他問題和冲突的神話。它們在大胆地寻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大家注意的中心是經濟問題。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和民主化的速度就要依靠經濟問題的解決情况而定。

維尔范接下去摘述了登載在7月16日出的華沙雜誌“經濟生活”上奧·蘭格的文章。

东欧如果繼續保持过去那种国际不平等关系，那就不可能进行社会改造。因此民主化的进程必須和劳动人民对国际关系平等和党际关系平等的要求同时發展，可見，这两种要求以極大的力量同时在波兰出現这并不是偶然的。这里談的并不是关于某些西方理論家所謂波兰脫离苏联的論調，也不是共产党內某些保守分子所写的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这里所指的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經濟都是一个活的机体，只要沒有別人的干涉和外来的压力，它就能得到最快的發展，并且如果它是大家庭中一个自由的成員，它就能对这个大家庭作出最大的貢獻。中国政府11月2日的声明說到，相互关系方面有些錯誤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誤解，声明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由于国与国之間和党与党之間的这种关系，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更好地按照自己的历史情况和特点来建設社会主义。”<sup>①</sup> 正是不平等关系在东欧的社会和經濟方面引起了这种不正常的情形。这里是說，民族自主在現阶段是經濟發展的先决条件，因此，各种各样长期侵害小民族或不發达民族的自由的做法，不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而且不会實現的。同样，正如强求別人接受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和經濟形式的做法遭到了破产一样，各式各样强人接受其他許多外来的政治和經濟形式的企圖不可避

---

① 引文和声明有些出入。——譯者

免地遭到了破产。新过程發展的开端証明，东欧正在努力寻找符合自己的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根据积极共处的精神行事，就能取得社会主义国家之間，以及同其他国家之間的友誼。

維尔范最后指出，为了积极共处，也是为了社会主义，最好是讓西方最近一些日子也在臆想“共产主义崩潰”，并对这問題發表文章的一些社会主义者，能够理解东欧所發生的过程，并且結束把世界局势导向尖銳化的政策，虽然，这种政策的結果并不是他們有意識的目的。



## 是真誠的社会主义的討論，还是 無原則的爭論？

（原載 1957 年 2 月 15 日“战斗报”）

近几个月来，特别是在波匈十月事件之后，苏联报纸和某些东欧国家的报纸都以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無产階級国际主义和無产階級专政为题發表了大量文章。乍一看来，似乎这代表了一个对社会主义当前各种問題进行广泛討論的时期。但遺憾的是，一开始閱讀这些文章，这种印象就消失了。

如果对“高举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莫斯科“共产党人”杂志）、“馬克思列宁的学說是我們的旗帜和武器”（莫斯科“真理报”）、“評民族共产主义的坏口号”（“苏維埃俄罗斯”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索菲亚广播）、“新出爐的修正主义者”（布达佩斯“人民自由”报）、“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是不可战胜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等几篇标题响亮的文章的主要思想試加綜述的話，应该得出下列的結論：

第一，絕大部分这些进行思想和理論爭辯的文章（我們提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特点是对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运动所面臨的問題毫未进行严肃認真的分析。同时，这些文章全是出自一个模型，只是有时把相同的学究式和死板的教条，甚至相同的引言加以顛倒次序而已。

这种情况早已表明，这些文章的作者不敢正視现实和生活，他們大概由于恐惧现实中的新事物，或者是簡直沒有能力看出那些正在蓬勃發展和不可克制地奋然前进的新事物。虽然在不久前的时期里，發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但在他們看来却并没有

什么質量上的新事物發生或出現，至多只是量變而已，而這種量變完全可以用很久以前相應的類似情況來解釋。根據他們的看法，一切事情以前都已發生過，而在20年、30年甚至40年以前的當時一切需要說的都已說過了。因此他們就這樣把解釋當前的現象和目前現實的變化這個如此重大的任務歸結為把這些現象和這種現實按照老辦法加以分門別類。

上述文章的主導思想是非常簡單的，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受到反動力量進攻的威脅，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應更緊密地團結在蘇聯的周圍，這似乎是由匈牙利悲慘事件和工人運動過去或現在所面臨的所有問題中吸取的唯一經驗。

當然，我們不能，也不願意阻止他們這樣想。這是他們的權利，正如我們有權利不那樣想一樣。但當他們表達自己的見解而對我們的概念避而不提、妄自認為只有他們的觀點才是，並且必須是絕對正確的時候，我們為了進行平等的討論，就有責任在我們自己 and 世界輿論的面前表達我們自己的看法（即便只是有時才表達一下）。

第二，一部分東歐國家報刊文章作者，盡一切可能否定現存的那些阻礙社會主義發展的內部因素。由於他們無視波匈事件的一些根本的社會根源，甚至於還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期間和以後所作出的一些結論後退了一步，他們就動搖起來，甚至於從根本上貶低了斯大林政策和那一整套被稱為斯大林主義的社會現象的危害性。這種傾向最近以來已經出現在東歐各國某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里。

當然，在這方面我們也不可能指望必須同我們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的觀點取得一致。問題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因為我們見解不同而譴責我們，可是我們認為我們的見解是正確的，只要這是討論的題目，我們就有責任公開表明我們的想法，倒底是誰

正确，这可由将来和实践来证实，而不靠写大量的文章。

第三，几乎我們所談到的所有文章都包含这样的内容：对那些仿佛打着“反斯大林主义的招牌”（这个招牌越来越说得虛無飄渺了）和“提出民族共产主义口号”（这一口号也是越来越被說成是有人在加以宣揚和維護）的人無情地施加攻訐，說这些人企圖削弱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結，企圖摧毀他們的陣营和損害無产階級专政，而归根結底，不管他們主观願望怎样，这些人終將把社会主义双手奉送給社会主义的敌人。这里，他們有时是間接地，而大多数情况下是直接地指明南斯拉夫是反苏和对苏联經驗进行攻訐的策源地，是“分裂主义者”和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团結”的体现者。

用这种方法来解釋最复杂的事件是非常简单的。这种解釋方法可归結如下：如果对一定事件的某些解釋“有利于帝国主义”，那么这种解釋就是錯誤的。显然，作为馬克思主义者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是不能同意这种“論点”的。这是徹头徹尾的唯心主义，更确切地說，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照它的說法：“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客觀真理。”

不管如某些人所說，斯大林主义是“与共产主义完全一致的”，也不管我們認為斯大林并不与共产主义完全一致，但这种对客觀真理的探求同各种各样評价斯大林主义是否“对帝国主义有利”一事并沒有任何联系。重要而且應該加以肯定的是：斯大林主义本身是否“有利于帝国主义”，这种有利又到了甚么程度，而不要把对斯大林主义性質的評价本身放到一个次要的地位，以及爭論这种評价是对帝国主义有利或無利。

在与南斯拉夫和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观点、立場以及行动的爭論中，某些东欧报刊的文章和广播往往是一条紅綫相互串联着的。

也許沒有必要再次重申：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過去和現在都主張對社會主義迫切問題進行開誠布公的、誠懇的、同志式的交換意見。他們相信，這種交換意見在今天比任何時候更為必要，如果上述文章的作者也對這種討論具有願望的話。遺憾的是，情況並不是這樣。

他們所進行的爭論和他們所根據的論據究竟如何呢？我們由於篇幅所限，只能援引幾個簡明而典型的例子。

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者，而且不僅是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者歷年來一直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工人運動的關係方面必須無條件地尊重平等的原則。如最近一系列事件所証實的對於歷史經驗的評價也說明了這個問題的頭等重要意義。這都體現在去年的蘇南宣言和10月30日蘇聯政府的宣言里。可是，上述這些文章的作者經常與這些文件相反，硬說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方面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困難，或者，在比較好的情況下，他們對這些困難默然不提。他們忽視了在東歐國家10月、11月事件里占有突出重要地位的那些問題。如果對事情進行認真的分析，就可以得出結論說，只有嚴格尊重各國工人運動的獨立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力量真正的團結。但他們的態度卻是進行毫無根據的指責，說對於這個機械的集團的“團結”進行批評只會引起分裂，只會分化社會主義力量；因而“不管你願不願意”，總是有利於資產階級反動派的。實踐證明，舊的“斯大林式”的“團結”和“壟斷”所提供的條件更加符合反動派的行動——這對於反動派並無任何阻礙。

第二個例子。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並且遠不只是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主張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可能並且應該是各式各樣的，而每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都應具有一定的特征。按照我們的說法，即是特殊領域和特殊“空間”，實質上也就是說獨特的、特



殊的条件。毫無疑問，在這一領域所積累的許多經驗都具有廣泛的、普遍的意義，但是接受還是拒絕這種經驗則是自願的事情。在自由接受的條件下，這種經驗甚至可以成為共同的。這一切都在蘇共二十次黨代會上談過了。但是，在若干共產黨機關報上發表文章的這些作者，表現了自己在理論思想方面的妄自尊大，一方面原則上也承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多样性，但另一方面卻把這些原則在理論上的運用說成是“民族共產主義”和“修正主義”的表現。不久以前，布拉格的“紅色權利報”曾清楚地闡明：宣傳“民族共產主義”只可能是向社會主義總進攻的前奏曲。當然，如果確是根據這種提法，是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的。事實上“民族共產主義”一語原來出自資產階級的報刊，現在它卻為某些共產黨的報刊所採用了。這就是一種企圖掩蓋爭論實質的手段，而且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似乎爭論不是圍繞着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是圍繞着民族主義在進行。資產階級報刊之所以需要這個東西，是為了在世界勞動人民面前掩蓋社會主義發展的蓬勃遠景，而現在某些共產黨中的保守分子卻把資產階級這種對我們鬥爭的騙人之談用來為他們在實際上阻礙社會主義的發展做辯護。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者現在雖然被人日益公開地稱為民族共產主義的代表者，但我們卻從來沒有提到過這種共產主義（提到這一名詞的只是我們上面說到的那些大量的文章）。當然這對我們的“批評家”來說是一點也不能混淆的。此外，還時而指責我們沒有看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之處，時而指責我們反對通向社會主義可以有各種道路。

為了舉例說明，應該提一提這個日益為人所重複的論調：南斯拉夫人硬要把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榜樣”，也就是說把自己在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的辦法強加給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有如莫斯科“共產黨人”雜誌在題為“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發

展”一文中所写的那样，說南斯拉夫完全抹煞了经历过最近几十年社会发展进程的考驗并被肯定了苏共历史經驗。莫斯科“新时代”杂志在談論瑪丽亚·維尔范同志在“国际政治”杂志上所写的一篇文章时，硬說“她力圖暗示只有在仿效南斯拉夫的榜样时，这些形式(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形式)才是可取的。”这里，我們可以看到：正是有人企圖把自己的作法归咎于一个一贯反对把自己的經驗强加給別人的国家。我們且不談論这些。当然，如果我們想要那样做，那将是一件十分难以理解的事情。但在同別人相比时，我們除了本身所有的物質力量以外，再也沒有其它物質力量了。而且，这种物質力量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但它并不取决于我們“干涉”別人事务和自己的做法“强加”于別人的本領和意願；它只取决于：別人是否認為我們的这种或那种經驗对他們有利。正如人們所說的，攻击总是最好的防御。

因此，在对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的政治、經濟生活的一般报导方面，乍看起来，好象是客觀的，但實質上却是恶意而又片面的，其用意是想以此来表明：“南斯拉夫的經驗”(看吧，我們是多么固执地企圖把自己的經驗强加于別人!)是怎样地带来了經濟上的無政府状态和政治上的迷失方向。

第三个例子。南斯拉夫的以及許多別国的共产党人都認為，如果不能保證生产者更积极更直接地参与經濟和国家的管理(如馬克思所說的国家逐步消亡)，則社会主义自然会面临官僚主义、停滞和蜕化的巨大危險。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下，民主化的社会實質就在于此。上述文章的作者，一贯避免对这种問題进行建設性的討論，(而这种問題却位于現代社会主义各項問題的最前列)他們满足于把对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批評与对無产階級专政的攻击相提并論。正如實踐所証明，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可能导致工人階級政党的領導同工人階級完全脫节，而所謂

的“無产階級”專政你可以把它称为任何东西，但就不是“無产階級專政”。因为这一專政沒有充滿民主的內容——但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似乎竟是并無妨碍的。由此就会产生这样一个謬論：致力于扩大工人权利和使工人階級政权确能得以加强的人，反而有可能被指控为陰謀反对工人政权。

可是，在此值得說明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的見解。当然別人也可以对同一問題有不同的意見。如果我們大家都主張对这一重要的問題进行討論，那么就就有討論的必要，可是討論必須是公开的、自由的和平等的。我們認為这种討論才是可取的和有益的。

在任何情况下，陈述意見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采取一种建設性的和真正是原則性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并不需要在表达自己意見的同时詆毀別人的見解和經驗。

事情就是这样。一方面有人認真地努力設法对社会主义所面臨的各种問題給予原則性的分析，而另一方面所采取的却是一种毫無論据的爭論性的行动，而且充滿着半明半暗的諷刺和帶有偏見的指責。不能閉目不見这种情况：一部份东欧国家报刊披着理論討論的外衣，实际上是在爭吵，而且事先就堵住了自己的耳朵，無視各种証据和事实，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般真理，并把这些真理同对若干共产党及其政策的不公平的攻击混淆在一起。這場論战的參加者，似乎作为“被侮辱”和“被攻击”的一方，毫不猶豫地詆毀着南斯拉夫。他們不是在熱衷地追求真理（这應該是最好的討論方法），而是經常对真理采取先入为主的态度，不是客觀地表达對方的态度，对这些态度进行認真的批判性的分析，而是蓄意进行詆毀。

因此，必須明确地說明，在估計过去的事件（不管它發生在甚么国家），也就是說在估計那些将被載入社会主义史册的事件

时，必須容許完全自由地作出判断。如果仅仅因为牵涉到某些国家的政策（不管是甚么国家）而不能就一些对社会主义总的發展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对其一般問題也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进行討論，这完全是难以想象的事。

應該指出，苏联外交部长謝皮洛夫在最高苏維埃两院联席會議上的报告中說到苏南关系的那一段話，也完全充滿了离奇的，同东欧若干报纸相似的論断。

謝皮洛夫說：“我已經說过，由于苏联政府的努力（这种努力得到了南斯拉夫政府的欢迎），苏南关系得以正常化。我們在将来也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苏南关系在友好和平等的基础上順利發展。目前这主要有賴于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因为在南斯拉夫还一直使人感觉到某些份子对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不友好态度，甚至是直接的攻击。我們对此感到遺憾，因为这些事实，毫無疑問地会影响到我們的共同事業”。

我們一方面欢迎“使苏南关系在友好和平等的基础上順利發展”的願望，但也應該立即指出，这一別有用心的提法是难以理解的，它使人得到的印象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主要是苏联政府努力的結果。南斯拉夫对两国关系之成为不正常是不負任何責任的，它曾不止一次地强调願意使关系重新正常化，但在这些事件發生之后，需要苏联政府首先主动地采取一些实际措施，这是很明白的事。無論在过去和現在，苏南关系“在友好和平等的基础上”的發展有賴于双方的善意和努力。这就是說，有賴于苏联方面，因为南斯拉夫的观点和立場是始終如一沒有改变的。

謝皮洛夫报告中特別使人感到不安的是連他也訴諸于对南斯拉夫进行毫無根据的指控。讓我們来形容一下这位苏联部长的語調吧，这些指控听起来也完全是在“攻击”。

不能忽視这一印象：連謝皮洛夫实际上也企圖把南斯拉夫



的某些观点和看法确定为是对苏联的攻击，而仅仅是因为南斯拉夫的观点和看法同苏联政府和苏共领导不同。这种声明甚至可以解释成这样的态度，即只有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接受苏联对现存分歧的观点和看法时，苏南关系才能友好地发展。

謝皮洛夫就这样把我们曾经描写过的在苏联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同苏南两国的国家关系混在一起了，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益的。

当社会主义发展的問題，特别悲惨地反映在匈牙利事件中的时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所发表的谈话和文章的精神，是力求尽可能全面和客观地对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的困难加以分析，不带任何偏见和对事实的歪曲。但可惜的是我们所得到的答复却使得客观的讨论无法进行。这些答复缺乏为这样一种讨论所必需的基本的性质。这就是为甚么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些大量的对南斯拉夫政策的攻击加以争论的理由之一。

我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舆论界认为：在共产党之间进行讨论是必需的，而且应该使得各种不同看法得到表达。但这种讨论不应成为国家关系之间的任何障碍。至于社会主义力量间思想上的团结一致，我们相信通过各种争执问题的解决和诚恳的讨论，将比用坚持机械团结的办法，更能使团结得到巩固。坚持机械团结的办法已经多次证明是成问题的和不切实际的了。而且上述方式是唯一可以达成团结的方式，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行的。同时，由于问题的重要性和态度上的深刻分歧，要达到团结一致一定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到那时团结的思想才会摆脱集团的内容（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一内容是存在的）。

依靠一种无原则的争辩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这种争辩由于对南斯拉夫的指责而愈益具有一个蓄意制造的运动的形式。我们坚决主张各种思想问题和对国际政治问题看法

的分歧不应当成为各国关系有成效地發展的障碍，因为这种發展有着广泛的可能性。假如繼續进行这一包含着許多思想認識以外的因素的反南斯拉夫运动，就会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实现更加困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認為对相互关系的評价和权衡不应当根据于一些未能实现的不现实的願望和計劃，而是应当根据于那些已經实现了的，特别是在各国关系中已經实现了的东西。这就是說应当根据于那些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低估的成績，这种成績表现在那些双方利益已經得到滿足并能順利开展相互合作的各个方面。

# 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議會 的外交政策报告

(原載1957年2月27日“战斗报”)

波波維奇

## (一)

在过去几十年里，国际生活中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了經濟、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虽然对这些变化还没有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估价，可是它們的总趋势是可以清楚地看出的。这里所指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客观趋势：各国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更加相互依賴和合作；为了普遍的相互經濟联系的目的，建立一个統一的世界市場，包括有必要縮小發达和不發达的地区和国家之間的差別在內，因此对不發达国家的發展給予国际援助在今天已經成为一种刻不容緩的需要；避免战争和避免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問題和国家之間爭端的手段；建立持久和平，这对全人类有效和諧的發展說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普遍先决条件。

这个进程随着工人階級和国际工运影响和作用的日益增长，随着在广泛基础上的相应的进步的社会变化，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国家、社会和政治制度各方面發展起来。我們把这整个进程称之为世界上社会主义因素的加强和取得优势，称之为世界在向社会主义前进。联合国通过其部分活动也反映着这个进程和这个客观的社会趋势。

可是，在当前世界上仍然發生作用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观念却落后于这种物質的發展。在这些观念之中，占統治地位的仍

然是采用軍事战略方法对待政治問題；而經濟和軍事实力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一般說来也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

利害冲突的錯綜复杂是实际存在的。虽然現代社会所面临的問題極其复杂，但這些問題必須得到解决，而且事实上也正通过各种方法在解决。問題在于我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和積極地影响各个問題的解决以及整个局势的發展。

我們当代的基本社会問題是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具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意义的事。它正在我們眼前按着現代社会进程和斗争的內在規律在实现。在这些进程和斗争里，主观因素的能动性起着很大的作用。

由此，我們就面临了下述的情况：即一方面，是普遍的、进步的客观趋势；而另一方面，却又是旧关系遗留下来的“不适当的”死板的现实。客观趋势正通过这些旧关系在为自己开辟道路。

在反法西斯和反奴役的战争里，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曾經站在一起。虽然如此，間接地說来，战争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特定的阶级內容。当时所提出的口号和总的目标促使了进步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發展，更确切地說，促使了在当时的旧关系的范围内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各种力量得以表现出来。这一进程也表现在：一系列的国家采取不同方式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同时在另一系列旧的附屬国或半附屬国里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斗争。通过这些运动和斗争，許多国家获得了独立，使旧帝国主义的殖民統治陷于瓦解。事实上这也就是一个今天已經全面展开的統一和进步的过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两个集团，从而把世界分割为二，造成了国际合作的困难。今天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分



析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显然，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有許多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

这些集团一旦建立起来以后，依据其內在的邏輯就自然而然地力圖为了自己的利益形成对立的軍事集团，而不惜牺牲集体安全；形成互不往来的經济体系而不惜牺牲自由和普遍的貨物交流；并轉而成为壟断的政治和思想集团。無論在政治、經济或思想方面各式各样的壟断都产生了类似的消極后果，在世界的广泛範圍內建立起有大国参加的軍事集团体系，以及軍事基地网的建立，都使国际关系更加混乱、緊張和复杂化，这不是使得安全更有保障而是增加了摩擦、冲突和战争的危險。在这方面只要举中东的例子就够了。

当然，我一点也不認为，依靠任何一方的一个簡單決議我們就可以指望解散这些集团。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依靠国际关系长期地朝着有利的方向發展，依靠促使东西双方进行合作的努力的加强，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上产生某种程度的集体安全。可是，必須指出：世界的分裂对于肯定积极共处的政策产生了消極后果，而积极共处却是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唯一基础。正因为这些原因，我們不願意参加集团，認为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对巩固世界和平作出我們的貢獻。但是，当然也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某一国家参加某一集团就会成为不爱好和平的国家，或者阻碍南斯拉夫同它进行合作（也就是同所有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准备根据平等的条件同南斯拉夫进行合作的話。

如果这种估計至少在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很显然集团以外的国家在进步力量的总和範圍內，会在国际生活中拥有怎样的地位和意义；同样，和平的积极共处政策及其实践也会在国际生活中具有怎样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种和平的积极共处不能理解为只是共存和相互“容忍”，而是应当理解为一种积极的合

作，其目的在于通过进步的社会变化克服矛盾。这样才有在长时期内避免战争的现实可能和远景——在今天只有受到历史譴責的势力才会把战争当作武器。正因为这个原因，只有决不为国家政策的眼前利益，实用主义概念所左右，而是遵循整个社会进步的长远利益的政治活动，才能是而且在实际上是真正进步的和建設性的活动。

## (二)

我不想在此詳細闡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的發展情况。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由于国际关系的恶化，特别是两个主要集团間关系的恶化，形成了所謂“冷战”。同时在集团間确立了某种力量的均衡，这种均衡是靠軍备竞赛維持的，在軍备竞赛中具有更大毁灭力的热核子武器的生产占居突出的地位。在这种气氛中以及在这种关系中是沒有可能解决任何一个悬而未决的国际問題的。过去形成的均衡，在客观上阻止了战争的爆發；虽然如此，但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均衡畢竟是不穩妥的，同时也不能提供建立持久和平的基础。

近年来，国际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国际緊張局势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緩和。人們越来越多地觉察到战争是不能解决国际的爭端的，在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而且战争会成为共同的灾难。大国已認識到“冷战”开始妨碍其本身的长远利益，并認識到如果不引起会导向大战的極其严重的糾葛，就不能强制破坏已达成的均衡局面。于是他們开始执行一种建設性的政策。朝鮮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停止，奧地利問題的解决，日內瓦四国首脑會議的召开，联合国的接納新会员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机构的成立，裁軍問題上观点的接近，以及許多令人兴奋的現象，都是新政策的实际表现。这种形势的良好發展，都清楚地証明了紧

張局勢在廣大範圍內有緩和的可能。必須指出，在這期間內蘇聯外交政策的改變，大大地有助於這種美好遠景的實現。總之，和平共處的政策開始日益被提到首位，並確立為共同的原則和實踐。

這種良好的發展過程，不僅涉及集團間各別國家的相互關係，而且也提出了集團內部各國間的關係問題。這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或者是在社會主義各國內，社會和物質的發展過程都沒有停頓。如果國際緊張局勢一旦趨向緩和，新戰爭爆發的危險一旦削弱，這種發展過程就必然反映在集團體系內的“軍事紀律”上，這種紀律在前一些時候曾由於局勢的動蕩不安而被認為是必要的。如今代替它的是在共處政策和原則範圍內所公開提出的這些關係的更加平等的問題。同一原因，我們已是現階段在全世界範圍內以新規模在進行着的人民解放運動的見證人。

但是當戰爭危險一趨向減少的時候，那些“局部性戰爭”合法性的理論和某些國家想利用剛出現的平靜來強制鞏固其已被削弱的地位的企圖就開始出現了；於是很快就看出某些國家的領導人沒有能夠現實地使本國政策適應於新的趨勢。因此和平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以武力作為政治手段，這當然不是政治力量的標志，而是脆弱的表現。顯然採用這種政治手段並不能解決已成熟的政治問題，而只能在緩和局勢的進程中引起危機，使國際關係再次尖銳化，但所有這一切，無論如何也不意味著上述社會和政治的良好發展進程會中斷，而毋寧說是被人為地埋沒起來了。另一方面可以預料那些曾使用過武力的國家，不管其今天在這方面採取的公開態度如何，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已看到他們是遭到失敗了。

### (三)

南斯拉夫政策过去和现在在其独立外交政策方面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原则的牢固性并不使我们的政策一成不变；因为国际情况本身就处在不断地发展的过程中。国际情况经常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常常不能立刻看清楚要采取什么立场和进行哪些活动才最有利于和平的加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事件与问题都不是以简单的形式出现，而是参杂着反映各种不同的相互混淆的观点和利益的内容和说明。至于我们决定我们立场和行动的基本准则是：根据客观分析，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来维护和巩固和平。

我们的积极和平共处政策，除服务于和平事业并自觉地致力于和平事业之外，它同时也符合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和直接的利益。世界对我国政策的重视证明：它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和利益，它已不只限于我国本身的利益，这就赋予我们的政策以特别的重任。

虽然我们这种独立的政策在许多外国领导集团中得到了承认，但是它的贯彻却经常遇到许多困难和许多其他集团的误解，这大概首先是由于，在集团还具有这种作用的世界上，我们的独立政策指出了它们的缺点，指出了随着时间转移并为了总的利益必须消除集团的存在。我们积极共处和不参加集团的政策，遭到各种批评，特别是在缺乏忍耐和缺乏合作的气氛占优势的国际关系尖锐化的时期。当对我国政策的批评实质上是对它的和缓性和建设性表现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集团的策略认为只有揭露另一集团的缺点才是可以接受的和合理的。

例如在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情况就是如此的：我们那具有建设性的和现实性的立场受到来自一方和另一方的谴责，既有“右



面”的也有“左面”的。那时我們的立場是致力于防止造成該地区更大范围的冲突，并且从匈牙利局势中寻求适合于匈牙利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和願望的社会主义出路。

以这种态度对待我們的政策和我們的立場是沒有任何现实根据的，我們对集团的立場不是出自于我們的空想，而是我們对国际关系评价的結果，我們認為这种种评价是客观的。这就意味着我們的这种立場并没有妨碍我們同所有国家建立尽可能良好的关系的願望和要求，不管它們属于这个或那个集团，也不管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有甚么差别。但我們深信，我們同一方面的国家維持关系，沒有也不可能有損于我們同另一方面国家的关系。同时我們認為，在那些属于不同集团的各国間維持这种良好关系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因此，我們欢迎其他国家負責人的具有这种精神的声明。例如苏联部长會議主席布尔加宁致阿登納一函中曾明确表示：我想強調指出，談到在我們两国間建立良好关系的时候，我們始終不渝的認為，这种关系的發展，不能也不應該給苏联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別国的关系带来任何損失。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2月18日在迎接保加利亚代表团人員的欢迎詞中也說：“每个国家都应受到尊重，只要它的人民及其領導者都奉行和平政策。”如果能用这种尺度来衡量我們的政策，那我們將感到非常滿意，当然，可以从各种不同的立場出發對我們的政策提出某些不同的意見，但是肯定不能从这样的立場出發，即認為我們的政策不是最一貫地爱好和平的。

如果从共同利益的观点出發（这种共同利益是在我們看到本身利益的同时也一直看到的）在我以上所提到的观点和政策中，有甚么值得指責的地方嗎？我深信是沒有甚么值得指責的。相反，我們相信我們經常是在非常艱難的条件下，通过沉着而又

明智的活動，進行着共同有利的工作。國際關係越惡化，這種工作就越需要（雖然這時進行起來比較困難）；因為這時不僅特別需要在這些和那些國家之間建立起橋梁，而且特別需要在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進行建設性努力的過去和將來這兩個時期之間建立起橋梁。

不難理解，在一貫執行積極共處政策的時候，那些把自己的政策也建立在同樣原則上的國家對我們是特別接近的。

#### （四）

我現在的任务是來報告我國同其他各國的關係，但一些具體的事實和事件使我不得不盡量簡短和盡量不離對外政策的本題，來談談我們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方面，談談我們同其他國家，特別是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關係的意識形態方面。我之所以說到這一點，是因為在我國同他們之間某些國家的關係中出現了這方面的問題，更準確地說，是因為若干本來屬於對外政治關係方面的問題成了意識形態問題。

我指的是最近期間，特別是波匈事件以後，在我國同某些上述國家的關係上所出現的困難，這些困難直接涉及我國的對外政策。我們十分重視同這些國家的關係，正因為這樣，就更有必要弄清楚這些困難的真正原因到底何在，怎樣才能依靠雙方的善意和努力把它清除？我不想在這裡又來重談這些關係的歷史和1948年事實上的決裂（南斯拉夫對此不負任何責任），也不談最近幾年開始的、為南斯拉夫真誠歡迎和全力支持的關係正常化。我只想強調指出最近幾個月發生的事件。

去年夏天南斯拉夫代表團訪問蘇聯以後，特別是上述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若干分歧便看得很清楚了（其中部份是屬於意識形態問題的性質）。這些分歧表現在一系列的相互關係問題

上，表現在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的理論和实践中的其他問題上，而首先則表現在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陣营”的关系上。

这些分歧事实上在以前即已存在，但在国际关系的發展还相当良好的时候，沒有把它認為是进一步改善我国同这些国家关系的障碍。即使在今天我們也还持着这种看法。

尽管苏联和若干东欧国家对事件的經過有另一种不正确的看法，我們对这一次發生的困难也不負任何責任。这条真理是近几月来在苏联和若干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反对南斯拉夫、反对我們的看法和实践的运动所不能推翻的。这一运动在客观上是企圖詆毀我国国家和社会制度，把我国孤立起来，誹謗我們的政策。

这些分歧在最初确是意識形态性質的，我們沒有理由不这样去理解它。而且，要把屬於狭义的意識形态性質的問題同屬於政治性質的問題区分开来常常不是簡單的事，何况还可以期望它会使得相互間的友好国家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正常發展呢。但遺憾的是这一期望至今仍未实现；据我們看来，这不是意識形态的分歧可能对国家間的关系起不良的影响，而是因为这一次的爭吵事实上是由于对国家之間到底應該保持怎样的关系有不同的見解。这就是說，即使在这一次，从意識形态上的分歧这个字眼的狭义方面來說，也沒有起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字眼的完整意义看来，对待所謂“社会主义陣营”的态度并不是意識形态問題。意識形态方面的論据又再次被用来作为建立象苏联政府認為正确的，对它合适的那样的国家关系的方便手段（不管这是有意識的或是無意識的）。因此，大部分的所謂意識形态爭論都是針對这样一些“錯誤”問題，即無产階級专政、国际主义、国际工人階級的团結，各种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理論上的可能

性等等。如果这里真是指的基本原理，那么实际上就不会有爭論。但由于从这些原理中得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实际上应維持怎样的关系的結論更正确的說使意識形态基础从屬於国家的直接的对外政策的利益时，爭論就会存在。这些关系和正确权衡这些关系的問題，是苏共二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后来，在苏联10月30日的声明和苏联同若干东欧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的其他一些文件中也提到了这些問題。根据我們的看法，对外政策的完全独立自主，不仅同真正的国际主义毫無矛盾，而且正是它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照我們看来，爭吵的實質在于我們对待“社会主义陣营”的关系和地位，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經講过了。“社会主义陣营”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事实。当然，这一状况对他們有利还是不利，这一陣营要不要以誰“为首”和应以誰“为首”，这是有关国家自己的事，而且只是他們的事情。我国采取独立的，一直坚持和平和置身于集团之外的政策，同样也是这些历史事实之一。沒有任何理由說我国这样的存在和它的这样的政策会有碍于任何人。我們不願参加“陣营”，因为这既不符合我国对外政策既定的原則和方針，也不符合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总的利益。显然，無論是“陣营”的存在，或是我們不願加入陣营，都不应妨碍我們發展相互之間的友好关系。除了要求以一种应有的态度相待之外，我們再無其他要求。我的确不知道是否有很多这样的国家，它的人民和領導者始終一貫地和頑強地“奉行着爱好和平的政策”，象赫魯曉夫同志所說的那樣，这些国家“應該受到尊重”。我离題太远了，但我仍要說我們并不要求任何人承認我們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無可毀謗的事实。只有實踐和历史才能对此作出有效的判決。

从所有这些理由看来，如果有人期待我国的發展会使我們



放弃置身于集团之外的立场，毫無疑問这是不现实的。如果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若干领导集团指望这一点：“失望”将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坚持这种不现实的期望，其后果对国家之间的关系說来也是有害的。因为这会导向以这种在不现实的计划范围内所没有达到的东西去估计和衡量相互关系的价值和意义，更正确地說，是根据分裂我们的东西，而不是根据珍贵的和真正有益的在实质上能达到而又能使我们接近的东西来估计和衡量相互关系的价值和意义。这就使得我们的与人不同的看法和立场被人毫不公正地视为对苏联政府和若干东欧国家政府敌对情绪和敌对意图的表现。但無論任何意識形态上的論据也不能証明：“陣营”是一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义务参加的合作的必需形式。同时，也不能因为一个国家对“社会主义陣营”的概念持着另一种立场或它不在“陣营”之内，就对它的制度的性質做出結論。

在这一場由苏联和若干东欧国家的领导集团进行的反对南斯拉夫及其政策的論战中，实质上受到最尖銳攻击的正是我国独立的置身于集团之外的和平共处政策。我們同一切国家，特别是同所有的工人运动的派别和力量进行合作的政策受到指責，說这是“反馬克思主义的”、“非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不管意識形态方面的术语如何，問題的实质完全不在于此。有人特別指出我們的政策是非馬克思主义的，因为据說我們的政策忽視了国际关系中的阶级斗争，不願看到世界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相应的陣营，从而沒有根据这种基本的分裂和差別确定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特别是当談到对于总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發展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匈牙利問題的时候。

在这方面我想举出下面两点：

第一，关于匈牙利。我认为无需再来重复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对此已经做过的分析和估价。但应当指出即是在属于“阵营”的若干国家的报纸对这些分析和估价进行批评以后，我们仍然坚持这种估价，事实上这些批评丝毫没有推翻我们估价的本质。这些批评都离开了正确的基础，即是说离开了对实质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和探求，所涉及的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而且常常歪曲了原来的意思。至今从他们这一方面还没有对这些事件作出任何一种比较认真的分析，即是说没有对这些事件的社会和政治的根源进行分析，而把一切都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所策动和指导的反革命活动，而我们却致力了解那里所发生的事件及其发生的原因。而且，我们当然既注意到反革命力量的活动，也考虑到其他因素的作用——这些批评和评论的目的仅仅在于找到一些补充的解释，以使无法分清责任，把旧政策和旧实践在整个阵线上毫无疑问的失败归诸于外国间谍和颠覆分子的活动和阴谋。据说这种解释和说明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因为似乎这种用来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实用主义的办法在阶级关系中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我想，在这里用不着再来说明这种办法和这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环境的发展的解释会带来怎样的新的危险了。

关于纳吉问题，我们对待各有关方面自始至终都是做了我们应做的事，但另一方对我们的态度却不能说是同样正确。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有人说我们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企图用某种方法干涉匈牙利的内政，那是完全不正确的。

一般说来，我们在联合国面前对待匈牙利问题的立场，除了根据既成局面和用在当时是唯一现实的办法来力求避免国际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而外，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目的；除了希望一个友好的邻国尽早恢复和平生活和常态以外，毫无其他利益。

其次，是关于共处政策和阶级斗争。1957年2月12日，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报告时曾肯定地说，苏联政府所奉行的共处政策决不是权宜的政策，而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石”。可是，当我们这样来肯定我们的政策时，却有人说我们忘记了阶级斗争。对于我们和我们的政策来说，这两个问题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世界观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根据这一点，阶级斗争就是社会主义胜利远景的基本原动力。正是基于对世界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进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产生了借助于积极和平共处的概念和实践而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斗争；这一斗争既是我们这种分析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有原则性的、实事求是的政策。因而，在目前条件下，即在工人阶级在世界上所起作用具有优势和社会主义因素和力量在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中具有优势的条件下，这一政策就是我们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这些社会主义的因素和力量不能导致“阵营”。如果真是这样，要把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思想原理同共处的原理和实践对立起来，无论如何也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任何人也不能为了阶级定义的必要性，而否认我们有权把我们的积极共处政策看成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否认我们有权象我们这样来运用这一政策。假如认为在这两者间有矛盾的话，那显然不是我们的看法。

社会主义不能保证不致发生特殊的内部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可能是相当严重和困难的（不久前我们都相信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保证不会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当然，也不能保证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不致采取错误的或有害的观点和立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并不是完全从外部通过颠覆和阴谋活动造成的。为了社会主义的有效的發展，必须“安于”这些事实。我们深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

主义給社会主义事業带来的損失要比所有的帝国主义陰謀加在一起所带来的損失还多得無可比拟；而且只有这样看才是避免重犯斯大林主义的唯一办法，因此認識到这一点就更为必要了。

同资本主义“世界”相一致的那一部分利益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只有在最大限度內一直不断地扩展这一范围，用展开和平竞赛的方法来决定到底哪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更富有生命力、更能滿足現代人类的需求和願望的社会主义政策，才是正确的政策。

对“陣营”的概念，甚至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作用和評价持有不同看法和立場的这一事实，不应当成为發展友好关系和合作的障碍。如果这点竟然成为不能發展合作的理由，那么只是証明了爭論的真正原因并非在于此。尽管对我们所称呼的斯大林主义的評价有分歧，重要的是我們在相互关系中不要采取有害的斯大林的方法和行为。我們相信这一点是可以达到的。

下列事实証实了这一点：在我上面所提到的困难發生之前，我们与苏联以及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关系在經濟、政治、文化和体育等各方面都有了順利的發展。我们对改进和發展这种关系給予極大的注意，并認為这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們的四个邻国都屬於东欧国家陣营，这点也不容忽視。我們特別重視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和發展。我們同这个偉大的国家沒有地理上的疆界，它的人民在决定全人类的进步和命运的事業中起了历史性的作用。但是，由于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和实际上的領導地位，它与南斯拉夫的实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东欧国家同南斯拉夫間的关系。

至于我們同波兰的关系，应当說波兰在去年十月暴風雨的日子里，在匈牙利悲劇和埃及战争的千鈞一髮的时期，在內部發展方面实现了深刻的非常有意义的轉折，在国际关系中勇敢地



走上了完全自立的道路。波兰人民在这条道路上所获得的成就使我们人民深为高兴。我们相信，为了互利和和平的巩固，我们两国政府将继续在各方面推进已经建立起来的富有成效的合作。

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关系仍未得到正常化的唯一的国家就是阿尔巴尼亚，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罪过。由于他们十分缺乏建立良好关系的善良愿望，虽然我们做了许多努力，仍然是无能为力的。近来甚至发展到某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讲话中毫无理智地和粗暴地攻击我国。这些攻击是这样肆无忌惮，竟在批评科索夫和米托希亚的阿尔巴尼亚居民的处境的借口下，对我国的内政横加干涉，并且公开地煽动反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印象：目前阿尔巴尼亚领导方面正在有意识地以各种借口去破坏南阿关系。但是，我们仍认为两国人民是被相互间的友谊，特别是被人民解放斗争中共同进行的奋斗、共同遭到的灾难和牺牲联结在一起的。两国之间应当建立正常的和友好的关系，因为这既符合双方的利益，也符合普遍的利益。

在谈到我们现在同苏联关系的情况时，我应当告诉你们，在实现某些经济协议方面，如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合作方面和在某些贷款和例行换货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但在执行几个月以前签订的另一些经济协定方面，却出现了意外的困难。特别是关于制铝的投资贷款协议，苏联政府提议把它的执行延迟到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期限。

尽管存在上述的困难和阻碍，南斯拉夫政府仍将继续努力，使我们同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的关系能更加广泛和更有成效地发展。不久前的事实证明，这些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无论从有关国家的利益看来，或者从更加广泛的世界和平的利益看来，基本

上都是适合的。为了正确理解各国人民的要求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我們仍然認為：在各方面开展同东欧各国的双边合作，存在着广泛的可能性。

至于說到我們，應該指出：南斯拉夫政府在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中，將繼續遵循两国政府在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宣言中指出，并被正式接受的各项原則。我們希望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的政府都有同样願望。

我們和西方国家虽然在社会制度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是，仍然可以發展双方的互利合作和友好关系。为什么同对人类社会发展与我們持有相同見解的国家不能更广泛地这样做呢？但目前正是由于对出自同一根源的、一致的世界观有着不同的解釋和运用，使得我們的关系复杂起来。事实上，如果大家都以应有的态度去了解南斯拉夫，了解它的全部見解，社会制度的内部形式，以及它的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且大家的确有了这样的了解，那么大部分的分歧，甚至所謂思想上的分歧都会很快消失。

我們同某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中也曾發生过暫时的困难，这是各国关系中不可避免的事。在这里，主要的困难也常常是由于对我国是集团以外的国家的这一情况缺乏了解，对我們的对外政策的主張加以怀疑。这是由于大国中某些集团不能理解，在目前总的国际义务下，第三种国家的真正独立是不能象他們所希望的那样“一面倒”的；也即是說，他們認為第三种国家对其他大国，特别是对“敌对”陣营的大国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实际上独立，而只是虚构的、有限度的独立。另一种困难是来自某些西方集团对我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指責。这里也只有我們對他們的单方面的共处。当然，我們絕不允許对我国内政横加干涉，常常有这样一种臆想：西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式無論如何比

別人完善，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發展和前进一定得采取这种西方形式。很明显，这种想法是沒有根据的，并且完全不能这样去权衡其他制度的优劣，也就是說，不能在这一基础上衡量他們有多少与西方相同之点，或在某种程度上与其相近。我們不把自己的道路强加給別人，也期望別人對我們不要这样。此外，不可忽視，在这样的願望和“阻碍”的后面，往往隐藏着十分实际的利益。例如：希望有可能对这个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發展加以更大的影响。

上面已經提到某些西方人士的观点。但应补充的是在与我国的关系中，这些观点沒能取得优势。相反，正是由于沒有附加政治条件，我們的合作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因此，将来也会是这样的。我們認為我国同西方的关系将能繼續順利地發展，从我們这方面講，并准备进一步努力改善和扩大这种关系。

我們从整个社会和政治进展的观点出發，将同样去对待欧洲的某些經濟的和其他的部門走向統一的趋向。虽然这些趋向無疑地在基本上合乎人类进步的要求，但由于目前还只是在几个西方国家的人为的狹窄範圍內活动，再加上在我們生活的“时代精神”里事物总还是从屬於过渡性的集团利益，所以还不能在完全的意义上認為它是良好的。

## (五)

去年南斯拉夫政府繼續同許多国家發展和扩大了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方面的联系。这些問題将在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詳加闡述。我这里只想涉及几个問題。

去年我們同厄瓜多尔、蒙古人民共和国、苏丹和柬埔寨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今年年初我們又同突尼斯建立了邦交。

我国政府性的和其他性質的代表团对別的国家所作的許多

訪問，以及許多外國政治家、議會和其他性質的代表團對我國所進行的訪問，都有助於愛好和平各國為鞏固和平的基礎和尋求進一步加強和平的道路所付出的共同努力。

去年，以鐵托同志為首的我國政府代表團訪問了埃及、埃塞俄比亞、法國、蘇聯和羅馬尼亞；同一時期，納賽爾總統、蘇加諾總統、尼赫魯總理、西哈努克親王、卡爾曼利斯首相、羅馬尼亞政府代表團和其他許多外國代表團訪問了我國。

這些訪問和雙方在訪問期間共同簽署的文件，都是全部活動的一部分，這種活動有助於從根本上加強世界的和平合作在道義上和實際上的影響，同時也從根本上促進了相互了解的意義。而且，可以肯定地說，去年各國政府和許多國家的各種努力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國際形勢的尖銳化並沒有到達不可復元的地步。

關於我國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關係我已經談過了。我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得到了良好的發展。

我們特別注意同鄰國關係的發展。同友好的希臘的關係得到了特別順利的發展和鞏固。同意大利和奧地利的關係繼續在順利發展着。意大利現居我國進口的第四位。至於奧地利，我們相信，通過奧地利財產問題的解決，已經消除了一個不動產抵押券的問題；這個問題曾經人為地束縛了符合雙方利益的、兩國關係的發展。

去年，鐵托總統訪問了法國。如果從今天的局勢來回顧這個有益的訪問的話，那麼可以再一次地說，當時簽署的文件是反映了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的。我們認為，在蘇伊士危機期間兩國關係一度表現停頓狀態以後，今天又重新存在着繼續進行有成效的、雙邊合作的一切條件。

我們同英國的雙邊關係在埃及事件期間沒有受到比較嚴重



的破坏。我們估計，扩大合作的条件是良好的。我国的議會代表团很快即将訪問英国。

同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得了良好的發展。不久，我将回訪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先生和挪威外长兰格先生，我国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代表团也将訪問这两个国家。

去年以来，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繼續得到了順利的發展。这种有益的發展特別表現在双边的經濟合作方面。今年，美国政府在我們所缺少的消費品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南斯拉夫政府已通知美国政府說，它对长期經濟協議感到兴趣。关于鉄托总统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訪問美国的问题，已經同美国政府研究了。我們遺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理由（这并不在于我們方面），这种本来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訪問未能实现。

我国同南美大多数国家都有良好的关系。双方都有进一步發展关系的願望。

我願意強調指出我国政府同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亚、埃及，許多阿拉伯国家和埃塞俄比亚等国政府所达到的高度的了解和合作。这里起重大作用的不仅是相似的共同利益，而且个人的联系和接触也加深了相互的同情和了解。我們認為，在扩大关系，特别是在扩大經濟和貿易的关系方面，存在着良好的条件。我国同印度的友好关系已經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方面具有特別价值的是：最高級的、本着完全相互信任的精神对一系列国际重大問題和事件公开地交換各种意見，并使双方意見趋于接近。这种相互間的信任 and 了解，已明显地反映在联合国組織里我們有效的合作中了。

## (六)

我国政府对一系列当前的国际問題，都是根据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共处的原則、發展国际合作和巩固和平的精神，采取了适宜的态度，并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对問題的解决作了建設性的努力。这些态度在过去已清楚地得到了表現：——如关于对埃及的軍事行动，关于中近东、匈牙利、塞浦路斯、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关于援助不發达国家、东西方的貿易、裁軍、集体安全、德国統一等問題，——这里，除了报告所需要的部分以外，我不打算再一一重复了。特別是在联合国致力于和平解决苏伊士爭端和防止由于以色列、法国和英国进攻埃及而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的时候，我們的建設性的努力清楚地表現出自己的作用。今天已不难看出这种突出的努力的意义和深远影响。現在我可以說，我們深信事件的过程已經証實了我們的立場的建設性和正确性。

請允許我就今天中东的局势說几句话。自从联合国成功的干預恢复了这个地区的和平以后，至今仍有許多重要的問題沒有解决。首先，今天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进行侵略的以色列軍隊尚未撤出停战綫。到現在为止，以色列政府仍拒絕执行联合国決議，还只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并损坏这个政府在世界輿論面前的信誉。显然，任何利用由于强力所取得的优越地位，而把某些問題的解决，作为履行这一国际义务的先决条件(不管解决这些問題的必要性是否现实)，都是我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公众所不能接受的。这些問題應該在以色列撤軍以后，本着建設性的精神来加以解决。联合国定将利用他的崇高威信，依靠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在这方面所作的坚定努力，用一切办法来敦促以色列撤軍。只有用和平的方式，順利解决阿拉伯—以色列的关系問題，才能稳定这个地区的局势，并为居留在这里的人民从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独立發展創造条件。同时这一办法也能最有成效地防止今后的外来干涉，并使这一地区不再成为大国間利害

冲突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有害斗争的场所。

我已經提到了我們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我們在这个問題上也只是从这样的願望出發：尽快地恢复和平，防止冲突扩大。因此，我們在联合国内竭力主張采取那些在既定局面下，能促使十分混乱的情况最穩当，最迅速地正常化的措施，从而防止进一步的国际糾葛。

根据我們在联合国所采取的态度，我国对裁軍問題的观点也是众所周知的。南斯拉夫政府無論現在和将来都支持一切首創精神，不管它們来自那一面，只要它們能加速这个对整个国际关系以及維護和巩固和平具有头等意义的裁軍問題的解决。我們坚决主張禁止生产热核子武器并銷毀現有的一切儲备。假如現在不能对上述問題达成協議的話，那么作为一种过渡性質的措施，我們主張禁止和限制对以上武器做新的試驗，并实行国际监督。鑒于新試驗本身包含的危險性，我們認為，這個問題的拖延不决，是不可能用任何战略的、政治的和其他的理由加以辯解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临着这样的事实：所謂“战略性”的原子武器業已列入現代軍隊的常用軍备了。我們認為，这并不象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可以限制“大規模”热核子战争的危險性；与此相反，这正意味着使此种战争逐步合法化。同时，我們認為，“双方”都拥有的原子彈和氫彈的儲备，也不能意味着是对战争的自然而然的障碍。實質上，这种观点是要使原子彈、氫彈的进一步生产合法化。当然，我們也主張逐步削減常規軍备。我們相信，只要一切国家，特别是大国（这些問題的解决首先有賴于他們）对达成協議采取坚决的方針，那么相应的不可缺少的监督問題就会相当容易地获得解决。为了能在这个問題上取得进展，首先需要負有十分重大責任的大国能对上述問題坚决地采取必不可少的、維護和巩固和平的方針，而不要从这样的立場出

發：企圖在可能發生的戰爭中贏得一個幻想性的優勢。此外，我們相信：如果象印度這樣不屬於兩個集團中的任何一方面的富有聲譽的大國能夠參加直接討論這一問題的機構，那麼這個問題解決的前景就會好轉了。

總之，由於不久前和平受到了威脅，國際關係和鞏固和平的努力受到了打擊。但是，正與某些人的斷言相反，共處政策並不是不現實的。相反，在經過了這些挫折以後，更加明顯地看到，共處政策乃是調解與促進國際關係的唯一道路，是唯一能夠避免具有空前摧毀力的戰爭並具有生命力的出路。顯然，這種政策絕不會使不久以前造成嚴重國際糾葛的集團政策進一步尖銳化。

因此，我們相信：世界應該重新回到共處與在相互關係中採取忍讓政策的道路上來，回到和平解決爭端和發展國際合作與和解的道路上來。

而這種趨勢早在蘇伊士危機高潮的時期就已表現出來了。不應該忘記，當時並沒有人自動地從所屬集團的立場出發來採取行動。只是在聯合國內由於美國和蘇聯同其他國家在一起而構成了顯著多數，才導致了英、法、以軍事行動的迅速停止。這裡具有決定意義的不是個別一些國家的特殊利益，而是靠共同的力量保住了和平。

我們認為目前已有某些行動和跡象表明，有必要消除當前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的，並且可能是暫時的緊張狀態。這些積極和跡象包括：即將繼續舉行的有關裁軍問題的談判（在這方面顯然已經取得了某些新的相近的看法），聯合國會員國對有關阿爾及利亞和塞浦路斯問題的建設性的決議所表現的一致，蘇聯政府關於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關係問題的倡議，蘇聯政府有關保證中東和平和解決該地區國際問題的建議（這兩個建議在西



方某些方面已得到積極反应)；其次，还有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同苏联更好地相互諒解的声明，以及艾森豪威尔由于以色列拒絕履行联合国有关撤出停战綫的決議所發表的声明；也包括前苏联外交部部长于今年2月12日演說中的某些部分，特别是有关苏联政府忠于和平共处政策的部分等等。實質上，这些政府由于遭到世界和本国輿論的反击，越發不願意担負蘊藏着許多严重后果的国际局势进一步尖銳化的責任；这些政府日益理解到这种制造尖銳化的政策正是对于奉行这种政策的人本身是最大的危害；同时它們也理解到在巩固和平方面采取主动不仅有益于每一个人，并符合于普通的願望，而且，还会巩固执行这些政策的政府和国家的国际地位。

我應該特別指出联合国最近在緩和危急的局势所起的巨大作用。它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了，同时它的責任也进一步加重了。因此，所有国家的政府对联合国的責任也加重了。联合国除了由于其反映了世界上各种不同利益和矛盾关系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的缺陷以外，它已日益成为調整国际关系和解决国际問題的一个有力的独立因素。南斯拉夫政府在将来也要象过去一样，对这个世界組織及其宪章的原則和宗旨給予積極的支持。

同时，我們也不能忽視目前国际局势的其他消極因素。这些消極因素是很多的，而且其中某些因素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我在这兒曾有意識地着重提到那些表明有可能迅速恢复建設性合作的積極現象。但我們意識到須要进行極大的努力，才能使这个積極的方針占上風。为了国际合作，为了本国安全和普遍安全，并且为了巩固世界和平，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今后仍将和过去一样，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会尽最大的努力。